

苏联历史
档案选编

—— 第 4 卷 ——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第 4 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赵国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赵国顺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内部发行)

ISBN 7-80149-634-5

I. 苏… II. ①沈… ②赵… III. 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苏联-现代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5922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4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赵国顺

责任编辑: 章若男 刘仲亨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本《选编》正文用纸由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20.25

字 数: 486 千字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34-5/K·086 全套定价: 4000.00 元

内部发行 不得公开引用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明* 于沛 王正 石泽

叶军 叶书宗* 刘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一 姚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档案文献共编为 12 个专题，时间范围从 1918 年到 1956 年。

“皮萨列娃关于红色恐怖的日记”：本专题收入的是曾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格·叶·李沃夫的姑妈皮萨列娃 1918 年 1 月至 3 月的日记，日记记述了她本人在这 3 个月红色恐怖中的生活感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维埃俄国的状况。

“肃反委员会和肃反工作”：本专题选编的是 1918 年 4 月至 1921 年 4 月期间有关肃反委员会的文件，其中包括捷尔任斯基个人档案中的来往信件、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关于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相互关系问题的会议记录，以及有关肃反委员会工作和反映肃反委员会问题的信件等。这些文件既说明了肃反委员会所起的社会作用，也反映出在肃反委员会掌握无限权力以后苏联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异化的某些现象。

“俄共（布）八大中的军事问题”：本专题收入的是有关 1919 年 3 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小组会议和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速记记录。文献披露了当时俄共（布）党内军事问题上的分歧，及中央多数派和“军事反对派”各自的看法。

“作家柯罗连科眼中的红色恐怖”：本专题选编的俄国著名的作

家和政论家柯罗连科 1919 年 3 月至 1921 年 6 月给他的老朋友、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拉柯夫斯基的 34 封信。这些信件，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红色恐怖政策的不满，以及对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担心。

“列宁在 1920 年的几个讲话”：本专题收入的是《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出版后苏联和俄罗斯披露的有关列宁在 1920 年的 4 篇新文献，即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讲话的速记记录、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总结发言，以及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回答与会代表提问的记录。

“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本专题收入的 7 份关于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 1920 年 10 月至 1921 年 7 月的档案文献，包括暴动者的宣言和镇压暴动者的决定及有关报告，从一个地区的角度反映出广大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余粮收集制”强烈不满和抵制。

“苏俄驻爱沙尼亚使团的报告”：收入本专题的 1920 年 9 月 29 日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特别委员会“关于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秘密工作条件”的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俄开展外交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年轻的共产党外交人员的对外政策思维。

“关于富农迁徙问题（一）”：本专题收入的是 1928 年 6 月至 1931 年 12 月有关富农政策和驱赶富农运动的几个文件，弗鲁姆金给政治局的信反映了集体化运动初期党内对富农政策的不同意见，乌拉尔州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和富农事务委员会的文件则反映了迁移富农政策实施的一些具体情况。

“大清洗中的外国侨民”：本专题选入了 30 年代中期波兰共产党员贝格在狱中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以及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雅凯尔的书面报告，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苏联安全部门在大清洗时期对包括外国侨民在内的政治犯的审讯过程和残酷手段，以及由此在政治侨民中引起的恐惧、普遍的不信任、孤僻冷漠和绝望的情绪。

“叶若夫案件”：本专题收入了1938年11月关于大清洗的执行人叶若夫被免职的3个文件，以及他本人被执行枪决前在军事法庭的最后陈述。

“苏德秘密协定与战前苏德关系（一）”：本专题收入了52份关于苏德外交关系的档案文献，其中包括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往来电报、苏德两国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记录、苏德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和秘密协定等，揭示了1939年8月至10月苏德改善政治关系的过程、苏德划分势力范围的政治交易谈判经过，以及1940年底苏德之间在处理一系列欧洲和全球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

“沃尔科娃与基洛夫案件”：本专题选编的是1956年沃尔科娃关于基洛夫被害案件给苏共中央的告密信，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这一信件真伪进行调查的结论性报告。这一持续了20多年的政治揭发及其回应的过程，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苏联30年代形成的政治审查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同时也说明法制不健全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幸。

赵国顺

2001年2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4 - 1

皮萨列娃关于红色恐怖的日记

(1918年1月至3月)

专题说明 4 - 1

№06260 皮萨列娃的日记
(1918年1月10日至3月26日) 4 - 2

肃反委员会和肃反工作

(1918年4月至1921年4月)

专题说明 4 - 13

№03292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理事会关于释放伊林致
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4月16日) 4 - 14

№03293 波尔托拉茨卡娅女子高级学校管委会主席团关于
释放伊林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4月18日) 4 - 16

- №03294** 莱温松、马利宁关于为伊林担保致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4月19日）…………… 4-17
- №03295**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关于为伊林担保致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4月25日）…………… 4-18
- №02260** 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记录（1918年6月12日）…………… 4-19
- №03296** 雅科夫列夫为伊林申辩致列宁的信（1918年8月24日）…………… 4-21
- №02261**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契卡工作给俄共（布）各省委员会的信（1918年10月16日）…………… 4-23
- №02262** 全俄肃反委员会俄共（布）党团组织关于《周刊》事件的决议（不晚于1918年11月14日）…………… 4-25
- №03297** 法学女子高级班班长委员会请求释放伊林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11月15日）…………… 4-27
- №02680** 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关于肃反委员会与革命法庭关系问题的会议记录（1919年1月30日）…………… 4-28
- №03131** 比亚雷尼茨基-比鲁利亚关于“海鸥”庄园给沃伊诺夫的信（1919年9月8日）…………… 4-41
- №03113** 高尔基关于释放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给列宁的信（不早于1919年10月6日）…………… 4-43
- №05305** 谢杰尔尼科夫关于苏维埃的腐败现象给列宁的信（1920年4月23日）…………… 4-47
- №02263** 萨姆索诺夫关于消灭宗教问题给捷尔任斯基的信（1920年12月4日）…………… 4-67

№03114	克鲁泡特金关于人质问题给列宁的信 (1920年12月21日)	4-70
№02264	萨姆索诺夫关于监狱状况给捷尔任斯基和克谢诺 丰托夫的报告 (1921年1月20日)	4-73
№02265	捷尔任斯基关于使用极刑等问题给俄共(布)中 央的信(不晚于1921年1月25日)	4-76
№02266	捷尔任斯基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肃反委员会 条例草案的意见(不晚于1921年3月)	4-79
№02267	土耳其斯坦前线特别局库什克分局向俄共(布) 中央的声明(1921年3月18日)	4-82
№02269	瓦尔金-姆格拉捷关于各党派的态度给俄共(布) 中央和莫斯科执委会的信 (1921年4月11日)	4-86
№02268	捷尔任斯基对土耳其斯坦前线特别局库什克分局 声明的答复结论(1921年4月23日)	4-90

俄共(布)八大中的军事问题

(1919年3月)

专题说明	4-91
№05221 军事小组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 (1919年3月20日)	4-93
№11676 军事小组第二次会议速记记录 (1919年3月21日)	4-141

- №05222 讨论军事问题的全体会议速记记录
(1919年3月21日) 4-163

作家柯罗连科眼中的红色恐怖

(1919年3月至1921年6月)

- 专题说明 4-219
- №01680 柯罗连科关于新政权的统治方法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3月20日) 4-220
- №01681 柯罗连科关于帮助朋友迁居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4月10日) 4-227
- №01682 柯罗连科关于搭救被捕者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4月15日) 4-229
- №01683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和出版等事宜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5月4日) 4-231
- №01684 柯罗连科关于出版社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5月18日) 4-236
- №01685 柯罗连科关于哈尔科夫文化协会等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2日) 4-239
- №01686 柯罗连科关于肃反委员会枪决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11日) 4-243
- №01687 柯罗连科关于人质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18日) 4-247
- №01688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奥斯特洛夫斯基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20日) 4-251

- No01689** 柯罗连科关于逮捕诺索维奇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7月15日) 4-258
- No01690** 柯罗连科关于奥杰尔受到指控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2月27日) 4-259
- No01691** 柯罗连科关于奥杰尔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3月12日) 4-261
- No01692** 柯罗连科关于搭救梅利古诺夫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3月29日) 4-262
- No01693** 柯罗连科关于调查“征用”行为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4月4日) 4-264
- No01694** 柯罗连科关于政治处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约于1920年5月) 4-265
- No01695** 柯罗连科关于格尔施泰因案件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5月5日) 4-267
- No01696** 柯罗连科关于随意枪决行为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6月7日) 4-268
- No01697** 柯罗连科关于行政判决和死刑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6月11日) 4-270
- No01698**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女学生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7月6日) 4-274
- No01699** 柯罗连科关于拯救儿童同盟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10日) 4-276
- No01700** 柯罗连科关于制止枪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13日) 4-278
- No01701** 柯罗连科关于保释托卡列夫斯基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21日) 4-279

- №01702** 柯罗连科关于托夫卡奇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31日) 4-281
- №01703** 柯罗连科关于枪毙人质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0月12日) 4-283
- №01704** 柯罗连科关于别涅夫斯卡娅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
的信(1920年11月2日) 4-286
- №01705** 柯罗连科关于采特林案申诉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1月5日) 4-288
- №01706** 柯罗连科关于行政性流放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1月11日) 4-289
- №01707** 柯罗连科关于费先科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1月18日) 4-291
- №01708** 柯罗连科搭救托尔斯泰的侄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2月29日) 4-292
- №01709** 柯罗连科关于用行政方式处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1年1月27日) 4-293
- №01710** 柯罗连科关于接待杜德钦柯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1年2月5日) 4-294
- №01711** 柯罗连科关于应通过法庭进行审判给拉柯夫斯基
的信(1921年2月15日) 4-295
- №01712** 柯罗连科关于天主教神父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
信(1921年3月7日) 4-298
- №01713** 柯罗连科关于契卡未经批准实行枪决给拉柯夫斯
基的声明
(1921年6月15日) 4-299

列宁在 1920 年的几个讲话

(1920 年 1 月至 10 月)

- 专题说明 4 - 301
- No06544 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920 年 1 月 12 日) 4 - 303
- No06548 列宁在俄共 (布) 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俄共 (布) 中央的政治报告
(1920 年 9 月 22 日) 4 - 309
- No11675 列宁在俄共 (布) 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俄共 (布) 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1920 年 9 月 22 日) 4 - 336
- No06545 列宁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问 (1920 年 10 月 2 日) 4 - 340

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

(1920 年 10 月至 1921 年 7 月)

- 专题说明 4 - 348
- No05194 劳动农民联盟区委会告红军战士书
(1920 年 10 月) 4 - 349
- No05197 暴动农民的部队告应征红军战士书
(1920 年 11 月) 4 - 351

- №05196** 卡麦隆关于坦波夫省暴动持久原因的报告
(不早于1921年1月3日) 4-353
- №05193** 给坦波夫省各镇压起义部队的命令
(1921年3月13日) 4-361
- №05195** 图哈切夫斯基致前线全体红军战士书
(1921年5月19日) 4-363
- №05191** 舍伊杰曼和瓦西里耶夫给图哈切夫斯基的通知
(1921年6月21日) 4-364
- №05192** 图哈切夫斯基给粮食征集委员会的命令
(1921年7月8日) 4-365

苏俄驻爱沙尼亚使团的报告

(1920年9月)

- 专题说明** 4-366
- №04015** 特别委员会关于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秘密工作
条件的报告
(1920年9月29日) 4-367

关于富农迁徙问题·(一)

(1928年6月至1931年12月)

- 专题说明** 4-402
- №07321** 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的信(摘录)(1928年6月15日) 4-403
- №07322** 乌拉尔州委第61次秘密会议记录
(摘要)(1930年1月22日) 4-405

- №07323**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关于“进入战备状态”的通知（1930年2月6日）…………… 4-407
- №07325** 富农事务委员会关于遣送富农的会议记录（摘要）（1931年7月8日）…………… 4-409
- №07324** 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 4-413

大清洗中的外国侨民

（1936年2月至1938年4月）

- 专题说明**…………… 4-415
- №04019** 贝格关于“波兰军事组织”案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2月3日）…………… 4-416
- №04030** 迪特里希给德共中央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处的报告（1938年4月29日）…………… 4-422

叶若夫案件

（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

- 专题说明**…………… 4-430
- №04021**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1938年11月17日）…………… 4-432
- №04022** 叶若夫关于辞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38年11月23日）…………… 4-439

- №040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免去叶若夫内务人民
委员职务的决定
（1938年11月24日） 4-443
- №06447** 叶若夫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秘密受审时的最后陈
述（1940年2月3日） 4-444

苏德秘密协定与战前苏德关系（一）

（1939年8月至1940年11月）

- 专题说明** 4-451
- №05763** 舒伦堡关于递交柏林声明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
（1939年8月15日） 4-453
- №05764** 舒伦堡面交莫洛托夫的柏林声明
（1939年8月15日） 4-456
- №05765** 舒伦堡关于促成同里宾特洛甫会面与莫洛托夫的
谈话记录（1939年8月17日） 4-458
- №05766** 舒伦堡面交莫洛托夫的德国备忘录
（1939年8月17日） 4-461
- №05767** 莫洛托夫面交舒伦堡的苏联备忘录
（1939年8月17日） 4-462
- №05768** 舒伦堡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内容与莫洛托夫的谈话
记录（1939年8月19日） 4-464
- №05769** 莫洛托夫面交舒伦堡的苏德条约草案文本
（1939年8月19日） 4-467
- №05770** 苏德贸易信贷协议
（1939年8月19日） 4-469

- No05771** 德国公司应提供的用苏德信贷协议贷款支付的各种设备（第一清单）
（1939年8月19日） 4-475
- No05772** 德国公司应提供的以苏联出口即行收入的自由资金支付的设备和物品（第二清单）
（1939年8月19日） 4-477
- No05773** 根据苏德信贷协议苏联所应提供的货物
（第三清单）（1939年8月19日） 4-479
- No05774** 苏德关于贸易信贷协议的秘密协定书
（1939年8月19日） 4-481
- No05775** 苏德关于贸易和信贷谈判的最后议定书
（1939年8月19日） 4-483
- No05776** 施努列关于德国政府将协助完成订货给巴巴林的信
（1939年8月19日） 4-484
- No05777** 巴巴林关于立即通知开始订货谈判给施努列的信
（1939年8月19日） 4-485
- No05779** 希特勒关于接受互不侵犯条约草案给斯大林的电报
（1939年8月21日） 4-487
- No05780** 斯大林关于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给希特勒的电报
（1939年8月21日） 4-489
- No05782**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苏德谈判消息给法国外长乔·博内的电报
（1939年8月22日） 4-491
- No05783** 法外长博内关于敦促波兰保持沉默给法驻波大使莱·诺埃尔的电报
（1939年8月22日） 4-492

- №05784** 迈斯基关于英国对里宾特洛甫访苏反应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
(1939年8月22日) 4-494
- №05785** 法驻波大使诺埃尔关于同贝克会谈情况给法外长博内的电报(1939年8月23日) 4-496
- №05786** 贝克关于对波苏军事合作立场给波兰外交代表机构的电报(1939年8月23日) 4-498
- №05756** 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23日) 4-499
- №05787**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波兰立场给法驻波大使诺埃尔的电报(1939年8月25日) 4-501
- №05789**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伏罗希洛夫答记者问给法外长博内的电报
(1939年8月27日) 4-502
- №05790** 莫洛托夫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开讲话
(1939年8月31日) 4-506
- №05791** 雷巴尔科和沙罗诺夫关于德国入侵波兰致国防人民委员和外交人民委员电
(1939年9月1日) 4-515
- №05792** 迈斯基关于英国政府通报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9年9月3日) 4-516
- №05754** 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
(1939年9月27日) 4-517
- №05755** 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
(1939年9月28日) 4-527
- №05761** 苏德关于划分利益范围的秘密补充协定书
(1939年9月28日) 4-537

- №05762** 苏德关于边界划分的秘密协定书
(1939年10月4日) 4-538
- №11677** 莫洛托夫关于斯大林对其柏林之行指示的记录
(1940年9月9日) 4-543
- №05794** 斯大林关于删除印度条款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1日) 4-547
- №05795** 莫洛托夫关于收到来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1日) 4-548
- №05793**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2日) 4-549
- №05796** 莫洛托夫关于与里宾特洛甫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
电报(1940年11月12日) 4-557
- №05797** 斯大林关于芬兰问题说法不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2日) 4-559
- №05798** 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2日) 4-560
- №05799** 莫洛托夫关于与希特勒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4-569
- №05800** 莫洛托夫关于改变芬兰问题说法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4-573
- №05801** 莫洛托夫关于与希特勒谈判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4-574
- №05802** 斯大林关于与希特勒谈判方针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4-575
- №05803** 斯大林关于与希特勒谈判策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4-576
- №05805** 莫洛托夫关于同戈林和赫斯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
电报(1940年11月13日) 4-577

- №05804** 莫洛托夫关于在黑海等问题上力争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4-578
- №05806** 希特勒和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3日) 4-579
- №05807**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3日) 4-592
- №05808** 莫洛托夫关于同希特勒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4日) 4-600
- №05809** 莫洛托夫关于不再报告谈判细节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4日) 4-603
- №05811** 莫洛托夫关于苏驻德大使回国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4日) 4-604
- №05812** 魏茨泽克给德驻外使团的通电
(1940年11月15日) 4-605

沃尔科娃与基洛夫案件

(1956年5月至12月)

- 专题说明** 4-606
- №06207** 沃尔科娃关于基洛夫暗杀事件给苏共中央的信
(摘录)(1956年5月30日) 4-607
- №06208**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审查沃尔科娃
的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摘录
(1956年7月18日) 4-616
- №06209** 彼得罗夫致苏联检察院的申诉
(摘录)(1956年12月12日) 4-622

【专题说明】

皮萨列娃关于红色恐怖的日记

(1918年1月至3月)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面对复杂、混乱的国际和国内局势，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红色恐怖政策，对一切危害或可能危害苏维埃国家政权的行为实行无情的镇压。这种状况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反应。本专题选编的皮萨列娃日记就是这些反应中的一种。

叶·帕·皮萨列娃是格·叶·李沃夫的姑妈，而李沃夫（1861～1925）是沙皇俄国的公爵，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在1917年2月至7月曾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因此，皮萨列娃对1918年最初几个月俄国社会状况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敌对势力的心态和看法。

（本专题文件由孙凌齐、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赵静男翻译）

№06260

皮萨列娃的日记

(1918年1月10日至3月26日)

1月10日

立宪会议终于在6日开幕，可是布尔什维克却把它驱散了。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站在他们一边。塔夫利达宫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头都发生了冲突，布尔什维克从房顶上向由工人组成的和平示威队伍开枪射击。有许多人受伤。令人担忧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说立宪会议的一些成员被打死了，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期待着邮电工人和铁路工人罢工以示抗议。

1月10日

传来可怕的消息，说盛加略夫^①和科科什金^②被人打死了。他们同其他一些部长一起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可是这两个人有病，科科什金平时身体就很虚弱，近来被转移到玛丽因医院。1月初，发生了刺杀列宁的事件，没有成功。这激怒了布尔什维克人群，他们本来已经狂暴得发疯，这时冲进玛丽因医院，把这两个不幸的人拖出来打死了。我吓得魂不附体。特别可怜科科什金，这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教授，具有非凡的智慧，为人开朗公正。格里戈

① 盛加略夫，安·伊·（1869～1918），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和财政部长。

② 科科什金，费·费·（1871～1918），1917年任临时政府国家监察长。

里^①时常求助于他。很器重他那些聪明的乐观的议论。也很可怜盛加略夫。

1月12日

今天拉德仁斯基到秋明来了，他是个很能干的工程师，曾在前线工作时，他到彼尔姆省来休息，他出生在那里，还准备周游西伯利亚的城市，以便调查清楚能否指望在那里招募志愿军在阿列克谢耶夫^②的领导下帮助卡列金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据拉德仁斯基说，“原来在顿河，在乌克兰和高加索，正在顺利地招募这样的志愿军，准备归到阿列克谢耶夫那里去。美国向阿列克谢耶夫和卡列金提供大笔金钱。很多人无事可做，而领取薪俸25卢布，吃穿就有了保障，因而吸引来很多人。”在莫斯科，列昂季耶夫和……热情地着手帮助做这件事。格奥尔基^③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不可能建立军队。然而，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以便摧毁布尔什维克并且不彻底陷入德国人的奴役。

从那里得到来自高加索的好消息，在叶森图基生活都很好，很平静，有很多熟人，孩子们健康。但是那里的情绪也很不稳定，年老的哥萨克忠诚，年轻的都被传染上了布尔什维主义。

1月29日

埃莱尔到鄂木斯克去，顺路到我们这里来了一天，我们见到他都非常高兴，向他奔过去，都期望从他那里听到新的、明确的和给

① 这里指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的宠臣格·叶·拉斯普廷。

② 阿列克谢耶夫，米·瓦·（1857~1918），沙俄将军，1917年3月至5月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领导白卫“志愿军”。

③ 这指格·叶·李沃夫公爵。

人以安慰的事，可是他能够告诉我们的并不多，莫斯科也是这样朦胧，一片浓雾，不可靠的消息倒是很多，真假难辨。他能够通报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高兴，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积极的光亮。格奥尔基向他询问列昂季耶夫参加的那个社会组织。他说，按照他的意见，没有任何实际可行的东西，他们现在正在忙于起草土地法。

1月30日

今天格奥尔基在1月28日的报纸上读到彼得格勒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消息。起因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破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宗教游行的队伍从修道院出发，向喀山大教堂进发，其他一些教堂的游行队伍也加入进来。整个涅瓦大街，从修道院直到喀山大教堂，人如潮涌，大约有30万人参加，人群里有工人，也有士兵。当游行队伍和人群停在大教堂附近的时候，人群里有人喊道：“基督复活了”，维尼阿明主教听见后回答说：“是的，基督复活了”。人群随着喊起来，情绪高昂，唱起了复活的赞美诗，群情振奋。与此同时，这份报纸还刊登了关于教会脱离国家的法令，说教会是属于人民的。这就为亵渎神明的抢劫和侵犯向圣徒大开了教堂之门。报纸上首次出现了这样的消息，说阿列克谢耶夫的突击队占领了沃罗涅日和一系列车站，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击。布尔什维克被这样的示威吓坏了，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短评，他们竭力对修道院里发生的事轻描淡写。

2月1日

昨天，科洛科尔尼科夫^①带来了24日的报纸，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宣布，他们归政府领导。虽然他们指责人们进行破坏，但

^① K.A. 科洛科尔尼科夫，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神父，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

是害怕大批人民群众在目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和情况可能向右转向反革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最低限度证明他们惊慌失措和软弱无力。

2月1日

今天证实了报纸上关于阿列克谢耶夫的突击队出击的消息，他制定了直到占领莫斯科和雷宾斯克的计划，以便切断南方。科尔尼洛夫指挥突击队，而阿列克谢耶夫则是参谋长。我们第一次得到这样的消息，这证明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而采取了正面的行动。消息具有重大的意义。胆战心惊，他们下一步的成就将是什么样的呢。这份报纸还有一条消息说作为克雷连科助手的哥萨克杀死了一名水兵，我不记得他的姓名，在他身上发现了40亿的支票，他正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没有军队，军队全都瓦解了，虽然在行动上也出现了关于动员的法令，可是它没有意义，因为前线已经没有剩下一兵一卒。布尔什维克如今只能依靠赤卫队，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力量。

关于阿列克谢耶夫的消息令人不安，据说他的军队在沃罗涅日和塔士罗格附近都遭到了失败，不能完全相信这些消息，因为这都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消息，可是如果不是失败，那么胜利，或许也不在阿列克谢耶夫方面。

四处传播着德国人占领一系列城市的消息，德文斯克、明斯克被占领了，普斯科夫被围，这个消息不管说起来多么可怕，但还是引起多数人的高兴，多数人没有任何爱国主义感情，这是反常的，但仅仅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安宁，的确是非常疲惫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为生命和财产胆战心惊，大家都渴望秩序。可是这也让人感到羞耻，非常懊恼。据说列宁逃跑了。确切的消息仍然没有。关于教会的法令引起了强烈的愤怒。这是对俄国最后一次可怕的重

大打击。如果我们没有力量保卫教会，这就将是我们在精神上的死亡。

2月11日

莫斯科举行宗教游行，吸引了数十万虔诚的教徒参加，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宗主教吉洪、修士司祭阿列克塞和来自扎萨诺德修院的德高众望的长老。大家都由于虔诚的信仰以及对遭受迫害的教会的爱戴和忠诚而团结在一起，他们准备保卫教会。我们秋明也举行了宗教游行，准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最近几天与布尔什维克谈判，他们在数天前占领了城市，他们警告说可能要开枪，他们不能保证平安无事，只不过是使这次游行夭折罢了。今天在教堂里宣布说游行取消了，可是老百姓不同意，在天启大教堂附近有一大群人站了很长时间，最后神职人员终于下了决心，出来了，拿出来神幡和圣像，游行队伍出动了，走过了几条街，其他一些教堂的游行队伍也加入进来，人群集聚了数千人。有敲钟声，没有任何枪声，大家都很高兴和心满意足，这可能表现出对教会的忠诚和对布尔什维克挑战的蔑视。

2月14日

布尔什维克已经出现好几次了，但是在秋明并没有呆下来，他们最后一次到来是比较正规的，他们宣布秋明已被占领，处处都安置了自己的政治委员，到处进行搜查和财产充公，起初收去武器，后来拿走一切粮食。洛普欣家发生一次莫名其妙搜查，一名水手粗野而厚颜无耻，带着两个士兵，翻腾了一通，甚至走进儿童室，孩子们正在睡觉，他们把孩子们的衣服都翻腾了。戈利岑^①家也

^① 戈利岑，尼·德·（1850～1925），沙俄大臣会议最后一任主席。

搜查了。没有搜查我们家。这一队布尔什维克走了，带走了征收的一切。接着又来了一个讨伐队；谁知他们要讨伐什么人。他们让我们这个和平宁静的城市充满了恐怖。这个讨伐队的首领是整个北方地区和西西伯利亚政治委员扎伊普库斯，他是个年仅 19 岁的孩子，他签署了各种命令，一个比一个疯狂，威胁说，两次不履行命令和法令就枪毙。宣布城市处于军事状态。为什么——没有人晓得，整个城市再温顺不过的了，不进行任何反抗。有一道命令要求向司令部交出武器和金银制品。这些温顺的市侩真够可怜的。

3 月 9 日

德国人的进攻得到了证实，报纸上有一切细节。我们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绝望，这样惊恐，三年半的时间里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和牺牲，最后却陷入德国人的奴役之中。

3 月 12 日

据传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签署了和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比德国人的奴役还可怕。我们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要从两种毁灭中选择一种：布尔什维克的还是德国人的——我们宁肯选择后者。

3 月 13 日

今天报纸上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准备接受的条件，它们是：（1）割让里夫兰、库尔兰和爱斯兰，（2）军队——赤卫队和红军转入和平状态，（3）从芬兰撤军，（4）停止与拉达的战争，（5）放弃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制度的宣传，（6）免税从俄国调运矿石等。这个“等”字很能说明问题，这后面还隐藏着许多东西。看来我们如今已经沦落到耻辱和绝望的日子了。莫斯科武装起义之后，科特利亚

列夫斯基^①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跟他谈到，在所经受的一切当中有一点很小的安慰，这就是〔我们〕可能已经沦落到最底部，再往下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如今没落到难以估计的地步！当然，一个强国的历史同大俄国一起结束了。它如何复兴，无法想象。格奥尔基心情很沉重。他一直说，如今俄国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它不能在国内组织拯救，因为它垮了，拯救只能来自国外。他认为盟国能够帮助它站起来，可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过俄国会落到德国人手里。可怕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布尔什维克从海上轰击雅尔塔，持续了一个星期。560发炮弹射向海滨大街，许多旅馆和民房被毁。可怜的布捷涅夫一家英勇地经受了这种考验，全都活下来，没有受到伤害。他们经济状况非常困难，生活用品的价格飞涨，他们将自己的住宅出租了两个房间。我非常可怜他们，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巴拉诺夫一家继续住在梁赞省科莫林诺，他们的消息更让人不安，毗邻的索洛维耶夫斯基村的农民威胁要毁灭他们，科莫林诺村的农民要保护他们，有一个军事委员给他们派来由8人组成的一队龙骑兵保卫他们。索洛维耶夫斯基人在城里控告这些龙骑兵，最后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遣送到毗邻的村子，索洛维耶夫斯基人与科莫林诺人一起来了，毁了打谷场，赶走了马和牛羊，拉走了粮食。这一切本来都瞒着可怜的萨舒尔卡，可是他还是知道了发生的事情，这个不幸的人重病在身，还是跑去保卫通过自己顽强的劳动挣来的财产。他得到的只是屈辱，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弄走，对他进行安慰。他们像是温顺的羊羔，泪流满面，把自己的贵重物品都乖乖地送给新的掠夺者，一种不愉快的孤立无助的感觉笼罩着我们。关于阿列克谢耶夫的消息最悲惨，虽然还很模糊，他带着自己的突击队

^①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谢·安·（1873～1940），俄国教授，政论家，立宪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撤退，遭到失败。他的命运继续是悲剧性的。格奥尔基回忆说，阿列克谢耶夫早在8月份开会的时候就对他说过，对哥萨克不能指望，不能依靠。格奥尔基从来都不相信哥萨克，因为他们被旧的制度给惯坏了，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但是现在他却不得不跟哥萨克一道打仗，因为军官与哥萨克不和，破坏了他的力量。卡列金由于跟阿列克谢耶夫发生分歧而自杀，他反对哥萨克可能是对的。

3月15日

科利亚来了。科利亚带来一个完全让人沮丧的消息，巴拉诺夫一家被关进了韦纽夫监狱，他看见过他们，他们头几天非常糟糕，就睡在地板上，甚至他们的东西都没有给他们。科利亚现在正在跟当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谈判，现在他们的处境好一些，答应释放他们。他们正在张罗此事。大浩劫之后，纳斯简卡往米哈伊洛夫斯克写了封信，从那里派来了一些赤卫队员，他们跟索洛维耶夫斯基的农民交了火，一个农民被击毙。于是索洛维耶夫斯基人完全疯狂了，向韦纽夫发出控告巴拉诺夫一家的信，指控他们挑唆，从韦纽夫派来一些赤卫队员逮捕巴拉诺夫一家，他们非常气愤，不断威胁要枪毙，把手枪顶在他们身上，挖苦和谩骂，无所不用其极。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竟然毫毛未损。科利亚到韦纽夫去了，他坚信不能见到他们活着了。癫痫没有发作。我们曾经盼望科利亚来，可是他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最大事件——德国人的进攻，压倒了其余的一切，超过了一切——他讲述道，莫斯科有一组织，名叫“俄国事业”，目前正在拟定法案。有许多单独的小组正在筹划武装起义。列昂季耶夫给格奥尔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叫他回去参加他们的工作，责备他抛弃了自己信中所表述的一切意思，把社会事业换成了投机勾当。这封信让我非常激动，可是格奥尔基绝对不信任他们的工作，认为他们佯装支持其工作。实际上这种工作没

有任何基础——此外，他的力量已经受到破坏，因此他不能而且也没有力量参加他认为是“没有前景的事业”，坐在那里开会讨论委员会的法案这是他所不愿意干的事。去从事完全不信任的事，这是一种犯罪。〔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可是毕竟让人懊恼，莫斯科认为我们来到西伯利亚纯属是从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考虑的。

3月17日

谢苗诺夫占领了伊尔库茨克，他正在向托木斯克进军。扎普库斯所领导的讨伐队降调了，急匆匆应召到鄂木斯克去加强那里的守备，但也有人说是到叶卡捷琳堡去了。哥萨克去攻打车里雅宾斯克……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叛乱。想要向秋明的资本家们索取200万军饷，资本家们开始讨价还价。可能分文不给。谢苗诺夫——这差不多是个神话般的人物，关于他的进军没有任何详细消息，他是孤军深入还是带领哥萨克和中国人呢。或者他背后有盟国支持，一无所知。

3月19日

昨天，18日，来了正式电报。彼得格勒被德国人占领了，他们也要逼近莫斯科，占领了离勒热夫不远的祖勃科夫。有可靠的消息说列宁逃跑了，托洛茨基启程赴西伯利亚，在彼尔姆被当地布尔什维克留住了，幸亏他暂时要留在那里。19日，车里雅宾斯克、乌法、奥伦堡可能是被不知名的哥萨克或者白卫军占领，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垮台了。

3月20日

格奥尔基近来感到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我高兴看到他精力旺盛，希望找到一条道路和为俄国的复兴而工作。他今天长时间地谈

论西伯利亚，兴趣异常浓厚，情绪高昂，讲述西伯利亚对俄国能起到的作用。俄国已经满目疮痍，恢复应该从边缘地区开始，但高加索和其他一些边缘地区对于俄国来说是陌生的。西伯利亚居民都是大俄罗斯人，这里的人民多数是朝气蓬勃的，有才干，不轻易激动，根基很牢固。但西伯利亚自身却一事无成，需要吸引同盟者——美国、英国，给他们提供广泛的可能性，让他们向西伯利亚投资，开发西伯利亚的财富，在工业的基础上与德国人斗争，他描绘了广阔的计划。他这几天打算到托木斯克去见马库申，虽然他也认为这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未必能了解西伯利亚对待他的方案的态度。格奥尔基认为，他如果在西伯利亚能够遇到同情，他就能到美国去见威尔逊。

3月22日

昨天晚上本地报纸上刊登一条消息，终于跟德国人签订了和约，在这段时间里，德国人又增加了一项条款——从我们手里为土耳其夺去了卡尔斯和巴统。批准和约应该是于17日在莫斯科举行，就是说，苏维埃政权保留下来，德国人承认它——又是难以言表的痛苦；可怜的格奥尔基夜里睡不着觉，无精打采，失去信心。今天他到城外去察看给我准备的一处度夏的地方，也许想要转移一下注意力，天气非常好。

3月26日

消息很少而且很含糊，昨天流传一些难以置信的消息，说以古契科夫^①和格·李沃夫公爵为首的俄国新政府在北京装备军队，与中国人和盟军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可能谢苗诺夫与北京发生的事

^① 古契科夫，亚·伊·（1862—1936），李沃夫政府的陆海军部长。

有关。继续谈论美国的广泛计划，让我很痛苦，我们了解得很少，没有任何实际材料，制定计划是非常困难的。非常高兴地得悉，昨天的谈话结束了，决定派人到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和更远的地方去了解信息。决定把3.召来，派他去侦察情况。不给到莫斯科去的车票，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饥荒。今天Г.收到老同事特列斯金的来信，他曾经是法院的副检查官，现在全家靠着修理煤油炉和送报为生，他的状况十分困难，购买1磅面包要3个卢布，鸡要14个卢布，猪肉要7个卢布，火腿要14个卢布，莫斯科来信简直是让人忧心如焚，人人都挨饿，请求给寄食品，可是我们却收不到邮包，洛普欣的住宅已经有人来看了三次，大家都想把它没收，终于今天来人宣布命令，要求三天之内把住宅给腾出来，让他们住另外一套二室的住宅，按照这些人的意见，所有17口人很容易住得下，岂有此理，让人气愤。

【专题说明】

肃反委员会和肃反工作

(1918年4月至1921年4月)

肃反委员会全称“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是苏俄第一个国家安全部门。它是在十月革命后国家机关旧职员怠工给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建立和工作造成极大困难的情况下成立的。最初它的主要职能仅仅是进行侦查和预审，在1918年初德国进攻彼得格勒的紧急情况下才授予它对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者采取各种非常措施的权力。肃反委员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当时它是高度集中、不受任何机关和群众监督的机构，因而时常发生滥用职权的事情。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肃反委员会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的延续，对苏联后来政治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专题选编的文件包括捷尔任斯基个人档案中的来往信件、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关于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相互关系问题的会议记录，以及有关肃反委员会工作和反映肃反委员会问题的信件等等。

(本专题文件由孙凌齐、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由王宏达、赵宏、李树柏、孟韵怡、陈俐佩翻译)

No03292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理事会
关于释放伊林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4月16日)

致肃反委员会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理事会认为必须释放担任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工会组织理事会主席的编外副教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①，因为：(1) 他的病情（左肺和鼻咽部粘膜炎）会急剧恶化和出现并发症；(2) 他在大学内和莫斯科市其他高校中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十分重要。

协会理事会愿意为编外副教授伊·亚·伊林担保。

协会理事会副主席

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 卡普捷列夫^②

协会理事会委员：

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兼助教 科斯明斯基^③

编外副教授兼外科病理学教研室主任资深助手、

医学博士 格拉韦

① 伊林，伊·亚·（1883～1954），哲学家、法学家、政论家、神学家。1918年4月15日因“反革命保皇组织活动”的罪名而被捕。1922年9月12日被驱逐出境。

② 卡普捷列夫，帕·尼·（1889～1955），地理学博士，教授。

③ 科斯明斯基，叶·亚·（1886～1959），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

莫斯大学编外副教授（签字）^①

理事会秘书、编外副教授兼青年助手 克列切托维奇

记录员：

留校人员 阿赫马诺夫

留校人员 彼得罗夫斯基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情况，兹补充说明如下：（1）伊·亚·伊林的病情要求遵守严格饮食规定和进行正规治疗，这可由治疗医生、医学博士古戈·阿道福维奇·利文塔尔予以证明；（2）伊·亚·伊林的两篇学位论文正在排印，需要他经常不断地加以检查；（3）一个月后将举行硕士学位授予讨论会和其中一篇论文的答辩。

理事会委员、编外副教授 科斯明斯基
理事会秘书、编外副教授 克列切托维奇

我代表本人和法律系完全支持这份申请。

系主任 塔拉索夫

^① 此处签名无法辨认。

№03293

波尔托拉茨卡娅女子高级学校管委会主席团 关于释放伊林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4月18日)

致肃反侦讯委员会

我们有幸请求侦讯委员会批准由波尔托拉茨卡娅女子高级学校管委会主席团担保释放编外副教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伊·亚·伊林在两个系（法学系和历史哲学系）担任教员，目前女子高级班即将进入考试阶段（4月9~22日^①），他的在场尤其重要。

波尔托拉茨卡娅女子高级学校校长、教授 维诺格拉多夫
法学系主任 尼·波里扬斯基
历史哲学系主任（签字）^②

① 这里日期使用的是俄历。

② 此处签名无法辨认。

№03294

莱温松、马利宁关于为伊林担保
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4月19日)

致肃清反革命、消极怠工和投机倒把非常委员会

兹证明莫斯科大学编外副教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是不过问政治的人，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如能将其释放，我愿承担责任，并担保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任何时候都会按照侦讯机关和法院的传讯前往。

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剧院管委会委员、
艺术教育局委员 莱温松
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艺术教育局委员 马利宁

№03295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关于为伊林担保 致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4月25日)

致肃清反革命、消极怠工和投机倒把非常委员会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作为法人，愿意承担责任并担保编外副教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绝不逃避传讯和审判。

协会代理主席、副主席

卡普捷列夫

协会理事会委员：

编外副教授 巴钦斯基

编外副教授 科斯明斯基

理事会秘书、编外副教授 克列切托维奇

№02260

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 俄共（布）党团会议记录

（1918年6月12日）

鉴于目前正处在严峻的时刻和特殊的情况下，现做出如下决议：

1. 利用秘密的工作人员。
2. 停止使用著名的和积极的君主主义者——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1人弃权）。
3. 进行登记并对一些将军和军官实行监视，对红军、全体指挥人员、各类俱乐部和小组、一些学校等进行监视。
4. 对十分明显的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掠夺者和贪污者采取措施，实行枪决。（5人弃权）。
5. 在各州采取严厉的和坚决的措施以制止传播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的报刊。
6. 建议党中央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岗位上换走乌里茨基^①同志，并用比较坚强和果断的、善于坚定不移地使用策略、毫不留

① 乌里茨基被害和列宁受伤是在1918年8月30日。

情地制止并同危害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敌对分子作斗争的同志来代替他。(2人反对,6人弃权)。

主席 伊·波卢卡罗夫^①

书记(签字)^②

① 波卢卡罗夫,伊·尼·(1895~1919),1917年加入俄共。1917年12月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② 此处签名无法辨认。

No 03296

雅科夫列夫为伊林申辩致列宁的信

(1918年8月24日)

莫斯科，救世主教堂广场，戈洛夫捷耶夫大楼，第30室

1918年8月11/24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目前，莫斯科革命法庭正在审判所谓巴里^①及其一伙的案件。同案被告之一是我的好友、法学哲学教研室教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鉴于伊·亚·伊林涉嫌此案而遭到审判，我坚信，是某种误会的结果，且会对他造成极大的不愉快，我贸然给您写信，并陈述按一般办案手续您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在指控伊林的证据中，稍有分量的只有一张在巴里那里查出的于1917年11月30日向伊林付款8000卢布的便条。我正是想就这张令人起疑的便条向您说明伊林不太便于告诉法院侦讯人员的内情。这笔钱确实是伊林拿走的，但是是作为伊林私人向巴里的借贷。借钱的目的是为了排印伊林的一部著作，并已在今年5月份作为学位论文进行了答辩。伊林的处境之所以严重，还由于同案其他被告都已逃之夭夭致使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代人受过。

对此我也不能再补充说明，也许您不需要我提醒即已知道，伊·亚·伊林是我国高等学校最值得珍惜的教员之一，他所写关于黑

^① 巴里，弗·亚·(1888~?)，工程师，美国公民。1918年4月被捕。后经秘密审判，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执行枪决。

格尔的著作受到普遍的重视，所在系的统一评价是，系里因他多年辛勤撰写的辉煌著作而授予他博士学位以代替他申请的硕士学位。伊·亚·伊林身体极差（案卷中存有他两侧肺叶上端均有结核感染的证明），他已经经受了夜间逮捕和监禁，而由于同案被告的逃亡使以上情况可能再次出现，这一切都对他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苏维埃政权为什么要重复过去旧时代卡索^①的教育部和其他活动家迫害高等学校人士（他们沉湎于自己的和平劳动，与政治并无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对任何政权均无危害作用）的错误而背上恶名。伊林正在排印自己的新的重要著作。仅仅4月份在布特尔基坐牢一次就使他在床上躺了三周……我胆敢向您保证，伊林从来与政治不曾有过任何关系，从来没有任何政治活动，今后也不会从事政治活动，也许终生不冒风险地在思辩哲学的流沙上描绘自己的几何图形。

不怕耽误您本已不够用的时间，真想请您分出半小时至一小时时间，以便和您谈谈伊林的事，求您中止他的案子，同时向您提出几个我十分关心的涉及正在上演的以您为主要人物的历史剧的问题。

阿列克谢·雅科夫列夫^②

① 卡索，列·阿·（1865～1914），沙俄国民教育大臣（1910～1914）。

② 雅科夫列夫，阿·伊·（1878～1951），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02261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契卡工作 给俄共（布）各省委员会的信

（1918年10月16日）

最近以来，由于肃反委员会在到处采取大规模恐怖手段的传言，一群心地狭窄的人、小资产阶级及大资产阶级确实实地哀呼号叫起来。在谋害列宁同志及杀害乌里茨基同志以后的对付资产阶级的恐怖时期或许是无产阶级实际上使用这种惟一的恐怖手段的时期，是从决议转向真正执行决议的时期。

正是受资产阶级这种恐惧心情和号叫的影响，在苏维埃很多机关，在一些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令人可悲的是，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党员中，开始了一场反对肃反委员会的行动。

很多团体开始使其服从地方行政部门的管理，开始改选并任命了一些委员会的主席，在各种报刊上掀起了一场运动，等等。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是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战斗机关的非常有害的一种影响，这种影响将使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化为乌有，反而使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轮番攻击的方式在很多组织中能够得逞。因此，我们认为，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在各地摆脱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不容否认，在一些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县城中，发生了一些蠢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问题就应使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失去振作的力量。

于是我们党中央站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立场上，今年10月2

日做出决定：“肃反委员会是中央权力机关的基础。全俄肃反委员会服从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各地方的肃反委员会服从于全俄肃反委员会，拥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的义务。”这是对无产阶级惟一有利的决定，它使这些机关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迅速进行有力的打击活动。

同时我们要使省委员会注意，希望它注意肃反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主要是县城里的。如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消除，那么肃反委员会在下次的争论中，就会成为比他们在列宁同志遭到谋害后的日子里强大十多倍的机关。

致以同志般的敬礼！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 彼得斯^①

外埠城市部主任（签字）^②

书记（签字）^③

① 彼得斯，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1886～1938），苏联党务、国务活动家，1904 加入共产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肃反委员会副主席，革命法庭庭长。1923 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委员。后遭到镇压。

② 此处签名无法辨认。

③ 此处签名无法辨认。

№02262

全俄肃反委员会俄共（布）党团组织 关于《周刊》事件的决议

（不晚于1918年11月14日）

研究了部分党员关于肃反委员会的论战问题，即由《周刊》的“不可姑息”这篇文章和俄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谴责《周刊》的编辑人员所引起的论战，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中的俄国共产党党团一致认为：

1. 编辑部刊登“不可姑息”这篇文章犯了为我们的敌人所利用的错误。

2. 编辑部承认错误并解释说，发生这件事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编辑部的成员都在忙很多重要的工作。

3. 这完全是可以解释的并证实自己有理的，因为在如此快的工作速度下，不仅可能犯错误，而且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4. 不仅我们的敌人，甚至连不理解肃反委员会在执行多么艰难的责任重大的任务的我们的同志们也犯了这种错误，他们可能有一种怀疑心理，似乎肃反委员会在使用刑讯（参阅《晚报》第81号费尔德曼的文章）。

5. 我们应该把没有编辑部注释的费尔德曼的意见看成是《晚报》编辑部的意见，如果确实如此——《晚报》编辑部既然知道，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工作着把全部精力献给伟大事业的负有重大责任的党员，为什么向他们头上泼污水。

6. 甚至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产生了疑心，在不负责任的

讲漂亮空话人的倡议下，决定改组全俄肃反委员会，这使肃反委员会的所有的负有重要责任的工作人员受到凌辱，并助长了对肃反委员会的诽谤性攻击。

基于上述理由，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中的俄国共产党党团做出决议如下：

1. 承认对《周刊》编辑人员的不妥当的诽谤性攻击是他们拒绝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原因。

2. 尽管如此，因为知道目前的形势要求全体党员努力地负责地去工作，不容许党员中有任何人擅离职守，因此，党团集体解释说，不赞成《周刊》的编辑人员所采取的步骤，号召他们留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队伍里。

3. 同时一致认为肃反委员会有义务迫使对肃反委员会说过未经熟虑的诽谤性言论的党员收回他们所说的话。

4.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纠正轻率的行为，并宣布修正的结果——证实真理，从而洗刷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身上被泼的那种污垢。

主席（签字）

№03297

法学女子高级班班长委员会请求释放伊林
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

(1918年11月15日)

致全俄肃清反革命、消极怠工和投机倒把非常委员会

法学女子高级班班长委员会请愿书

法学女子高级班班长委员会请求保释我班无人代替的教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伊林。伊·亚·伊林于今年11月3日上午9时在自己住所被逮捕。

班长委员会主席 斯捷潘诺娃

秘书 (签字)^①

莫斯科, 1918年11月15日

^① 签名无法辨认。

No02680

**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关于
肃反委员会与革命法庭关系问题的会议记录**

（1919年1月30日）

主持人：皮亚特尼茨基^① 同志。

参加者：有表决权的122名同志。

报告人克雷连科同志^② 代表莫斯科委员会发言。

克雷连科：莫斯科代表会议应就这个问题讲几句权威性的话。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在这方面也同样重要，即可否保留肃反机构，可以或不可以，为什么？

问题不在于肃反委员会的过去，不在于其功绩，而在于如今所有这些机构能否保持得住，其结果如何。因此我们说，对革命而言，要使这些机构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是危险的。肃反委员会及肃反机构是在开展同反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机构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组织。很清楚，将来肃反委员会是无法保持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那里所发生的那些错误，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肃反委员会这一组织本身导致了这些错误，并促使肃反委员会所有工作人员都犯这样的错误。在一些报告中，在对肃反委员会某些人员的侦讯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惊人的舞弊行为，甚至

① 皮亚特尼茨基，约·阿·（1882～193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起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② 克雷连科，尼·瓦·（1885～1938），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起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革命法庭庭长。

在重新组织起来的肃反委员会，解放了的被占领区中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舞弊行为都是该组织的工作条件造成的。这样一些舞弊行为当然不利于居民接近苏维埃政权，它破坏了跟居民的联系，即破坏了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惟一基地。在苏维埃工作的其他一些方面，我们常会遇到一些舞弊行为，但是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掌握较多权力的那些组织，即肃反委员会。

我们必须找到舞弊行为的原因，这些舞弊行为在肃反委员会是有一席之地的。问题不在于跟反革命作斗争时所采取的那些坚决的措施，而在于要使这些措施确实针对革命的敌人。对此有一个条件，就是应该很好地安排调查和侦讯机构的工作。那些决定人们命运的机关，本身应该对其他上级机关负责。应该有这样一个机构，即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在那里就法庭正在审理过程中的那些案件得到答复。肃反委员会是建立在另外一种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用中国的长城把自己和各种监督，甚至党的监督隔绝开来的基础之上的。党的监督只是在工作方针的某些原则方面才能有所反映。党组织无法进行更加充分的监督。必须废除在委员会工作中不能表示自己意见和不能进行监督的原则。所有的判决都应该公开地进行，同时侦查员在准备案件方面的全部预审工作，都应在司法机关的监督下进行。在肃反委员会，与侦查人员方面可能出现的舞弊行为比较而言，对侦查人员的记述还是赋予充分信任的。应该创造另外一些侦查审讯的条件：每一个被告人都可以找来他所需要的证人，同时也可以向法庭申诉侦查员的不正确的行为举动，如果发生这种行为举动的话，案件的全部详情细节都应在公开的法庭上，从那些证人和被告人那里加以问明，这样才有消除侦查人员方面产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

肃反委员会的一些辩护者声称，革命法庭审理案件的工作进行得不够快。为此，应该排除一切不必要的手续，加快诉讼程序。要

做到快，同时需要有五位负责的党的同志担任审判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他们惟有凭自己革命的良心来办事才行。他们做出决定，应不应该就该案件听听所有证人的意见，应不应该准许让原告人和辩护人参加。除此之外，实践表明，同样一些案件，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革命法庭，查清案情的速度同样迅速，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革命法庭在此期间，为查清案件的详情，能够及时听取一系列证人的陈述，〔其实〕肃反委员会仅仅是根据侦查员所取得的材料办理，因而革命法庭所做出的判决，要比肃反委员会所做出的判决更为严厉。

况且肃反委员会如今已走上了自我砍头的道路。县和区的肃反委员会都已经被撤销了。现在一些日常琐碎的问题列入了肃反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例如，监督清除积雪，战略性地住满套房，这样的结果是，肃反委员会被各种各样的工作挤压得满满的，因而也就无法胜任更为重要的各种工作了。后果不佳是明摆着的，总务处和办公室的运作不行，而其他一些部门的情况也一样。侦查工作和制止犯罪的工作，是理应保留在肃反委员会的管辖之中的，应该把那些犯罪行为提出来，以便使每个公民都愿意到那里去工作。进行审讯，而后是做出判决，这方面的工作应该与侦查工作独立开来而进行。

全俄肃反委员会对改组各肃反委员会不采取任何措施，其领导人员中也没有一致的行动。因此，拉齐斯^①建议把肃反委员会转变成苏维埃的行政部门。彼得斯认为，只在某些城市和某些地方，夺去肃反委员会的司法职能是有必要的。如果说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机关需要肃反委员会和恐怖手段，这就证明那些选举产生的机

^① 拉齐斯，马·伊·（1888—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构是毫不中用的。

彼得斯的这一决定，是对决议的拒绝。捷尔任斯基同志是同意我的意见的，但他反对将此在法律规范上固定下来。因为对案件的最后决定权归革命法庭，因此法庭应该是独立的。同时，其他一些同志也提出建议，希望革命法庭转变成隶属于肃反委员会下的一个分局。

所有这三种观点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只有非常时刻才准许肃反委员会加入工作。

革命法庭就其种种权力而言，同样也并不是一个和平宁静的机构。我们把各革命法庭审判员的人数缩减到了五人；审判员的革命良心乃是被告人罪行程度的惟一标准，这些审判员都是从党的可靠的同志中间选举产生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求并坚持的是，革命法庭应保持公开性，同时也要求并坚持能对侦查员的侦讯工作和行为举动进行检查。侦查和审讯两者是应该分开进行的，但这一点现在肃反委员会却做不到。现在授予肃反委员会的仅仅是侦查战斗机构在警告和制止犯罪行为方面的一些职责。

现在问题是这样明摆在那里，不得不讲一讲的并不是应该撤销肃反委员会的问题，而是不应该保留现有的那些东西的问题。应该建立与反革命作无情斗争那样一些机构的问题，这些机构是公开的，而且是允许进行监督的，但是，这些机构要能赋予人们或多或少坚定的信念，坚信来自侦查人员，同时来自这一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的错误和舞弊行为将是可以避免的。现在革命法庭的状况诚如我们的决议所提出的那样，今后也将是这样一个机构。

捷尔任斯基同志声称，克雷连科同志所依据的是他未经审查过的那些文件，再说这些文件都是一些不可靠的人呈报的。

作补充报告者说，跟肃反委员会的人斗争，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敌人。不仅在肃反委员会，同时在其他所有的机关，都会有一些不

足之处，因此，不应当从这样一个方面来看待肃反委员会的问题。

肃反委员会是在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机构。我们应该用革命胜利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应用撤销肃反委员会的办法，那样只会对我们有损无益。正是在肃反委员会不能很好地完成自己任务的那些地方，反革命的势力就猖狂，如在彼尔姆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样走下去的话，就会使苏维埃俄国陷入新的布列斯特和约境地之中，而这种和约已不再是什么喘息，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毁灭。我们已经战胜了大资产阶级，残余的敌人在我们苏维埃好多机关中深藏起来，他们在暗中破坏、阻碍我们的工作。在好多机关中，从前的一些副省长都在那里工作。可以委派去跟他们作斗争，跟这些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只能是肃反委员会，而不是革命法庭。在无产阶级采用大规模恐怖手段的地方，我们通常是不会遇到背叛行为的。

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敌人，以其对这些机构的攻击，迫使党的一些优秀的同志从那里逃跑了。

跟反革命作斗争的战斗机构，就其职权而言，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不能分开的机构。不应该把肃反委员会变成侦查的机构，将来可以成立一个刑事警局来担负侦查任务。克雷连科同志主张：革命法庭对侦查员进行监督，这一主张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每一个被告人都会对侦查员的行为举动做出种种虚假申告的。克雷连科同志组织革命法庭的方案，将造成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公文和遥遥无期的漫长诉讼程序。由于力量不足，我们无法避免某些错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这一点，必须把革命法庭这一机构和我们的一些机构联合起来，以使用这种节省力量的办法，建立一个隶属于肃反委员会的与反革命作斗争的统一的机构。而肃反委员会是比革命法庭更为果断坚决的机构。我们并不反对公开性，但我们反对撤销肃反委员会，因为非常情势的时期尚未过去。

为了保存实力，我们撤销了县一级的肃反委员会，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地改进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应该给我们提供新力量。肃反委员会没有什么传统，因此也就没有比肃反委员会更善于随机应变的机关。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革命的战士，因此他们不可能去进行侦查工作，即谍报工作，因为社会主义者不适合做这种工作。不应该把警察局的工作交给像肃反委员会这样的战斗机构。对肃反委员会来说，枪决权是非常重要的。在前线只有捷尔任斯基一个人的名字会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尽管我在前线工作的时间不久。可以不使用枪决权，但这一权力应该有。

让每一个发言的人按预先登记的次序发言，而不是让各区的代表发言，这一建议被接受了。

发言者的时间限制在十分钟内。

莫罗兹^①：生活本身提醒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死刑，法国革命中也曾建立过与我们肃反委员会类似的机构。肃反委员会本身是在资产阶级白卫军的恐怖手段逼攻下，为建立与其针锋相对的红色恐怖而成立起来的。

肃反委员会刚开始在白卫军中进行肃清工作，源源不断的一股股浊流便向肃反委员会扑涌而来了。

无论谁也没有使死刑具有法律的根据；死刑正如肃反委员会本身一样，是由革命运动所提出来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反革命，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撤销肃反委员会。

肃反委员会并没有用中国的长城和社会的其余领域隔离开来。党的委员会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提出工作报告。

反革命和职务方面的犯罪行为，如今在苏维埃俄国依然存在，

^① 莫罗兹，戈·谢·（1893～1937），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

因而，跟它们作斗争的机构，也就是肃反委员会，也就有必要存在下去。

发言者的名单停止登记，按照预先登记的顺序由一些同志发言。有的人赞成克雷连科提出的建议，有的人则反对。

伊利亚^①：肃反委员会的一些代表老是说，必须镇压反革命，这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自从十月革命以来，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一些演说中谈到，由于我们的地位在苏维埃俄国内部已经得到巩固，而且部分反革命分子已经战败，因此我们对待一些邻国，甚至过去一些敌人的关系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应该跟他们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

肃反委员会没有揭露种种犯罪行为，而是造成了这些犯罪行为。某些斗争的措施和方法，例如种种威胁恫吓手段，并不是经常有益的，比如说，如今这种手段只会给我们带来危害。

我们大家都要承担规定执行死刑的责任，如果采用死刑完全根据侦查人员的决断，正如在肃反委员会经常发生的那样，那么我们反对采用死刑这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被枪决的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不可能进行检查的。我们需要得到这样的保证，无论哪一个无辜的人都不会被冤枉地定罪。这是每一个公民，特别是每一个工人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我们就无法在工人们中间树立起苏维埃政权的信心，并形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之心。

列宁同志建议与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达成协议，以便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如果他们不反对我们的话。我们要让中等阶级确信，如果他们没有什么过错的话，苏维埃政权将保护他们免

^① 伊利亚，即齐夫齐瓦泽，伊·韦·（1881～194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担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受各种专横和暴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

我们绝不主张停止跟我们敌人的斗争，但是我们主张与那些能够吸引到我们一边来的邻邦改善关系。但是要靠肃反委员会我们是不能做到这一切的，因为肃反委员会是用完全另外一种精神实质建立起来的；只有根据克雷连科同志的方案建立起来的革命法庭，才能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工作有所帮助。

米齐金^①：如果我们不提全俄肃反委员会，而提我们全俄革命法庭这一机构的话，这中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在革命法庭我们要想获得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举动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对此我们是绝对没有信心的。况且革命法庭的特点是：以自己的判决释放了很多我们的敌人。

如今我们正处在尖锐的国内战争时期，因此肃反委员会本身的建立也正是由于环境所致。

如果我们不建立肃反委员会，而建立与其起同样作用的革命法庭的话，那么这将是徒然耗费精力了。问题正在这里：进行一切工作，其用意就是要对小资产阶级和从前的官吏采取温和的态度，为此提出建立革命法庭的建议。

克柳科夫^②：现在的时代，不是过去那个时代了。现在必须把有关犯法行为的所有案件都移交给革命法庭，而不是交给肃反委员会，因为后者的行动经常凭一时的气愤和激动。我们应该凭理智来进行审判，而不应凭感情，要不然我们会毁了革命的。这里现在有两种力量，两个机构在进行着战斗，即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民事案件交到革命法庭的手中。应该把全部工作集

① 米齐金，尼·伊·（1886～1958），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起担任列福尔托沃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和红色近卫军指挥部成员。

② 克柳科夫，费·奥·（1885～1950），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起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

中起来消灭目前的混乱状况。肃反委员会不愿承担侦查的职能，但是如果我们跟无产阶级一道前进，我们就不应该去计较哪些工作必须承担，而应担负起对革命有益的必不可少的任务。

伊柳申^①：我们不善于认清事物逻辑的真正价值。侦查审判制^②确实是资产阶级的遗产，但是我们应该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取可能对我们有用的所有的东西。现在，当资产阶级采用其他方法，即在苏维埃各机关里采用隐秘的暗中破坏的方法，来跟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应该改变我们跟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方法。我们应该把反革命分子从我们苏维埃的机构中拉出去。我们应该由75%的共产党员组成战斗的机构——革命法庭。肃反委员会作为与反革命作斗争的机构是有必要的，但是由于反革命在另外一些地方表现自己，因此，与反革命斗争的机构也应承担起另外一些职能：在苏维埃工作人员中进行侦查。我们应该依靠在肃反委员会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的帮助，建立一个战斗的侦查机构，这个机构将侦查消除犯罪行为。当犯罪行为被消除之后，这个机构则将自己的权力和那些被它所逮捕的犯罪分子都转交给革命法庭。

辩论结束。

彼得斯同志代替捷尔任斯基同志做补充发言。

彼得斯：克雷连科同志所谈到的种种舞弊行为，不仅在肃反委员会里有，同时在所有其他苏维埃机关中也有。克雷连科同志许下诺言说，在根据他的方案进行改组后的革命法庭将不会有任何的舞弊行为。如果说这一点在中央确实能够做到的话，那么关于各省的情况，这一点就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我们消灭了大资产阶级，而

① 伊柳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布特列区委员会成员。

② 侦查审判制是1864年俄国的刑事审判制度。公诉、辩护、裁判均由审判庭基于严酷侦查方法而进行。

所有残留下来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进入苏维埃机关，因此必须跟这些资产阶级作斗争。那些反对肃反委员会的人经常说什么应该温和地对待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是继续站在最激烈的反对立场上，并拼命地在跟我们斗争。

关于革命法庭的情况并不理想。过一段时间，在使革命法庭合法化的工作结束之后，应该重新成立肃反委员会，以便跟各个城市里蠢动起来的反革命作斗争。某些城市的最高权力应该归属于我们党的中央机关，这些机关不仅应该给各个肃反委员会，同时应给各个革命法庭提出导向性的路线来，各地肃反委员会则隶属于执行委员会和全俄肃反委员会。

在各革命法庭理应起导向影响作用的不是某些审判员同志，而是党的组织。

实践表明，除了肃反委员会之外，无论哪一个机构都无法制止匪徒活动、反革命和其他各种活动。撤销肃反委员会将到处导致这样的结局：我们将不得被迫转入地下状态。

肃反委员会无法说明自己完整详细的行动计划。克雷连科同志在自己的指示中，没有谈及他的方案打算完全撤销肃反委员会的问题。可以限制肃反委员会非常权力的地方，也许只有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全俄国，因为在俄国要这样做为时尚早。

克雷连科（报告人）：我必须依据的，并能说明肃反委员会性质的那些事实，我已从最高革命法庭侦查委员会以及维亚茨基执行委员会侦查委员会的一些正式报告中援引了。

同志们建议把党的一些好同志派到肃反委员会去工作，这个建议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就是那样，以致在这类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中造成了一种偏见，好像肃反工作者都是一些拯救革命的垄断人员。

我们不能承认，把一些案件移交给革命法庭，而另一些案件则

不移交，这正是肃反委员会所希望的。

我们不单是反对肃反委员会，而是反对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

捷尔任斯基同志关于肃反委员会的指示，要求一切照旧，而我们则坚持既要肃反委员会，又要对革命法庭进行彻底的改组。我们认为，必须为肃反委员会保留侦查战斗的职能，但不是撤销肃反委员会。

全市代表会议应该就这一点表示自己的意见，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在等待着党的下层群众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皮亚特尼茨基：将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提付表决，该决议由斯克雷普尼克^①同志和彼得斯同志修正补充，并经区际会议通过。

决议。应将业经通过的关于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问题的以下各点报告中央委员会。

1. 关于做出某些诉讼性质判决的权力，应该从肃反委员会那里收回来，而转交给革命法庭。

2. 革命法庭应该在排除一切不必要的形式主义、加快诉讼程序和更加细心地挑选党的革命法庭成员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3. 应该为肃反委员会保留的只是预告和制止犯罪行为方面侦查战斗机构的任务。

捷尔任斯基同志在全市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

市代表会议在讨论了有关革命法庭和肃反委员会的问题之后认为，正当全苏维埃俄国处于被国际帝国主义匪徒四面包围的时候，正当国内反革命走狗极力挣扎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正当有人在挑拨农村反对城市的时候，正当怠工事件和投机倒把变换新花样的时候，代表会议认为，撤销肃反委员会或是从肃反委员会手里

^① 斯克雷普尼克，尼·阿·（1872～1933），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起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和政府主席。

收回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所有敌人作无情斗争的权力，抑或是撤销肃反委员会的侦查机构，这只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并削弱国家的政治威力。因此，市代表会议完全赞同全俄肃反委员会与反革命作斗争的总的政策，同时建议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解决有关委员会所有的工作，进而委托莫斯科委员会指派最积极而且可靠的同志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工作。

提付表决的问题是，该以哪一个决议案作为基础呢，是以莫斯科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决议案为基础，还是以捷尔任斯基同志提出的为基础。

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案以 98 票对 25 票通过，被作为基础。

被作为基础的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案按几项提付表决。

第一项

修正案：别连基^①提出修正案：“除了跟流氓无赖、土匪活动和造反暴动作斗争的情况以外”——被采纳。

在不正常的、特殊的情况下，做出死刑判决的权力应授予肃反委员会。

对第一项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可以收回由革命法庭办理的某些案件——被采纳。

克雷连科（反对两个修正案）。甚至在别连基同志所提及的条件下，也没有必要授权予肃反委员会采用死刑的权力。要是罪犯当场被捕获，物证俱在，或是在与暴动作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被捉，毫无疑问，肃反委员会可以就地予以枪决。如果当斗争变得有计划性质的情况下，那么判决死刑的权力应移交给革命法庭。至于第二项修正案，那么，即使没有我们的决议，中央委员会也有这种权力。

^① 别连基，格·雅·（1885～193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起任俄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监察委员会成员。

第一项未加修改便被通过了。

第二项

第二项未加修改便被通过了。

第三项

维格尔^①：必须补充的是：“而且委员会的活动应置于司法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被采纳。

赫梅尔尼茨基^②：必须作一个补充：“按照上诉程序肃反委员会置于革命法庭的监督之下”。没有这一点修正，第三项便将没什么变动了。党的监督，〔同时还有〕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机关的〔监督〕都不能以适当的办法予以实行。只有革命法庭才能承担监督的这些职能——被采纳。

克雷连科：侦查的结果送交革命法庭去裁决，这样，革命法庭便可对侦查机构进行监督。基于这些看法，维格尔同志的修正案是可以采纳的。

现在我们可以使任何一个罪犯都受到法律的制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被揭发有舞弊行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无论哪一个人工作人，都会被革命法庭提出起诉。这样，即使赫梅尔尼茨基的修正案也没有任何新意了。

第三项未加修改被通过。

① 维格尔，叶·伊·（1899～1937），1918年入党，是党的巴乌曼区委工作人员。

② 赫梅尔尼茨基，亚·伊·（1889～1919），时任俄联邦人民委员会法律顾问。

No03131

比亚雷尼茨基 - 比鲁利亚关于 “海鸥”庄园给沃伊诺夫的信

(1919年9月8日)

最尊敬的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我在莫斯科实在耽搁得太久了，那么多事情和活动，主要是人们对画的需求太大，对艺术的兴趣太浓。

为此我在乡下待了半年，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说实话，我也叫我们这儿这些可爱的人们搞得精疲力竭。他们真的一遇机会就抢东西，为了搞到面包、黄油和其他食品，真是不得不把什么都给他们，甚至脱掉西服，一点办法也没有，风气如此。连懂行的领导人物我也躲开了，因为我无力与之周旋，我的精神崩溃了。在受到斯卡洛诺夫的攻击并了解了这一卑鄙内幕之后，我对什么都厌烦了。

过一周我就回去，我必须见到您，画一些鲁宾金树林河岸画。在那里，因种种告密行为，人家登记了我的财产，其中有些破烂儿被我卖掉，换面包了。假如这些东西都得退还，我只好还钱。退东西，现在我还能行，因为没有面包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使我迫不得已。这是个重要原因。所以我现在把我们证明文件寄给您，文件根据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证明，“海鸥”庄园不应被征用和挤占。这份证明请您费神保存一下，等我回来，我再拿。当然，在关于我拥有自己私产的权利上，我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我相信，人们自己会明白，他们这样对待我是错误的。坦白地说，我深感委屈和气愤，因为我为我们乡那些忘恩负义的居民做了那么多善事，操了那

么多心，甚至还因为我建了那些工作室，不论是画室，还是工艺室；他们回报我的却是百般诋毁和诽谤。因此，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离开我建立并培育起来的学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已不能，而且也无力生活和工作下去了。亲爱的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我对您说，我深爱人民，但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我们美丽的自然风光背景上的幻想。我将十分高兴与您重逢，回到乌多麦尔，我们再见罢。

真诚尊敬您的和永远忠实于您的
维·比亚雷尼茨基-比鲁利亚^①

^① 比亚雷尼茨基-比鲁利亚，维·卡·（1872~1957），画家、美术研究院院士。1912年比亚雷尼茨基从特维尔省上沃洛乔克县一位铁匠手里买下几俄亩地，建了一个名为“海鸥”的画室。很多著名俄国画家都到这里居住过并作过画。1919年7月27日《特维尔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称这个画室是“残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避难所，主张由人民来做“海鸥”画室的合法主人。于是，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比亚雷尼茨基便把证明他拥有“海鸥”别墅的一份文件和上面这封信寄给了当地的公社主席阿·伊·沃伊诺夫。

№03113

高尔基关于释放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给列宁的信

(不早于1919年10月6日)

我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对俄国的知识分子，我了解得并不比您差。假如您还记得的话，那么我是坚决否定他们的首批俄国文学家之一，迄今仍复如此，而且将来我的态度也未必改变。

不过，我的老天爷，终归还得弄清充当政客的知识分子和国家的科学知识人材之间的区别，应当划清帕维尔·米留可夫^①和杰普^②的界限，应当明白，唐恩^③和布什^④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里的小人物——缺乏自尊心、贪婪忌妒，为图功名、安逸和舒适而不惜犯罪的人，与图尔金^⑤教授毫无共同之处。后者通过自己的发明，在书籍彩色印刷业中，实现了彻底的变革。他清除了使千百万工人受到毒害甚至送命的铅块，以及现有的全部印刷技术。这种人的价值一点不比政治领域里的改革家小。

谢尔盖·奥尔登堡^⑥曾一度出任立宪民主党瓦西列奥斯特罗夫

① 米留可夫，帕·尼·（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

② 杰普，Г.Ф.（1854～1921），俄国热力工程专家。

③ 唐恩，Ф.И.（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被驱逐出境。

④ 布什，H.A.（1869～1941），俄国植物学家，科学院通讯院士。

⑤ 图尔金，H.B.（1861～1933），印刷技术领域的发明家，新闻记者。

⑥ 奥尔登堡，谢·费·（1863～1934），俄国东方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斯基区的书记，甚至当过临时政府的部长，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今天仍是立宪民主党人；他是一位大学者，工作出色的人，能用客观的眼光看待事件的史学家。我了解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我敢断言，他不是敌人，而是好帮手。

您清楚，在白匪那边几乎没有正经人，一个学术界的大人物都没有；他们都留在我们这边了。他们留下不是为了搞阴谋，而是真诚地希望，新制度能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工作天地。而且他们正在工作，天地良心，一点儿不错！

请您叫人上教育委员部给您开列一份苏维埃政权期间的发明创造的简短清单，您就会相信我是对的，没错！假如公布这份清单，则不仅在我国，就是国外，在协约国里，也会产生巨大的宣传作用。

是的，我是缺乏自制力，但我并不瞎；我也不是政治家，但我也并不傻，而政治家们却往往是愚蠢的。我知道您惯于“利用群众”，个人对您来说是一钱不值的；但对我来说，梅契尼科夫^①、巴甫洛夫^②和费奥多罗夫^③则是世界上最富天才的学者，是世界的精髓，你们是政治家，是形而上学家，而我不过是个不能自制的艺术家，但我却比你们更有理性。

在俄国，聪明人并不多，我们没多少才华出众的人，很少，少得可怜！而骗子、无赖和冒险家却数不胜数。我们这场革命要进行几十年，上哪儿去找那些既能十分理智又能干劲十足地领导革命的力量？工人阶级正在灭绝。农民吗？迄今为止，农民还没搞过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您想他们能行？“信则得福，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反正不相

① 梅契尼科夫，И.И.（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和病理学家。

② 巴甫洛夫，伊·彼·（1849～1936），俄国著名生理学家。

③ 费奥多罗夫，С.П.（1869～1936），俄国外科医师。是俄国最早使用内腔镜检查手段的医生之一。

信农民，因为我把他们看成是工人和文明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现在一个有学问的人对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宝贵。正是他，也只有他，才能够以新的智能使国家富有，使其发展，因为他能使人类理性与僵死的物质在各个领域的斗争中，为我们创造一支必不可少的技术大军。

我说过，请您数一数科学家在苏维埃政权期间做出的成就，您在这份清单上会看到密织渔网，西班牙病杆菌的发现，彩印领域的革命，极为有趣的……在食物的化学领域，等等，等等。这些人完成的工作数量和质量会使您大吃一惊，而他们却在挨饿，被赶出家门，饱受凌辱，被投进监牢。

对人文科学家们不信任甚至持怀疑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我认为，对有用之才持两种态度是不文明的、愚蠢的，而且对革命事业极端有害。这是一场社会革命，因此要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是的，这我明白！可是，我的老天爷，有用的知识是宝贵的，这一点对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应是不言自明的。您大概清楚和明白，恰恰是有用的知识，不仅过去是，今天是，而且将来也必定是最革命的力量，只有以这个方面为取向的理性，才能强有力地推动人们前进，把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组织起来并使之得到无限的扩展。

事情就是这样。把挨饿的老年学者除掉，把他们投进监狱，让那些被自己的权力意识弄得昏头昏脑的白痴们拳打脚踢，这不是干事业，而是野蛮行为。

再说一遍，维克多·切尔诺夫和别洛戈洛维^① 医生或马努欣^②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不，——应当另做评价，后者是国家有用之才。别把充当政客的知识分子和智能即科学力量的创造者混为一谈。

① 别洛戈洛维，H. A. (1834~1895)，俄国社会活动家，医生。

② 马努欣，C. C. (1856~1921)，1905年以前任司法部长，参政员和国务会议成员。

杰普被放出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感谢。您也放了杰列申、奥西波夫（一位优秀的外科医生）、布什、奥尔登堡、谢尔巴^①和所有科学家吧。

可见，我至死都是一个缺乏自制力的人，紧握您的手，您这位先生也同样缺乏自制力。

尽管我和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②很早以前就分道扬镳了，但我还是为他感到惋惜！英年早逝，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阿·彼什科夫

① 谢尔巴，Л.В.（1880～1944），俄国语言学家。

② 安德列耶夫，列·尼·（1871～1919），俄国作家。

No05305

谢杰尔尼科夫关于苏维埃的 腐败现象给列宁的信

(1920年4月23日)

奥伦堡，1920年4月23日

敬爱的同志和师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在您的世界命名日这一天，我从奥伦堡写信给您，我听说，我是根据您本人的愿望被派来的，我这样理解这一任命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情况并不比巴什基尔更好。”

事实果真如此。巴什基尔以其好寻衅惹事的狂暴民族主义使领导者们“苦恼”，但它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着，而安静并谦虚的吉尔吉斯，眼下则仅仅是一根写着典型苏维埃字样“吉尔吉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柱子”，在这根柱子的周围，不知要在何年何日才能奠定何种基础，现在是“一片荒凉”，再没有别的东西。

今年年初，“温和的牛犊”阿尔乔姆^①以他无足轻重的平庸政策及无能表现使巴什基尔空立在那里，而吉尔吉斯共和国胚胎还在娘肚子里就被佩斯特科夫斯基马虎不认真的好心肠酿制的花露水浸泡起来。巴什基尔人现在在地方上谁的话都不听，并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相反，吉尔吉斯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其邻国，谁都不想听他的话，也不想承认他。

不过，从“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这一作为现实主义任务的观

^① 阿尔乔姆，即谢尔盖耶夫，费·安·（1883～1921），1920年起任全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点来看，这两种情况同样都是不可取并令人悲哀的。在此地，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伟大“宣言”的词句早已化为无穷无尽的无聊的恶意的互相指责和挑剔，实际上渐渐地转化为令人厌烦的“笔墨战”和成为癖好的在“文牍处理上”的“国际斗争”。规模宏大的世界性悲剧在于，“解放被压迫者”瓦解并分化为一系列在“别动我们的人”这样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冲突和争吵。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状况下，很难去同情受委屈的人或是指责欺侮人的人：大家都受委屈，同时也都欺侮别人。

我们这里一向是这样：“谁都没出错，可你看，有人竟蹬了腿！”——这是一个商人在作家乌斯宾斯基那里说的。那时我就想：要是因为这些无谓的纷争我本人或者哪一个正在诞生的共和国（“历史对落后民族是无情的！”）蹬了腿就好了（“这是护国分子的归宿”！），即使是整个苏维埃俄国又怎样？琐事和卑鄙的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有庞大的“系数”，像是杆菌或霍乱之类的东西。

因此，请允许我在这封信中再次就我在这里看到的杂乱无章和毫无意义的事情的一些基本原因很坦诚地和您交换一下意见。

一、波拿巴主义是一种日常生活现象

1918年秋天，您以前的朋友和战友波格丹诺夫^①在祝福我作为一个“革命的实业战线惟一代表”去参加您领导的党和苏维埃工作时，曾经表示过一种担心，害怕当时开始抬头的俄国“波拿巴主义”会阻碍您倡导的事业取得最终的成功。您当然很清楚地知道并理解，到1918年年底，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不过，您在

^① 波格丹诺夫，亚·亚·（1873～1928），俄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医生。1908年起是召回派和前进派领导人。十月革命后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

脓疮上压上了“国防苏维埃”这块冷敷湿布，于是脓疮便好像消散了。但是，随时都可能复发，特别是在生命攸关时刻（一个杜里延的小富农在炮架底下对我说：“只要打起仗来就好了。到那时我们给他们一些颜色瞧瞧！”）。我曾经紧张不安地等待这一时刻，而且只有在创建了第一支劳动军时才完全舒展了一口气。我明白，把军队建成劳动军，并把所有居民纳入军队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确实能够（彻底）消除把政权交给打了胜仗的革命军阀手中的可能性，这些军阀形成一个被颂扬为“英雄和解放者”的特殊派系，他们每个人甚至都不反对在“享受荣誉”的时刻亲自享用自己和集体战功的果实。

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享受荣誉”，我们既无时间，又没有理由。拿破仑以“解放”的名义掠夺了几乎整个欧洲，所以他能够在自己家中和战友们一起炫耀一切光荣。我们除了有与崩溃作斗争的机会外，什么都没有取得。过去蓄存起来的“骆驼的驼峰”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耗光，如今像个空空的且满是破洞的袋子一样悬垂着。一切都投入到战争中，连国民经济中最“基础的资本”也包括在内。在我们头上重重地压着一条穆罕默德的戒律：“不要给他们任何东西，除非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我们需要创造一切。前线上的艰苦奋斗以及更为沉重的“酬劳胜利账单”的重任，需要有新的斗争方法、新的战略和战策，更需要一些新的、和平的、“非军人”型的“英雄”，需要专家们一长制的权威，这些专家胸前并没有挂满红色“轻骑兵”勋章，可他们懂得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方面，也有可能并且应该是不可避免地涌现那样一些人，他们昨天还在“前线的那一方”，或是在这里，在后方工作，也就是在棍棒下“劳动生产”过，正像典型的“白色奴隶”一样。只靠“白色奴隶”干不出什么名堂来。他们没有权，不会负什么责任。如果想要干一番事业，必须把不自由的奴隶变成具有权威的领导人。

当然，您和党的上层人物很容易并且很快就能理解，这一切都是很必要的。可是在这里，在基层，对这些还没有理解也不会很快理解。因为理解这些事对自己不利。得了吧！我，昨天的战斗“英雄”，今天却得站到“指定的地方”并且俯首贴耳地完成某个从集中营跑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或工程师的技术作业或指示，而这个工程师还是不久之前被我俘虏的！昨天我自己还是“独断专行的首长”，而今天我却是个“普通的群众”，一般的执行者，而且甚至，可能还远不是一流的。对不久前“光彩和光荣”的记忆，毒化着我的意识，妨碍我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微不足道的事业，即使已经顺应了我这一新使命。我愿意发号施令，可目前是别人，非党人士：昨天的反革命分子在对我发号施令！

正是这种靠自己“光荣的过去”的报酬为生的愿望——这种手工业方式的庸俗的“波拿巴主义”——成为现代俄国典型的“日常生活现象”，特别在这里，在边远之地它表现得更为充分。在这里，“捍卫自己”不受中央法令、指示和要求的约束。而在那里（中央），它便“转为进攻”，恐吓并“以恐怖手段威吓”由于这些“新贵族”出现而不断呻吟着的普通老百姓，以及中央那些严肃对待自己新任务并要求把这些任务好好付诸实施的代表们。

“新贵族”这几个词，用得相当深思熟虑。到目前为止，任何政权，最终都依赖于黩武主义。一切“高尚品格”，不管是承袭下来的，还是个人所有的，都是通过战功取得的真实的，或是臆造的战功。而我们今天的红军战士，昨天都曾是“前线战士”，他们从内心，从心理上，还没有酿制成要求不把任何东西视为已有的共产主义的新酒。这些人按一般常规，经常是非常鄙视所有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们依据的就是自己的成功。他们和我们，是英雄和普通劳动者，这已是“两个大差别”。他们可以把所有的书拿在手中，而我们只能有他们愿意给我们看的那些。他们有各种主动权和权

力，而我们则被看成被监管的坏分子，需要严格加以控制。

“新贵族”很自然地和新苏维埃资产阶级结为联盟，后者因自己“过去的战功”也具有特殊的“条件”和对追求“高尚品格”的权利。

二、第二种日常生活现象——“苏维埃资产阶级”

“苏维埃资产阶级”，也是我们边境地区的日常生活现象，从正常任务和对苏维埃政权健康认识来看，他们是最薄弱和亟待解决的环节。“过着优裕生活”，比旧资产阶级和新投机倒把分子生活得更好的只有内地苏维埃官僚主义的上层人物。他们的“康宁生活”带有“不劳而获”的性质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如果一个人把属于一千人的一千份商品占据30~40~100份，而把剩下的份额按定量“凭卡”分配给其余的人，难道这多余的29~39~94（99）份商品不就是通过从许多人那里每人强占少许而来的不劳而获的“剩余价值”吗？“通过正当的劳动”，仅靠普通的苏维埃薪金，一个有家室的人绝对不可能有6万卢布的积蓄，供他“买新潮服装去取悦于他心爱的妻子”。至于那些豪华的住宅、优美的环境和阔绰的外出——就不用提了。这一切都是那么粗暴，那么无耻地当着名义上是“专政”的工人们做出的，这些工人却日渐衰败，由于愤怒而凶狠起来，孩子们在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夭折，他们自己也不断死于流行病。在旧制度下饱受摧残的普通老百姓，如今也哀叹不止，阿谀奉承并悄悄地散布流言，他们单纯地认为，没有“任何差别”。

在一些边远地区机关中的“残酷性”和甚至简直是“野蛮的风气”、完全可以证实这种普通老百姓的意见。

形式主义、拖延作风和冷酷无情地不愿透过（常常是）浸满泪

水的“一小块纸”去看具体的泪珠，——这是一种平常又普遍的现象。每个“首长”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奇奇怪怪的习惯用语，“我”、“在我这儿”、“我的财物”等等——这都是我们这些大大小小官员们通常的讲话方式。过去的“宫廷中的谄媚者”、各种各样阿谀奉承的贱人，他们什么样的屈辱都能忍受，但求能“得到一点点怜悯”，或是能避开“皇帝老子”的愤怒。而今在每个新型刚愎自用的头头们的周围，都有数不清的从旧制度残存下来的人。为“头头们”准备报告，写发言稿。有些过去曾当过“军士”的半文盲的活动家，靠着聪明的“白色奴隶”为他们写文章，竟然在自己的蚂蚁窝里获得文学上的知名度。

更有甚者。一个犯刑事罪的头号骗子，因盗用公款和窃取国家财产被奥伦堡省地方局解雇，很快又在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乌谢尔甘县地方局干了类似的勾当，顺势混入俄国共产党县委员会主席团，然后，预感到逮捕迫近，跑到斯捷尔利塔马克，从阿尔乔姆同志那里得到一个“巴什基尔急救站县委员会主席”的称号和“保护证书”，这样一来，谁也不能逮捕他了，后来他以胜利者的身分凯旋归来，终日无所事事，挥金如土，“帮助”自己的同伙而不是巴什基尔人，而最后又做了一个正式报告，说什么由他在乌谢尔甘县第五区开设了一所“以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也就是自己的首长，‘恩人’——命名的托儿所”。然而经地方上检查发现，这个托儿所只是名义上存在！

讨好“顶头上司”并在自己周围安插上“自己人”——这是普遍存在的一般规则。选举实际上已被从上面指定某些人带着某个“选举委员会”的图章并派往指定地点的做法所取代。这种“按死板公式办事”的选举法以及对“秘密投票”的极端惧怕——这便是某种规模不大，但已经成熟的寡头政治集团维护“专政”的一些样板模式，这个集团引用一些英明的行为准则联合起来，即：“官官

相护”和“难兄难弟”等。

通过这种方式造成的缺乏责任心和不加惩处现象，把群众姑息放纵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专横和擅自处理简直铸造成一本不朽的杰作。“按自己的想法拒绝”，——奥伦堡房产管理局一个“掌大权的人”在回答吉尔吉斯某机关无可争辩的、最最合法的请求时，在他的批示中是这样写的。“没有靠山”、“没有熟人和各种关系”目前寸步难行，自己人能把自己人“甚至从绞索下拖出来”，哪怕他是罪恶昭彰的骗子，而对“别人”则以各种借口加以迫害。每个机关都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群星殿堂”，每个主管部门，每个城市和乡镇都有一个互相勾结起来的私党和“秘密团伙”，牢牢地把权掌握在手中。

不难想象，在这荒僻的角落里形形色色的“特权人物”都能干出什么勾当。“拯救”，“袒护”自己人——不算回事儿，而如果只要受委屈或不满意的人敢说个不字，那就让他做出证明，他“不同情旧制度”。在别洛列茨克，在塔米扬—卡塔依斯克县的“区肃反委员会”中，许多六七十岁的巴什基尔老头，粗糙的双手长满茧子，被关押在潮湿而肮脏的牢房里受折磨达半年之久，一直关到2月中旬，虽说颁布了10月大赦令，而他们又完全适合！至于我走后他们遭遇又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是谁，在哪儿，把谁，为什么“关了牢房”，任何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搞错”〈不受惩罚〉在那种条件下并不是件难事。至于较小的错误、犯法和犯罪行为往往不加惩处，就不值得一提了，通过搜查、征用和充公等方式来“自我供应”，是最实惠的手段：没有裤子，可以从任何人身上扒下来；没有面粉和肉，“投机倒把商”是干什么的？连马合烟都用不着买，走，到市场上去抢！……越是做得厚颜无耻，就越叫得响亮：“我们是——党员！……我们流过血！……”

三、“党性”和“国际主义”

在有关巴什基尔的一封信中，我痛斥了巴什基尔人的落后和无能，而把俄国共产党员，根据他们的控诉和讲述，把他们说成是受害者——绝大部分如此。但那时我还没有看清他们的实质。1~2月间，我曾到过阿维扬诺-彼得罗夫斯克、乌维扬斯克、别洛列茨克和齐加钦斯克等地的工厂，以及塔本斯克车站。应该说，我觉得很过意不去，竟做了强者的保卫者和辩护人，来反对弱者。巴什基尔人在理解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方面“不怎么样”，这一点当然是对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是非常“不怎么样”。

从“革命性”的资历来讲——这是“三月的啤酒”，资历较深的革命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紧紧抓住“立宪会议”的观念，以至和它一起毁灭或至少是丧失“自己的威信”。如今占大多数的是“战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的准尉”们，也就是上述人加波拿巴主义分子。在巴什基尔中部——这是一些“乌拉尔一带的哥萨克游击队战士”，他们被分派到各家各户，专门“建立并巩固苏维埃政权”。和中立的“无党派”群众相比，特别是和“杜托夫分子”和“高尔察克分子”相比，他们，应该说，简直是顶呱呱的小伙子。只有一个缺点：他们把党理解为拥有特权的帮派，而把政权视为“战斗的奖赏”。他们没有一点为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工作的愿望和技能，（哪怕像别列茨克那样，只为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在“党委会”、“革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里就座的都是些瓦西卡、米什卡和别季卡之类的“战斗同志”，就是他们这些人要在代表大会上、各种会议上指挥和“发号施令”。除他们之外，他们谁都不承认，谁都不相信。我们这些关于非党人士有成立组织和监督政权的权利的口号，他们既不能胜任，也不合他们的胃口。

不能胜任，是因为他们不会理解，当我们在大多数人民被剥夺了生存权利，什么都不敢讲，经常担惊受怕的背景下建立可怜的上层政权时，我们曾进行了多么可怕的“反革命”和“反动”活动。而不合他们胃口，原因很简单：“我们曾经流过血，可他们却要指挥命令我们？”。群众害怕自己生活中有个愚蠢的、拙嘴笨腮的人来当合法的主人，这是寡头政治独裁。非党劳动群众的“自决权”，对他们来讲和“异族自决权”一样不受欢迎。

那儿和这儿情况完全相似：我们这些别季卡、瓦西卡和米什卡们，要把政权分给某个人，还要承认他有权思考，有权不仅按我们的意志，而且还要按他自己的意志行事，说不好甚至还要取代我们，或是让我们听他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产生了那样一些奇怪的现象：1) 在奥伦堡省（一直到最近），未曾开过非党会议，尽管中央一再直接发出指示和要求，此外，不久前省理事会代表大会在我参加下讨论过那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在州和乡镇中以“执行委员会”取代“革命委员会”，这样做有没有危险？2) 在塔米扬—卡塔依斯克县党代表会议上，在“巴什基尔人”（一个和谐的团体）中，只有一个巴什基尔人，而进党委会的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巴什基尔人——“肃反工作者”，一个惟命是从的小伙子，自己人！所有其他巴什基尔人——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从来没有站到白匪一边的达乌托夫，都以“民族主义”和“政治水平不够”为由被淘汰。

以前，每个省长或农民首领都有“自己的巴什基尔人”或是“自己的吉尔吉斯人”，这些人得到了一种专利权，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表达自己忠心耿耿的感情，并以“完全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态度提出各种请求。如今这种“日常生活现象”，经过适当的修改，在我们的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中复活起来。“不可靠性”过去一直存在着，现在亦然。“既然你是个国际主义分子，那你就用俄语思考和讲话，千万别与非党的民族主义者们保持友谊！”经常不断地

有人按这种规则对大小官员进行告密，谁都不感到奇怪。红色斯克沃兹尼亚克。德穆汉诺夫斯基，像他的黑色原型一样，经常放肆地对每个落后民族宣称：“你的丈夫，也就是你的领袖，对你不合适！”

客观公正地说，地方官员也没有什么大错，因为有人支持和鼓励他们，或者至少相邻各省的省委会没有粗暴地制止他们。您记得吗，听说过吗：像乌法和奥伦堡这些省委员会？他们是否因有人过分粗暴而残酷地欺侮巴什基尔人或吉尔吉斯人而提出抗议和争议吗？他们是否以书面形式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向您和中央提出过请求，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几个相邻的穆斯林共和国的情况与状况？我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而相反的情况却多得很。不但如此，甚至中央在地方上的有些代表，在这方面表现得远远不能与自己崇高称号相符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①同志曾在11月党的全巴什基尔会议上坚决反对一个候补委员进入州委员会，这个候补委员就是我。而以尤马古洛夫^②为首的一小撮冒险主义分子却顺利通过，不但没有反对意见，而且是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参加的会议上通过的，而两个月后，他就亲自揭穿了这伙人的无耻行径。阿尔乔姆同志从我这里拿到“巴什基尔援助”之后，没有骑长疥的、被淘汰的瘦马，而决定偏要骑“党的”马。他从许多地方，从乌法，从奥伦堡——弄来不少有历史污点的“工作人员”，把我坚持推荐的从莫斯科来的大专家们扣上不合格的罪名作为非党人氏转给别人。党内这些“脱离集体的人”和盲动家因他们的过去而被巴什基尔人仇视，可以理解，他们在“欺压巴什基尔人行为”上显得特别突出，并在巴什基尔当地和中央闹事时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只要举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86～1937），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乌法省委员会主席。

② 尤马古洛夫，哈·尤·（1891～1937），1919～1920年任巴什基尔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

出几个人的例子就可以理解，这些“共产党员”起了多么大的危害作用：奇斯佳科夫建造了以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命名的“空中楼阁”，还有波利亚科夫^①，别洛列茨克^②的组织曾把他看做一个阻挠他们慢慢调整与巴什基尔人基本关系的人物，因而很乐意地摆脱了他 [……]

个别奥伦堡的工作人员公开对我说：“要不是杜罗洛姆一伙，我们早就和巴什基尔人和谐相处了，可现在事情弄得一团糟，就连接近他们都很困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实在的，巴什基尔人错只错在他们的落后上。过去老天赐给他们的太少了，但就是从那些得天独厚的人那里，除了土耳其斯坦阵线的一些代表和个别中央代表外，他们也从未得到过真诚的、同志式的援助，巴什基尔人始终在受迫害，可现在别人却想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巴什基尔人身上。为了使这种提法的不公正和不正直性显得尤为明显，只要问下面一句话就足够了：“可你们又为吉尔吉斯人做了什么好事呢？吉尔吉斯人一直表现得即便不是卑躬屈膝，怯怯懦懦，也算是非常谦恭有礼”。

四、作为吉尔吉斯自决权因素的“日常生活现象”

1. (吉尔吉斯的和平主义)

《现代》吉尔吉斯问题的全部特征，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个主要原因：吉尔吉斯人不是狼。从前，150~200年之前，他们曾是真正的亡命徒，确确实实的草原骑士，如果不打斗，简直无法平静地坐卧和生活。这一点有他们的人民文学为证。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如：《叶尔·塔尔京》、《科勃兰德》、《阿尔巴梅斯》、《沙克尔·

① 波利亚科夫，米·哈·（1884~1938），1921年任克里木革命委员会主席。

② 别洛列茨克，地名，在南乌拉尔，属奥伦堡省。

沙克拉特》、《克兹·日别克》以及其他许多史诗和生活诗篇中都充满着英雄主题和对骑士决斗流血战斗和胜利后欢宴的描写。“英雄”、“勇士”和蒙古语“骑士”在可汗、达官贵人和人民中间永远是中心人物。战争和爱情——是古老的吉尔吉斯民间诗歌中两个基本主题。在最古老的作品中无意识地着重描述英雄们凶残的本性、他们对危险和和平劳作的轻蔑，而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的画面是以明显的满足感被描绘出来的。这里在最古老的著作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向蒙古骑士神话的过渡，此时英雄们已失去了全部真实性，表现出极为可怕、无限夸大的特性，其中包括兽性的残暴和灭绝人性的残酷。

自1735年阿布海尔^①汗加入俄国国籍时起，战争作为〈对吉尔吉斯人来说〉封建主和统治阶级的一项事业的作用在减弱。俄国政府在“哥萨克路线”的帮助下〈坚定不移地〉深入到草原中，解除了吉尔吉斯人的武装，既阻止他们起内讧，又不使他们去攻击其他游牧民族（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托尔高特人、乌兹别克人等等），即便他们是希瓦人、布哈拉人或是中国国籍的人。1869年，汗政权和草原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消灭，而所谓“中亚细亚统治权”的取得，结束了希瓦和布哈拉实际上的独立，彻底“征服”了吉尔吉斯草原。最近50年，吉尔吉斯人过着和平安静的生活，充满了“在经济上赶上俄国”的积极愿望，十分之九的吉尔吉斯人都成为实际上潜意识的“和平主义者”。旧制度起初亲自缴了他们的械，后来“为了边疆安全的利益”，也不许他们有武装，最近，〈甚至〉连让吉尔吉斯人服兵役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因为他们完全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生活和战争本身的条件。吉尔吉斯人“变成

^① 阿布海尔（1693~1748），小茹兹哈萨克汗。18世纪20年代与准噶尔人进行斗争的哈萨克民军指挥。

没有骨气的人”，心理上软化起来，忘记了过去的时代，那时每个氏族都像一个活动的战斗连队一样到处游牧，随时准备进攻和自卫。由此得出客观上无可争议的结论：吉尔吉斯人早就注定要在世界大战和世界革命中伴演一个纯粹消极和经常受苦受难的角色。在现代吉尔吉斯生活中，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归结到一个中心点——吉尔吉斯的和平主义是这个有着深远历史根源的日常生活现象。

2. (国内战争)

当前，无论白军还是红军，无疑首先都把吉尔吉斯人当作军需物资、马车和劳动力的供应者，所有进入吉尔吉斯草原的武装人员——有的购买，有的干脆就拿和抢吉尔吉斯人的东西；有人雇佣他们，有人“很荣幸地前来工作”干活。现在有些“知情人”却说，吉尔吉斯人不适合苏维埃政权，因为他们不向路人要“证件”，不管是什么人他们都给提供车辆和食物，甚至是逃兵。“真的是这样吗，亲爱的！”本来就不会看，看了也弄不懂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那要这“文件”又有何用。“首长在大声喊”，“首长生气了”，“首长不满意了”，再不然甚至干脆就“把人砍死或枪毙”……唉呀！他需要什么就赶快给吧，不然是大祸来临了！……于是就给了，只要还有就给吧，因为不能把牲口和财产都搬到“远离这些恶魔”的什么地方去呀！……

撤退的军人和部队特别残酷和不择手段，而且也更加不谨慎：他们把武器和弹药都扔掉了。吉尔吉斯人把这些武器捡起来，匆匆“自学”了“武器的使用法”，然后就开始反击掠夺者，并且自己也抢劫起来，特别是抢逃兵，有时也抢辎重。碰到谁就抢，就杀，只要有“外来人”，“俄国人”，或者是敌对“党”，仇敌种族，支系或辈分的吉尔吉斯人都要杀。

战胜的一方，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当它的政权刚刚〈在草原上〉巩固起来，一部分吉尔吉斯人便缴械投降，而大部分吉尔吉斯

人则偷偷把武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于是又重演上面的故事：一些人抢夺，劫取，拿钱买，另一些人把东西给人家，并为他们搬运，为他们干活，“尽量讨好首长”。

3. (军事)

高尔察克曾试图由吉尔吉斯人组成“哥萨克型的骑兵部队”。吉尔吉斯人都来了，“惟命是从”，可是后来着上军装，武装好之后，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四散逃窜，有的甚至在第一战次斗尚未开始时便逃得无影无踪了。

苏维埃政权给了前省级官员，一个头号骗子童甘钦一张委任状，给他“格杀勿论”的权力，并委托他迅速组建红军的“吉尔吉斯部队”，把权交给童甘钦，童甘钦接了权。不管是什么，都给相当大的数量：钱、武器、装备、被服、粮食和布匹等等。可“吉尔吉斯部队”在哪里？他们的“战斗功勋”又在哪里？就连职业参谋部的说谎专家，在这方面都编造不出一点能自圆其说的谎言，而只好改行研究考古学、民族志学和教育学，“以便不白拿薪水”。

可以满有把握地指出，童甘钦“从哪里拿了什么东西”，但“这些东西派了什么用场”，就永远是个谜了。钱没了，东西没了，武器也没了，既没有决算，也没有什么“吉尔吉斯武装力量”。有的只是“胚胎”和“萌芽”，“计划草案和编制”，仍和一年前一样。

伏龙芝^①同志曾经对草原上也是一个大骗子的斯捷潘诺夫—姜格尔金给以“改信耶稣教”的信任，并派他到图尔盖去“组织”一个什么队伍、姜格尔金离开奥伦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久便从地方上传出一些不知怎么回事情的、不详的谣言和反响：“谁在哪儿开枪了”，“发现了大批武装匪帮”，“在库斯塔奈县成立了姜格尔金

^① 伏龙芝，米·瓦·(1885~1925)，苏联军事活动家和军事理论家。国内战争期间任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员。

为首领的另一个吉尔吉斯军事革命委员会”等等，等等。最后一封电报：“据谣传，姜格尔金由于种族仇恨在图尔盖被击毙……”

成立了“吉尔吉斯军事委员部”。该委员部把一些小姐们和苏联居民“以薪金制调到那里”。成立了“军事-工程管理局”，在那里有6个工程师厌倦了修理运货大车和茅厕，终于想出一个主意，要修建几条新铁路，“因为它们对共和国的未来有很大的意义”！可是在吉尔吉斯国民经济会议这一机关里，只有一个半工程师，而在各个地方，技术力量和资金都紧缺得很。

在吉尔吉斯人中间“红军的”一切创举都是谢德林的“平地上的山丘”：不管你多么努力，不管怎么挖，哪怕有三个技术高超的工程师和专家们的帮助，也无济于事。

在其他许多方面，从军事观点和哥萨克观点来看，我的这些可爱的、值得骄傲的吉尔吉斯人，还不如一块空地，更确切地说，纯粹是个负值：每个人的消费几乎都是那么多，而成效是一点都没有，也看不出会有。“普及军事训练”和“警卫”——这是吉尔吉斯最大限度的军事“计划”。其他一切就靠魔鬼来决定了。

4. (“政治纲领”)

根据上述各种条件和“方法”，能不能说吉尔吉斯基本群众都是反革命分子？很明显，不能这么说。谁都不能够哪怕是在棍棒逼迫下建立起一支“坚定的战斗力量”，甚至干脆就是“坚定的军队”来，不可能既非革命者，亦非反革命者。这是评价吉尔吉斯草原上政治运动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立场。而“所有的品质都取决于这一点”。

为什么吉尔吉斯人“原则上赞成”立宪会议，而又“原则上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国内战争呢？很简单，通过和平合法的途径解决一切国际、国内的争议问题，最符合他们这些“和平主义分子”的心意：得到你应得的，付出你应付的，一切“按全民的公正的政权

指示”办事，——就完事了！你不需要打任何人，谁也不会打你：“两全其美”。

这是运动的出发点，继而发生的是上面的事，自己变成“狼”，像巴什基尔人那样，通过向左向右打耳光的方式实现“自决”，——吉尔吉斯人做不到，但立宪会议的幻影刚刚消失，他们便立即亲身感受到高尔察克的“狼牙”。人民痛苦得嚎啕痛哭，于是正直的民粹主义分子（一部分阿拉什——奥尔金斯克知识分子）意识到，他们“走错了路”，和人民一起走到无法通向自由未来的岔道上了，于是这些软弱无力、心地善良、维护和平的“反革命分子”转向红色旗帜，大多数都成为“原则性强”的“富有同情心的”革命者！他们再也不到任何地方去，也不会掀起任何“暴动”。不会制造任何阴谋。要是没有苏维埃政权，他们无路可走。连打仗都不会，怎么能暴动呢？如果新的内战就在眼前，旧制度就要复辟，还搞什么阴谋呢？……

这一切都为——一个相当严肃的现实性结论提供了基础：真正的而且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是现在怀疑或指控吉尔吉斯人是反革命分子的人。在哥萨克人、外来移民和吉尔吉斯人中间，正是那些当地的“波拿巴主义分子”在这方面犯有错误，还有那些比较大的官员，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吉尔吉斯人民真正的生活，而是根据莫斯科的刻板公式或根据当地的提台词者的意见来评论吉尔吉斯人的生活。

5.（“刑事概念”）

吉尔吉斯的知识分子昨天在谈话中强调了吉尔吉斯大众心理的另一面——这就是对特赦的倾向，特别是在刑事案件方面。这一点需要逐条进行研究。

杀人。150多年以前，杀人没有被看做是对个人犯下的罪行，而是被视为对氏族的侮辱。被杀者的氏族应该向杀人者的氏族复仇：以血还血。这种残余在草原的南部地区保留下来，特别是在阿

戴族中（是人类最多的纯游牧民族，有 22 个乡，近 20 万人口）。阿戴人通常不允许把杀人案件提交俄国法庭。杀人凶手的亲属向被杀者家庭和亲属赔偿 5 千到 1 万卢布的“解冤费”（罚金，罚款），大部分都以牲畜和财物顶替，之后双方便把事情忘诸脑后。凶手得到所有人永远的赦免。所有人都有责任向俄国当局隐瞒杀人事实，必要时还要把杀人凶手藏起来。和解的双方，既然他们“按照习俗得到了一切”，就没有权利向任何地方提出控诉，也无权责备凶手，否则面临着耻辱的威胁。这些亲戚们对凶手既有分寸，又有礼貌，这是出于一个单纯的想法：“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事”。因此，吉尔吉斯人把最严重的行凶犯罪事件看做私法性质的，而不是公法性质的。致伤，殴打和致残都以同样态度对待：欺负者的那些行为中并不带有什么侮辱性，既然他已经以某种方式和被欺负者“和解”了。侮辱、说谎和诽谤，如果涉及自己的“亲属”，特别是父母和长辈，那就要受到议论和惩处。对其他的人可以随意侮辱，可以对他们随便说谎和诽谤：自己人不会指责，而其他人呢，发生纠纷和争讼时，他们也会用同样方式对待别人，一旦事情以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都得到完全的赦免！任何人在和睦时都无权指责别人，说他什么时候曾经没良心地撒谎并诽谤那些现在与之友好往来的人，像“正人君子”一样交往的人。所有这一切“当然”完全和英国的原则不一样：“就连敌人的危害也没有说出事实那么严重”。但与我们那些亲俄罗斯的权利相比，这也坏不到哪里去。吉尔吉斯人懂得斗争手段的相互关系：我能做什么，我的敌人也有权这样做。然而我们的“波拿巴主义分子”多半变得崇尚霍屯督人的真理：“我偷别人之妻是好事，别人偷我的是坏事”。特赦只给自己人；对敌人要迫害，哪怕实际上完全没有敌意的，甚至当他们已经对我们有利而且以后还会更有利的人，也要加以迫害。

抢劫，偷窃和欺骗。抢劫——是在公正的战斗中夺取别人的牲

口和财产，主要是牲口，后来这一行为变成捍卫种族之间真理规则的惟一手段。如果杀人的氏族不肯自愿付出“解冤”财物，对方就可以用武力夺取按习俗规定的数量的牲口。如果夺取了多于应该付的数量，那么“多拿的”就会被对方以武力夺回，这种侵袭的参加者既不是掠夺者，也不是强盗，而是类似“法庭警察”之类的人。

“绑架牲口”是件严肃、危险而又光荣的事，盗马的行为就不那么受称赞，不过“好的盗马者”，自己人不但不加轻视，有时反而对他很敬重：这是真正的好骑手！只是不要偷自己人的，一般都偷有钱人的马，因此整个行动都带有打猎或运动性质，但偷偷窃走别人的财产，如：马具、面包、衣服等，——这就是可耻的行为了，这是“偷盗”。这时就既要背着外人，也要背着自己人。这种事通常不能向人夸耀，也没有人称赞此事，更可耻的是以欺骗的方式发财致富：拿了不还，答应了不做，雇工时讲好价钱——偏不按着做，但是，看来，在这里，归还被盗的东西，恢复对方被损害的利益也可以赦免，虽然并不是完全赦免。对于骗子和小偷，可以经常提起他的勾当而不冒社会舆论指责的危险。不过这里不应该忽视问题的一个实质性差别：欧洲人——所有主人都将偷盗视为非常危险、使被偷盗者不可容忍的事而加以追缉；而吉尔吉斯人则没有忘记小偷也是人：如果不偷也能活，干吗要偷呢？我不偷可以生活，你为什么不能？没有必要去偷。

行贿受贿、苛捐杂税、敲诈勒索。这是吉尔吉斯草原最可怕、最根深蒂固的“日常生活现象”。必须同这种现象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而且不是一代人的斗争。历史根源在于过去，那时小的可汗王的“国家收入”通过子民们对可汗捐赠的方式来收取。当自愿捐献不足时，就不得不通过可汗属下的官员们鼓励、强迫并敲诈一部分，这些官员，当然，不享用货币薪俸，而是通过扣除一部分捐赠物资留为己用以维持生活。就连法官们也是靠罚款或罚款人所给的

东西，以实物收取报酬，这些实物，看来，也是以“礼物”的形式赠送的——以报答〈诚实的〉劳动和感谢之意。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869 年。当时实行了草原法，废除了“苏丹统治者”以及一切封建草原贵族的权利，建立了将草原分为许多领土单位——“乡”的制度，每个乡的首领是选举产生的乡长。各县指定了“县长”，他们是从俄国官员，大半是军官中产生，隶属于“军队的省长”和州长。1903 年，在吉尔吉斯草原实行了以“农民首领”为名的“地方自治长官”制，但每县 2 至 5 人。

给官员们“送礼”，不管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继续）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现象。难以想象的是，那些乡长、法官、村长、19 世纪 50 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和与吉尔吉斯人有关连的俄国官吏，如何不择手段地通过罚款、威胁和强制办法夺取那些往往带有贿赂和敲诈性质的“礼物”。

处理琐事的法庭是人民法庭，“按照通常的习惯”，而且可以理解，也收受礼物和贿赂。依次类推的机构是——“农民首领”、“县代表大会”和“州法庭”。那里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吉尔吉斯人的“习俗”。那里坐的都是些根据一些无人知晓的“书本”来进行审判的人。要想“讨好”这些人，应该如何去接近他们，真是天晓得！这里就需要“说人情的人”和“辩护律师”，他们写些“请愿书”、“控诉状”、“上诉状”“上诉书”之类的东西，同时把有罪和无罪的双方都抢个精光。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学家”和省长周围有影响的官员，如果是吉尔吉斯人，则身价百倍。这些人物常常担任省长、部长或沙皇指派的代表团团长。贫民们为所有这些“效劳”付出代价，除了以满足的心情眼看着那些辩护人收取“最高级的礼物”外，他们什么报偿都得不到……

穷人们和中农们的“直观法制感”早就在谴责所有这些不成体统的现象，但因看不到任何出路，只好不情愿地服从“习俗和纪

律”。因此，在吉尔吉斯人的活动中，简单确定“刑事罪”的事实，远远不意味着他在亲戚和人民大众的眼里是无耻的人，很可能，人们已经根据一个原则“赦免”了他：“所有人都这么做，所有人都会这么做”。

五、结束语和结论

我来不及像一开头那样长篇大论地结束我的这封信，那就好似用一只太大的手去拿一把小斧头。不过，我的主要任务——就吉尔吉斯问题给您提供某些方面的参考材料——还是部分完成了。其余的我将在以后空闲时写给您，我将作为一个胆敢郑重引用“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和吉尔吉斯的民族主义者”被人隆重地接到莫斯科去见您。

我本想请求您的保护和支持，可现在，看来，只好认为这是毫无指望的：“波拿巴主义分子”和“新贵族”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与我和解，所以我请求把我作为他们（“波拿巴主义分子”和“新贵族”）的牺牲品。但同时也要求对他们严加干预，使他们永远不敢再去恐吓、讹诈吉尔吉斯人和巴什基尔人。

应当重用那些不抢劫别人的知识分子，应当停止对他们纠缠不休：“行共产党员的洗礼吧！”他们自己会悄悄做到这一点，不过是要灵巧地、小心翼翼地按部就班地做到。

谢杰尔尼科夫^①

^① 季·伊·谢杰尔尼科夫，吉尔吉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02263

萨姆索诺夫关于消灭宗教问题 给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0年12月4日)

就拉齐斯同志关于我们对宗教界态度的信我可以补充以下几点意见：

1. 拉齐斯同志说，共产主义和宗教信仰不能共存，他是完全正确的，除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机构外，没有其他任何机构能够消灭宗教，他这样说也是十分正确的。

2. 全俄肃反委员会所通过的消灭宗教的方针从实际方面来看原则上是正确的，通过担任宗教教阶制度最高层职位人士从核心瓦解宗教的可能性问题除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这方面搞的试验遭到完全失败。例如“宗教事务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错误的方针并着手使东正教教会适应新的环境和时代，结果该委员会被我们解散了，而像阿尔希叶波斯科普·弗拉季米尔（佩津斯基）·普佳塔^① 这些接受忏悔的牧师们都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像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样，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全面地去展开他们的工作并给教会毁灭性的打击，与此相反，普佳塔在肃反委员会闹内讧并对吉洪^② 挑拨是非，同时自己为消灭教会实际上什么事情也

① 普佳塔，阿·弗·（1869—1936），前公爵。曾任俄国驻罗马使馆的教堂堂长。1919年秋同大牧首吉洪和解的尝试失败后，领导“人民解放教会”，宣布同吉洪领导的东正教教会绝裂。

② 吉洪，即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拉文，（1865—1925），1917年起任莫斯科和全俄国东正教大牧首。

没有干出来，甚至像伊利奥多尔·特鲁法诺夫^①那样果断勇敢的着长袍的武夫，就连他在教会的罗网中也找不到精神支柱来公开迎头痛击教会的教阶制度。

3. 基于这些想法，以及注意到下层的年轻的结婚的牧师们，尽管他们为数不多，毫无疑问，他们是进步的，是宗教的改革派，甚至有革命的倾向，主张改造教会，最近以来肃反委员会保密局在其瓦解教会的计划中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正好都放在牧师的基层部分，我们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够用长时间的紧张的和细心耐心的工作来彻底消灭和瓦解教会。在这方面已可以看出某些成绩，尽管暂时还不是在大规模的范围之内。这条方针是正确的，更因为如吉洪、弗拉季米尔·普佳塔之流那样的教会老谋深算的狼，他们能够对我们干出他们随心所欲的事情来，只求自己逃命，他们的灵魂看见的和做的是另外的事情，其实下层的牧师们摆脱了大教会的狼的魔爪后，往往十分忠诚地为我们工作，此外与我们一起直接在信教的基本部分的人中进行工作，下层的牧师执行我们的路线，把瓦解的工作带给更多的信教人，而这就是决定一切的。

4. 到目前为止，肃反委员会仅在进行瓦解最强有力的和最大的东正教教会的事，这是很不够的，因为在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有很多如伊斯兰之类的势力并非不强大的宗教，在这些地方我们也将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进行如对东正教教会所做过的那种瓦解的工作。

5. 驱散宗教的工作是非常艰巨和繁重的，因此想很快取得成

^① 伊利奥多尔，即特鲁法诺夫，C. M. (1880-?)，东正教修士司祭。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

功是办不到的。为了进行这项工作需要有坚强而干练的人，很遗憾，中央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些人。

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局局长 萨姆索诺夫^①

^① 萨姆索诺夫，T.П.（1888～1956），1919年入党。1919年3月起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保密局局长。

№03114

克鲁泡特金关于人质问题给列宁的信

(1920年12月21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声明，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一项决定：将萨文柯夫^①和切尔诺夫集团中的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中心”和“策略中心”的白匪，以及弗兰格尔匪帮的军官们，抓作人质；一旦苏维埃领袖们被害，将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消灭”这些人质。

难道你们当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提醒自己的同志并让他们相信，这类做法是向中世纪时期和宗教战争的丑恶时期倒退，他们这种人不配在共产主义原理上创建未来社会，珍视共产主义未来的人是不能采取上述措施的！

难道就没有人解释一下什么是人质？

把人质投入监狱，不同于惩治罪犯。抓人质是为了以其死亡威胁自己的敌人：“你们杀我们一个，我们就杀你们几个！”每天早晨拉出一个人杀掉，或者说重新把他送回监牢，对他说：“等着罢，今天先不杀你！”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难道您的同志不明白，这对人质及其亲属来说，无异于恢复肉刑？

^① 萨文柯夫，波·维·（1879—1925），俄国社会革命党活动家。

希望谁也别对我说：“现在掌权的人们也不乐意活在世上。如今，甚至有些国王也在‘混吃等死’”。

像路易斯·米歇尔^①先生这样的革命家们，将在法庭上因其一生所犯的罪行而为自己辩护。或许人们对他不予追究，如同马拉泰斯塔^②和伏尔泰、林纳·德-克莱尔所做的那样。

甚至国王和牧师都愿使用扣押人质这类野蛮方法以求自保。新生活的领路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们怎么能为了防止敌人侵害而诉诸这种武器呢？

这会不会被看成一种征兆，即你们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实验并不成功，建设生活对你们来说已不再重要，你们只想自救？

难道您的同志们还没意识到，你们共产党人不管犯过多少错误，你们仍是在为未来而工作？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应当用近似恐吓动物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事业。因为正是以往的革命者们所干的这类事情，使新的共产主义尝试变得如此困难。

我相信，对你们当中的优秀分子来说，共产主义未来比自己的生命要宝贵。只要想到这种未来，就会促使你们改弦更张。

尽管十月革命有许多重大失误（关于这一点，我了解得和你们一样清楚），但它毕竟使俄国取得了长足进展。它证明，社会革命并不像西欧人当初想像的那样：是不可能的。尽管它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正在向平等的方向迈进，这是复旧的企图抹煞不了的。

为什么要把革命推向导致其毁灭的道路呢？而这主要又是因为

① 路易斯·米歇尔（1830～1905），法国诗人。

② 马拉泰斯塔（1853～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

犯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不应当有的错误，这种错误原是旧制度的余毒，是毁灭一切的专制政权过时的恶行。

彼·克鲁泡特金^①

德米特罗夫（莫斯科省）

1920年12月21日

^① 克鲁泡特金，彼·阿·（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

№02264

萨姆索诺夫关于监狱状况给捷尔任斯基和 克谢诺丰托夫^①的报告

(1921年1月20日)

昨天晚上我去看了列福尔托沃和布特尔监狱，在那里了解了监禁在两所监狱里政治犯的生活情况。结果如下。

一、列福尔托沃监狱

囚房里：脏、潮湿、恶臭，而主要是——烟雾，简直使人喘不过气来。被捕的人蒙着头躺在床上，他们千方百计地躲开烟雾，塞住所有的缝隙防止烟雾，开着通风的小窗等等。囚室里使用极简陋的多烟的铁炉子，炉内没有任何的通风力，等等，被捕的人埋怨糟糕的伙食和缺少书籍。走廊里笼罩着透不过光线的烟雾，地上一片泥泞和水。烟雾给被捕的人和警卫人员带来的折磨十分可怕。在气温低的情况下，囚室里的烟雾尤其大。这里宣布绝食的政治犯要求迁移到布特尔基去，这应该认为是正确的。再这样继续对待活着的人并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他们的生活是不允许的，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二、布特尔监狱

晚上9时到达并走进社会革命党中心人物的走廊，这里除东斯

^① 克谢诺丰托夫，伊·克·(1884~1926)，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基^①外，囚室里没有任何人。他们的所有的囚室都敞开着，被捕的人像过去一样来回地走动，从一个囚室走进另一个囚室，从一条走廊走向另一条走廊，从一幢楼走向另一幢楼。社会革命党人中央委员们对面的囚室里坐着一些死刑犯，他们囚室的门关闭着。

妇女和男人像过去一样在一起散步，等等。

在监禁着中央委员的地方，对于我向警卫队长助手们提的问题，最后一个人回答说“那里”，并向我建议去把他们叫到我跟前来。我拒绝了他们的帮助，走向第12走廊去看政治犯，在这里的一间囚室里，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挨饿，原来他们不顾我们的命令，依然保留着没有擦掉反革命的诗句和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在邻室房间关着50~60人，其中有社会革命党人中央委员们，季莫费耶夫^②曾在那里做过报告。据我所听到的报告片断，报告的题目大概是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区别。我的来到对他们来说是突然的，于是他们以为，我是来驱散他们的，可我并未这样做。

在这种条件下关押政治犯，特别是在这座城市里，是不允许的，因为这表明我们的领导人对监狱和住在里面的人无能为力和不通人情。

三、几点结论

1. 立刻，今天就将逮捕的全部政治犯从列福尔托沃迁移到布特尔或者迁到塔甘卡去（假如塔甘卡不像列福尔托沃那样）。

2. 解散列福尔托沃监狱的管理部门并将其主管人员送交法庭惩罚，因为他们非人道地对待被捕的人，理由是其主管人员不尽职

^① 东斯基，Д.Д.（1881~1936），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

^② 季莫费耶夫，E.M.（1885~1941），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

责和玩忽职守。

3. 在列福尔托沃，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怂恿和以其轻率的态度对待被捕的政治家。

4. 由于纵容社会革命党人和非法的纵容所有被捕的人，解散布特尔监狱管理部门。

5. 在布特尔立刻建立正常的严格制度。

6. 全俄肃反委员会参加建立监狱制度并对莫斯科肃反委员会的行动进行监督。

全俄肃反委员会保密局局长 萨姆索诺夫

№02265

捷尔任斯基关于使用极刑等问题 给俄共（布）中央的信

（不晚于1921年1月25日）

在外线作战行动停止以后，全俄肃反委员会自己把关于极刑，关于减少整个肃反委员会审判的职能，关于调整一切审判机关的惩罚工作，关于与惩罚机关和审判机关所有组织系统配合的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至于谈到使用极刑问题，去年12月24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给各省肃反委员会发了电报，电文中说，除了对公开的武装行动案件外，没有全俄肃反委员会对此事的核准，禁止执行极刑的判决。关于对废除极刑的可能性问题，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对一切政治上的犯罪行为可以废除极刑，但一切恐怖行为和公开的暴动除外。在刑事犯罪方面，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必须对匪徒和间谍分子使用极刑，对那些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的犯罪行为尤其要坚持保留使用极刑，因为他们严重地阻碍着苏维埃政权恢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产力。

当时，经济战线要求全力以赴地动员起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因为经济战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必须毫不留情地同形形色色的阻碍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的犯罪行为做斗争。

但在经济战线上要想使极刑的使用在消灭犯罪分子方面上取得像在反革命战线那样的成绩，一切惩罚机关的工作必须协同一致并对其实行统一领导，哪怕在这方面有原则性的决议也好。全俄肃反

委员会认为，目前它的一切机关，除那些参加了与匪帮或外部敌人进行军事行动的地方和部门以外，或许能把自己的职权转交给法庭，正如1920年3月29日的法令所规定的那样。但是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在宣布解除战斗状态的大部分地区，用主管部门协商的办法，而不是用命令的办法来做这件事是合适的。

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异常复杂，因此在向和平状态过渡的情况下，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

但肃反委员会机构放弃审判职权是简化和加强审判机构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必须消灭铁路和军事部门主管的法庭，把那里现有的共产党的力量转到通常的革命肃反法庭和人民法庭去。为了处理从肃反委员会转来的那些终审案件，要建立专门的囚房，如在莫斯科已经实行的那样，最后要加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下的统一的最高法庭来统一整个的审判工作。

关于监狱的政策，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年1月8日颁布了第10号命令，为资产阶级建立专门的制度并把工人交由工厂委员会担保作为这项命令的基本原则。而且要特别注意肃反委员会仅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才采取逮捕措施的情况。此外，根据12月30日第186号命令，因政治案件被捕的反对苏维埃的各种党派的成员，应该被看成是不受惩罚的人，而是为了革命利益临时与社会隔离的人，对他们的供养条件不应当有惩罚性质。

最后，今年1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召开了改变监狱状况和惩罚政策的委员会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同志、亚戈达^①

^① 亚戈达，Г.Г. (1891~1938)，1907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

同志、伊霍诺夫斯基^①同志、梅西恩格^②同志、阿佩捷尔^③同志、赞格维尔^④同志（分别代表全俄肃反委员会、莫斯科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员委员会），克雷连科同志（代表上诉法庭），萨夫拉索夫^⑤同志（代表司法人民委员部），达尼舍夫斯基^⑥同志（代表革命军事法庭），古比雪夫同志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会议建议成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附属下的委员会，而在各地方成立省工会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没有审判职能，其任务是处理无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犯人的案件，以及让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与同犯罪行为的斗争。

有关的法案草案很快将提交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依靠广大群众，首先是依靠工会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惩罚机关的工作将使无产阶级感觉到在实行自身的专政职能。

全俄肃反委员会恳请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在政治犯罪领域取消对极刑的有关限制并在经济战线加强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的惩罚。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 捷尔任斯基

-
- ① 伊霍诺夫斯基，M.K.（1886～1938），1918年12月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侦查局副局长。
 - ② 梅辛，斯·阿·（1890～1940），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起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1921年1月起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
 - ③ 阿佩捷尔，И.А.（1890～1940），1920年12月至1921年7月担任全俄肃反委员会行政组织局局长。
 - ④ 赞格维尔，З.Г.（1895～？），1920年起任俄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役总局局长。
 - ⑤ 萨夫拉索夫，Я.А.（1879～1939），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起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⑥ 达尼舍夫斯基，卡·克·（1884～1941），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革命军事法庭主席。

No02266

捷尔任斯基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 肃反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

（不晚于 1921 年 3 月）

不能同意法令草案分为侦查和侦讯，因为草案弄断了连接在一起的不可分的锁链。被扯断的锁链在扯断的一端带着一大堆辩护人——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富人的司法制度。“口头陈述的结果——就是真理。”在法庭上财富在说话。如果我们扯断这条锁链——我们在法庭上怎样才能找到真理？偶然事件和印象也是一种将人引入歧途，并能制造印象的那种财富。开始办案并了解第一手材料的人才能知道实情。我们为什么要求改变现存的情况呢？假如在肃反委员会的机构中没有足够数量的善于表达的人，应该去找到他们，反正在法庭和其他侦查机构中他们是很需要的。这种结合能大量地节省人力和时间。假如对我们没有信任——那就应当把我们驱散，因为我们只有依靠党的信任才能存在，我们比任何旁人都更无法容忍一切毒草，都能更加顺利地消灭这些毒草。

以为政治斗争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经济犯罪行为的斗争是脱节的——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盗窃、贪污、怠工行为、放荡行为——这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我们这里的表现——被击败的资产阶级会用这些表现扼杀无产阶级专政。而在资产阶级制度中，盗窃和侵吞只能加强私有制的统治。尤其是现在，在过渡时期——我们被迫做出让步——交出我们的阵地，减少和削弱与这些犯罪行为作斗争会使我们的一切希望毁灭。

将全俄肃反委员会置于司法人民委员的监督之下，使我们的威望大受影响，贬低了我们在与犯罪行为作斗争中的威信，证实了所有白匪关于我们的“非法行为”的不可信的谎言，将如此庞大的机构置于一人的监督下，实质上不能取得任何结果。这不是监督行为，而是使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有机构威信扫地的行为。处在一人的监督下，只有一名委员会的委员——肃反委员会受到不公道的对待，因为他们是在战斗中经受考验的党员组成的，并具有比省司法委员更多的党龄。肃反委员会处在党的监督之下。实行省的司法委员制度意味着实际上改变对肃反委员会的方针，因为省的司法部门——这是形式上的公正机关，而肃反委员会是有纪律的党的战斗的队伍。无论是省的司法部门这种形式，还是肃反委员会，都是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肃反委员会及委员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不能当那种等级的公民，如白色专家——二等公民。司法人民委员部有普遍的权利和义务在全国和在一切部门、社会团体及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监督法制，而不仅是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机关中。而为什么只有我们应当受到监督呢？

原则上这种监督的安排是针对我们这些党的工作人员的，而不是针对逮捕和枪杀的专家——内心是不能接受的。

从业务的观点来看，草案也是经不住批评的，我们不能出示侦探的案卷——否则因斗争有成绩而解除我们的责任，那就不应该要肃反委员会了，把一切斗争任务都转交给将负有责任的省司法部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好了。

司法人民委员部应该使我们的斗争披上新经济政策的外衣——应该这样，但为此应在责任和任务方面统一步调，应当派送我们这样具有司法知识的战士去，以便使我们的斗争通过各种保障等等伪装起来。应该教会我们用敌人的武器去打击敌人——但打击的是敌人，而不是我们。为此，应该加入委员会并对这些形式加以监督，

监督这些形式是否被破坏。这是应当做的事，而不是交出阵地，即使在没有这种需求时也是如此。假如肃反委员会已失去了党的信任，而省的司法部门却获得了这种信任，那就应该解散肃反委员会，并将他们的斗争任务转交给省司法部门。

还忘记提醒一下，对我们的侦察机关的监督按照法令应该由法庭来执行。

№02267

土耳其斯坦前线特别局库什克分局 向俄共（布）中央的声明

（1921年3月18日）

我们，共产党员——土耳其斯坦前线特别局库什克分局的工作人员向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错误地枪决在特别局和肃反委员会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的事情，这些共产党员近来在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活动频繁。枪杀这些工作人员是因为各种犯罪原因，但在无产阶级这些惩罚机关中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能保证明天不被人枪决，不被加上犯罪行为中的任何一条罪状。看来，枪决工作人员是指望对惩罚机关的机构进行整顿，处在“上层”的人们根本不想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会瓦解工作人员队伍，这些工作人员已没有任何工作的愿望了，他们已经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十分冷漠的态度，直到最后轮到他们被枪决也无动于衷了。而假如那些如此轻率地签署死刑判决的人再走近一些看看这些工作人员的生活，便会发现，他们赤足、裸身、挨着饿，这些挨饿的人有时为了一俄磅的饼子（小麦面的饼）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出身于工农，具有沙皇制度遗留给他们的一切缺点，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那么我们就觉得，不能够轻率地签署“枪决”。不管这件事如何令人伤心，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共产党员一进入到惩罚机关后就不再是人了，而变成机械运动的自动步枪了。甚至连思维也是机械式的，因为这种人不仅连自由发言权，甚至连独立思考权都被剥夺了。他不能自由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流露出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对受到枪决

的威胁。有人想从原来的、如其他人一样的、昨天还是那样“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肃反工作人员或者特种人员中培养出一名纯洁如水晶的、不犯任何错误的、理想的工作人员。但假如我们拿每个共产党员——肃反工作人员或者特种工作人员来举例并研究他的生理和心理结构，那么我们会发现，他有物欲使他正常地感觉到其他的嗜好，这些嗜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要根除掉几乎是不可能的。除这一切之外，须知我们大家都在犯错误，因为我们是在错误中学习的，假如因我们犯这些错误，因我们或许第一次在生活道路上磕磕碰碰，就要把我们拿去枪毙，那还有什么工作的愿望可言。尽管在进行残酷地枪杀，犯罪行为却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这证明，我们用枪决的办法不是与犯罪行为作斗争，而是与罪犯作斗争。而这些罪犯是谁？是工人和农民。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成立无产阶级的惩罚机关是专门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它不断地在被消灭，而资产阶级彬彬有礼地佩戴上了“专家”的头衔之后，怡然自得地很愉快地微笑并制造叛乱，又促使那些工农成为罪犯。资产阶级用不着去犯罪，因为他们能够生存，而且不良嗜好也很少，所以他们非常安静地生活，任何的枪决事情对他们是不可怕的，因为在法律上他们一向是正确的，而工人和农民由于自己的无能仍然总是在各方面都是有罪的。从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枪决——这是对工人和农民的极为残酷的一种手段。我们认为，在审判任何一个工人或农民之前，无论他在哪里工作——无论是在肃反委员会或是在其他机关，必须查明引起其犯罪的原因，查清他的生活条件，他的心理上的特点，他所受的教育、觉悟程度等等，这时才去判决。判决不是去枪决，而让其从事一些强制性的劳动，因为在强制性的劳动中，每个工人和农民都能够改正错误并在自己所犯罪行中追悔。只是必须使每一个罪犯——工人和农民激起悔过的感情，自身变质的感情，于是原先的罪犯，社会的有害的成员能够重

新加入我们无产阶级大家庭的行列。除这一切之外，将本应枪决的这些罪犯送去进行强制性的劳动，使我们能获得很大的好处，使他们成为我们必需的工人的力量。我们不是对枪决提出异议，而是对使用这样的枪决办法对付工人和农民说出我们的观点。需要枪决：枪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家、匪徒以及思想上的反革命分子，枪决他们后，我们消灭了祸根。按照我们的意见，给犯人判罪时，应当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现在，假如我们来看看在无产阶级惩罚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那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站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之外，因为由于长时间地处在惩罚机关，由于单调的、冷酷的、机械的工作，这种工作只是寻找和消灭罪犯，于是他们渐渐地违背本意变成过着特殊生活的人了。他们身上滋长了坏的习气，如傲慢、贪图功名、残暴、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等等，于是他们使自己不知不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组成了他们的特殊的等级，这种等级可怕地使人想起原先的宪兵。党的组织怀着恐怖和蔑视的心情把他们看做是原先的警卫队。由于目前的工作安排，以及惩罚机关的这种结构和这些机关完全没有与党组织积极的必须的联系，出现这些现象完全是很自然的。一方面是党的一只铁拳，另一方面这只拳头对党迎头打击。直到定期地更换在惩罚机关的共产党员，用调遣他们去其他机关工作的办法，向惩罚机关注入党的新生力量为止。因此，在惩罚机关待过又从那里离开去其他机关的所有的党员同志们不要去歧视现在在惩罚机关的共产党员，而要尊敬他们，他们是革命的真正的蒙难者。

上述一切看法不是由任何的或为自己的利益而颤抖的偶然现象引起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长期工作中的经验及对一切革命事件和生活进行观察中——为了国家机关的机构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分析和得出的结论。

总括以上所述，我们说：要更经常地更换身在无产阶级惩罚机

关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多关心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人员。

用枪决对付资产阶级和用同志式的改过对待工人和农民。这就是我们的惩罚机关所应建立的基础。

总之，在结束我们的声明时，我们，共产党员，希望我们党的最高机关将会重视我们的声明，那么 we 想，上述的一切不会成为旷野上的呼声。

我们不相信本声明会送到您处，担心它会“搁浅”在塔什干，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寄送给您的是急件的第二份，并用同样的地址从邮局又寄了一份。

附件：在声明上签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附上了党证号码、党龄和社会职务。

外里海省库什克要塞特别局分局

1921年3月18日

签名

№02269

瓦尔金－姆格拉捷关于各党派的态度给 俄共（布）中央和莫斯科执委会的信

（1921年4月11日）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团体目前实际上处在秘密状态中。

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采取积极的政策但尚未公开化。相反，社会革命党正积极转入地下，以便从那里破坏苏维埃政权。

但上述所有党派和团体也有与积极态度相反的派别和团体。大概有一定数量的、为数不多的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坚决反对切尔诺夫^①－阿夫克森齐耶夫^②的冒险行为。大多数的孟什维克，毫无疑问，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新的好战的企图持否定态度，而且他们那里又发生了新的比马尔托夫^③－唐恩更左的分离派别。

于是这些“左的”派别取得了公开身分。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东斯科伊提出申请允许他们有印刷出版机关。孟什维克早就在力争实现那个目标。因此莫斯科苏维埃选举时，提出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向我们的政治敌人提供人所共知的“选举自由”。我认为，应该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允许孟什维克、

① 切尔诺夫，维·米·（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18年1月任立宪会议主席。1920年起流亡国外。

② 阿夫克森齐耶夫，尼·德·（1878～1943），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8年任所谓乌法督政府主席，后流亡国外。

③ 马尔托夫，尔·（1873～1923），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

社会革命党人”、最“彬彬有礼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印刷机关出版物是合理的。我不理解，马尔托夫的《社会主义通报》，在莫斯科，而不是在柏林出版，会对我们有什么危险。这份刊物不会因此变得更卓越、更强有力吧。这未必能成为孟什维克的重要的组织中心。例如合作组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个意义上起着重要得多的作用。

而当现在这份内容贫乏的不合法的《通报》流传到我们这里时，它对大家具有特殊意义。

但是取得合法地位后，当然，我们应当紧握缰绳。通常或是我们允许我们的敌人完全肆无忌惮，或是完全不许他们说话。到目前为止，在法律的范围内我们似乎还不能控制住他们。

现在我们应该试图去做这件事。我们应当对我们的敌人说：“先生们，在我们的法律范围内你们是自由的”。

对号召进行内战、罢工、违反我们的法律的任何企图，我们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去审讯。

他们积极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图谋将被我们坚决制止。

我们应该向他们承诺这件事并认真地去实行。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法律范围内与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工人们支持法庭对煽动进行新的内战和罢工等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谴责。

我认为，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公开身分时，我们与他们进行政治上的斗争更容易些。现在我们手中有大量的极其重要的材料来对付我们的敌人。当我们现在发表言论来揭露时，人们对他们很少相信，并对他们说：“他们的嘴被封住了”。

按照我的意见，让“所有的党”，而不是“一个党”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是极为重要的。在苏维埃中我们需要反对派。当一个非党的工人对一党专政提出异议时，他是指在苏维埃中没有经常反映不是阶级的，而是他们的职业上的和生活上的利益及需求的那些党派。

我们需要反对派是为了加剧我们敌对的一些党的队伍中的分裂和瓦解的趋势。“布尔什维克党确立其统治是在不断地瓦解和粉碎所有身旁的党的基础上的”——切尔诺夫在《革命俄国报》第3号上哀怨地说。公开的党派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人所共知的“随波逐流掩饰其真面目的习气”。假如对待反对派更委婉些，更“彬彬有礼”些，一直到目前为止那样做的话，那么反对派在小资产阶级党派队伍中完全成为“瓦解组织和粉碎组织”的因素。

最后谈谈关于“制度”——关于苏维埃制度，关于宪法的问题。当流放我们的党员去服苦役的专制政府在杜马中还容忍我们的党派时，它关心俄国的“议会制度”的利益，关心其宪法。我认为，目前我们不能轻视我们苏维埃制度的利益，不能贬低我们宪法的威信。

“自由选举”、“宪法”，当我们实现这件事时，它加强了我们的阵地，削弱了新的喀琅施塔得事件成功的可能性。

分配制和合作社并列时我们也要从我们的敌人的手中夺取这个武器。我们要去完成这件事，越快愈好。

现在，依我看来，对小资产阶级我们是有“好政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目前还在叫喊说，他们又一次被布尔什维克“剥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再重复一次1918年夏季彼得堡的经验，并在选举运动之前故意引人注意地释放被告发谋划、煽动、组织暴动和罢工等等的那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最“彬

彬有礼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都是十分合理的。这个措施不会在政治上削弱，而会加强我们。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 瓦尔金（姆格拉泽）^①

^① 瓦尔金（姆格拉泽），伊·弗·（1890～1941），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

№02268

捷尔任斯基对土耳其斯坦前线特别局 库什克分局声明的答复结论

(1921年4月23日)

假如确实对枪决契卡工作人员范围太大和考虑欠周的话，我认为此信应送交彼得斯同志去了解情况并采取措施。对这封信应该有反应——这封信给人的印象是一些心里长期痛苦的人们写的。实际上，从来不允许那样去惩罚所有犯错误的人。那些来自工人中的人犯罪是偶然的，对他们施用极刑应当极其慎重，只是因为他们曾生活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对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状况缺乏关心——缺少与党的联系和支持。假如罪行很多，假如把他们看成像宪兵一样——这意味着他们全部将被毁灭。这里应当医治一下肃反委员会，不是用枪杀，而是确确实实地较经常地替换、更新成员，与党接近并引起党本身的关注。假如同志们把他们看成像宪兵一样——这是肃反委员会的毁灭。在党的内部要与这一点进行斗争，派送到肃反委员会的不是“宪兵”，而是同志，党每一步都在支持他们并将给予党的信任。

费·捷尔任斯基

【专题说明】

俄共（布）八大中的军事问题

（1919年3月）

本专题收入的是关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小组会议和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讨论军事问题的文献。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代表俄共（布）中央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一部分反对中央军事路线的代表，包括弗·米·斯米尔诺夫、格·伊·萨法罗夫、格·列·皮达可夫等，组成了“军事反对派”。斯米尔诺夫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代表了这个集团的观点。由于很多代表报名发言，代表大会决定将讨论放到军事小组会议上进行。有85名代表参加了军事小组的会议，23名代表发言。3月21日晚，关于军事问题的讨论移到代表大会秘密全体会议上进行。雅罗斯拉夫斯基向大会汇报了军事小组的工作。讨论结束后进行表决，赞成中央决议案的代表有174名，赞成“军事反对派”决议案的代表有95名。

这里刊出的军事小组3月20日和21日会议以及3月21日秘密全体会议的速记记录是第一次发表。只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发言以前全部或部分发表过，列宁的发言收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

卷第 170~176 页，斯大林的发言摘要收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21~222 页。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编辑和校注，
郝尔启翻译)

№05221

军事小组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

（1919年3月20日）

主席^①：我将如下建议提付表决：同志们是否愿意首先开始就现有的两个报告^②进行一般性辩论？（通过）

捷姆利亚奇卡^③：我提议表决：我们把某份提纲作为基础还是就这样开始辩论？

尤列涅夫^④：我们在白白浪费时间。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要辩论。就是说，把哪个报告作为基础的问题，在我们辩论的过程中就会弄清楚的。我提议停止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而就这两个报告的实质着手讨论。

主席：也许，我们应该先就立即开始辩论的问题，交换一下意见，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建议？（通过）那么，我们就开始辩论。我建议限制一下时间。登记发言的有24个人。（通过限制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的建议，通过停止发言者登记的建议）。

① 速记记录中未注明谁是军事小组的主席。根据一些间接材料（如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给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声明）推断，军事小组主席是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② 指索柯里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夫1919年3月20日上午在俄共（布）八大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③ 捷姆利亚奇卡（扎尔金德），罗莎丽亚·萨莫伊洛夫娜（1876～1947），1896年入党。时任第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④ 尤列涅夫（克罗托夫斯基），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1888～1938），十月革命后历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东方面军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巴甫洛夫^①：我发言很简短。我只是想，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军阀习气，帮派习气——已经存在了。它表现为肆无忌惮的专制独裁。让我们惭愧的是，应该说，这种帮派习气甚至在我们亲爱的共产党员同志当中也有所表现。这些党员一无所知，他们却说什么一切为了红军！在这个口号后面，往往掩藏着旧时代见不得人的污垢。这种帮派习气是一种最可怕的现象。它使广大红军战士不能和当地工人大众打成一片。党在地方上的工作必须改弦易辙。

有一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那就是，建立纯军事性质的党的机关只会使红军战士中的党员与其他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众更加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因为工人和红军战士大众只会看到，这个享有特权的帮派怎么在外省、在地方如此大吵大闹，简直令人可怕。

请注意听听从前线来的同志们是怎么说的。我想说，有些同志在这里谈到全世界国民经济委员会，他们需要在军事工作上表现出自己的理想主义。这些同志忘记了，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军事长官。他们把自己关在纯军事的圈子里，忘记了其他工作，忘记了党的工作。这就是我要说的两个基本论点。代表大会必须采取措施，从整个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中根除这种军阀习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我们地方将是权威性的。

显而易见，在大大小小的指挥机关里坐着一些损公肥私的家伙。到这之后，我曾到各式各样的机关走了走：还是那些老面孔，那些令人难以容忍的损公肥私的家伙。有些同志认为，如果我们把他们赶走，就会产生某种可怕的后果。做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吧！如果我们看到，所有这些指挥机关里的……我不愿说出那个难听的字眼来，他们都滚出去，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请求特别

^① 巴甫洛夫，Д.А.（1880～1920），1899年入党。时任俄共（布）叶列茨县委员会主席。

注意这两点。必须在建立我们的党的和红军的组织时，无论如何不要使它们脱离地方党组织，党的工作不要集中在专门的兵役委员会里，而要仅仅集中在党的中央机关，集中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

萨法罗夫^①：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同志们在试探所谓反对派方面作了几次不成功的尝试。我应该说，这些尝试非常不成功。尤列涅夫同志不知为什么说，有人想要通过选举产生指挥人员。我不知道有这种人，至少在我们共产党里没有。索柯里尼柯夫^②同志说，有人想让我们的军队回到游击时期。对这种人我也不感兴趣。假如尤列涅夫同志援引了某些文件，那就会正确得多。理由充足得多。红军应该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客观工具，而且是工人阶级的主观的、有觉悟的工具，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地提出来。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他说：根本问题不是军事专家的问题，而是掌握那个构成我们红军主要部分的中农广大群众的问题。我觉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只能这样，而不是以别的方式提出问题。当然，无论什么人，至少是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不打算拒绝利用军事专家，谁也不认为，可以如常言所说的像个莽汉、像个傻瓜那样，拎着斧头去迎击坦克。要是跟风车这样的敌人作战，那当然十分容易。这个问题不值得研究。就其实质说，军事专家的问题，我们的机关吸收和利用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的问题，十分自然地关系到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已经提及，这就是中农问题。

在革命初期，即革命的志愿游击斗争时期，应该说，我们缺乏

^① 萨法罗夫，格奥尔吉·伊万诺维奇（1891～1942），1908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② 索柯里尼柯夫（布里利安特），格里戈里·雅柯夫列维奇（1888～1939），1905年入党。时任南方面军和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军事组织的基本骨干。大众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上是可靠的。他们对自己直接参加的斗争，政治上多多少少是有认识的。如果以彼得堡赤卫队员为例，他们那里根本不用设什么政治部门。在现在的红军中，我们就看不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也不可能有，因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绝大多数人是小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他们在军事上训练有素，而在政治上觉悟上则相去甚远。于是这里，正是鉴于这一原因，军事专家问题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如果说过去这些志愿队伍里需要军事专家，迫不及待地需要他们，是因为当时没有能发出最起码的、最直接的指示的行家里手，那么现在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大众，则在政治上缺乏觉悟。军事专家来到这些人中间，是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中，他不可能对群众产生任何有害的影响。而在这个环境中，因为我们的军事机关表现出官僚化倾向，而这一倾向主宰着我们党的军事政策，所以就有极大可能为了贪财图利，为了某种阶级利益去利用这些人。因为，否认绝大多数旧军官还没有站在我们一边这一基本事实，那只是佯作不知。问题不是说要屏弃旧军官，而是要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利益去利用他们。

而现在，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问题。在白军中什么人构成基本骨干？就是那些其利益与白军息息相关的军官。在红军中什么人能够做基本骨干呢？只有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也只有党的纽带能在两者之间起到联系作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过去报务员想得到电报机，铁路工人想得到铁路，而现在共产党员想得到红军。这个比喻极其不妥。如果说谁有权领导红军，那么，首先就是共产党，因为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工具，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恰恰又是共产党领导着这个政权。当然，不应赋予党支部直接干预军官发布命令、直接干预军事活动的权利。但是，党需要找到领导整个红军

建设的某些形式。

这些形式还没找到。我们有中央委员会给各党支部的指示^①。这一指示规定，政治委员应该接受党支部的领导。但是，真正按这一指示行事的政治委员为数极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与那样一种人打交道，他们利用这些指示，来达到根据这些指示以享有权利的目的。于是，关于从政治上支配这些缺乏组织观念的人的问题就是一个根本问题。军事机关的某种官僚化使我们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指示中没有说明政治委员和政治部门的相互关系，没有说明各政治部门之间有怎样的党的关系。完全不知道，各方面军、各集团军的政治部门、全俄政治委员局^②，服从于怎样一个党的领导中心。我们不知道，那里有中央委员会的什么委员，他在领导全俄政治委员局。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央的分支机构。

总之，同志们，既然我们没有提出这个关于党支配整个红军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根本问题，所以我们关于部队的组建方面、部队的配足编制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缺点的全部议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所有这些老大难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我们的事情并不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军事作家，比如斯米尔加^③同志描绘的那样一帆风顺。需要明确地说，这里要有党的权威性的干预。这不是党的工团主义，这是党对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干预。

米雅斯尼科夫^④：有人说，我们在军事问题上，以党的中央委

① 指《俄共（布）中央给前线和后方的红军部队党支部的指示》。

② 全俄政治委员局隶属于苏俄陆海军人民委员部，1918年4月设立，1919年4月改组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③ 斯米尔加，伊万·捷尼索维奇（1892～1938），190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④ 米雅斯尼科夫（米雅斯尼克扬），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1886～1925），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方面军总司令、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员会为一方，以反对派为另一方。我认为，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根本不存在。我们的军事问题和军事政策是曲折发展的。党的中央委员会本身，尤其是托洛茨基同志，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使得我们弄不清，在军事上哪种观点会占上风。这倒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军队非常年轻。必须再过好几十年，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军队锻炼出来。这个问题不必多讲。我们现在正在开的代表大会，应该收集地方上的同志们的意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兵役委员会变化多端，有时淹没在诸多其他单位之中，有时自己又将它们取而代之。有一个全俄政治委员局，它的职能就相当模糊。比如，我只从那里领车票。

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谈实际方面吧。遗憾的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作副报告的人对这个问题谈得更为透彻。我恰恰想把他的论点作为基础，并进一步阐明这些论点。此外，我并不同意他的某些论据。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也不能正确对待军事专家问题。我们谁都不会说，应该利用他们或者不应该。但是怎样利用呢？这个问题应当解决。

我的观点是，我们利用军事专家时，应该不是让他们担任指挥职务，而是把他们作为顾问，不给他们任何指挥权。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在爱斯兰战线工作的经验，我知道，他们在监督之下干得不比现在差。他们那时没有任何指挥权，但是他们并没有背叛我们，并没有消极怠工。有人对我们说：如果你们不给他们权力，你们就将得不到现在得到的东西。这些要求是军事专家们提出来的。为什么他们要求这个？就是為了更便于消极怠工，为了不受监督。如果我们把军事专家仅仅作为专家对待，剥夺他们的指挥职务，这个问题会解决的。当然，没人否认，身为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军事专家应该担任指挥职务，而对那种没有站到苏维埃立场上来的军事专家，应该剥夺指挥官的权力。

军事专家，对我们来说是异己分子。他们现在执掌着许多权力，给我们的军队带来许多毛病和消极的东西。关于这些斯米尔诺夫^①同志已经讲过。首先，是名分问题。有人曾说，这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从普通士兵的观点来看，这不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就用不着秘密颁布命令，规定有将军军衔的人应该在袖子上戴一颗星了^②。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群众中间炫耀这种特权对我们不利。

接着谈特权。军事专家和工业、经济领域的专门人才，就以女打字员为例吧，她们的数额相差悬殊。军事部门的打字员的收入是900，而苏维埃机关的打字员的收入是600~700。人们涌向军事部门，于是那里来了一些不宜做军事工作的人。军事机关里不应该有特权。每一名专家，每一名军人，都尽量把后方看做前线。当我们的战线在600俄里以外的時候，整个俄罗斯都是前线地带，于是所有的人都只领取一点口粮。

条令问题也是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是谁制定的条令呢？是我们？不是。还是那些制定过沙皇军队条令的将军们。我认识一个政治委员，那是奥廖尔的一位朋友，叫谢马什科^③。把原先条令里“沙皇”一类词勾掉，换上“苏维埃、列宁”这些词儿。你们说，什么是士兵？士兵就是沙皇和祖国的仆人。他的条令里说，士兵就是苏维埃政权的仆人，他应该保卫祖国免受国内外敌人侵犯。在各种条令里，你们能找到一大堆这样的毛病。如果你们拿卫戍勤务条

① 斯米尔诺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77~1938），1919~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粮食人民委员。

② 1919年1月16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批准了各兵种军官袖标和领章的样式。

③ 谢马什科，А.Я.，1918年5月起任奥廖尔军区政治委员，1919年1月起先后任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令看看，那里边写着，应该怎样答话。写这个干什么？当托洛茨基同志骑着马（骑术不佳），去参加检阅，视察他的部队的时候，需要这东西。这我明白。可是，当我们拟定曾被沙皇军队诅咒过的整个条令的时候，这东西根本用不着。你们就是这样激起士兵反对你们自己的。

纪律问题——这里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什么是纪律？就是需要按照首长的命令做事。未必有人会否认纪律的必要性——别无出路。当然，我们应该否定选举制。关于这点，我不准备赘述。

有人在这里谈过党的工作问题。党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需要制定党支部应该遵循的一定的方法。但是，我应该指出，遗憾的是，在地方上我们的党组织本身似乎对深入军队中并在那里按党的原则开展工作不感兴趣。各个战线情况如何？大多数部队没有像样的党组织。代表大会应该就这个问题制定一定的方法。

关于动员问题已经谈了许多。很遗憾，法令对于谁是劳动人民，没有清楚的说明。我们说：苏维埃机关的全体职员是劳动人民。可是，他们当中现在也还有一半以上是白卫分子。我们应该通过决议：“我们应该招募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和共产党员。那些军士，关于吸收他们已经颁发了命令，他们都是富农。可不是吗，旧军队的军士是些什么人？教导队都是从乡下富农当中选来的。”

再有，今天谁也没有在报告里谈到军队的供应问题。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供应机构的情况糟糕透顶。然而我们应该把供应工作安排妥当。

同志们，我想谈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请给我两分钟，让我谈谈各个作战中心的事。（提议被通过）

应该怎样组建指挥人员队伍呢？上校以下的低级指挥人员当然应该是我们的人。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军事机关对培养我们的指挥人员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遗憾的是，我们的指挥人员只去参加检

阅——别无他任。

遗憾的是，从教官训练班出来的指挥员不称职。至于高级指挥人员的队伍，依我看，组建方法应该完全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不同意斯米尔诺夫同志的观点。军队中应当实行一长制。集体阻碍事。指挥员应该是自己人。如果有专家担任参谋长，任何一个自己人都能指挥。

亚历山德罗夫^①：我希望在红军组织里工作的所有发言人都离题近些，谈得具体些、实际些。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今天对我们指出，我们没有一个阶级军队。最初有过，可是后来军队里到处都是富农分子。这点说得对。应该告诉你们，最近通过动员招募来的这批富农分子，确实使我们全军士气低落。最近在乡下，那些刚愎自用的军事委员和乡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经常把本应向富农征收的非常税转嫁到中农头上。这种做法对我们军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我听到过几千次抱怨，收到过几千份申诉。学员和红军战士抱怨说，我们在军队服役，可是却让我们纳税。在奥廖尔省布良斯克县，在普龙斯克和奥尔洛夫斯克，我们就赶上了倒霉的时刻。当时发生了地方守备部队暴动^②。那里的富农分子不去作战，不同情我们，不理解我们的任务。

开小差现象瓦解着我们的军队。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税的分摊办法起着很坏的作用。这是一个情况。现在就需要引起重视，把富农分子从我们的军队中清洗出去。否则，奢谈什么阶级军队都纯属空话。第二，无论我们怎样利用这些革命法庭制裁开小差者，还是无济于事。开小差的人数不断增加，只是有时有所减少。哪个团的

① 亚历山德罗夫，A.C.（1881~1957），1900年入党。时任俄共（布）奥廖尔省委员会主席。

② 指1919年3月驻守奥廖尔和布良斯克的第4步兵师发动的叛乱。

指挥官称职，哪个团开小差的人数就越来越少。政治委员不称职，开小差的人数就增加。我想，原因在于我们军队补足编制的原则。现在就必须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改变军队补充兵员的办法，回到我国实行君主专制时代的那套办法上去。把梁赞人派到坦波夫〔省〕去，把坦波夫人派到弗拉基米尔省去。为什么？是这么回事。我问过〔开小差的人〕：你干什么去了？你知道，地主会抢地的，〔他们回答说〕：到离这里15俄里的村子去运粮食了。你拿他怎么办呢？所以应当改变补充兵员的办法，就是说，应当抛弃就地补充兵员的办法。

再者，至于军事专家和政治委员，那么，无论报刊上，还是谈话中，每每提及他们时，都只有一个结论：政治委员毫无用处。政治委员与党组织全无联系。他们大多是毛头小伙儿，1918年、1917年入党的党员，有的甚至1919年才入党。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很明显，如果一名有经验的军事专家碰上这么个政治委员，立刻就会把他同化过去，把他攥在自己手心里。政治委员就会变成专家的勤务兵。事情很明显，惟一的出路是，总司令部下设训练这些政治委员的学校。应当把干练的同志送到那里，2~3个月内，我们就会有出色的政治委员。是啊，同志们，军队中的政治委员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如果政治委员称职，如果他到军需库办公室、学校去看看，那么，这样的政治委员确实能振奋军队的士气。

当然，我们没爱国军事专家不行，这用不着多说。

条令应当修改。条令使我们的军队士气低落，条令使我们的军队染上反革命情绪。有的地方准许专家有听差和勤务兵给他们擦皮靴，应当废除旧条令，应当制订真正无产阶级红军的条令。再说说指挥官训练班的事。应当效法我们的敌人的经验。所有的师和旅都应该在共产党员这一特定的核心周围扩编。这就是能拯救我们的惟

一具体措施。

雅罗斯拉夫斯基^①：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最大的军事活动家托洛茨基同志缺席。否则，他可能会更天才地为他提出的那些建议辩护。但是，还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看得出，托洛茨基同志就满腹疑团。关于设立红旗勋章，关于条令应该修改，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每当旁人给他指出这些条令里^②的一大堆毛病的时候，他便十分惊讶：这些条令是他批准的。我应该在这里略微谈谈这些条令产生的历史。在全俄总参谋部^③制定这一条令^④的委员会上，我当着泽维亚尔托夫斯基^⑤面提了条建议，条令不能按这个样子颁布，应该先以草案形式发往各军事组织，让同志们根据它发表意见。全俄总参谋部没这么做。不但如此，全俄总参谋部把这个条令寄给几个军区的政治委员，其中也有我，我们作了几点修改，这些修改意见没有被采纳。因此，我应该指出这一事实：批准这一条令的人对这件事漫不经心。我想，今后我们不会再提这件事。

很明显，我们都有同感，这个样子颁布的条令，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赞成。这个条令需要修改，我们也许会通过决议，让同志们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全俄总参谋部或者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⑥以若干独立的决议的形式加以颁布。此事我们可以告一段落了。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1878～1943），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后任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

②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1月批准的红军内务条令和卫戍勤务条令，12月批准的野战条令，1919年1月批准的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

③ 全俄总参谋部是苏俄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机构，1918年5月设立。

④ 指卫戍勤务条令。

⑤ 泽维亚尔托夫斯基，И.Л.（1888～？），1917入党。时任全俄总参谋部军事院校总管理局总政委。

⑥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18年9月6日成立，是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权力机关。1923年8月23日起改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下面，我想谈谈关于我们的机关官僚化这件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同志们在这里提到了供应问题。从前线回来的同志知道，当他们需要从这里领到什么的时候；要受多少罪，要受多大罪。需要在区兵役委员会登记，然后在市兵役委员会登记，然后去找军需总部，以后去找军区军需总部。从军区军需总部领到一张某某军需库配给许可证，最后到了库里，却发现那里一无所有。那里告诉他，得去某某市。为领一个凿子，跑趟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开过一次研究供应问题的特别代表大会^①，但是我应该指出这一事实：这方面缺乏某种条理性。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应当重新考虑。

我想谈谈一系列矛盾重重的命令，这些命令政出多门。最高军事检察院^②做出一些说明，发布一些命令。尤列涅夫同志则就同一问题做出另外一些说明，发布另外一些命令。闹得政治委员们莫衷一是。他们去问最高军事检察院，可最高军事检察院不知道政治委员条例。他们说，这事问尤列涅夫同志，其实这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对好多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我要请尤列涅夫同志回忆一下，在全俄第一次政治委员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政治委员权利与义务条例^③。条例哪儿去了？

尤列涅夫：被否决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就应该告诉大家，提出的所有提案都被否认了。可以再制定一套嘛！根本没这么做。政治委员们工作时完全无章可循。他们发生了许多争吵。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没法有计划地工作，全俄政治委员局本应解决这个问题，却毫无作为。怎么

① 1919年3月13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省军事采购局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 最高军事检察院是苏维埃俄国最高军事检查机关，1918年4月设立。

③ 指1918年6月初在全俄第一次政治委员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兵役委员会和政治委员条例》。

会这样呢？为什么要去问尤列涅夫同志呢？我们的政治委员有什么职权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中央委员会早就应该制定条例，早就应该指出，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何在。这项工作干得糟透了。条例送到全俄总参谋部，6~7个月后才最后敲定。编制表4月份交上去，年底才批下来。这一切都必须彻底改一改。

我还想就我们做的几次实际上非常不成功的尝试说几句。我们与与会者谁都不拥护游击习气。托洛茨基同志要是在这里参加代表大会，他也不敢像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这样讲话，不会说这番话，似乎这在我们整个历史上是件可耻的事，游击斗争在历史上有它光荣的一页，可是您却把它说成耻辱。当初应该改正这些错误，但是应该说，这些游击队不光做坏事。

现在情况又怎么样？发布征集所有军士的命令。把他们组成突击营，结果发生了丢脸的事。第一次开拔就出了前所未闻的事。全军覆没，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试验应该结束了。我想，后来显然在这方面也形成了一致意见，以后我们很长时间不会再谈诸如全俄政治委员局及其职能问题。所有的政治工作应由中央委员会去做。

奥库洛夫^①：我想就条令问题说几句。当然，条例制定得不好。有许多地方应当删除。但是，这里对条令的批评，就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人们批评这些条令时所持的观点是，那里有太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在某些条令里，对一些形式的规定十分确切是完全必要的。请看看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记录摘要吧。那里列有对彼得格勒执行卫兵勤务的检查结果。通过检查发现，由于对可以让什么人接近钱箱，什么人不能，没有十分明确的条文规定，卫兵让完全无关的人看了他们本来没有权利看的東西。有一个外来的人，他是受

^① 奥库洛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880~1939），1903入党。1918年12月起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东西伯利亚部队司令。

彼得格勒苏维埃委托来看看士兵都懂些什么的，竟允许他乘那辆装甲车走了，那本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乘坐的。

我觉得，必须使条令具有完全明晰的表述方式，使每个士兵都能看懂。我认为，从这方面看，一定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是需要的。除了某些情形，例如卫兵队派班，一般说来，在军事技术范围内，条令的这个方面还是制定得相当仔细的。

同志们，关于军事专家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大家在这里谈得很多。如果谈到军事专家的工作，那么，我们抱着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应有的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必须说，军队中共产党员的工作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咱们就以某些工作人员参加战斗的情况为例吧。在这方面，空军为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提供了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我举几个数字。比如说，有这么一些数字：在高级首长中，有45%是共产党员，在支队首长中，有17%，在其余飞行员中，有11%。职务越高，共产党员越多。飞行小时：共产党员中，有25%从来没飞过，战斗小时不足10小时的占75%。现在说到旧军官：10小时以上的占61%。

有人喊道：他们往哪儿飞呀？

奥库洛夫：往哪儿飞，我知道，差点儿没把我用汽车拉到白卫军的军营里去。我想使谈话以郑重的数字作依据。请大家不吝指教。

如果我们从空军转向一般的军事工作，看看有没有组织得很好的干部，他们的工作情况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这种组建得不好的军队，确实在检查中会暴露出完全没有战斗力的问题。可以说出很多这样的部队，像莫斯科第2师、第6师、莫斯科工人师、第11步兵师、尼古拉耶夫师（林多夫^①同志在那

^① 林多夫，Г.Д.（1874～1919）第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月13日尼古拉耶夫第4步兵师发生骚乱时遇害。

里被杀害)。还有南方面军的很多师。从战斗训练的观点来检查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队这种享有特权的游击队的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如果你们看看对这支部队的检查结果，就会看到，仅仅由于对支队人员缺乏技术训练，士兵根本不知道每个士兵都应该知道的许多基本情况。不知道许多最起码的东西。同志们，我们的“自学”代价太高昂了！

故此，根据可以得到的关于军事部门工作的许多资料，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说，取消或者限制军队中的军事专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了判断所需要的军事专家数目多么巨大，我可以说，为了在各军区开展工作（我们新组建的军队工作所需未计算在内），我们需要 18000 名专家，而我们能够提供的，包括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我们认为合适的人，只有 8000 多一点儿。而且这还不算各方面军的要求，除了东方面军，不算任何方面军的要求，总之，你们看到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只能提供 44%。从前线回来的同志都知道，没有增援部队意味着什么，前线军队过度疲劳意味着什么。可是要知道，我们新组建的军队因为没有这些专家还真寸步难行呢。

我想强调指出，在很长时间内我们还不能不利用我们军队中军事专家的劳动，在很长时间内还不会有一定数量的在这方面受过教育的共产党员。因为，提供给我们的和现在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奔赴前线的人，是仅仅懂得几页军事书籍的人。把重要任务交给他们，这就意味着进行危险的试验。我看，这就是在我本人这里出现的与军事专家的作用问题有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戈洛晓金^①：首先应该索性把关于专家问题的一切不同意见和

^① 戈洛晓金，菲利浦·伊萨耶维奇（弗拉姆）（1876～1941），1903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乌拉尔州委书记、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委员等职。

来自官方的一切证据都搁在一边。因为，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专家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他们偏偏这样说，就表明，他们提出问题态度不够严肃。刚才奥库洛夫罗列的数字就表明了这一点。假如我也谈这个问题，我就会把我的10分钟浪费掉。那就会一无所获。

我们要讨论什么问题呢？是关于一般说来需要建设某种新军队的纯理论问题？是关于是否需要专家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必须解决，明天就付诸实施的实际问题？还是决定我们整个未来和现在的问题呢？正是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假如中央报告人是这样提出问题，他就会谈到各军区发生了什么事情，谈到各个战线发生了什么事情。假如代表大会听到这些情况，与会者就会毛骨悚然。我们做出了重大牺牲。为了胜利，为了建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我们党没有不肯做出的牺牲。仅仅这样提出问题。

如果说我反对罗森霍尔茨^①同志现在就讨论某些条款的建议，那么，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条款不应该讨论。它们应该讨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涉及到整个路线正确与否，涉及到改变整个军事体系。这个条令本身，它是那条路线的延续，在红军建设上缺乏任何创造性。

譬如我们来谈一个问题，谈谈指挥人员的问题。指挥人员起着重大作用。我们先从上层来谈谈指挥人员。指挥苏维埃共和国全部兵力的司令部。当我们从指挥个别的部队，从指挥个别的方面军，转而指挥俄罗斯共和国全部兵力，我们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迈进了一大步，但只是从形式上迈进了。

那么，实际上这一步是怎样迈进的呢？谁哪怕有少许前线上的实

^① 罗森霍尔茨，阿尔卡季·巴甫洛维奇（1889～1938），1905年入党。时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第8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践，他就会懂得，我们的指挥非常糟糕，或者说，根本没有。指挥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调度现有的兵力，并在每一个特定的时刻将兵力投向该时刻最需要的地方。表现在确定最重要的突击方向，并据此为其他战线提出明确的任务。有过这样的指挥吗？有过，一度有过，那时说，现在南方战线是主要战线，后来又说，好像是别的战线。但是，我们给其他战线的任务改变了吗？没有。不论情况如何，总是那同一封电报：进攻啊，进攻！对这个集团军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物质上的、物质上的力量，都完全不作考虑，只要进攻。

我想给你们讲讲一个集团军的故事，如果你们想听，就讲讲我所了解的三个集团军的故事。显然，总司令部根本没有研究透自己的军队，不了解自己的军队。假如你们知道，在5个月中牺牲了25000名乌拉尔革命无产者的第3集团军是一支什么军队，假如你们了解这条战线的情况，那就好了！你们不了解这条战线，就像托洛茨基同志对它不了解一样。我们会证明这一点的——中央委员托洛茨基不了解党的州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而外交人民委员不了解第3集团军。

有人喊道：说得对。

戈洛晓金：今天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谈到，东方面军因为没有利用好援军而遭受败绩时，他怎么能不了解呢！没什么可利用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我们始终因为没有预备队而吃尽苦头，我们吃尽苦头，是因为在第5集团军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有人还逼着它一个劲地进攻。你们没有正确的指挥，没有正确的组建工作，对战线情况一无所知。这一战线上的情况是这样。各个战线上的情况又怎么样？不多不少，正好一个半月以前，某一方面军的代表们说：再也不需要西伯利亚局^①了，因为我们正以凯游行方式走向西

^① 西伯利亚局是俄共（布）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成立于1918年12月。1920年4月起先后领导阿尔泰、叶尼塞斯克等省（州）的党组织。1924年撤消。

伯利亚。你们就是这样了解军队！

我们的指挥是办公室里的指挥，是在地图上运筹帷幄。有人在地图上做出气魄雄伟的迂回，却不知道需要用多少兵力才能完成这一壮举。关于州委员会曾做些什么，我们会在报刊上答复你们的，你们十分清楚这一点。

再有，说到政治工作，那么，各个司令部里的党的工作，抓的都是微不足道、鸡毛蒜皮、荒谬可笑的事。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反对专家，我们谈的是整个体系。我没能详谈组建工作问题，政治工作问题。我们有发号施令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最高军事检察院，有国防委员会。有在火车上发号施令的波德沃伊斯基^①。这些就是妨碍工作的症结所在。我要问同志们，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比如关于哪条战线至关紧要和怎样摆脱目前的困境的问题，你们哪怕开过一次负责人会议吗？哪怕是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你们尝试过运用国内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吗？没有，你们不曾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这样做，现在也没有在各集团军范围内这样做。在这里开全俄军区政治委员和军区领导人会议时，你们甚至也没有试图把身为党员的军区政治委员召集起来，解决如何摆脱目前困境的问题。这就是这一问题的现状。总之，同志们，我们必须运用已经打了一年国内战争的共产党员们的经验。

主席：有人告诉我，在这里参加会议的好像有的不是大会代表。

米柳亭^②：是这么回事，有过决议，小组可以邀请非本组成员参加会议。

^① 波德沃伊斯基，尼古拉·伊里奇（1880～1948），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俄军事组织局主席、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

^② 米柳亭，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1884～1937），十月革命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主席：有人建议我们的讨论禁止旁听。我们的会议是秘密会议。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们，我想指出能够说明军事部门缺点的一些事实。有人在这里谈了关于指挥人员的问题。我们的训练班是怎样的？训练班办了两个月。那里研究了苏沃洛夫、拿破仑怎样作战，瑞士有多少名军官，等等。当共产党员们提出抗议的时候，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竟向他们宣布：我逮捕你们。就完事大吉了。

现在，同志们，我要在这里指出，在各省、在地方上，是怎样发布指示的。没有一名代表明确地指示过应该怎样工作。让你不知道，应该相信哪路神灵。军事检查员们驾临地方，发号施令，他们说：因执行不力宣布逮捕。有这样的事，政治委员捕人。然后发出电报：确认排除任何嫌疑。怎么能这样工作呢！有多少共产党员丢了性命。大批人被枪决。还有来自各方面军的自荐的代表。有这样一件事：来了一名代表，把乡苏维埃委员都关了起来，把富农都武装起来。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把他打死了。于是有人发布命令：惩罚全县的人。并针对县执行委员会派出了讨伐队。我们问莫斯科。回答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么回事。东方面军司令部往地方上派过这种工作人员，他们干有害于苏维埃政权的事，瓦解红军。

主席：您讲的是我们机制的一般性缺点。

米雅斯尼科夫：我很清楚我在讲什么。新组建的部队开小差，因为三个月拿不到钱。以后方民兵为例。所有应召参加后方民兵的人，都作为专家给放过去了。本应征募 2000 人，只招募了 100 人。与逃兵行为作斗争的情况呢？有决定^①，有中央拍来的电报，可是革命法庭却打发他们回家。我们在这里谈过供应问题。我们辛比尔

^① 指国防委员会 1918 年 12 月 25 日和 1919 年 3 月 3 日通过的关于与逃兵行为作斗争的决定。

斯克省守备部队有3万人，红军战士两天才能领到一条鲑鱼。现在收到几封电报，说辛比尔斯克省暴动了^①。这是因为，我们的官僚主义瓦解了红军。

尤列涅夫：同志们，我个人认为，情绪越来越偏激了。我不知道，下一位同志最后会说出什么话来。大概会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我们共产主义工作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领域。共产党员同志们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说的是党的工作的缺点。不应该忘记，我们都是经过中央委员会任命的。但是，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应该承担军事部门职能的庞大机构。还必须有一些部门——必须如此，这是定而不可移的。需要具体地估计形势。

我从这一观点来谈谈指挥人员中的政治委员和倒霉的专家问题。同志们首先指出，没有规定政治委员的权利与义务。完全正确，没有规定。但是，同志们，假如你们哪怕多少严肃一些来看看我们的政治委员的人员构成，那是怎样一种情况……

有些人喊道：从上层开始说。（鼓掌）

尤列涅夫：……先说军区政治委员，一层层往下说。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彼此恭维，那么，同志们，大概我们会互相说一大堆令人肉麻的话。政治委员问题，是我们一个老大难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全党的一个悲剧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提供数万名政治委员，从哪儿去找哇？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应当培养。这是惟一明智的答案。但是我想，我们还做不了这件事。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些政治委员。不能给我们的政治委员太大的权利，这十分清楚。请看这个例子：从高加索方面军来了几位代表，他们说：随便给我们一些人吧。只好随便派一些人。但是我们看到，共产党员的党龄越来越短了。我这里有一些党员是1919年1月才入党的。我们就授

^① 指1919年3月初富农分子在萨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发动的反苏维埃叛乱。

予他们职务。这里的问题要比同志们感觉到的更为严重。

还有，关于指挥人员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米雅斯尼科夫同志想轻而易举地就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讲，自己人那里进行的那些战役结局如何。我们不知道那里有什么辉煌胜利。我们革命的悲剧就在于此：革命推开了知识分子阶层，排斥他们，根本没有给指挥部门输送多少杰出的人才。这一点应该承认。我们共产党的军界缺乏天才人物。如果我们指派政治委员们上前线担任指挥员，让军事指导员们担任顾问，那就更荒唐透顶了。莫斯科维亚这里可能有顾问，但要在战斗情况下。哪里需要迅速解决问题，哪里就应该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我们十分了解，我们缺少优秀指挥人员。关于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那个方法，我个人应该说，甚至在这里，在我们本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我们都被迫放弃委员会集体工作体制。因为我们懂得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会导致无尽无休的决议，反决议，条款，反条款。在指挥问题上，无疑应该实行集中制，应该实行一长制。因为没有比存在双重权力更致命的了。把是否进行某个战役的问题提付表决，那里大多数人可能凑巧站到军事问题上一窍不通的那伙人一边——这是苏维埃共和国里司空见惯的区区小事。

有人在这里谈过薪额问题。我只请你们注意，共产党员同志们，有人谈了首长和我们的政治委员的薪额问题。但是也应该谈谈红军战士和共产党员的薪额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关于在红军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薪额问题，谈得很少。这个问题本来是应该谈的。戈洛晓金同志在这里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地谈了中央的各式各样的缺点。我应该说，我不下任何反对性的结论。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一清二楚。在斯米尔诺夫同志说每时每刻都有越来越多的战线的时候，〔这点〕说得对。生活正是如此，我们需要连续作战。今天在这里，明天就要转移。

有人喊道：拆东墙补西墙。

尤列涅夫：完全正确，拆东墙补西墙。斯米尔诺夫同志，请您相信，这里问题并不在于人们失去了分寸感，失去了把军队派往需要的地方的能力。

现在再谈谈政治工作问题。我完全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并且将向代表大会全力呼吁，希望大会首先指示各级党组织加倍重视党的工作，希望新的中央委员会担负起组织这一党的工作的任务。我们之间在这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分歧。问题仅仅涉及到我谈过的那非常重要的几点。

关于条令我再说几句。你们看到了吧，同志们，条令是个可恶的东西。在我们拟定条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中有许多毛病。但是，在你们用共产主义精神彻底武装军队之前，条令又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将红军战士置于这样的环境中，使他懂得，他应该做什么。如果说我们有时走纪律处分这个极端，这可能也是出于万般无奈。有些同志谈到从军队里清除富农。问题不在这里，因为富农很少。我们军队的基本群众是中农。请找到通向他们心灵的途径吧。可能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将指明这些途径，那时，我们的红军将有保证不再发生某些地方700人失踪的事情。这些失踪的人到哪里去了，你们怎么想？我认为，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是你们在建设我们的党组织，是你们在建设军事机关，这个机关将对监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把自己的代表派往各个部门。但是，假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中央也就不成其为中央了。你们想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变成军事部门。那就直截了当地说，应该使中央委员会军事化。但是，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同志们将对这样做提出抗议。多一点儿共产党人的冷静，少一点儿狂热。狂热危害无穷，往往变成无聊的空谈。基本问题在于，需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任务上。

托尔马乔夫^①：今天，同志们，双方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在这里，在分组会上展开的越来越激烈的辩论中，就军事专家问题进行的辩论，采取了极其荒谬的形式。许多同志，其中包括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试图把事物说成，似乎双方中的一方——这里给了它个封号——是反对派，它提出从军队里取消军事专家的方案。

有人喊道：从指挥部里。

托尔马乔夫：完全正确。这一点，这个反对派的报告人至今没有说过，这一点，这个反对派的任何一位代表在这里的分组会上也没有说过。其他同志，像米雅斯尼科夫同志试图给军队中专家的工作做个评价一样，都谈到了，他们曾经肯定，现在专家在军队里干得更好了，更负责了，更认真了，更有活力了。他曾试图举例说明这一点。我想，这位同志的这部分论据未必能在这里找到许多支持者。

我根据自己在红军中，在第3〔集团军〕中工作的经验，可以举出几个数字。特别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曾断言，军官中大约有10个英雄就有10个叛徒。在离开我们集团军来这里的时候，我请人给我提供一些数字材料，为的是提出指挥人员中的军官问题有适当的根据。结果，集团军各革命法庭及其反间谍机关提供了一份厚厚的正式清册，上面列出2月和1月这两个月发生的投敌、叛变等等事件。这份清册记载得还不齐全，但大致说明了下列情况：两个月来，在这个有500名军官的集团军里，这500~600名军官——这里有名单——发生了100起叛变事件。这100起当中，有50起投敌事件，均已经过核查，登记在案。这50起事件已由革命法庭

^① 托尔马乔夫，尼古拉·古里耶维奇（1895~1919），1913年入党。第3集团军总政委。

审理完毕。还有数十起也由革命法庭审理。这是大约两个月内的事情。就是说，每个月50起。这意味着每个月10%的军官出事。数字相当可观。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断言，军队中军官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些数字惊人，人们还是说，应该用这种以及更高昂的代价购买军官。但是，专家问题，需要像列宁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论述的那样^①，完全正确地提出。当列宁同志谈到利用各种各样的专家时，他把这个问题归结到创造这样一种环境，使这些专家真正为我们所用，使他们尽管心怀敌意，但最大限度地化害为利。

关于这种环境，现在能说些什么呢？这种环境，首先不应当像截至目前那样去创造。这是一种符合党的精神的环境。谁到过军队，谁就会十分清楚，只通过派来的政治委员，不依靠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和党组织，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监督。这只是口头上的监督，正如斯米尔加同志在谈到政治委员问题时所写的那样。现实的情况妨碍人们看透人头脑和内心的隐秘，因为给所有专家派来的政治委员，就是为了监视他们，那么，一切不轨的念头、一切反革命意图必须瞒着政治委员。所以，当谈起利用专家时，首先就应该谈到军队中党的工作和党的监督。

尤列涅夫同志说，我们提出的问题，据他看，可以归结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军事化。这纯属牵强附会。我们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使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不是以命令的方式进行，而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对这一工作加以调节。所说的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调节和指导。这样做了吗？没有。各集团军政治部门与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颁发的惟一工作细则，是关于党支部权利与义务的细则。有些集团军多少个月都不知道，尤列涅夫同志领导的机关是负责领导军

^① 指列宁1919年3月18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19~136页）。

队整个政治工作的机关。开过一些方面军代表大会，可是他们作了些什么决议，我们不知道。从我在军队中工作以来，我们始终根本没有接到过一项指示，一条指令。我们的草案是建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说的是给每个军事委员会一名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工作人员。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够做到这点。我们现在大约有 30 个集团军，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再多。给 30 个人是可以的。我们坚持让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我们建议按照使两个系统协调一致的原则来搞好党的军队工作。一方面，是由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从上面任命的党的代理人系统。另一方面，通过利用党的基层经验，通过重视和利用在军队中工作的那些党员同志。

阿布拉莫夫：请允许我指出一种十分奇怪的情况。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听取了报告人的发言，然后听取了副报告人的发言。由于有足够数目的签名，提出了让副报告人发言的建议。我凭良心要问，同志们在报告人和副报告人提出的提纲中，发现了什么原则性的区别吗？在这里，讨论关于转到实际问题上去，或者就一般问题的发言，谈了很多。大多数人发言虽然也主张讨论原则问题。我已经听了 12 个人发言，到现在我也没看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区别何在。虽然都在这里竭力证明，需要对路线作某种修改，但是怎样修改，就难以捉摸了。

我只明白了一个从本质上区别一个组织立场的问题，这就是指挥问题。基本点是，我们的全部任务归结为如何掌握农民群众，如何建立军队中的指挥，使这些农民群众掌握在我们手中。无论报告人，还是副报告人，都同样地提出一个问题。只是副报告人说，我们该从一长指挥转向集体指挥了。不错，他附带声明，这并非十全十美，这只是临时措施，但无论如何目前必须这样做。对此我应该说，斯米尔诺夫同志在他的提纲里，比在他的发言里谨慎得多。在

发言里他索性谈到集体指挥，于是我明白了，团由团长和团政治委员指挥，然而在提纲里说，问题涉及到军事委员会，应由全体委员负责指挥。这个问题在总政策中无足轻重，由于这个问题而安排副报告就没有任何理由了。

同志们，这里全部的发言都确认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其中一部分是捕风捉影，一部分实有其事。我想，既然谈的是军事政策的某些缺点，从总体上说，谁也不否定利用军事专家这个方法，利用军事专家的必要性，那么，我们就需要提出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我应该说，有许多缺点纯属捕风捉影。同志们，你们看看这份提纲本身吧。这里向代表大会提议做出决议，由各军事组织系统总结红军建设经验，总结通过在报刊上讨论的方式进行。请问，同志们，难道我们的报刊不登军事讨论方面的文章吗？

有人喊道：不登。

阿布拉莫夫：不，这完全不对。如果你们有某种切实可行的建议……

有人喊道：我的文章被波德沃伊斯基扣住了。

有人喊道：没错，对卡缅斯基的文章提出了警告^①。

阿布拉莫夫：……因为事例不符合实际。在这份提纲里谈的是：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工作人员。可是现在情况怎么样？不仅任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而且通过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任命拉舍维奇^②为第3集团

① 原南方面军和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A.3.卡缅斯基1918年12月2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对党的军事政策作了不正确的阐述。文章发表的当天托洛茨基致信俄共（布）中央，俄共（布）中央当天就做出决定，批评了卡缅斯基的观点。

② 拉舍维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84~1928），1901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副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

军司令。不错，可能正像列宁同志说的，这差不多是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个人做出的决定^①。但不过是在其余的中央委员相信此事并认为他们的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做的。那么，同志们，我要说，问题在于某些具体的缺点，对它们必须按照某种系统的方式加以讨论。我认为，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一般性辩论漫无目的，毫无意义。

主席：阿布拉莫夫同志在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发言机会之后，提出了不再给任何人发言机会的建议。

斯米尔诺夫：我要对阿布拉莫夫同志的建议表示坚决反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详加讨论。

卡尔波夫^②：我觉得，全部辩论主要可以归结到前线和后方党组织的相互关系上。我们不应该忘记今天稍有触及的主要问题，即培养指挥人员的问题。遗憾的是，甚至在提纲里，它也被忽略了。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一年，应该揭露我们至今没能消灭的缺点。出席这次会议的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知道，五六个月之前，在莫斯科这里，在指挥员训练班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委员、各个集体及其相互关系，做出了一系列决议。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党团中做出的那些决议。我们划分出党团，做出了一系列决议。遗憾的是，军事训练部门至今没有执行这些决议，始终竭力加以回避。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和其他与会者知道，我们在那里审议过条令草案，他们也知道，大家对草案持什么态度。其实，这里就有12月5日给军事训练部门的命令。第3条尤其有代表性。（宣读）“指挥人员要求准确履行条令各项条款，以具备适当的风度

^① 指列宁1919年3月18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69~74页。

^② 卡尔波夫，Н.И.（1894~?），1915年入党。时任彼得格勒军区指挥员训练班政治部主任。

和应有的军人仪表。”这意味着什么？这一条说明了尼古拉二世时代旧条令的复活。这是那些为尼古拉二世效劳的专家们拟定的。没有从党的角度对这个条令作任何修改。这个草案需要仔细推敲。在我们训练班上我说：不管他们怎么做，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什么风度。我向军区政治委员正式声明了这一点。军区政治委员用电报告知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泽维亚尔托夫斯基作了微小的让步。

应该彻底改变的地方，正是教学方法。遗憾的是，在军事院校总管理局里掌大权的还是那些使用老方法的老教官。他们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这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里不是在造就新型指挥员，而是使旧士官学校复活。在我们党内一切缺点都应该公开。以彼得格勒骑兵训练班为例。我无法认出自己的党员同志了。他们的马刺喀喀作响，都在做肩章梦。只要他们能通过三人领导小组这几关之后，幸运就降临到他们身上了。这就是那里的情况。甚至在我们的同志中间风气也坏透了。连党的集体也不能与这个或者那个专家发出的各种命令抗衡。

最近形成了明显的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军事院校总管理局根本不去调整工作。政治教育处主任完全得不到莫斯科的任何指示，任何指令。为培养红色指挥员，派来了三四个前才入党的一些预备党员。我们在集体的核心小组分析了这个问题，做出了表示异议的决议，把它寄给了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和彼得格勒委员会^①。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如果派党的工作人员，就需要派负责人员，并像要求每一位党的活动家那样要求他们。必须把指挥员训练班办好，使它能真正培养红色指挥员。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指望，我们能得到可以依靠的人。在我们没有自己的红色指挥员之前，不管我们怎样动员旧军官，我们的前景都不会乐观。缺乏这些红色指挥员，

^① 指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

会严重影响整个红军的建设。

有人喊道：我建议停止所有这些辩论，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应当〕提出具体建议。（建议未被采纳）

穆林^①：同志们，红军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正是因为在这红军这个战斗组织中，最鲜明地反映了我们苏维埃政权实行专政第二年暴露的普遍性缺点。这是通病，同志们，所以，这里进行的辩论，尽管言辞激切，尽管可能有些同志没提出具体明确的解决方法，这场辩论无论如何不能停止。在过去历次代表大会上，在所有工作会议上，在我们一切工作中，我们总是把所有老大难问题推到我们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这次代表大会将最终消除这所有争执，消除妨碍我们工作的这所有阴暗面，并且给红军建设工作带来健康气息。所以，我对一些同志流露出的激昂情绪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希望所有对前线工作了如指掌的同志，都无条件地得到发言的权利。

我作为政治部主任、作为拥有 4000 名共产党员的师团的指挥官，曾在前线的一个地段上长期工作。因此我认为，我有充分权利代表那些与军队息息相关的同志发言。我们来看看最近在我们中央机关扎下根来的那种政策。这是一种病态的政策，它使我们的红军分崩离析，如果这种政策还要长期维持下去，就会使我们费了八九个月的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那支军队，变成一支被别人随心所欲牵着鼻子走的机械力量。

在这里分析的问题，以及同志们为之情绪激昂的问题，诸如专家问题，这些问题现实本身已经解决了。没有专家前方就无法作战。所有在前线上工作的同志都懂得这一点。所以，对人所共知的事情用不着多费唇舌。卡尔波夫同志代表培养指挥人员的训练班发

^① 穆林，B.M.（1885~？），1906 年入党。时任第 29 步兵师政委。

言时说，我们没有教官。条令制定得不像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制定条令的笔杆子。这是我们的一块病，没有专家我们就没法工作。这是一个没法回避的难题。但是，我们应该把他们放在使〔他们〕无法为害的环境里。所以，那种观点，坚持那种观点的有斯米尔加同志和其他原来不搞军事的同志，请原谅，我表达得不够恰当……

有人喊道：原来做文职工作的同志。

穆林：……原来做文职工作的同志，他们现在更热衷于军事了。这些同志在走另一个极端。现在说政治委员制度过时了，这就意味着给敌人帮大忙。这是十分明显的事，现在军队里决定权属于政治委员，将来也属于政治委员。我认为，如果是一名有经验的政治委员，他永远能够使指挥人员服从他，使指挥人员好好工作。

但是，同志们，红军建设中实行的政策，最近从根本上渐渐带有一种特殊的军事性质，带有那样一种军事色彩，它把联系我们红军和共产党员的一切纽带彻底斩断。刚才谈论的条令，就是支配了我们红军的那种军事精神的小小表现。在各个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都知道，在基层曾负有政治监督使命的我们那些党组织，也往往不能胜任。我们长期以来在所有决议和指示里如此大谈特谈的党的监督，必须提到应有的高度。党组织看到某个集团军里发生的不成体统的现象，应该采取措施来消灭它们，上报中央委员会，并通过某种途径尽到自己这一责任。我工作的那个集团军没有这样做。那些党内同志，他们深深陷入军事之中，他们代表的正是我们追求的那个理想，目的是拥有我们自己的指挥员。等这些人成了指挥部长官时，这些共产党员给我们的军队带来了一种风气，使政治部门叫苦不迭。

有人喊道：对。

穆林：这些政治部门说，他们没来时，日子比较好过。只是

最近，共产党员们开始发表意见了，开始说：我们的优秀同志历经艰辛流血牺牲建设的红军，应该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需要发生多次巨大的震荡，在整个前方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牺牲性命，才能迫使党的高级机关最终注意到我们的前方发生的不成体统的现象，并采取某种措施。不言而喻，红军与我们苏维埃机关血肉相连，我们应该使整个俄罗斯的整个苏维埃政策路线健全起来，从而使红军开始健全。我们应该拿出决定性的意见，因为关键性的决定是应该由党的最高机关做出的。只有作为我们党的最高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应该领导我们军队的全部政治工作，全部监督工作。

主席：有人提出停止辩论的建议。

米宁^①：登记发言的有许多同志，有有着丰富经验的乌克兰代表。已经发言的有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代表。另一方面，也应该倾听对立面——官方政策代表的意见。只能提出一种希望，希望同志们做出具体结论，但是停止辩论是不行的。在这里谈到了出版自由。这是我的提纲，我想发表，可是没能发表。为什么没能发表？因为有一条明确的官方路线禁止发表。因此，我坚决反对停止辩论。

波泽尔恩^②：我认为可以停止辩论。我同意已经积怨太深的这种看法。但是，你们承认吧，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可不是让我们来诉苦的地方。我们首先应该有可能初步拟定现实的行动纲领。这才是我们这里的目的。我认为需要节约时间。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些具体建议告终，而是以具体建议开始，我们也完全能够取得那些成

① 米宁，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1882～1962），1905年入党。191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南方面军和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波泽尔恩，波里斯·巴甫洛维奇（1882～1939），1902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曾任西方面军、东方面军和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果。我们有9条或者10条^①。每个同志都能发言并且说出他应该说的话。但是，这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就不会无尽无休地推迟我们结束工作的时间。现在我可以肯定，同志们在同一个问题上发10次言。我们不能这样工作。所以我建议，提出一定的题目，大家就这一个题目发言。

主席：请尽量说具体点。

米宁：同志们，我有机会在几个军事组织担任半年领导，就在这一点上，与波泽尔恩一样，红军产生的全部过程都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于是我发现了这样一条线索。最初，占优势的是手工业方式，一些人的英雄主义伴随着部分群众的强盗行为，某些英雄部队表现出色伴随着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组织状态。我们逐步走向更高的形式——成长为现代化正规军。现在任何人都绝对不会维护旧秩序。我们需要正规军，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不需要任何军队的时刻。在我们迈进组织正规军的时期后，我们彻底放开了手脚，甩掉了第一个时期坠在我们腿上的那些机械的小资产阶级残余。后来，我们开始吸收白卫分子入伍。而现在这里对反对派的批评批得不对头。我们甚至被称作来自丘赫洛马的共产党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曾怀疑，人们那样说是因为怕丢掉美差。这话说的完全不是地方。谁也不维护手工业方式。谁也没说反对利用专家。问题是，怎么利用专家。

察里津声威大震，正是因为这里不曾有过专家。那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些专家，是工程师。组建工作是专家们进行的。在我们确信可以委任专家担任负责人员的时候，我们就委任了，而在确信不行时，就不委任。但并不总是可以委任他们。有人举过这样一些事，例如：一位军区首长公开挂出了军事地图。

^① 指索柯里尼柯夫的提纲。

另一位作战部首长被军事检察院逮捕了。利用他们了，可这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我们反对为诺索维奇^①提供重要职务，结果又怎样呢？诺索维奇投敌了，就是说，两三个师全完了。梅霍诺申^②同志带着瑟京^③、舍斯塔克来找我们。我们对这伙人都不信任，并且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梅霍诺申。后来的结果是，舍斯塔克在科兹洛夫被枪毙了。与此同时，还有这样一些〔关于〕共产党员的事例，这些党员是我眼看着长大参加工作的。他们是天生有才的人，他们在供应方面、在作战指挥方面做了许多事情。来了一位陆海军人民委员，他对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鲁希莫维奇^④、阿尔乔姆^⑤等人说：反正你们守不住这个城市。托洛茨基来了，不问任何人情况如何，就说：这是见识肤浅。他对我 and 伏罗希洛夫说：我把你们押到莫斯科去。这根本不是共产党人的态度。

这里谈到，我们没有出色的指挥员。为什么没有？因为白卫分子压制他们。他们甚至连提升低级职务也很不容易。问题不在于去臆造这些人才，而在于正确地使用他们。党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拒绝任命，他说：我不能主持整个供应工作。可还是任命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摧残无产阶级红军的健康萌芽，那就非常不好。有人对我们说，总参谋部军官中英雄辈出。这好极了，我们对此表示欢

-
- ① 诺索维奇，A.Л.，前沙皇军队上校，1918年5月起任北高加索军区参谋长。
 - ② 梅霍诺申，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1889～1938），十月革命后历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 ③ 瑟京，帕维尔·巴甫洛维奇（1870～1938），沙俄将军，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曾任南方面军司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行政部部长等职。
 - ④ 鲁希莫维奇，莫伊塞·李沃维奇（1889～1938），1913年入党。曾任国营顿涅茨煤炭工业托拉斯经理、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等职。
 - ⑤ 阿尔乔姆（谢尔盖耶夫，费多尔·安德列耶维奇）（1883～1921），1901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

迎，需要吸收这些英雄。涌现了这样一些英雄，太好了！但是，我们那里也有过这类英雄。然而，当你们以反对支队建制为借口放走一大帮白卫分子的时候，情形就十分可悲了。难道这不是嘲弄人吗？我们在《消息报》上读到：列别杰夫^①得了赏金。赏了这位列别杰夫 2000 卢布。

我还要说这么一件事。奥库洛夫正在这里出席会议。有一份有趣的文件。文件里说，寄上我从商店买来的线和布条，供缝制各级军衔的识别标志样品用。这就是那些识别标志（出示军官的带穗肩章）。

有人喊道：可耻！

奥库洛夫：这是有人挑拨离间，可您却在这里念这东西。这是挑拨离间。

米宁：有签字：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库洛夫。

奥库洛夫：这是挑拨离间。

米宁：这是一份文件。就是我们部队的指挥员抗议书那种文件。现在请看。现在请看，还有另一份文件。专项调查。“铁师”全师投降，原来，大部分指挥人员是从下诺夫哥罗德监狱整个端过来的。我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守住了察里津，事情干得很漂亮。我不会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怎样要求精美的食粮，但是他们实行了军事书报检查。你们看这份报，报上一个著名的“反革命分子”弗·伊·列宁的信《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受到了检查。请看伊里奇信里的空白^②。（全场议论，喧哗）

① 列别杰夫，П.П.（1872～1933），旧军队少将。自愿参加红军。1918年5月起任全俄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

② 指1919年3月6日《斗争报》第53号转载列宁《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一文这件事。由于地方书报检查机关的干预，发表该文时，列宁有关苏维埃俄国经济状况困难和饥荒的论述被删去。

奥库洛夫：请允许我发言。我不会耽搁你们很长时间的。

有人喊道：第二次了。（喧哗）

奥库洛夫：关于个人问题。（喧哗）

有人喊道：关于个人问题快散会的时候再谈。

捷姆利亚奇卡：首先我想指出，我们今天的会，这个军事小组会议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缩小的党的代表大会。因此，提出停止辩论的建议是完全多余的。同志们，我肯定地说，我们有大量的情况需要在这里彼此交流，因为代表大会是惟一能够给我们某种实际帮助的一级会议。同志们，我来到这里之后，去过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政治委员局。除了全俄政治委员局听取了 my 意见，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做点儿实事，在其他地方对我连听也不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没空儿听我说话。因此我认为，在军事小组会议这里，我们需要讲话，把一肚子话都讲出来。

我想请同志们注意两种情况。我认为，对待那些委派的指挥人员和钟情于指挥人员的人的态度，同志们，这不能像对待专家和所谓反对派的态度。在委派这些指挥人员的情况中有某种区别。当我们谈到我们所需要的专家时（因为工人和农民不具备担任专家的素质），当我们承认这些专家时，同志们，我肯定地说，有某种力量驱使这些专家去伤害那些也被指派担任这些职务的共产党员。我肯定这一点，是因为那些共产党员，那些和我们一起工作了数十年的、也是专家的同志们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而总参谋部的军官们，非党专家们——我要直截了当地谈这一点——却被安插在共产党员也能出色地胜任的位置上。我知道一个不幸成为共产党员的总参谋部军官的事例。托洛茨基恍然大悟，说：他不幸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守纪律的党员同志。

与专家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会议的所谓官方部分在这里谈到的，都是他们那里对共产党员的恶

劣态度。无论尤列涅夫同志，奥库洛夫同志，还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共产党员毫无用处。首先，正如一位同志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你们不知道军队的情况，你们甚至不知道共产党支部的情况。当奥库洛夫同志举出他那个关于空军的出色的例子时，他忘记了，空军为我们提供的那些工作人员，到现在也没有和我们一起。如果说我们的工人还没有学会飞行，如果说在空军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很少，那么，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应该把这些飞行员作为专家招募过来，但是应该将他们置于监督之下。而为了使共产党员学会飞行，学校应该首先招收共产党员。

关于共产党支部想搞分立主义，在这里谈得很多。这是谎言，同志们，我们各个集团军里连分立主义的影子也没有，集团军的共产党支部根本不搞这一套。共产党支部是团结部队的核心。但是，你们，同志们，却不承认它是核心，你们认为你们的总参谋部军官才是核心。在谈到共产党员的时候，谈的内容不应该是，让这些共产党员今天就变成专家吧，专家是需要的。依我看，谈论学校的那位同志，在这里为学校该是个什么样子，学校里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优秀人材，十分出色地勾出了一幅图画。

当大家在这里谈到条令的时候，可以想到，我们是在谈论我们正在建立的组织的条令。有人在这里提到，条令是小事一段。不，同志们，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斯米尔诺夫同志今天在全体会议上谈到军事监狱的条令，谈到有的人，你们本来对他们不应该信任，他们却受到充分信任，享受种种特权。这些人，甚至是犯罪分子，他们的状况却比共产党员还优越。我认为，既然我们确实从自己人中间培养专家，我们就要像党应该做的那样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员。因此，当尤列涅夫同志说，他任命过一些水平不高的政治委员，因为高水平的没有，这时我要说，差劲儿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任命。我不禁要问：优秀共产党员都上哪儿去了？中央委员会找

不到优秀党员，这是不可能的事。

尤列涅夫：没有优秀党员。

捷姆利亚奇卡：我在这里就这些政治委员问题举出了几百个实例，尤列涅夫同志知道这件事。他甚至还告诉我，我让他厌烦了。有人给我们派来了一些犯罪分子。我一直坚持，不要给我们派这样的政治委员，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影响很坏。我认为，只有中央委员会才应该分配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下设一个组织部。我们并不是让中央委员会干预具体工作，给各个部门分配工作人员。我们只是建议给军事部门分配，因为我们懂得，这个部门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有人喊道：那么粮食呢，运输呢？

捷姆利亚奇卡：我只是想简单地这么说个意思。如果我们到处都讲，共产党员毫无用处，我们永远也不能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这些政治委员来。我认为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明确地指出：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人和农民，也就不能正确地对待共产党员。（热烈鼓掌）我们代表大会的所谓官方部分的政策就是如此。

尤列涅夫：这里没有什么所谓官方部分。

主席：请不要打断发言。

尤列涅夫：有人说谎的时候，不能沉默。

伏罗希洛夫：同志们，我只想说一说本应在全体会议上说的话和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可以说的话（现在这个机会是，我曾经担任过指挥员的那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在场）。我想举出一些事例，来形象地说明捷姆利亚奇卡同志所谈的思想，即共产党员正因为是共产党员而受到猜疑。我们本来是可以立刻就解决这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的。但条件是能够立刻抛弃我们军事部门官方领导人头脑中形成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对共产党员这种人，应该通过军事专家、白卫分子特别进行监督，加以检查。

我应该指出，我曾经指挥过第10集团军。米宁同志和斯大林^①同志最初都是这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对其发号施令的那个集团军是怎么建立的，它情况如何，从哪里得到供应，怎么补充兵员。他们一无所知。我们自己应该为自己建立一个特别省。在这个省里进行动员，因为无处可以得到补充。如果说这里用两年进行动员，我们进行动员要用22年。顿河哥萨克从四面八方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只得采取断然措施，在组建军队的同时进行异常艰巨的战斗。依靠现有的条件，仗着我们的集团军及其骨干也是由乌克兰被占领期间杀出来的部队组成的，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建立了一个集团军，我们曾经自己设法做到自给自足。我们惟一努力争取到的，是由于斯大林同志的帮助得到了一些钱。而现在到了我们再也无力抵挡白卫军猛攻的时候了。于是人们开始注意到我们。这是我们集团军全部工作中最艰难的时期。于是我们感觉到了我们所有人因此而吃尽苦头，但大家都在关心着这整个的队伍。上面专门派了两个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一起来检查集团军的工作。奥库洛夫同志来了，梅日劳克^②同志也来了。因为梅日劳克是另一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立刻就明白了，这里是没有什么人好检查的，各方面都很圆满，只是需要向集团军供应补给，只是需要作为任何一个集团军应该做的事情。

于是奥库洛夫同志开始工作了。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奥库洛夫同志在这里证实了，他一次也不曾与我在作战问题上发生过分

① 斯大林 1918 年 7~8 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1918 年 9~10 月任南方面军（不是第 10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梅日劳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1893~1938），1917 年入党。1918 年 9 月起任第 3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 月起任第 10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 年 1 月起任乌克兰副陆军人民委员。

歧。他发现，各方面都很圆满。当我们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我们却无所作为。这是因为我们不能供应集团军必需品、不可须臾缺少的必需品，我们没有这些东西，虽然我们预先申请过。只是等托洛茨基同志来到，开始高喊：“尽快把全部必需品送来！”这才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但不幸的是，奥库洛夫同志到我们这里之前，已经接到指示，他应该让这里的一切彻底变样，因为这里不买总参谋部军官的账。于是遣散时期开始了。遣散一个又一个。奥库洛夫同志与我反目成仇。因为什么？开始给我们派来一些小毛孩子，毫无用处的政治委员。于是他们往这个本来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直由我们的军官指挥的集团军委派了这样一些共产党员。造成了荒谬可笑的局面，出现了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们和指挥员们搞不到一起。指挥员们要求彼此之间有个明确的关系。就因为这事，我和奥库洛夫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结果我从那里被召回了。

有位同志在这里说，他们那里有 200 人投敌，每月 10%，我们那里，在我指挥的那个集团军里，在同一个时期，一起投敌事件也没有发生过。如果你们愿听，我可以有凭有据地证明，在那个时期我们参加了多少次战斗。在我担任指挥工作的时期，我们那里光是残废了的就有 6 万人。你们可以想像一下，战斗激烈到什么程度。虽然指挥人员不是总参谋部军官，不是专家。也有专家，不过不是往白卫军方面叛逃的那号专家。而现在，同志们，情况又怎么样呢？〔有人指责我们说，〕这支集团军里过去没有做好政治工作！我们都懂得政治工作至关重要，但是，没有人才、物力，我们没能〔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此外，这是惟一一支接近于我们的理想的集团军。我们有一批可以对其绝对信任的指挥人员。阿布拉莫夫同志到过这里。他不能否认，挽救察里津战线局势的正是那支由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共产党员指挥下的骑兵

部队。

奥库洛夫：是杜缅科^①，一个哈萨克军官指挥的。

伏罗希洛夫：他连军官都不是，是个军士。即使他是个哈萨克军官，也是个不需要政治委员的军官，是个可以信任的军官。而现在，却不是为这个集团军创造一种环境，使它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成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军队的建军范例、我们阶级战争中的先锋队。反而正在采取如下手段消灭这支集团军：一个接一个地撤换那些不同意官方观点的人。把这支集团军放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让它最终土崩瓦解。这个集团军正在走下坡路，我们的一切都会走下坡路，除非我们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结束已经形成的那种局面。我们甚至没有机会议论像军事政策这样的重大事情。我们有独断专行的指挥，独断专行的决定，在这些独断专行的人物周围麇集着敌视我们的白卫军官阶层。白卫军官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同志们头脑发昏，将其同化为一路货色。这一同化的后果正在表现出来。

列文^②：同志们，我们认为，我们的军事政策和军事状况是不正常的。显而易见，我们需要专家。这一点我不准备再谈。我要谈谈政治委员问题和整个政治鼓动问题。我们把我们的红军发展到300万人。我们看到，共产党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要在这支红军中进行鼓动，我们的高级军事机关在这方面是如何工作的呢？

一方面，红军的政治方面应该由全俄政治委员局任命的政治委员们负责；但是另一方面，全俄政治委员局下面还没有一个鼓动部。到现在为止，我们从这些组织得到的只是分成两部分的一张

^① 杜缅科，波里斯·莫克耶维奇（1888～1920），1919年入党。1919年9月起任东南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混成骑兵军军长。

^② 列文，P.Я.（1898～1937），1915年入党。时任察里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画。一边画的是一名红军士兵，另一边画的是一名沙皇军队的老兵。区别只是，沙皇军队的士兵在军官面前站着，我们的官兵二人并肩坐着说话。好久以来，这就是惟一的鼓动。突然不知从哪儿又跑来一个卫戍条令：全队立正！向右看齐！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这只是个草案，他说得根本不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条令发出去，检查组就来了。张口就问，条令贯彻了吗？检查组由一位老将军和一位上校组成。卫戍委员会和团里的各个支部都找我。我对他们说，党代表大会上会废除的。

下面我想说说，政治委员在我们那里起什么作用。有一位同志说得非常对，有些政治委员被控制在专家手里，对红军来说失去了意义。是的，我们都知道，政治委员的作用应该像钟摆。他应该站在指挥员和红军战士之间，不偏向这面，也不偏向那面。可实际情形又怎么样呢？军事专家，他们彼此之间很亲热，他们抱成一团儿。可是，军区政治委员把自己的下级看成一种奴隶和仆从。尤列涅夫同志说，只好任命差劲的政治委员。前线的同志们提出惟一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这条出路恰恰能够补偿所有遭到破坏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地方上经常来一些政治委员，他们不拿地方党委员会当回事，不拿地方苏维埃当回事。惟一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就是，以后由党的省委员会任命政治委员。那时候就不会再有这些无谓的争吵了。政治委员经常说：我有我自己的上级，党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我们不应该忘记，政治委员应该在党的管辖之下。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科兹洛夫的同志们还要说的——南方面军司令部不承认科兹洛夫委员会，竟枪杀共产党员。所以我建议，在中央委员会下设一个特别军事局。就让那些委员参加，不过，得让他们受中央委员会监督。那时候，至今妨碍我们工作的那些缺点就都能消灭了。

鲁希莫维奇：我认为，军队的阶级选择，假如这是能够做到

的，它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在我们的革命开始吸收中农和小农阶层之后，阶级选择不见了。从这时起，我们的军队不再具有纯阶级性质。这是十分自然的。在军队里谁能够是天然的支柱呢？这一支柱将是支部，主要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至于区分富农和中农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富农的人数微不足道，所以这没有多大意义。只要党的工作做得好，也许，就可以使危害活动不起作用。如果说列宁同志和许多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在中央能够标出^①小商品生产者和较大的商品生产者，那么，这在地方上就不那么容易。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将农民置于这样的环境中，使之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立场上。这个任务极其复杂，然而非完成不可。

问题在于，军队中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在军队中应该开展明确的党的工作，以扩大那个可能会破裂的薄弱的党员层。另一方面是，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它有害百姓，引起某种反抗，它便无法战斗。这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一方面，它是内部教育手段，而另一方面，它是对中农的教育工作。

我想指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又一个方面。必须采取措施改造那些由农民组成的不符合党的要求的支部。这些支部只会使群众蜕化。应该将这项工作转交政治部门，而且每个政治部门都应该承担一定的重要责任。

波泽尔恩：根本问题是党的工作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里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列宁同志对我们说过，需要利用专家，但是，也需要利用共产党员。我觉得，副报告人斯米尔诺夫提纲中包含的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区分”。

这几项，应该采纳。需要提出这样组织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的问题，这一工作会产生最丰硕的成果。我们应该合理地分配工作人员，直至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当然年轻的党员不应担负责任过于重大的工作。我认为，此事往后不必再提。

是的，对此事负有使命的那些组织的工作进行得不够富有成效。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尤列涅夫同志提供的大多是不中用的工作人员。这种情形发生在北部州，而且不只是在北部州。关于这一点已经谈得够多了，而中央机关的必要性谁都不否认。尤列涅夫同志没有否认需要改进党组织的活动这一点，但是，在与中央委员会关系密切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党的机关中，团结一致应该是无条件的。这在技术上如何安排，并不重要。

我想请大家注意另一个方面，对此人们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我们所有的党的支部与地方组织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党组织经常宣称：我们自己的工作太多了，因此造成了军事政治机关的孤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

下面我要谈谈军事专家这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谈谈指挥人员与红军战士的关系。在所有这些辩论中，给我留下鲜明而清晰的印象的是下面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它是由于一系列矛盾造成的。我们有一支红军。我们试图通过政治工作将它提到某种高度，但是我们又不能把他们都发展成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外部团结、强制团结的措施。

同志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大有作为呢？这件事需要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在指挥人员中的个别人和红军战士大众的领导人之间，必须有某种区别，这里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根据自己亲身经验看到这一点。过去，我们营房里有一些彼得堡工人，他们许多人见我面都认识，我走进营房的时候，他们都向我敬礼表示欢迎。现在我进去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

识我，红军战士同志们照旧躺着，两脚该怎么着怎么着，翘得老高。同志们，我可以对你们肯定地说，这是农民。既然他们看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走过去，政治委员走过去，既然他们看见可以躺着，两脚高高翘起，那么，在此之后，过了20分钟同一位政治委员要求执行某一项命令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既然可以翘脚，管他什么命令呢！这绝对是事实。这里要找出个界限来。我们必须在这些部队里采取某些措施。如果有农民群众，人数达数万之多，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动用这个强制团结、强制教育的机制。

我不能说，这里宣读过的那些条款有用。这些特权完全不对，这个条令许多地方应该彻底修改。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不会不肯承认必须作很多修改。但是这里，同志们，有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在我们使人们具有自觉性之前，我们必须使用那些方法——我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使用旧时代用过的那些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是数百年的经验，是若干代人严格治军的经验。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清除一切无用的东西，同时进行广泛的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进行这一工作，只抓严格治军，只抓种种条令，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说起党的工作和我们军队的总的状况，我应该谈谈下面这件事。有人对我们提到中央，说中央毫无用处。我承认，我对这点全然不懂。也许，斯米尔诺夫同志说得对，但是我应该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与政治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世界上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总指挥部都不是这样。当然，同志们，在我们需要将我们的部队迅速调往顿河、明斯克和天晓得什么地方的时刻，很难向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军。而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我们就会遭受极其巨大的损失。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出一些最高限度的任务。你们都会有同感吧，我们在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出的任务，我们不可能现在就立即完成。如果我们把我们预定的计划哪怕完成一半，那就

了不起。你们预定少一点，你们就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是的，同志们，我们需要前进，无论如何也要夺回基辅。否则就十分不妙。最好纳尔瓦能投降。同志们，所以说，我们的中央机关毫无用处——对不起。根据我在军区和在前线工作的经验，我可以这样说，最近两个月难关过去了。所举的事实都属于过去了。

至于供应问题，这是个令人伤脑筋的不易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必须提出一些最高限度的任务，在这里很难把什么都做得完美无缺。如果我们不让整个党的机关行动起来，我们将会十分困难……在这里我们只能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把我们党的力量组织起来。

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当然，既然我们没有专家不行，我们就得容忍他们。关于将要取代旧指挥人员的新指挥人员，我想说几句话。因为我负责这件工作，我想说，我们正集中全部力量来造就我们的新指挥人员。捷姆利亚奇卡同志说我们的新指挥人员很糟糕，他们应该挨打。我们没有可能给我们的指挥员训练班仅仅补充共产党员。我可以责备基层的工作人员，并且有凭有据地证明，我们曾经采取各种措施，让在各个战线上作战的工人和农民同志有机会离开前线去学习。当然，军队的情况也许是，它连一个人也抽不出来，因为军队本身也需要人。我这里有扎维亚洛娃同志送来的一份文件。她在文件中写道，派来参加训练班的75人中总共只能留下10人，将65人送回，因为一部分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参加训练班，另一部分人一点政治觉悟也没有，是些不问政治的人。不过我们还是在培养新指挥人员，粗略地讲——我不掌握准确数字——给军队配齐35%的共产党员。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在这里说，训练班毫无用处。但是，我要问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和你们，党的省委员会的代表同志们。如果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在这里，他就会证明，关于这个问题我跟他谈了多少次，即我们不能通过党的省委员会给这么多训练班找到政治委员，

也找不到政治教官。米雅斯尼科夫同志到他说的那些训练班去过几次？他作过努力来使事情办得好一些吗？我看，他根本没到那里去过。而身为彼得格勒训练班政治处领导人的卡尔波夫同志，让政治工作做得好一些，在骑兵训练班里同志们不要碰得马刺喀喀作响，这不是该他留心的吗？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想接着再谈几个我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大概允许我再讲几分钟？

主席：有人建议休会，明天再继续辩论。

斯米尔诺夫：我认为，刚才在这里发言的18个人，已经说出了需要说的全部看法，不可能另外再补充什么新东西。军事小组总的方向已经明确了。总的说来，所有发言人相当一致地反对中央的政策，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把某一提纲作为基础后就休会，明天转入具体问题。

罗森霍尔茨：我认为，发言登记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结果有人希望陈述略微不同的观点却没有机会发言，因为曾经打算让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机会的。因此我认为不应该停止辩论。

阿瓦涅索夫^①：这个建议会使全体会议陷入非常困难的处境。所以我建议大致划分几个小组，用五分钟在每个小组里讨论一下，今天就谈完这个问题。

索柯里尼柯夫：我们的决议与各小组工作情况有关系，我们没有涉及到全体会议辩论的问题。

罗森霍尔茨：有一点很清楚：只有问题在小组里得到深入研究，才可以提到全体会议上，所以明天在全体会议上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加以审议，只好研究其他问题。所以应该转告主席团的同志

^① 阿瓦涅索夫，瓦尔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1884～1930），1903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等职。

们，根据小组意见，明天上午无法提出这个问题。

阿布拉莫夫：鉴于每个小组都没有结束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明天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将有困难，我希望以小组名义提出建议，将全体会议改在晚上，白天各小组继续工作。

索柯里尼柯夫：马上就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将拟定明天的工作计划。

卡缅斯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需要报告主席团，明天上午我们继续工作。

索柯里尼柯夫：代表大会关于这点曾经作过决定，我们不能废除。明天各小组成员出席全体会议，等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再回各组。

主席：决定将工作顺延到明天。

奥库洛夫：请大家稍留片刻。有人在这桌子上放了几副军官肩章。这些肩章的来历是这样的。托洛茨基同志在察里津的时候，有许多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一次带有正式性质的讨论。讨论以后，建议〔第10集团军〕委员会制作某种职务识别标志。这些标志按照我给的图样制作出来了。标志由红星组成，用金、银线镶边。全部区别就在这镶边的不同式样上。这是样品，还没有经过批准，伏罗希洛夫同志也知道这件事。样品送到几个地方，有的地方已经把它忘了。我就要离开察里津的时候，也就是敌人离城只有几俄里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夏坚科^①就把这些肩章拿出来开始鼓动，说总参谋部军官叶戈罗夫^②

① 夏坚科，叶菲姆·阿法纳西耶维奇（1885～1951），1904年入党。1918年8月起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政委，11月起任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1919年1月起任乌克兰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叶戈罗夫，亚历山大·伊里奇（1883～1939），1918年入党。1918年12月被任命为守卫察里津的第10集团军司令。

带来 70 名叛徒，已经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准备好肩章，好把第 10 集团军交给白卫分子。有人又把这卑劣的挑拨伎俩搬到党代表大会这里来了。

（休会）

№11676

军事小组第二次会议速记记录

（1919年3月21日）

罗森霍尔茨：（继续发言）^①……问题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份提纲^②不容争辩。只是现在，在长时间顽强的斗争过程中，我才提醒同志们，最初在莫斯科州组织^③有人发表了反对这种潮流、包括反对军事专家、还反对其他许多人的看法。在各个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通过多次试验，坚信必须吸收军事专家参加作战，坚信没有他们不行。还应该说，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多月内，集团军而且不仅是集团军，还有方面军，出现了彻底瓦解的情况。我说的是南方面军，那里可以看到支队建制的混乱，直至对利用军事专家持否定态度。在我们这个政策中，优点是我们创建了正规军。对这点不应当忘记。当然，在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提纲里，表达了解决我们军事政策中起了很大作用的问题的愿望。

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一下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提纲和实际意图，我们会深信，这一提纲并不是与托洛茨基的提纲分庭抗礼，只是对个别条款上有不同意见，个别条款的内容就是建议代表大会赞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政治委员的规定。因此，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实际建议只是对个别条款有不同意见，除此之外，都是要求恢

① 在1921年3月21日军事小组会议的一份速记稿上有一个用铅笔写的说明“会议开头未作记录”。

② 指托洛茨基的提纲《我们的建军政策》。

③ 指1919年3月2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省第12次代表会议，会上除了其他问题外，还讨论了军事政策问题。

复某些实际建议。似乎他在这里本来可以不提出单独的行动纲领，而只对基本纲领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审议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实际建议，我们就应该注意到，那里有许多条款与[托洛茨基的]提纲完全一致。我说的是第1条，关于“严格考虑被动员者的阶级属性”的规定，第2条，关于仔细清理编入工人连队的富农分子。不十分明确地谈到政治委员的有效的、实际的监督的第6条，也是这种条款，这一条对政治委员的权利强调得不够。第12条也属于这类，内容是把对整个党的工作的领导权交给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单独分出的军事局来实现这一领导。

这些建议在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提纲里，虽然表述形式（不同），但是也有明确的表述。中央委员会谈到了把政治工作和政治部门交给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

总之，在实际建议中，你们会发现有四条建议与托洛茨基的提纲中提出的建议一致。如果我们再看看具有很大实际意义的其他建议，比如说，严格规定政治委员的义务，关于建立技术权威委员会的说明，这些在托洛茨基的提纲里也谈到了，后者强调指出从军队中选拔出能够担任指挥职务的士兵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最后再举出关于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的军事组织经验的说明，那么，我要建议完全同意这些建议。

最后，这里有两条有重大意义的建议，也许会引起争论，不过我个人完全同意。这就是关于取消没有必要的指挥人员的问题和关于建立、组成统一的、确实能领导军事行动的、了解前方情况的中央的问题。需要指出，实际贯彻这两条措施看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不应否认我们的东方战线上的失利与此事有密切关系这一情况。这里说过的那件事不仅是几次不妥当的任命造成的后果，而且是中央所犯一系列错误，其中包括在分配我们预备队问题上所犯

错误造成的后果。我不能现在就更加确切地去谈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采取了一系列不谨慎的步骤。

总之，在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建议里有许多实际建议大体上与托洛茨基的提纲并没有分歧，依我看完全无须争辩。但是，那里有几条建议与他的一般建议没什么关系，而且实际上又是非常有害的，按这几条建议做就意味着使新组建的军队陷于无组织状态。我说的是军队指挥人员实行集体领导制。斯米尔诺夫同志大体上提出了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一建议呢？第一，他说，军事指导员在指挥军队时表现了严重的优柔寡断，并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为自己作掩饰。我们必须把这事用明文规定下来，他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许许多多懂得战略性措施的政治委员，在带有战役性的问题上甚至不愿发表意见或者不愿发表某些意见。斯米尔诺夫同志也应该清楚这种情况。而如果我们这样的政治委员吸收到各集团军的领导班子里来，那么，正如斯米尔诺夫同志说的那样，我们这样就把他们和试图做点什么的六年级学生相提并论了。如果我们将为他们提供机会去解决战役性问题，我们将一无所获。而如果我们像斯米尔诺夫同志所说的那样，给不敢独立解决问题的军事专家再派去一位对战役方面一窍不通的政治委员，那不会有什么用处。事情是很清楚的。毫无疑问，由于让政治委员参与决策，不仅讨论，而且解决他们知之甚少的战役问题——我们知道，在战役问题上做出这种决策的速度多么重要——那么，其结果，在军事委员会上必将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对该问题可能通过决议或妥协性的决议，不过这决议从战役角度看是地地道道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总之，斯米尔诺夫同志的这一建议会在我们各集团军的管理方面产生致命的影响。正确之处仅仅是：不仅集团军政治委员，而且所有政治委员的权利，应该扩大。更确切地说，现在政治委员占据

的地位，应该用明文规定下来。因为他占据的不仅是至今已有的条例规定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不仅执行监督职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执行行政管理职能。在这方面，政治委员应该享有决定权。因此，需要重新考虑政治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地位，无论如何不应让政治委员决定战役问题。

最后，斯米尔诺夫同志接着提出一条建议……

主席：您的时间到了……

罗森霍尔茨：……他提出一条关于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政治委员的建议。这里指的是按照党的组织程序任命政治委员。（宣读）。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在这些问题上，斯米尔诺夫同志一方面提议建立统一的中央，而另一方面，又要求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在我们的政治机关中的某种等级隶属关系中（这一隶属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占有一个等级……根据这一建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能调动它在方面军或集团军的委员，政治委员不对它负责。这样一来，将造成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不会使工作井然有序，而只会给工作带来紊乱。随后，斯米尔诺夫同志又认为必须把政治部门的全部工作集中于党的委员会。斯米尔诺夫同志没有建议使整个政治部门完全由选举产生。这一建议经不住推敲，实际上它也只能加重磨擦。

总之，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这三条关于组织工作的建议，实际上只能给工作带来严重的紊乱。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从整体上研究了斯米尔诺夫同志的提纲和建议，我们应该说，我们排除这三条实际上不合理的建议。我们深信，其余建议，或者是由托洛茨基的提纲里包含的建议组成的（这一部分是无须争议的），或者只是对基本提纲的补充。因此，我建议把托洛茨基的提纲作为基础，只对它作一些增补和修改。

主席：曾经做出规定，给报告人和副报告人各15分钟发言时

间。我们现在可以请索柯里尼柯夫作为报告人和斯米尔诺夫同志作总结发言了吧？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将最后发言。先请斯米尔诺夫同志发言。

斯米尔诺夫：我决定谈一谈罗森霍尔茨同志的三条不同意见，叶弗列莫夫也谈到这三点^①。他们说我的提纲基本上与托洛茨基的提纲没有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应该谈谈其中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在托洛茨基的提纲里，实际上恰恰回避了现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的那些分歧。这里谈到普及军事训练、军事警察，只有一条十分含混地讲到军事专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非常明显的分歧。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是下列情况造成的，即代表大会应该做出某种具体决议，代表大会应该表明态度，这一态度在我们军事政策中，不仅在这份提纲中没有表明，而且在有着我们指出的一个普遍的明显的倾向的一系列实际行为和举动中也没有表明。

谈到这一点，需要指出，我们的军事政策在基本问题上大大偏离了正确路线，极少考虑到创建红军时所处的阶级环境。我们没有正确地提出军纪问题。我们的军事政策没有考虑到军队的基础是中农，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把他们吸引到我们一边，而不要用使人想起旧军队的那些形式把他们吓跑。

我来谈谈索柯里尼柯夫的一条不同意见。正是索柯里尼柯夫说，威胁着我们的主要危险并不是来自军事技术人员，而是来自现在在我们军队里的农民群众，如果他们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指挥员领导，他们就会责怪我们。我应该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在索柯里

^① 在军事小组 1919 年 3 月 20 日和 21 日会议速记记录中没有找到叶弗列莫夫的发
言。叶弗列莫夫，杰梅尼克·伊万诺维奇（1881~1925），1918 年起任莫斯科党
委书记、第 10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尼柯夫和托洛茨基的建议中存在明显的不一致的地方。托洛茨基明确地说：既然波拿巴主义的基础……（宣读）危险从另外一个方面威胁着我们，这威胁是，由于似乎要实行旧军队的制度而在农民群众中可能会爆发风潮。

现在，谈到提纲，我们必须表明我们对托洛茨基的政策的总的态度，而在这里就显出了我说的那份提纲的必要性。

对我提出的另一种不同意见，就是有关军事专家和集体指挥的问题。罗森霍尔茨同志非常不正确地叙述了我关于集体指挥的论据。我说过，应该撤换不称职的军事指导员。更应该撤换不学无术的政治委员。但是，任何指挥人员的基本素质，是他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决定，而不怕为后果承担责任。总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做出决定，不怕最高领导给他处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往那里派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负责的政治委员。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将这一建议固定下来，以便确立从军事技术观点来看是正确的指挥。

现在谈第二条不同意见，即应该推迟解决政治委员的权利问题。我应该提醒大家，使政治委员与专家权利平等这一要求是对各集团军和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这个问题是由于基层，团里和集团军里需要立即解决而提出的。

现在我来谈谈顾问问题。我说过，需要给政治委员过问军事行动的权利。因此，方面军政治委员应该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所以担任这一职务的将是完全能够审时度势的最负责的同志。但是，如果他们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面对形势无能为力，那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把决定这一问题的权利交给军事专家。但是，不应否认他们有这种权利。这里你们无法用任何细则应付过去。政治委员的权利，指挥员的权利，这都需要用法律固定下来。因为在这些情形下结果将是，谁将实际上进行指挥的问题将由党的中央委

员会控制下的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来确定。如果政治委员在理论、战略方面觉得自己底气不足，那么，他就会把指挥权交给专家，而在相反的情况下，则不会这样做。这里需要根据个人选择来行事。

下面我应该谈谈波泽尔恩同志关于纪律问题的不同意见。他说，对外纪律是需要的，并且还作为例证提到了一件事：他走进营房的时候，红军战士们躺着，两脚翘向天花板，因此他们不能十分出色地执行他的命令。这完全不对，因为我本人也上过战场，他们没有向我行过军礼。结果怎么样呢？但是我的命令总是得以出色完成。我们从军事专家那里搬来了这些偏见。他谈到顾问，说从这个观点看军事专家仅仅是顾问这种情况毫无可取之处。现在我们绝对不能为所有的集团军找到这样的负责的司令员。因此，需要使责任由集体来承担，让军事专家也有表决权，军事专家与政治委员一起表决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这是对这种人的一个保障。我们刚才谈到，一长制的指挥是不可行的，因此应当承认这条建议是这个问题最能解燃眉之急的解决方法。

现在这里有同样性质的一些不同意见，似乎我们在建议由中央委员会任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这是不对的，尤列涅夫同志只不过是明白问题何在。这里说：“任命……”（宣读）这里不过说的是做出一个规定：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不经同意即任命集团军政治部的成员。

最后我应该谈一下尤列涅夫同志的反对意见，他说，我们指出的是机制的某些缺点。问题是，假如这些错误性质各异，假如只是在军事政策中徒劳无益，那就另当别论。但是，我要说明，这里指出的错误是执意坚持那条路线的结果。还需要说明，如果这条路线不是在托洛茨基的提纲中提出的，那就是说，应该对它提出问题。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机制的个别缺点，而在于总政策。这些缺点表明：现在，我们能够吸收专家，但不能够安排好他们的工作。代表

大会正是在这一点上应该表明自己权威性的意见。需要在这方面努力修正路线。尤列涅夫同志错误地说，他的发言归结为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没有政治委员，没有出色的指挥人员。情况如此令人无法容忍恰恰只能说明我们的军事政策领导人无用。

主席：有人建议，给我们的中央军事机关出席这次会议，但还没有在这里发言的代表每人10分钟。已在这里发言的有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全俄总参谋部代表、军事院校总管理局代表。泽维亚尔托夫斯基一人代表两个机关。出席会议的还有斯克良斯基^①、丹尼洛夫^②等同志。有人建议给他们每人10分钟。

施特恩贝格^③：我建议，等反对派说完他们的意见，各部门代表再发言。各部门代表先说，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后说。

有人喊道：我认为这种情况不正常。假如各部门代表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结束语之前发言，这比较合理。在他发言之后，他们再发言十分不方便。所以，我建议不让他们发言了，而让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发言，他显然代表领导的行动路线。

布勃诺夫^④：我反对让中央代表们发言。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一般性全面辩论，然后着手一般性实际工作，即把一个方案作为基础，对其进行详细讨论。那时中央代表同志们就有机会详尽说明自己的看法了。现在不让他们发言，是为了让他们能在适当的地方为小组的工作效力。

① 斯克良斯基，埃夫拉伊姆·马尔科维奇（1892～1925），1913年入党。1918～1924年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② 丹尼洛夫，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1877～1939），1904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在军队工作，任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的委员。

③ 施特恩贝格，帕维尔·卡尔洛维奇（1865～1920），1905年入党。1918年起任第2集团军和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④ 布勃诺夫，安德列·谢尔盖耶维奇（1883～1940），1905年入党。曾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主席：我现在将建议提付表决。谁同意？谁反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该您发言了。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们，首先对雅罗斯拉夫斯基作个小小的说明。昨天有人顺便指责我褻渎了游击时期这一神圣的年代。但是，昨天米宁同志在这里是这样谈到这个时期的：一些人的英雄主义，广大群众的强盗行为。我想，有这个鉴定，问题就圆满解决了。

现在讲实质问题。昨天我们在比较激烈的辩论中进行了讨论，讨论了一个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十分清楚的问题，即关于军事专家的问题。

萨法罗夫同志在这里说，谁也不想作战时不要军事专家，应该利用他们。当然，假如不是这些同志开始就说，这个问题在他们那里已经清楚了；假如这些同志不玩弄词藻，同志们就不会再谈军事专家问题了。如此而已。

这是一场玩笑，不能把它称做别的。问题还不在于玩弄词藻，而在于一个十分明显的原则：军事专家是否应该指挥？旧军队的原指挥官可以在新军队里担任指挥职务吗？

米雅斯尼科夫同志说：我们应该剥夺他们的指挥权，不应该给他们任何指挥权。这样利用军事专家应该叫什么呢？大多数人会说：这样提出问题，根本经不起推敲。既然我们聘请指挥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专家。就在斯米尔诺夫同志解释的那份提纲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内容，尽管那里采取了隐蔽的形式。因为那里说得很肯定：由两名政治委员和一名军事专家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但是如果军事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处于少数，那么，这就意味着剥夺他的指挥权，剥夺指挥员指挥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希望恢复我们放弃的那种做法。

所有同志都知道，我们开始时，安排自己人作指挥员，给他配一名军事顾问，这里专家只是个摆设。于是做出一项决定，是一项

实实在在的规定——取消这种形式，全部责任由指挥员承担，在他身边设监督员、顾问。现在，假如我们采纳斯米尔诺夫的提纲，我们就回到了起点上，因为我们不搞二人小组、三人小组、四人小组或者五人小组，因为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全都人数众多，我们就会有更大的集体了。

然后，同志们，党员指挥员问题受到了某种实际考验。你们昨天听到了从东方战线回来的同志们的发言。那里往往有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指挥员。我不准备去估计同志们的责难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正的。你们昨天听到了清清楚楚的大声疾呼，在共产党员担任指挥员的地方不成体统的事情是如何接连不断地出现，当集团军的领导是党员指挥员的时候，这些不成体统的事情又是如何以大批共产党员的牺牲而告终。所以，在指挥经验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对此，我们不能再有动摇。

捷姆利亚奇卡同志发言时指出，共产党员成了二等角色，军事专家才是一等美称。我要说，琢磨出这种等级来很轻巧，但事实胜于雄辩。实际上我们只能说：只有真正的指挥员才能担任指挥员职务，如果他是共产党员，他就应该是个通晓军事、能征善战的人；如果他是专家，那么，哪怕他不是我们的人，但只要他本领高强、精通用兵之道，他就应该担任指挥、负起全部责任。

同志们，如果说不得不谈这个问题，那么，仅仅是因为辩论紧张激烈，杂乱无章，同志们竟然能够这样提出问题，以致不得不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说，它说明的不是一般地利用专家，而是具备知识和经验的指挥员才可以进行指挥。因为责任重大，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小部队作战。由于总的领导体系，形成了这样的局势，此时因为一个团、一个营、一个旅的失利，就会导致整个集团军的失利，造成十分惨重的牺牲。所以我认为，来自前线、未与集团军失去密切联系的同志们，都了解集团军的战斗、牺牲、苦难，那些同

志不会赞同某种死抠原则的反对派的观点。

我断言，从原则上阐述的那个观点，只是无论如何要持反对派立场的某种愿望。同志们，我们之中任何人都不能对引起十分悲惨后果的大量缺点、极为严重的缺点、不足和毛病视而不见。我们对这一点一清二楚，任何一个人人都清楚。但是，同志们，口头讲讲是一回事——这里出路确实在于技术上的完善，而试图转向另一条路则是另一回事。我坚决反对这样做。我们的军队由于这一政策，由于这种扭转政策的企图最终会土崩瓦解。

我理解，在我们屡遭挫折的战线上作战的同志们，他们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需要掉转方向，离开我们在走的道路，那样就会遇救的，昨天听到了东方面军对其他方面军的抱怨，说东方面军被遗忘了，如此等等。我们不能在执行我们党的政策时，只考虑到东方面军的利益，考虑到一些抱怨，诸如这个方面军没有得到增援，这个方面军被忽略了，注定要完蛋，等等。很明显，我们在东方战线上力量正在削弱，但这里有一些起决定作用的理由。当时问题是这样的：是否坚守东方战线？就我所知，斯米尔诺夫同志是从失掉乌法的那个集团军来的，我觉得，他不久前还曾经断言，那里形势大好，好极了。后来，不出几天，就放弃了乌法。这里曾经有明显的政治利益。在辩论中，有一个同志说，政治在取得成功，并且一定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当我们转向南方，以防止同盟国从南方向我们进攻时，为此我们被迫向那里派遣了巨大的兵力。

我要说，在这种论据的影响下，我们遭受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挫折。这证明我们党在军事建设方面的路线的偏差，——这种论据根本经不起推敲。

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军队中共产党组织的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军队中的监督工作依靠军队中共产党员的内部组织团结。当然，军队应该处于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但是，

它将处于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然而，在各个集团军中应当执行统一的共产党政策。假如我们走上一条把集团军交给集团军范围内的共产党员监督的道路，我们知道，那会发生多少冲突。

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军队的条令问题。我十分明确地提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当然，问题不在于，军官内急时是否可以无人押解，而士兵内急时要有人押解。问题不在这里。军队内部急需条令，这才是问题所在。（笑声）条令在这里象征着内部纪律和规章，昨天却有人对此群起而攻之。波泽尔恩同志昨天有勇气发言维护内部纪律和规章。我要说的只是，波泽尔恩同志无比正确。

主席：我请求再给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一点儿时间，让他把话讲完。

有些人喊道：同意，同意……

索柯里尼柯夫：我要说，关于内部纪律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一个原则性问题，即我们不是游击队，而是过渡时期的军队的问题。我们军队中保留着各式各样的阶级成分，它反对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代表的某种专政，反对在我们军队中实行无产阶级对类似专家这种阶级残余和对中农的专政，反对在红军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必须靠无产阶级的暴力手段行事，强迫小私有者、小业主，强迫他们去为共产主义献身。这一切都要靠内部纪律、规章、团结取得。我知道，前线上的部队无疑是靠鼓动来管理的（这种方法不久的将来失去作用）。因为我们只有小股队伍的时候，士兵认识指挥员的面孔，那时不需要什么识别标志，没有必要佩戴。但是，当我们的士兵不仅不认识师长的面孔，而且不认识团长的面孔时，就可能因此发生各种可悲的笑话，这时必须有某种识别标志，于是它们应运而生。

现在请允许我将矛头转向谈论肩章并同时挥动多半是从别人肩

头摘下来的肩章的同志们。恰恰是在那些存在同志式的关系、同志式的纪律和内部〔秩序〕的部队里，我们可以谈谈这件事，因为这反正不会宣扬出去。在这些部队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不成体统的做法：打嘴巴、鞭笞士兵、残酷得无以复加的肉刑，即使在旧时代也未达到这种程度。你们知道，在著名的基克维泽师^①里盛行打嘴巴的做法。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在召集红军战士大会的时候，传入我耳鼓中的是一片惨叫声。于是我说：最好用党的纪律代替同志式的鞭笞。这样做我们只会得到好处，在我们的军队中这将仅仅是小小的胜利，小小的成就。

作为结尾，我要说：同志们，我们将要讨论具体建议，其中许多建议与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也完全一致。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分歧。在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一定会取得完全一致。但是在建立共产党员管理组织的问题上，在这方面我们不会达成一致，也没有必要达成一致。

主席：辩论结束。现在我们对提出的建议进行表决。

有人喊道：这里有一条建议，对提纲进行记名投票。

有人喊道：同志们，问题是，有托洛茨基的提纲。我建议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还要把小组会上的实际建议加进去。

主席：实际建议随后提交讨论。

斯米尔诺夫：我建议，我们不要其他提纲，有些补充意见其实措词还不够恰当。只能把托洛茨基的和我的提纲付诸表决。所以索柯里尼柯夫不能把他的论点作为提纲提出来。

有人喊道：请允许就程度问题说几句。我断定，索柯里尼柯夫还有第三份提纲。所以，二者必取其一：或者索柯里尼柯夫的论点

^① 指参加察里津防御的步兵第16师。该师于1918年5月由瓦·伊·基克维泽组建。1919年1月基克维泽牺牲后，该师被命名为基克维泽师。

是一份提纲，我们将对它进行表决，或者不算提纲。如果这里要塞进一大堆补充意见，把什么都看做提纲，这就不对了。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们，斯米尔诺夫的提纲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政治问题，另一部分是一般性建议。我的提纲将与托洛茨基的提纲构成一个整体，现在我只是宣读我的提纲。

主席：谁赞成现在宣读对托洛茨基的提纲的补充、修改意见？（喧哗）

有人喊道：同志们，我们不要再争论了。我认为，可以宣读，然后提出补充意见。

索柯里尼柯夫：“总的说来，肯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宣读）

主席：那么，我来提付表决：谁赞成把此提纲作为基础？

有人喊道：我想就程序说几句。我觉得，既然宣读了斯米尔诺夫同志的提纲……不应该把某些提纲提交委员会。把哪些观点作为基础：索柯里尼柯夫的提纲还是斯米尔诺夫的提纲？

索柯里尼柯夫：我已经说过了，我的提纲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合并成一个：托洛茨基的提纲和索柯里尼柯夫的补充意见。

主席：谁赞成把斯米尔诺夫的提纲作为我们下一步讨论和建议的基础？

有人喊道：我想说一点。出席会议的人谁将参加表决？

主席：我想补充一下，只有有表决权的同志参加表决。

有人喊道：我提议记名投票。

主席：同志们，这里有几个同志提议记名投票，他们这里人数足够。要求这样做的有萨法罗夫、格列丘什、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米哈伊洛夫等同志。我应该提付表决。

有人喊道：有一条具体意见。这里有一份名单，可以根据名单表决，或者赞成，或者反对。

主席：我赞成。我照名单念一遍，看谁有表决权：谢尔盖耶夫同志——只有发言权，叶弗列莫夫——缺席，列文——有表决权——赞成还是反对斯米尔诺夫的提纲？

有人喊道：请允许我谈谈表决方法。这里有个错误。不应该这样表决，不应该依次念出每个同志，随后马上又问赞成还是反对。

主席：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这个建议。

有人喊道：这事谁也不明白，前线代表的提纲和斯米尔诺夫的提纲是一回事。

主席：请允许我，这样吧，同志们，我念姓，每个被叫到的人就说他赞成谁，赞成斯米尔诺夫的提纲还是托洛茨基的提纲：韦谢洛夫同志——赞成斯米尔诺夫，鲁希莫维奇——赞成斯米尔诺夫，瑙莫夫——赞成托洛茨基，沃斯科夫——赞成托洛茨基，克韦托夫——不在，约诺夫——只有发言权，伊万诺夫——不在，彼得罗夫——赞成斯米尔诺夫，明科夫——赞成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赞成斯米尔诺夫，索林——赞成斯米尔诺夫，苏尼察——只有发言权，米哈伊洛夫——赞成斯米尔诺夫，库利——赞成托洛茨基，彼得罗夫——不在，西多罗夫——赞成托洛茨基，皮萨列夫——如果提纲不是以最后形式通过，那么，赞成托洛茨基，马尔戈林——不在，拉济扬——不在，梅利尼科夫——不在，施特恩贝格——赞成斯米尔诺夫，科尔涅夫——不在，叶夫谢耶夫——赞成斯米尔诺夫，切丘什科夫——赞成斯米尔诺夫，科兹洛夫——赞成斯米尔诺夫，拉希亚——赞成托洛茨基，阿尼什金——不在，戈洛晓金——赞成斯米尔诺夫，沃尔福维奇——赞成斯米尔诺夫，奥谢姆——赞成斯米尔诺夫，齐洪——不在，阿基姆——赞成托洛茨基，卡缅斯基——赞成斯米尔诺夫，斯塔尔科夫——不在，萨莫赫瓦洛夫——只有发言权，西蒙诺夫——赞成斯米尔诺夫，尤金——赞成斯米尔诺夫，维克曼——赞成托洛茨基，格森——赞成托洛茨基，姆格拉

泽——不在，舒瓦洛夫——只有发言权，沃林——赞成斯米尔诺夫，列普尼科夫——只有发言权，伏罗希洛夫——赞成斯米尔诺夫，博什——只有发言权，布雷格曼——赞成托洛茨基，米雅斯尼科夫——赞成斯米尔诺夫，阿利法诺夫——不在，茹科夫斯基——不在，阿瓦涅索夫——不在，马吉多夫——赞成斯米尔诺夫，拉罗泽——不在，科兹洛夫——不在，雅罗斯拉夫斯基——赞成斯米尔诺夫，卡尔波夫——不在，利扎列夫——只有发言权，萨法罗夫——赞成斯米尔诺夫，托尔马乔夫——赞成斯米尔诺夫，哈塔耶维奇——不在，穆林——赞成斯米尔诺夫，萨莫伊洛娃——不在，捷姆利亚奇卡——赞成斯米尔诺夫，扎卢茨基——赞成托洛茨基，涅姆佐夫——不在，洛吉诺夫——不在，孔达科夫——不在，维勒——赞成斯米尔诺夫，萨福诺夫——不在，库兹涅佐夫——赞成斯米尔诺夫。

有些人喊道：把我记上，把我记上……

主席：这里有许多工作人员还没登记。许多人曾经参加各项工作，所以我请大家登记。（登记）拉斯托普钦——赞成托洛茨基，阿列克谢耶夫——赞成托洛茨基，古罗维奇——赞成斯米尔诺夫，尤什金——赞成斯米尔诺夫，德鲁扬——赞成斯米尔诺夫，伊林——赞成斯米尔诺夫，斯莫利尼科夫——赞成斯米尔诺夫，列文——赞成斯米尔诺夫，奥库洛夫——赞成托洛茨基，罗森霍尔茨——赞成托洛茨基，克雷洛夫——赞成托洛茨基，波泽尔恩——赞成托洛茨基，兹韦列夫——只有发言权，奥希托维奇——赞成托洛茨基，布勃诺夫——赞成斯米尔诺夫，叶夫多基莫夫——赞成托洛茨基，伊万诺夫——赞成斯米尔诺夫。（进行统计）

主席：结果如下：赞成斯米尔诺夫的提纲——37人，赞成托

洛茨基的提纲——20人^①。那么，同志们，我们转入下一项议程。这里提出了几条建议，希望分成一些具体问题。

有人喊道：就程序提个建议。我建议逐条宣读提纲，如果有遗漏，同志们可以提出补充意见。

有些人喊道：对。

主席：同志们，有没有人反对我们现在就开始逐条宣读提纲并提出补充意见？谁反对？没有。

有人喊道：就程序提个建议。我提议缩短三、五分钟时间，限制发言人数，因为许多条款已经相当熟悉，经过周密研究了。我提议：只谈赞成，或者反对。（喧哗）

主席：请使你的建议措词再恰当一些……同志们，丹尼洛夫同志坚持要求在这里搞清楚，我们是否要讨论罗森霍尔茨同志提出的建议。

有人喊道：我认为，会议表决把某份提纲作为基础并且提出了一定的讨论程序，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认为其他建议完全是多余的。

丹尼洛夫：同志们，昨天罗森霍尔茨同志提出一项明确的建议：审议几项体现辩论实质的基本条款。要依我最好不是像斯米尔诺夫建议的那样审议个别条款，而是挑出一些条款。这样更合理，因为辩论将是激烈的，而又不会有什么效果。我拥护罗森霍尔茨同志提的建议，昨天在就这一建议进行表决方面，好像没发生什么分歧。

主席：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把提纲作为基础，将对它逐条讨论。这不妨碍任何人提出建议，我们将进行表决。

丹尼洛夫：对不起，这里说的不是具体建议，而是讨论昨天已

^① 根据速记记录，赞成托洛茨基的提纲的为19人。

经解决的个别具体问题，关于政治委员的个别问题。

主席：请原谅，我这样理解，如果将提出某些建议和关于政治委员的建议……

有人喊道：就程序提个建议。我提议每人发言限制在五分钟内，然后每人只要表示赞成或反对就行了。

主席：现在有人就程序提出建议，发言限制在五分钟内，然后每人只表示赞成或反对就行了。还有其他建议吗？

有人喊道：同志们，我有这么个建议，把没有争议的条款作为基础，搁置那些……

主席：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里提议只给发言人五分钟？有反对的吗？

有人喊道：同志们，五分钟什么都说不出来。限制发言人数要好得多，但是至少要让他们能谈到实质。五分钟没法谈实质问题。

尤列涅夫：我们在这里谈了半天缩短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一辩论起来，就会白白浪费时间。

主席：同志们，谁赞成把发言限制在五分钟内？谁反对？少数反对。就是说，现在建议是这样，就每一条由一两个人发言。谁赞成只让一个人发言？赞成还是反对？

有人喊道：我赞成让两个人发言。

主席：我把建议提付表决：让两个人发言。每条让两个人发言，同意还是反对？那么，就是说通过了。我来逐条宣读提纲：“（1）1918年底和1919年初的特点是力图……”（宣读）

有人喊道：我认为，我们这里在做一件严肃的事情，可是，有些同志却不论什么时候都随便出出进进。我提议，请愿意参加辩论的同志们表决，请他们像个开会的样子。

主席：同志们，请停止走动。

尤列涅夫：我认为，对这条应该修改。这里说：“两个战斗的

营全都……”（宣读）我认为，应该用别的方式表达，换成“动摇的”这个词。这里需要强调动摇的时刻。

萨法罗夫：同志们，我以为，有一些经验的人都懂得，绝大多数是中农。他们一点也不想作战，他们想逃避战争。这说明了他们的阶级立场，他们一贯动摇的立场，尤列涅夫同志指出了这种立场。国内战争的所有后果都说明他们的阶级立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个阶级根本不愿通过武装斗争解决问题。

主席：同志们，我把尤列涅夫的修改意见提付表决。谁赞成？谁反对？大多数反对。修改意见被否决。谁还想发言？没有了？我把整个条款提付表决。大多数赞成。通过。

现在宣读第二条。（宣读）谁想就这条发言？

有人喊道：同志们，我想，正是现在我要反对把这一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因为现在我们不能说，我们军队中的指挥权没有分散，因为我们在录用专家，因为我们在给旧军官以指挥权，我们不能做出这种结论。也许将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我们应该努力使指挥人员成为骨干，就像在资产阶级军队里那样，就像在沙皇时代一样。

萨法罗夫：同志们，我想说点与他不同的意见，因为既然我们承认与红军中旧人员之间对立的必然性，承认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那么，我认为足够……

丹尼洛夫：我觉得，这里没有原则性分歧，但是，从某些建议中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在军队人员中有大批资产阶级分子这件事，我认为是个矛盾。后来又讲，在建设工农的阶级军队时，我们把指挥权交给旧军事专家。这也是个矛盾。我们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说，种种矛盾的结果是必须任命被赋予更大权利的政治委员。但是，这些政治委员往往是冒冒失失的毛孩子，他们或者由于自己言谈举止不学无术而不能起到监督作用，或者军事专家在各方面左

右他们，支配他们。我们说，军队离不开供应，没有供应就不能正规作战。但是，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仗打到第五年，还能有什么供应呢！这是前所未闻的矛盾。我们说过，我们需要自觉的革命军队，可是在这支军队里大多数人是农民群众。这是矛盾。我们需要革命报刊，否则做事就没有理智。请看，这一系列的矛盾，于是我觉得，昨天进行的争论和提出这些条款的企图，都是想逃避这些矛盾的错误企图。对此必须明确指出。

主席：请斯米尔诺夫发言。

斯米尔诺夫：有人在这里说过，这些条款是用一种深奥的语言写成的，还有人会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奥语言形式，因为军官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阶级对立。但是，不可能谈什么与军官的阶级对立，而如果我们曾把军官看做一个阶级，认为应该把这个阶级从军队赶出去，如果说，一方面，军队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另一方面，由小农领导，那么，我们要指出，在这两个个别阶级之间没有阶级对立。我不理解，这一条为什么会引起争论。

主席：我提付表决，谁赞成这一条……

有人喊道：我提议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和向导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门。

有人喊道：我提议删掉这一条。

主席：那么，我提付表决。

有人喊道：我提议删掉这一条。应该直截了当地提出，谁赞成删掉，谁不赞成。

主席：谁赞成？谁反对？请数一下。5人赞成删掉这一条，大多数赞成保留。

有人喊道：我有修改意见。开头几个词：“不应该分开……”加上：“由阶级利益的对立。”

有人喊道：我想作个说明。我们这里描述了军队组建的环境。

这里要指出，在无产阶级和中农之间没有阶级利益的对立。

主席：谁赞成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谁反对？大多数反对。那么，我把整条提付表决。谁反对？

开始第三条。

有人喊道：有个紧急声明。我提议赞成托洛茨基的提纲的同志出去几分钟商量一下。

捷姆利亚奇卡：我请求就程序问题说几句。我抗议，正当会议，占用党的代表大会时间召开的重要的军事小组会议进行中，这时〔一位同志〕闯入会场，不向主席请求发言，就决定休会。这不仅是对本次会议的侮辱，而且是对党的代表大会的侮辱。这次会议分组，是按照组织局预先编好的名单分的，是阿瓦涅索夫贴出的这张名单。因此，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侮辱。

主席：我不允许再就程序问题发言。

有人喊道：我想说，看来因为小组是这种分法，当然所有建议都不会被采纳。我们认为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其中应该不仅调查一个方面，而要调查两个方面，我们不想有意助长这种做法，我们认为制定这些措施是适宜的。

这不能称作中断会议，而是从实际出发。只有在从各个方面讨论问题的时候，只有那时，问题才能得到正确解决。而当小组以偶然形成的多数否决……

有人喊道：你们不是正在这里商量吗？（喧哗，叫喊）

主席：同志们，请遵守秩序。所有小组，其中包括军事小组，都不是随便分的。这里大多数与会者都是在军队工作的人，正像大家都不是偶然来开会一样。所以，我请求你们收回自己的话。（喧哗）

有人喊道：同志们，你们可以随便打什么比方，但是，我应该说，我没想侮辱本次会议。但是，我要说明，我们少数派有权去商

量一下。这并不是侮辱。(喧哗)

主席：同志们，在会场安静下来之前，我暂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萨法罗夫：鉴于同志们用一个声明在这里引起了全场喧哗，我认为这就是中断小组工作。为各派着想，我提议，立即停止喧哗，接着做下面的事情。

有人喊道：同志们，我提议让他们休息一会儿，让他们碰一碰头。然后我们再集中起来，继续开会。

有人喊道：我想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小组是非常清楚地分成两派，所以必须休息一下，都冷静冷静。

有人喊道：很明显，提出自己的希望并且维护自己的观点的同志们想商量一下，然后继续开会。这是正当要求。

有人喊道：我们请求休息10~15分钟。

戈洛晓金：同志们，这是完全正当的要求，只不过是用不正当的形式提出来的。如果同志们想商量一下，他们应该请求休会，那样一切就会平安无事了。

博什^①：我们想在今天结束这些工作，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对全党和各个方面军关心已久的事情做出最后决定。

主席：同志们，你们需要休息多长时间？

有些人喊道：15分钟。

主席：这里有人建议休息半个小时。谁赞成？谁反对？同志们，我宣布休会半个小时。休息后还在这里开会。

^① 博什，叶夫根尼娅·波格丹诺夫娜（1879~1925），1901年入党。时任俄共（布）阿斯特拉罕省委委员。

№05222

讨论军事问题的全体会议速记记录

（1919年3月21日）

主席^①：请阿拉洛夫^②同志作关于军事形势的报告。

阿拉洛夫：同志们，我们前线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谈当前形势之前，我要向你们说明，自夏季以来我们这里发生的变化。你们在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三种颜色。绿色表示6月份以前我们苏维埃俄国边界的位置。蓝色表示1918年11月15日前的变化，而红色表示今年3月1日前我们边界的变化。从这些粗略的曲线上你们可以看到，军事上的胜利、军事部门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们的领土从夏季战役以来发生了变化：大约扩大了一倍半。有些地方我们向前推进了400到600俄里，例如在奥尔斯克战线上，而在乌克兰战线上推进了1000俄里。俄国领土扩大了数千俄里。

用绿色画的这条线，表示那时红军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是开始组建红军，开始有计划的、正确的建军的时候。这是独立的游击队〔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地活动的时候。其中有些游击队十分成

① 速记记录中未注明谁是这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主席。根据一些间接材料推断，会议主席为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彼·格·斯米多维奇。斯米多维奇，彼得·格尔莫格诺维奇（1874～1935），十月革命后历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

② 阿拉洛夫，谢苗·伊万诺维奇（1880～1969），1918～1920年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功地击退了反革命的进攻，但是，尽管他们立下了英雄的功绩，还是被迫撤退下来，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组织，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是在决定创建红军之后，在实行统一指挥、成立中央之后，在实现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之后，这时才可以看出我们疆土不断扩大，逐渐达到这条蓝线的位置。

就是这最初几步为建立红军奠定了基础，使我们能够有计划地使用预备队，将部队从一条战线调往另一条战线，从不大吃紧的地方调往局势严重的地方。而在建立这支军队前，每当发生暴动或者世界资产阶级和国内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我们就要派遣所有兵力，而且有时不得不募集数十人、数百人，以解危如累卵之急。

但是如今随着边界向外推移，国境线增加到 8000 俄里，这是任何一次战争中，无论帝国主义战争，还是国内战争中，都不曾有过的。由于疆土扩大，对于军事指挥来说，出现了一个困难的局面。最近两个半月以来，疆土还在扩大，红军的胜利有时让人头晕目眩，但是最近几天我们发现向坏的方面转折的苗头。有些方面军开始退却。

我还想谈谈失利的原由，谈谈西线和东线军队撤退的原因，目的是描述出这些失利的情况，从而采取必要措施以彻底扭转失利趋势，并且从容不迫、满怀信心地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如果我们看一看北方战线，现在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红军正在顺利地向前推进。我们占领了申库尔斯克，逼近了奥博泽尔斯克。最近几天，我们的部队遇到了铁丝障碍物。在北方战线，敌军兵力多达 136000 人，主要由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少量捷克人、塞尔维亚人组成。在北方战线和南方战线这两条遥遥相对的战线上的胜利，使我们坚信，东方战线和西方战线上的失利局面也将被扭转，我们的红军能够乘胜挺进。

在南方战线，我们位于靠近新切尔卡斯克、罗斯托夫和大克尼

亚热斯卡亚镇的地区。取得这一胜利的原因是，我们在南方战线成功地建立了一支由行家里手——专家指挥的精悍有力的军队。只是在搞好红军组织工作之后，在红军与中央、与总司令部取得牢固而密切的联系之后，红军才所向无前。而在第 8、第 9 集团军撤退之前，彼此之前没有任何联系，和中央指挥人员也没有联系，当时的局面则完全不同，这一度影响了南线军队一部分队伍的运动。当时，克拉斯诺夫^①拥有许多突击营和专家，他们用迂回战术迫使我们的第 8 和第 10 集团军甚至在顺利的进攻之后又撤退到很远的地方。在第 8 和第 9 集团军与中央建立联系之后，他们又转入进攻。他们用迂回战术和其他战略性的措施把克拉斯诺夫的军队赶往新切尔卡斯克方向。但是，现在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已不复存在，替代它的是邓尼金志愿军^②。后来从北高加索调遣了全部兵力向我们的南线军队扑来。

在我们的北高加索作战的有两个集团军，但这两个集团军已经被邓尼金击溃了，一直被打到了黑海边上。我们凭借着攻势，发动了神速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以一个缺衣少鞋的集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冒着严寒，历时一个半月，推进了大约 400 俄里，这是一次成功的进攻。现在进攻受阻了。这不仅仅是由于遇到了邓尼金的抵抗，而且由于我们在北高加索被击溃的第 11 和第 12 集团军使邓尼金能够完全从容不迫地把它的巨大兵力调往顿巴斯，从而阻止了我们往那里的顺利进攻。为此，我们的军队应该变更部署，以挫败顽强抵抗。虽然看起来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胜利，实际上是

① 克拉斯诺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69～1947）——沙俄将军。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首领之一。1919 年流亡德国。

② 志愿军是 1918～1920 年在南俄建立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其成员主要是沙俄军官、土官生、反动大学生和上层哥萨克分子，其首领先后为 М.В. 阿列克谢耶夫、Л.Г. 科尔尼洛夫、А.И. 邓尼金和 П.Н. 弗兰格尔。

第11和12集团军的失误、失败，这两个集团军妨碍了我们井然有序的南线军队的运动。

其中一个集团军^①仓皇溃逃的原因，是它失掉了联系。它没有组织好物资供应和粮食补给，在指挥方面力量薄弱。而邓尼金的军队有统一的指挥、老练的长官，能够直插该集团军后方，使其四散奔逃。此外，卫生工作状况也糟糕透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这在该集团军的溃逃上也起了某种作用。

这两个集团军本来能够靠自己的机动挡住邓尼金的军队，在顿巴斯和顿河下游打掉其顽强气焰，那样，我们现在在亚速海和黑海就占有重要据点了。

我指出这个方面。是为了用对比的手段突出，当〔一个集团军〕通过迂回进行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通畅的联系的进攻时，与也许有大批兵力的，但未经周密组织的、无作战计划的游击队的行动相比，要收到更好的效果。

又比如，由15000~20000人组成的弗兰格尔军^②向由10万多人组成的集团军发动攻击，并迫使后者退却，因为弗兰格尔军组织严密、联系通畅，通过迂回迫使尽管人数较多但组织得不好的集团军四散奔逃，还保持进攻态势。

我们的情报机关和侦察机关表明，在德国人的统一指挥下组建了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和佩特留拉分子的军队，他们现在将兵力集中在从温道^③至符拉迪沃斯托克^④一线。我们的情报机关表明，曾驻扎在北乌克兰地区的南线兵力，现在正调往靠近

① 指南方面军（后为里海—高加索方面军）第11集团军。

② 指1918年11月底组建的П.Н.弗兰格尔第1骑兵军，隶属于志愿军，专门与第11集团军作战。

③ 文茨皮尔斯市（拉脱维亚）1917年以前的正式名称。

④ 原文如此。似应为“比亚韦斯托克”。

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在东普鲁士地区、格罗德诺省已确实建有兵营，正往那里集结志愿兵，那里安顿了专家，是来自德国的职业军事家。此外，立陶宛部队也在集结，由德国人提供教官。他们让供应立陶宛军队和德国军队给养作为回报。然后他们从比亚韦斯托克朝乌克兰到萨尔内方向采取行动。目前他们的总兵力多达15万名步兵。

据统计，其中德国人现在在各个战线上有18000人之多。这是个大约数字。他们有两个军，而其余部队是立陶宛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这是一个有组织、有周密计划的运动，步步为营，矛头直指我们。这个运动归根结底是由协约国领导的。在这方面有一些情报和资料说，协约国不愿动用他们自己的军队——法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他们驱使德国军队和波兰军队来和我们作战，吓唬德国说，苏维埃政府将占领东普鲁士，从而助长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除了我们的敌人的这个有周密计划的运动，影响我们的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消极方面。实践表明，我们期望在国际方面获得的优势，抵不上在组建国内军队中出现的那次失败。那里没有那种统一的、有力的、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团结和对中央的服从，没有正确的供应，联系情况也糟糕得多。〔那里〕总是没完没了的辩论，不论是在友好的苏维埃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之间，还是与中央之间。一大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必须理出头绪，采取某种办法加以处理。这一切都相当深刻而明显地反映在军事上，而在军事上每分钟都极其宝贵。

现在，乌克兰战线正迅猛向前推进。它的触角伸往各个方向：敖德萨、梅利托波尔、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方向，直至下顿巴斯。此外，除了最北部——基辅方向外，向东方的推进也很顺利。在这里，我们对面集结了7万敌军，主要是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

人、希腊人。英国人较少，他们只提供专家、火炮和坦克。但是，主要都是法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他们集结在黑海附近。此外，有佩特留拉军队的小股残余。佩特留拉^①被击溃并逃往加里西亚以后，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最近两三个月在基辅和日托米尔方向的战线上，在这个方向上出现了佩特留拉的军队，组织上多多少少比过去严密了，而且与西线建立了联系。这些军队没有退却，甚至对我们施加压力，迫使某些部队后撤。在其他方向上情况比较顺利。

由于乌克兰战线本身发展过猛，缺乏比较善于运筹帷幄的组织人才，我们只好派出全部兵力去夺取新的地区。对这一点有一种担心，已在西方战线得到证实，这就是在内部组织不够协调的情况下，过快的推进可能很快就会遭到遏制，而在受到某种外部冲撞时，还可能出现反弹。在南方战线，除了志愿军，据近两三天内获悉，法国和英国教官陆续到达南方港口，在邓尼金的军队里出现了法国火炮，出现了坦克。总之，协约国除了派来步兵，还在提供某些物质援助。

东方战线夏季过后非常顺利地由伏尔加河向前推进，并已经开始翻越乌拉尔山，现在转而后撤了。它退到了自己的北部地区。其原因是，去年冬季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建立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达6个军之多，治理有方，军容严整。这6个军已经在我们的战线上采取行动。说到后方，我们还没有关于军队在后方的资料。但是这6个军创建得法，组织严密，现在士气高涨，正朝彼尔姆——格拉佐夫方向、萨拉普尔方向、乌法方向运动，并已出现在奥

^① 佩特留拉，西蒙·瓦里里耶维奇（1879～1926），乌克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首领之一。1917年和1918年参与组织乌克兰中央拉达和督政府，1919年2月起为督政府首脑。

尔斯克方向上。

高尔察克这次较快得手^①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十分糟糕，东方战线部队之间缺乏联系。除了我方存在这些缺点以外，还有敌方纠集了雄厚强大的兵力，而且指挥人员比我军高出一筹，善于应变。乌法城下的突击可以认为是十分成功的战略机动，完全为我方指挥部始料所不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奔袭对乌法进行包抄后，集中兵力对其实施出其不意的突击，结果我们的部队只好撤退，以免被敌人切断。同样非常成功的几次战略机动，不仅由于我军松松垮垮，而且还由于我们的部队不善于给这种突击以回击。

这次在乌法方向上的神速奔袭使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我们的部队正迅速朝奥尔斯克方向移动。必须后退一段距离，把军队的防线扯平，以防使军队处于遭受高尔察克军队攻击的位置。

至于北高加索战线，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现在这条战线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曾在那里作战的几个集团军已经撤离，我们的南线军队正去支援他们，南线军队最终也将在东北战线采取行动。

这就是我所能向你们描述的当前各个战线上的形势。

在东方战线上目前有 6 个军，有 104000 名有战斗力的步兵。在我军长达 8000 俄里的整个战线上，与我们作战的敌军总共有 50 万~60 万人，而且没有把敌军所有的预备队都计算在内，我们不是对所有的预备队都十分清楚。

除在各个战线上作战和调动军队外，总司令部必须始终掌握一定的组织严密、保持良好状态、能相当〔迅速地〕投入行动的预备力量。在各个内线上，我们能够把强大的预备队调往某一个方面，拥有一支集中的突击部队，〔可以〕把它派到遭受敌军猛烈进攻的最薄弱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是，这里存在许多缺

^① 指高尔察克部队 1919 年 3 月初发起的进攻。

点，也妨碍各个战线上的工作。

我们新编部队的一系列失利影响了各个战线。但是，失利不能只怪军事部门，还有其他〔原因〕：军队驻扎，组织得相当有力^①的运输，不能使我们的军事部门在驻扎、饮食、军装、政治工作方面迅速得到补充。

这些方面应该加以强调，应该指出来，比如应该指出，有些从中央来到前线的部队，穿着破衣烂靴，住在又潮又冷的营房里。他们情绪低沉，给各个战线造成极坏影响。

此外，政治工作不够坚决有力。许多部队开赴前线，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去作战。没有进行任何文化教育工作。对这方面应当予以重视。

我不得不责备的不是一个部门，内地新编的部队比较脆弱，他们还不是坚强的预备队，军事部门对此还不够重视。不仅是训练，生活环境本身也应该使他们走上前线时从容镇静，懂得打仗的目的，使他们的情绪不应因饮食和宿营条件恶劣而发生动摇。

此外，为了在前线上能正确而迅速地采取行动，必须有组织得很好的通讯联络。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我们的电话、电报联络的部门必须与我们的军事部门建立全面联系，使我们能迅速通话，在这方面不出任何故障。因为中央与各个战线的联系是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这样漫长的战线上，会出现很多毛病和故障。

说到供应方面，我们十月革命后接收的那个机关已经彻底被摧毁了。我们过去没有任何供应机构。俄罗斯境内堆积如山的储备被毫无意义地滥用，没有长远打算而漫无目的地大批大批发往这个或那个战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了解某些物资位于何处，当时这些仓库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爆炸。于是我们赶往那里，但是找到的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不力”。

已经只是残余。现在我们彼此之间多多少少建立了像样的联系，我们的组织比较严密了。但是过了好几个月。直到现在，这个机关还没搞好。我们的军队，尤其是在北方战线上，现在还在挨饿，穿不上衣服和靴子。

此外，我们的预备队的利用有时还带有偶然和无序的性质。出于纯政治考虑——乌克兰的暴动，在某一条战线上必须采取行动——总司令部并不总是指望预备队。虽然实际上是可以指望的。现在我们经常收到来自各个战线的通报，说必须给他们预备队，说他们不能采取行动，他们在退却，因为没有援助。但是，不管怎么求救，预备队往往不能派出，因为或者预备队没有准备就绪，或者虽已准备就绪，但其他战线也需要。

注意到我们各个战线上总的形势，还必须说，预备队并不是随时都有，有时必须从某一战线上抽调军队，必须让他们随机调动。虽然我们收到报告说，那个战线力量削弱了，敌军可能对他们实行突击，于是从那里不能呼救。我们远远没有考虑全国范围的军事政策。我们在各个战线上还都没作这种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司令部必然会遇到一系列违抗命令的现象。

就是说，从对我们的军事形势所作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以下情况：目前，我们在东线和西线连连失利，这些失利的原因是，敌人这个时期内已经建立起一支人数众多纪律严明的军队。例如，东线有6个军，西线有15万人，现在他们正将这些兵力派来攻击我们的落后的部队。这些组织严密的兵力是指挥、领导和供应的典范。因为在南线，在德国边界上，在乌克兰南部边界上，在顿河战线上，活动着一些军队，这些军队都依靠德国的〔军事潜力〕，依靠德国的援助，完全像依靠供应他们最新式武器的协约国的援助一样。这是一种巨大的技术力量。

就是说，我们也必须用同样的手段去组织、去供应我们的军

队，去加强军队的通讯联络、组织性、集中性，必须建立严格的指挥。

在发现敌军进攻的地方，也发现了境内的暴动，诸如奥廖尔、布良斯克、塞兹兰和辛比尔斯克地区，恰恰在敌军攻击的方向上。这也加重了我军的失利。

从我的报告中所能做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加强红军，为它提供组织性强、有真才实学的指挥人员。可以说，这样的指挥人员目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调动90%的人去奋勇作战。

我甚至可以举出布良斯克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些部队发生了暴动，口号是：立宪会议万岁，杀死犹太人，为两俄磅面包。这时，除了极少数例外，全体指挥人员都跟我们走，帮助我们缴了部队的械，平息了暴动。而那时这个第4师的几名政治委员却未参加我们的行动^①。阿斯特拉罕地区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在那里发生暴动的时候，指挥人员都帮助我们^②。我认为我有责任说出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情。

此外，我们必须有自己训练有素的红色军官，必须有学识渊博、能征善战的人才。我们在各个战线上都缺少专家。最近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统计证明，竟缺少60%的专家。这对我们的红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红军还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战斗，经常遇到大雪，而现在，比如说在南方战线，正值开河季节，只好穿着破皮靴甚至赤着脚趟过大河小溪。虽然热情高涨，但是，由于笨拙的指挥，由于不善于预见敌人有何行动，他们企图往哪里迂回、制定什么计划等等，热情往往低落下来。这里必须具有研究地图、分析士

① 指驻扎在布良斯克和奥廖尔的步兵第4师部队1919年3月12~14日发生的暴动。该师人员中农民占多数。

② 指1919年3月10~12日阿斯特拉罕发生的反革命叛乱，起因是对居民和红军战士的口粮进行了限制。

气的经验、知识和本领。

我应该说，侦察工作的水平低得不值一提。有时只好去找党、找中央委员会，请求派来工作人员担当这一工作，因为在夏秋两季还没有使用专家。有些侦察员倒是很乐意干，但是效果不佳，因为他们不会提供情报。这影响着军队的工作。

要知道我们的侦察工作就是眼睛。我们探听到敌军的秘密意图、供应情况、通讯情况、军队调动情况，这就使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将受到攻击，为此必须调兵遣将。我们往往缺少这个环节。只是直至最近才在某些战线上安排好这项工作。为此也必须有一批能人。似乎只有深入敌人内部，哪怕是到敖德萨也好，亲眼看到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把情况报告我们。然而，一切都报告得非常笨拙，传递得非常笨拙，我们从中无法做出任何结论。

不论哪个方面——供应、技术装备、通信、炮兵、浮桥和桥梁的修建——到处都需要专家，可是我们却缺少专家。我们在现在这种全面紧张、仅有极少的专家的条件下，不能保证做好我们军队的供应工作，从而使军队上升到一个高水平。这一结论是从我们各个战线上的形势以及近来出现的失利中得出的。

当然，这些失利，比如我们在南方战线上遭受的失利，完全是暂时性的。这里有一些严重的失利，似乎我们要让出沃罗涅日。敌人到了离沃罗涅日几俄里的地方。但是，我们集中兵力，调去了我们所有的优秀同志，调去了预备队、专家，把事事安排得有条不紊，组织得井然有序。我们终于把似乎要大获全胜而头脑发热的克拉斯诺夫军队一举击溃，彻底全歼。

我认为，而且相信总司令部也对此有十分把握，西方战线和东方战线也会取得同样的胜利。一批批新编的部队、新调来的部队等源源不断的兵力，不仅一定能顶住敌人从东西两个方向的进逼，而

且能再次将他们赶过乌拉尔。

这个结论也是纵观我们的整个形势而得出的。现在，这在北线也显而易见。我们也曾从那里被迫撤退，但是现在已转入进攻。在这里，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的瓦解也多多少少起了作用。阿尔汉格尔斯克情况如何，我们不大清楚，因为最近两三天我们遇到了抵抗。可能这是为了调走他们的兵力或者为了向我们进犯，但是我们终于初步尝到了胜果。我们的队伍不顾低达零下35度的严寒〔发动进攻〕。最近有许多人冻死，但是这挡不住红军战士，他们正在奋勇前进。

这一事实完全可以说明，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说，红军定会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再次向前挺进。

主席：同志们，现在开始就关于我们委员会的问题进行讨论。负责军事问题的小组请求主席团允许他们发言。在这之后，主席团建议我们让多数派三人和少数派三人发言，以便让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两位报告人致结束语。有人反对吗？有〔其他〕建议吗？现在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作关于小组工作的报告。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们，在我们小组登记的有97人，但是实际上出席人数〔要〕少得多。在投票时有表决权的有57人。最初，我们接着昨天在这里对已经开始的问题的讨论，再展开辩论，虽然曾有人建议不进行任何辩论，而只是着手讨论同志们提出的建议。但是，因为全体会议上这些报告还不曾讨论过，我们认为必须否决那条建议。对这些报告讨论得相当认真，发言的既有这些提纲的赞成者，又有反对者，总共有20人就这一问题发了言。

然后，我们把应该将哪份提纲作为进一步讨论实际建议的基础这一问题提付表决。同志们持有不同意见，总的说来，根据这些提纲中拟定的两种方针分成两派。我们表决时，参加表决的57人中有37人赞成把斯米尔诺夫同志宣读的提纲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20人赞成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曾在这里为之辩护的那些论点。

在我们决定把这份提纲作为基础之后，开始对它逐条讨论。前两条在全体与会者参加情况下以36票的多数通过。前面两条通过以后，有一位赞成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观点的同志建议不赞成小组多数派意见的同志退出会议去进行单独商议。这是采取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做法。处于少数的同志们不通过主席，就说：咱们去单独商量一下。军事小组对这些同志的做法感到很气愤，但通过讨论决定索性休息一下，让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们自己去随便碰碰头。

休息了一个小时。这批同志正好用这一小时讨论他们的问题，碰碰头。然后，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代表这部分同志声明，因为在我们委员会里存在原则性分歧，又因为问题已经多多少少弄清楚了，所以他们——20个人——认为小组工作已经结束，建议立即停止〔工作〕，说完就从军事组退席了。〔他声称〕我们只讨论了提纲的第二条，下面不再讨论。我们不得不等待一个小时，等他们讨论完。在这之后他们竟退出了会场，不参加对问题的下一步讨论。我提出了抗议，我们把对这些同志的非同志式行为的抗议交给了主席团。

无论在军事小组中存在何种分歧，无论在存在不同意见的哪个小组和哪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如果这个小组或者这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不赞成多数派的观点，立即就退出会场，认为没有必要对某种建议提出修改意见并对问题加以讨论，这种做法都是不能允许的。

这些同志退席后，军事小组继续开会，原则上通过了斯米尔诺夫同志在这里宣读的那份提纲，作了几点修改，然后散会。我应该稍微谈谈这几处修改。这里有几点修改并没有很重要的意义，多少带些文字润色的性质。但是也有一些修改至关重要。

例如，第10条中原来这样说：“尽管一长指挥优于集体指挥，直至建立起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完全可靠的指挥人员队伍以前，必须授予共和国、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权和指挥权。”这一条被军事小组的多数否决，竟添了另外一条来取代这一条。增添的内容如下：授予政治委员在作战问题以外所有问题上（即在作战问题以外的组建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表决权。

然后对第7条作了补充，补充的内容是：以确实可靠的工农分子充实指挥人员训练班；不仅在前线设立党员占多数的专门委员会，而且在后方的兵役委员会下设委员会，登记红军部队中的所有可以送往这些训练班的优秀分子。

随后又对第11条作了补充，内容是：必须彻底改变军事书刊检查的状况。这里有个同志宣读了一份文件，文件说列宁同志受到了军事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他给农民古洛夫的复信受到检查，而军事书刊检查员没想到会宣读这封信。因为检查条例已经被克雷连柯^①同志批得一无是处，说那是官僚作品的样板，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从过去那一套照搬进来^②。这一点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来，所以我认为，检查条例或者章程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修订。我们长期隐瞒彼尔姆陷落这一事实，仿佛敌人就不会知道这件事似的。我们这里很长时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结果荒诞不经的谣言不胫而走。

这里有一系列的因素和情况，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其中，我恰恰可以指出，现在大家正在谈论的东方战线上的第3集团军的问

^① 克雷连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85~1938），十月革命后历任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最高总司令等职。

^② 原文如此。

题，可以指出斯大林同志和捷尔任斯基同志调查组现在提到的关于彼尔姆陷落的一系列原因^①。他们在向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②中，所描述的彼尔姆陷落的情形，与阿拉洛夫同志对我们描述得完全不同。报告中有大批珍贵的资料。假如我们对全体代表说明，失败挫折原因何在，我们失败的情况究竟如何，那么，这些失败肯定就会减少许多。

其余所作的修改，我认为不太重要，我想就不必宣读了。我们将逐条讨论这些观点。如果我们将采纳它们，那时可以再谈这些修改意见。

同志们，我只想再补充以下一点。我坚信，假如整个军事小组对所有这些观点全面详细地进行讨论，假如这一个小时我们不是花在一小部分同志单独商量上，那么，工作本来会更圆满一些。也许我们就会提出一系列宝贵建议，而这些建议也许恰恰就是那些离开会场的同志提出来的。如果说我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只做了这点工作，那么过错不在我们。军事小组昨天始终都在开会，从晚间6点开始，几乎开到晚间11点。今天又是这样，从10点几乎开到6点。差一刻6点我们才散会。军事小组工作很认真，努力弄清提纲的缺点，能够做到的一切，我们都做到了。

主席：请萨法罗夫同志发言。

萨法罗夫：我们面对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问题主要引起了军队代表的兴趣〔这便是明证〕。

-
- ① 高尔察克的部队于1918年12月25日攻占了彼尔姆。俄共（布）中央对乌拉尔州党委会关于第3集团军失利原因的信进行研究后，决定成立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组成的党的调查组。该调查组于1919年1月初到达第3集团军。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向1919年2月5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会议报告了调查结果。
- ② 报告发表时所用的标题是《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关于1918年12月彼尔姆陷落原因给列宁同志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76～199页）。

在这些代表中，恰恰大多数是明确赞成斯米尔诺夫同志与其他一些同志一起提出的那些提纲的观点，这一情况，这一事实表明，在军事建设，红军建设方面，情况并不像我们某些同志有时描述得那么顺利。

在代表大会刚刚开幕的时候，有人作过某种暗示，说我们党内存在某种反对派，说反对派曾毫不掩饰自己的方针，好像他们赞成选举指挥人员，屏弃军事专家，认为仅凭健全的共产主义理性就可以战斗，如此等等。不需要装甲列车，不需要大炮——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列宁写的纲领。这就足够了！

对方这种描述手法实在轻巧，又像宇宙一样陈旧和古老。采用这种方法，对于我们的对方来说善辩者的任务就大为简化了。遗憾的是，情况绝非如此。少数派中的一些同志在军事小组指出，把我们分成两派的是原则性分歧。我不怀疑，下一步那些观点的代表人物会摆出证据，说他们是作为对托洛茨基的提纲的补充而制定的提纲，与我们的提纲几乎完全没有区别，或者确切些说，我们的提纲与他们的提纲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寻找在利用军事专家问题、红军的基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的根据，这种企图是没有指望的。军事小组的这个少数派作为补充而通过的提纲进一步表明，恰恰是我们的提纲，军事小组的多数派的提纲的相当大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被这个少数派作为他们自己的提纲接受并采纳了。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同志们并没有认为应该有始有终地结束军事小组的工作，却认为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即我们存在着一条原则性分歧的鸿沟，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任何同志式的谈话都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他的报告里说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中，主要的不是关于军事专家本身的问题，——这完全正确，——而是我们这里存在的与红军建设有关的

小资产阶级危险问题。毫无疑问，我们不得不在红军中与之打交道的大多数人，都与小农所有制有关。这个大多数属于所谓中农。这个大多数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这个大多数在政治上是落后的，等等。为了弄清本质特征和分歧所在，需要对过去略加追溯。

我们军队建设的第一个时期是游击时期，志愿兵时期。这是有许多满怀革命热情的杰出革命战士的时期。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时期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没有打下军事组织的初步基础。战斗命令由赤卫队员和红军战士进行讨论，却被党的会议和集体废除，如此等等。如果我们对那个时期分析一下，那么，当时我们首先要办的主要事情恰恰应该是建立军事组织的初步基础，建立指挥权力。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队伍，但是不曾有过组建规范、组织严密、供应充足的军队。这是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有许多志愿兵。他们政治觉悟高，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他们满怀革命热忱，是政治上先进的群众。

当我们转入全民动员以后，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没有全民动员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军队。于是，立即在我们面前出现了经过某些变化、有了某些不同形式而本质依然如故的军队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整个政策中普遍存在，这就是有关对这个中农本身进行政治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最初关心建立军队指挥系统，打下军队组织的初步基础的事，出于惰性我们参照旧军队建立并照搬了许多东西。这是由周围环境决定的，这是由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决定的。但是，这种有害的惰性在我们这里有所发展，我们在这方面开始照搬旧时代的国家机器了。

同志们，问题是我们必然立即遇到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不是作为逻辑上的矛盾存在于纸上，而是存在于实际中，也只有在实际过程中才能彻底解决。我们坚信，我们不能建立统一的指挥权力，不能建立统一的指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没有他们自己的专家，

或者即使有，人数也极其有限。军事技术、军事组织的要求，战争的要求，迫使我们利用军事专家。于是我们只好建立某种以政治委员为一方，以军事专家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双重指挥权力。在这方面，白军的情形完全不同。某一个级别的军官借助棍棒纪律使士兵群众服从自己，他们用棍棒、马鞭、通条驯服士兵。他们没有这种双重权力。但是我们这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种权力，因为军队的基本政治骨干仅仅是具有一定国内战争经验、接受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

当我们不得不将我们生气勃勃的革命与军事组织相提并论的时候，这里就有个显然的矛盾。需要考虑到军事组织的这些形式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要求，而且需要说，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军事政策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们的事情是依赖惰性前进的。虽然许多共产党员曾致力于红军建设，但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的政治委员实际上却完全与党失去联系。在军事小组里有人说，军事专家糟得很。当时没有提出问题：那政治委员好一些吗？是啊，政治委员同样糟得很。但是，党从这里做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需要找到有计划地在军队中，在这个军队的组织建设中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明确办法。需要找到将此事付诸实施的明确办法，根据这次尝试我们可以说，这个办法还没找到。

是的，这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一些杰出的理论原则，但这些原则对这个办法只字未提。那里谈了许多警察系统。但是，“太阳升起之前，露水把眼睛腌得难受。”在我们仅仅停留在美好的意愿上的时候，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党在军队中离群索居的艰难处境。所以我们提出关于在红军中建立真正的党的组织联系的问题。

同志们，毫无疑问，……提出的这些原则……，毫无疑问，维护我们提纲的这个观点绝不是否认对军事专家的一切利用，绝不是

说不需要军事专家。

根据现在我所说的这些话，你们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当我谈到关于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时，我想起了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一段话，他轻描淡写地就把这个问题对付过去了。他说；有一个时期，铁路工人说铁路属于铁路工人。有一个时期，报务员说，电报局属于报务员。现在非常糟糕的是，共产党说，共产党属于世界军队。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党的工团主义。我看，这个观点绝对行不通。需要使红军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客观工具，需要使红军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要使它成为政治教育的学校，一个组织上的学校，成为对被我们吸收到军队中来的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的场所。

我们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借助于从旧时代搬过来的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新措施，无法对付这些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在阶级关系方面不同我们站在一边的人。同志们一直在说，需要小心对待中农，与中农商量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办法。但是，当我们谈到红军问题时，我们就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在红军问题上我们认为，只要承认军事专家存在，只要承认军事专家绝对宝贵，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这样做问题还没有解决。问题需要解决。关于党的领导权的问题，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根本问题，即需要如何组织、安排这些政治委员，如何与他们保持联系，等等。

列宁同志说过，我们在每个专家身旁安排一名政治委员^①。好极了！但是，需要让分散到个别的连、团、师里的政治委员通过某种方式与您，列宁同志保持联系，保持某种党的联系。可是，至今

① 指列宁1919年3月19日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37~157页）。

为止这种组织形式恰恰还根本没有找到。

我们提的建议清楚而且明确。我不再谈组建部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在两个提纲里看法相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可以说不言而喻。因为这里存在分歧，对这个问题无须再谈。

下面我们转入党对军事专家进行实际的政治监督问题。这种监督不是停留在事情的形式方面，而是建立在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内部组织团结上。有人怀疑我们建议让党支部进行监督，建议召开大会来讨论战斗命令。为了彻底打消形形色色的怀疑，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有组织纪律性的党的集中监督。需要把我们创造、建立的那个机构置于党的监督之下。需要与党有直接的联系，使联系不仅存在于军队里有许多党员工作人员这个意义上，而且使〔联系〕十分明确，要有确定的形式。我们提出这种联系，这种联系的形式，强调必须按照有关精神建立政治机关，因为我们确定政治机关的基层组织，而另一方面，我们把它们的全部工作都直接统一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

同志们，谈下面一些问题的将是持那个观点的那些同志。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本问题，即在军队中建立党的领导权，目的是建设好军队，把军队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它。（鼓掌）

主席：请奥库洛夫同志发言。

奥库洛夫：同志们，我们的时间都花在说得天花乱坠而内容空洞无物的关于军事专家的清谈上了。乍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分歧。乍看上去似乎谁都〔不〕想以任何方式限制和贬低在军队中利用这种专家的劳动。我说这是空洞无物的清谈，是因为我们共产党的预备力量已经消耗殆尽。我们穷其所有，拿出全部军官人才，仅能满足各内地军区需要的44%。如果我们再加上各个战线尚未满足的要求，那么在这方面情况还要糟糕。

前线上缺乏指挥人员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士兵们不是上战场，而是赴刑场。在后方这意味着缺乏组建军队的骨干，缺乏训练机构。有了这种机构才能组成预备队，有了预备队各个战线上的军队才没有后顾之忧。因为缺乏训练机构也就没有预备队，于是对我们来说极其宝贵的前线广大共产主义干部流血牺牲，而无望得到后方的援军。

我们不要再一味沉溺于幻想了。只有在最广泛、最充分和最理智地利用各种专家的劳动的前提下，我们的军队才能作为一支正规军而存在。我们都同意，这种劳动应该受到我们所能掌握的一切手段的监督。但是，我们应该同意，不管怎样摆布，共产党员甚至不能满足军队现有要求的百分之一。关于军事专家已经说得够了。我不打算再赘述。我只想指出军事专家在新编部队一事上的功绩。有了这些新编部队才得以占领乌克兰部分地区，是这些新编部队正在开赴南方战线，是这些新编部队遏制了敌军在东线的猛攻。他们完成了军事专家意图的十分之九。所以我要说，企图抱住过时的游击形式不放，就会导致一派灾难景象。我可以引证^① 10个师，因为他们的崩溃正是有人企图不经法定机关而去组建部队的后果。我知道甚至还有这样的部队，还没有开到前线，士兵就跳下火车四散奔逃了。同志们，这些后果，在所有稍微客观一点儿展望一下前景的人面前，这些军事工作的后果都不能不受到毫不含糊的谴责。

同志们，与军事专家问题有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利用他们的问题。有人在这里不只一次试图证明，军事专家是一个阶级。这样提出问题当然是轻率得令人无法容忍。

军事专家是在军队服役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阶层。它的全部命运的一部分以总的政治形势的动荡为转移。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旧时所

^① 原文如此。

谓旧的军官阶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阶层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这个阶层分为蔑视普通军人的近卫军军人、蔑视某些龙骑兵部队的哥萨克、羡慕骑兵的最不幸的普通军人以及其他部分。总之，那个对我们反复讲述的神话，说什么军官们天生是一帮白卫分子，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严肃的论据为依据的神话，它不能为我们亲身的实践所证实。现在正在发生的对军官们的同化进行得不够快。我应该说，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同志们的错误行动使这一同化经常受到阻遏。举出下面一个例子就足够了：经常有整师整师全体军官被捕的现象，而且这些逮捕没有任何理由。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关押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只好释放，因为连任何犯罪的迹象都提不出来。

我们都是人，也都懂得，在这种心理状况下这些人是很难与我们同化的。我可以举出莫斯科对军官们的征召，在那种环境中进行的那次征召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我可以举出察里津那只著名的驳船^①，那只船干了许多使同化军事专家难以实现的事情。

然而这种同化的征兆就在眼前。我可以引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收到的三封电报。电报说，无论哪次暴动都有士兵群众参加。有两次甚至有共产党基层组织参加。所有这些电报都说，这些暴动没有骨干军事专家参加。对这一事实我可以详加说明。这是由我们的政治委员同志们签署的。有一封电报是由施略普尼柯夫^②签署的。

这里对中央的部分活动提出了指责。可以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是由于中央的错误，军队才在彼尔姆或察里津城下崩溃的。不对。这些严重病症的总病根就是党自身内部的沉疴。这种沉疴就叫做我

① 指当时停泊在伏尔加河上的一艘驳船，这艘驳船被察里津肃反委员会用作关押被捕者的监狱。

②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1885～1937），1901年入党。1918年12月至1919年2月任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行我素，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完全不愿考虑前线和后方的任何情况。

同志们，我曾经十分深入地在—一个集团军^①里工作过。领导集团军的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指挥人员。为了打破某些人也许会有的一些幻想，我打算谈谈这次经历的结果。这个集团军中极其严重的崩溃情况如何，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看出……（宣读）机枪队政治委员 11 月 18 日报告……（宣读）如果你们稍微详细研究一下这些事实，你们就会明白，只有瘫痪了的指挥部才会从自己的指挥中心给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部队布置任务。

同志们，这个集团军与敌军的力量对比如下：集团军有 76000 名士兵，50000 名步兵和骑兵，而敌军有 26000 名士兵；我们的集团军有 1000 挺机关枪，而敌军有 100 挺。可是我们却在原地踏步，流血牺牲，完全不能前进，因为我行我素使军队丧失了战斗能力。

似乎与此同时，政治方面的一切工作会做得十分出色吧，我们的革命指挥官正是擅长在那个领域里解决问题的呀。但是并无此事。我给你们引证几个文件：“钢师”政治委员报告，师中施行肉刑——用马鞭抽打；卡梅申第 1 师政治委员 11 月 20 日报告，师中施行掌嘴；以托洛茨基命名的革命团队政治委员殴打红军战士；军事监督长官 11 月 27 日报告，卡梅申师设立了临时野战法庭，法庭在三种情况下判处肉刑，而师长发布了这条命令。这意味着，肉刑在共产党军队中是合法制度，既然发布了正式命令，这件事谁也用不着向谁隐瞒。

同志们，如果我们来看看军队中的经济状况，你们就会看到同

^① 指防守察里津的南方面军第 10 集团军，奥库洛夫 1918 年 10 月 26 日至 12 月 26 日任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该集团军司令为克·叶·伏罗希洛夫，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有谢·康·米宁。当时斯大林也在察里津。

样的光怪陆离的幻象。我以中央委员会保存的数字和文件为依据。有一个师，“钢师”，名册上有8400人。而从经济管理局的资料来看，这个师领取了20000人的补给品。与此同时，还领取了灯笼裤22000条，军便服20000件，长衬裤……（宣读）

你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主宰这个集团军的是怎样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无以复加的经济混乱。大体上说，这个集团军中的供应情况如下：步兵和骑兵45000人，领取119000人的给养，实际上只有45000名战士，却要养活150000个懒汉。这个集团军递交的年度报告表上申请领取10亿卢布，而4个月领取32300万卢布。这将近从中央领到的现成补给品的五分之四。

同志们，有人曾在这里说，阿拉洛夫同志不正确地描述了彼尔姆的惨剧。请允许我宣读他依据的文件中的一段话。（宣读）我是一字不差地念给你们听的。

有人喊道：什么文件？

奥库洛夫：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签署的文件。

有人喊道：是谁指挥集团军？

奥库洛夫：拉舍维奇同志，共产党员。

同志们，如果实事求是地谈论集团军这种经济混乱的状况，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那样起劲地维护那些造成这些经济问题的专家。

同志们，察里津市及其四郊遍地倒着死马。我们的骑兵和炮兵丧失了战斗力，辎重不复存在。即使战争的幸运之神对我们有所青睐，我们能充分利用上天赐给我们的幸运机缘吗？我不准备多谈糟糕透顶的救护情况、交通情况、使全体居民对我们十分反感的军纪败坏、抢掠成风，但是只想说，这种我行我素的政策已经泛滥到更为广泛的领域。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没领教过察里津我行我素政策那种怀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态度。没有一个人不被我们搞得伤透脑筋。

因此，群众对我们深恶痛绝。只要告诉你们这一点就够了：有一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①解释说，这个委员会之所以〔称作〕革命的，就是因为它有权以革命的方式废除中央的所有法律。

如果我们赞成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应该停止一切战争，因为军队有力量就在于它有统一的意志，而不是在于这种各行其是观点。

请允许我向你们宣读一位旅长就十分重大的问题呈交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宣读）有谁多少懂了些什么吗？而我虽然急切地想弄懂，却根本一点也没懂。我向你们担保，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什么也不会弄懂。请想像一下，在打仗的时候，他要发布书面命令，人们要去执行的。你们看到了，所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最起码的知识问题。

同志们，我就要结束发言了。同志们，我深信，在我们一昼夜间要工作 18 小时的时候，军事机关的缺点最使我们寝食不安。而军事部门也像其他所有部门一样，正在经历着一场悲剧。

我们缺人哪！昨天在小组会上是谁向我们显摆说，有前所未有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如果你们有这些干部，为什么在前线要人时，你们却给我们派来头一天才参军的几乎不识字的毛孩子？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你们为什么不帮助建设一支对所做的事情抱有深挚信念的军队呢？为什么你们只给我们送来这种瓦解我们前线军队的援助呢？

无论人们在前方多么艰难困苦，但是他们紧握钢枪，等待你们后方的补充人员，你们这里的干部。这些干部似乎曾在这里做政治工作，但是他们却使前线瓦解。在你们如此恶狠狠地批评军事工作确实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之前，请你们先让从你们这里到我们那里

^① 指谢·康·米宁。

去的那些人高高兴兴地去，让人们在前线上等待每一趟军事列车时，不必考虑是否需要再安排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可靠部队，将这趟前去增援的军事列车上的人解除武装，枪毙20~30个人。如果这些问题将在后方得以解决，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们从阿拉洛夫的报告里看到，局势十分严峻，秋天以前的日子不会好过。需要谈论的不是集体指挥，而是铁的纪律。应该互相要求，并要求全党同志遵守这一纪律。

伏罗希洛夫：阿拉洛夫同志和奥库洛夫同志在他们的发言里指出了这种情况，就是由于在我们集团军里实行的那种制度，我们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随便举个例子，他们说，我们现在占领了乌克兰，是因为往那里派去了在军事专家领导下临时组建的部队。应该说，这里不是误解，而纯粹是歪曲真相。

这里有一些同志非常清楚，乌克兰是怎样占领的。占领乌克兰时不但没有任何专家，甚至还违背了中央的命令^①，违背命令并且冒着受到惩罚的危险。乌克兰是由两个起义的师^②整编而成的部队占领的，现在乌克兰还只有一个师和几个团，他们与军事专家、皮达可夫同志和其他人领导的那个师毫无区别，一点不差。为了解除嫌疑，我应该指出，我和那些与我观点相同的人一样，与我所属的那个集团一样，从来不曾坚持那种立场，似乎我们反对军事专家，不愿利用他们，而宁愿把他们关在驳船上。不是这样。我们还要继续说，我们知道，应该利用军事专家，但不是自己去做被军事专家利用的人。

① 伏罗希洛夫记错了。1918年11月11日人民委员会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十日内完成用于解放乌克兰的苏维埃部队的准备工作。红军在乌克兰的进攻于1918年11月15~17日开始。

② 指1918年9月由起义部队整编而成的乌克兰苏维埃第1师和第2师。

至于我们的同志们被人利用，我可以用文件证明这一点。这不是像奥库洛夫同志那样在这里败坏别人的名声，那些事还有待研究。这里有白卫分子们写的文件，他们领取共产党的数百万卢布去干他们的事。诚然，他们不是有意领取的，但原因在于现行的那个制度，在于军事专家。

同志们，请看这本杂志。名字叫《顿河之浪》，杂志里写的是红色察里津的事。是这样说的：“公历5月底我带着秘密使命来到察里津。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使命的时候，但是多亏了它我才有机会打入……”^①（宣读）

下面就谈到察里津发生的事情了：“……这样一来，从6月20日起，察里津，同时还有整个北高加索，就转归斯大林—朱加施维里管辖之下了……”（宣读）

遗憾的是，这里没有说领到了几百万。领到了900万。我们把这笔钱和这些被我们揭穿的先生们的小命一起抓到了手心里。这些给我们写文章的先生，是〔我〕和斯大林同志一起逮捕的。斯大林同志也在这里开会，他将发言不同意我的话。这些先生，关于他们的事我们报告了中央，这些先生过了不多久又露面了——一位担任南方面军副司令，另一位担任该方面军的长官，参谋长……

有些人喊道：说出姓名来。

伏罗希洛夫：这些先生是诺索维奇和科瓦列夫斯基^②，这些可

① 指白卫分子的周刊《顿河之浪》1919年2月3日第6期刊载的署名为切尔诺莫尔采夫的《红色察里津》一文。

② 前沙皇军队上校A.И. 诺索维奇从1918年5月起任北高加索军区参谋长，A.И. 科瓦列夫斯基从1918年7月起任该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二人均参与了由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领导的察里津反革命阴谋活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1918年8月10日诺索维奇和科瓦列夫斯基因涉嫌策划阴谋活动被逮捕，但后来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又被释放并进入南方面军司令部工作。1918年秋，诺索维奇投奔白卫军，科瓦列夫斯基则被枪决。

爱的伙伴中的第三个人现在还在指挥一个方面军^①。

在我们指出这一点时，任何人没有给我们做出任何回答。斯大林同志虽然是直接领导，也毫无办法，因为我们既然有军事专家，就是说，对这些本来就马马虎虎的家伙用不着尊重。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先生中的一位，那篇妙文的作者，带着我们共产党的一辆汽车和两名共产党的（也许是带引号的）司机逃跑了，显而易见，还带着比奥库洛夫同志的文件数量还要大得多的文件，还带着重要得多的文件径直投奔敌人去了。

我向中央递交了〔报告〕，要求立即逮捕科瓦列夫斯基和三个人之后，经过长时间奔走才落实了这件事。于是科瓦列夫斯基，即诺索维奇的伙伴，被枪毙了。这引起了某些高高在上的同志的不满。后来查明，科瓦列夫斯基有组织得相当不错的一伙人，他们不断地把所知道的一切情报传送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集团军的一些不顺遂以及所有那些失败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像〕阿拉洛夫说的，我们的侦察工作非常糟糕，那么，亲爱的同志们，敌人的侦察工作就做得很出色了。我们为此提供了一切方便，连细枝末节都要让敌人知道，因为坐在我们司令部里担任指挥职务的不是敌军的侦察员，而是敌军的长官。他们不仅能对我们的情况加以阐述，不仅能预先画出我们的行进路线，而且简直能调遣我们的千军万马，使我们撞到他们的枪口上去。等你们考虑到这一点，那时你们就会谨慎行事了。

我们老共产党员，不是昨天才入党的，我们懂得，在缺少专家

^① 指 A. E. 斯涅萨列夫。斯涅萨列夫（1865～1937）是旧军队中将，自愿参加了红军。1918年5月至9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军事领导人，1918年11月起任西方面军司令。

的情况下难以建设军队。但是请相信，我们的人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能向你们证实，把太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专家身上是不行的，哪怕只提出一条理由就足够了：这些专家是另外一种人。即使这是一些绝对诚实的人，他们也不理解现在正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军队里培养的那种士气，是帝国主义军队的士气。而指挥员不应仅仅是个只知打仗的指挥员，而应是他的部队的灵魂。为了领导群众，他应该与他们打成一片，深入其中。如果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指挥。所以你们，同志们，请思考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编部队的问题，你们也会为这个观点辩护的。

应该指出，我们的上层人物认定，不管怎么跟托洛茨基谈论这个问题，这件事非常微妙，非常特殊，我们只是应该跟着专家走。我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事先已经注定不理解了，那么我想，就很难去跟着你不理解的人走。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事先就有了答案：我们不理解军事工作。我们把如此重要的、十分严肃的事情委托给不与我们一心的人。而当前，我们由于条件，并不是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应该用最新技术进行战斗。最新技术曾是连绵不断的战线。在最近一次大战^①中，有上百万的军队卷入，为数众多的士兵由于连绵不断的战线，被迫一连数月、甚至一连数年蹲在战壕里。有人希望把这最新技术搬到我们的运动化的^②战争里来。现在我们为了进行这种战争，组建了每师有 52000 人的部队，而且对每一个战士来说，平均还有 2.25 个人不是战士，（而是）为部队服务的人。

你们可以想像一下，为了一位长官领导下的两千人的师，应当有多少各式各样的机关、各式各样的辅助单位为这一切服务哇。于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原文如此。

是我们这里的情形是，我们开始组建各种辅助部队、师部。而最后对于师本身、对于战斗组织本身、对于战斗核心，我们却没有时间了，因为暴风雨般的时代要求迅速组建部队。我们得到了成百上千的人，他们却不愿去作战，他们只起阻碍作用。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的同志们认定，这是个特殊问题，不属于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

我应该说，同志们，奥库洛夫同志在这里举出了许多令人叹服的证据，来说明共产党员们在如何指挥战斗。但是，奥库洛夫同志没有说最根本的东西。他没有说，在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察里津战线上，军队并不是由军事专家组建的。中央对这个集团军一连数月一直置之不理，只是斯大林同志偶然去那里，才使我们能够在那里干出斯大林同志说过的那些不合法的事情来。

我们被迫干过许多不合法的事情。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省、两个县，为的是能够在那里进行动员。我们在那里宣布建立一个省，为的是能够使集团军得到供应。我们曾经动员马匹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这一切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共产党员多么不善于做组织工作，而是为了不让顿河的反革命匪帮跟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哥萨克匪帮勾搭上。是为了能够拿下喀山和萨马拉。是为了把察里津变成让反革命浪潮撞得粉身碎骨的凡尔登。

奥库洛夫同志不知道也不曾提及这一点。他那时去是为了取缔、解散、消灭这个没有各式各样的军事专家也行的集团军。他没有说，这个集团军在5个月期间因死伤损失达6万人之多。关于这一点很少有谁知道，因为我们没工夫去唱高调、写文章。

不错，那里有许多纠纷，有许多混乱现象，没有把党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但是这位同志终究没有说，那里已经做了什么。我这里有几张今天才送来的照片，照的是一些装甲列车。这是我们在没有任何专家的情况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工程专家和军官们一

起造出来的。有 18 辆装甲车。这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有马队，骑兵，托洛茨基同志对骑兵作了番视察，与指挥员热烈地接了一阵子吻之后，声称：有人吓唬我们，说我们不能建立骑兵，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事情，过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没有见过。这是沙皇军队不曾有过的骑兵。这是事实——总数达 12000 人之多的骑兵，地地道道的骑兵。他没有说，现在在那条战线上，在驱逐了共产党员之后，在把专家运到那里之后，这些专家守住察里津归根到底不是用的调到那里去的部队，守住察里津的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建立的骑兵和部队。

有人在这里谈到，只要在南方战线加强组织工作，派军事专家到那里去，我们就能向前推进。而因为没有这么做，因为那里没有专家，我们就在原地踏步不前。但是，同志们，这意味着简直就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当我有一次有机会和伊里奇同志谈到这一点时，我说，为了击溃克拉斯诺夫的军队，我们应该拿下乌克兰，而拿下乌克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件事。乌克兰被暴动的烈火吞没了。克拉斯诺夫先于所有人考虑到这一点，退到他现在作战的那条战线上去了。阿拉洛夫同志说，他开始拿不定主意了。但是，他退走是因为为他敞开了侧面和后方，于是他不想再等了。可我们要是快点出兵，要是我们（不）因为我们的同志攻占了别尔哥罗德而把他们投入监狱，或者至少不用监狱威胁他们，也许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北高加索，正从那里往外运石油呢。

不应该像旧军事专家那样说：他们的军队好，我们的军队不好。需要考虑到军事形势，需要考虑到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而我们，谢天谢地，生活在向社会主义转折的关头，生活在最紧要的关头，生活在调动在这场革命中起作用的一切因素的关头。说到战争，需要注意到战争进行的环境和条件，这样才能懂得在发生什么事情。每一次胜利和失败都与此密切相关。而当我们感到十分困难

的时候，这往往是因为我们被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农民和反革命哥萨克包围了的缘故。

最后，我应该说，在奥库洛夫同志讲的话里，实情微乎其微。只有一点是实情，那就是奥库洛夫同志来察里津战线后，为真正帮助我们那些不像无足轻重的中农、而恰恰是无产阶级分子的红军战士做得很少，为彻底解散、取缔、摧毁集团军做得很多。

斯大林^①：同志们，在进入正题之前，为了公正起见，我想指出奥库洛夫同志关于察里津的说法中的某些不实之处。他说的那些毛病和那种杂乱无章的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是他忘了最主要的：这个集团军原地踏步两个月，是因为在这两个月期间，由于中央的供应机关做事没有章法，使局势没有好转。奥库洛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人民委员会和其他同志都知道这一点。我说这事，是为了洗刷奥库洛夫同志强加于集团军的耻辱。集团军好歹守住了察里津。察里津现在在克拉斯诺夫的追随者那里被称作迦太基，至今还在前线上的同志们当中以红色察里津而闻名……（声音不清）当然，需要批评任何一个有毛病的集团军。

然后，我应该对奥库洛夫同志有关彼尔姆战线上的惨剧原因的第二个说法作一些修正。〔他说的那些〕是不正确的。我没有说过这事，捷尔任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里也〔没有〕说过，彼尔姆失陷的主要原因是司令部杂乱无章和指挥无方。指挥无方，管理不善，集团军司令部不善于指导各集团军的行动。但是主要原因不是这个，而是别的：开赴前线的补充作战人员不中用。

现在转入正题。这里所谈到的一切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俄国要不要建立一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全部问题都在于此。半年前或者8个月前，我们有了一支新的军队。这是在沙皇的旧军队瓦

^① 斯大林的讲话摘要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21～222页。

解之后建立的一支志愿军，它组织得不好，实行集体管理和指挥，并不总是服从命令。那正是协约国的攻势开始比较明朗的时期。军队的成员即使不完全是工人，至少主要是工人。

由于缺乏纪律，由于缺乏旧时志愿军的严整性，由于命令得不到执行，由于军队管理中的混乱状态，我们屡遭败绩。事情发展到敌人从我们手里夺取了喀山、克拉斯诺夫从南线展开进攻的地步。在西线曾发生两个帝国主义集团更为危险的战争。事实说明，组织得不好、纪律性很差的志愿军经不起考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如果不建立另一支军队，一支自觉遵守纪律、有组织得很好的政治部门、一旦接到命令就能够奋起杀敌的正规军，就不能保卫我们的共和国。曾经面临这项任务，不论怎么说，总算完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使我们的决定，中央关于必须和必然建立一支纪律严明、服从命令的正规军的决定付诸实施。这个时期自中央宣布的动员并吸收几乎所有人服兵役之时开始。这样一来，军队的状况就改变了。如果说志愿军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军队人数更多而且应该更有计划性，变成了一支工农军队，主要是一支农民军队。

所以现在全部问题在于，使志愿军时期我们不管怎么说已经具备的自觉纪律再加上铁的纪律。

我必须说，构成我们军队的大多数的那些非工人分子——农民，他们是不会为社会主义打仗的，是不会的！他们不想自愿去打仗。各个战线上的许多事实都说明这一点。后方和前线的许多次暴动，各个战线上的许多次闹事都证明，构成我们军队的大多数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想自愿去为共产主义打仗。

我请你们注意：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迫使这些分子去战斗，不仅在后方，而且在前线跟随无产阶级前进，迫使他们去和帝国主义战斗。就在这个把武装农民团结在无产者周围的过程中，同是必

须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惟一能够保卫国家的正规军。问题就是如此。

而如果必须从各个方面向帝国主义确定^①进攻，那么，现在进攻正是从南线、东线、北线和西线全面展开。在西线已经知道，阿拉洛夫同志讲过这点，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从芬兰开始，经过德国、经过波兰、加里西亚和罗马尼亚，他们都集中在兴登堡^②麾下。这几支军队不是游击队，而且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所以毫无疑问，可以与这样的军队抗衡的，只能是纪律严明、经过考验的军队，同时又是有觉悟的、有高水平的政治部门的、一接到命令能立即投入战斗的军队。据我理解，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我们才能保卫共和国，反之则不能。

所提出的两个提纲草案，当然都涉及了这些根本问题：专家问题、我们的后方新编部队的缺点问题、各集团军的管理问题、供应问题和指挥方法——一长指挥还是集体指挥——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各自独立存在的问题，而最〔重要的〕仅仅〔在于〕，我们或者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的工农（主要是农民）的军队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遭到毁灭。

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初步方案包含着进行各种尝试，不错，这些尝试是隐蔽的，不大明显的。但对我来说是明显的，所有这些尝试是为了破坏纪律，让农民分子轻松，妨碍将他们约束在一个统一的、有纪律的整体中。同时，这个方案以及大量补充说明谈到吸收专家。问题是不是谈到利用，而是谈到吸收。关于吸收专家的问题，这是个自然而然暴露出来的问题。这是事实，关于指挥的问题

① 原文如此。

② 兴登堡，保尔（1847—1934），德国军事和国务活动家，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任德军东线司令和总参谋长。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组织者之一。

带有大量补充说明，还有，同志们对解决得不彻底的几个方面不满意。有一件事我们不应该加以掩饰，这就是，我们应该守纪律。而这些同志以各种形式攻击中央的军事政策，因为中央要求建立正规军，要求所有人——政治委员、专家、构成军队的各个阶层——都执行严格的纪律。纪律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建立它，我们应该用它约束我们军队的农民分子，从而组织好一支能够与敌人抗衡的正规军。

在各个战线工作的同志们 [知道]，虽然有关于只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服兵役的法令^①，但实际上在南方战线和东部地区军队是由原白卫分子整编而成的。调查^②证明，组建总部^③在吸收剥削者服兵役，突然发现团长是个交纳 16000~20000 革命税的人，也就是说，干脆是个富农。这种缺点应该改正。

在军队的教育工作中也有缺点。这是在工农军队中制定纪律后的主要问题。政治教育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我们在乌克兰获胜，那么，主要是因为有着极其高涨的革命热情。军队中的政治教育具有巨大意义。我们应该提出改组或取消全俄政治委员局的问题。必须使部队在后方和前线都受到革命精神教育，必须努力建立起一支准备在任何时刻投入战斗的正规军。

至于具体提案，关于这一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讲得十分坦率，而且一清二楚。我提议在提纲之后通过具体提案，作为中央总政策的必然结果。

戈洛晓金：在我们军事机关正式代表与中央委员斯大林同志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斯大林同志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不过在这方

① 指人民委员会 1918 年 6 月 11 日颁布的《关于动员伏尔加河沿岸军区、乌拉尔军区和西西伯利亚军区各县的工人和农民服兵役》的法令。

② 指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彼尔姆失陷原因调查委员会进行的调查。

③ 指全俄总参谋部动员管理局。

面应当解决这个问题。奥库洛夫同志提出了问题：什么人好——共产党员还是专家？什么人叛变的多？什么人在前线上表现不好？假如我们采取这个办法，我们就会给你们举出大批大批的例子，我们当中每个人都会举出数百个军事专家叛变、怠工的例子。但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办法，不应该采取这个办法，因为这什么都不能解决。我们认为，为了创建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为了使这支军队取得胜利，〔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用叛变的代价、用我们上千名共产党员牺牲的代价去使它巩固，而只要取得胜利并创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就行了。所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应该怎样对待中农？怎样吸收这数十万中农，迫使他们为共产主义而战？用什么方法去组编他们？同志们，我认为，所有就这个问题登记发言的64个人都证明，这是个有代表性的现象，在代表大会议程上，不曾有任何一个问题有这么多人登记发言。在代表大会议程上，不曾对任何一个问题有过这么激烈的辩论，不曾采取我们现在的办法来彻底弄出个所以然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果代表大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在各个战线上军队就完全无法作战。

而现在，同志们，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说：我们有什么可以遵循的呢，难道就是这个条令^①？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小事，说条令可以修改，说这是错误，说那是疏忽大意，说问题不在这里。条令仅仅是近期整个军事政策的反映，我们根本不因中央委员会在军事问题上的政策而对它进行指责。我们指责的是，它的政策在军事机关得不到贯彻。我们指责中央委员会的是，它放手不管军队的组织，我们提出我们的草案就是想使军队的组织回到中央委员会手中，使共产主义政策自始至终深入贯彻到红军的所有组织中去。

^①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11月29日批准的内务条令。

这个条令本身糟得很，不是由于条令不仅能使军队秩序井然，而且也能使军队杂乱无章。糟得很是由于条令出台的过程。条令是在四个月内出台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军事政策的整个体系、整个结构、整个路线。人们制定这个条令的时候，十分清楚，在一年当中，我们有在军队各个战线上、在兵役委员会中工作的相当内行的、知名的、年老的工作人员，有在国内战争中在组建红军方面积累了经验的人。然而还是恰恰没有考虑这种国内战争的经验，应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红军的组建经验。糟糕的就是，这个条令散发着旧时代的味道。其表现是军事专家正在利用我们。军事专家不了解红军、国内战争，甚至没有帝国主义战争的阅历。在战争期间应该屏弃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组建过有战斗力的部队。全部问题就在于此。

如果我们问，应该怎样组建我们的部队，使之有战斗力，我们说：我们要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各式各样的措施，但目的是使中农为社会主义而战斗。这里不仅需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采取种种强制手段，还需要采取种种教育措施。请看看这个条令。它为政治工作提供答案了吗？完全没有。这里说，规定了额外的两个小时，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和教授手艺。这毫无用处。要知道全部政治工作都脱离了我们的控制，因为它是由办公室进行的，因为党的工作是由官僚们进行的，就是通过我们代表大会四周这些留声机进行的。这些留声机就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工具。我们蜕化成了什么样子，这是最好的、十分恰当的说明。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按照它们的旨意来回乱跑。

军事专家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们有什么本事，而在于他们会利用我们，他们会迫使我们按他们的指挥棒行事。这就是军事专家的危险所在。我们将购买他们的知识，但是要使其为我所用，使我们能创建自己的军队。这正是创建红军问题的根本所在，为此，需要考虑到国内战争的全部经验。要考虑到并且要弄懂。而我敢肯定，这里有人甚

至不希望这样，甚至听都不愿听，他们竭力说：一切都顺利。

有人喊道：谁这样说？

戈洛晓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这样说，在这里发言和在小组里发言的时候，奥库洛夫这样说过，索柯里尼柯夫也这样说过。但是如果仔细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能说些什么，那么你们也会说，并非一切都顺利。斯大林能正确地观察问题，他说过：有缺点，需要改正。请指出削弱我们战斗力的缺点吧。我们拥护一切增强我们战斗力的措施。同志们，要是我们可以批评我们军事机关的每一个个别部门、批评我们的指挥部门、我们的组建部门、我们的管理部门，那就好了。

我要指出指挥问题。阿拉洛夫同志说，我们必须要有集中的管理。但是，同志们，我们会有集中的管理，会集中共和国的全部力量去管理和指挥吗？我肯定说，不会的。我太了解我们的方面军和我们的集团军了，我肯定说，不可能有这种事。

奥库洛夫同志承认，他不了解第9和第10集团军，他不了解第3集团军。第3集团军过去和现在能够支持，不是因为军中有公认的精锐部队。它能够支持，靠的只是州党委动员的那些部队。全靠这些部队，第3集团军、米阿斯战线和秋明方向才得以支持。可是这段时间却放弃了整个西伯利亚、乌法、萨马拉。当我们在叶卡捷琳堡宣布对乌拉尔工人进行革命动员的时候，建立了一支由阿尔泰工人组成的7000人的基干部队，其中只有20个人留下来了。托洛茨基同志却在报纸上问道：让他们说说，他们有过什么样的团队^①？就是说，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不了解第3集团军。否则他

^①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8年11月29日（第59号）刊载的与托洛茨基的谈话，题为《关于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在谈话中指责乌拉尔共产党员军事工作做得不好。

就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了。

我们说，应该结束这种状况了。我们来到这里，这样情绪激昂地讲话，因为局势并不顺利，[因为]在发生一系列的风潮和暴动，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些客观原因产生的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应该克服这些客观原因，善于对待中农、善于与他们达成谅解这些事。

在发布关于对整个维亚特卡省进行动员，组编这种普通部队的时候，甚至没有考虑当地的条件。假如曾经有意考虑，那么十分明显，当南部各县仅提供无用的富农分子的时候，北部部队^①却提供革命部队。假如他们有意考虑这一点，那么，他们组编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假如他们遵守那项法令，那么，在我们的连队和团队里就不会混进应该交纳45000卢布革命税的个别人了。

下面要谈到许多专家。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并非任何一名专家都是真正的专家。但是，任何一名专家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这里留下的是最差的专家，而最好的专家都离我们而去了。最好的专家是安多格斯基^②，他跑到白军那里去了，他使白军受到了鼓舞。因此发布了一项命令，为这个安多格斯基提供一切东西。请想像一下吧，如果这个人现在正制定扼杀布尔什维克的方案，将会出现什么情形！

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就这个问题多讲了。但是。假如我向你们说出我们在各个方面军、各个集团军的指挥方面的全部力量，你们就会看到，事情并不顺利。那时有人会对我们说：请给我们人吧，你们也许有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会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甚至在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地区”。

^② 安多格斯基，А.И.（1876~？），1917年1月起任总参谋部学院办公室主任，后为该学院院长。1918年8月初，在争夺喀山的战斗中投向白军。1919年任高尔察克部队第一副参谋长。

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甚至最好的专家，当选举军事委员会的时候，他们从前线为这些委员会挑人，以便能确定，哪段战线重要，哪个地段可能会受到某种攻击。我们这里却完全放弃这一切做法。假如在指挥共和国全部兵力方面，哪怕有一次在某个关键时刻试着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召集起来，以便考虑一下，哪个战线在战略或政治方面是最危险的战线，……如果往这里调遣全部兵力，因此给予他们这种支援前线的任务。没有这样做。甚至当他们集结某些部队时，从部队的人力、物力来看绝对不能进攻，可还是对部队说：进攻呀！进攻呀！进攻呀！

同志们，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只能消灭战略错误^①。我们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是啊，尽可能地取代专家，但是利用政治委员们在一年国内战争和红军组建期间的全部经验，利用这些经验，仅仅在这之后才开始把红军建设成真正的红军，而不是建设成白军。（鼓掌）

主席：请列宁同志发言。

列宁：同志们，我尽力仔细地听取了军事小组两派之间，两种不同提案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引起了激烈的发言和导致了军事小组内部的严重对立，以致部分人退出了会议。当然，退出会议是不对的。仔细考虑了这些提纲^②。我首先要表示不同意那种说我们的一切都顺利的看法，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的局势现在很严重，以后仍然很严重，这一点已经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奥库洛夫和阿拉洛夫同志向你们讲过了。这一点在中央委员会中也没有任何怀疑。当时，我们决定托洛茨基同志不参加代表大会，而到局势危险的地方去。我们意识到我们给党的代表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后备队”。

② 指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提纲

大会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是我们说过：局势是严重的。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些缺点的批评怎样超出了应该批评的界限。这就是以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名义提出的提纲的第 1 部分第 6 条。（宣读）

是啊，同志们，如果是这样地冲动，如果你们竟谈到专制农奴制度，那么会上情绪激烈也就毫不奇怪了。难道在共产党内可以这样谈问题吗？当我不得不同斯米尔诺夫同志谈话时，他向我介绍了情况，同时，他指责了这个条令。这个条令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和同志们交谈过，他们向我说：强迫敬礼。老实说，我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于是就去打听。我问了一些在军事部门工作的同志，我说请你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弄到条令。这里也暴露出我们一个很大的缺点——我找了一个多星期，现在才拿到了这个条令。（鼓掌）我拿到后看了第 16 条。（宣读）

我读完了这一条。这一条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不仅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也不是一名军人，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实际上我碰到过。当我听到说，首长有事找部下要行举手礼这一点就是恢复专制农奴制度，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除了这一条以外，其余的我没有看。如果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这一条必须修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当然，是存在着一些个别缺点。但因此就谈到专制农奴制度和旧军队，我说，先生们，如果你们这样讲，那就不对了。现在你们写出这些东西来，起初你们说我们同中农打交道，——你们不想同中农打交道，而是想助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声势。得了吧，他们到哪儿能找到“专制农奴制度”这样合适的材料呢？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你们在提纲中过分热衷于某种东西，你们有些不对头。缺点谁也没有否认。条令谁也没有去维护。

下面我们读一下第 10 条。（宣读）

下面勾掉了，我想，是由于发表的需要吧。但是，如果应该宣读小组里表决过的全部提纲……，我把这里读一下……（宣读）

怎么能这样呢？说我们做得不好，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设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这叫什么罪名呢？要知道，国防委员会从来没有一次干预过军事作战行动——它的任务是加快这一行动——我们在加紧处理二三十个有关供给红军粮食的问题。而这就是陆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存在的罪过，要知道，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里，显然不能自圆其说。内情并不是这样。你们写的并非你们所想的。

戈洛晓金同志在这里发言时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军事部门没有执行。您提出这样的指责，您作为党代表大会上的一名重要发言人，可以指责托洛茨基，说他不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这是一种狂人的指责。您一点根据也拿不出来。如果您能证明这一点，那么，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中央委员会就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如果党的组织不能够使它的政策得到执行，它还算是党的组织呀！这太不足道了。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产生意见分歧和错误，这一点谁也不否认。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毙人，我就认为这是个错误，我认为他们枪毙错了。伏罗希洛夫同志引证的那些文件（文件举出第10集团军中，包括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内，有许多英雄的事迹）揭露了我们的错误。我的错误也被揭露出来了，我不是打过电报吗，我说：要谨慎。我犯了错误。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当然，如果德宾科^①在

^① 德宾科，帕维尔·叶菲莫维奇（1889～1938），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海军人民委员等职。

斯莫尔尼宫签署和约的时候，就把克拉斯诺夫枪毙，那就好了^①。这当然是个错误，察里津保卫者的功劳在于他们揭露了阿列克谢耶夫的这个阴谋。斯大林同我有过意见分歧。斯大林证实过，并且谁也不会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在军事部门没有执行。这种指责是往整个军事部门和中央委员会脸上抹黑。你们现在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但你们曾打算说出这一点。这里的内情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首先来看第 10 条的第 2 部分。“结果……经常不足……”^②

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吗？在中央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上——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没有一次没有开过中央委员会会议或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我们没有一次不是解决基本的战略问题。例如，这里开的秘密会议，如果敌人威胁到西线，并同时向北推进，我们就会在那两个地方都没有足够的后备军。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最近几个月要坚持住，因为我们知道敌人不能坚持多久。如果这里有人指责我们说，由于错误政策的结果，后备军经常不足，——这是可笑的和荒谬的。我们为后备军不足伤透了脑筋。但是，我们在没有后备军的时候总是把部队从这一战线调到那一战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做出决定：任何部队都不得从南线调走，不管其他地方受到怎样的威胁。

我要补充谈谈关于中农的问题。当然，思想影响的政策是必要

① 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被平定后，哥萨克士兵们通过自己的代表表示愿意放下武器。1917年11月1日（14日），以帕·叶·德宾科为首的苏维埃代表团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停止战斗和逮捕叛乱首领的协议。亚·费·克伦斯基逃跑了。彼·尼·克拉斯诺夫被赤卫队捕获。克拉斯诺夫做出不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保证后被释放。但是他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不久就成了顿河反革命白卫军的组织者之一。

② 在列宁讲话的速记记录中，句子到此中断。这段文字应是：“结果在前线危险地段的后备军经常不足，因此不能机动……”。

的，但那是不够的。因为军队的无产阶级部分还不够大。这就需要铁的纪律。如果你们要说，这就是专制农奴制度，并抗议让首长行军礼，那么有中农参加作战的军队你们就不会得到。没有铁的纪律，没有无产阶级约束中农的纪律，什么事也做不成。为了吸收中农，我们什么事都需要做。但是，认为由于首长行个军礼，就抛出了关于专制农奴制的纪律的提纲，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进行创建由中农组成的军队的工作，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实行铁的纪律，这里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现在我们来读第6条，萨法罗夫同志在这里作了说明。^①（宣读）

萨法罗夫同志以此嘲笑索柯里尼柯夫，说他发现了工团主义的特点。军队不能这样，军队里需要集中。这里你们是纠正了一些东西，但你们的尾巴依然保留着。既然如此，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提纲呢？

或者请看第10条。瞧这里在修改之前是怎样写的。^②（宣读）

就是说，集体指挥。这真是令人吃惊，完全退回到游击习气的时期。你们修改时，把这一点删掉了，但表决却是按原来那样。至于少数派离开了会议，这是不好的，这是破坏纪律，是决不能赞同的。但是你们挖空心思地提出这样一条，并能够对它进行表决，能够为它拼凑了37票，这就更不好。

这不仅不好，而且掩盖着危险。问题在哪里呢？全部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你们身上存在着旧的游击习气，这在伏罗希洛夫和戈洛晓金的所有发言中可以听得出来。伏罗希洛夫谈到察里津集团军在保卫察里津中的巨大功绩时，伏罗希洛夫同志当然绝对正

① 指弗·米·斯米尔诺夫的提纲第1部分第6条。

② 在这一条里，弗·米·斯米尔诺夫要求在建立起如他所说的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完全可靠的指挥人员队伍以前，军队中实行集体管理部队的制度。

确，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英雄主义。这的确是一项非常巨大的、辉煌的业绩。但是，现在伏罗希洛夫本人在讲话时也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游击习气的可怕痕迹是存在过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伤亡了6万人。这太糟糕了。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这是在没有军事专家的情况下以6万人的伤亡为代价换来的。

一方面，第10条中写道：军事专家要服从集体指挥。这就等于排除了他们。另一方面是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话。他说，我们没有军事专家也对付过来了，只是伤亡了6万人。察里津集团军的英雄主义将要传布到广大群众中去，但是，说没有军事专家我们也对付过来了，这哪里是保卫党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党的路线没有得到贯彻。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过错在于他不愿意抛弃旧的游击习气。说游击习气同历史上的一定时期相联系，这是正确的。他说：在乌克兰，我们没有专家也对付过来了。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的错误也在于他们赞同这种游击习气。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应该懂得，为苏维埃政权而举行起义时，游击战是必要的。但是，是否可以把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刚刚举行起义时期的国内条件和现在的条件相提并论呢？当然是不可以的。而伏罗希洛夫同志却忘记了这一点，这样他就完全否定了他自己的提纲。

这些游击习气的残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则已到根除的时候了。他们所说的话表明，这些同志还没有摆脱游击习气。你们反对派的全部错误就在于，你们由于把自己的经验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把那些永志不忘的英雄主义传统同这种游击习气连在一起，你们不想知道现在是另一个时期。现在，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

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是赞成军事专家的；另一方面，又说要由集体指挥，你们自己否定了自己。你们说，军事专家经常叛变、投敌。难道我们在纲领草案中没有讲到他们满脑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任何反革命阴谋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奇怪的是你们竟从自己的小圈子看问题。你们说：我们英勇地保卫了察里津，这是真的。但是，你们既然带着这种思想走上讲台，向代表大会讲话，你们就是在破坏整个党的路线和整个党的纲领。你们在维护旧的游击习气。当你们提出完全是反对军事专家的提纲时，你们就是在破坏全党的整个策略。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但是，你们在谈到规定专制农奴制的纪律时提出的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是毫无用处的。同时，戈洛晓金甚至说，留声机是旧时代的东西，这种旧时代的东西正在毁灭我们。你们听听吧，这样来否定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技术，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在纲领中说，要吸收军事专家，而你们则说，要利用他们。而且是在集体指挥之下来利用。不，不能这样。他们将负责指挥，我们将派自己的人同他们一道工作。而且我们凭经验知道，这一定会有成效。

伏罗希洛夫同志竟然制造了这样的奇谈怪论，说破坏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骇人听闻。奥库洛夫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奥库洛夫多次报告说，那里还有游击习气。奥库洛夫用客观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损失6万人，但是从我们总的路线来看，我们可以一下子付出6万人吗？

伏罗希洛夫：可是我们击毙了多少呢？

列宁：我完全知道，你们击毙了很多。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不幸的正是你们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察里津上了。从英雄主义方面来看，这是个极其伟大的事。但是，从党的路线方面，从认清我们提出的任务方面来看，很明显，我们不能够一下子付出6

万人的代价。如果那里有军事专家，有应该受到重视的正规军的话，可能不会付出这6万人。

这是从游击方式的活动向正规军的历史性的过渡。在中央讨论过了几十次，而这里却有人说，所有这些都必须抛弃，必须往回退。这绝对不行！

我们度过了游击活动时期。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在西伯利亚吧，还将是游击活动时代。但在我们这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这里有人说要回到游击活动时代，那么我们就最坚决地说：永远永远不行！（鼓掌）

斯米尔诺夫：我要提醒你们注意我的报告所讲内容的客观环境。我想举个例子：革命时期组建的军队与从前组建的各种军队大不相同。这种独特的环境要求我们高度注意组织军队的工作，注意考虑我们工作的特殊条件和经常得到的支持。我要说，在我们的军事政策中我们有向军事专家工作靠拢的某种因素。组织军队的整个工作都交到了他们手里。在这种情形下我曾指出一系列原因：指出条令等等。我曾指出，这确实是发生这一情况的有害的原因：情况是落到我们手中的很大一批人员水平很差，没有战争经验，按照从前的理论体系组建新军队。结果是，我们采取了一些谁都不需要的措施。我们毫无必要地使军队分散到各处，创造那么曾认真对待过的革命建设事业。我听到了各种不同意见。

我们听到，这些专家很好或者很不好。我们听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两位委员阿拉洛夫和奥库洛夫同志的报告。阿拉洛夫同志断言，在……^①，敌人对他们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进攻。我应该说，我们2月初在第5集团军的时候，当时第2集团军无进攻之力，我

^① 此处速记稿有遗漏。

们没有想到，敌人会搞这次袭击^①。如果说共和国委员会的委员们不懂得这种简单的东西，那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了解东方战线。另一方面，奥库洛夫同志提到了第10集团军。而且斯大林同志——相反观点的代表——相当清楚地证明，他不了解东方战线上这些集团军的情况。这就是说，所有军事专家都确实水平很差。这一切会产生什么后果？

列宁同志在与我个人谈话中注意到行军礼那一条。他很关心这一条，还看了条令。我上次在这个会上发言时引证了条令中的许多段落，其中包含着比行军礼更重要的东西。我认为，列宁同志不会否认，勤务兵制度是一件并不比行军礼次要的事情。列宁同志特别批评了……比如他谈到国防委员会说，我们无缘无故地攻击了这个机关。列宁同志仔细研究了提纲。提纲说，存在某些机关，但是，这条没有经久不变的界限。

同志们，应该说，我们得到的实际情况，不是将对军队的供应工作移交给军队供应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恢复^②。我们和军队的所有军需机关当时有一些规定，而其中有许多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两个机关颁布相互矛盾的规定或者命令，那么看起来事情就与我们说的有些出入了。

列宁同志谈到后备军不足的问题。同志们，当然，如果这样看问题，即是否拥有兵力仅仅取决于有多少军队能用于迂回，那么，说我们没有后备军未免为时过早。这仅仅由于列宁同志在军事上是外行。正是由于有好的指挥我们才可能有相当数量的军队作为后备力量。

我曾经指出，我们没有后备军，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措施，

① 指高尔察克军队发动的进攻。

② 原文如此。看来应为“决议”。

因为我们不能从军队中抽调后备军，因为我们在所有战线上进行战斗——结果后备军就没有了。我们甚至在东方战线上也形成了（这种）局势，（以至），顺便说一下，甚至专家同志们，其中也包括那些跑到那边去的专家，也承认这一点。他们说，我们不善于建立后备军。不管我们组建多少后备军，像我们这样作战，后备军以后还是不够用。

列宁同志接着又谈到铁的纪律，还谈到我们反对铁的纪律。这不对。我们在执行铁的纪律。我知道第 10 集团军的一件事。在一个团拒绝投入进攻的时候，曾经强制他们去进攻。所以，我觉得，这里举的例子根据不足。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用什么形式执行这种纪律。是否需要以这种手段去实施铁的纪律？是否需要强迫军队一定死记硬背答词？托洛茨基同志听到过，如何向他致敬，但是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否清楚，他们整齐地喊出那些话，费了他们多少功夫。同志们，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当过士兵的人都非常清楚，算术、算盘教学要占他们两个多月，因为需要计算。但是如果还需要进行政治教育，如果除此之外还要用熟记某些空洞无物的词藻、送往迎来的套话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来塞满士兵的脑袋，这就是犯罪。而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去促进严格的军事训练，那么，我们就不能养成纪律，而只会使他想起旧时代。那时，我们的纪律只能表现在我们将教会他们齐声高呼，别无所长。

列宁在共产党员集体问题上责难我们，并且宣称这是游击习气。这与列宁在军事上的天真有关，因为游击习气不在于存在共产党员集体，而在于存在与他人不相往来、我行我素的个别队伍。后来我提出了明确的论据，即我们应当建立能够做出各种符合具体情况的决定的指挥。我对列宁指出过某些后果，即集团军司令在发布命令时有时考虑最高领导是否赞同，而不关心这是否有利。我们认

为，责任应该在革命委员会。

下面我还要谈谈几条不同意见。比如，对一些共产党员提出了责难，说他们组织暴动。特别强调说，在阿斯特拉罕地区发生暴动时，政治委员们也卷了进去，而指挥员却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觉得，不应该轻率地发出这样的责难，首先应当进行调查，刚听到点风声就发出这样的责难是不可取的。

斯大林同志断言，我们应当迫使军队去作战。我同意并且举双手赞成。中农因为当过士兵而发自内心深处地憎恨旧军队，您会用那些使他愤怒的办法让他去作战吗？您会向指挥人员提供我们现在提供的特权吗？这对军事技术来说是否需要？我说过，不需要。如果我们提议在军队里采取这些措施，这实在是荒诞无稽，不可思议。我们这样做，将会白白招惹农民，因此农民会恨我们。

斯大林说，需要创建正规军。谁对此持有异议？当然了，必须创建正规军。生活本应创造出领导这支军队的特殊的军官阶层。我们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从整体上与中农发生接触，我们可以争取他们持同情态度。但是，因为这支正规军与革命前建立的那支军队相比，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创建，那么它的形式也就有所不同。我所说的只是这点。

我想谈谈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以及他在报告里提出的那些不同意见。总的说来，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报告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这是一篇无论如何都应该读一读的命题作文。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了证实应当证实的论点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这篇习作，颠倒是非，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颠倒是非不大使人信服。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令人恐怖的前景。他对我们说：同志们，请不要忘记，主要危险并不在军官身上，而在军队里的农民身上。如果军队将处于旧军官的指挥之下，这并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由游击队的领导率领这批农民群众，那就大事不妙了。在这种情形下，

可能会发生农民起来反对我们这种事情。我听到这一危险时，真是哭笑不得。在这一点上，索柯里尼柯夫与他为之辩护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背道而驰了。提纲里说：“因为……”（宣读）如果托洛茨基如此斩钉截铁地断言，波拿巴主义现在不构成威胁，那么，如果游击队首长们将坑害我们，难道波拿巴主义将构成威胁吗？波拿巴可是军事专家呀！

同志们，随后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又不顾满头大汗，变本加厉地竭力证明，是我们在鼓吹游击习气。他这结论从何而来，我不清楚。虽然他搬出所有神明来发誓赌咒，说确实如此，但是我想，出席代表大会的人对这一点谁也不会相信。同志们，在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认为，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在这里不曾提出一条像样的理由。我认为，我们招募了专家，把组织军队的工作交给了他们。他们不考虑我们已有的经验和由于那些经验取得的种种成果。他们从军事专家的观点出发，开始建设一支旧军队了。

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件我不能避而不谈。同志们，上次我读过条令里的几条，这些大家都听到了，也都了解。我认为，假如你们处在我的地位，接到这种提议在红军中普及条令的命令，我认为，你们也会动一番脑筋的。你们也会想到，这会对广大红军战士产生什么影响，光是有关设勤务兵这一条会产生什么影响。于是我们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给托洛茨基同志拍了一封电报，说我们不能执行这个条令，因为它与军队的情绪不协调，于是我们收到了意味相当深长的答复。（宣读）

托洛茨基同志根本没有读过这个条令。泽维亚尔托夫斯基同志只是粗略地翻了翻。我问军队代表们，他们收到这个条令了吗，才知道，有的人没收到，有的人收到了，可是没读过……（宣读）同志们，我非常清楚，这样不执行命令就是破坏纪律，但是我认为，这个命令是仓促写就的，也是由于仓促没有发到军队里。就是需要

用这种观点对待内务条令。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些不懂军事科学、认为只需要杀杀砍砍的军事上的糊涂虫认定这个条令会在军队里发挥巨大作用。可是除了使事情极端复杂化，一无所获。而托洛茨基同志显然甚至不曾劳神浏览一遍条令。我们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到此为止，我们应该停止对军队说三道四了，因为否则就会形成十分不正常的局面，最终只会毁掉这支，谢天谢地，暂时还相当不坏的军队。

主席：一些同志提议休会，因为根据议程时间已经过了。谁赞成休会？谁反对？大多数反对。

索柯里尼柯夫：一位同志在这里对你们报怨军事小组的少数派，说他们的做法十分无礼。我们应该代表少数派承认，也许我们的做法十分无礼，但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更加突出这个问题的尖锐性。我们认为问题已经在小组里讨论过了，应该把它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而不要搞得过于繁琐，不要试图把它淹没在节外生枝的论证中。代表大会党的^①小组讨论的问题如下：我们打算从根本上修改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接受的党在军队建设工作中的政策这一条，还是不打算修改这一条。分歧正是在这一条上。当弄清因为有不同的理解而存在分歧时，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提交代表大会解决，让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威解决这场发生在小组里而且采取了十分荒谬的形式的争论。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根据某些发言，比如斯米尔诺夫同志的发言，予以公断。

问题是如何修订党的政策方针。这很清楚，因为已谈出的实事求是的想法，以及实事求是的批评，几乎都是一致的。斯米尔诺夫同志和我提出的提纲，两者是一致的。我作报告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们都还记得，正是我在我的报告里首先指出了军事工作的安排

^① 原文如此。应为“军事”。

中目前存在的必须加以改正的缺点。我们根据问题的实质，一致同意主管部门有关实际改革的批评。我们的分歧完全在另一方面。

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在一般性辩论中，在某些代表小组少数派和多数派讲话的发言人的言词中，这些分歧已经暴露无遗。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希望否定原先的党的政策方针。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很明显：假如代表大会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就需要从正在领导这一军事政策的同志手里，即从托洛茨基同志手里，夺回领导权，问题就不仅是推翻原先的政策方针了。这里是第一条不同意见。我们要问：反对派会用什么人取代托洛茨基同志？我甚至不能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过，党的中央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不同意改变党的政策方针。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在这方面也会支持这一立场。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的处境也很困难，因为我必须为那个缺席同志的政策辩护。我个人和任何一个人更愿意让托洛茨基本人在这里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因为他为整个政策负责。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在，因为他宁愿去夺回乌法，让乌法在托洛茨基^①同志待过的那个集团军手里恢复原状。可我更愿意让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

同志们，在小组里讲话的 20 位发言人中的每一位同志，都从专家问题谈起，都从声称这不容置辩是个重要问题开始，无论哪位同志都说，要使专家得到保障。此外，20 位发言人都谈到这个题目，军事专家的题目，这是因为无论哪位发言人都懂得，前线上的结局比党的代表大会上辩论的结局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这就足够了〕。这么说，同志们，这个题目对于我们是最主要的题目，是有决定意义的题目，它并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

首先应该停止玩弄词藻。同志们，可以说，奉献给我们一堆漂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斯米尔诺夫”。

亮话的人只是想嘲笑我们罢了。我们谈到吸收专家来担任指挥职务，我们谈到我们没有指挥员去率领士兵，——我把自己算作前线战士中的一员。当我们看到兵力不足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准备厮杀的工人、共产党员纷纷阵亡，而他们纷纷阵亡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领导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被迫招募军事专家，目的是利用他们曾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经验，目的是给军队提供哪怕是政治方面还不够可靠，但还是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的指挥员。同志们，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赞成利用军事专家，但是我们的做法是，问题将在由两名政治委员和一名专家组成的全体会上解决”的时候，当有人提议召开有专家参加的共产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要说，这些人是在拿军事专家开玩笑。（鼓掌）

我要明确地说，同志们，如果这20名发言人为关于军事专家将仅仅在有政治委员们参加的集体中才有表决权的提纲而争辩，如果我们退出会场后小组里有人大笔一挥抹掉根本问题的是非界限并提议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接受既成事实，如果有人宣告20名发言人昨天为之争辩的那些决定无效，我不禁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严肃的政治行为还是稚气十足的政治游戏？

同志们，请听我说，我们已经开过几次代表大会了，我们从未进行过如此冷酷无情的争辩。但是，同志们，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计划还不会导致危险的实际后果。但是当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会产生实际后果的时候，我要说，在为提纲作辩护而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之后几分钟内就改变自己的决定，这样搞政治，我要说，无法博得半点敬意。

同志们，最后我要宣读一下小组少数派提出的决议。（宣读）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军事领导机关面临的政治局势的前景，本应该早些时候勾画出来。但是，我的报告在结束语部分包含着所有论点。我认为，全党代表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在军事政策方面必将踏

上一条进行认真求实的工作的道路。因为我们懂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给正在各个战线上浴血奋战、壮大成长的各集团军定下任何怀疑和动摇的调子。

斯米多维奇^①：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宣读小组多数派提纲。

雅罗斯拉夫斯基：（宣读）

有些人喊道：那么，有提纲……（声音不清）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没有宣读过。

主席：你们听到了另一方面的提纲。我们开始表决……有人建议把这次表决挪到明天。其理由是，有许多人缺席。关于这点有人要发表意见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本来通知〕今天6点休会。那些没出席的同志显然认为，这不是太重要的问题，可以不出席。为了他们推迟对这样重要的问题的表决，还要占下一次会议的时间……我反对这样做，提议立即开始表决。

有人喊道：明天拿到提纲好好考虑考虑，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表决之前需要仔细考虑一下。再说主要理由是，现在不是全体出席。

主席：我提付表决。谁赞成立即对决议进行表决？大多数赞成。

阿瓦涅索夫：对表决程序提个建议。我将念出代表证书的号码和姓氏，同志们就说出赞成哪份决议。将在这里相应做出记号。对所有没听见自己姓氏的同志将再叫一次。所有最后剩下的同志还可以告诉我，说我没念他们，我们再记下他们的意见。所有最后漏掉的同志明天还可以补上自己的一票。我认为，这样可以使同志们遵守秩序。

① 斯米多维奇，彼得·格尔莫格诺维奇（1874~1935），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

有人喊道：同志们，我提醒一下，我们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批准和约^①的时候，表决也是这样进行的，不过现在提出的形式跟那次不一样。等我们来开会的时候，在入口处贴两张纸。在纸上可以进行记名投票。

主席：将对这个建议进行表决。同志们，我们开始表决。

有些人喊道：我们应该明天上午开始逐条宣读。

主席：我把这个意见提付表决。谁赞成？现在必须把已经由罗森霍尔茨同志全部读过的两个决议作基础。^②我们把哪个决议作为基础——这个还是那个决议？同志们，谁赞成把罗森霍尔茨同志提出的决议作为基础？大多数赞成。这个决议作为基础。

有人喊道：我建议，在表决的时候只让有代表证书的同志投票。如果我们决定允许补充登记，那〔只能〕在我们表决结束以后。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把某一个决议作为基础，那我们明天也不能这样做。（一些人的喊声，喧哗）

有人喊道：请大家遵守秩序。（铃声）

主席：请维克托罗夫^③同志讲话。

维克托罗夫：在座的来宾和只有发言权的同志们，这里除了唱名不会有任何值得关心的事了，所以请你们是不是最好退席？

主席：谁对表决程序有什么建议？

有人喊道：我建议严格记录，还有，给我们出席的人规定好明天上午……点^④集合。

① 指布列斯特和约。

② 看来，速记记录中未记录罗森霍尔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提议将托洛茨基和索柯里尼柯夫的提纲作为决议的基础。

③ 维克托罗夫，米哈伊尔·弗拉基米罗维奇（1893~1938），海军将领，1921年后历任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司令等职。

④ 速记稿中遗漏了时间。

【专题说明】

作家柯罗连科眼中的红色恐怖

(1919年3月至1921年6月)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面对复杂、混乱的国际和国内局势，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红色恐怖政策，对一切危害或可能危害苏维埃国家政权的行为实行无情的镇压。这种状况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反应。本专题选编的柯罗连科给拉柯夫斯基的34封信就是这些反应中的一种。

弗·加·柯罗连科(1853~1921)，是俄国著名的作家和政论家，他在1900年认识了作为革命者的克·格·拉柯夫斯基(1873~1941)，并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1916年拉柯夫斯基被罗马尼亚当局抓获后，柯罗连科曾出面为他担保。1919年1月拉柯夫斯基担任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此后两人的书信来往更加频繁。这里收入的信件，充分反映了一位知名的老作家对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红色恐怖政策的不满，以及对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担心。对柯罗连科信中不断的请求和申诉，拉柯夫斯基大部分都给予了答复，并尽力解决和满足了他所提出的要求和愿望，但毕竟有限。不过柯罗连科论及的许多带有深远社会意义的问题则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本专题文件由孙凌齐、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温耀平翻译)

№01680

柯罗连科关于新政权的统治方法问题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3月20日)

1919年3月20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有许多话想和您谈，但是……我十分为难。如果您和原先一样只是拉柯夫斯基，是我的和善可亲的挚友，我就不会为难。如果您是纯粹的官方人物，在原先的条件下我会如同我一向习惯于做的那样在报刊上发表公开信向您表白。但是，您既是我的和善可亲的挚友，又是官方人物。我什么也不能在报刊上向您说：现在独立的报刊没有了。70年代一度盛传一个令人惊恐的消息：亚历山大二世曾做出决定要取缔《政府通报》^①和《省府公报》^②以外的所有报纸。后来人们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如今这个幻想竟成为现实：除了官方和半官方的出版物外，其他的出版物几乎荡然无存。而我认为，对于你们自身也好，对于当前的政权也好，这样做是极其有害的：你们听不到独立的批评，对发生的一切你们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

当然，利用我们之间的稔熟关系，我可以向您说出我本想发表的想法。但是，……您能够清楚地想象出，我，一个习惯于坦诚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老作家，转而采用“打书面报告”的做法，即

① 《政府通报》，俄国沙皇政府的官方机关报，1869～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

② 《省府公报》，俄国沙皇政府的官方报纸，1830～1917年先后在42个省出版。

使是写给一位和善的挚友，是多么困难。正因为如此，我才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详细描述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至少我克制自己不采用我习惯用来描绘自己思想的那种具体的细节叙述，而局限于苍白无力的一般性的说明。不指责也不揭发任何人（要指责著名的地方布尔什维克行政人员我目前也没有材料），我只谈生活本身提出的和处处表现的主要问题。

首先谈谈“不可靠分子”。如今你们称其为“反革命势力”，但实质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换了一个角度而已。有人会说，主要问题正在于此。不，事情并非如此。我们那时对于“不可靠分子”的提法感到愤怒，不是因为它是针对我们的，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愚蠢的、无的放矢的、极不道德的手段，因为它审判和惩办的不是行为，而是“思想方式”。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称呼它什么，它都是不道德的……当人们被关进监狱，只是由于他们是“农民党人”^①，或者仅仅由于他们是保皇党人，那我认为，这损害了本应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个领域，因为对这一切只能说服，通过活动来与之进行斗争，而不是用惩办的方式。只能惩办行为，而不能惩办思想。要是允许另一种做法，那你们就会陷入原先沙皇政府的处境：监狱人满为患，到头来你们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将会出现“残暴的笑柄”，共同的不满情绪将会增长。而这将是一种悲剧：连某些并不笨的人也会做出笨事。希望您不会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偏见”。

其次，你们在同谁或者说在同什么作战呢？因为某人属于资产阶级或属于“农民党”，就能说他是人民的敌人，将其置于法律之外吗？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是制度，而不是人，除非他们犯下了某种不规行为。否则，这就不是

^① “农民党”——指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

为思想而斗争，不是为新的生活方式而斗争，而是一种野兽之间的咬斗。如果我们拥有独立的报刊，而不是只有《政府通报》和《莫斯科公报》，那么你们就会知道，有多少人在各地的肃反委员会，特别是县一级的肃反委员会，因为“身份”或信仰而遭受磨难，多少母亲，妻子、儿女为此以泪洗面，这又引起了多少误解、对牺牲者的同情，甚至愤懑。而且是在极广大的范围内。这些眼泪、叹息、议论会像无法看见的水蒸汽一样逐渐积累成孕育雷雨的乌云。沙皇政府不相信这一点，最终陷入崩溃。固然，它仍维持了很久。但是要知道，沙皇政府的根基是很深厚的：存在了几百年……现在，一切要进行的快得多。我认为，制止这一切对你们也很重要。

再次，“资产阶级”被规定必须参加强制性的劳动，实质上就是苦役劳动。这是为什么？恰恰是为了把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人，不是吗？），而且是把马克思主义者不久前称之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最后一个阶级的人，为了把他们置于法律之外，对他们进行侮辱和嘲弄。为了恪守自己划定的范围，我不准备引用具体的例子，这些例子常常是令人惊异和悲剧性的。而这里又是人，并且可能是不坏的人，由于遵从虚假的“原则”，做了明显不好的事。但是，劳动介绍所已经宣称反对这些不自由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也不适合的竞争者参与竞争。是否可以用一些笼统的解释来停止这类黑暗的荒谬做法。

还有，我曾经在一次（关于加齐斯基^①的）演讲中说过，有两种类型的官员：一种人几乎听任从生活中产生的一切事物自由发展；另一种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干预，甚至连青草也不会生长，于是下命令用行政措施拔苗助长。布尔什维克承担了十分巨大

^① 加齐斯基，亚·绥·（1838～1893），俄国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

的任务（依我看来，这在目前情况下总的说来是无法完成的），因而……常常太像第二类官员。你们不利用自治机关（佩特留拉分子并未消灭它们）而自行处理一切。你们想通过官僚主义的办法做一切事情，这样你们又使这些巨大的任务更加复杂起来，因为你们干预了本来正在进行，而且没有你们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会进行得好得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由有经验的人们在管理。生活会因此而立即感到受到干预。第一是官僚主义的干预，第二是不懂行的干预。由此而来的害处极大，同样不仅对生活有害，而且对你们也有害……

为什么我——一个并不是布尔什维克，而且甚至反对过布尔什维克的人——要写出这一切呢？原因如下。仔细审视发生的一切，我看不出任何地方有我可以认为是真正的、正确的、合理的事情。所有政党都存在片面性、盲目性、残酷性。如果所有人都能开始表现出更加明朗的观点，那么对于整顿振兴的事将会有极大的益处。只要在人们中间仍然仅仅存在兽性，残暴性，——人类长期以来的敌人——自然，被文化所征服的自然，便会挣脱人类的掌握而对人类进行自发的战争。而你们（相互敌视的人们）之中谁也不愿意真正看到这一点。你们想的只是战胜敌人。而在这一场战争中，人们没有想到，归根结蒂，所有人都失败了，甚至包括胜利者在内。我们很可能正在接近这种可怕的灾难，而这种灾难目前尚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因而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尽快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对付这种危险。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采取切实的路线，理所当然地成为拯救祖国免遭空前灾难的事业，以及祖国振兴事业的领袖。如果有人看不清这一点，只想战胜对手和掌握政权，那他什么事也做不成，不但将毁灭自己，也将使国家在总的灾难中遭到毁灭。现在你们所有的人都在为政权而搏斗，看不到这一切，因为争斗使你们丧失了理智。但是我们没有丧失理智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一切。群

众也开始看到了这一切，但是群众的声音你们是听不到的，因为你们到处在压制他们的声音。例如，规定了“自由选举”，但却有一个不容变更的条件：选举共产党人。这正是地方自治局长们的策略。

还有两句话。我们这里的监狱和肃反委员会已经人满为患。有一次，一名宪兵将军（我曾因他们粗暴地进行搜查，包括对我进行粗暴搜查，而尖锐地指责他）给我看了满满一箱子告密信，并对我说：“我们不能阻止这些告密行为……我们自己也在告密者的控制之下。”日常生活现象中最为卑劣的便是告密横行，这种现象在没有法制和为所欲为的时代总是屡见不鲜。还是那些原先热衷向宪兵告密的人，现在则常常向你们的肃反委员会告密。不管怎么说，告密的心理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如果现在可以说，其中有一部分人并非是公报私仇的坏蛋，那么要知道，即使以前也有真诚的黑色百人团分子。但是，没有什么比陷入告密的控制之中更加可怕的了。而你们的官员已经最大限度地陷入了告密的控制之中。这对于你们自己也是危险的。

据说，不久革命法庭就要开始行动。据说，将要执行枪决。要审慎地使用这种手段。尽管罗曼诺夫王朝有300年的根基，绞架并未能帮助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处决总的说来是不能容许的，而处决的事已经太多了。残酷手段已经席卷全国，而所有在国内战场上“交战”的人们都要对此承担责任。你们布尔什维克的责任也不比别人少。如果说“志愿军”分子和佩特留拉分子施行了大量处决，那么你们也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上划掉这类大量处决人质的事实。前几天在波尔多瓦的《消息报》上刊载了关于不经审判，而由克列缅丘格肃反委员会下令枪决人的消息。现在这种做法已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不会使人吃惊，甚至也吓不倒人。如果某个地区提出来：残酷手段应当停止，报复应当停止；我们不对政治对手进行报复，我

们同他们只在公开的战斗中作战，这倒会首先使所有人大感意外。这将是一件新闻，并预示一种转折，只有认识自己和自己任务的那种力量才有能力实现这样的转折。

我担心这只是一种幻想……请你们尽可能限制一下使用处决的手段。我曾经反对过在沙皇政权下成为“日常生活现象”的处决行为。现在我继续注视这种现象。应当说，这种滥杀无辜的做法，而且是毫无根据地滥杀，我永远也想象不出来。

如果您愿意并能够限制一下滥用政治处决的现象，那就是在席卷全国并将使国家毁灭的可怕浪潮中的一种新的、真正理智的、真正有益于人类的声音。这样做不但不会危害你们的事业，反而会将其纳入正确的道路。注意分析大革命时人们心理的历史学家米希勒^①曾经指出，反革命情绪如沉闷的轰鸣声响彻在通往断头台的桑坦顿桥前的地带。群众的精神生活中有自己的独立审判。会有波动，但却不仅仅以现在的直接物质利益为依据。“停止残酷行为”的呼声可能成为一种像海潮一样强大的独立的精神审判。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开始。

弗·柯罗连科

1919年3月20日

又及：还有许多话要说，其中包括乌克兰的民族问题。乌克兰沙文主义在自己猖獗之时做了许多坏事。但我怕，布尔什维主义有时也会“全盘追随俄罗斯主义”，从而对合法的和天然的自决倾向予以蔑视。已经无法使俄罗斯回到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它无疑

^① 米希勒，J.（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17卷本《法国史》和7卷本《法国革命史》的作者。

必须继续走地区自治或甚至联邦的道路。无法使生活停止下来，真正的国家智慧只能正确并及时地判定其最终的方向。

能否也稍稍限制没收的狂潮：把人民的住房、所有财产、甚至包括小物件都一下子统统没收了。这样做不仅不公正，而且残酷。而且都“在24小时内”完成！

No01681

柯罗连科关于帮助朋友迁居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4月10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在谈论社会事件的长信之外，还要增加一个小小的私人请求。

在彼得堡有一位作家，名叫阿尔卡季·格奥尔吉耶维奇·戈恩菲尔德^①，是《俄罗斯财富》^②（唉！现在应该说是前《俄罗斯财富》）杂志的撰稿人。这是一个极有天赋的人（文学评论家），异常和蔼可亲，但又孤立无援。他驼背。尽管如此，他的毫无恶意，平静而光彩的人生哲学令人惊叹。您可以想象，如今这样无助的好人在彼得格勒会是怎样的情形，他将会死去。如果您能为促进这样一次小小的迁移助上一臂之力，我将会非常感激。为此，似乎需要，第一，允许他迁入乌克兰，以及根据他的情况，也允许他乘坐某一次卫生列车或专用列车。如果在他作好启程准备时，能为他提供方便，我会为此而十分感激。

有无关于罗马尼亚朋友：格里亚^③、扎里福普尔一家、您的妻

① 戈恩菲尔德，阿·格·（1869～1941），文学研究家。

② 《俄罗斯财富》杂志，90年代初是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1906年起是半立宪民主党的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民社会党）的机关报，1876～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

③ 多勃罗贾努-格里亚（卡茨），康·（1855～1920），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

子的消息？阿芙多季娅·谢苗诺夫娜^①还在奥德萨而无法离开那里。

握您的手。

您的 弗·柯罗连科

^① 谢苗诺夫娜，柯·阿·（1855～1940），柯罗连科的妻子。

No01682

柯罗连科关于搭救被捕者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4月15日)

1919年4月2(15)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刚刚收到米拉^①签名的电报。其中也提到您的病。衷心祝愿您康复。十分感谢您为戈恩菲尔德和……所做的一切。唉！又一个新的请求。您该记得，我曾写信向您提到莫斯科的С.П.梅利古诺夫^②的案件。您当时回答说，经查看材料，在被捕者名单中没有这个姓氏。这是对的：当时他已获释。但是，我昨天得到消息说，他又一次被捕了。我不知道。但我想，而且甚至确信，罪名不会严重。但逮捕了他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他是合作社办的“大家族出版社”的灵魂，在这家出版社周围有一大批文学工作者和印刷业工作人员。按照我的观点，恢复而不是破坏各种生产应当成为现今最迫切的任务，有鉴于此，我胆敢再一次给您写信。希望我这封信到达时，您已经康复。

握您的手。

弗·柯罗连科

① 米拉，拉柯夫斯基的秘书。

② 梅利古诺夫，С.П. (1880—1956)，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20年被判处枪决，1921年被大赦。

向我们共同的友人致意，其中包括托尔戈维茨^①同志。

我不专门为制止不经审判的处决而表示感谢，因为我确信，您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公正和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本身。不管怎么说，从任何观点来看这都是必要的好事。

^① 托尔戈维茨，罗马尼亚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政治侨民。

No01683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和出版等事宜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5月4日)

1919年5月4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昨天我给您发了一份回电，今天马上就几个问题更详细写一写。

第一，正如您从电报中看到的那样，发生了某种误会：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都没有直接或间接提出申诉说受到地方政权的压制。只有很短一段时间，曾有“管理人员”来找过我，并宣布要没收我的两个房间（其中一人甚至宣称要没收我的工作室，而这间工作室装满了我的文件、资料和手稿）。当时我正等待我妻子归来，但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使管理人员感到为难：她可以在别的某个住所内找到地方安身！不过我们一向上级征用机关说明这一切，上述企图立即被制止，而且再也没有打扰过我。现在，妻子已经回来，并带来了陪伴她的我们原先的一位女住户，而且几天之内我的侄女带一个孩子就要来到。这样，我们的住所就会住满了人。我本人根本不可能对地方政权的任何“压制”和不愉快有丝毫抱怨，对于试图征用房间的做法也看做是这类事情的一般现象。如果不是对我采取了特殊的态度，我的房间就会被没收，而房间里的家具和我分门别类放置资料和手稿的柜子也要归新的住户所有，我甚至有可能因住房不够而与妻子分开来住。我已经写信给您谈到一些做法，谈到

在征用住房时，从迁出者那里把一切东西，包括小物件都加以剥夺，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就会既失去了习惯的住所，又损失了自己的财产。处于这种境况的人很多，包括，如我昨天得知，我的一个早年的好友也遭到这样的命运，他的房子已被没收，现在的问题是要决定，是否还让他留在自己的房子里，虽然他一家人已经挤在两间房里了。有关征用的总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毫无疑问，其中许多做法是不需要的，是多余的和残酷无情的。

我非常感谢您的善意的忠告——迁往南方。但要这样做，对我来说十分困难。以我的年龄，这样的迁移谈何容易，何况我的命运已经如此，到了那里我也不会更安静。这里对我个人，是很关心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到了那里也难以避免。而在那里也像在这里一样，人们会向我提出质问和责难，问我为什么沉默不语，为什么不像以前在沙皇政权时写揭露文章那样写文章，等等。人们太单纯了，他们不知道我现在连写作的地方都没有。当然，我也不那么天真，会期待布尔什维克政权宽容一些，能够根据我的健康和心脏状况，安排我的活动方式。但是当肃反委员会开始执行一连串不经审判的枪决之后，当他们不是枪决强盗，而是为“过去的事”而枪决政治对手之后，并且把病人押到墓地，放到挖好的墓旁，像狗一样地枪杀，“没有任何手续地”把人推入坑内，随即掩埋掉，那么，不论这类事发生在哪里，在波尔塔瓦或是在克里米亚，我都不能无动于衷。这就是我曾在给您的电报中提到的不经审判而处决的情况。甚至连地方的“执委会”也不知道用这种方式枪决的不只是强盗。现在这种不必要的残暴做法已经停止，但我无法设想出一个地点和环境，使我处于其中而能作为这类事件的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不设法干预。如果上述“非常”做法继续下去，那么当现在革命法庭开始行动之时，——只审判几十个人是不够的。就说前几天，对某个伊林斯基一家进行了审判。人们坚持说，这名70岁的

老人也要被判处枪决。但是，在审判时不少证人的证词证实，他们一家对居民很好，而倒行逆施的判决则是某一个坏蛋强行制造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判，他将向当地农民勒索3万卢布。情况竟是这样的明显无误，以致指控的主要证人当场被捕，而被告在所有旁听者如雷般的掌声中被宣布无罪。所有的红军战士都鼓了掌。甚至连看管被告的卫兵也放下枪支，参加鼓掌。但是……被告已在监狱蹲了几个月，而他们的儿子，也被逮捕，染上伤寒死了……。

为了这伊林斯基一家的事，我也曾步履蹒跚地往返于肃反委员会，替他们说情。为他们说情的还有普拉斯科维娅·谢苗诺夫娜，但是，当然，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一切材料证明他们是人民凶恶的敌人，必须进行公判，等等。然而，请看，这是什么样的材料呢！……如果不同公开法庭斡旋和争论，伊林斯基很可能早被枪决了，而“柯罗连科老头”的说情也很容易被说成是过分宽容和对革命要求的不理解！

在结束这封长信的时候，还要就我在电报中提到的斯波金说两句话。对我而言，我也曾努力为他的案件奔波过，这个案件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曾是（盖特曼时期！）米尔哥罗德的卫戍司令。这是一位残疾人，是一位和善亲切的人，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从事过任何过激行动，没有参与过惩戒讨伐行动，没有逮捕过人，更不用说枪决之类的事了。他只限于在形式上履行地方政权的指示，而对卫戍司令的职务极其苦恼，正因为如此才离职到罗姆内担任副团长的职务。他已经不为佩特留拉分子服务了，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想找一份别的，更加安宁的工作。

但是仍然逮捕了他。审讯后将他释放了。后来又逮捕一次，又将他释放了，复活节后又第三次逮捕了他。这个心脏有病的老人不得不一连几夜经受等待“行政方式处决”的折磨。但对我而言，除了这一整套程序的残酷无情之外，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能否仅仅因为有人为旧政府服务过就加以处决，或用别的方式惩

罚？或者说，只能由于过分滥用权力或残忍行为才能如此加以审判。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斯波金之后还会出现许多与警察、官吏及军事细节有关的案件，而告密和公报私仇现象的肆无忌惮也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当然，这里也可以说“我们有材料”，等等。但最后我还应当补充说，我是一个老新闻记者和政论作家。我曾经在最困难的时期写了许多有关最尖锐问题的文章。我的文章甚至在沙皇政府的检查机关得以通过，一次也没有被扣压。我不仅是一个“善良温厚的老头”。我知道认定一件事有多难，所以我从不信口胡说和信笔胡写。因此，旨在批驳我和把我送上法庭的侦查活动，每次都发现，我听说的比我能够写的甚至还少些，而我所写的，则是无法批驳的。

现在没有什么报刊可以供我写作。只好不由自主地在私人场合谈论，变成了“说项者”。但是，拒绝介入周围的生活，即使其中一部分，无论住在哪里，我都是做不到的。不管怎样，还是感谢您的善意忠告。

还要谈一谈苏维埃出版社的提议。我很难这样笼统地做出回答。因为我的作品先前已经按照各种合同分别交给了各个出版社，而且已经预付了我急需的稿酬。我的不少作品已经出版。可您知道，目前要出版一本书意味着什么。因此，我认为自己无权再交出作品（而且是如此笼统地）而违背自己的义务。我因此需要更详细地知道，究竟建议出版什么，对每一部作品都要专门考虑，当然，苏维埃出版社出书，会比我现在打交道的合作出版社便宜得多。但我不认为自己（而不是指别的人）有权违反同它们签订的合同而分割它们的利益。

握手，并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波尔塔瓦，小花园街1号

又及：还想就出版社的事补充几句。自然，出版价钱便宜的书——是件好事。但是，总的来说，自由发展图书出版事业，是更好的事。“用公款”的出版社从文义上讲不可能取代独立的出版社，而如果它想要取得领先地位并在书刊市场获得优势的话，那它必将成为矫揉造作的事业而压抑文学。至于想等待出现这一事业的新的形式那还早得很，正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摧毁旧的生产方式要比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容易得多。

我觉得还有许多事要告诉您。不过以后再写吧，如果您有时间去读“柯罗连科老头”的信的话。您看，就在这方面，关于广泛和自由地发展图书出版事业方面，便有许多话可说……

现在，斯波金及家人自己请求接受审判，以免第四次再被捕。我只请求把他交给我保释，直到开庭为止。

№01684

柯罗连科关于出版社问题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5月18日)

1919年5月18日

于波尔塔瓦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从您寄来的季诺维耶夫的电报中看出，你们发生了某种误会：我写信给您说过，我的作品大部分按照合同已经给了各合作出版社（3个），我根本无权如彼得堡出版社所设想的那样，大量支配它们。要知道，这样做就意味着直接破坏了签订的合同，因为根据这些合同许多作品已经出版，许多正开始出版，许多已预付稿酬。出版商耗费了资金而我竟要同时交给他人出版。

因此，我不可能如此大量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彼得堡出版社。只能拿出少量短篇小说和文章，这些作品或者尚未交给任何人作为单行本出版，或者因某种原因出版商实际上尚未将其出版。前一类很少（在信中列出的作品中属于这一类的只有通称《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很少的一组文章）。其余的部分给了“作家出版社”、“大家族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均在莫斯科）和“柯罗连科民间文学丛书”。此外，根据合同“大家族出版社”正在出版我的全集。也许还可以抽出某些作品，但是为此不与上述出版社联系是不行的。而在目前信函往返条件下，这需要时间。我已经写信讲过，必须等候回信。

向您说实话，对于任何官方的出版社，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我内心是很难一下子接受的。对于作家，特别是对于一名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来说，最珍贵的就是完全不依赖于任何政权。而你们布尔什维克现在就是政权，而且不必讳言，是一种经常压制其他信仰的政权。因此可以理解，独立作家的第一个冲动便是在出版作品时回避“官方”的印记。我对自己说，我们的制度经常变动，但是应当有这样一些使生活不应中断的生活领域。这样的领域之一就是书籍的传播。因此不应当回避这方面的共同工作，只要“官方”垄断的最坏影响尚未在其中显现出来，只要在其中能进行有效的工作，而不是以官方手段在书刊市场上压制对手。而这种状态目前似乎并不存在（关于期刊就是这样：报纸和杂志被查封，纸张被没收去用于“官方出版物”）。根据这一考虑，我原则上并不回避彼得堡出版社。秩序和制度不断变化，让书籍保留下来吧！但是把我的作品的出版重心转移到这个出版社我做不到。在我能够自由处理自己的作品以前，我不能这样做。

在书单中提到的而我又有权处理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一组文章中，有一篇半小说体裁的随笔（《第13号屋》），也曾被别人出版过。不过，我想，经过与出版商商议后，我能够把它列入这一组文集。此外，还有一篇近年来（革命前）写的文章，叫做《玛里阿姆波尔的背叛》。它曾在《俄罗斯新闻》上刊载，并由莫斯科的犹太人准确消息传播协会收入小册子《格尔沙诺维奇事件》予以转载。这本小册子有许多印刷错误。如果决定刊印，我将寄校订本去。

我不想再增加这封信的内容。您的工作一定很多。但是我不能不再说几句关于一位现在住在奥德萨的老学者的事。原先他是喀山的一名教授，Г.Я. 阿法纳西耶夫。人们没收了他的3个房间，拿走了打字机，搬走了他的大学生儿子的绘图桌。现在，据他在信中

说，正威胁他要把他们一家赶出住所。能否不打扰一位为教育做过许多工作的老人及其家庭，并且把打字机和绘图桌还给他们？不要拿走他们本来不多的床单和衣服。

请您原谅我常常因小事麻烦您。而我已经十分节制了。否则，如果不控制自己，我写这类信之多会使您无法应付。

我再谈点一般的看法。以前农民曾经认为，把原先地主们的土地没收过来，就足够分配给所有农民了。现在，“无产阶级”和代表他们的政权也存在这样天真的误解，以为只要把资产阶级的衣服剥掉，就足够所有贫困的无产者穿着了。剥掉衣服，——再容易不过了。但是，要使这么多贫困的人都穿上衣服，则是天真的幻想，只会导致不好的后果。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01685

柯罗连科关于哈尔科夫文化协会等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2日)

1919年6月2日

于波尔塔瓦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又不得不就具有原则性和广泛社会意义的事给您写信。

4月份是哈尔科夫群众文化普及协会^①成立50周年的日子。这不仅只是哈尔科夫引以为骄傲的组织，因为就其任务、职责、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它都是俄罗斯最好的教育组织之一。几十年来，它曾为反对旧政府而斗争，整个俄罗斯知识界都积极参与了这一斗争。协会几次濒临关闭，但是它的事业深入人心，得到广大居民群众的关心。致使专制政府的部长们也不敢对它下手，以至一再拖延。

革命后，这种无时不在的危险当能一去不复返了。盖特曼的乌克兰，准确地说，是盖特曼政府中的沙文主义分子对这个共同文化的传播者仇恨不已，但也不敢采取任何断然措施。之后，布尔什维克来到这里。

你们政权成立的头两个月，看来对于协会也没有什么不利之处。诚然，它立即丧失了许多收入来源（市里的和地方自治局的资

^① 哈尔科夫群众文化普及协会是1869年建立的全俄教育中心，属社会组织，于1920年解散。

助，募集资财的利息，协会出租房屋的租金等），但是这是你们政府的一般措施所造成的，并非是直接针对该协会的。相反，协会受到全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善意关怀和承认。教育人民委员部还为协会拨款 5.4 万卢布，用作必不可少的开支，以弥补被减少的收入。

但是，随之出现了新曲调。我已经向您写信提到在你们的阶级专制政体中形成的官僚主义的最坏方面。其中的一个表现便是企图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包括原来一切顺利进行，而且一直仅由社会力量管理而无官方干预的事务。布尔什维克们确实认为，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取措施帮助它们生长。这样一来，当然，许多原先自行生长的东西都被践踏了。

布尔什维克政权力求在一切地方压制任何自治行为。首先，你们消灭了城市自治机关和地方自治局。如果今年冬天我们所有人都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那样在寒冷中生活，那么很容易证明，这不仅是总的交通运输混乱等等的结果，而且也是城市地方自治机构被取消的结果。现在的政府过于自信地把整个燃料供应工作揽在自己手里，而从前的自治机构只是巧妙地调节价格，以及只控制不超过 1/5 的燃料储备。其余的全由私人经营。

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还是回到文化普及协会吧。哈尔科夫国民教育局已经对一个甚至在沙皇制度下都能利用广大空间和阳光而成长的优秀机关动手了。“为了发展真正的教育工作”，这个局开始把一个生气勃勃的完整事业弄得四分五裂，将它们分到自己的各个科里，但是，如果实际上不去触动这个并非“官方的”，而是纯粹社会的首创活动，似乎仍有很多余地。接着是决定从协会“转划”走 4 个图书阅览室、1 个校外教育咨询室（这个室拥有一个由工作细致热情的委员会多年建立的完好的图书馆），等等。完整的事业

将要被分解，书籍、展品之类的物品将一再转移，还要建立起专门的编制，支出会大大增加（用于官僚主义地处理问题），而这个机构在最不利的沙皇制度条件下却能成长、发展和繁荣。

有必要这样做吗？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表现那里并不存在的创造性，为了在工作总结中即在字面上使一切都十分漂亮。而事业本身却会因此而停顿不前，受到损害。

人们听到周围关于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工作负担过重的埋怨。应当承认，这里有许多是真的。但是也要批判地对待这样一个问题：这类工作中的一大部分在于改动原先本来搞得很好的工作，改组原先本来顺利、方便、扎实地进行的事，这样做是否必要？

现在谈另一件事。

取消县级肃反委员会的做法不能不令人欢迎，只要……这一切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在本地省执委会和您的电报的干预下，我写信向您提到的不经审判的枪决事件在波尔塔瓦已经停止。但是县级的肃反委员会至今仍在进行枪决。在科贝里亚基不久前就枪决了近10个人，在其他县城也有类似的做法。

据说不久前有3名米尔哥罗德人被押解到基辅你们那里，他们是沙鲁达、谢加尔和另一个同伴雅斯特列博佐夫，全是农村青年，看来是涉及最近一次米尔哥罗德的暴动事件^①，我不知道，指控他们有什么证据。但是我知道，抛开政治不论，他们是极好的青年人。其中一个，沙鲁达，我认识，出身于西沙基的农民家庭。一想到这个青年的生命或许已经结束，我的心就发疼……啊，多么需要，多么需要更多的人性。

据我所知，有一封电报发到基辅，说到从哈尔科夫来了一批警

^① 1919年4月3日深夜，在米尔哥罗德发生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为首的是前沙皇军官杜甫塔克。

察（70人），不经知照波尔塔瓦政权机关而逮捕了波尔塔瓦普拉斯科维耶夫基村的12个居民。这是以地方恩怨为基础的惊人的滥用权力。

握手并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No01686

柯罗连科关于肃反委员会枪决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11日)

1919年6月11日

于波尔塔瓦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今天（6月11日）本地的《消息报》刊载了一则报道，说根据波尔塔瓦省肃反委员会的决定枪决了4名“反革命分子”：尼基秋克、克拉西连科、扎波罗热茨和马尔琴科（最后一位才17岁，差不多还是孩子）。您应当记得，就肃反委员会枪决8个人一事（在4月里）我曾给您发去一份加急电报。（感谢您！）第二天（4月7日或8日）的回电，制止了预定的一连串枪决。您也给我来电报说，正在筹建法庭，对它们的公正性可以完全信赖。此后，我们那里再也不曾有过不经审判的枪决。法庭力图使工作走上尽可能符合法制的轨道。从基辅来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法庭庭长促进了这一趋向。

可惜的是，所有这一切缺乏足够的坚定性与持久性。近日我们从报刊上读到，从基辅来了一个社会主义检查团（这一类组织），而且又是要改善和指导地方肃反委员会的活动。而正是在这之后，不经审判的枪决又开始了。我同“检查团”的某些工人成员谈过话。有一篇文章（或演讲）在谈论这个“检查团”时提到“工人的本能”。可惜除了本能以外，在这类问题上还需要知道关于法制的

基本原则，而这里完全没有认识到，行政侦查机关（即使是“集体讨论”）做出的判决决定（死刑！），实际上就是不经审判的迫害，是谋杀，而不是执行判决。我已经写信向您说过关于在法庭上顺利地证明伊林斯基（夫妇）无罪的事，而肃反委员会先前却已将伊林斯基列入被您的电报所制止的那一连串枪决之列：对最后判决连红军战士也一致拍手赞成……而现在又开始不经审判地枪决，其中包括几乎是孩子的青年马尔钦科和乌克兰剧团的演员克拉西连科。要知道，乌克兰社会多么重视自己的演员群体。长时期以来戏剧是乌克兰文化的惟一发源地，因此涉及戏剧的一切动向都会使乌克兰人戒备起来。而根据某种秘密决定不经审判的夜间杀害（就在街上），必将在第二天一早就因看到人血而聚集成人群……这对谁有利？为谁服务呢？

有人对我说，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残酷行为更加严重，而在你们基辅，则是“以赤色恐怖的方式”进行的。要使这些现象摆脱不经审判的残暴行为的耻辱性质，仅仅称之为某种“方式”是不够的。所以当我在你们的报纸上读到关于“白匪刽子手”的消息时，不禁想起他们的报纸也曾写到过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于是我忧伤地想到，所有这一切竟和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不过还是回过来说说波尔塔瓦的事吧。只需要其中某一样：或者支持来自法庭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制潮流，或者……当发生不经审判的枪决时（没有审判的形式，没有辩护，没有公开讯问证人），而是由纯粹的行政和受到所有人谴责的（不必对此视而不见）机关做出决定时，也不必做表面文章玩弄法制游戏。

在处决执行后的那一天，我来到肃反委员会。人们对我说，这不是他们的判决，枪决是根据“特别部”的判决执行的，而肃反委员会则持否定意见。今天这一否定的意见已不存在。但是，具有典型性的是，似乎已经停止了的现象竟恢复得如此容易。只要以纯粹

官僚主义的方式改变一下称呼，就又可以不经审判随意枪决无论多少。我曾打听，“特别部”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其主要任务乃是同开小差现象作斗争。但这次案件与开小差事件并无任何相似之处。

我为什么要写信给您说这些呢？您曾经给我来电报说，很快答复我的信。我没有收到这封回信。不要以为我有什么意见。我十分清楚，您没有时间，……有许多别的事。我写信给您不是为了辩论，而是因为一想到我们之间一度曾在许多方面（在重要问题上）的想法相同，我便无法沉默。最后还因为，我认为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一致之处。也许，柯罗连科老头的某些话，虽然保留有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法制、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等方面的偏见，仍能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灵中获得反响。

我想详细向您说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有个叫库利科夫^①的人（看来是哈尔科夫的军人），是波尔塔瓦县普拉斯科维耶夫卡村人，干预地方事务，不通知波尔塔瓦地方政权机关，逮捕了10名农民和2名女教师，押往哈尔科夫，并在那里进行拷打，强迫他们承认是“反革命”。其间，他从普拉斯科维耶夫卡不仅带走被告，而且带去了“自己”专门选定的侦查人员。据5月7日哈尔科夫《旗帜报》^②第2期刊载的消息，这些“侦查人员”残酷地拷打被告。我不再描绘细节，因为事情已经公开曝光，波尔塔瓦政权机关正要求恢复“按管辖范围审判”。是否能成功，——还不知道。看来，整个事件是因地方利益引的的报复行为。

最后是两个“个别事件”。您那里，在基辅，有一位年老病弱，几近死亡的女作家亚历山大·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沙别利斯卡娅。她

^① 库利科夫，Г.И.（1890～1950），普拉斯科维耶夫卡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在红军中担任各种指挥职务。

^② 《旗帜报》，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机关报，仅出版两期（1919年5月6日和7日），就被当地苏维埃政权取缔。

曾在《祖国记事》杂志工作，她的一些中篇小说曾引起人们关注。如今她多病而不幸。布尔什维克第一次来到时，她的儿子被杀死了。1月份，她被逐出住所。她在当教授的丈夫死亡11年来一直领取养老金过活，现在连这件事也有人刁难。能否为改善这位年老而极其不幸的女作家的境遇做一些什么？

还有：基辅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医生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巴济列夫斯基。我们这里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沙雷医生，克列缅丘格公民，一个有过卓越经历的人，请我转告您，巴济列夫斯基决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不应受到镇压，我乐意完成他的委托。

握手。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19年6月13日

又及：为了一切神圣的事物，请制止不经审判的枪决，不管是谁实行的：特别部也好，肃反委员会也好，还有别的什么人也好。现在我得知，肃反委员会的特工不时挑唆青少年们，人为地制造阴谋活动，然后又策划就这类人为制造的“阴谋”实施枪决。这种做法应予以立即制止。例如，某一个名叫赫拉涅维奇，阿基莫娃·米哈伊拉的姑娘，及其他人的案子就是如此。我怕我的信迟到了。我也将在这里奔走呼号，包括去找有关的肃反委员会，以及去执委会。

我曾同您说起过而现在由我担保已获释放的斯波金十分确定地告诉我说，“特别部”又有意逮捕他进行不经审判的迫害。难道这样的耻辱行为，且不管以前如何，竟有可能实现?! 法庭审阅了他的案卷后没有找出任何严重的问题，但并未结束，因为不知道他是否会因什么问题又将被送法院审理，而他本人也请求这样做，以免再次被逮捕。我写信告诉过您这件案子的重要性及为此案奔走的原因。

No01687

柯罗连科关于人质问题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18日)

1919年6月18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在你们的上空，也就是说，在你们党的上空，显然乌云密布。我这样判断，与其说是根据报纸上关于邓尼金分子日益逼近的消息和大量当然是经过渲染的传说，不如说是根据残酷行为的增加，而残酷行为一向是恐惧造成的结果。哈尔科夫已经在“枪决资产阶级”（我们这里官方的《消息报》的一篇报道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并劫持人质。

恐惧不是好的参谋。我记得我们这里在佩特留拉分子统治的最后日子里都在等待布尔什维克的到来：人们感觉到，到来的是一支有自我意识且比较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不会有殴打、暗杀和残酷行为。虽然你们也曾经有过相反的事例，即也曾经有过不必要的和无的放矢的残酷行为，但这似乎已被人淡忘（如今“过去的事”很快就被淡忘）。果然，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在我们那里的行为令人感到这真是一支比较安定的力量。现在这已成为过去。现在情况如何呢？全城都知道，特别部已经瞄定了4个人，有一天夜里开来一辆汽车，要在夜里把他们押往墓地枪决。在这4人中是已有一名17岁的男孩成为陷害的牺牲者。据说，司令员制止了这一次处决，下令转交法庭审理。但是，这消息是否

属实无人知晓。有目共睹的是全城都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4个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悬于生与死的边缘，在公开审判与不经审判而由某一个阴险的非公开机构决定处决之间。……也可能夜里开来汽车，把人拖入车子，在夜里枪杀，把人，把也许还活着的人，抛入预先挖好的坑内，加以掩埋。……偶然性可以很容易地猜想到，并无敌对和仇视情绪的人们的同情在哪一边。……要知道，人性毕竟并未泯灭。

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您真以为这样做会有用处，或者能吓住人们和告诫人们。源于事实的这类广泛存在的“日常的”影响和感觉，是对你们，以及对一切因惊慌失措而采用强力的人最有害的宣传鼓动。

对你们来说，危险来自何方？不仅仅来自直接的敌人，而且是来自你们所创造的条件。当然对您也不是秘密，目前农村中反共产主义情绪正在增长，而在表面驯服的掩盖下，动乱的情绪正在发展。而一旦发生动乱，首先积极参加的正是那些目前乔装为你们的信徒而以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名义对周围人们进行恫吓的人。当布尔什维克于3月份第一次来到时，有许多农民在他们之前涌入城市，似乎是来帮助布尔什维克。有一些人无法无天，主要在城郊流窜，破门入户，枪劫财物，任意杀人。当布尔什维克最后一次来到时，他们销声匿迹了。我曾亲眼看到其中一伙人分散开来，四处躲藏。好像是某团团长什梅金……现在，这些强盗又在农村积聚了一定势力，抓人，枪劫，杀害被捕者（我向地方当局呈交了这类事件的材料）。我向您保证，这些人在等待出现新变化，以便抢在邓尼金分子之前大捞一把。

你们以为在这方面“人质”会对你们有用处吗？就说哈尔科夫吧，那里逮捕了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诺索维奇。他的名字一度（在沙皇政权时期）为整个俄罗斯知识界所知晓。他曾勇敢地进行

了关于勒拿枪杀事件^①、关于赖因博特案件^②、关于苏霍姆利诺夫案件^③的侦讯。现在他被作为人质逮捕。为什么？为了一旦发生危险就将他枪决。这样做能恫吓谁呢？能防止什么呢？对于那些在乡村各处，也在城市中，熙攘涌动的愚昧无知的人群（因为生活无着，缺衣少食，其中有的可能以抢劫为生）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能顾及你们那里监禁着一个曾表现为勇敢正直的公民的人吗？

我们这里有一次作为人质逮捕了原市长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谢缅琴科。在城里和自己村子中（他在那里有一个不大的庄园）许多人都知道他。他面临危险看来使许多人感到痛苦，但对于准备起来反对你们的人并非如此……一般说来，抓人质的做法是野蛮时代的可耻遗毒，现在则是毫无道理和无的放矢的。我们这里还没有染上这种毛病，这是我们本地地方政权的光荣。约一个月以前抓去的“人质”很快即被释放，目前并没有逮捕新的人质。这两种潮流究竟哪一种会占上风呢：是哈尔科夫因恐惧而实行的“赤色恐怖”呢？还是目前我们这里比较平静的气氛呢？如果处于您的地位，我会更信任叶戈罗夫司令^④（他用法庭的审判取代特别部的阴险的裁决）和省执委会中那些头脑清醒、不诉诸残酷行为的委员们。

去年在布尔什维克撤退时曾有过一种谣传，说他们预定要拿我作人质。可能这不是真的。当时我对此并不在意，而且就在当天还乘车前往车站，为释放6个农民而奔走。我们（代表团）做到了这一点，当发生盖特曼时期用维林斯克监狱大肆逮捕的暴虐行为时，

① 指1912年4月17日沙皇军队对勒拿采金工业公司矿工的镇压事件。

② 赖因博特，阿·阿·（1868～1918），沙俄将军，因其在担任莫斯科市长期间（1906～1907）的行政警察暴行，迫于社会暴动的压力，被解职并送交法庭。

③ 苏霍姆利诺夫，B. A.（1848～1926），沙俄将军，1909年起担任陆军部长。1915年俄军在战场失利后被解职，第二年初被捕。

④ 叶戈罗夫，阿·伊·（1883～1939），国内战争中任集团军、方面军和军区司令员。

我在报纸上指出了在激愤和混乱之际释放那几个农民的事实。……不过，请设想一下，如果传闻竟是真的，我被抓去当了“人质”，事情会是怎样呢？这会使谁懊丧，使谁受到恫吓呢？也许有某些人会感到懊丧，但是那些同你们斗争的人只会举手欢庆。请相信我，现在看到“人质”，可尊敬的人，受到你们的威胁而同样举手欢庆的正是那些秘密反对你们的人。他们为此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而采取这种中世纪野蛮手段的布尔什维克却要为此蒙羞。

衷心希望您的名字能同反对“劫持人质”的人连在一起，而不是跟丧失理智诉诸“劫持人质”的人连在一起。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No01688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奥斯特洛夫斯基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6月20日)

1919年6月20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现在我回答您关于波尔塔瓦枪杀事件的垂询。迟复的原因是我必须搜集准确的材料，而这两天我又因一个人的生命而忐忑不安：此人已被判决。全市因这一不公正的判决可能执行而处于阴暗之中。这指的是乌克兰剧团的一名演员、剧作家兼导演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已经向您写过，乌克兰社会对于自己的天才人士，特别是演员和作家十分珍惜，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又是一个十分受人喜爱和得到普遍尊重的人。对他的判决，是一次荒谬和不公正的判决，是对乌克兰人（其中包括你们的信徒）正当感情的挑衅。社会革命党共产主义斗争派的一名党员（他在波尔塔瓦的革命生活中享有显要位置，是他领导的支队于1918年11月在正规的苏维埃部队来到之前先占领了波尔塔瓦）就此事呈交了一份公开声明，其中写道：“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消极怠工，还是别的什么，但出于我的革命责任心我不能不说出自己坚定的信念：矛头指向中立人士（我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人）的毫无意义的恐怖行为，这是为反革命的利益服务。”

眼下这个案件（连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移交到了基辅，这个人的生命就取决于基辅的特别部了。目前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甚至

包括你们的乌克兰人，都在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个人的生命。如果您愿意了解这件案子，那么案卷中应当会有马杰普·布加耶夫斯基的便条，上面一段话就是我从其中摘引出来的。从这张便条完全可以看出，即使假设某些指控正确，这也是因为过去的事而对现今持中立态度的人士进行报复。要报的仇是，他过去竟敢做一个乌克兰自主派。和你们并肩斗争过的这一位你们的人又写道：“现在，许多过去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立场上的人，改变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就算不是积极的拥护者，至少也不是敌人……如果对所有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中立态度的人实行枪决，那么势必要把居民的一半都枪毙。”

我想，说一半还是少了，而按照这样的尺度行事，这个比例还要不断增加，因为这样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群众直接划入不可靠的行列。

您可以看出，这都是由于激动不安造成的。这几天，当这个已被判决但现在又送往基辅的人的命运即将决定之时，我就处于这种激动不安的情绪控制之下。我衷心地恳请您即使不对他表示怜悯，也要坚持正义、司法公正，以及……为政权利益着想。

现在转而谈谈一般性问题。您想了解有关波尔塔瓦枪决事件的具体情况，以下便是。

在布尔什维克取代了张皇失措的佩特留拉分子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庆幸处决不再发生，秩序和政权相对宽容的气氛将会代替各种残暴行为。但是后来，报纸上出现最初来自县城的关于根据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实行死刑处决的报道。开始人们以为是处决那些确实野蛮地残杀了许多人家的强盗，而我也没有特别关注这一现象，现在仍为此不断严厉责怪自己。还在3月4日，在克列缅丘格就枪决了两名“反革命分子”：沃尔科夫和电车售票员巴图申（3月13日波尔塔瓦《消息报》）。后来，3月末，又出现了在波尔

塔瓦枪决 3 个人的报道：其中 2 个（博伊科和沙夫孔）因为抢劫，第 3 个（达维德·叶菲莫夫）是“1918 年 3 月 22 日布尔什维克到来以前曾在专制政权卫队中工作过”（也就是说，是为过去的事情进行报复）。接着，4 月 5 日，波尔塔瓦全城盛传一个可怕的关于大量枪决人（8 个人）的消息。关于这一次事件我当时曾发电报给您。甚至在执行委员会中，人们也以为是枪决强盗。但当我带去城里众所知晓的姓名时，执行委员会立即制止了继续枪决的做法（预定要处决 35 人）。这几起枪决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夜间，人们被押往墓地中已经挖好的坟坑旁，站到架在坑上的木板上，然后被开枪杀死。人落入坑内，随即掩埋，也许人还活着！列夫琴科是由别人把他抬到木板上的，因为他有病在身，既不能坐，也不能站。我认识的第二个人是什库鲁比，一个列舍季洛夫卡的农民。他拥有总共 15 俄亩的土地，但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是他的农民把他送到柏林去的。这就足够了：就是说，是个活跃人物。我为他奔走调查，事后又搜集材料，并且越来越相信，他是无辜死去的。在盖特曼时期，他被任命为乡长，但他拒绝接受，因为不愿意扮演政治角色。农民中也有别的思潮：在农业社会周围纯粹经营性的派别，什库鲁比就为经济目的去过柏林。我在肃反委员会指出了这一切，但什库鲁比被突然枪决使我十分痛苦和吃惊。列舍季洛夫卡是一个小地方（12000 多人），人们很长时间不会忘记这次对一个颇有知识的农民的处决。现在贫农和中农正在明显地接近，布尔什维克政府也承认这一点，而什库鲁比就是一个优秀的中农。然而所有这些认识，是一个枪决人的机构所无法理解的。

我记不起，因而现在无法举出其他被枪决的人的姓名。我只知道，即使其中有 2~3 个强盗，但决不会再多。其他“反革命分子”哪些方面不可靠，常常根本无从证明。

自那以后——感谢您和当地的执行委员会——肃反委员会使处

决受到限制，随后其原成员中有人被送法院审判（受指控的罪名十分丑恶），再后有部分人被调离。但在各县枪决之事仍继续发生。暗杀一名叫做科米萨罗夫的13岁的男孩（他是克列缅丘格肃反委员会要求逮捕、后来在途中失踪的）和科别利亚基肃反委员会枪决诺维茨基这两件事给人的印象特别深。

但是，在5月8日至9日的夜间，又发生了新的案例。夜间在通往墓地的科别利亚基大街上响起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和枪响。原来是有4个人被押往墓地。虽然他们带着镣铐，但……似乎还是有一人逃跑。逃跑的虽只有一个，所有人却都被用手提机枪打死了。早上，那里聚集起人群，尽管被赶散了，人们还是看到一片血泊，而且有狗在上面用鼻子嗅。这种情景给人造成的印象难以描绘，而且还有亲人们的绝望哭号……当时被枪杀的有：马尔琴科（17岁的少年）、尼基秋克（自来水管道工人的儿子）、克拉西连科（乌克兰剧团的演员）和扎波罗热茨。他们都是政治犯。我想，从乡村来城里和从城里去乡下而路过的人们，走路的和乘车的，他们所散布的影响，足可以比得上几百张传单和几百名宣传员的作用。共同的印象又是，无辜的人遭到枪杀。……是的，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别的情绪。事后执行委员会也得知了这一切。我曾写信给您谈及此事，这一封信就是您的电报引发的。

不久，在波尔塔瓦的《消息报》上刊登报道说，某些人是根据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而枪决的。但二、三天之后又出现驳斥的消息。肃反委员会否认是自己决定的。枪决是特别部实施的（6月14日《消息报》）。

以这种方式流洒的人们的鲜血形成一种对苏维埃政权不利的有害的影响。对此，据我看来，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觉察。至少在那以后，每当夜间提取被关押者而目的不清楚时，监狱开始根据省监禁办委员会的指示要求出具确切说明和履行手续。这样，6

月13日一名被捕者，14日4名被捕者未予立即交出。这样，一名被判决人员的妻子得以向叶戈罗夫司令提出申诉。叶戈罗夫制止了死刑执行，下令将这个案子（或几个案子？）交由法庭审理。叶戈罗夫在对付格里戈里耶夫分子^①的公开战斗中也有良好表现。他的观点是，为了保持战士的荣誉，与其在后方像6月8日在波尔塔瓦市科别里亚基大街上特别部所取得的胜利那样取胜，还不如在公开的战争中多面对100名敌人：

还有一个细节：在这种阴森的气氛下，同是6月份，一天深夜又要求提走一名被捕者。又因手续不全，此人暂时未被带走……后来查明，此人根本无罪，遂被释放。

您在电报中写道，我应当注意到，这种杀人的浪潮可能酿成血流成河的惨状。是的，我对这一切都予以关注。一般说来，我承认现实。不过我并不是只从某一个方面来看待现实。我也注意到有人把上述阴森的枪决推诿给犹太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身上。有奇谈怪论说，6月8日押送被捕者的只是肃反委员会中的犹太人，等等，等等。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一段时间内我仍然想，如果布尔什维克能够坚持冷静和自制，那么很可能他们将在斗争中获得胜利，那时他们将不得不自己面对自己的主要重大错误，并在和平的基础上同它们的后果作斗争。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现在，由于“红色恐怖”、逮捕人质、不经审判的处决的影响，这种心情正在消失。之所以对你们政权丧失信心，是因为你们（我不是讲个人）惊慌失措，捕风捉影，而且随意消灭个别人，使这一切成为“日常可见的现象”，这立即对群众产生影响。

是的，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我也不是佩特留拉分子，也不是

^① 格里戈里耶夫分子，指1919年5~6月在乌克兰南部参加反苏暴动的人，为首的是前沙俄将军格里戈里耶夫。

邓尼金分子，不相信外界的干涉有什么好处。我不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家。但我相信，我坚信，我确知，仍然存在一种道义的力量，它一旦觉醒，许多事情即将发生变化。因此，我努力在野蛮之中唤醒人性，我不仅相信，而且确知人性不仅不会损害，而且会有助于斗争本身。在公开战斗中英勇刚毅，对战败者表现人性，这才是人类斗争，而不是野兽互咬的真正公式。现在很少有人理解，敢于坦诚表现这种心情的人是多么强大有力……但你们，布尔什维克，却没有这种心情。基辅和哈尔科夫的“红色恐怖”和“红色恐怖方式”……证明了这一点。这类现象目前在波尔塔瓦较之我们的西面和东面地区要少些。但是，正如您所看到的，这些已经足够了。主要的是：不同的思潮正在斗争，而一旦更加残暴的思潮取胜，那么最最荒谬绝伦的，也是对你们最最有危害的残暴行为就会大肆泛滥。

我向您写信讲过我对逮捕人质的见解。我们这里也已开始抓人质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战争期间我注意过这种现象，可不记得哪一次枪决过军事人质。而我们这里已经有过，在哈尔科夫现在还有。

我感到该结束了，但我不得不再谈一件与枪决无关，但更加使我激动不已的事。我本想尽量不由您出面干预，以为事实如此显而易见，如此令人气愤，只要准确无误地向任何一级政权机关提出，就必然会得到制止。但是现在我看到，没有强力的干预是不行的。地方政权软弱无力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事情是这样的：在波尔塔瓦县有一个叫做普拉斯科维耶夫卡的大村子。村中两个当地的党派相互争斗。当地居民告诉我说，事情都是从某一个什么“野猪仔”引起的。请原谅，这像一则笑话，但正如您所看到的，这里的一切都像是一则阴森神秘而又鲜血淋漓的笑话。其中一个党的党员，农民库利克（或库利科夫），显然是个颇为能干的人，官运亨通，担任过哈尔科夫市的城防司令（现在在

炮兵主管部门担任要职)。他威风凛凛地回家乡休假，认为自己有能力干涉此地的恩怨。他带来一批红军战士，把2名女教师（神父的妻子斯特拉尚斯卡娅和杜德尼克）和10个农民抓作俘虏，而且竟不告知本地当局而押往哈尔科夫。此外，他还带去几名对方那个党的成员，作为这一事件的专门侦查人员。此后，在哈尔科夫的一份报纸《旗帜报》（6月7日）刊载了一则消息，说关在拘留所（在别祖格洛夫巷）里的一些波尔塔瓦人受到也是波尔塔瓦的侦查人员（即他们在普拉斯科维耶夫卡的直接敌人）的拷打。

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法庭（或执委会）下属司法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于是向基辅发了3份电报，向哈尔科夫发了1份电报，要求归还，由原管辖法院审理和立即把被捕者移交到波尔塔瓦。但是……至今不见任何结果。而其间一个波尔塔瓦人已被拷打致死（安东尼·科列茨基），另有3人则在医院中濒临死亡。曾派人前往哈尔科夫。当地执委会同意把被捕者放回波尔塔瓦，但军事当局（受库利科夫的影响）不同意，想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刑讯已得到公开证实，案件引起轰动……在这种情况下审理和判决能意味着什么？我在沙皇制度时期写过许多关于刑讯的事，但从不记得有类似的例子。在沙皇统治下我会把这一切公诸报端。现在只能写“报告”。如果在报纸上披露，全俄罗斯都将愤怒和惊恐得颤抖。写了“报告”以后，人们仍然继续遭受折磨和恫吓，目的是通过逼供和诬陷把案子摆平。

怎么办！再向上一级写报告。难道竟没有一种力量能制止这种令人发指而又如此荒谬无比的血腥罪行。

最后，握手并衷心祝愿您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01689

柯罗连科关于逮捕诺索维奇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19年7月15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请您关心哈尔科夫州合作社协会理事会代表关于作为人质被逮捕的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诺索维奇的申诉。作为一名老政论作家，我可以说，他的名字因对勒拿事件的侦查，以及因赖因博特和苏霍姆利诺夫两个案件而为人所知。所有俄罗斯进步人士都对他的活动深表同情。我在论及人质问题时曾写信向您谈到过他。

握手。

弗·柯罗连科

1919年7月15日于波尔塔瓦

№01690

柯罗连科关于奥杰尔受到指控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2月27日)

1920年2月14(27)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又一次向您求助，而且又是“关于案件”。我在哈尔科夫有一位好友，叫做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奥杰尔。他是一个诚笃的合作社工作人员，信仰上是孟什维克。因合作社的事务他曾去过罗斯托夫，后来从那里回来。在哈尔科夫，由他主编出版了一份报纸《我们的道路报》。此外，他被指定为地方自治会议员候选人（也可能是被选上的）。这两件事，即办报纸和拥有议员称号，都是邓尼金时期的事，我听说，这一切现在都成了指控他的罪状。

我很了解奥杰尔，他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绝不是邓尼金分子或反革命。但是，促使我写这封信的动机甚至并不仅仅是个人对善良人的好感，而且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总的问题：当邓尼金分子来到这里时，他们对曾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工作过的人随意逮捕。现在布尔什维克来了，难道他们也准备像邓尼金分子那样对待曾在邓尼金政权下工作过的人。我理解，邓尼金分子很希望当他们离开而布尔什维克来了以后，这个地区变成一片荒漠。这会使居民迫不及待地盼望他们回来。不久前我在波尔塔瓦的地方报纸上看到过类似的设想：即使在邓尼金时代从事过中立性事务的人们也是他们的爪牙。如果不发生这样的事，对于布尔什维克要好得多。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和邓尼金

分子一样，也要求自己离开以后这个地区变成荒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承认这样的斗争是合理的，那么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生活必将枯萎而死。在一个荒芜的国度中，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停止斗争。局势正在沿这个方向发展；波尔塔瓦好像已经是第14次易手了。哈尔科夫也是这样。目前在我们这里的又是苏维埃政权。能否长久呢？我也不想猜测。不管怎么说，并不能排除新的变动。那么，某一方面又会对那些曾经在你们掌权时从事过必要的中立性事务的人（而停止这些事务，生活便会死亡）说：“你们这样做是支持了我们的敌人。在布尔什维克时期你们本不应管好吃饭、喝水，不应关心取暖，不应出版报纸，医治病人，教育儿童，只应当忧伤地等待我们回来。”现在一些狂热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机关报上也这么说。难道这种观点竟有可能占上风，从根本上稍稍推动社会生活的行为竟会被看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罪行。生活不应当也不会因为无休止的派别斗争而中止自己的正常过程。党派只会增加过多的和无的放矢的迫害，因而，不必我来证明，这样做只会有害于崇高的事业。

当我在报纸上读到基辅的契卡枪决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纳乌缅科的消息后，我的心都淌血了。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和社会活动家，曾因当时政权的狭隘沙文主义而拒绝担任督学的职务。我想，这次处决将在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上长期留下一个血色狼藉的污点。我当然从不曾想过把眼前的事同纳乌缅科的事相提并论。但我以为，从根本上说，因为见解的不同，因为出版过报纸，因为在如今使俄罗斯四分五裂的无休止的内乱期间参加过城市自治机关而遭到迫害，即使是轻微的迫害，也是斗争中的任何一方，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事业而又期望得到别人尊重的一方，不应允许其在自己队伍中存在的现象。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01691

柯罗连科关于奥杰尔被捕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3月12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曾经就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奥杰尔的案子给您写过一次信。现在我确切得知，他是2月26日按照契卡的逮捕证而被捕的。对我而言，这显然是一场误会。我对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奥杰尔十分了解，因为沙皇统治时期他在波尔塔瓦受到警察监视时住在我的寓所里。他是孟什维克，曾在公众大会上积极发言，曾在哈尔科夫编过合作社的报纸，而且并不曾隐瞒自己的思想方式。当邓尼金分子在我们这里掌权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告密的政权》，被几家报纸所转载。告密的政权在任何一次政权更替时都会出现，我相信，只有卑劣的告密，由告密者诬陷造成的私人报复，才会导致把鲍·谢·奥杰尔作为“反革命分子”或邓尼金分子而逮捕。

我利用这次机会对说到使我惶恐不安的事的上一封信作几句补充。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3月12日（2月28日）

№01692

柯罗连科关于搭救梅利古诺夫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3月29日)

1920年3月16(29)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看来，伴随着您现今的地位而来的麻烦事之一，便是收到弗·加·柯罗连科的信和请求。

您回来以后，我给您写过三次信。一次是关于三个人被契卡判处死刑的事，两次是关于在哈尔科夫被捕的我的好友鲍里斯·谢苗诺维奇·奥杰尔（合作社工作者）的案件。后来人们告诉我说，当时您患了伤寒。希望现在已经康复。

这一次我又有一个新的（准确地说，还是一个老的）请求。我得悉，在莫斯科逮捕了主持“大家族出版社”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梅利古诺夫。我曾经在写信给您时谈到过他，当时他也被逮捕。您当时发电报询问后回复我说，据您收到的莫斯科的电报说，在被捕者中没有梅利古诺夫这个人。确实如此，当时他已被释放。可能这是偶然的巧合，但梅利古诺夫的亲人认为事情顺利解决是您查询的结果。现在他们又来找我，也就是说想通过我寻求您的庇护。梅利古诺夫是一个性情急躁的而且直言不讳的人。我看，这就是他被捕的原因。这种性格的优点（在有許多不利方面的同时）之一是，在看到性情急躁和直言不讳的同时，无须再考虑有什么保留、言犹未尽及隐讳之事。就我所知，近几个月来梅利古诺夫一心

扑在出版事务和自己的历史研究上。

祝您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从罗马尼亚有无关于我们共同友人的消息？

№01693

柯罗连科关于调查“征用”行为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4月4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罗扎利娅·米哈伊洛夫娜·阿伦施泰因可以讲述简直像是公开掠夺那样的一桩“征用”事件的始末。我想，进行调查以便最终停止此类“征用”行为对任何一种政权都是有益的。

握手，并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4月4日

No 01694

柯罗连科关于政治处决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约于 1920 年 5 月^①)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还不知道昨天应当对 3 名“佩特留拉分子”的命运做出决定的会议结果如何。我希望，将成为波尔塔瓦法庭历史上阴暗篇章的这一次处决不会成为现实。我曾经就邓尼金政权时期逮捕“政委”的事指出，波尔塔瓦法庭不曾判处过一次死刑。对一名罪证确凿的强盗的死刑判决也未予执行（我并未就此提出过任何申诉）。关于波尔塔瓦布尔什维克法庭的司法公正这一事实，我得以写文章在报上发表，并且以获得这种可能性深感欣慰。难道现在我竟不得不写文章记述政治处决，而且是由于一件令人奇怪的案件，处于这个案子中心地位的又是一个孩子，他是否已经成年，一直未能查清。“多次阅读某些例如平克顿、塔拉斯·布尔巴等书之后，我形成一种强烈的幻想：要做一名著名的统帅。于是我的大军便由我们两人组成，我和我 11 岁的弟弟，他在筹备出版物方面也是我的助手……，正是这份出版物给我们带来了不幸……当 3 月 26 日人们告诉我可以释放我时，我就高兴地招供，甚至交出了铅字和出版物。绝对肯定，我现在一想到这事就十分羞愧……”以及如此这般。这段文字摘自已被判决的扎先科的悔过书。难道真有可能对这样的事进行判

^① 档案原件没有表明时间，这里标示的日期是编者估计的。

决。我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

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沉重的预感。我感觉到，距你们的报纸所描写的平静生活和创造性工作还很远。我感觉到还会有灾难和新的变动。而我多么希望，在这种血腥的混乱之中能愈来愈多地渗入宽容和人性的事例。很可能我的预感是虚妄的，而你们的消息更加准确。但是如果我在这方面错了，那么我所写的内容就更加必需了。总的说来，宽容是力量的象征。

祝您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No01695

柯罗连科关于格尔施泰因案件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5月5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又是我们会面时我讲过的那件事：关于不由行政处理（格尔施泰因案件）而移交给革命法庭的事。您当时转给科秋宾斯基^①同志一张便条。而他，如您所知，被暴动者抓获，现在在哈尔科夫。这时契卡已经决定不经审判以行政方式予以判决。因此，我不能不给雅科夫·伊萨柯维奇·戈列伊泽尔提供方便，使他同您见面，并向您陈述一切。

握手并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5月5日

^① 科秋宾斯基，尤·米·（1895～1937），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波尔塔瓦省委委员和省执行委员会委员。

№01696

柯罗连科关于随意枪决行为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6月7日)

1920年6月7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又是这类事，老是这类事！我们这里开始了一场不经审判而枪决人的狂潮。三天前枪决了5个人，其中有2个是经营磨坊的。我亲自看到官方人员关于其中一个不应进行审判的结论（并转给了契卡首长夏诺夫）。但是不加审判地枪决却说有足够的理由……我记得先前您（和前波尔塔瓦政权一起）曾制止过契卡不经审判即处决人犯的做法。现在这种做法竟演变成一股狂潮。看来，要拯救共和国有赖于毫无根据地枪决几个人。

日前，卡柳日内被释放了，他甚至被革命法庭判处枪决。至于肃反委员会的判决就更不用说了。工人们请求释放阿罗诺夫，但是他们的请求，如同我的请求一样，为时已晚。

现在前去您那里的一个年青人也是为此类事而来。案件本身我并不清楚。但对于我来说，这可能又是一次行政侦查机关的判决就足够了，而且只是请求移交给法庭。难道真的不能制止不经审判而枪决人的狂潮？莫非拯救共和国真的需要违反法制的行为。那样事情就糟了，因为不经审判而枪决人只能说明当局信心全无和神经紧张，除了参与者自己以外，绝对会使所有人大为愤慨。

握手。

您的 弗·柯罗连科

(见反面)

又及：向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转达我们共同的敬意，并为她翻译多布罗贾努的文章而表示深切的谢意。现在总是发生令人惊恐不安的事情，使我无心他顾，因此不能马上写得更详细些。不过我准备最近专门写信给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其中不谈枪杀和处决的事。现在只先说一句，通过柯斯季卡的文章我又看到了原先所认识的那个聪明的格里亚。根据某些迹象我认为，他正有病（如同他的老友我一样）。

衷心地向您致意。

弗·柯罗连科

1920年6月7日

No01697

柯罗连科关于行政判决和死刑问题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6月11日)

1920年6月11日

于波尔塔瓦

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又一次心情懊丧地给您写信。

去年撤退前在基辅和哈尔科夫发生的事，现在在波尔塔瓦也大肆泛滥（不过在我们这里程度要小得多）：盲目的、毫无顾忌的红色恐怖——这通常不是伴随着对力量和形势稳定的认识而产生的迹象，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因恐惧害怕而产生的惊慌失措、加强残暴行为的迹象。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一定向您说过，病弱和神经崩溃的我坐车径直走到群众大会上找他，哀求取消对5个人的处决（其中包括经营磨坊的阿罗诺夫和米尔金）。当时我带去了工人们的申诉书和粮食专业机关代表的正式结论：阿罗诺夫的活动中没有犯罪的成分（米尔金只不过是一个职员）。卢那察尔斯基一定也向您说到这一切的结果：他们在前一天已被枪决。现在，家属们请求把尸体还给他们，以便埋葬到犹太人墓地中去。当地政权机关予以拒绝。理解犹太人宗教感情深度的人，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当能认识到这种请求的意义，为什么必须尊重这种“偏见”。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拒绝请求您关注亲属们的这项请求。持此信的人将向您详述他们的请

求。与此同时，我也借机再讲一些事情。

我不准备用许多时间回顾已被枪决的扎先科（包括他的孩童般的阴谋）和巴什坦尼克的案件。因同一案件而被判死刑的人之一（卡柳日内）已根据中央政权机关的命令彻底获释。对此我衷心感到高兴，但是难道您不认为，在几天之内从死刑到完全释放之间的摆动未免太大，而且说明法制活动中的某些不平衡……连法制活动都是如此！那就更不用说按照行政方式的枪决了。那么难道不应当对于因同一案件而被判决的其他人的案子重新加以审理吗？（例如：被判处在国内战争结束前在集中营中监禁的斯杰潘·瓦西里耶维奇·西多鲁克。）

而对于采用行政方式的判决，更不用说是死刑判决，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从心底表示抗议，而且一直到死也决不停止抗议。据说，现在又从米尔哥罗德押解来 36 个被指控参与阴谋的人。其中有 3 个姑娘，准确点说，是 3 个女孩（2 个 17 岁，1 个 18 岁）。能否怀疑，这些中学生的行动是在不够理智的情况下做出的？据我所知，他们参与阴谋的程度，只是参与了天真地策划秘密侦察活动，而且甚至还没有付诸行动就已败露。即使在沙皇政权下，也不曾仅仅因为有意图而判处死刑。我曾经多次写文章反对当时的死刑判决，布尔什维克也曾引用我的这些文章反对临时政府。在我看来活不到把布尔什维克自身行动作为过去的事来看待的那一天了。但是，历史学家难道真的会在记述 20 世纪俄罗斯共和国时不仅说明其昌盛辉煌，而且也记录下它对犯有意图罪的人采取死刑的做法吗？而我一想到这可能和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十分痛苦。

可是事实上，新的一次判决看来正在酝酿成熟，而且又是以行政方式决定的。在邓尼金分子统治时期，他们在波尔塔瓦挖掘出 16 具尸体，并把它们摊在地上。很难设想，这造成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和引起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多大敌视。因害怕有人对留在市内的

布尔什维克采取过分的愤怒行为，我试图在地方报纸解释说，我们波尔塔瓦大都只对盗匪判处死刑。当然，我不能为不经审判的死刑判决（即使是对于盗匪）进行辩护。但我毕竟有根据指出，苏维埃政权在我们这里表现出节制，从而一有可能我就到处呼吁邓尼金分子也这样做。如今，一旦发生新的变动，能够一般地缓和内战残酷性的上述论据就不再存在，而我也极其失望地看到，毫无顾忌的残酷行为甚至在不久以前并不存在的地方也大肆泛滥起来。一直到死我也不会停止重复这样的话：哪怕能够取消不经审判的死刑也好。这是我们祖国和革命本身的无法磨灭的耻辱。

再稍微回顾一下磨坊经营者的案件。所有关于他们的反映，包括工人人们的反映，都是再好不过的了。他们被处死是因犯了投机倒把之罪，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按照统一的固定的价格为磨坊购买粮食。但是，如果坚持固定的价格，也就是强迫他们按照比实际价格低三倍、四倍的钱来购买粮食，那么现在当农民不得不用100或150卢布买一根针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死刑也无法为城市搞来粮食。我不禁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工人对国民公会的一次请愿。从也是因物价高昂而引发的红色恐怖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以后，他们向国民公会写道：“我们请求面包，而你们却想用死刑来喂饱我们。”那时也处死了阿罗诺夫们和米尔金们，但断头台并未能有所帮助，人们不能不对之表示失望。难道能够认为，枪决能更有效地调节价格吗？

还有，我写这封信时心中充满深深的绝望。这一片阴云已在上升，但我却看不到与之斗争的手段。以前我通过地方政权或经由您的干预总能做到些什么。现在，地方政权的做法远远超过了当时促使我向您写信时的情况，而您……您似乎对于要求宽厚和人性的呼吁更加听而不闻。与此同时，新的大雷雨前的阴云又在集聚，而苏维埃政权的措施只不过是加速其到来而已。

又有什么办法呢！看来我是看不到这一切了，不过我希望我生前日渐衰弱的声音一直能捍卫革命所实际依赖的真理的原则。

最后，请允许我祝愿您真正一切顺利。此时，我回忆起我、您和格里亚在许多方面和主要方面还一致的时候。

弗·柯罗连科

又及：市内正有一种传闻（目前对我来说还只是传闻），说同阿罗诺夫一起被枪决的5个人中有斯列特教堂的神父波利耶夫金·拉琴科。另外，一个慈善机关（医院）的神父格拉西姆·塔拉先科和他的儿子被捕已无疑问。此外，尼古拉耶夫教堂神父加夫里尔·科瓦连科也已被捕。令人更加惊恐不安的传闻甚至说这几名神父即将被枪决。

补充一句：阿罗诺夫被枪决前一周半，省执委会曾写信给契卡说，根据法律顾问的结论，必须或者释放阿罗诺夫，或者将他的案子移交给革命法庭。

No01698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女学生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7月6日)

我本想就我们波尔塔瓦发生的事给您，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写一封详细的长信。但是信的内容和它该当涉及的那些事件的性质使我激动万分，以至于我不得不把这封信搁置一段时间，让我的情绪多少安静一点。因此我只好写短些。

我已经写信告诉您，我们这里即将决定一些从米尔哥罗德押解来此、被指控涉及所谓米尔哥罗德阴谋的人们的命运。我也写到，其中有3个女中学生（或者准确点说，是女孩）：利亚先科、比夏尔加和普里斯杜巴，其中最大的为18岁。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决定，当然不是法庭而是非常侦查委员会决定的，这个委员会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死刑的判决！我已就此向地方政权机关表示抗议，得到的善意回答是：案件已转交给了哈尔科夫。但现在得知，对案件已经做出决定：星期六至星期日（7月2~3日）的夜间已有12人根据契卡的决定被枪决。其中被处决的有：据熟悉的人共同认为尚未成年的拉古列兹和普奇科，以及我曾经讲到的姑娘中的一个——女中学生比夏尔加，而且她神经不正常。

已经不必多说什么了。甚至在沙皇统治时期也不随便处死孩子，更何况是不经审判而通过“行政方式”做出的决定。目前在乌克兰共和国，这种用行政手段残杀孩子的做法已成为“日常现象”。由于我们并没有我甚至在沙皇政权时期都能够对当时的死刑瘟疫表

示抗议的公开报刊，我只能局限于给您写这封信。

请您接见维克托·格尔马诺维奇·李克曼。如果您愿意的话，他能够向您提供波尔塔瓦事态的详细情况。

祝您真正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7月6日

维克托·格尔马诺维奇·李克曼此前在政治红十字会^①与普拉斯科维娅·谢苗诺夫娜一起工作。

^① 政治红十字会是俄国19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为在押政治犯和流放犯提供帮助的不合法团体，1917年后成为合法团体，一直存在到30年代。

No01699

柯罗连科关于拯救儿童同盟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10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昨天人们通知我说，波尔塔瓦当局收到了根据您的指示发来的电报，其中问及我的健康状况，并建议如有需要为我前往某个疗养院和甚至去高加索提供方便。非常感激您的关心，但是采取如此紧急的措施并无必要。我已病了很久，而且是慢性病（心脏），目前并未特别恶化，至于真正的安静——如今在哪里能找得到呢？因此，再次对您的关心表示感谢，但我要再说一遍：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紧急措施。

我写这封信本想只限于表示感谢，但是……不得不顺便就一桩社会事件再说几句话。如您所知，我参与筹建（还在督政府时期）拯救儿童同盟^①，并担任了它的名誉主席。它主要从事在乌克兰筹建大俄罗斯儿童教养院。当苏维埃政权于去年从波尔塔瓦撤退时，把教养院的所有事宜均移交给了我们同盟。现在，据本地卫生局长沃尔科沃伊称，中央政权机关似乎决定要立即取缔同盟，认为它是苏维埃政权不需要其配合工作的社会机关。而且（根据卫生局长沃尔科沃伊的正式说法）卫生人民委员古列维奇已经两次问起他，波尔塔瓦的同盟是否已停办。我怎样也无法理解，是什么原因竟会这

^① 拯救儿童同盟，是在柯罗连科的倡议下于1918年成立的，一直存在到1926年。

样对待同盟？当然，现在它的工作已经大大压缩，但就是现在它仍然管理着几个机关，这些机关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的缝纫场为孤儿院和幼儿园缝制衣服，它的玩具工场为所有的儿童机构提供玩具，并为幼儿园、托儿所等的女领导人生产服装样品。它的供应科在痢疾广泛流行期间采购大量喂养儿童的制剂（如雀巢奶粉、蛋白奶、糖原等）并根据医生的处方加以分配。

如今，卫生局长沃尔科沃伊在正式会议上宣布，他好像在哈尔科夫的报纸上看到过关于在各地普遍取缔同盟的法令。对于一个在社会倡议下产生的，给社会带来巨大好处的机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见！纯粹官僚主义的机构能否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是很大的问题。莫非这是官僚主义化、官本位的又一个迹象？这里，在地方上，这一点令人感觉强烈。必须弄清——而且越快越好——这种害人的传闻是否来自中央。

紧握您的手和祝您顺利。

您的 弗·柯罗连科

1920年8月10日

您不在期间，我曾给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写过一封信。想她已收到。

No01700

柯罗连科关于制止枪决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13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此信由米哈伊尔·伊里奇·佩尔佐维奇转交给您，他还将向您叙述一桩目前使我们全城激动不安的事。又是关于枪决几个人和关于通过枪决来同投机倒把和贪污贿赂作斗争的事。当然，无论是投机倒把，还是贪污贿赂，都是令人作呕的事，但是不采取广泛的、明智的方法，而采用处决，则更加令人作呕，而主要的是无的放矢。生活常常是采用迂回的办法取得上风。佩尔佐维奇同志将向您叙述和这个案件有关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会使您反对无的放矢的处决做法。在这类事情上用威吓能够做到的事，——照我看来并不多——已经做了。如果在某个地方有可能制止流血（在我们的时代血流得过多），那么我希望您在这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

您的 弗·柯罗连科

1920年8月13日

№01701

柯罗连科关于保释托卡列夫斯基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21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在一定已使您厌烦了的我的一长串信函之外，又加上了一封。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命运以及您的命运就是这样。您完成着您的事业，而我则不得不通过也许无效的信件和抗议来给自己作为作家公民的良心寻找抒发的途径。

这一次是请您关注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斯托普涅夫斯基的诉说。在我们这里，米哈伊尔·季米特里耶维奇·托卡列夫斯基被（显然是契卡人员）逮捕了，而他在自己的社会活动方面表现杰出。革命前曾遭受迫害，坐过牢，被流放过。革命后担任过省地方自治机关主席和市长。最近一年半以来只从事合作社工作，同时负责过波尔塔瓦消费合作总社的文化教育科。这里的人们谁也没有认真看待他的被捕，都说：关一阵就会放人，以前宪兵就是这样无故逮捕人的。这并不是第一回。糟糕的是，托卡列夫斯基是一名重病患者（他已染上肺结核），而这一个小小的错误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请

求设法使米哈伊尔·季米特里耶维奇·托卡列夫斯基能在解释清楚错误之前交保释放。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8月21日于波尔塔瓦

No01702

柯罗连科关于托夫卡奇被捕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8月31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这封信由索菲娅·丹尼洛夫娜·特列古布（或者由亚历山德拉·普拉托诺夫娜·波诺马廖娃，如果索菲娅·丹尼洛夫娜无法从契卡那里领到通行证的话，因为通行证并非总能领到）转交，内容涉及我的好友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托夫卡奇被捕的事。他的被捕不是根据契卡的决定，而是特别部授权卡普斯强斯基同志（负责对可疑人员进行搜查和逮捕）而逮捕的。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托夫卡奇之所以引起怀疑，看来是因为：第一，他是乌克兰本地人；第二，他是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家（曾是市杜马主席）。当他的妻子（因丈夫一时不在而作为人质被捕）问起为什么要逮捕她的丈夫时，卡普斯强斯基同志回答说，要逮捕他是因为他消极怠工，在8月8日结束假期之后不上班工作。然而，这明显是个误会，因为他原在“村民”协会工作，是被省地方自治局正式免职的。他本是根据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任职的，只有全体会议才能免去他的职务。但是为了不增加不必要的冲突，他遵从省地方自治局的决定，并为此正式呈递了申请书。这样，卡普斯强斯基所说的理由就不存在了。据我所知，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托夫卡奇很早就脱离了一切党务工作，只从事专业工作，因此不可能提供任何真正的（即使是间接的）逮捕口实。这样，剩下的只是乌

克兰的籍贯和显要的（在过去）社会活动就是他“不可靠”的原委。难道这就够了吗？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8月31日

No01703

柯罗连科关于枪毙人质问题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0月12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在关于秋里莫罗佐夫医生和苏维埃司法机关明显错误的信之外，现在再加上一封更加一般性的信。您，看来，记得我们在您来波尔塔瓦时谈论到枪杀人质的事。我一再证明，中世纪野蛮行为的这种残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并且是毫无用处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双方也只是用这种办法来相互指责，而不是真正实际使用。您和您的同志们表示反对，但是最终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使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也只能极端审慎地采用。我不得不停止反驳。

您看，现在在我们这里这种做法已经开始了。在今年9月30日的波尔塔瓦《消息报》第99期上，刊载了一个处决人犯的吓人的长名单（36人），其中（第9批）有沃夫克、加夫拉西和什捷凡的名字，他们之所以被枪决，按照官方的理由，是“作为自己儿子的人质，因为这个地区抢劫行为不断”。关于这几个为人父者自身的罪过却一点也没有提到。

这种事情就怕开了头。接着残暴行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的墨守成规和野蛮做法的实践不断发展、扩大，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惯例。而我已经知道了这种“无节制的”采用逮捕人质办法的若干事例，它们能使任何一个人愤怒不已。同一个家庭可能会无休止地遭受处决人质的灾祸。上面我提到老什捷凡因儿子的事而惨遭枪决的

事。这类事太多了。可是，野蛮的惯例在我们那里对此并不满足。当父亲已经被捕并在监狱里面临枪决时，被搜捕的儿子自愿来到，以便救出父亲。地方军事委员会给他出具了自首的证明，让他带着这个文件前去波尔塔瓦，并派人押送。来这里以后，他去看望了叔父，即人质什捷凡的弟弟，费多尔·阿尔希波维奇·什捷凡。后者自然只能够劝告侄儿带着证明前去肃反委员会。理所当然，比军事委员会更加热心地从叔父家里把侄子抓走是没有理由的。但是逃兵什捷凡改变了主意，他并未去契卡，而是从波尔塔瓦逃走了。于是先枪决了父亲，然后又召唤来当叔父的，要求他在3天之内，后来改为在一周之内把侄儿送来。我且不说这种做法是极端不道德的，政权机关竟然把抓捕罪犯的责任推到其亲属头上，从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侦探。但是……俄罗斯人真是老实听话，叔叔什捷凡在枪决的威胁下竟然外出寻找，而且竭尽全力，这一点地方政权机关可以证明，但自然没有找到。这位儿子没有来拯救叔叔（而且他同叔叔很少相同之处）。当人们再次对他说如果侄子不回来可能要把他枪毙之后，我有机会同他谈了一次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苏维埃政权绝对忠诚（也许是太忠诚了），而我在这次谈话时表示坚信不可能采取这种野蛮而毫无意义的再次枪决的做法。现在，这位做叔叔的，费多尔·阿尔希波维奇·什捷凡一定是正在西南方面军的契卡（由卡普斯强斯基决定？）等待自己的命运。莫非我真的错了，而荒谬绝伦的事情竟然是可能的？！

现在再谈我所知道的（可我不知道的又有多少！）第二个事例。在波尔塔瓦附近约5俄里处，有一个叫雅柯夫策的村子。村里有一个农民，叫格里戈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别洛孔。他有演员的性格，既会拉手风琴，又会唱歌，常参加业余演出，在任何集体场合都起核心作用。大约两个月以前，一名共产党员被暗杀。谁也不会想到，别洛孔竟会与这件暗杀事件有牵连。凶手已为当局查知。但

是，他曾住在雅柯夫策，而别洛孔也曾在雅柯夫策住过。人们把他逮捕了起来，并说如果抓不到凶手，他就要被枪毙。又是这样，可这种野蛮的残酷威胁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儿子什捷凡不来自首以救出父亲，而让父亲被枪决，那么能够设想一个暗杀共产党员的人会为了救出一个在某次晚会上见过面的一个愉快的人而前来自首吗？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我认为是野蛮的和毫无益处的这些做法现在仍然使用不衰。我认为，这种做法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通过居民的公正的不满情绪加强了你们的敌人。难道这种情况果然还要继续存在下去，不断增加、发展吗？

祝您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10月12日

又及：最近，我又得知若干事例：一些做父亲的，在枪决、没收全部财产及烧毁住房的威胁下，外出寻找儿子。有时这种做法取得成功，但即使在此种情况下，难道能祝贺某一些政权机构取得这样的个别成功吗？我急切地请求把我的这封信也让您的同志们知道。

№01704

柯罗连科关于别涅夫斯卡娅被捕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1月2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这封信由雅科夫·斯捷潘诺维基奇·多罗申科转交给您。

他的女儿，索菲娅·雅科夫列夫娜，从夫家姓别涅夫斯卡娅，于10月某日被西南方面军特别部逮捕。她在省制革局任秘书，靠这个工作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自1905年起就在波尔塔瓦居住。我清楚地知道，她从不参与政治。从逮捕后到10月28日以前，一次也没有被传讯过，但于29日被递解到哈尔科夫，看来既未侦查，也未审讯，而特别部经常是这样做的。

看来，转移至哈尔科夫并不能说明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已经知道的情况：在此前人们曾被关押在冰冷和挨饿的监狱中，接着又坐同样寒冷的“取暖车厢”转移，再后又在哈尔科夫坐牢，而且说不定会转移到北方，如果除此之外还考虑到别涅夫斯卡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您一定会同意，要这样对待她总得要有某种理由。但这一次并没有任何理由。可是总的来说西南方面军特别部在这方面又特别慷慨大方。过去常常出现一种情况，仅仅因有人不肯担任特工就这样被迁送到外地。您如能关注多罗申科的请求我将非常感激。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11月2日

(见背面)

又及：在工人和别涅夫斯卡娅的同事们写给我的信中，在提到其他申诉方式完全无效之后，还说道：

“通过3年来的共同工作，我们坚信，这是一个极端诚实的人，一个无可挑剔的工作人员。完全无法谈论她的政治活动，因为全部业余时间她都献给了孩子们。由于忙于工作和家事，她不仅远离政治，而且远离社会活动，因而我们认定，她的被捕是由于毫无根据的告密行为所致。”

№01705

**柯罗连科关于采特林案申诉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1月5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基辅崩得就被基辅革命法庭判决的 И.Я. 采特林一案请求将处罚改为派往前线。被判决者的妻子安娜·米哈尔伊洛夫娜·采特林前去哈尔科夫呈送申诉。我请求予以关注。

祝一切顺利。

弗·柯罗连科

1920年11月5日

No01706

柯罗连科关于行政性流放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1月11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的女儿索菲娅^①今天或明天将为“拯救儿童同盟”之事前去哈尔科夫，因此我想利用她这次前往之机谈一谈同盟的事。

日前，曾为移民机构工作过，近来又为总社工作的医助涅斯托尔·罗曼诺维奇·列夫钦科，被从这里带走。我认为，合作社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真正的过渡性台阶。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列夫钦科被带走时未经审讯，未经侦查，甚至似乎并未提出任何指控。现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这类事件。当然，这样做比审慎对待如此多人的自由要方便得多，这些人可能根本不应受到逮捕、坐牢、流放。当需要抓住一个俄国公民的领口时，常会出现一句奇特的俄罗斯套话：“到了那里就会搞清楚的。”所有的行政性流放便这样发生了。

因此，我请求您关注这类行政性流放者的命运，其中包括涅·罗·列夫钦科的命运。

最后祝一切顺利。

您的弗·柯罗连科

1920年11月11日

^① 柯罗连科，索·弗·(1886~1957)，1903年起任父亲的助手和秘书。柯罗连科纪念馆在波尔塔瓦建成后，她一直担任该馆馆长。

又及：昨天我在街上遇见了我以前曾写信向您谈到的一批法国女家庭教师中的一位。她们现在获准离境，对您十分感激。不过又发生了新的伤心事。地方政权机关规定只允许法国妇女离开，而，例如，瑞士人则不能享受这一规定。我就认识这样一位瑞士妇女，她只能忧伤地目送自己的同伴飞走，而自己却不能和她们结伴而行。难道不能予以相应的说明吗？

№01707

柯罗连科关于费先科被捕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1月18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这次写信给您要谈的事情，我已经给卡普斯强斯基——西南方面军全权代表——写了信。这件事是指毫无理由地逮捕合作社工作人员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先科。谢·亚·费先科的为人和活动，我作为在波尔塔瓦生活的职业观察者（政论家）十分清楚。因此我寄给卡普斯强斯基一份申诉，请他将其列入卷宗。这样案卷中就会有我要说明的一切，而我也不必再次重复。在申诉中我也提出由我保释谢·亚·费先科。现在他被押往哈尔科夫，而这种做法和以前按行政手段处置人们的自由的作法完全一样，不必经过仔细的侦查。

我的极其恳切的请求在于，费先科的案件一定要仔细审查，那样我相信他将被释放。

祝您一切顺利

您的 弗·柯罗连科

1920年11月18日于波尔塔瓦小花园街1号

№01708

柯罗连科搭救托尔斯泰的侄女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0年12月29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我以自己恳切的请求支持尊敬的伊·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①的请求。确实，一名病魔缠身的老妇人会给苏维埃政权带来多大损害呢？而关于苏维埃政权机关竟然在监牢中折磨现年60岁的列·尼·托尔斯泰所钟爱的侄女的消息则会带来更加大得多的损害。不必是一名反革命分子，可能甚至对于共产党人，这样的消息定会使每一个人产生对苏维埃政权的最不好的反应。因此我希望，伊·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的请求会在您的心中引起积极的反响。

祝您一切顺利，包括完成善举。

您的 弗·柯（罗连科）

1920年12月29日

^① 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伊·伊·（1864～1940），教育工作者，政论家，托尔斯泰思想的追随者。

№01709

柯罗连科关于用行政方式处决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1年1月27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附上我写给现今代行省执委会主席职务的德拉戈柳克同志的信的副本，您从中可以知道是什么事。问题涉及一项任何一个尊重自己政权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严重诬陷的事件。目前案件正由契卡进行审理，可能契卡会认为这个案子可以由自己按行政手段处理，这样很可能明天就有一批重要的被告遭到枪决。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现政权将遭到可怕的道义上的损失。只有革命法庭进行审理才能全面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否则人们会说（而且并非没有根据），用行政方式进行处决只是掩盖政权本身的濫用权力。

祝您一切顺利。

您的 弗·柯罗连科

1921年1月27日

№01710

柯罗连科关于接待杜德钦柯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1年2月5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米特罗凡·谢苗诺维奇·杜德钦柯，基督教徒，前去哈尔科夫。他希望能和您见一面。此人纯粹以劳动为生，接近人民，因此我想他能向您讲述一些您也感兴趣的事。他得知我和您长期交好，请我设法从中介绍，以求更便于见到您，我乐意这样做。

烦您告诉米特罗凡·谢苗诺维奇，我前不久听说的我们共同的友人格里亚—多勃罗贾努去世的传闻是否可靠。

祝您一切顺利。

您的 弗·柯罗连科

1921年2月5日

№01711

柯罗连科关于应通过法庭进行审判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1年2月15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首先寄给您佩列亚斯拉夫利的通告，从中您可以知道：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批准将佩列亚斯拉夫利奸细案^①立案。现在因这个案件在波尔塔瓦逮捕了佩列雅斯拉夫利政治局^②的成员沙罗夫及其一家，随后，据佩列亚斯拉夫利传来的消息，那里也逮捕了政治局主任扎伊采夫及其妻子。您可以看到，卑劣的诬陷手段对于纵容其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并非没有影响。现在更加必须通过革命法庭来公开处理这个案件。其次，我寄给您一份我写给波尔塔瓦契卡的信件的副本，从中您可以看到，契卡对人的生命的态度轻率到何种程度，以及对这一切规定一个总的尺度加以限制是多么必要。

明天，随这封信一起还押送去许多乌克兰人，关于他们的事我已向您写信说过。我和许多共产党人的担保未曾起到任何作用。

我听说格里亚—多勃罗贾努去世了，可是真的？

① 佩列亚斯拉夫利奸细案，指控佩列亚斯拉夫利市一部分居民受贿和投机倒把的案件。

② 原文如此。

祝您一切顺利。

您的 弗·柯罗连科

1921年2月15日于波尔塔瓦

附件

致波尔塔瓦省肃反委员会主席

我愿意表示几点想法，这些想法一直使我无法安静下来，而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压抑着我的情绪，使我的思想无法摆脱。有一件事情特别使我难以平静。这就是对原宪兵格·格·维亚特金的枪决（见去年12月24日《消息报》上的名单）。关于枪决他的原因只有如下说明：

“维亚特金，格里高里·格里高里耶维奇，43岁，维亚特卡省亚兰斯克县库金乡别列宁村公民。因曾在沙皇政权下任宪兵，并未经允许而藏匿武器。”

就这样，这个人因原先曾是宪兵而遭枪决。总不能因为某人拥有一把什么样的手枪未请求准许而将其枪决。我觉得对于这个人的死负有罪责，虽然枪决他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但是他的亲人曾来找过我，当时我安慰了他们——其实我本应大声疾呼，竭尽全力设法营救。但是，人们竟然枪决了他，这使我惊愕万分：要知道他担任宪兵是12年以前的事！自那以后他住在乡村，从事农业劳动。这样，摆脱宪兵职务只能是他的荣誉。同村人的反映已经送到契卡呈交给您，其中（和对我说的一样）一致证明维亚特金是一个诚实的劳动者而无任何劣迹。

然而你们竟然还是用行政方式枪决了他，而我还在安慰他的家人！对此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也不会忘记这件事。年青时我曾被

迫游历过许多地方。在我的记忆中曾多次记下“坏地方的好人”。这类好人中的一个，而且12年以前就摆脱了沙皇政权下宪兵的头衔，却被你们处决，而我却因安慰他的家人而参与了这一处决的实施，原因在于轻信：即使在契卡也不会处决既不是强盗也不是反革命的肯定无辜的人。

我说出所有这一切是因为：第一，这件事使我无法平静；第二，为了向你们指出：契卡有时轻率地处理人命达到何等地步。我有一个微弱的希望，即一个肯定无辜的人的死可能引起人注意对于可能涉及人命的问题小心从事。现在我请求从总的方面小心从事，具体的指被指控有反革命行为的神父伊万·格尔莫格诺维奇·卢别诺伊。他的案件已审理结束，几天之内就要上报“常务委员会”。如果算一算他的家人（妻子和子女）这段时间所受的折磨，我想这已经足够了，不能再给这些痛苦加上一个亲人的死刑。也可能，不存在死刑的问题，但他是一个神父，如同维亚特金原来是一个宪兵一样，也使人不免为他的命运担心。

也许，您不以为在常务委员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是多余的事。

弗·柯罗连科

1921年2月15日于波尔塔瓦

又及：我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卢别诺伊神父患有斑疹伤寒，而据女护士说，恐怕难以复原。

№01712

柯罗连科关于天主教神父被捕事 给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1年3月7日)

亲爱的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

这一次是应本地罗马天主教徒的请求给您写信。他们的神父于数月前被捕，关押在波尔塔瓦的集中营内。他们递申请要求将他释放，但至今均属徒劳。但是，这一问题涉及教会的重大利益。不仅在波尔塔瓦省，而且在邻省，如克列缅丘格省，也只有他一位天主教神父。由于无人主持宗教仪式，许多人为此感受到极大的精神折磨。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是由于偏见所致，对此只能抱一种嘲弄的态度。但是，看来这是一种重大错误。如果对于不信教的人而言这里只不过是“偏见”，然而对于知道什么是宗教宽容精神，而且知道要在社会中培养这种认识曾花费了多少时间的人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对于每一个亲身感受过真正自由的人的神圣的东西。

面积广大的波尔塔瓦教区的代表能向您详细解释这一问题对于他们的重大意义。我也希望，如果不是由于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及对其评价问题，那么宗教宽容问题应当从苏维埃政权那里得到相应的反响。

1921年3月7日

No01713

柯罗连科关于契卡未经批准实行枪决 给拉柯夫斯基的声明

(1921年6月15日)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拉柯夫斯基同志

寄自波尔塔瓦红十字会

声明书

根据我们获知的难以核查的消息（不过经市内一再盛传的说法证实），6月2日有一批人经省契卡常务委员会决定被枪决。对这批人执行极刑并未经最高政府批准，是对已颁布法规的违犯。这样，被告们被剥夺了苏维埃政府向他们宣布的保证。对此，社会舆论激动不已。对被处决者中个别被告有所了解的人们表示，他们不应受到这样的惩处。另外一些人十分年轻，看来最高权力机关必会以更加人道的观点看待他们的行为。其中第三类人员的命运之所以被如此决定，似乎也并非没有个人挟嫌报复的因素，只是破坏法制被加添上一种自然的理由。……

为了避免此类事件有可能再次重复，我们请求最高政府通过适当的方式重申不经中央乌克兰肃反委员会批准不得再判处极刑。

名誉主席 弗·柯罗连科

主席 П. 伊万诺夫斯卡娅^①

1921年6月15日

^① 伊万诺夫斯卡娅的签名是柯罗连科代行的。

【专题说明】

列宁在 1920 年的几个讲话

(1920 年 1 月至 10 月)

《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收入了当时苏联已经公布的列宁的全部文献，据此翻译的《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于 1990 年全部出齐。此后，苏联和俄罗斯报刊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列宁的文献，其中一些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我们从中选了 4 篇，编成这个专题。

这 4 篇文献均是 1920 年的。这一年，苏维埃俄国打垮了协约国的最后一个傀儡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至此，延续达 3 年之久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告结束。苏维埃国家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复杂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所刊文献对此作了初步探索。

1993 年俄罗斯联邦议会机关报《俄罗斯报》全文刊登了列宁 1920 年 1 月 12 日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讲话的速记记录。这一文献以前从未发表过，只是在《列宁年谱》第 8 卷等俄文著作中提到过这次讲话。

1920 年 9 月 22~25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在报告中主要

论述了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的问题，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只收入了这个报告的简要报道，而报告的全文直到1992年才由俄《历史档案》杂志予以发表。列宁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也是第一次发表。

1920年10月2~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于10月2日晚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93~312页）的讲话，并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许多问题。这里选收的列宁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问是《苏共历史问题》1988年首次发表的。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编辑校注，
黄有自、王问梅、赵国顺、项国兰翻译）

No06544

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920 年 1 月 12 日)

同志们！我有一项极其讨厌的工作，这就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我几乎在人民委员会每一次的会议上都给令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粮食人民委员部气势汹汹地指责交通人民委员部，历数它的罪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们开完一次会后我会去跳水自杀。我这样说是为了指出，在这个会上也出现了最荒唐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对此人民委员会是有责任的。托洛茨基同志说，提出用部门机关取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发神经病，也可以说是人们跟官僚主义混蛋们打了一天交道后才这样说的。这些人来这里就胡扯些本位主义的东西，还不得不为此花费时间，真叫人感到难为情。

托洛茨基同志好就好在没有这么做，他的提纲的最后一点是：请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我们已经这么办了。他在自己的提纲中建议中央委员会提出下述任务：要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部门负责人和官僚们，不要说什么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比军事部门差。这是一味博得廉价掌声的好办法，只是这个办法包含着十足幼稚的利益，包含着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好还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好这种既讨厌又愚蠢的争吵。这两个机构都不行。

是谁挑起这场讨厌的本位主义的争吵的呢？不是托洛茨基同

志，他在提纲中什么也没有说。论战是洛莫夫、李可夫、拉林同志挑起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最高的官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们当中还有一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位主席的头衔多得很，如果我要列举出他的所有头衔，那我的10分钟发言就得花掉5分钟。因此，说这个会上大家彬彬有礼、亲密无间、对会议确实兴致勃勃是没有根据的。有兴致，那并不是因为李可夫同志和其他参加讨厌的笔墨官司的人都发了言。托洛茨基同志提出关于新任务的问题，而他们则把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本位主义的论战端了出来。难道我们不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同志在他们的十分愚蠢的文章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说出来。会上有一位发言人说：不能同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论战。如果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有错误，那么请直截了当地说，在会上加以纠正，指出这是错误，而不要去胡扯什么集中和分散。李可夫同志说有必要谈集中和分散，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人以为，这儿坐着的人都很落后，他们连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的前几行都忘了，提纲说：“管理经济要有总的计划……”等等，最尊敬的李可夫、洛莫夫和拉林，你们看得懂俄文吗？让我们回到你们16岁的那个时候吧，让我们来从头闲扯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吧。这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国家任务。这是胡说八道，一文不值的垃圾，把时间花费在这方面简直叫人感到难为情，可耻。

当我们议论新任务的内容时就争论起来了：争论的问题是关于集体管理机构和一长制。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如果我们在工人集会上说我们赞成集体管理制，同时却贯彻资产阶级的原则，那是一文不值的。这样的论战我在人民委员会里常常听见。这种说法很愚蠢，只有在本位主义的争吵中才说得出口。集体管理制变成了泡在会议上，说什么一长制不是惟一可行的组织办法的人的空谈。

我们当然需要让工人学习管理。集体管理机构当然也是可以学会的。如果他们不会别的办法，那就让他们待在集体管理机构里吧。学习是不需要集体管理机构的，找一些助手就行了。我们要把集体管理原则和政权的一长制原则结合起来；贯彻集体管理原则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工人学会自己管理。集体管理机构应该由 4~5 位同志组成，他们都配备有助手。我们将有时实行集体管理制，有时实行一长制。那些差的、不得力的、落后的和不开展的，让他们去实行集体管理制，让人们去议论纷纷，说得厌了也就不再说了。

战争教会人们把纪律强化到最极限，把数万、数十万，即数万、数十万同志集中起来，他们为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而牺牲。要不是他们流血牺牲，我们大家都已经见鬼去了。尤登尼奇春天要来，协约国正在策划，我们不了解它将策划出什么来。

我现在要谈复员和利用军事力量的问题，目的是使军事力量和军事机关适应即将到来的时期的需要。我们正处在转折的前夕。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这么结束的：叫大家各自回家，而人人都欢天喜地。宣布复员，让所有的工人各奔东西，去领取 3 普特的口粮等等。当然到会的人在拍手鼓掌，而他们知道工人们受什么样的苦，饿成什么样子。但你们因此博得廉价的掌声。我们大家都知道饥荒十分严重。但是请你们把粮食运来吧。请大家想一想复员意味着什么。谁说要复员，这是废话，空话。请试一试让第 3 集团军复员，这个集团军干得很出色，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那些发笑的人对当前的形势根本不了解，也不善于思考。不管这些方案有多少错误，我们花 10 分钟就看明白了，但是基本上按托洛茨基同志电报中所说的办法去解决。您的基本思想很值得重视。一个集团军驻扎在乌拉尔，在西西伯利亚的边上，它能干什么呢？返回彼得格勒。它又回不来。火车不通。另一个集团军正开赴南方。你们去收集几千万（普特）。你们知道，需要收集 3000 万普

特粮食，而不是空谈经济建设。你们试一试去收集这 3000 万普特。一个集团军开到西西伯利亚，驻扎在那里，离又离不开。另一个集团军开到罗斯托夫的南面，也离不开，因为那里是顿涅茨克州，而我们也不可能从那里调兵。一个集团军进入塔夫利达省，正在攻打梅利托波尔，那里粮食多极了，但不能把军队调走，因为那里有反革命匪帮，又有粮食。关于这一点，即关于这些具体任务没有人考虑过。与其像孩子一样胡闹，还不如考虑一下，该做些什么。

人民在挨饿，铁路不通，而我们军队里的每一个战士都说，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纪律。军队打击并处决损人利己的家伙。这个军队也有缺点，军队机关干的蠢事一点不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干的少，托洛茨基同志永远不会去写这些情况。而现在这个机构有可能采取强制措施和执行纪律，因此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些粮食收集到手并且运回来，因为我们的全部困难就在这里。为了收集到 3000 万普特，需要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哪里，就在挨饿的庄稼汉能够帮助饱汉弄到食物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是能吃饱的省份。说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的人真可耻——这是毫无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论据，这是一文不值的蛊惑言论。他们竟然把社会主义的军队，把这个军队的纪律和组织称作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而正是这支军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才没有沦为饥荒的牺牲品。我们怎么说得出这种话？这种说法同在人民委员会里开始的争吵一样：挥起棍子就打。我不幸在人民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都见到过这种情景。这不是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而是我们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这方面我们往往做得还不够。

我们战胜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靠的是我们比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强的纪律，而托洛茨基同志实行了死刑，这种做法我们是要加以称赞的。他通过共产党员的自觉组织和鼓动来实行死刑。我们

为了一万个白卫军官而牺牲了几万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样做才拯救了国家。现在必须采用这些方法，不采用这些方法就运不来粮食。只有在乌克兰粮食才富足。我们运不回粮食来，因为要给工人发放口粮，就必须收集余粮。为了抓建设，就必须让几百万工人去干活。

有人说：好吧！让工人离开军队回家吧。谁也不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儿在闹饥荒。他们要留在能吃饱肚子的地方，留在梅利托波尔省和其他地方，同自己的军队在一起，军队可以多吃两倍的东西；但是如果军队不吃东西，它就救不了你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管部门，而是共和国的整个形势。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克列孟梭的文章？他说“我要推动波兰和罗马尼亚去干”。你们怎么能让军队复员呢？这是空谈，而不是严肃的论战。我们只复员一小部分人，其余的人我们要留下以防不测。要做到这一点该怎么办呢？彼得格勒和沃罗涅日的工人不可能赶来。如果他们能够赶来，我们就不会让他们复员。

有人说：我不想待在兵营里，我想为建设出力。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简直可笑。这样来理解国家任务是可耻的，在这一点上连论战都没有意思。这种人在地方机关犯的错误同我们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机关犯的错误一样多，但是他们能为我们解围，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把粮食和食油从车里雅宾斯克运出来，那里没有粮食机构，又没有工夫去建立。你们用《共产主义 ABC》是战胜不了富农和匪徒的，这需要有可靠的力量。军队今天在梅利托波尔省，明天又要开赴别的地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工人都能理解我们，赞同我们。如果你们想进行论战，那就去批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吧，可是我有言在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会议上你们都会挨揍的。存在着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纪律涣散，我们正在反对这种纪律涣散和官僚主义，必须同这些不良现

象作战。流血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不流血的、真正的、要求有军队纪律和作用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要求人们去参加战斗，而不是待在家里。为了进行这场战争，需要利用那些驻扎在波兰和我们之间、邓尼金和我们之间，驻扎在北高加索的军队。要这些军队干什么？让它们复员吗？纯粹是胡说八道，应该把这些军队同整个机关、整个共产党的先锋队一起派去收集和运送粮食。既然我们不惜处决几千人，那我们也不惜采取上述措施，以此来拯救国家（鼓掌）。

№06548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 关于俄共（布）中央的政治报告

（1920 年 9 月 22 日）

同志们，在目前时刻作报告，重点自然应当是对波兰的战争和
我们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波折。让我先谈几点〔意见〕，先讲讲这场
对波战争尚未成为事实的那个时期开头的情况。

大家知道，在对波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处理问题极其谨慎，甚
至特地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声明，非常郑重地向波兰
人、波兰资产阶级提议，根据对我们、对许多民族、〔对〕从前
处于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工农极为〔不〕利的条件媾
和。^① 我们提议根据毕苏茨基^② 线，即波兰人在今年 4 月 26 日发
动进攻之前占据的边界线媾和，按照这条边界线波兰人得到了整
个白俄罗斯和很大一片乌克兰领土，因为当时他们控制着沃伦省
以及现在他们夺了过去的罗夫诺的许多延伸地区。我们同意以这
条边界线为基础签订和约，是因为我们认为和平的经济工作，这
项我们已把军队生活和数十万工农生活纳入其中的工作，比起有
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解放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或加里西亚
东部要重要得多。

① 指 1920 年 2 月 2 日电台广播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其中重
提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 1920 年 1 月 28 日在《关于苏维埃对波政策的基本原则》
的声明中提出的建议。

② 毕苏茨基，约瑟夫（1867～1935），波兰政治和国务活动家，1918 年 11 月起为
“国家元首”，波兰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的策划者之一。

在这方面，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已经多次证实并将继续证实：我国的新外交完全不同寻常，在君主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还决不可能实行，当布尔什维克公开发表声明时，没有一个国家的哪一个人能够明白，我们确实是在公开声明和特别外交手段的基础上开展外交活动的。换言之，如果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愿意承认毕苏茨基线”，——〔这是国际资产阶级的见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非常软弱，做了非常大的让步。我们〔以自己的建议〕助长了波兰资产阶级和地主最狂热的沙文主义，助长了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最狂热的沙文主义，〔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大家都认为在通常的外交中不会有这样的做法——“难道有这么干的吗？这是软弱的表现。”可见，决定发动进攻的不只是波兰人，而且还有法国，因为我们极不寻常地公开声明；为了避免战争，我们愿意退却。而先前在马尔赫列夫斯基^①作为波兰红十字会^②的正式代表进行的谈判中，这样的边界线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是基本线^③。因此我们根据过去的谈判做了很大的让步。这一让步被当作我们软弱的表现，并最终导致了战争。

大家还记得战争的初期，战争使波兰人获胜，直至占领基辅。据初步统计，他们当时控制了拥有将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大家记得，在〔波兰人〕此次获胜之后，军队的〔重新〕部署获得了成功，我军转入进攻并迅速推进至波兰的最主要边界线。

这时，对波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开始了，这一转折实际上是从

^① 马尔赫列夫斯基，尤·约·（1866～1925），波兰和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1919年10～11月代表俄国红十字会同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团举行谈判。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委员，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和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团于1919年10～11月在白俄罗斯米卡舍维奇车站举行的谈判，经过谈判签订了《关于彻底解决俄罗斯联邦扣押的波兰人质的问题的协议》和《关于交换被俘平民的协议》。

和〔到〕战的转折。应当由此开始谈起，以弄清后来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讨目前牵动着每个党内同志的最主要的、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就是由于战役的整个发展我们所遭到的严重失败，灾难性失败。

7月12日，当时我军在连续进攻中已穿越广大地区正直逼波兰族聚居区的边界线，〔以〕寇松^①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向我们发出照会^②，要求我军在离波兰族聚居边界线50公里一线停止前进，条件是按照这条线签订和约。这条线的走向是比韦斯托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将加里西亚东部划归我们。所以说这条线对我们非常有利。这条线就叫做寇松线。

当时我们就面临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必须做出极为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是一个出发点，我在报告中还要提到它，以便对最重要的和主要的问题做出评价。

当时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是接受这个可给予我们有利的边界线的建议并从而采取一般说来单纯的守势呢，还是利用我军的高昂士气和当时的优势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一个打防御战还是打进攻战的问题，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都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我们正处于苏维埃政权整个政策的转折点。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与协约国作战，因为我们非常清楚，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的每一次局部进攻都有协约国在撑腰，我们意识到我们打的是防御战，而且在不断地打败协约国，但彻底打败协约国我们做不到，协约国比我们强大许多倍。我们只是尽量广泛地利用协约国各国之间出现的缝隙，为的是及时进行自卫。同

^① 寇松，乔治·纳撒尼尔（1859～1925），1919～1924年为英国外交大臣。

^② 列宁指的是收到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0年7月11日照会的日期。照会中对苏维埃军队和波兰军队的分界线作了详尽的说明。

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作战经过展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从兵力计算的角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对他们是各个击破。全世界最聪明的政治家，不仅是诸如英国、念念不忘前沙皇王朝的亿万财富的不自量力的法国（那里还有一些怪人指望收回这笔财富）的在殖民主义问题上不自量力的政治家，不仅是想要从俄国捞一把的不自量力的政治家，不仅是同俄国利害攸关的大政治家，而且还有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大政治家，他们全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他们比我们强大百倍，却并未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因为其内部四分五裂，因为他们一步也迈不出来，解决不了把三四个成分合为一体、把三四个强国联合并协调起来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他们同我们相比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在海军和其他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却连在财政方面也无法联合起来，这就使我们得到了好处。而且那正是整个资产阶级都对布尔什维主义怒气冲天、恨之入骨的时候。结果是我们比他们强大。他们把敌人一个接一个地投入进攻，他们尽管叫喊什么不想让沙皇复辟，却无法阻止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彻头彻尾的君主派政策，从而使本该跟他们走的那一部分人即农夫和富农也同他们疏远了。

这就是说，最终出现的局面是：我们终于确认，协约国对我们的军事进攻已经结束，防御帝国主义的战争也告完结，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波兰是一个赌注。波兰认为它作为一个具有帝国主义传统的强国有能力改变战争的性质。就是说，当时的估计是防御战时期已告结束。（我请大家少作笔记，这些话是不该见报的。）另一方面，进攻向我们表明，协约国在无力通过战争扼杀我们的情况下，在无力靠其士兵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只能怂恿个别小国向我们进攻，这些小国并无军事价值，只是以协约国提供的暴力和恐怖手段为代价才得以维持其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孟什维克民主资本主义至今仍在所有与俄国接壤的、由前俄罗斯帝国旧版图构成的诸如爱沙

尼亚、格鲁吉亚等国中苟延残喘，无疑靠的是协约国提供的援助。协约国提供大炮、士兵、制服、金线，以便控制工人。

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防御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军事形势来开始进攻战。当他们进攻我们时，我们打击了他们。现在我们要尝试进攻他们，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还将帮助立陶宛和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我们决议的说法。

当中央委员会酝酿这一决议时，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决议多少有些笨拙，即好像不能投票反对它，怎么能够投票反对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呢？

如果把我们对波兰的态度同我们对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的态度比较一下，差别就显而易见了。当初我们并未通过以军事方式帮助格鲁吉亚或爱沙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我们通过的是意思相反，即不提供这种帮助的决议。

由于这个原因而同这些国家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产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他们发表充满痛苦的针对我们的讲话，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同那些绞杀和拷打曾为苏维埃俄国抛洒热血的拉脱维亚优秀同志的拉脱维亚白卫军刽子手签订和约呢？格鲁吉亚人也发表过这样的讲话，但我们没有帮助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无暇顾及。拯救和巩固共和国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在波兰问题上我们改变了这一政策。我们决定利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由此而产生了以后的总政策。

我们对这一点的表述并未放在中央委员会记录的正式决议中，而正式决议在下一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党来说就是法律。但我们彼此之间说过我们应当用刺刀试探一下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否已成熟。这里我们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

题对国际联合体即共产国际的优秀共产党人来说来理论上还不十分清楚。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① 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时候，我们正好也在中央委员会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还不能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次代表大会要公开举行。这正是代表大会巨大的、革命的、一般政治的世界意义之所在，日后会显出这种世界意义比迄今为止要大许多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诸如德国独立党人^②之类的代表，德国独立党人现在奉行的是最卑劣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当时不能把他们赶走。当时要向全世界共产党表明，我们不愿意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因此，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开诚布公。所以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有意不去涉及。会上不能提出转而向协约国各国发动进攻的问题，因为当时还没有到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耐心等待〔他们〕。

《红旗报》^③和其他许多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亲手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人自认为是共产党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是民族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当然，诸如芬兰同志之类承受苦难较多的共产党人丝毫没有这种偏见。我说丝毫没有，因为他们经历了较长的战争时期。我接见过英国工人代表团^④，我对他们说，任何一个正派的英国工人都应当盼望英国政府失败，当时他们对我的话

① 指1920年7月19日起在彼得格勒、以后从7月23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② 指1917年4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基础上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第二国际并就加入共产国际一事举行了谈判，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③ 《红旗报》创刊于1918年11月，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建，是“斯巴达克联盟”的机关报，后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④ 1920年5月26日，列宁在莫斯科会见了英国工人代表团。

根本不理解。他们的那副表情我看连最好的照片也拍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这样一个道理，即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英国工人应当盼望本国政府失败。

波兰的无产阶级居民非常成熟，农村无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应当帮助他们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就是事件发生时我们、我们党所处的那个阶段。这不仅是苏维埃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是全世界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单枪匹马地面对全世界，惟一的梦想就是抓住他们之间的些许缝隙，这样敌人就不会把我们压倒了。现在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成长壮大了，你们只要胆敢进攻，我们就会以反进攻来回敬，好让你们明白，你们所冒的风险不仅是输掉几百万，你们已经在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身上输掉一大笔，你们还要冒这样的风险：你们每出动一次，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扩大一次。迄今为止俄国不过是受人嘲弄和议论的对象，议论的是如何更好地由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来瓜分它。可现在俄国说：我们走着瞧吧，看看谁在战争中更厉害。这就是现在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整个政治、全世界政治的变化。日后历史学家将不得不指出，这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这一政治产生了哪些结果呢？当然，主要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遭到了巨大的失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当把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介绍一下。

我们用刺刀对波兰在社会革命方面的准备程度试探得如何呢？我们应当说，这种准备还不够。用刺刀进行试探，就是说可以直接接触波兰雇农和波兰工业无产阶级，因为后者还留在波兰。工业无产阶级仍留在华沙、罗兹、栋布罗维察等离边境很远的城市。另一方面，为了真正试探出波兰无产阶级——首先是工业无产阶级，其

次是立于强横势力基础上^①的雇农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我们当时必须肃清波兰资产阶级军队，而且不仅占领华沙地区，还要占领有工业无产阶级的那些地区。这些地区比未能占领的华沙离得还要早^②。因此对波兰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准备程度的试探非常不够。

我们遇到的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情绪空前高涨，随着我军向华沙推进，这些人为自己民族生存而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未能试探到波兰雇农和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中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情绪。

然而国际政治中却出现了一幅极有教益而且成为事件中心的图景。加米涅夫同志可对这一图景的一个侧面作较为详细的、纤悉无遗的介绍，他在伦敦看到了〔事件〕的某些波折。^③

我们未能试探到华沙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程度和准备程度。我们的推进证明，波兰无法战胜我们，而胜利离我们却近在眼前了。

原来，所有这一切都在改变着国际政治。我们在向华沙步步推进时，已经离全世界帝国主义政治的中心近在咫尺，我们都已开始干起来了。这听起来有些费解，但英国“行动委员会”^④的经过证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远”。

③ 1920年7月，当红军在波兰前线取得巨大胜利之际，列·波·加米涅夫赴伦敦进行谈判。1920年8月4日，加米涅夫会见了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1863～1945），会见中英国政府首脑要求苏维埃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在华沙城下败退之后谈判中断，加米涅夫于1920年9月1日被逐出英国。驱逐的表面借口是指责加米涅夫对工人报纸《每日先驱报》的活动提供资助。列宁所提到的加米涅夫的讲话，是1920年9月22日在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之后作的。

④ “行动委员会”是英国工人为了阻止英国介入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而建立的机构。1920年8月9日，在伦敦举行的工联议会委员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成立。除了中央“行动委员会”之外，各地还建立了地方“行动委员会”。

明，绝对准确地证明，位于华沙一带的不是波兰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共和国的中心，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整个现行体系的中心，我们现在所处的条件是，我们不是在波兰而是在德国和英国开始动摇这个体系和干政治的。因此，我们就在德国和英国创建了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地带，因为波兰作为俄国和德国之间的缓冲国，波兰作为最后一个国家，仍然完全掌握在反对俄国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手中。波兰是整个凡尔赛和约^①的支柱。

当代帝国主义世界是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帝国主义者战胜了德国，解决了近几年内由两个全球强大集团中的哪一方、由英国集团还是由德国集团来主宰世界命运这一问题，他们以凡尔赛和约结束了〔战争〕。除了凡尔赛和约之外，他们再无其他巩固全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手段。波兰是这个凡尔赛和约中强有力的一环，我们突破了这一环，也就打破了整个凡尔赛和约。我们当初提出了占领华沙的任务。任务发生了变化。原来，所决定的不是华沙的命运，而是凡尔赛和约的命运。整个德国资产阶级黑帮报刊和法国报刊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我军向东普鲁士（以延伸到但泽的波兰走廊为界）边界推进表明，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关于数万、数十万德国共产党人正在越过我国边界的消息不胫而走。〔关于建立〕德国共产党员团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只得做出决定帮助不发表〔这些消息〕并继续声称我们正在〔同波兰〕作战。

现在收到一些不同意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报纸，这些报纸都在描述东普鲁士的局势，这时便呈现出一幅十分耐人寻味的图景，它使我想起 1905 年俄国革命的某些时期，当时德国出现了中间类型的

^① 凡尔赛和平条约正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 年 6 月 28 日，以战胜国为一方，以投降的德国为另一方在凡尔赛（法国）签订和约。

黑帮革命者。那时候俄国 1905 年革命迈出了最初的几大步，以发掘、唤起农民中最有影响同时也最落后的分子，帮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是黑帮分子，他们通过反对我们的宣传竭力唤起农民。当时进行这种宣传的是黑帮神父和军官，结果却是这一重新崛起的黑帮政治组织第一次把农民联合了起来，吸引他们组织起来。这些被唤起的农民今天提出黑帮的要求，明天就要求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如今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一家反布尔什维克刊物的通讯我没有带来（当然，由于时间关系我也不可能全文宣读），文章谈到整个德国东部都沸腾起来了，所有卡普分子（即拥护卡普^①——相当于我国的科尔尼洛夫的人），所有这些卡普分子都拥护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当同一个不成熟的、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德国青年谈话时，他表现得犹豫不决，说应当把威廉请回来，因为现在天下大乱，没过一会儿说的话又截然相反，说应当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我们看到，整个德国东部都沸腾起来了。正在策划成立一个以科尔尼洛夫式的将军们为首的反常的联盟，这些将军都是具有军事常识的人，他们的口号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向法国开战，同谁联手和在何种条件下开战都一样”。这些德国军官在政治上一窍不通，他们不知道战争总会带来一定的后果（他们哪里会懂得这个道理呢！这样的德国军官应当在各种各样的革命中学习上 10 年，才会学到一些东西），他们居然想不惜一切代价向法国开战。

可是，当时我们就有力量而且有相当大的力量来对付协约国。当时我们答复寇松说：“你们提到了‘国际联盟’^②，可‘国际联

^① 卡普，沃尔弗冈（1858～1922），德国容克的代表人物，“祖国党”的创建人之一。1920年3月领导保皇派的军事政变，政变失败后逃往瑞典。

^② 国际联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倡议下于1919年成立的国际组织。

盟’算什么东西？简直不值一提。还有一个问题，波兰的命运谁说了算。问题的解决不是看‘国际联盟’说什么，而是看红军战士说什么。”如果把我们的照会^①译成大白话，那么这就是我们对冠松的答复。当时在德国，人们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出现了反常的有代表性的联盟，一个不是根据协议组成的、未在任何地方经过登记和表决的联盟，联盟内卡普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群众都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

这就是当时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德国共产党人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在这里，都在莫斯科解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德国造就真正的共产党的成员，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右派独立党人，该党的领袖类似我国的马尔托夫，而工人们则怀有布尔什维主义情绪。他们正忙于解决这个各国都面临的世界性问题。这时德国的事态发展超过了这些问题的一切解决办法，便出现了一个由彻底的和极端的爱国者和认为应当自觉地〔同〕苏维埃俄国结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联盟。出现了这样一个联盟，即在世界政治中只有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带来凡尔赛和约的“国际联盟”，另一种力量是破坏了这个凡尔赛和约的苏维埃共和国。德国的这个反常的联盟是拥护我们的。

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实，我曾不止一次地仔细研究过国际政治，我在对反击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的战局进行总结和谈到与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签订和约的条件时也曾谈到过国际政治。具有国际意义的不仅是我们击溃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并争取到了俄国富裕农民即反共产主义的农民，顺便说一句，是他们决定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命运，而且我们还争取到了一些小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些小国表面上独立，却受

^① 指俄罗斯联邦政府 1920 年 7 月 17 日给英国政府的照会。

到协约国的压制，这就决定了爱沙尼亚同我们签订和约^①，它是第一个同我们签订和约的国家。爱沙尼亚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国家，它完全处于英美亿万富翁的控制之下，它本来是根本反对同我们签订和约的，它同我们签订了和约，因为它觉得国际帝国主义简直是它们的冤家对头。

在德国，共产党人只剩下自己的口号了。当初德国左派谬论百出，居然说不必进行国内战争，相反，需要进行反对法国的全民战争，那简直是愚蠢之至。这样提出问题就与背叛相差无几了。不进行国内战争，就不可能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你要是同德国科尔尼洛夫分子签订盟约，他们就会欺骗你。德国有一个又弱又小的共产党和一个强大的谢德曼分子、右派孟什维克^②的党，这是个庞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为首的是我国的马尔托夫之流，政策是脚踏两只船。

第一个结果是，有许多小国尽管极其仇视布尔什维克，但却都同我们联合起来，这些小国在镇压本国布尔什维克（爱沙尼亚的、芬兰的、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的同时，却不得不同我们签订和约，他们说，在国际关系中我们这些小国更接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我们在行动上证明，对于德国来说（该国群众的情绪就是最不成熟的黑帮群众的情绪，这些人会说：“还是威廉好”）在国际关系中除了苏维埃俄国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力量。

德国的民族愿望由两个因素组成，不从政治上分清这两个因素就要犯大错误。一个因素是推翻压制他们的凡尔赛条约。另一方面，拥护这样做的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说：我们岂止是想推翻凡尔赛

^① 俄罗斯联邦与爱沙尼亚的和平条约于1920年2月2日在塔尔图签订。

^②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

条约，实际上他们是想恢复帝国主义的德国^①

不仅对几个小国，而且对德国，我们都在国际局势方面进行了试探。

我在彼得格勒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②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曾谈及国际局势，我说，地球上现在大约有人口 30 亿，其中即 30 亿中的 3/4 在殖民地，而 10 亿中的 3/4 在战败国，就是说，殖民地的人口占了 70%。我说，即使这样粗略地划分，如果我们谈起世界政治，那么只要政策对头，有 7/10 的人口会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他们又不是共产党人，怎么会拥护苏维埃俄国呢？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怎么会同我们保持一致呢？他们不是在国内枪杀共产党人吗？如今我们以我们的国际政策证明，我们同所有生活在凡尔赛条约之下的国家结成了联盟。这可是全球人口的 70% 啊！

如果说在德国人们只是担心和等待，那么英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英国的寇松向我们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你们后退，要么我们开战。他们习惯认为，他们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就可以支配整个世界。我们对此的回答是：我们不承认“国际联盟”，于是法国报纸便说这是“放肆的答复”，这是课堂用语的一种说法，老师在教室里对学生说，我们举止放肆。但在世界政治中这样的术语不能使用。事实是“国际联盟”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上佳表现。

原来，要想同我们开战，首先须得问一问英国人。我们发表声明的结果是，英国无产阶级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我们兵临华沙城下却未能拿下华沙，也没能试探出波兰工人对革命行动的

① 原文如此。

② 列宁指的是他 1920 年 7 月 19 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第 205～223 页）。

准备程度，但我们试探了英国工人并使他们上升到了革命行动的新阶段。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时，英国工人（其中9/10是最奸诈的孟什维克）对此的回答是成立“行动委员会”。英国报界惶恐万状，惊呼这是两个政权。他们说对了，目前英国在政治关系上所处的阶段，同1917年2月以后的俄国完全一样：与政府并行的是苏维埃，苏维埃拥有协商委员会并实际上对政府的每项措施进行审查，于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都说这样下去不行。现在英国也出现了“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不许英国向我们开战。寇松勋爵向我们提出的三条威胁性要求无一兑现，而英国工人运动却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阶段。

“行动委员会”建立了整个工人群众的机关，一个与资产阶级政治中心平起平坐却并不与之步调一致的政治中心。这个“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货真价实的孟什维克和货真价实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是当初我们赶走的那些人。

〔为了同机会主义者分道扬镳〕，我们需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国代表汇集到一起。大会决议直到今天才全文发表，决议中这一政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通过。产生了什么样的对比关系呢？有人说我们提出了闻所未闻的条件^①。如今那里出现了分裂，至少是一无例外地在世界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出现了分裂。

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做到了几十年来即使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彻底决裂的情况下都做不到的事情，就在这时英国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却联合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曾伤透脑筋去解决那些极其困难的课题。〔但〕工人运动

^① 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根据列宁制定的原则起草的。

的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既要在思想上与孟什维克决裂，又要与孟什维克在“行动委员会”内共同行动。

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个矛盾，是机会主义，但是我们说：你们要进行的还是一场基本特点为俄国式的革命。

英国的“行动委员会”完全不同于曾处理过郭茨^①和唐恩^②等人的事情的我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全体工人不分党派的、不去区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组织，这是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竞争的联合组织，孟什维克在其中被迫扮演布尔什维克的角色。

我们知道，孟什维克和第一批社会革命党人炮制^③的 1914 年内阁曾说，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来保护少数吧。他们迷失了方向，而把群众推到了我们一边，所以说普列汉诺夫做得对。他们说，我们主张立宪民主，而你们主张部分的民主。

还有一个“行动委员会”。但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这是一种我们不得不读^④的东西，因为这涉及到〔具有〕非常牢固的孟什维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如果说我国的孟什维主义已有 15~20 年的历史的话，那么英国所有的工会组织都具有以孟什维克为首的民主制度，这一制度被英国孟什维克破坏殆尽，于是他们只得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进攻。^⑤

我们曾有机会向英国、法国的工人们说，你们应当教会他们做

① 郭茨，阿·拉·（1882~1940），社会革命人，1917 年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十月革命后是“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② 唐恩，费·伊·（古尔维奇）（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 年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

⑤ 原文如此。

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教会了这一点。英国的政治开始教训法国的政治。同时你们应当学会在群众团体的基础上同被迫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的英国布尔什维克结盟，以便使英国群众学会实际这样做。^①

我们自己在俄国也曾伤透脑筋，俄国工人要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欺骗多少次，才会不再相信他们呢？他们在二月革命前欺骗俄国工人，从五月起欺骗到七月进攻，又欺骗了一次，到了十月俄国工人终于完全成熟，不再受人欺骗了。

英国工人需要让英国孟什维克欺骗多少次呢？这个哪本书上都未讲，而且也不会讲。这个以后就清楚了。但英国布尔什维克应当善于随时同群众站在一起，开导他们，给他们指点，对他们说：你们又在受骗了，你们又受了一次骗。在英国目前事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加米涅夫同志在归纳他的印象时也将谈到，英国孟什维克已经觉得自己是政府了，他们知道，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坐不稳，这届政府迟早要倒台。他们简直觉得政府的职位眼看就要到手了。〔英国布尔什维克应当讲清〕：“请吧，不过你们也会像你们的资产阶级政府一样倒台的，而且会一跌到底，永无上台之日。”

这就是对我国所处的国际政治和西欧正在形成的关系的总结。

现在我该谈一谈如今从这个总结中得出的主要而又可悲的〔结论〕。我们在前线被击退，我们撤得远远的，战斗现已在格罗德诺附近展开，波兰人正在逼近的一带，原先毕苏茨基就在这里吹嘘说他要向莫斯科挺进，而当时只是吹吹而已。应当指出，尽管我们被击退了，我军仍然创造了奇迹。敌人把我军向东和向西击退了几百〔俄里〕，但我们尚未退到我们当初向毕苏茨基提议以此为界媾和的地方。现在毕苏茨基同意媾和，但与我们第一次提议媾和时相比，媾和条件对他说来不利，而对我们说来却很有利。但我们还是遭到

^① 原文如此。此处速记记录中有遗漏。

了惨败，一支多达 10 万人的大军或是被俘，或是还留在德国。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败。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肯定犯了错误。我们可是已经稳操胜券，却把它丢掉了，就是说犯了错误。这个问题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在中央委员会找过答案：错在什么地方？错在哪里，应不应当把错误找出来？

显然，错误不是出在政治上，就是出在作战的战略上。但是大家知道，战略和政治二者密不可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在〕政治局〔内〕解决过纯战略的问题，完完全全的纯战略问题，我们都禁不住相视而笑：我们怎么会个个都成了战略家呢？我们中间甚至有些人连从远处都从来没有见过打仗。但尽管如此，还是得研究战略问题，因为战略从属于政治，二者密不可分。如今同尤登尼奇、邓尼金发动进攻的时期一样，我们不止一次地解决过纯战略的问题。这对我们说来不足为奇了。但现在应当记住，任何战略都无非是政治而已。

现在到哪里去找错误呢？可能是政治上的错误，也可能是战略上的错误。我丝毫没有自认为懂得军事科学，我事先恳请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通晓这门科学的同志们多加谅解。我将从找出可能犯的政治错误或战略错误的角度进行分析。

我现在要说，中央委员会分析过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为了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为了以适当的方式解决它，我们该为此投入很大力量，但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因为我们全神贯注于未来。于是我们决定：过去的〔谜〕让历史学家去解吧，让他们日后弄清这个问题吧。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错误不是出在政治上，就是出在战略上，要么两方面都有问题。可能错误出在对寇松 7 月 12 日照会的答复上，当时我们说得很干脆：不理睬“国际联盟”，我们继续前进。

不消说，我们根据错误的判断做出了决定。尽管当群众的英雄主义和热情无比高涨时处于困难政治条件下的革命者习惯于趾高气扬地解决问题，对他们的要求是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预先确定了总的进攻方针。这一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一方针基本上是完善的，并且确实适合世界历史的新时期，俄国迄今为止一直充当解决问题的客体（问题是让尤登尼奇还是让高尔察克来吃掉它。再配点什么菜），在新时期中俄国决定着英国的内政。

也许，当时应当换一种方式答复。我们当时说，我们基本上接受寇松的建议，但是要讨价还价。在加米涅夫由于他无法左右的原因讨价还价到了被逐出英国之前，我们根据我们的决定一直在讨价还价。我们得到了“行动委员会”的帮助，所以最终获胜的是加米涅夫，而不是劳合-乔治。

也许，我们当时应当这样答复：我们基本上同意在 50 俄里处或你们划定的边界停止前进。这是由各军事战线的情况决定的。我们如得到加里西亚东部，就有了一个针对所有现代国家的基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与喀尔巴阡罗斯为邻，喀尔巴阡罗斯比德国还要沸腾，又是通往匈牙利的直接走廊，在匈牙利只要稍加推动，革命就会爆发。我们就会在国际范围内保持不可战胜的强大国家的荣耀。这是极大的嘉许。

但这是另外一种政策。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那种沸腾局面。大概也不会有“行动委员会”。英国的整个政治，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就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但我们会赢得一个牢固的、安定的、强大的基地，以便通过划定的边界对中欧发动战役。

我再说一遍，也许这是个政治错误，整个中央委员会对此负责，我们每个人也对此负责。这是主要的错误，因为战略是从属于政治的。

可能作另外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中央确定了政治方针，因为中央确定了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地位，因为中央确定了我国指挥人员不能逾越的范围：“你们下达了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越过民族聚居区边界线并在我们占据的地方和比亚韦斯托克与德国划界的任务，〔虽然〕有可能实行能改变自己的战略条件和任务的战略。”可以这样认为，战略家〔不〕应当精确地把问题的解决付诸执行。但议论、动机、情绪是一回事，而决定是另一回事，可以议论，可你这个正派的人民委员要是不执行决定，就得下台或者蹲监狱。要是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早就垮掉了。

这里战略也许会暗示说：要进攻吧，我们的兵力不足，我们要推进 50 或 100 俄里以后停下来，我们就进入波兰族聚居区，我们就稳操胜券，如果当时我们停下来，我们现在肯定已经赢得了和平，绝对胜利的和平，而且仍然保留了荣耀，仍然保留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能是战略上犯了错误。

所有那些错误大体上就在这个范围里，中央委员会的思路自然一直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时在中央委员会内占上风的是下面这种意见：不，我们不打算成立研究进攻和后退条件的委员会。我们没有力量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其他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抽不出一点儿力量、甚至抽不出次要的力量来干这个。我们必须去解决其他问题，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因为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打击过邓尼金，把他赶到了顿涅茨区，但未能将其彻底击溃，结果我们又退回到奥廖尔。我们曾经看到我们同高尔察克作战的经过。我们把他赶到了乌法，在他把我们赶回萨马拉的时候所有的欧洲报刊都定出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陷落的新期限。

有意思的是，我昨天看到了一本美国书，有几个人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收集了优秀的美国报纸有关俄罗斯的全部资料。这简直

是为布尔什维克作的最好的宣传。他们研究了曾几次定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陷落的时间。这本小册子收入了美国报纸从1917年10月到1920年的有关报道和由此得出的简要结论。再没有比这本进攻简史更好和更有成效的东西了。我们要设法出版〔小册子〕的俄文本。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红军在击溃高尔察克后败退150俄里时候的情景。红军中的一位同志对我讲过，红军在距车里雅宾斯克50俄里之遥的地方停下以前做了无法做到的事情，当时红军已陷入无力作战的境地。斯米尔诺夫^①同志说：“请看看俄国士兵吧，如果我们不前进，我们就〔不去〕动员新兵了。在鞋破底穿这种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行军根本不行，但生来就能创造奇迹的英雄们做到了。”

红军战士开始创造奇迹了。他们走了800俄里。他们是再走上100〔俄里〕呢，还是在100俄里开外的地方停下来，因为再也走不动了。这是新战略空前困难的战略任务。

大家知道我们为打高尔察克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大家知道任务的这些因素，中央委员会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央委员会本身因我们犯错误和打败仗而深感不安，没有着手纠正这个错误〔和〕任命委员会。

我们必须解决日常的政治问题，如里加谈判^②。我们面临着向格罗德诺的进攻，而弗兰格尔占领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③并且正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④进逼。必须集中全部兵力，解决这个问题。

① 斯米尔诺夫，伊·尼·(1881~1936)，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至1919年4月是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4月至1920年5月是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该集团军于1919年7月从高尔察克部队手中解放了车里雅宾斯克。

② 指1920年9月21日苏波代表团就签订和平条约在里加开始举行的谈判的例会。

③ 今扎波罗热市。

④ 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

把每一支兵力都扩大一倍岂不更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着手研究了，我请大家来关心它。

显然，波兰人的进攻和弗兰格爾的进攻都是协约国的进攻。协约国打算孤注一掷。

今天收到一位在英国工作的同志的来信，他在信中说：那里的情绪在发生变化，昨天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支持布尔什维克，今天却支持协约国。不过我们还见识过比这更大的转折。

我们应当考虑到目前的条件。看来，冬季战局注定要进行。

许多迹象都说明了波兰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打的是什么算盘。法国人把宝押在了弗兰格爾身上，他们对波兰人说：请你们相信，只要你们接受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把华沙一带划过去的边界，你们的事情就完了，弗兰格爾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你们惟一的朋友。政治并不太重要。法国人，波兰人，弗兰格爾，〔这是三个独立的因素〕。让这三个因素步调一致地行动并非易事。三国政府甚至几乎无法把力量联合起来对付布尔什维克。

这件事似乎极易做到、毫不费力，因为大家都恨布尔什维克。可以想象到，毕苏茨基、弗兰格爾和法帝国主义者都愿意全力以赴去镇压布尔什维克。三方都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尽管他们聪明过人，还网罗了绝顶聪明的谋士，却什么事也做不成。另一方面，现在法国人竭尽全力支持弗兰格爾，弗兰格爾也不断取得胜利。不断给他派来援兵。另一方面，法国人必须保住波兰战线，他们必须说：再等一等，别签订和约。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波兰的小生产者、爱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波兰社会党^①的代表，地主的党

^① 波兰社会党是改良主义政党，其代表人物在 1918—1919 年间多次在波兰政府中任职。

和农民的〔党〕^①（富裕农民、富农的党），他们〔全都〕说：我们更喜欢和平，因为战争带来的是破坏。

早在战前波兰的局势就危机四伏，他们的代表说过，战争过后他们的财政会完全破产。这话不错，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打这场战争是要花钱的，而法国却承认“神圣的私有制”。

又有消息说，60艘轮船再次驶向波兰。我认为他们靠这60艘轮船也加强不了自己的地位。

这里有一位同志^②给我们作过报告，据他说，波兰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他这句话是一带而过的，我却注意到了，因为这才是全部的实质所在。如果说我们战胜了高尔察克、邓尼金，那么仅仅是因为他们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弗兰格尔现在自以为很稳固，也仅仅因为他的军队清一色由军官组成。他自己知道，他只要一依靠群众，也会像当年的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一样迅速垮台。

波兰人向我们发动进攻时，起先用的是清一色由青年〔组成的〕军队，而青年是完全可以“感化”的。现在他们征召的已经是那些经历过更为残酷战争的年龄段的人，现在他们的军队已经是由成年人组成了，他们的军队不是由小孩子组成了，成年人是不会任人摆布的。波兰人现在进入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在新时期所进入的阶段，从节节胜利的阶段进入了一败涂地的阶段。这就是波兰现在的情况。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说，我们应当避免进行冬季战局，因为〔在〕我们看来数万名俄国工人、农民的生命比其余的一切都

① 指代表农民利益的波兰人民党。

② 指弗·乌兰诺夫斯基（1893～1937），他是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出席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要宝贵得多。我们非常清楚，下了很大的赌注，我们是强大的，我们一旦拿下苏维埃制度有保障的加里西亚，一旦拿下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已经沸腾起来的匈牙利有联系的加里西亚，我们就能铺平笔直的革命大道。为此值得一战，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但同时我们意识到，冬季战局需要付出许多人的生命，于是我们说：我们应当避免进行冬季战局。

这方面成功的机会并不大，因为弗兰格尔和波兰不管怎样争吵，他们毕竟是同一条国际战线。不过这里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同过去的一切国际惯例背道而驰。我们非常清楚，国际强盗是不会相信我们的，但是总有人始终相信我们。

于是我们就要直言不讳。于是我们建议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名义表明我们不想进行冬季战局。但愿能在 10 天之内签订和约，那样的话我们就放弃加里西亚并且建议在比寇松线偏东得多的地方划界。无论这些让步对于我们来说有多么沉重，但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避免进行冬季战局。〔因为〕我们可以在和平建设领域内站稳脚根。但是我们建议在〔10 天〕之内完成此事。但是我们说，为了完成此事，你们的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应当战胜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而这〔未必〕能够做到，因为他们很强大，因为农民一向都是爱国主义的仆从，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不可避免的私有制，这是必然的，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也是必然的。但至少机会是有的，至少在这些党的个别会议上已经与我们〔意见一致〕。这些党派的代表说过：我们知道，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协约国不能挽救我们，挽救波兰的是爱国主义热潮。这些教训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确定在短期内做出巨大的让步，为的是解决冬季战局的问题。我们想要避免冬季战局。因此我们建议波兰人立即签订和约。

我们提出的边界线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东边。我们在军事方面得到的好处是有把握迅速战胜弗兰格尔。这样的好处足够了。

对于西欧的政治，我们应当从第一次积极政策的尝试回到后果上来。后果并不那么可怕。军事上的后果〔对于〕共产国际来说算不上后果。共产国际在战火纷飞中锻造了武器并且将武器磨得很快，帝国主义老爷们对它也无可奈何。目前所有的党都在按我们的设想发展，因为共产国际下了指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放心。问题在于发展的速度，在于发展的条件。我们当时没有能力取得一举粉碎凡尔赛和约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全世界洋洋得意的帝国主义的凡尔赛条约本该被打得粉碎，但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基本政策依旧未变。我们正利用一切机会转守为攻。我们已将凡尔赛条约撕开了一个口子，一有适当机会我们就会把它撕个粉碎。眼下为了避免冬季战局应当做出让步。

我现在手头没有提交党代表会议批准并呈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声明全文。我已经讲了声明的政治内容。为了避免冬季战局，我们给波兰人定了个短短的10天期限。我们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获胜。我们已向我军表明，为了避免冬季战局的困难我们已竭尽全力。在我们看来，同尽快结束战争的问题相比，疆界问题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条件，无论有人不顾我们的和平建议强加给我们的冬季战局怎样艰苦，我们还是胜利地结束冬季战局的。

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现在我就国内局势简单讲几句。尽管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结束冬季战局。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很清楚，只要搞到粮食，我们就有了基础，有了根本。1917~1918年度征集到3000万〔普特〕。第二年为11000万。我们现在有了保障，〔因为〕我们有3亿多普特粮食，也许可到36000万普特。就是说，平

均每月有 2500 万到 3000 万普特。这些数字超过我们在挨饿的年代为之大伤脑筋的数字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不必胆战心惊地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票子了，不必胆战心惊地望着那些我们每天都要签发的数百万、数亿、数十亿的纸币了，这些纸币表明这个基础只是玩具，〔它〕已受到破坏，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破旧外衣上的碎布条。只要国家按照余粮收集制并作为工业需求的一定条件从农民手中一年征集到 25000 万^① 普特粮食，我们就有了建设的基础，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开手脚去解决妥善分配的问题。

我们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我们知道我们有 1 亿多普特石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顿涅茨煤田有 2000 万到 3000 万普特煤，我们还知道，我们的木柴供应有了好转，去年我们没有煤也没有石油，只有靠木柴来对付。这说明，我们有了经济基础，尽管损失惨重，尽管疲惫不堪，尽管有神经衰弱、官僚化的毛病，尽管党的整个机构不如从前，尽管有以上情况，尽管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局困难重重，我们正在继续为自己提供并保证可以提供基本的经济基础。人的口粮和工业的粮食即燃料我们都有，而且比去年多得多。所以，想到我们曾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我们要说，只要我们再次团结和集中所有的力量进行冬季战局，我们就有把握夺取胜利。

现在我要谈一谈租让问题。租让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曾经争论过租让在原则上是否允许。我们达成了共识：只要处理得当，就允许租让。当然，我们只会把自己加工不了的资源租让给帝国主义者。我们的同志在英国签订了 1 万俄亩森林的租让合同。我们亲自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北部地区筹划此事，这对我们是绝对合算的。15 年之后我们就可收回了。这个期限完全可以接受。不必害怕租让，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利条件。

^① 原文如此。

前不久我看到美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斯皮尔德写的一本书，此人简直就是我国的阿列克辛斯基^①，他说，只要我们同资产阶级签订租赁合同，将必败无疑。美国的阿列克辛斯基的这一类攻击毫不重要，我们对这些攻击应当泰然处之，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工人都认识到我们做得对。

我们现在正竭力帮助俄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但往往光靠俄国的力量还不行。我们说，革命只有靠先进国家先进工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共产党人都不曾对此有过丝毫怀疑。

这是一个弱国要对付所有其他各国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将是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我们可以放心，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别人才会迷失方向，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对小国的国际政策。当然，那样一来我们就会作为一个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元气大伤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存在下去，我国拥有自己在10~15年内都开采不完的、极其丰富的资源。吸引外资进行开采，用我国的资源去抵偿的只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还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说现在即可保证提供和睦关系的基础。

英国撵走了我们的工会组织，同加米涅夫吵了一通，把他驱逐出境。这并不怎么可怕。共产党人当初就不怕让别人撵走。同时也签订了要我们供应100万根枕木的合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是不能斗争的。我们有自己生产不出来的枕木，有我们无法利用的森林，而你们却能利用。你们把我国边疆地区我们无法利用的森林拿去，同我们签订租赁合同，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和睦的基础，创造政治和睦和经济和睦的基础。你们不能进攻，因为一旦试图进攻，

^① 阿列克辛斯基，格·阿·（1879~1967），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者。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起为召回派分子，“前进”集团领导人之一。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1918年流亡国外。

“行动委员会”就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共产国际在每个国家里都有数以十计的关系和代理人。各个国家的代表常常到莫斯科来。我们不以其他的发展条件转移……^①

这件武器原则上是可用的，尽管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仅已经确信这件武器原则上可用，而且实际上我们已经学会使用它了。美国的政治家发出一篇篇冗长的照会指责我们，说我们是蹩脚的民主主义者。一位有名的美国亿万富翁跑来说：让我们一言为定……^② 我们大概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只能对协约国采取守势，但是，尽管第一次完全失利了，遭到了第一次失败，我们仍然会一次再次地从防御政策转向进攻政策，直至把他们统统击溃。

① 此处速记记录似有遗漏。

② 此处速记记录有遗漏。

№11675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 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

（1920年9月22日）

同志们！我还要讲几点意见。托洛茨基同志在他最后一次讲话中试图把他说的“半梦行症患者”解释得较易让人接受。在讨论中有人向托洛茨基同志指出，如果说军队处于半梦行症状态或者如他后来形容的那样处于半疲劳状态的话，那么中央战略指挥人员可没有或者至少是不该处于半疲劳状态。错误无疑还是有的。我说过，这就是我们的军事战役的整个发展进程已经证实了的那个错误。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在战胜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之后还没有学会把内心的疲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具有三分之一半梦行症患者的心态，那么我们不得不向每一个政治领导人说：请重申我们的指示并加以变通。尽管我们已经同邓尼金、高尔察克以及波兰有过两次较量，但我们还没有学会〔这样做〕。

至于布哈林的〔讲话〕我要说，他在第二个原则问题上说得过了头，就像斯大林同志说过了头一样。当时西欧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现在要是说我们受骗了，红军理所当然就会出来辩解。我在报告的开头讲过，研究退却条件的委员会做了工作，但中央委员会不同意退却。这里并没有去证明当时应该专门任命委员会。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基本的政治蓝图。我们不会去研究这件事情，但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布哈林说：不能指靠革命，也不能指靠战争。革命的特点是，斗争的节奏和参加斗争的人数可以十倍百倍地增长，

1905 年俄国的几次罢工就是如此。我们继续保持信任，西欧战线和中央指挥部无愧于这种信任，因为中央指挥部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征战中经受了考验，这些征战已足可抵偿所有的局部性错误。

那个说“你们没有对错误进行分析”的同志^①错了。

我们就是从这里开的头。我的报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有错误，我们就来对它进行分析。就是说，所有党员都就此发表了意见，所有的评价都摆了出来。也许我们在邓尼金问题上会犯错误，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 4 次错误就绝非不可避免的了。

布哈林同志抨击捷尔任斯基^②，说〔他〕只会使人感到极度苦闷，我明白捷尔任斯基^③所讲的实际情况。但怎么可以把对事实进行评价说成是使人感到极度苦闷呢？怎么扯得上极度苦闷呢？仅仅因为这是一些很可悲的事实，仅仅因为这些事实说明任务过于艰巨就骂波卢扬，说他使人感到极度苦闷……

布哈林（在座位上）：我指的是柯恩^④讲的话。

列宁：柯恩和捷尔任斯基都举出事实并且指出波卢扬^⑤的策略估计是错误的，波卢扬说，形势很复杂，对一个在其国内开展活动十分艰难、而且居民又是清一色无产阶级的国家的局势无法做出判断。不过波卢扬的看法有误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了。说他使人感

① 指第 1 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康·米宁（1882～1962）。

② 速记记录有误。这里指的是德·瓦·波卢扬。

③ 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1877～1926），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之一，1917 年 12 月任肃反委员会主席，1921 年 4 月任交通人民委员，1924 年 4 月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④ 柯恩，费·雅·（1864～1941），波兰和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1919 年起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0 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委员。

⑤ 波卢扬，德·瓦·（1886～1937），1919 年 12 月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部主席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0 年 7～9 月兼任第 15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和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

到极度苦闷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这会给人以某种误导：别去搜集反面的事实，否则就会说你使人感到极度苦闷了。不对，我们恰恰就是要学习去搜集反面的事实。

现在我可以作几点与大会决议方针相符的总结。托洛茨基同志说得对，他把波兰发生的事情比作国际革命时代范围的1917年七月行动。这是对的。我们自己就曾经历过2月、3月、6月的游行示威和4月20日的示威，我们过去说这是半游行示威和半起义（我们说过：“比游行示威稍大，比起义稍小”），我们经历过这些“比起义稍小”的行动，经历过胜利的起义走向目标……^①

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确实正在从半革命、从不成功的出击走向不出现失误的目标，我们将在这一基础上学习进攻战。

我们在决议中不谈这个。我们要提出波兰共产党人向我们建议的决议，我们要说，这是能通过的惟一正确的决定。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步骤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群众成熟起来，使他们有可能成长、成熟和壮大并避免前进道路上必然会出现的错误。

这个结论决不是中央委员会的结论，而是曾经到过前线的同志们和代表们的结论，因此这里根本没有谈到不信任。采取进攻行动即通过革命决定的原则合理性是受到承认的，清楚地计算力量、仔细核查正面和反面的事实都是必要的。

我收到一张字条，有人问为什么意大利的情况谈得很少？因为除了报上有关意大利的报道以外，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假如资产阶级得胜了，它可能就报道了。不过这也许是件坏事。总之可以认为，国际局势正在孕育着新的国际革命而与我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意大利革命达到了新的规模。若是再有一个苏维埃波兰或者苏维埃匈牙利，岂不更好。我们决不发誓

^① 此处速记记录有遗漏。

明天我们〔不〕为匈牙利去冒险。我相信，代表会议在这方面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不过我们要说，再次冒险的话，我们每跨出一大步都会牢牢记住应该在哪里止步。我们要冒险，并打算帮助意大利，不过可惜眼下这实际上还无法做到。

但归根结底重要的是，刚才托洛茨基同志令人欣慰地强调指出，绝对必须击溃弗兰格尔，在入冬之前将其彻底击溃，因为在两条战线中我们对波兰做出了巨大的领土让步，可波兰又不会在国内战争战火蔓延及切断粮食和石油供应等方面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弗兰格尔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对波兰做的领土让步并不十分重要。会上没有人反对我们关于波兰的原则声明，这也是我们能把所有力量团结起来的保证。

我们也许要再开一次专门讨论军事供应问题的会议，这样同志们可以交流心得，比方说，从哈尔科夫来的那位同志^①可以讲讲他谈到的关于军事供应主动性的意见，他们做了其他地方没有做的事情，那样一来，此类范例即可轻而易举地推广到其他地方去。

最后我宣读一下声明，这篇声明现已最终定稿并建议代表会议批准，这样明天共产党党团即可将声明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明天夜间这份声明即可送到我国代表团手中。……^②

^① 指 E. Г. 叶夫多基莫夫 (1891~1941)，西南方面军特别部副部长。

^② 列宁接着宣读了声明。

No06545

列宁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问

(1920年10月2日)

同志们，大家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对这些问题我将逐一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请谈谈共和国所处的军事形势和国际形势，依你看，在这种形势下青年团的任务是什么？”

当然，我现在不会再给你们作一个关于共和国所处的军事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报告，何况我的嗓子已经哑了。这个问题只好先放一下，或者另外请一个人来谈谈这个问题。^① 简单地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军事任务，要集中一切力量同弗兰格尔作斗争。你们从报上了解到，与平时一样，彼得格勒工人在这方面走在前面，莫斯科工人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也不甘落后。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要切实讨论一下，青年团应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②

①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10月3日，在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尼·伊·布哈林作了题为《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② 俄国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决议强调指出，共青团同整个无产阶级一样，所面临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支援前线。共青团给自己提出的目标就是：全力支持红军，在后方组织好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参加为前线募集物品的运动，提高为红军生产的各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等等。

下面是几个有关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

“为了使农民不把余粮和其他农产品隐藏起来，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常常是由于需要才不得不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以便去换城市工人领到的并拿到农村去交换的大镰刀、器皿等等。”

我想，大部分农具和农业机器都应分配给农民。只有当农民具备了从事农业最必需的东西，这些现象才会消失。

还有两三张字条说，不仅拿走了农民的余粮，而且还拿走了他们必需的粮食，还列举了说明这种情况的几笔账。

“不仅拿走了农民的余粮，而且拿走了他们仅剩的最后一点粮食。例如，一个有 7 口之家的农民，有 1 匹马，1 头奶牛，他有 50 普特粮食，拿走了其中的 $\frac{1}{3}$ ，50 减 17，还剩 33 普特……按 9 个月算，每人每月 1 普特，7 乘 9 等于 63 普特。那么牲畜的饲料怎么解决呢？这些情况使农民异常激烈地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农民还在忍耐，拿走了农民的粮食，可是却什么也不向他们提供，甚至连焦油都不提供，而没有焦油就不能生产出粮食。应当特别重视劳动农民的供给问题，否则农民对任何友好的言词都不会相信。”署名是“一个农民”。

这是真情实话，苏维埃政权往往不能向农民提供必需品，这往往是由于工作组织得不好，因为俄国森林很多，生产焦油总是可以办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工人吃不饱，收购不到足够数量的燃料和原料，遭到破坏的工业就恢复不了。例如，大家知道，我们没有纺织品，可是大家知道，人民非常缺乏衣服。农民交来粮食，应该奖励他衣服。农民提出需要衣服是完全对的。为了得到衣服，就要恢复纺织厂的生产，要从土耳其斯坦调运来棉花，而那里的棉花还不够，因为在好的年景我们从土耳其斯坦调来一半棉花，而另一半要靠进口，而现在国外 1 普特也不给我

们。需要运来足够的燃料，所以我们对农民说，为了恢复工业、各地的农民都应把自己的余粮交给工人国家。据说，有时不仅拿走了余粮，而且连必需的粮食也拿走了。大家知道，如果估算一下，俄国的粮食够所有的人吃，不仅够吃，甚至在歉收时，甚至现在也够，就是在1918年和1919年也够。可是，要合理分配粮食，就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我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如果把正在成长的一代组织起来，我们现在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大家知道，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大家知道，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正在继续斗争，正在为把余粮全部交给工人国家而斗争。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另一方面，以投机倒把为生计的富裕农民没有停止活动。

这里有张字条，询问有关同孩子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的措施。

除了把合理分配组织好以外，没有什么同投机倒把行为和孩子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的特殊措施。苏维埃政权第一年，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手中才获得3700万普特（粮食），那时我们是束手无策的。第二年我们获得11000万普特的粮食，我们已经开始巩固起来。在到1920年8月1日为止的这一年里，我们国家采取措施通过粮食组织已收购了26000万普特。我们寄希望于下一年的余粮收集，任务是45000万普特粮食。如果我们能收购到30000万~36000万普特，我们就能使工业开工。那么在这之前怎么对付投机倒把行为呢？要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也就是组织的斗争，团结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的粮食越多，投机倒把行为就越受到打击，而国家就能越多关心工业的恢复。例如，在至今一个工厂也没开工

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现在有 16 个工厂准备在今年冬天开工，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一个工人同志^①对我说，预计半年内就能为我们提供〔12000 万〕俄尺^②棉布，因为他们有从土耳其斯坦运来的足够的棉花，也因为今年我们获得了 10000 多万普特石油，这样工厂的燃料就有了保证。我们就是要这样开始摆脱缺衣少食、束手无策的困境，开始反对投机倒把，进入一种正常的共产主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自己手中有足够的粮食，能使工厂开工，而为此就应该有足够数量的原料和燃料。工厂要用其生产出的产品奖励交来粮食的农民，要使农民看到，他交售粮食获得的不是一文不值、光证明他尽了交售粮食的义务的纸币，而是获得他们经营所必需的产品。

这就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 3 年，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战争使我们丧失了，而且正在失去优秀的人才。但是大家知道，战胜弗兰格尔和结束对波战争会使我们赢得更长的时间致力于和平的经济建设。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① 这里指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纺织工厂开工突击委员会主席格·库·科罗廖夫。列宁于 1920 年 10 月 1 日会见了他。

② 在速记记录中，具体数字的地方是用 7 个零（0000000）代替的。关于这个数字，格·库·科罗廖夫关于同列宁会见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说法：“我简要地向伊里奇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和我找他的原因。伊里奇走近我的身边，用手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说：‘科罗廖夫同志，你们真能生产 1 亿多俄尺棉布吗？’我回答说，我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弗·伊·列宁朝我手里厚厚的材料夹瞥了一眼……又说‘粮食人民委员部今年一共只准备供应居民 8000 万俄尺棉布，能够在 6 个月之内再得到 12000 万俄尺，那太好了……’在规定的 6 个月内，‘尽管中央在原料、燃料和其他物质的供应方面只完成了计划的 50%，伊万诺沃的纺织工人却为共和国提供了 11800 万俄尺棉布’”（见《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 版，第 4 卷，第 263、265 页）。

这里还有几个与名称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十分重要。^①

主席^②：这是具有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

列宁：把这个组织叫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这里还有一张字条提出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

“您怎样看青年团同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您怎样看青年团的独立性，在多大的范围内有这种独立性？”

我想，青年团如果真正想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话，就应当遵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而另一方面，它的任务主要就是，使所有正在成长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活动能成为共产主义青年的楷模和榜样。这是主要的方面。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成为所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实际的榜样，要使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能够看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所做的，也就是他们希望每一个工人和农民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怎样从组织上落实，应该怎样在实际中贯彻，我说不上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你们的章程，自始至终待在这里，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这方面的情况我不了解，关于这一点，最好由比较了解你们章程的你们的同志来谈，我

① 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一些青年团积极分子中流行的一种意见认为，青年团作为青年的政治组织，应当限制团员的成分，只有那些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青年人才能被吸收加入共青团。这个观点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建议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喀山代表团团长 X. 加尔别尔尤其积极坚持这种观点。他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指出：“在革命的过程中，我们的青年团组织在发展，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种倾向，就是它正从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任务的组织变成一个由共产主义者构成的组织”。但是，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知道，按此观点就会取消青年团对广大青年群众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把青年团组织变成搞关门主义的小团体，变成“青年共产党”。列宁显然不知道这个建议，因此认为改变组织名称毫无意义，对青年团活动的性质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② 即 Л. А. 沙茨金，他是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者之一，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担任执行主席。

只能说，一方面要遵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另一方面希望青年团在实际上做到不与世隔绝，要使 40 万团员成为所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实际领导者和实际榜样。要使在建立青年团支部的每一个农村、在建立青年团小组的每一个城市居民区的工农青少年都看到，这个小组或支部在帮助他们，在为他们而工作，给他们带来好处，领导他们清除垃圾、反对不卫生的习惯、反对投机倒把行为。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在实际中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做青年团实际工作的人更清楚。

“在进行自我教育时，怎样利用知识分子的力量？我指的是当代保守知识分子。”

“国内战争快结束了吗？”

如果我本人知道这一点，我会十分高兴地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我只能说，我们把弗兰格尔消灭得越快越彻底，这场战争就结束得越快。

现在我接着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字条。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有知识分子阶级？”第三个问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毫无疑问应该是工人，应该是青年贫苦农民和雇农的〔代表〕。青年团应该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小市民、学生和职员？”

至于知识分子，就其地位来看更接近于小资产阶级、小市民和小私有者。因为在资本主义旧社会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富裕家庭的孩子才能受到充分的教育。因此，他们受到的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的教育。而从其工资水平来看，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中他们都高出工人和农民，其中一些人，尽管是极少数，还常常达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像所有小业主和小私有者一样，常常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这一点我们在俄国农民阶级的行为中可以看到。

我已经顺便提到了俄国东部、西伯利亚、南方、高加索的手中

粮食最多的俄国农民长时期里吃尽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统治的苦头，当时他们是拥护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当工人帮助他们推翻了地主，农民就支持工人，可是当工人说，我们不允许自由买卖粮食，因为我们认为按投机价格出卖余粮，是犯罪行为，并要求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工人国家，后者将恢复工厂生产以工厂产品偿还交售粮食的农民时，农民开始动摇，于是他们认为还是跟着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走能得好。他们认为，向他们许诺召开立宪会议和建立“民权制度”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比起工人来，更能使他们的生活有保障。而只有当经验向他们表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也就是说使那些原来的地主卷土重来，以致投机倒把到处盛行，其结果是极少数的富人因此得到了好处，于是农民从这一沉痛的教训中得出了结论：同工人联盟比同地主资本家联盟可靠，“民主制”、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同地主资本家联盟，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像在欧洲过去所有的革命中一样，是受压抑的：而同工人的联盟更靠得住，虽然工人对农民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赞成自由买卖粮食，因为这对富人是发财的自由，而对穷人来说则是破产的自由，而我们将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战斗。工人国家有了这些余粮就一定恢复工业，并把工业产品分给农民。

一旦我们学会了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进行这一分配，那么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也就建立起来了，共产主义社会将在同所有剥削者和投机倒把者进行斗争中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个斗争是艰巨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它要求组织，要求训练，要求教育。所以我说，如果青年团能够懂得自己的任务——教育、改造、组织全体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只有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

但我还要再说一遍，在过去3年中，我们忙于完成刻不容缓的军事任务，而俄国产粮区同工人政府的联系往往中断，我们仍旧取

得了如下的成就：通过国家征购的途径把大量的非投机倒把的粮食都集中在工农政权的手中，而这些储备粮就是恢复工业的基础，就是在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和农民之间恢复合理分配产品的基础。

我就谈到这里。（掌声）

【专题说明】

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

(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

在苏维埃俄国的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所谓“余粮收集制”俄文为 *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确切的译法应是“粮食摊派制”，那时苏维埃政府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征集的几乎是农民手中的全部粮食，所以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和抵制。特别是到内战后期，这种不满和抵制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终于酿成了波及全国各地（至少有13个省）的农民暴动。1920年8月下旬在坦波夫县爆发的农民暴动就是其中一例。

当地农民拒绝按余粮收集制缴纳粮食，举行了起义。不久起义波及到坦波夫省的其他几个县和沃罗涅日省的少数地区，并且发展成为公开的反苏武装暴动。1921年9月，暴动被镇压下去。然而，正是由于广大农民的反抗，迫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重新考虑对农民的政策，以及如何带领俄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整个政治和经济政策，于是，“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

本专题选编的7份关于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档案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民暴动的原因、进程，以及苏维埃的对策和立场。

（本专题文件由孙凌齐、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黄小兵翻译）

№05194

劳动农民联盟区委会告红军战士书

(1920年10月^①)

《在斗争中你将得到自己的权力》

应征的红军战士们！

丢掉自己的无知！停止对农民，特别是起义农民的敌对行为吧！如今是该你们认识和清楚自己不当行为的时候了。你们在同那些大多是刑事犯和招摇撞骗者的共产党人一道参加反农民起义的同时，也把人民的愤怒引向了自己。难道说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在你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你们，应征的士兵们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的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你们最后一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是该高呼的时候了：

打倒共产党人！

打倒卑鄙的苏维埃！

^① 原档案文献未表明时间，这里标出的文件时间是编者估计的。

自由的俄国万岁！

人民游击军万岁！

立宪会议万岁！

《劳动农民联盟》区委会

No05197

暴动农民的部队告应征红军战士书

(1920年11月^①)

《告应征红军战士书》

共产党员政委们派你们镇压他们称之为匪徒的我们。他们对你们说，匪徒向和平居民宣战，出于某种目的贪婪地宣战，以前所未有的凶残破坏着居民们劳作的家园，劳动者圣洁的鲜血在流淌，婴儿孩子们在流泪，一座座粮仓被打开，和平的居民区的上空被火焰照亮、燃烧，居民大批死亡，最终苏维埃政权必将被毁灭。他们以这些心灵的痛苦呼吁你们的热爱自己的俄罗斯人民的俄罗斯的心，于是你们过去和现在都朝我们祖国的这些匪徒们冲去。然而，亲爱的弟兄们，清醒过来吧。俄罗斯人民，而不是当权者和委员们的声音，在呼唤着你们，清醒吧！没有任何匪徒、任何强盗，有的是一致站起来的受难者——俄罗斯人民。他们饥寒交迫，备受折磨，贫困到极点，最终被苏维埃政权赶入死路。他们忍受不了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压迫，愤怒地举起俄罗斯人巨大的拳头砸向自己的压迫者，不是砸向你们，更不是农民劳动者（如果那样太可怕了），而是砸向他们——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全俄罗斯人民的敌人，极残忍的共产党人。是该不再相信他们这些骗子们的时候了，不要再做他们这些领导者们的盲目的共产党人，执行他们对俄罗斯母亲惨杀命

^① 原档案文献未表明时间，这里标出的文件时间是编者估计的。

令的工具了。国家终将毁灭，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清楚明确的。国家如今以至将来都在被毁灭。他们，这些强暴者、自私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在努力挖掘坟墓，他们准备占领我们和你们亲兄弟——俄罗斯人——的寒冷的土地。清醒吧！受难者滚烫的神圣的眼泪在向你们哭诉，召唤你们投入共同的齐心协力的复仇斗争。专横、强暴、奴役在米库拉·谢利亚尼科维奇有力的打击下正被毁灭，在3年的共产党的统治下笼罩俄罗斯大地的压迫的黑暗正在消散。而自由的光明的太阳的曙光必将照亮我们的祖国。整个被解救的人民的意志，而不是掠夺者和他们的领导者的意志，将使生活幸福起来。我们不把你们当敌人，而是当作朋友呼唤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的人不少，我们的人很多，我们是你们亲爱的全体人民。来同我们一道用共同的力量建造美好的生活。你们是被驱赶着拿枪反对我们的，你们不是敌人，而是亲爱的宾客，亲密的朋友，到我们这边来吧。这里没有机枪子弹、没有炮弹、没有刺刀的寒光，迎接你们的是热烈的兄弟般的吻和热烈的兄弟般的爱。

劳动农民游击（集团）军总指挥部

№05196

卡麦隆关于坦波夫省暴动持久原因的报告

(不早于 1921 年 1 月 3 日^①)

“安东诺夫匪帮”的发端及其原因。

安东诺夫（前称“匪徒”）暴乱活动开始于去年。1920 年上半年时它还活动得不广泛，属匪徒性质。以后左、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都利用了它。当时无论是坦波夫党和苏维埃机关，还是部队指挥部都对它估计不足，如今它已酿成一场大火，占据了整个坦波夫、基尔萨诺夫、博里索格列布斯克 3 县。今年 8 月初，安东诺夫匪帮第一次到阿法纳西耶夫卡活动，将近 60 人。由于省契卡在镇压时方法不力和生硬（见今年 12 月 28 日会议上原契卡主席塔拉斯科维奇的报告），对摇摆的农民措施不当，激怒了群众，致使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匪帮没有被彻底消灭，……在被打散后又逐渐地发展起来，以至发展到很大规模，并渐渐扩散到全省。南部几县的富农阶层和不满苏维埃政权的人，再加上播种不足，收成不好和旱灾等不良条件，都给匪帮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适宜的土壤。当然，共和国严重的粮食状况也迫使粮食部门人员不能持客气态度采取适宜的办法收取粮食。他们站在自己狭窄的粮食立场上，只求尽力全面完成余粮征集，而没有对富农和贫农经常进行必要的区分，滥用了授予他们的广泛权力和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不满情绪的扩散，给匪帮和暴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社会革命党中右的和左的积极分

^① 原档案文献未表明时间，这里标出的文件时间是编者估计的。

子们广泛地利用了自己原来的基地——坦波夫省，利用了正在兴起的匪帮和农民阶级中潜在的不满，通过有组织的地下活动将农民的不满置于自己危害极大的影响之下。暴乱领导人安东诺夫^①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社会革命党全民政权和“立宪会议”思想和口号的狂热传导者。用省契卡主席拉斯科维奇的话说，他在一年半里建立了基层组织和未来作战据点。

遗憾的是，直到最后一刻，当地政权机关对这一活动的性质都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连省契卡这样权威的部门，都将其称之为“匪帮”，如此认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8~9月份（见省契卡主席格罗莫夫的报告），因此，对此的积极性和预见性都是不够的。

而今他们的活动已形成有计划有组织地与苏维埃政权对抗的形式：国营农场、苏动组合、公用设施等遭到系统地接连不断地破坏。坦波夫和基尔萨诺夫县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均遭破坏，甚至无法重新建立，因为所有的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均被起义者杀害。

力量不足始终困扰着同暴乱进行积极的斗争。再加上地方权力机关没有及时向地方指挥部通报安东诺夫匪帮的深刻根源。地方指挥部把安看做是纯粹的“匪帮”，认为只要打掉其主要的核心的几股力量就可以消灭。有时，当打击取得实际成果，安东诺夫匪帮被打散后，指挥部即向总部发出最近必将铲除的电报。然而匪徒却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集结，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逐渐加强。

以共和国内卫部队参谋部为首的总指挥部在没得到对暴乱明确深刻的判断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指挥部表面化的意见，曾认为凭借当地现有兵力，而无须按实际状况的需要增加兵力，即可一举平息

^① 安东诺夫，亚·斯·（1888~1922），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坦波夫省叛乱的首领。

暴乱。

共和国的客观状况，波兰、弗兰格尔、乌克兰和其他一些省份的暴乱都要求节省军事力量的使用，而坦波夫并没提出坚决明确的要求，没指出该省的严重局势，如再拖延实际援助将无异于死亡。固然，其曾有过派一骑兵团，一步兵营和一些有经验的指挥人员的请求，但与此同时又称，暴乱即将平息，苏维埃政权正在恢复，剩下的只是彻底击溃敌人等等。总指挥部考虑到在坦波夫省司令员指挥下有近 11000 名步兵和 600 名骑兵，并清楚地知道，该省的主力 and 物资尚没有达到充分的使用（包括无编制的分散的党和苏维埃的武装），广大的工人群众还没吸收来参加积极斗争和保卫大城市，省内的马匹使用也很不够，主要注意力尚放在次要任务上；而不是放在对付暴乱上：比如，参加粮食征集的士兵有 5000 余人，而作战的仅有 3200 人左右，因此，总部当然建议应首先使用上述力量。

最后，事态急剧恶化，地方政权和指挥部不得不报警，请求给予实际支援以扑灭严重蔓延的大火。

为讨论坦波夫省局势而组成的委员会于 12 月 5 日开始工作，1 月 3 日结束。在研究内卫部队参谋部和坦波夫参谋部、军事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当面询问反暴乱领导人和听取 12 月 26 日至 29 日坦波夫省执委会军事委员会、省委会和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开会做出的对局势特点的分析，以及研究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委员会做出如下结论。对暴乱活动持久和未及时平息的结论是：

一、总的客观条件

1) 外线的局势，与波兰、弗兰格尔、佩特留拉的作战使得总部不可能向坦波夫指挥部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兵力援助，以根除

“安东诺夫匪帮”，保障该省的全面稳定。

2) 坦波夫省的粮食状况一方面由于严重干旱、播种不足、反歉收促使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产生了不满。另一方面部队和总部对粮食供给的急需不允许征粮工作有丝毫放松，只能遵照总部一项项无条件的命令在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滋长的条件下，加强征粮工作，这也削弱了反暴乱的力量，使暴乱活动得到了明显的扩大和深入。

3) 被起义占据的几个县的富农阶层不让苏维埃政权在当地扎根，原苏维埃政权在这里是有名无实，未能取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4) 该省共产党力量薄弱，总部曾多次抽调该省的部分部队，而对上述薄弱环节和留下这些部队以加强该省的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估计不足。

二、总指挥部的疏忽

1) 考虑共和国的外部局势是必要的，但应指出，以内卫部队参谋部为首的总指挥部并不总是关心地听取地方指挥部的要求，因而耽搁了派兵援助。

2) 在任命平息暴乱的指挥员时，对其全体人员的适应能力考虑不足，结果导致频繁更换指挥员，这实质上对顺利作战是有害的。

3) 在作战第一阶段，形势要求经常同地方指挥部及该省党、政部门联系以对形成的态势做出直接判断时，却缺乏联系。

4) 轻信地方指挥部的报告，有时对近期消灭安东诺夫匪帮的推测和对战果的评价过于乐观，由此自然对实际局势和平息暴乱所需力量估计不足。

三、地方指挥部

1) 截至 12 月 1 日前，坦波夫指挥部和军事委员会没有向共和国内卫部队司令员作过一次详尽的有关当地军事态势和暴乱活动性质的报告。所有收到的报告都很不确切，还令人感到乐观。依据这些不定期报告，无法得出活动已变成暴乱的结论。相反，报告有时还指出居民们不赞同安东诺夫，安东诺夫匪帮是靠强迫动员得到补充的。不只一次地报告说暴乱很快就会被平息。地方指挥部本身对此完全确信，有时还预测 7 至 10 天即能结束。还报告过基尔萨诺夫-坦波夫-巴拉绍夫三角地的匪帮已彻底清除，目前已着手恢复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在 12 月 1 日前地方指挥部没提出过增派新的大部队的要求。当然应当指出，的确曾提出过增派少量骑兵的要求，但这一要求并不坚决。此后曾派去两个骑兵连和一支装甲部队。而第一个有关增派较大数量部队的请求是在 1920 年 12 月上旬由内卫部队司令部的委员会在去坦波夫考察后提出的。此请求提出增派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师，后实际派去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骑兵连和一个炮兵排。

2) 对暴乱的客观条件、根源和特点缺乏系统的认识。对暂时的胜利过于乐观。尽管实施过几次打击，但并没打掉匪徒的核心，没有考虑匪徒们会分散开，使其活动更具危险，更深入广泛。

由此，总部的信息不准确，被乐观的暴乱即将被平息的愿望所左右。

3) 缺乏计划和深思熟虑的作战方案。

4) 不注重政治工作。作战部队未经过训练，未进行经常性的整顿和教育。由于疲劳过度，不间断的作战失利，总之是不合理的使用，使部队失去了战斗力，纪律紊乱，出现了抢劫。

5) 部队分散和作战中缺乏主动性。骑兵无目标地追赶敌人,致使疲惫不堪,战斗力减弱。由于将其分散成小部队活动使起义者得以分别歼灭并连续被缴械。

6) 斗争方法缺乏连贯性和滥用镇压。火烧匪徒最终控制的几个村庄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只是激怒了居民,使这些失去居所的人变成了积极的匪徒。此外,恰恰在作战比较平静的期间(11月上半月)随意“放火”。

四、军事委员会

1) 军事委员会没有充分行使1920年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宣布为战时状态地区所作决定中授予的特权。

2) 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是每日集中对积累的近况进行枯燥的讨论,毫无计划和系统。与省内党、苏维埃、经济组织的联系只是纯形式上的,十分薄弱。同广大工人群众则完全没有联系,没有作吸收这些群众直接参加同暴乱活动积极斗争的努力。

在上述方面对各县的指导也十分软弱无力。没有领导县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没有确立县军事委员会同指挥部,同党、苏维埃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及协作。

3) 长期“闭门造车”,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广泛利用当地的财力和物力以平息暴动活动。在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中从没有针对省内严重局势提出任何原则性报告,相反只是罗列大量杂乱无绪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是军事委员会能够解决的。对有关暴乱前线状况的报告进行详细了解后就会发现军事委员会对担负的国家重任所持的形式主义态度。

4) 军事委员会对规定建立隶属司令员的政治部的工作完全不

感兴趣。在报告作战部队的政治工作时该政治部和坦波夫省部队政治部都不参加。军事委员会对其做出的这个或那个决定也并不关心其是否落实。因而在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中也没有相应的反馈报告。

5) 甚至还做出决定，让司令员离开他的直接任务：重建国营农场，返还被匪帮掠夺的牲畜等。

6) 军事委员会和指挥部，而正是在 10 月底和 11 月初暴乱者进行了群众性的发动时工作不协调。与此同时，在 11 月份开始了对所谓“匪徒村庄”最有力的镇压，包括连续烧毁这些村庄。

五、委员会的结论

委员会查明，坦波夫省暴乱活动的规模已具较危险的特点，为平息它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1. 通过增加和有计划地分配兵力占领坦波夫、基尔萨诺夫和博里索格列布斯克三县地区，并命令地方政权在占领区内以 10 倍的努力重建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恢复被匪徒破坏的苏维埃经济。

2. 向指挥部提供必需的指挥人员，并向暴乱前线派出新的部队，同时用新部队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部队。

3. 在作战部队和居民中按已做出的计划，展开大范围的政治工作。由于共产党员不足（被匪徒杀害近 800 人），请党中央派出完成此任务所需数量的党的工作者。

4. 增加该省的契卡机构（因死亡已失去近 40%），人员由中央调遣。

5. 改组军事委员会和指挥部。

6. 责令军事委员会对其行动及使用该省兵力、财力和储备以支援作战和为恢复被破坏的经济制定出详尽的计划。

7. 指挥部应根据本结论之 1，做出平息暴乱活动的作战计划。

8. 对妨碍及时平息坦波夫省暴乱的共和国严重的客观条件引起重视，迅速将平息的实施措施付诸实施，不再追究耽搁平息暴乱有关人员的过错。

9. 开始法庭侦讯，将下列人员和罪犯交付革命军事法庭审判：

- 1) 未充足供应作战部队弹药；
- 2) 未抵抗就让整个部队投降敌人；
- 3) 在作战部队服装供给上杂乱无章。

委员会主席 卡麦隆^①

委员（五人签字）

^① 卡麦隆，彼·亚·（1886~？），内卫部队革命军事法庭副主席，是当时成立的研究反安东诺夫分子的工作拖延原因委员会的领导人。

No05193

给坦波夫省各镇压起义部队的命令

(1921年3月13日)

副本

秘密

坦波夫市

No47 /野战通信处

1921年3月13日20时56分

近来从战地得到有人抢劫的消息。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注意到各野战部队任务繁重，给养不足的同时认为，在战地抢劫是一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些行抢的红军战士是劳动人民的敌人，是红军的耻辱，是匪徒们最好的帮手。

一、

各部队所有指挥员要同军事委员一起对所属部队进行检查。对所有查出的财物，除红军战士应得的外，都要没收并发给最贫穷的农民。

二、

要布置共产党员们在作战和休整中不间断地对整个部队进行监督，要按红军战士的人数向党员们平均分派任务，党员要对分配给

自己的战士的行为完全负责。

三、

对那些在抢劫时被抓后仍不思悔改，或在其处又发现有居民财物的，今后不经审判就地枪决。此命令传达至所有连队。此令以电报下达。

司令员 巴甫洛夫（签名）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安东诺夫（签名）

总参谋部参谋长 涅韦任^①（签名）

^① 涅韦任，康·彼·（1881~1934），时任坦波夫省部队参谋长。

№05195

图哈切夫斯基致前线全体红军战士书

(1921年5月19日)

红军战士们！

收割的季节正在临近。

国内战争前线上暂时的平静终于使我们有时间去战胜折磨苏维埃俄国的饥饿，建立起我们共和国工人和农民正常生活的条件。

但是，被赶出国外的地主们不想让工农国家能和平地劳作。他们联合坦波夫省的富农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以此地的富农暴乱进而推向整个苏维埃俄国。

然而，这是痴心妄想！

苏维埃的农民们以实行粮食税保障着自己的经济的发展，他们坚定地捍卫着工农俄国，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哪里生哪里灭亡。

红军战士同志们！

消灭最后的敌人——社会革命党这伙蝗虫。

让这伙蝗虫在新的丰收前在红军的一次打击下灭亡。

勇敢坚决地打击劳动者阶级的敌人！

司令员 图哈切夫斯基^①

1921年5月19日于坦波夫市

① 图哈切夫斯基，米·尼·（1893～1937），苏联元帅，1918年起历任集团军司令员，工农红军参谋长。当时担任镇压暴动部队的司令员。

№05191

舍伊杰曼和瓦西里耶夫 给图哈切夫斯基的通知

(1921年6月21日)

坦波夫

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

莫斯科

№659088 /232 /参谋部

1921年6月21日反匪徒委员会决定：建议坦波夫指挥部动用毒气攻击，但要极其谨慎，要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确保成功时使用。

共和国炮兵视察员 舍伊杰曼^①

军事委员 瓦西里耶夫^②

① 舍伊杰曼，尤·米·(1867~1940)，工农红军炮兵司令，炮兵和装甲兵视察员。

② 瓦西里耶夫，Б.А. (1889~1939)，1921年担任党的坦波夫省委书记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消灭坦波夫省境内的匪帮而设立的委员会的副主席。

№05192

图哈切夫斯基给粮食征集委员会的命令

(1921年7月8日)

送参谋长卡库林^①

第一、二、三、四、五、六区粮食征集委员会

已被击溃的匪帮现隐藏在林区，他们拿当地居民出气，并烧桥毁坝，破坏人民的其他财产。

为保护桥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委员会命令：

1. 立刻占领重要桥梁附近的村庄，扣押人质不少于5人，在桥梁被破坏时即行枪决。
2. 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当地居民保护桥梁免遭匪徒袭击，要让居民们担负起24小时内修复被破坏桥梁的职责。
3. 此命令散发至所有的村落。

司令员 图哈切夫斯基

^① 卡库林，尼·叶·（1883～1936），1921年5～9月任坦波夫省部队参谋长。

【专题说明】

苏俄驻爱沙尼亚使团的报告

(1920年9月)

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俄国即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1920年，列宁和俄共（布）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彻底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卫军的决战。与此同时，为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争取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苏维埃政府也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但年轻的共和国在这方面还缺少经验和专门人才，在工作中暴露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收入本专题的1920年9月29日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特别委员会“关于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秘密工作条件”的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苏俄外交工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反映出年轻的共产党外交人员的对外政策思维。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编辑和校注，

王应杰、乔立良翻译)

№04015

特别委员会关于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 秘密工作条件的报告

(1920年9月29日)

一、按照国际惯例，任何国家驻某国的外交使团都被视为国中之国。这里的所有人、法律、物品等都享有治外法权。使团是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一部分。走出使团的大门，就如同迈出国境。不征得使团首脑的同意和不遵守固定的制度，任何人都无权擅自走进它的大门。国际惯例还要求，即使在宣战的情况下，也要向使团全体人员及其档案资料提供自由回国的通行证，不得抓人和扣留文件。当地政权只能在外国使团全体人员已经撤离和断绝外交关系后方可进入其驻在地。

如果认识到外交使团对派遣国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上述的规定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国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对外机构，是捍卫以该国政权为支柱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机构，是对朋友进行经济和政治影响，向对手和敌人施加压力的机构。通常，不论对使团所在国而言，还是对其他所有国家（不管它们是否在这里派驻代表机构）而言，使团都是一个集金融经济、军事和政治等三个情报部门于一身的机构。换言之，每个使团都是在国际环境和世界范围内为派遣国的利益而进行情报活动和反间谍活动的机构。因此，在每个使团中和每个使团周围都有一个从事阴谋、设置圈套和暗地活动的网络，这是使团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金融经济竞争中开展军事政治竞赛的一种反映。

从19世纪末起，使团在这方面的活动表现得特别突出和集中，当时金融资本为现代帝国主义创造了先决条件，成为国际关系和对抗中占优势的的决定性因素。在最后这次战争中，特别是在目前——世界革命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的情况下，这种活动的突出性和集中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而且，一旦无法直接在该国设立自己的外交情报机构，则情报部门的使命就由自己在邻近的“中立国”中的使团担负起来，或直接由敌对国中的某些“中立国”使团承担。大概无需多言就能证明，在这种条件和任务下，外国使团在工作中形成的秘密使命和外人不得侵犯和擅自进入使团驻地的规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一位英国人说：“我的住宅就是我一一把锁”，以此来强调外人不得擅自进入自己的住宅。当代任何国家政权，只要一掌握最高权力，就应该说：“我的使团就是我在别国的堡垒。”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所有使团，即它的所有堡垒，犹如链条的各个环一样，相互联系在一起。如果链条所有环无一例外全都牢靠，那么整个链条就会十分坚固。如果一个环薄弱，自动断裂开来，那么整个链条，即整个组织工作马上就会全面崩溃。一旦某个外交使团或某个堡垒的秘密工作被揭露出来，就会暴露该系统所有组织，因而必须重新改组这个系统，特别是该系统的秘密联系。同时，每个独立的使团也拥有自己的由各种人物组成的复杂的长链条，这些人应当在外部的压力和诱惑面前表现得相当可靠和坚定。这个链条的最薄弱之处是同本中心和其他使团或堡垒保持联系的那些人。但是作为接近和实施联系手段的预备手段，链条中的所有环，即有可能在该使团和堡垒中自由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谈的不是理想，而是必要的实际条件：外交使团作为军事堡垒应在外部安排和内部组织方面做到，不让一个可疑的人或陌生人在使团驻地经常活动，而且外人只能在保证使团不受外部

间谍和内部叛徒威胁的一定条件下才被准予进来。

根据这个原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没有绝对把握证明事情按另外一种形式发展时，必须把每一位经常参加使团工作的人都视为可能的叛徒，把每一位“客人”都视为可能的间谍。这里遵循的是不信任的原则，信任则是例外。只是表面了解现代外交使团生活和组织的人都知道，必须严格遵守原则：没事时你到使团来不能随便见接待室值班员以外的人，有事来时只能见你所要见的人，其他的一切对你来说都是其他宗教的“圣地”，任何无聊的好奇行为在这里都被视为侮辱和犯罪。

二、所有这些要求对原则上反对“秘密外交”的苏维埃政权的使团是否适用呢？适用，不仅适用，而且非常适用。苏维埃政权希望“不存在”“秘密外交”，但帝国主义世界的“秘密外交”却越来越希望直接威胁到其生存的苏维埃政权不复存在。置身于资产阶级世界和苏维埃俄国驻外机构决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机构平等。这是不言而喻的。苏维埃外交人员和每一位在国外的诚实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是所有政权机构以及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可调和的、毫不留情的敌人。即使当它签订某项条约或订立在当时无疑对另一方有利的契约时，它也是敌人。在签订条约或契约时，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像“歪曲自然法则和所有真理”的怪物；握紧拳头，等待时机，掐住“另一方”的喉咙，将其置于死地。这里不可能存在“平等”。强盗和禽兽在自己的圈子里能够平等。所有被掠夺者相互间也能够平等。但是原则上他们同“另一方”是不可能平等的，即使从他们各自的观点来看。“两个阵营”中的任何和约都只不过是停战协定，而任何协定都只不过是新一轮冒险搏斗之前的“喘息”。

因此，苏维埃使团在苏维埃国家境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异己的、敌对的堡垒。它仅仅被其他国家暂时接受，但实质上还是不受欢迎

和遭到敌视的。除苏维埃政权驻外机构同非苏维埃国家机构相互对立的那些具体的实际问题以外，在基本任务和目的上也始终存在着原则性的对立，在对待自己及另一方的出发点上也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敌意。而且，每一位诚实的苏维埃活动家和工作人员在非苏维埃国家——不仅是外部的敌人，也是内部的敌人。所在国统治阶级之所以允许他们待在使团里，没有把他们同国内最恶毒的敌人一起抛进监狱，是因为这样做无利可图，不合时宜。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可靠的长期联盟。他们永远是“不友好和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但是必须容忍他们，因为本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劳动群众向往着他们并准备为他们鸣不平，因为他们受到这些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因为他们享有世界革命“首批设计师”的威望和被压迫人民的朋友的声誉。使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失去人们的信任和爱戴，让他们威信扫地，将他们周围的光环驱散——这是所有国家统治阶级同这些代表交往和谈判时肩负的惟一和长期的任务。这是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其余的任务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针对苏维埃使团的“外交”和“情报”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要紧的是，通过渗透到他们的“圣地”不仅获取所谓的国家机密和军事秘密，而且还要首先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收集各个部门中必不可少的内部垃圾，逐渐积累起来，然后将所有垃圾摆在“受骗的工人们”面前：“请看，你们的庇护人和恩人原来是这样的！”

惯于将“言论与行动”、“真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掩饰和伪装起来的大师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允许“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有任何疏漏。如果他们能够在某个场合证明，俄国劳动人民的领导阶层并不比他们——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工作和生活得“更好”，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从这个观点来看，新理论的预言家们自然应该是无可责难的。他们认为，通常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缺点和弱点

是不能原谅的。否则，如果他们自己也“像异教徒”一样行动和生活，那还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如果已经出现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客观条件，那么即使苏维埃俄国的所有代表和苏维埃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骗子、投机者和道德败坏的人，世界革命也会继续向前发展。是的，世界革命不会因此而流产或停止发展。但是这类现象会减缓世界革命的发展速度，并且妨碍劳动人民尽快摆脱与他们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的荒谬理论，这一点大概是无需争论的。从我们国内的情况来看，苏维埃式变革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发达国家哪怕推迟一个月发生，在我们眼里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力争使这个变革及随后的所有事件接受我们的影响并按照我们的行为方式进行，而不是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否则，进步群众将不得不把我们视为自觉和不自觉的反革命分子。可想而知，在这些国家里，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行为方式将阻碍他们走苏维埃式道路。

结论是一目了然和不容置疑的：既然这是现实存在的，那么苏维埃在境外的每个使团就应该像恺撒的妻子那样各方面都做得纯洁完美，不给我们的敌人以攻击的把柄。整个使团及其每个部门、整个工作性质及其每个单独行动、对每个工作人员的挑选都应做到这样。在这里必须建立连环保，因为连环责任是必要的。所有人对一个人和每个人负责，因为外界是根据一个人和每个人的行动来评价所有人的。驻非苏维埃国家的苏维埃使团——不仅是国中之国，而且是新世界设在旧世界中的一个整体。使团中的一切都应有自己的特点，都应是新的和最好的：待人接物的态度，牢不可破的同志式联系的特殊精神、使团全体成员自上而下的亲密关系、言行和决定的明智性和合理性，最后，对派遣的人满怀历史和国际责任的深厚感情，把派遣的人和社会主义祖国饥饿而贫穷的劳动群众当作自己的家人的深厚感情。用商业语言来说，每个苏维埃驻外机构——这是我们提请所有国家劳动人民注意的新产品的广告和业务形象。其

附加条件是，我们将不在使团所在国内从事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但我们将不能不把加强自己在劳动群众中的威信、作用和影响作为自己的任务。换言之，我们不能不争取同最亲近的、与我们相关的革命政党和思潮建立某种形式的真正的长期联系。我们不仅是预言家，而且是第三国际实际工作的组织者。除通常公认的各种情报和反间谍部门外，我们还应该建立整个社会政治、特别是共产主义政党的情报部门。因此，我们使团的秘密工作应该建立在其他使团达不到的高水平上。“列宁之流”的公司在这方面早就享有世界声誉，是最好的、最灵活和最现实的秘密工作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发源地。“丘比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我们可以原谅欧洲各国年轻的共产主义政党天真幼稚的秘密工作方式，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早已远离地下工作，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原谅尚未放弃十月革命前20多年地下工作活动方式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应该使自己不合法的地下工作做得让统治阶级无法挑剔，使敌视我们的反间谍机构无机可乘。另一方面，应使外国同志向我们求援时坚信，按照我们的办法、原则和指示去做，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各种失误和意外。如果让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冒着被镇压的危险”——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被人们指责为反革命，还要被指责为奸细，即使是不自觉的反革命和奸细，反正都一样。

总之，我们在总结实际生活不断地、时时处处向苏维埃国家的所有驻外使团提出的普遍性要求时应指出以下几点：

1. 每个苏维埃使团应该是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小团体，应具有不同于其他所有团体的自己的生活方式，应在生活中遵守和执行劳动服务而不是剥削劳动的新的实际工作原则和方法，应通过秘密工作的浓厚烟幕挡住我们的敌人的无聊的、自私的好奇。

2. 使团所有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性和纪律性应比前线部队的要求更严格，甚至不亚于革命前我们的地下组织。

3. 这里针对间谍和叛变行为的预防措施应比红军作战司令部更严密，因为这里对揭露出来的间谍和叛徒施以镇压的恐吓不能或几乎不能收到任何实际效果。

三、谈完总的组织和预期设想后，我们来谈谈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的具体环境和实际工作。我们深感忧郁、困惑、不安和羞愧。俄国苏维埃使团来此半年丝毫也没有把曾被誉为酒肉朋友的“妓馆”的偏僻的二等旅馆变成堡垒或共产主义的“炮台”，仍保留其很多原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将一些丑陋的东西涂在打开通向欧洲大门的苏维埃使馆的脸上。这里没有一个特征能够告诉外人，这里拥有一种全新的、强大的、长存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的外在表现促使每个人都会产生“我要留在这里”的愿望。

不，完全相反。这里的一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人们是“路过这座城市”，是偶然、匆匆和临时到这里来的：“刚来，马上就走——我同这儿没有任何关系！”既然这些人只是临时来的客人，那他们住在这里就很不自在，“仿佛偷偷摸摸地”。这里不仅没有国旗，没有苏维埃招牌，甚至连登记卡和门上标志都没有。整个使团不分昼夜根本无法同外界隔离开来，至今仍未（哪怕是出于礼节，作作样子）对自己享有治外法权的领域采取“警卫国境”的措施。使团内部至今未将十分重要的办公用房同在这里工作和居住的职员的个人住房严格划分开来。在使团驻地，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堡垒中进进出出的全都是同使团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常事。这里居住着饭店的老板及其服务人员，他们仍然生活在原来的环境中，同很多老主顾和“客人”显然还保持着原有的“最佳关系”。这些人同没有任何公务借口到这里来的不相干的人经常混在一起，长时间地聊天，这简直就是一幕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的常见的“生活写真戏”。

对来访者没有任何监督：到使团来，就好像到原来的“彼得格

勒”旅馆一样，所有愿意来的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第一次来访的人，或有事找看门人的人（这类人并不多）才向不认识的“管事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其余的人进出使团三层楼畅通无阻：无人查问进进出出的人。只有去使团首脑及其商务助手的办公室才需登记和禀报，但即使到这些办公室，每一位来访者如果愿意也可以随时“突然”闯入。没有一间安排有序的总接待室，只有一间专门接待到上述两间办公室的人的房间。但在这间接待室里既没有一位知书达理、熟悉情况的接待员，也没有一张咨询台。因此，白天在旅馆的走廊里，外来人熙熙攘攘，四处查看，有时还无拘束地交流察看结果。这样的秩序给重要的公务来访者造成诸多不便：在走廊里徘徊，坐在窗台上和临时堆放的箱子上，或者干脆站着等几小时。可见，只有间谍和投机者才会喜欢这样的条件。然而这种环境会使其他所有人对这个孤立无援、乱七八糟、非公务性、没威严和运转不正常的机构产生一种极其反感和难以忍受的感觉。在俄国，大概只能在靠近前线地带、在红军前进后的最初几周内看到这类机构，但在这些地方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实际上这是无法排除和不可避免的现象。然而这些军事保密部门会马上着手制定严格的通行证制度和采取警备司令部通常简便易行的方式对来访者实行监督。雷瓦尔的苏维埃使团没有一个组织有序的警卫队，就好像没有自己可靠的服务员一样。因此，负责人的办公桌夜里经常受到任何国际惯例和条约都不曾规定的“检查”，就不必惊讶了。工作人员没有宿舍和俱乐部，只要愿意，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各种不适宜和不可靠的联系和交往，但是采取措施制止这些交往则困难重重。

对于那些被迫在我们使团寻求“避难”的人没有任何合适的专门住所：可以偶然悄悄地进来，但是要想住下来不被其他国家的间谍发现和必要时出去，则几乎不可能。最后，对那些过往的党和

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住地应尽量不引起外人注意的人也没有任何关照。这些人只能自己去想办法：奔波找旅馆，常遭到无情的拒绝或勉强住进大概专门为减轻敌人反间谍部门的任务而设置的空闲住所。近两个月来，虽然听到不少抗议和抱怨，但在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也未见任何改观。从苏维埃式同志关系和秘密活动的常识来看，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的，除旧俄市侩庸君子玩忽职守的作风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更不必谈它对当地居民和外国人心目中的“苏维埃招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

但是用最后这个结论来解释使团住所问题也是恰如其分的；难道还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这样做了吗？这像什么样子？对所有到“外国使馆”这个住所来的人来说，这种局面不正是引人注目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广告吗？人们常常根据使团来评价派遣国。难道在雷瓦尔的所有其他使团也都如此吗？即使对我们友好的人又能从这种混乱中得出什么结论呢？这种混乱和孤立的状况能赢得威信和荣誉吗？它能唤起人们的信任和爱戴吗？除了敌人和间谍外，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还有兴趣同这样的机构共事呢？莫非使团行政领导对这一切没看见、没意识到和不了解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不及时采取措施、从与我们友好和敌视我们的社会舆论中撤消这个给苏维埃抹黑的日常展览会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们能安心地、无意识地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呢？

四、当我们开始审查雷瓦尔使团生活和工作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他们最薄弱的方面——全体工作人员时，所有这些问题始终在我们眼前盘绕。在这方面，雷瓦尔使团早已成为真正的“话柄”，尤其是在雷瓦尔当地。

世界上竟有人对雷瓦尔使团的全体工作人员如此了解，以致能够准确地回答出——何人、何时、怎样和为什么到这里来工作。还有人能够说出使团每一位在册的工作人员当时在干什么，他的工作

多么重要，多么有用。这里是否有人只是名义上“被派去”从事某项工作，而实际上却无事可做呢？是否在使团工作中一方面存在工作人员不必要和不容许的工作过程情况，而另一方面又存在工作量严重不足的现象呢？他们日常联系和交往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除上帝和别国反间谍机构外，无人知道这些情况。这里有一个非常离奇的现象；所有人都知道并能说出，除两三位使团最重要的共产党员外，任何人都绝对不应知道的事，但却无人知道使团每一位可靠的成员都应了解的情况，这就是；工作人员中谁最不可靠、最值得怀疑，为什么和必须在哪一方面，而不是随随便便在所有方面提防他，直到采取措施把他遣送回俄国。由于秘密工作的整体现状和难以置信的无所作为使中央委派的负有特殊使命的所有人员一到驻地就被马上识别出来并立刻被敌人的阴谋诡计和流言飞语所包围，成为令人担心的、纠缠不清的、“需要提防的秘密工作人员”。

相反，使团某些人的投机活动和间谍联系直到这些人已经到达俄国苏维埃政权力所不及的地方时，才被大家知晓。而且最典型的是，对某些人（如埃尔兰格尔和维尔古斯）行为可疑的及时忠告被使团当权者们当成流言飞语和阴谋诡计，对被告不产生任何影响，却使原告打上“坏烙印”。“没有抓获就不是小偷，没有判刑就不是犯人”的原则在地下秘密工作军事要塞生活的条件下是绝对不适宜的，这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解释：在没有证据之前，何必惊动本人。但是等拿到证据时，已经无法惊动本人了。我们不仅没有通过地方法庭对“形形色色的”外国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反而时常采取一些措施掩饰他们赤裸裸的行为，尽量不让他们被我们政权和我们法庭抓获、审判和判刑。得知自己不能继续留在雷瓦尔使团工作而不回或不想回俄国的人逐日增加，埃尔兰格尔夫妇及妹妹（根据古科夫斯基的证明，埃尔兰格尔的妻子在使团没有担任正式职务），维尔古斯、卢里耶、梅勒、费尔斯捷尔。他们都是商贸部门的，但

后四人已经由索洛蒙同志领导。埃尔兰格尔等三人在古科夫斯基同志的公开帮助下已经走了，去“四处寻找安身之处”。不妨指出，遣送回俄国的威胁恰恰落在那些一接到中央的指示马上就会回国和不想去任何地方的人身上。由于整个监督和管理措施十分不力，工作人员中某些人的道德败坏行为被视为自然和正常的现象。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受到制裁和伤害。他们往往知道的事情太多，以致没人敢伤害他们。只要对他们本人有利，他们会继续这样干和准备这样干；否则就逃走和转入“地下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滋生的躺在饥饿的苏维埃俄国身上、轻率地践踏生活、特别是那些在利用“别人收入”的人的作风取代了严肃的同志关系和实事求是的纪律。整个使团直到不久前是一个真正的、自己打自己的福音会会馆。贸易部门和外交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和敌视。中央居民疏散管理局的生活和工作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俄罗斯通讯社也不知在那儿干些什么。每个部门至少有两个阵营。所有人都被仇视、不信任、阴谋诡计、流言飞语、工作普遍不协调、崩溃和涣散的毒气所笼罩。总之，这座堡垒的气氛令所有人坚信，它注定失陷，它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敌人的打算、意志和情绪，而不取决于它自身的力量及其抵抗和自卫的手段。情况极其糟糕，因此一位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谈及它时指出：“不想和不愿意把我们从这里驱逐出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我们是长期的、极其廉价的重要情报的来源。”而另一人则将使团比作一个被罩在玻璃罩里的组织：任人欣赏。这不是堡垒，不是防止变节行为和间谍活动的基地，不是情报机构，而是有组织的变节行为，是外交和整个公务工作闻所未闻的荒诞笑料。这里的一切，除名称外，几乎没有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和外交机构的痕迹。这样的机构对敌人无害，然而首先和主要危害的是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政权。

五、在这种大环境下，在内部自我防范的组织中，由于全体人员成分复杂、经常流动，所以公务工作的类型和性质就可想而知了。谢德林说：“一旦把无保障奉为原则，就等于有了充分的保障。”把没有秩序、没有条理当作制度加以接受，就会使人觉得制定出来的制度是故意杜撰的。如果说，我们漫不经心和暴露一切的做法是我们对付敌人从外部干涉我们命运的最好挡箭牌，那么他们无疑更喜欢和更需要我们这个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耳目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从下面这个有说服力的事实中就可以判断出来：当一份铅封和打印的极其重要的报告随外交邮件发走后，同敌人反间谍机构有联系的一个人能够一字不漏地讲给报告的作者听！一份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贸易提案没有送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周后才在莫斯科找到，为此驻雷瓦尔的贸易部门引起强烈恐慌，然而，莫斯科居然通过公开的直通电话询问：“有没有涉及到那些部门？”9月中旬从伦敦来人带着新密码和报告到莫斯科，因为我们使团的密码信件对我们的敌人构不成秘密。也许，这多少可以用“疏忽大意”和“偶然现象”来解释：格罗让同志专程公出到伦敦取密码时，将密码放在标有我们伦敦地址的专用外交信袋里。格罗让在扬堡因事被耽搁，可信袋却运往雷瓦尔，并在格罗让回来之前从那里通过当地英国领事馆“自动”运到雷瓦尔了！使团的图章常常不是由使团书记使用。此外，我们在雷瓦尔还迎合敌人的愿望和利益，采用纯粹奸细的做法将账簿凭据公开。那里很多凭据和文件证明了哪些外国共产党组织何时由何人“签收”了多少款子。甚至还将俄罗斯联邦需要向雷瓦尔派遣自己代表的绝密机构的“账目公开”。如果注意到，这些文件和凭据涉及到被残酷镇压的爱沙尼亚当地共产党，那么就不会有人把上面所做的这种“疏忽大意”的评价看做正确和公正的了。同时还有历史的证明。在旧制度下，布尔什维克善于以做生意为由进行党的专门

账目的管理，这种做法很巧妙也很灵活，即使突然搜查，也不会在最要紧的地方找到任何把柄和“可疑之处”。难道我们要永远彻底地丢弃这种做法的秘诀吗？

直到最近，商业秘密和政治秘密仍没有任何保障，而且现在连贸易部门的所有业务都缺少保障。在埃尔兰格尔成为“世界公民”之后，不久前被解职的维尔古斯也着手采取这样的行动，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自愿在维尔古斯任职的贸易办事处工作的瑞典国民梅勒，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外国国民候选人在继续行动。以投机为业的库尔良德9月底以前也是该办事处的人，他是在莫斯科根据一部分党员的抗议撤消了他在雷瓦尔的职务后被调回去的。很显然，贸易部门至今仍按老习惯收取贿赂和“佣金”。一些有名望的供应商公开承认，他们暂时不同我们贸易部门来往的直接原因只不过是“没有交情”，无法进来。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里是否存在比单纯地纵容和盲目地、不受监督地信任一些不可靠的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其荒唐的疏忽大意行为更严重的现象。应该说，将贸易部门工作的最初阶段称为“投机和挥霍时期”并不过分。埃尔兰格尔领导贸易工作，兰德曼实际负责运输工作。埃尔兰格尔按25马克的价格向佩尔兹尔“购买”钉子，而对供应商本人来说，这些钉子在雷瓦尔只值10.25马克。兰德曼拿到一叠未经任何人登记和注册的提货单后随意处理。他的“工作”账十分荒谬，即使从最后一笔账（当时兰德曼已经知道要对他进行检查）来看，他从申报的400多万马克中就获取暴利近40万马克。

这里根本谈不上任何商业秘密。“自己的”长期供应商预先就知道中央的所有任务和竞争对手的建议，并在这方面比那些按职务应该知道的人了解得更详细，消息更灵通。维尔古斯当权时又将这一套做法延续下来。至今还依稀可见其痕迹。目前仍没把商贸业务作为一个单独的绝密工作部门。问讯部门的情况也是一团糟。一周

前，在办公室里还没有一位内行的和负责的自己人。时至今日，那些怀疑一切的人仍能随意接触所有文件。而我们却全然不知道，我们在同谁打交道。根本没有建立秘密的商业情报部门。因此，关于供应商的情况，除了他本人愿意自我介绍的内容以外，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事先了解该商行的信誉及其政治联系和目的。没有任何预防措施对付那些试图打着做生意的旗号为反间谍部门服务的人。也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同我们签约仅仅是为了束缚我们的手脚，拖延时间，使我们一无所获。身为波兰臣民并同我们签订了大批合同的供应商古特马赫尔被抓这一令人不解的事件极其有说服力地证明，在决定什么人能够和愿意成为我们的供应商时，需要刨根问底和小心谨慎，需要对某些人加以提防。也许，最终会发现，古特马赫尔被抓实属偶然，他真心打算履行合同，但有一点错误，即我们在他被抓之前甚至连他的国籍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了解。玩这种游戏全靠碰运气，有时是很盲目的。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从协议和合同中准确地了解到我们需要多少、何时需要和需要什么，但我们对这些人的底细，除他们的名、父名、姓及其公司名称外，常常是一无所知。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就是果戈里所说的那样：“是啊，如果仅是骗子也就罢了，如果比骗子还坏呢？”

在雷瓦尔，除签订合同外，我们从未对敌人营垒进行严肃的金融、经济和商品市场方面的情报工作。在这方面，甚至连计划中的咨询工作都没有。所有工作都带有偶然性，只是同上一批合同的价格作些比较并采纳彼此间的各种建议。在讨论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和我们购买时能得到哪些好处时，商贸部门并没有可掌握的任何固定的客观标准。简言之，我们不是在做买卖，而仅仅是在讨价还价。我们摆出一幅极其严厉的、无所不知的面孔，以为把那些久经沙场和见过大世面的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了，其实他们只是为了迎合我们才装出破产的样子并……巧妙地欺骗我们。只是在落后

的、不开化的国家里，“国库”才经得起这种原始的贸易斗争方式和方法。任何个体经营者，即使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本国的不太高明的、二流的经营者的以及那些“代理人”和“掌柜”的，都不会这样干：“用这种方法马上就会全赔光。”只有在公司的制度和计划完备、不受领导人没有任何客观限制的个人灵感和情绪支配，所有工作都是通过认真组织和自动监督的机构来进行，即所有方面都由众人筹划和检验后才由一个人做出决定的地方，才具备商业—金融秘密并能对其加以保密。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也要把偶然的和多变的无效努力和欲望除外。

六、只有进行合理的、全面的检查，才能为实事求是地总结雷瓦尔使团各方面的工作提供真正的比较客观的依据。但是，不仅没有进行这样的检查，甚至连这样的建议都没有。任何一位善于思考的人，只要有可能会接触我们在雷瓦尔的生活和工作，就能准确地指出，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像应该的和他想象的那样。我们的软弱无力、门户大开、无所事事对谁都不是秘密。这种情况所有人都知道，大家都在议论，有的人痛心，有的人却津津乐道。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什么措施可以迅速和果断地改变这种凄惨状况。能够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别无他人，因为对其他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与己无关的事，特别是在那个涉及到保证使团秘密和密码不被所有外人知晓的部门里。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俄国布尔什维克生存和取得实际成就的最主要条件历来是灵活的策略，善于尽快适应各种历史情况，甚至突发的变化，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的确，任何“策略口号”通常都是在科学和客观地全面评价时局，即不仅分析我们现有的力量和手段，而且还严肃、坦率和冷静地分析当时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之后，才提上布尔什维克会议议程的。布尔什维克从不放弃利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公

开的“合法”工作的机会和可能性，同时又时刻准备像鸭子下水一样潜入水里，以便继续进行“不合法”工作，直到重新出现能够进行公开的群众性发动的有利时机。正是布尔什维克一方面把欧洲革命者看做是组织地下活动和运用地下工作技巧的大师，另一方面又把他们视为将地下工作同公开工作，“不合法”工作同“合法”工作相结合的大师。十月变革使布尔什维主义所有领袖得以在国家政权机构中公开工作，应该把十月变革看做是布尔什维克逐步放弃地下工作及其手段的转折阶段。绝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以后三年多时间里经常从事的工作其谨慎程度甚至不及过去的百分之一，有的人还习惯于“毫无顾忌”地工作。与此同时，按老习惯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俄共现有党员中至少十分之九的人是从大街上迈进敞开的党的大门的，这些人没有经过任何地下工作的培训，党校和党课通常不讲授地下工作的技巧。

由于上述及其他一系列原因，党目前变得“无阳刚气”，放任无度，萎靡不振，完全染上庸俗的轻举妄动和无忧无虑的作风。很少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或在完成党的某些最重要任务和目的时绝对必须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地方也全然不遵守这些原则。莫斯科，至少是莫斯科的最高层领导人了解任何秘密情报、会议或决议时，最长需要2~3天。党员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党员的质量获得的，而现在党员的数量又极大地降低了党的自我保护和保存能力。目前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些人会干地下工作，但不愿意干，另一些人想干，却不会干。老一套地下工作经验对一些人已经失去实际意义，而对另一些人则从来是力所不及和不熟悉的。

党的队伍中地下工作的本能和习惯大大下降的另一个普遍性的原因是党在泱泱大国中占据了政治统治地位，掌握了威力巨大的镇压机构，以前党员稍不遵守地下工作原则和行动，不仅会殃及其他人，而且自己本人也会受到沙皇检查机关和法庭的威胁。如今这样

的党员常常能够把自己的过错转嫁到其他人身上，用“示范镇压”的方式来掩盖事实，既然我迟早能够战胜所有敢于利用我的不慎行为的人，那我为什么还要小心谨慎呢？最后，削弱地下工作习惯的第三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因是错误理解甚或具体歪曲作为管理和事务性工作手段的一长制原则。我们甚至开始在军队中全面废除这一原则，对群众的自发创作活动施加革命的政权威力，最后走到极端对立的方面，不仅从我们的工作中取消资产阶级民主类型的集体领导制，而且放弃所有集体主义精神，即在整個事业中，其中包括国际事务中，自上而下地通过某种合作体系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精神。一长制目前被很多苏维埃行政领导人理解为一个人说了算，对下面极其不负责任。这样一来，对上面实行一长负责制的做法逐渐蜕化成为个人对“部下”一贯正确，即下级丧失了同领导“合作”的权利和可能性，以及合法和及时批评其决定和安排的权利。

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随处可见的后果。在大事上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把所有工作承担下来。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贯正确的做法必然逐级下传。我在选择自己的助手时历来是一贯正确的。既然我对某人给予充分的个人信任并承认他有能力办好某事，那么我选出的人也同样具有“第二级一贯正确”的属性和不接受任何批评（除我本人的批评外）的特权。一贯正确的第二级同样也会派生出第三级，第三级又会派生出第四级，以此类推，一直到派生出一贯正确的信使和在其他部门工作的看门人。一方面自上而下地进行奖惩，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实行报告和责任制度。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上司和自己的工作。如果上司对我的工作满意，别人与我有何相干？这就是根据惟一的、无所不知和一贯正确的上帝的“方式和面孔”进行管理的官僚主义的主要本质。对于任何善于钻营和了解机密的精明人来说，经过长期验证的一条捷径就是：“巴结”、“讨好”和“骗取”一长制领导人的

“信任”，然后千方百计地坚信自己的保护人是一贯正确的，一刻也不忘记表现和强调自己本人对他的忠心和他“献身”的准备，只有如此才无愧于上级的信任。如果这种做法做得极其巧妙、灵活和连贯，那么这位精明人即使做出让不精明的人受到枪决或至少被关进监狱的事情时也会逍遥法外。

这些善于钻营的人以及间谍和奸细要想达到实际目的，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削弱党员及其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将其化为乌有，经常在党员中挑起内讧和仇恨，用诽谤和挑拨编织的阴谋来对付那些最坚定和警惕性高的党员，使他们成为令顶头上司不快和讨厌的人，如此等等。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在我们的事业掌握在不可靠的外人手里的地方，党的舆论就处于混乱状态，党的工作就无人过问。而在“一贯正确”的、完全抛弃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同志式合作感情和责任的人领导的地方，揭露出来的问题和罪行最多。附带说一句，正是这种现象引起我们最近一次党代表会议的高度重视。

七、在前三个派生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俄国最典型的各部门共产党员之间的内战。尼采说：“如果你向深渊望去，深渊就会映在你的眼中。”每一位苏维埃行政领导人都被一大群卑躬屈膝的殷勤的专家和官员围着，这些人像深渊一样极其不幸地映在自己领导人的眼中。“我的办公室主任”，“我的秘书”，“我的那些部门负责人”都是“我的部下”。我一贯正确，我的助手和工作人员一贯正确，当然，“我的部下”也一贯正确。因此，凡是内部对“我的部下”进行的批评，我都视为“背叛”和“破坏办公纪律”，而对来自外部的批评，则看做是“阴谋”、“诡计”和“诽谤”。只要我的部下一贯正确并引以为自豪，就是让整个事业蒙受损失和崩溃的威胁也在所不惜。在旧制度最后一次战争中，集团军指挥官、军长或师长有时故意做些手脚，以全军覆没为代价，让邻近的指挥

官蒙难。1919年春，哥萨克人未能占领奥伦堡，其原因就是杜托夫^①的将军阿库利宁和克拉斯诺亚尔采夫都不愿让对方坐享其成：当一方进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

用这种办法和精神培养起来的我们的“必不可少的专家们”，受自己“一贯正确”的党员上司的庸俗自尊心的影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事情颠倒过来，忘记总任务和总目标，只追求“不要伤害我们的人”的狭隘的、狂热的“部门爱国主义”。双方不是客观地清查和消除部门间争斗的原因，而是简单从事，奉行“教训他们”，“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彻底打消他们的念头”。“他们”是不可调和的、不应存在的敌人。对付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连根铲除。但是这些敌人——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混入双方阵营的白匪；都不是，而是另一个“不同部门”的、不存在党派、性别和民族区别的领导人 and 工作人员。这种“印第安部族”之战经常是在同一个办事系统中从事不同业务的，且彼此工作缺一不可的部门之间进行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中央供应管理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银行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这里战争常常代替了协作。像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这样独立工作的部门则很少与人宣战和进行忘乎所以的进攻。同样，它们也不妨碍任何人。最后，肃反委员会和国家监察总署的所有机构普遍不受欢迎，因为这些机构只是为“插手别人的事”而设立的。

老一套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诫我们，要不分地点地寻找和挑选自己人，不管此人在何处供职，是何身份。正是这种做法训练出联系和接头的方式，巩固了同志式的团结，开阔了眼界。如今不同部门

^① 杜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1879~1921），沙俄陆军上校，奥伦堡哥萨克军队统领，哥萨克反革命首领之一。

的党员工作者已经不是自己人，不是同志，而常常成为敌人或如果无法摆脱，就需多加提防的“暗探和间谍”，因此，需要进行各种“识别”。同一部门的不同机构，然后是同一机构的不同科室，虽然都具有本系统的属性和精神，但彼此之间内战不断，并且发展到在一起工作的某些人身上；所有人都是敌人，都是对手和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和同志，所有人都彼此不信任，但不是出于对整个事业的考虑，而只是从维护自己个人微不足道的便利和观点以及有时带有明显犯罪目的的个人利益出发的。“所有人内讧”对整体的自我保存和保护造成极大困难，但却给企图钻进或已经钻进我们机构内部的敌人带来最大的便利，使他们能够“分而治之”，干着自己的罪恶勾当。在这种勾心斗角的情况下，受委屈的、不幸的、被侮辱的人比比皆是。反间谍机关在他们中很容易招募到奸细和长舌人，这些人会友好和秘密地告诉你他们知道的一切情况，却不曾料到他们这样做客观上是一种背叛行为。在苏维埃部门工作的万事亨通的官员和专家中通常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因无处消遣时间，不得不出卖自己，像奥涅金站在叔叔的床边一样，而对自己一贯正确的上司，“暗自思量：‘你何时完蛋？’”即使对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不作分析，我们也敢说，上述四条足以使人得出如下推测，比如，在刚刚建立苏维埃大使馆的里加、维尔诺和格鲁吉亚，其状况基本上同我们在雷瓦尔看到的一样。为此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在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以及伦敦也能找到很多很多雷瓦尔的影子。原因相同，后果也一样，因此，原因没消除，后果也消除不了。

我们国外所有机构的典型的、共同的缺点从根本上说是中央造成的，因此只能靠中央在现有的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采取措施加以消除。很多人会认为，受条件所限，整顿我们所有国外机构的环境，使其变成我们对朋友施加影响和对敌人施加压力的真正堡垒的任务是相当困难和几乎办不到的。但是两年半以前，红军的组

织、装备和供应工作更是十分困难和难以办到。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解决得很出色、很完美。当时，我们没有笼统地抛弃和照搬我们的阶级敌人的盲目经验，而是克服和超越它们，在别人军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新军队。我们不以客观情况为借口请求宽恕自己，而是尽快学会用敌人的、但却是照我们的办法生产出来的武器去打击敌人。

苏维埃外交领域是通过对外战线实现我们的国际任务和从事政治、军事和经济反间谍工作的部门。如果全党以及每一个党员都能认识到这项事业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组建红军的任务，如果能够保证所有新生力量和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从后方和前线输送到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将会取得更快、更好的成就。这是应该做到和将要做到的。我们不希望看到，在我们开创的事业的废墟上，历史严厉而愤怒地指责我们：“真是自作自受”……

八、有些同志，其中包括 И.Э. 古科夫斯基^①，在讨论本报告结论及其总纲时发表意见，认为中央对苏维埃各使团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并不感兴趣，中央最关心的是我们在雷瓦尔的现状以及为消除上述缺点必须采取哪些措施，因为缺点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对这种观点只能赞同一半。不深入分析妨碍我们科学地、脚踏实地地实现苏维埃代表机构理想的原因，就容易在指出缺点时带有诽谤和污蔑某些人的色彩，就会在实际措施中只不过采取一些“手工业方式”：取消一些，增加一些，修改一些，当情况比过去稍好些时，就会沾沾自喜地说：“能做的都做到了”。

我们不应同别人作斗争，而应同我们不能容忍的那些现象和工作人员作斗争，逐步实现自觉提出的任务并认识到，这项任务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的。

^① 古科夫斯基，伊·埃·（1871～1921），时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

否则就难免陷入到追究我们所讨厌的某些人对整个宇宙建设的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上。谢德林笔下的奥穆特王子的“管家”和教员哈比布拉说：“赶走人民，任用昏官，于是改革结束。”我们的改革往往也局限于这样的模式：“赶走一个人，任用另一个人，于是改革结束。”似乎不改变整个环境，仅凭一位新人就能使一切改观。

以上我们有意识地着重分析了那些不仅雷瓦尔，就连莫斯科也无力马上和具体解决的普遍原因。我们全党必须经过较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当然，我们中央对这些原因是相当了解的，但却没有将这些原因同具体的任务和中央尚不够了解的这些材料联系在一起，否则我们就不会惊讶地发现，又打算让雷瓦尔秩序在里加、科夫诺和梯弗利斯出现翻版了。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对个别情况不够了解，而是因为没有把个别情况同普遍原因联系在一起，没有把个别情况作为组织工作总纲的基础。现在我们必须集中来分析一下雷瓦尔的混乱现象和原因。如果中央愿意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现象和原因还是可以克服并相对迅速地得到解决的。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杂乱无章，它们之间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混淆不清，不仅如此，它们同必须经我驻外机构才能实现其家里的内部任务的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很不明确。简而言之，不论外交人民委员部，还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直到目前，即在打破封锁之前，始终没有机会和必要广泛开展自己在国外的工作，而且组织筹备工作也根本没有开展或为免受良心谴责而稍许开展一下。外交人民委员部经常以外交照会的形式书写传单寄给不同的收信人，只是偶尔才有机会郑重地派人就真正的外交事务单独出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前身贸易和工业人民委员部主要从事走私方面的工作，在那些人员流动性大、办事效率低的部门会议上只研究一些日常“琐事”，而在

确实需要从事重要工作时却从未将部门结构及其公司计划提上议程进行讨论。

因而这些部门有组织地“耽误”和“虚度”了两年多时间，后来开始惊慌起来，内部缺人，没有章程、条例和细则，对外关系一片混乱，在狂热、忙碌和部门之间多次争吵后诞生了两个垄断性草案：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门外，任何人无权经商，除外交人民委员部外，任何人无权同外国政府进行接触。之所以称之为草案是因为：实际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克拉辛在伦敦，而他的代表柯普目前在柏林既从事外交工作也在经商，外交家李维诺夫则同时在哥本哈根和克里斯蒂安尼亚经商。里加外交部的代表（名义上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成员）加涅茨基还负责贸易事务。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另一成员舍印曼在格鲁吉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雷瓦尔也出现这样的双重的局面；古科夫斯基从事外交工作，而索洛蒙负责经商，但两人相互不满，因为他们两人都妨碍对方的工作，每个人都以各自上司的权利和指示为由，结果，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根据索洛蒙的要求紧急派人来，但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自己人”的意见不放他们走，认为这些人在雷瓦尔是不需要的人或多余的人。另一个更令人伤感的结果是，不久前，苏维埃雷瓦尔分裂成两大派——“古科夫斯基派”“索洛蒙派”，他们每日每时都生活在仇恨中，每日每时都在盼望自己一方的胜利和对方的彻底失败。有一点客观上是确凿无误的：在世界革命尚未成功之前，决不能在国外的外交和贸易工作中实际划分明显的界线。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正确的。争论毫无意义，要紧的是，外交工作应始终和经常地帮助贸易工作，同时贸易工作也应助外交工作一臂之力，双方应密切配合，应该使在国外的所有其他部门的代表不受双重指挥，并能在我们使团中找到自己合法的和可靠的位置，从而使这些代表能够充分发挥才干，为俄国整体事业、为国外的外交和贸易工作服务。苏维埃政权在派

驻国的所有代理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密切合作，在有系统、有计划地划分劳动和职能的基础上制定极其严格的协作纪律，相反，互相搞阴谋、设圈套，进行无谓的争吵，这都是不能容忍的，是可耻和犯罪的行为，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显然，优先权和首席地位应属于那些代表、保卫和维护苏维埃俄国整体利益并执行苏维埃俄国任务的人，而不属于个别部门的代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维埃使团的首脑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只当成“外交部的官员”，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列宁第二、列宁第三、列宁第四，如此等等，需要的是能够把我们在派驻国的所有任务：经济的、革命—政治的和军事的任务理解为一个完整概念并担负起领导责任、能够从事所有领域工作的人。如果不按列宁的方式：忘我地、无私地、坚持不懈地工作并遵循事物惟一客观的需要，而是根据琐碎的、暂时的、摇摆不定的个人看法和兴趣行事，那么任何垄断措施，任何特殊权力都无法使我们摆脱雷瓦尔现象。这里需要的是统治者，是乐队指挥式的统治者，他首先告诉乐队的每个人应如何演奏，然后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执行自己的指示，因为他总是按照作品的总谱来要求大家的。只有这种能够同时组织和调整复杂的全盘工作并贯穿严肃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管理形式，才能使我们正确地解决一长制的问题。这种管理形式同时排除了来自上面的个人意愿和来自下面的无政府主义，不会使部下成为俯首听命的小卒，使每个人都能独立完成领导指派的整个事业中的一部分任务。

假如一个人成年累月指挥着一支极不协调的乐队，其中每个人都各自为政，而他本人又对总谱不甚理解，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说：关于上述组织工作的意见是最必要的、是通俗易懂和人所共知的。我们的无产阶级知识具有现实意义，那么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去做呢？但是如果同时由两个经常相互争斗和竞争的部门——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来实现开头我们指出的、刚刚又加以

补充的、论据充分的苏维埃国外工作的理想，那么这个理想只能是一句空话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应在这些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日常工作联系和彼此之间以及同其他部门之间协调一致的日常工作。不是“联系”，而恰恰是合作。按照自己本人的理解，这种合作排除了“大家争吵”和内讧的可能性。

目前，由于外交部门和外贸部门的工作及其对整个共和国的作用突然得到加强，所以这两个部门同样都需要进行改组。这种改组应同时并按计划进行，即在贸易和外交方面给国外机构的主要指示和根本任务不再“各自为政”。不仅应削弱，而且应彻底根除中央结构的双重性：但愿来自中央的指示都是协调一致的，都能考虑到国外机构工作的所有复杂因素，因而使各个部门都能接受和不引起争议。斗争、争论、竞争即使不能立即根除，也无论如何不能发展到地方机关中去。

下面一事足以证明这些要求不是乌托邦式的“美好祝愿”，两年前，在一方是军事供应机构，另一方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由于相互关系没有协调好，每个部门的内部组织都存在条件不完善和考虑不周到的情况，因而曾出现极为严重的斗争局面。但是现在它们在相互合作的气氛中工作，这个局面虽不够完美，但已经相当不错了，它既满足了军队当前的需要，也没有妨碍和破坏国民经济所有系统的运行。现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恰恰应该在那些因战争而使内部处于极其困难的部门中帮助我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应在思想、工作速度和责任感方面实现军事化。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在这些方面实现军事化。到那时，根据复杂的生活要求协调这两个部门的结构及其相互间的工作的任务就不再是一道难题，而且也能够相对迅速地得到解决。

九、我们国外代表机构的命运、作用及其工作成就取决于红军的成败，这一点早已得到公认：当托洛茨基赴华沙时，契切林的外

交照会和克拉辛的贸易提案就很容易被接受，可现在，当他离开明斯克和基辅时，情况则十分糟糕。也有反面的依存关系，虽然它对所有人来说尚不十分明显：当我们事先得知敌我力量准确的对比关系，当你们事先得知敌人及其盟友的兵力和计划，当你们能够清醒地考虑到全世界革命政党对我们斗争进程的影响时，制定作战计划就容易得多；而当你们凡事都凭运气、理由不充分、论据不可靠，甚至连材料都是假的时，制定作战计划就困难得多。而这些条件又完全取决于我们公开和秘密的外交及经济情报，驻外机构的水平和它们忠实履行自己的具有战斗意义的任务的能力。

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很多人“已经遗忘了的马克思的话”，他说，目前我们整个斗争的目的正是为了恢复各民族人民的经济联系，或按我们的说法，是以联合成为统一的世界性的生产和分工合作社的劳动人民兄弟般团结为基础的，或按他们的说法，是以先进国家——其中每个国家都希望优先和垄断地剥削殖民地和更落后的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和无政府竞争为基础的。应通过言论、措施和行动宣传我们这种世界经济联系的社会效益和目的。这种宣传是卓有成效的，它削弱和扰乱敌人的阵营，减轻我们红军的任务，如果这种宣传能够巧妙地直接在敌人营垒中开展，则效果更佳。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那么也是在多数情况下，同样取决于我们国外代表机构工作安排的正确与否。

因此毫无疑问，必须用作战工作的精神和速度来组织我们的国外战线。不论日常工作方式和纪律手段，还是选人标准，都应该彻底摆脱“文人的”、官吏的和庸俗的做法。很早以前就发现，老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更容易接受思想教育，而年轻的共产党员恰恰在前线作战工作中接受到更多的教育和“锻炼”。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党的国际影响是靠党内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获得的。我们党的战略和策略是建立在对外部环境，其中包括对敌人的力量进行

思考和分析之上的，因此，其最大特点总是最务实，也就是说，由于地点和时间不同，常常带有“机会主义性质”。然而，不论在组织结构和纪律方面，还是在战略和策略方面，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各种现代化军队（更不用说我们党一手缔造的红军了）所必须具备的。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过去和现在始终比其他工作进行得顺利，我们在军队中过去和现在始终走的是一条我们熟悉的老的党的路线，是塔拉斯·布尔巴的道路，此人不喜欢“同女人厮混”，而且也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同女人厮混”，他亲手杀死“好色之徒”安德列，“秘密”来到华沙，潜入敌人中心，就是要对自己心爱的奥西普说一声“我听你的。”

我们党应把我们在国外的所有机构无一例外全都引导和安排到这条以严格的斯巴达式的纪律和军事目标为宗旨的工作轨道上来，广泛运用由自己最喜爱的孩子的创举——红军的经验丰富起来的秘密工作传统。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外机构成为真正的堡垒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广告，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道路。承认这条道路是上层和基层的惟一可行和必须奉行的道路，党就会毫不费力地从中得出所有的实际结论。运用革命的作战部队的观点，党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到，应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和结束贸易和外交部门的改革，应采用什么方式和速度来领导这些部门在中央和地方上的日常工作。不论在组织计划和战略任务上，还是在选择计划和任务的执行人上，党都能够把所有的“偶然性”和“失误”减少到不可避免的最小限度。选择执行人的问题尤其应当引起重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自上而下都是各类专家，他们偶而也去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他们常把功名和私营主低级的、惟利是图的作风带到这里来。他们希望能够像“我们的祖先在阿斯科尔德时代的生活”那样经商和生活。他们总是把“脸”朝后，面向资本主义的准则、习惯和方式，而不是向前看，面向在世界范围内由统一的中央领导的贸易组织。酒鬼

的马总是往酒馆走，而牧师的马则习惯在每所房子旁停步。这样的马对我们不适用，因为它们不能尽快抛弃它们原有的“好习惯”。

尚不清楚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这方面的情况，但根据它的国外机构的情况，根据它能够为里加、科夫诺和梯弗利斯“行动起来”这种状况来看，它的情况也并非一切都“很顺利”。它骑在偶尔找到的、别人的马上。它也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一样，没有干部学校和选择干部的办法。不是去培养和造就“红色外交家”和“红色商人”，而是寻找现成人员，就像在森林里采蘑菇一样，偶尔采的是根本不能吃甚至是有毒的。应该结束这种局面。派到负责的外交岗位上的绝不能是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和对“资产阶级国际权利”一无所知的人，这些人根据灵感创造“自己个人的革命”行动并做出一些在本质和形式上都是愚蠢的事：他们不承认共产党员有避难权，不关心真正的和可能的同胞，亲手破坏和允许其他人破坏已签订的协议，不仅完全脱离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而且也脱离本使团某项严肃的、灵活的和负责的工作，当然不包括纯粹表面上做出的、注意自己表面一贯正确、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表现。我们需要的是有丰富的外交和贸易工作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即现实工作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不是有点才气的演员，虽然他们能够“做样子”和“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是优秀的外交家和杰出的商人。

在培养党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同专家相结合的工作中，“托洛茨基方式”是人所共知的，已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取得显著成效。应该用恰当的措辞把这些方式运用到培训和挑选贸易和外交工作领导人和执行者的事业中。但这里还应注意我们在上面已经实际说明的一个情况。每一个在俄国的“专家”都知道，他们时刻受到全俄肃反委员会或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威胁。不论小偷偷多少东西，都无处可藏：迟早会被发现和没收的。而叛徒和间谍也知道，一旦他

们被揭露出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就会马上终止。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专家”对国外工作如此“爱好，并成为一种病态”的原因。在国外可以通过经商交易和出卖“有价值 and 感兴趣的情报”而发财，而且还能充分保证“挣到的钱”和自己本人不受侵犯。即使被揭穿也没关系；将钱从一个银行转到另一个银行，换个护照或国籍，就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人了。所以，我们允许最恶毒的敌人出境，不仅是让他们逍遥法外，而且还给他们一大笔嫁妆，让他们把已经“挣到的钱”和能够赚“更多钱”的机会都带走，让他们转而为外国反间谍机构或另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公司服务。在这种天赐良机的情情况下，就连俄国“忠诚老实和无可指责地”工作的大部分苏维埃专家也会变成小偷、间谍和叛徒。请将东西收藏好，别引小偷上门！

因此，结论很简单；党必须采取措施关闭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为那些愿意到中央、地方和国外这两个部门工作的专家开设的“免税口岸”，并为此而制定专门的、较之对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军队保密机构工作人员的要求还要严格的监督措施，只允许那些经过专门考验和各方面切实可靠并且不受“捞一把就溜走”诱惑的人到国外去工作，另外还要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属留在俄国作为保人和人质。与此同时，制定严格的责任制，凡经自己推荐和帮助联系使叛逃的人获得境外出差机会并使之逃脱苏维埃惩罚的人都要为叛逃人承担责任，直至枪毙罪大恶极的为外国反间谍机构和反革命机构物色人选的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这样一来就可以立刻制止住我们的“将军们”把“自己人”安插在身边或利用自己的关系把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塞给”别人，而不承担任何后果。我们驻外机构的每个人首先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人，其次才是某人的亲属和朋友。目前我们并没有用这样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我们在培训和挑选驻外人员方面的所有实际措施，显然这样的研究观点是超前的，因为我们党中央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原则性

看法的最后意见。我们的态度就足以说明这个总观点的特点，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适宜的，应该成为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问题上所有实际工作的基本原则。

十、我们已经将改进我情报部门在国外的工作以及应在雷瓦尔和爱沙尼亚采取的具体措施作为一个专门报告提出来，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同我们选举的党组织有直接关系或属于某些党员、即苏维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职权范围内的一些实际结论。根据上面阐述的具体事实和组织意图，任何一位不了解雷瓦尔党的工作状况，并十分细心的人都能推断出，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因为党在这里没有自己的机构或只有萌芽状态的、不能对使团整个工作环境给予任何影响的机构。在尊敬和信任埃尔兰格尔和兰德曼的地方，党员和党的事业必然不受重视。

我们支部在各个方面开始有所起色还不到一个月，开展严肃的工作也只有两周时间，但是成效已很明显。“外交官”和“商人”之间的清晰界线得以消除，他们开始本能地融入到集体中并参与中央居民疏散管理局的工作。党对使团大大小小的事情开始发表有益的意见，党的活动开始具有普遍性。很多人一扫过去对事业视而不见、对一长制行政领导进行歪曲的明显的不健康的做法。人们对可疑的联系和交往警惕起来，投机商开始垂头丧气，游手好闲的人振作起来，可靠的人和不担负责任的人也自下而上地开始进行工作汇报，出现了工作人员普遍钻研业务和相互密切交往的萌芽。总之，作为使团的灵魂，小小的党组织开始对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和敢于掩盖这个灵魂的声音。它已找到自己同中央和苏维埃政权以及世界革命的灵魂的合法联系，它知道通往这个中央的直接的和公开的途径，它摸索出同雷瓦尔使团过去的遗产进行斗争的力量和方法，它把个别同整体结合起来，把偶然同典型区分开来。使团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改过去由于部门业务工作

中存在大大小小的误解和混乱相互间进行争斗、捣乱和破坏的作风，面对艰苦的工作，大家携起手来，努力地、按计划地、谨慎地进行整顿。现在可以大胆地说，党和苏维埃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央措施和指示，就像使团行政当局旨在改变目前混乱状况、非地下工作方式和各自为政的情况的任何明智举措一样，都会得到雷瓦尔使团大多数党员自觉和认真的执行，他们不是由于害怕而执行，是发自内心的去执行，不管哪个部门的人都如此。

在这方面，我们应怀着高兴的心情欢迎已经开始的对雷瓦尔使团工作和整个情况进行的全面检查，因为这是惟一的确定客观真相的手段——为什么从前恰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情况，必须查明当前混乱的真正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完全彻底地加以根除。目前应彻底结束我们使团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无休止包围着的局面。既然这个局面掩盖了具体事实，那么就应使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罪犯的地位越高，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对他的惩罚就应越重。既然流言和诽谤是我们的敌人恶毒发明出来的，那么就on应该正式和不容违抗地将它们推翻，并继而追究诽谤者的刑事责任。我们神圣的由劳动人民的鲜血染红的旗帜应骄傲地、公开地飘扬在我们的使团的上空，赢得敌人对我们的尊重和朋友对我们的信任；不应把这面旗帜藏在阁楼上，让这里挂着我们陌生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饭店和旅馆的牌子，并且没有任何外部标志证明这里是工农革命政权的使馆的驻地和办公地。

就让敌人不喜欢我们吧。就让那些惧怕我们存在的人憎恨我们吧。这是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但是不要让资产阶级营垒中的人以任何借口和理由亲昵地拍着我们的肩膀并“用外交方式”向我们递眼色，把我们当成不亚于资产者和投机商的“机灵鬼”和“干欺骗勾当的老手”。应该打消资产阶级走狗们以任何理由和无任何口实就向我们吠叫的兴致。我们应该具备各种手段对付他们，当然这些手

段过去和现在都有，只是我们至今仍不愿意、不善于和没下决心使用它们。我们必须使社会注意力和舆论转到我们的国际任务和目标上来，转到理解和评价俄国劳动人民为在地球上解放劳动所承受的无比煎熬和英勇精神上来。让所有人都谈论和想到我们的功绩，即除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现实的、并非杜撰出来的缺点以外的、应流芳百世的功绩。爱沙尼亚不是法国和英国。只要我们像伟大国家和伟大思想——所有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思想——的代表应该做的那样去做，爱沙尼亚人民就会加深和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我们。

如果没有共同关注我们的任务、尊重我们的日常才干和创举的氛围，我们就会步履艰难，几乎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我们所必需的金融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因为所有人都在注视我们，但各方面的不理解、不尊重和不信任使我们孤立起来：敌人和投机商能够轻而易举地和毫无危险地深入到我们中间来，而朋友则可能受到怀疑、遭受迫害和镇压。我们至今尚无法制止几乎公开为萨文柯夫^①和弗兰格尔招募军队的行为，无法拯救那些仍被关在爱沙尼亚监狱里的爱沙尼亚当局已保证根据和平条约释放的人。以后，即便只是作为我们情报部门的雇佣间谍，还有谁会冒险把自己的命运同我们系在一起呢？如果我们使团毫无威信可言，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谁惧怕自己的过失和罪行被揭露出来和受到惩罚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里也有一种“秘密外交”，但只不过是另一种极端：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中已无任何秘密而言，只剩下一个问题：苏维埃俄国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外交使团”？应该在使团中依靠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神圣任务而珍视党和苏维埃政权、

^① 萨文柯夫，波里斯·维克多罗维奇（1879～1925），俄国社会革命党活动家。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十月革命后多次策划反革命叛乱。

而不是把党和苏维埃政权当作达到个人私利的工具的共产党员来进行审查工作，从而将这个秘密揭示开来。与此同时，这项审查工作对使团工作人员的公民觉悟、党性原则和事业心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它应该为最终确定目前混乱的使团工作人员的确切数量和质量奠定基础，采取坚决措施肃清所有的“死魂灵”、“自己人”和“食客”，肃清政治上不可靠和可疑的分子。

如果在我们的国外机构中实行军事化，对一长制问题作些根本性的调整，使一长制带有严格的军事化色彩，允许并要求对毫无意义的、荒唐的或对事业有害的命令拒绝执行，并对发布这类命令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就必然而且完全能够使雷瓦尔的状况得到改观，并争取内部措施杜绝严重违反工作常识的现象。这种工作常识是连专制制度时代具有进步和求实精神的官僚们都承认的。这种工作常识的实质是使所有下属人员都有一定的专长、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在履行职责时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改进工作方面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精神，既能够与同事协调又能够适应广泛的机关工作任务。应该把每一位得力的助手都视为并培养为自己可能的副手和接班人，逐渐委以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和越来越大的得到监督的自主权。领导者应该把对事业有利、而不是对自己有利作为评价人的标准，事业上的“自己人”和“亲近人”不应该是“我喜欢的人”和“喜欢我的人”，而应该是把事业当作忠贞不渝的朋友来热爱的人。此外，仅仅有领导者个人的智慧和忠诚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不要使所有委托给他的事业把他造就成愚蠢的傻瓜和骗子。

如果首长和周围工作人员之间不能就实践的主要任务和主要问题经常展开争论，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军界，很久以来一直有一种传统，即在会议上从最低职务的军人到决策首长都有表决权，首长决策时要权衡所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只有刚愎自用的人和缩在任何法律条文都没涉及到的角落里的人才会奉行“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的原则。

我们的工作纪律和军事纪律的核心不是卑鄙地惧怕“愤怒的君王”的打击报复，而是高尚地恐惧那些给共同事业造成损失、给共同事业帮倒忙的行为。如果有人对纪律做出不同理解，把自己高高挂起，那么他决不会建立培养可靠的、忠于事业的工作者学校。还必然会成为维尔古斯一类奉迎之徒的掌中玩物。如果有人以受苦役人的眼光从下面往上看纪律，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体面的首长，只会成为刚愎自用之类的人和教唆愚昧的老师。最后，如果领导者不遵循“不能用大炮打蚊子”，即不能光抓琐碎小事的原则，那么任何纪律和责任心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一位苏维埃行政官员给自己提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荒唐任务，那么他就会整天痛苦地工作12~15小时，不能按时饮食起居，累得精疲力尽，还总是抱怨“没有任何人可以担负起任何事情”。这种沉湎于管理和插手所有琐事的领导者，永远也抽不出时间来与自己的助手共同商量和讨论重大问题。这种人是自己的敌人，对周围的人来说，他是极大的祸害。我们应向这种“自我折磨者”和“折磨人者”大声说：“放弃小事，珍惜自己的精力，去干些大事吧！”

纪律的主要敌人不是来自下面的为所欲为，而是来自上面的胡作非为。要求保持秩序的人，他本人首先应该在这方面为其他人做出榜样。不要去做不成熟的事，未经负责的专家鉴定的事，不要乱作批示。不会指挥，就不要乱发命令和指示。不要无的放矢地改变决定。不要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使你的工作人员无法坚持与你不同的、但却符合事业实质和利益的观点，重要的是，不要无故破坏一个人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乐趣。要知道，即使是一个服苦役的人也喜欢在他正常做事时不受干扰。

之所以在这里重复这些常识性知识，是因为“一贯正确的领导者”使这些常识在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遵守。领导者往往原则上同

意，但两分钟后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种做法甚至在旧制度的末期就已经过时了，我们不应对讲求实际的欧美国家使用这种做法，欧美国家几百年来已经习惯于完全相反的做法，而且对其结果颇为满意。委员会没有把改进雷瓦尔使团现状的具体措施写进这个报告，而是寄给了有关部门。那里讲的也都是些显而易见的常识问题，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一贯正确的领导者们”自己不打算整顿管理工作呢？难道像在门口安排值班人员、检查出入证、在禁止外人出入的地方安上门锁之类的事情，也要搞“党内发动”才能做到吗？委员会认为，争论最大、谈论最多的问题是立即为整个使团，包括贸易部门和中央居民疏散管理局寻找一个处所。因此，为了有利于解决这个确有困难的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些想法和情况。兰德曼在我们附近“挣到很多钱”，已经购买了一栋很好的房子和一艘轮船。假如佩尔兹尔能靠供应钉子获得相当于固定资本 150% 的利润的话，他也可以购买房子。至于我们其他“朋友”的财产情况，依靠任何审查工作也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他们至少拥有十栋中等水平的、现在就值 700 万~800 万“瓦巴”（当地对某种贸易的俗称。）的房子。

结论：我们虽不富裕，但也不能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使用廉价的工作人员。当务之急是为我们使团找到一处体面的和可靠的房子，使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此事谈论、计算和统计已半年有余。现在是该着手做这件力所能及的事了。从恶劣的、大车店式的住所迁到一处属于自己的、与周围世界隔开的、除朋友外谁也不能出入的布尔什维克的堡垒中。

委员会成员 谢杰尔尼科夫

【专题说明】

关于富农迁徙问题（一）

（1928年6月至1931年12月）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任务到1932年底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的方针，特别是通过大规模迁徙来消灭富农的方式，是令世人瞩目的“创举”。尽管在集体化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有人对斯大林主张的富农政策提出异议，但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手段取得绝对权力的斯大林，在清除了党内阻力后仍然毫不犹豫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消灭富农的行动。

本专题选编的几个文件，弗鲁姆金给政治局的信反映了集体化运动初期党内对富农政策的不同意见，乌拉尔州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和富农事务委员会的文件则反映了迁移富农政策实施的一些具体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编辑和校注，

杨世招翻译）

No07321

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

（1928年6月15日）

……我们国内形势的恶化，首先是由于农村形势、农业状况恶化的结果。我们不应闭目不见除一小部分贫农以外，农村都反对我们这个事实，而且这种情绪已经开始感染到工人的城市中心……从农村在目前我们正经历的危机过程中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发，我认为有义务提请政治局注意成千上万党员心目中已变得十分尖锐、每次见面都要谈论的那些问题。大概无须证明，我们目前经历的困难，不单单是制订经济计划时所犯错误导致的结果……

在有30~40名同志出席的乌拉尔州党委会上，莫洛托夫同志是这样阐述他对农村的态度的：“应该狠狠打击富农，要吓得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他说这话绝不是偶然的。他在自己对下乡采购粮食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就曾指斥所有不同意这条路线的人对富农姑息迁就……

在对待中农问题上全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尽管出于习惯大家仍在继续高谈阔论与中农的联盟，而事实上我们却在抛弃中农……

最近所采取的方针，导致了中农的绝望和对前途的灰心。为刺激经济好转的所有办法……都由于中农害怕被划为富农而显得软弱无力……

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干什么呢？（1）建立革命的法制。非法

宣布富农的做法已导致与所有农民的关系无法可依。我们颁布的有些决议，从形式看是法令，而实际上是对法制的嘲弄（比如，因为地里有象甲虫、养狗没有拴起来就罚款100~200卢布），苏维埃政权已成立11年了，竟然颁布这样的东西是不能容忍的；（2）农业商品率的作用、农产品的作用，应当继续保有我们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期间所赋予的那种意义……（3）由此，我们应当通过降低富农的积累、通过增加税收、通过使中农和贫农脱离富农的经济影响（因而也就脱离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来与富农作斗争。我们不应该用我们数量本来就很少的贷款来支持他们，但也不是“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瓦解富农经济……[富农经济]在今后一些年里我们还需要。因此，第一而不是第十重要的是，下一年仍要关心和帮助个体经济。（5）最大限度地帮助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贫农，通过巩固这些集体，把他们吸纳进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公有经济。（6）不要突击和超突击扩大国营农场……（7）恢复，确切地说是开辟粮食市场……（8）将面包价格[每公斤]提高15~20戈比，同时以同样幅度降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使总的农业指数保持在现有水平上……（9）加强与手工业酿酒的斗争，因为手工酿酒耗费大量粮食。（10）农业人民委员部应把发展作物栽培，特别是粮食作用的栽培放在注意的中心，而迄今为止重视得很不够。（11）不仅使集体、而且使个体经济也能够购买农机……

莫·伊·弗鲁姆金^①

^① 弗鲁姆金，莫伊塞·伊里奇（1878-1938），时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30年代大清洗时被镇压。

№07322

乌拉尔州委第 61 次秘密会议记录（摘要）

（1930 年 1 月 22 日）

绝密

严禁复制

……听取：

1. 卡巴科夫^① 同志关于富农的电报。

决定：

1. 批准给各专区区委书记和区执委会主席的电报电文……

……

3. 委托州执委会的党团在 5 天期限内：

（1）起草出要下达的主要指示，以规定关于登记富农产业、对被没收的富农财产进行估价并转交集体农庄使用的办法；

（2）从每个专区的经营、经济和政治特点以及集体化的速度出发，并考虑到全州需强制迁出的富农人数为 1~1.5 万，具体确定要迁出富农的专区和区；

（3）确定可往北部边远森林地区遣送富农的专区、区（托博尔斯克、鄂毕多尔斯克、北方上卡马区的伊夫杰利等）以及往这些地区可能遣送的富农数量；

^① 卡巴科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1891~1937），1914 年入党，1929 年起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

(4) 确定利用富农进行伐木、挖土及别的工作的具体计划，以及将其关进集中营的可能……

(5) 通过党、团、苏维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等渠道，向地方下达指示，使所有机关都做好准备，以便它们能够确保顺利进行这场与富农斗争的运动。

(6) 通过党、苏维埃渠道下达指示，重新审查并巩固各级苏维埃的组成。

(7) 在工厂工人中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使工人通过决议，拥护党和苏维埃政权消灭富农阶级的措施。

(8) 委托乌拉尔州集体农庄联合会从集体农庄系统下达指示，使集体农庄组织积极参加消灭富农的事业。信的草稿应与州党委协商。

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 П. 祖巴罗夫

№07323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
关于“进入战备状态”的通知

（1930年2月6日）

急件

机密

请于24小时后退回

由于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可以设想，某些地区农村的富农分子，将会把所有对我们不满的人联合在自己周围，以结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匪帮。可以肯定，这些可能的土匪暴动成不了什么气候，但为预作警告，州党委建议各区党委书记亲自负责，在接到本通知之后3天内，立即对各个共产党员支队向目标集结的现实性进行检查。早先我们已向各区区委指示了党员支队的编制，其补充办法是既要保证党员支队具有无可争议的战斗能力，又要在支队集中被用于作战时，联共（布）党员的离开不会影响生产。所以现在必须马上再审查一下支队成员的组成，并将那些离开岗位不会影响生产的联共（布）党员列成清单，但是必须保证支队成员都能适应行军打仗，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是残废。除此之外，必须检查党员支队人传通信联络的通知系统是否可靠，能否保证支队成员在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快速集结。

应采取的措施，使所有编进党员支队的联共（布）党员立即到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的教学队列单位接受军事训练，使党员

支队在集结时表现出是真正的战斗军事组织。每个共产党员也都应参加军训，因为即使没列入支队的联共（布）党员，也将是必要时补充党员支队的直接后备人选。

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的要求，但须得到州党委的批准（通过直达电报），各区区委书记应立即召集党员支队。党员支队将按国家政治保卫局指示，在支队指挥员指挥下行动。请即以本通知精神为依据，使党员支队动员计划进入战备状态，并于3日期满时向州党委报告执行情况。

此项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工业和农业经济计划的完成。

联共（布）责任书记 波塔斯库耶夫

№07325

富农事务委员会关于遣送富农的 会议记录（摘要）

（1931年7月8日）

机密

主席：安德列耶夫^① 同志

与会者：亚戈达、叶夫多基莫夫、尼古拉耶夫、科甘、韦尔曼、斯莫利亚尼诺夫、菲加特纳、巴利扬同志

1. 关于全苏东方煤炭工业公司的申请

满足全苏东方煤炭工业公司的申请：

（1）为切列姆霍沃遣送 1000 户特殊移民。从巴什基尔特殊移民中调拨。遣送日期：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

（2）从东西伯利亚内地特殊移民中为博库恰恰遣送 5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7 月 15 日至 25 日；

（3）从巴什基尔特殊移民中为安热尔卡 - 苏真卡遣送 20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7 月 18 日至 24 日；

（4）从巴什基尔特殊移民中为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地区遣送 30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7 月 25 日至 8 月 3 日；

（5）从西西伯利亚内地特殊移民中为米努辛斯克地区遣送 5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7 月 15 日至 20 日；

^① 安德列耶夫，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1895～1971），时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

2. 关于乌拉尔煤炭工业公司的申请

(1) 从下哥罗德边疆区为基泽尔地区遣送 1100 户特殊移民。
遣送日期：8 月 2 日至 4 日；

(2) 从下哥罗德边疆区为车里雅宾斯克地区遣送 11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8 月 5 日至 7 日。

3. 关于全苏东方钢铁公司的申请

满足全苏东方钢铁公司为下列企业提供 18200 户特殊移民的申请：

(1) 从莫斯科州为库兹涅茨克建筑公司遣送 5000 户特殊移民。
遣送日期：7 月 20 日至 8 月 1 日；

(2) 从中部黑土地地区为辛那尔建筑公司补充遣送 10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7 月 9 日至 11 日；

(3) 从鞑靼为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建设局遣送 50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7 月 16 日至 8 月 5 日；

(4) 从莫斯科州为韦索科戈尔斯克矿山管理局遣送 5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8 月 2 日；

(5) 从莫斯科州为巴卡尔矿山管理局遣送 1200 户特殊移民。
遣送日期：8 月 3 日至 6 日；

(6) 从莫斯科州为戈罗勃拉戈达茨克矿山管理局遣送 10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8 月 7 日至 9 日；

(7) 从莫斯科州为兹拉托乌斯特矿山管理局遣送 5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8 月 10 日；

(8) 从下哥罗德边疆区为辛那尔矿山管理局遣送 1000 户特殊移民。遣送日期：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

(9) 根据塔吉尔建筑公司经理特拉赫捷尔同志的申请，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向该公司遣送了 3000 名特殊移民，该公司却拒绝接收，因此，这批特殊移民只好改做其他工作。特此宣布

给塔吉尔建筑公司经理特拉赫捷尔同志以警告处分。

责成全苏东方钢铁公司在—昼夜期限内提出准确申请，说明塔吉尔建筑公司接收特殊移民的时间。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将满足其申请。

4. 关于全苏有色金属、黄金、铂开采加工销售联合公司的申请

满足全苏有色金属、黄金、铂开采加工销售联合公司的申请

(1) 在乌拉尔方面：

A. 从下哥罗德边疆区为卡拉塔遣送 400 户特殊移民。时间：8 月 2 日；

B. 从下哥罗德边疆区为塔吉尔遣送 200 户特殊移民。时间：8 月 3 日；

C. 从下哥罗德边疆区为卡拉巴什遣送 400 户特殊移民。时间：8 月 4 日；

D. 从下哥罗德边疆区为国营乌拉尔白金企业联合公司遣送 800 户特殊移民。时间：8 月 5 日至 6 日。

(2) 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方面：

A. 从西西伯利亚内地特殊移民中为马林斯克地区遣送 400 户特殊移民。时间：7 月 15 日至 20 日；

B. 从西西伯利亚内地特殊移民中为奥利霍沃地区遣送 200 户特殊移民。时间：7 月 15 日至 20 日

(3) 鉴于早先遣送阿尔丹的特殊移民户的安置极不像话，致使 4000 名家属没得到安置而滞留铁路沿线（大涅韦尔车站），所以，对阿尔丹提出的 1000 户特殊移民的申请不予满足。

5. 关于全苏泥炭工业公司的申请

从为乌拉尔林场调拨已遣送乌拉尔的 50000 户特殊移民中，于 8 月份转拨 5000 户到乌拉尔泥炭开采场。

6. 在中部各州使用富农开采泥炭、在顿巴斯使用富农承担公路建筑公司和全苏国营标准木房建设股份公司的工作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这些申请不予满足。

7. 关于全苏森林木材工业公司的申请

(1) 鉴于已交给全苏森林木材工业公司的特殊移民的劳动在伐木区使用得很不好，对全苏森林木材工业公司为北方边区遣送 17000 户特殊移民的申请不予满足；

(2) 满足在北方边区韦利斯克地区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砍伐木材和木柴遣送 3000 户特殊移民的补充申请……

No07324

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

（1931年12月^①）

机密

安德列耶夫同志收

1. 1930年共迁出：113013户，551330人

2. 1931年共迁出：243531户，1128198人

1930年和1931年共计迁出356544户，1679528人

其中：

（1）从其他州迁入：245403户，1157077人

（2）各州内部迁移：111141户，522451人

共计356544户，1679528人

3. 迁出的富农被迁往下列边疆区：

（1）北部边疆区：58800户，288560人

（2）乌拉尔州：123547户，571355人

（3）哈萨克斯坦：50268户，241331人

（4）西西伯利亚边疆区：69916户，316883人

（5）东西伯利亚边疆区：28572户，138191人

（6）远东边疆区：9694户，48269人

（7）雅库特（阿尔丹）：1366户，7157人

^① 档案原件没有标明文献时间，这里标示的日期是编者估计的。

- (8) 列宁格勒州：6884 户，31466 人
 - (9) 下哥罗德边区：1497 户，6316 人
 - (10) 北高加索边疆区：3000 户，15000 人
 - (11)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000 户，15000 人
- 共计：356544 户，1679528 人

【专题说明】

大清洗中的外国侨民

(1936年2月至1938年4月)

在30年代举世闻名的苏联大清洗中，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极度恐怖之中，以至告密成风，人人自危。不仅善良的苏联人民饱经磨难，就连侨居苏联的外国人也未能幸免。

本专题选入的波兰共产党员贝格在狱中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以及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雅凯尔的书面报告，描述了大清洗时对政治犯的审讯过程和残酷的逼供方法，描述了由于怀疑、间谍恐怖症以及对外国人的不信任而产生的恐怖气氛，这种在当时被党的高层领导以及政权的惩罚机构制造出来的气氛，很快就笼罩了苏联的各界居民。文件深刻反映了由于政治镇压、大规模搜查和逮捕、告密和诽谤、虚假的谣言等等，在政治侨民中引起的恐惧、普遍的不信任、孤僻冷漠和绝望的情绪。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被逮捕的一贯“忠诚于党的总路线”的共产党员的妻子们，她们不知道自己丈夫的命运，失去了工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她们甚至决定杀死自己的子女而后自杀。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编辑和校注，

黄有自、李传勋翻译)

No04019

贝格关于“波兰军事组织”案 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1936年2月3日)

尊敬的德米特里耶夫同志：

我曾经是一名联共（布）党员和波兰共产党党员，在联共（布）和波兰共产党的队伍里我度过了大约15年^①。由于参加了波兰共产党，我被监禁在法西斯波兰的监狱里长达5年多。从1927年起，也就是来到苏联以后，我主要是在基辅、普罗斯库罗夫和莫斯科的几家波兰报刊编辑部里担任领导工作，乌克兰联共（布）中央以及文尼察州党委对于我的工作都给予了好评。

目前，我被监禁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劳动改造营里，我被指控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被缺席审判，依据审判结果将被流放在这里5年。

审判结果是完全不正确的；我没有犯罪，这与向我提出的指控相距甚远，就像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违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纲领的行为。总之，我被监禁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而将我开除出党的决定在我被捕一年之

^① 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于1918年，1925年改名为波兰共产党。布罗尼斯拉夫·阿达莫维奇·贝格（真实姓名是维托尔德·萨尔茨贝格）生于1903年。他是波兰青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并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1922年由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而被逮捕并被监禁直至1926年12月。1927年8月移居苏联并加入联共（布）。1934年12月，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并被判处5年监禁。

后就做出了，决定是正式通过的，也是缺席做出的。

但是，德米特里耶夫同志，我给您写信并不是为了我个人。

我给您写信是因为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波兰共产党，我觉得，在您的干预下，这个问题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近两年来，在乌克兰有几百名共产党员和无党派的波兰人遭到逮捕，其中有很多从波兰移居的政治侨民。被逮捕的人，其中包括我，都被指控参加了波兰的反革命组织“波兰军事组织”（所谓的斯卡尔别克小组^①）实际上，案件是这样的：

以下是事实：

1) 患有结核病的“T”被昼夜监禁在盛着冷水的浴池里，并以枪决等类似话语对其进行恐吓。其结果逼迫他在完全是捏造的关于自己和其他同志的供词记录上签字，供认他们是“波兰军事组织”的成员、破坏分子等等。

2) 像“传送系统”一样审讯“Д”，审讯连续进行了三昼夜，吃饭、大小便都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进行，不让他睡觉，也不让他吸烟。两名侦查员轮班进行审讯：当一名侦查员在沙发上睡觉时（有“Д”在场），就由另一名侦查员审讯他。他们以枪毙、逮捕其妻子来恐吓“Д”，向“Д”出示虚假的、审讯其他被捕者的记录，还以威逼和其他方法来劝说“Д”，要其为了“党和政府的利益”提供明明是虚假的证词。其结果是，“Д”被逼签署了虚假的证词，说他是斯卡尔别克的助手，他进行了破坏工作。“Д”还提供了有关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关于我的供词。后来，在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Д”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切卑鄙的行为。这封信在检察

^① 波兰军事组织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从事反俄、反苏维埃的恐怖活动。布罗尼斯拉夫·斯卡尔别克，1906年加入波兰社会党，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33年被捕并被镇压。

员济科夫斯基手里，他将该信件藏起来，并威胁“П”，如果他想揭露这件事，就镇压他的妻子。

3) “П”三次被押赴刑场，以此来折磨和恐吓他。结果“П”在虚假供词上签了字，指控许多同志是“波兰军事组织”的成员。后来，“П”否认了这些被逼迫出来的供词，但是，这些供词仍然成为指控许多无罪同志的依据。

4) “Г”在招供之前受到了极大的折磨，结果他供认他将众多区的武装成员组织在一起，准备进行武装起义；“К”交待说，他组建了一支“由几万人组成的地下集团军”；“М”交待说，他想“炸毁基辅发电站以及其他一系列设施”。

5) 用枪决来恐吓我，并千方百计地嘲弄我，侦查员布连、博洛京、扬科、卡冈诺维奇和检察员济科夫斯基试图逼迫我提供关于许多波兰共产党员的虚假供词，指控他们是“波兰军事组织”的成员或者是其领导人。这份人员名单是由涅明斯基编出来的，他们折磨涅明斯基，直至其提供了简直是幻想出来的供词。他指称我是“波兰军事组织”在普罗斯库罗夫地区的6个基层组织的组织者，这份名单里包括普罗斯库罗夫地区6个波兰村庄的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无党派积极分子。后来，涅明斯基5次来找检察员济科夫斯基，否认这些供词；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了，而我也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并被逼证明这份名单。除此而外，还要求我提供关于捷尔任斯卡娅^①同志、拉佐维尔特^②同志，以及列维茨基^③同志的伪

① 捷尔任斯卡娅，索菲娅·西吉兹蒙多夫娜（1882~1968），费·埃·捷尔任斯基的妻子。

② 拉佐维尔特，萨穆埃尔（1885~1937），1904年11月加入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19~1920年曾任俄共（布）中央波兰局委员和书记。1937年9月22日因被指控参加波兰间谍机关而被处决。

③ 列维茨基的情况不详。

证，说他们是“波兰军事组织”的领导人。

6) H同志、Б-г同志、С-а同志、Б-д同志、В-л同志、З-р同志、К-л同志、Д-б同志、П-ш同志以及由于“波兰军事组织”案件而被指控的其他同志都对我讲过，他们都被逼迫提供关于许多无罪同志的虚假供词，指控他们是“波兰军事组织”的成员。同时，某些侦查人员甚至厚颜无耻地要求他们提供关于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连斯基^①同志以及波兰共产党某些领导同志的伪证。

7) 对几名下流坯，像捷奥多尔、奥尔达科夫斯基以及斯……^②进行加工之后，侦查机关通常采取这样的做法：使被告同这类人之中的一名或者是两名进行当面对质。这类人厚颜无耻地编造对自己有利的谎言，这就足以判处被告几年徒刑。这类人被单独关押在条件很好的地方；给他们的妻子安置很好的工作，搬迁到好的住宅里，给予优越的物质帮助，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把他们带出监狱，让他们乘汽车沿市区兜风，答应不管判决几年徒刑，都会很快释放他们。

8) П-ш对我说：“我提供了虚假供词，说我是‘波兰军事组织’文尼察州委员会委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被带到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巴利茨基^③同志面前。我们向他讲述了关于捏造我们参加了‘波兰军事组织’工作的事情。我们的侦讯人员命令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枪毙我们”。

① 连斯基，尤利安（1889～1937），1905年加入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29年起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1937年9月21日被处决。

② 此处原档案复印件字迹不清。

③ 巴利茨基，弗谢沃洛德·阿波洛诺维奇（1892～1937），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主义工党。1934～1937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37年6月被开除出党，11月27日被枪决。

德米特里耶夫同志！这远远不是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全部，而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个案件的一部分。

德米特里耶夫同志！这不是谎言，不是诽谤，也不是挑唆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是事实！是的，万分遗憾，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批侦查员，披着英雄的肃反工作人员的外衣，通过采取非法的审讯方法，人为地制造了这起案件。

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革命法纪遭到粗暴破坏，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遭到肆意歪曲，几百名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的名誉被破坏，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卑鄙地欺骗，造成了远远超过德雷福斯^①案件和阿捷夫行径^②的挑唆性案件。

请您不要以形式主义的态度对待这封信，请将这封信的内容通报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向您保证，我非常明白自己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此我应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什么也不怕，因为我是正确的，我知道，最终会“水落石出”的。我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什么东西也不能把我摧垮。在这些卑鄙的挑唆行为之中的最下流的一个案件没有被彻底揭露之前，我将继续提出这个问题。

我给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写了很多封信，但是，一切都毫无结果，因为我的所有声明都被侦查员扣下了。这封信是从另外一家邮局寄出的。

亲爱的德米特里耶夫同志！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案子，因此，要求对此做出最快的反应，以免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声誉造成

① 德雷福斯，阿尔弗勒德（1859～1935），法国总参谋部军官，犹太人，1894年依据捏造的叛国罪，被屈判终身苦役。

② 阿捷夫，叶甫盖尼·菲舍列维奇（1869～1918），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和该党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892年起充当警察司密探。1908年被揭穿。“阿捷夫行径”成为警察的大规模挑唆行动的同义语。

严重损害。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贝格，布罗尼斯拉夫·阿达莫维奇

梅德韦日亚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白海—波罗的海联合企业管理局囚犯
贝格，布罗尼斯拉夫·阿达莫维奇

1936年2月3日^①

^① 贝格的这封信及其他写给党和苏维埃上级机关的所有信函和声明都是徒劳无益的。这封写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信也没起作用，因为信的复印件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德·扎·马努伊尔斯基转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到1939年布·阿·贝格才刑满获释。自1941年8月到1942年10月，贝格在红军队伍里工作，自1943年起居住在诺夫哥罗德州的博罗维奇市。1955年12月30日，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决议，贝格获得平反。

№04030

迪特里希给德共中央和德共 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处的报告

(1938年4月29日)

绝密

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和
坚格尔^①同志

1938年3月27日，某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谢尔多夫斯基同志，对居住在莫斯科巴里科夫斯基街6号、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维利·克莱斯特（凯福）^②的妻子说：“您（指克莱斯特的妻子），作为一名联共（布）党员，应该知道，住在苏联的所有德国人都是间谍”。对于她的丈夫克莱斯特同志不是间谍以及在法西斯德国他曾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回答，这位党委书记说：“是的，正是那些在集中营待过的人，他们是法西斯派到苏联的间谍分子……如果将他们全部逮捕起来，那么，在发生战争时，他们就不会带来危害”。

联共（布）党委书记谢尔多夫斯基同志的这种看法不是个别

① 坚格尔，费利普（1888～1948），1919年加入德共。1937～1938年任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负责人。1938～194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后因健康状况不好而退休，1947年回到东德。

② 凯福，维利（笔名为克莱斯特）（1897～1979），1920年加入德共。1935年来到苏联，根据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的指示，整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著作。

的,《莫斯科报》^① 1938年4月12日第19号社论也表明了这种观点。同时,该报还登载了以下内容:“实际上,日本驻在国外的所有官员都参加了反苏间谍活动。丝毫也不夸张地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个日本人都是间谍,正如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一样。”

由于《莫斯科报》在出版之前要经过图书出版事业总局的检查,所以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即“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是官方的观点。

如果就这一点更准确地研究一下在苏联对德国人进行逮捕的有关数字,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数字与这位党委书记以及《莫斯科报》的观点完全一致。

1938年4月28日,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登记有842名被逮捕的德国人。但是,这仅仅是在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登记过的被捕者的一部分。实际被逮捕的德国人数量自然比这要多。自1937年10月到1938年3月底,被逮捕的人数是470人。仅在1938年3月份,就逮捕了大约100人。1938年3月9日,在莫斯科政治侨民^②之家有13人被逮捕,而3月11日有17人,3月12日有12名政治侨民被逮捕。3月23日逮捕了最后4名男性政治侨民(路易斯·埃勃涅尔同志当时正在疗养)。例如在恩格斯省,没有一名纯德国人^③是自由的。

1937年初,在列宁格勒市的德国共产党员小组有103人,而

① 《莫斯科报》为周报,1934年4月至1939年5月用法文出版。

② 希特勒在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后,大肆迫害共产党人,于是很多德国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分子不堪忍受纳粹监狱和集中营的折磨,而作为政治侨民移居苏联。因为这个“向他们殷勤地敞开了大门”的国家给他们提供了避难权。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久便成为另一场巨大的漩涡的牺牲品。

③ 指没有加入苏联国籍的德国政治侨民。

到1938年2月只剩下12名同志。所交纳的党费也可以证明这些数字。1937年初，向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交纳党费的德国共产党员有1300人，而目前只剩下378人交纳党费，其中的17人今年还没有交纳党费。由于对这17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不清楚他们目前是否还活着。这里还应该补充三名同志：贝鲁特·科涅，自1937年7月，休茨·埃利兹和温德尔泽，自1937年底，均未交纳党费。交纳党费的人员中，有335人在莫斯科（包括今年还没有交纳的20人），43人在其他省。这些人中有129人是集体交纳的，其余的人是单独交纳的。党费的数额从1937年初的10000卢布下降到1939年4月的3000卢布。今年交纳的情况是：1月份是6783.40卢布，2月份是4226.75卢布，3月份是3377.65卢布，4月份是3916.10卢布。

在被逮捕的人中，青年人占有很大的数量，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来到苏联时，完全还是小孩子。例如：被逮捕的马达列娜·马克思^①的儿子们，盖利赫·施密特以及赛德维茨·马克斯^②的两个儿子等人。

可以说，有70%以上的德国共产党员都被逮捕，如果逮捕仍以1938年3月的那种规模继续下去的话，那么3个月之内将不再有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存在。在841名被逮捕的人中，有8位同志已获释放。

一些同志的情绪和看法

一部分同志的情绪紧张不安，众多的人遭到逮捕，使他们感到震惊不安。当他们相互碰面的时候，总是问：“你还活着？”当同志

① 马克思，马达列娜（1895—1943），1920年加入德共。1935年被选为德共领导成员。

② 马克思，赛德维茨（1892—1987），30年代德国左翼社会党人领袖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转入德国共产党。

们来我们代表处交党费时，就说：“看，您的卡片越来越少！总共还剩下多少——有一打吗？您现在一周还接待两次？我们简直吃惊，还没有让你们关门！”

如果说几个月前，每一个被逮捕的人还被同志们认为是间谍分子，那么，现在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保尔·塞贝尔、维利·克莱斯特、汉斯·高斯拉坚、瓦尔德尔·迪特宾德尔^①等人是间谍分子或者是挑唆分子。维德曼、格里希向我们讲述了以下情形：“那天，当保尔·拉伊德尔被逮捕时，维德曼同志正想顺便去他的住所。但是，在拉伊德尔住的那所房子里，其他一些住户（俄罗斯同志）警告他，不让他去那里，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还在拉伊德尔家里。维德曼同志一直等到拉伊德尔被带走后，才来到他妻子那里。拉伊德尔的住所里已经有几位也是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妇女，他们安慰拉伊德尔的妻子并劝说她，不要难过，他们会帮助她的，俄罗斯人被逮捕的人数比这还要多。”

苏联公民对于被逮捕的德国人的亲属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去年，在莫斯科被逮捕的德国人的家属都被看做是法西斯分子和特务分子。

今年3月中旬，住在这个政治侨民之家的一些同志，充满了惊慌和恐惧，他们打好了行李，等待着被逮捕。被逮捕者的妻子，例如费利克斯·加列^②教授的妻子，于1937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1938年3月初，福劳·格尔特鲁达·米尔贝格（奥尔布里什）也同样自杀身亡。

① 迪特宾德尔，瓦尔德尔（1892~1938），1920年加入德共。1935年起任苏联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中央政治侨民事务处主任。1938年3月31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后下落不明。

② 加列，费利克斯（1884~1937），1920年加入德共。1934年3月来到苏联，1937年8月5日被逮捕，同年被处决。

一些被逮捕者的妻子和孩子简直就是挨饿。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每天都收到大量呼吁帮助的信函，出现很多令人震惊的场面，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已经成为被逮捕者的妻子们表现绝望情绪的场所。一些妇女甚至试图从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大楼的窗户跳出去。格尔特鲁达甚至打算将自己的婴儿扔到电车下面然后再自杀。丈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被逮捕的索尼娅·格列利克也流露出同样的打算。一部分被逮捕者的妻子和其他亲属都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表示，他们的丈夫是无辜被逮捕的，他们没有干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一些人用编造的谎话来解释这些逮捕，而另外一些人则推测说，这是德国法西斯分子干的，目的是帮助亚戈达^①分子消灭一部分德国共产党的干部。

1938年2月21日，拉伊德尔的儿子、24岁的霍尔斯特在莫斯科的家中被逮捕。在进行搜查和逮捕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发现，除了霍尔斯特之外，拉伊德尔还有一个儿子瓦尔德尔。一名工作人员将霍尔斯特带走，而另外一名则留在拉伊德尔的家中进行监视。大约2小时后，这名工作人员返回，拉伊德尔的另一个儿子瓦尔德尔也被逮捕。

瓦尔德尔·迪特宾德尔在被逮捕之前曾对我说过（我记得是在今年的2月份）：“我们俩人（指迪特宾德尔和迪特里希）知道的东西太多。开始他们会逮捕我（指迪特宾德尔），而你（指迪特里希）会继续我的工作，然后，你也将被逮捕。”

^① 亚戈达，亨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1891—1938），1924年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34年7月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是30年代大清洗的直接组织者。但亚戈达自己也成为这场荒谬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1936年9月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被免职并开除出党，1938年3月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被判处死刑。

当德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在今年的4月4日去探望在高加索被逮捕的库库利斯和哈尔姆斯的妻子们时，她们说：“为什么他们只逮捕无产者，而不是你们（也就是领导同志们）。当发生这样不公正的事情时，党为什么不帮助我们？”莱斯同志说：“如果党不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向它交纳党费？”

玛利娅·克拉梅尔同志，其丈夫正在西班牙作战，她情绪非常激动地来到我们代表处说：“请给我机会，让我见斯大林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我想对他们说，那些德国同志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们，他们是无辜被逮捕的”，如此等等。

要想让同志们相信苏维埃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是公正的，需要实际做出巨大的努力。但是，总的来说，从交谈中可以看出，对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信任程度在下降。

住在政治侨民之家里的被逮捕者的妻子们，例如林格·埃利扎、列什涅尔·安娜、佐尔加茨·埃尔娜、汉格尔·玛利娅，不久又有芬格麦耶尔·格尔特鲁达，自1938年4月中旬开始就没有得到食品供应卡。只有他们的孩子还能得到食品供应卡。总之，这些妇女为了生存下去，有时出卖一些破烂家什。

以下是一份政治侨民的名单，目前他们没有任何工作。

住在政治侨民之家的人有：

林格·埃利扎（她的丈夫已被逮捕，有三个孩子）；埃格尔·柳西；列什涅尔·埃尔娜（她的丈夫已被逮捕）；佐尔加茨·埃尔娜（她的丈夫和儿子均被逮捕）；卡斯帕尔·约卡娜（她的丈夫被派出差^①，两个孩子16岁和17岁）；克尼普什尔特·玛尔加列特（一个

^① 当时对于德共党员来说，出差经常意味着参加西班牙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是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以及在与德国相邻的国家内组织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婴儿由她带着，另一个孩子在儿童院^①)；什连克·埃利扎（一个婴儿由她带着，另一个孩子在儿童院）；费舍尔·根里耶塔（一个婴儿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在儿童院）；科布列尔·玛利娅（一个孩子两岁，一个孩子17岁）；霍尔·安娜（三个孩子）；洛茨卡特·埃尔娜（她的丈夫已被逮捕，有三个孩子）；留克·格列塔（一个孩子）；芬格麦耶尔·格尔特鲁达（她的丈夫已被逮捕，有两个孩子）；格莱涅尔·埃利扎（一个婴儿由她带着，三个孩子在儿童院，丈夫被派出差）；克鲁泽·安娜（一个孩子）；汉森·汉涅洛列（一个婴儿由她带着，另一个孩子在儿童院）；福格曼·埃尔娜（丈夫在西班牙）；汉格尔·玛利娅（丈夫已被逮捕）；格留涅尔·玛尔塔（丈夫被派出差）；埃布涅尔·露易斯。

住在列宁格勒政治侨民之家的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别墅的人有：

格罗斯·杰奥（残废人）；苏科夫·奥托（也是残废人）；斯普里克·弗里茨（也是残废人）；列姆林格·西尔德（儿子15岁）；乌尔里希·弗里达（残废人）；格拉杰维茨·赫尔德（丈夫被派出差）。

住在佩尔洛夫卡的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别墅的人有：

什拉姆尔·约泽福；凯尼格·伊列娜；科伊菲尔特·弗兰茨（残废人）；西尔特曼·托尼（残废人）。

住在“伊利因斯基”的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别墅的人有：

赫尔布斯特·玛利娅（残废人）；里赫拉特·芬德林格（一个孩子在儿童院）；布列杰·约加娜（有一个17岁的女儿）；塔乌贝·格尔特鲁达（一个孩子住在切柳斯金斯基）；博尔曼·古斯塔夫（同妻子两人）；福劳·豪什坦因（本人患病，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女儿）；福劳·莫泽尔（丈夫已被逮捕，有一个孩子）。

^① 指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

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关照的还有 39 名政治侨民。他们之中有 9 名妇女，她们的丈夫已被逮捕，有一名妇女，她的丈夫在西班牙牺牲，还有八名男人。

第二部分。关于逮捕：在一部分同志已经被派往西班牙出差之后，其中一些人的妻子前来通报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人来探望她们，其目的是逮捕她们的丈夫。但是，上述所说的同志已经动身前往西班牙了（例如阿尔弗列德·芬德里希同志）。

由于直到今天为止，我都不能口头向您通报这份材料，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一切以书面形式向您报告。

迪特里希^①

1938 年 4 月 29 日于莫斯科

^① 让克·迪特里希，真实姓名保尔·雅凯尔，是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处负责统计、登记和检查在苏德共党员的领导人。

【专题说明】

叶若夫案件

(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895～1940），1917年加入俄共（布），曾任哈萨克边疆区党委书记，1927年到党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出任中央干部部部长，1933年到中央清党委员会工作，随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主席。1936年接替亚戈达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30年代大清洗的第二个执行者。1936～1938年叶若夫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多次被授予最高奖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一批老革命以及大批红军高级将领的审判，都是经过叶若夫之手。在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米高扬做了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第一公民》的报告，以表彰叶若夫及其镇压机器在执行恐怖政策方面的成绩和贡献。

但是到1938年8月，拉·贝利亚担任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1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存在着“最重大的缺点和歪曲现象”。随后叶若夫向政治局递交了表示悔过的辞职信。1939年1月21日，叶若夫最后一次在列宁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会议上露面。4月10日，他

被逮捕，然后被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苏哈诺夫斯基特别监狱。关于审判叶若夫的材料至今很少见到，从详细记有叶若夫的最后陈述这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叶若夫本人也是在刑讯逼供下承认强加给他的各种罪名的，而当叶若夫1940年2月1日接到起诉书时，便推翻了自己过去的供词。不过，他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1940年2月4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叶若夫被枪决了。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乌传袞、黄有自翻译)

№04021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
《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

（1938年11月17日）

绝密

第 II4387 号

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

各边疆区和州内务局局长

各专区、市和地区内务分局局长

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检察长

各专区、市和区检察长

各民族党中央、联共（布）边疆区、州、专区、市和区委员会书记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1937～1938年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粉碎人民的敌人和清除外国间谍机关（尤其是日本、德国、波兰、英国和法国的间谍机关）在苏联的重要支柱，即数量众多的特务分子、恐怖分子、破坏分子、敌对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白卫分子、厚颜无耻的富农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粉碎打着所谓政治侨民和投诚者的招牌从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德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哈尔滨越过边境线进入苏联的外国间谍的间谍破坏活动的斗争中，也

做了大量的工作。

清除国内的颠覆破坏分子和特务分子，对于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不应该认为，在苏联清除特务分子、敌对分子、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的斗争已经结束。

目前的任务是，继续同苏联的全部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并利用更加完善和可靠的方法来进行这一斗争。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1937~1938年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所进行的粉碎和消灭敌对分子的大规模的行动，都是采用了最简单的侦讯和审判方法，这不能不导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不仅如此，人民的敌人和钻进中央以及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分子，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搞乱被侦查的案件和间谍案件，故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逮捕，同时保护自己的同伙，尤其是钻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同伙免于被粉碎。

最近查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里存在的重大缺点有：

第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放弃了情报工作，宁愿采用最简单的行动方法即实行大规模逮捕，同时忽视调查工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如此脱离耐心细致和全面系统的情报工作，醉心于简单地处理案件的方法，以至于最近一段时间需要向他们提出进行大规模逮捕的“限额”问题。

这导致已经很薄弱的情报机关的工作变得更加落后，而更糟糕的是，很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对于情报措施的兴趣，而这些措施在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还导致在缺乏可靠的情报机关的工作的情况下，侦讯人员就不能完全揭露被逮捕的特务分子和外国间谍机关的破坏分子，也不可能彻底揭露他们之间的犯罪联系。

这种过低估计情报工作的意义以及不可原谅的对于逮捕的轻率态度尤其令人不能忍受，而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早在1933年5月8日、1935年6月17日和1937年的3月3日决定中，就下达了坚决的指示：必须正确进行情报工作，限制逮捕以及改进侦讯工作。

第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工作中的另一重大缺点是：根深蒂固的简单化的调查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侦查员通常局限于从被告人那里得到承认自己罪行的供词，而完全不关心用必须的文件资料（证人的证词、检验报告、物证以及其他文件）来证实这个供词。

经常是，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后过了一个月，有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也不对其进行审讯。在审讯被逮捕的人员时，不作审讯记录。经常有这样的情形，侦查人员将被告的供词以杂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接着，过了一段时间（十天，一个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再编出一个总的审讯记录，而这完全违背了刑法典第138条的要求，即对罪犯的供词要尽可能地逐字记录。经常是要等到被逮捕的人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后，才编定审讯记录。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被告推翻某些指控材料的供词没有被记录到审讯记录里。

侦查卷宗材料也很粗糙混乱，归档的材料有草稿，还有不知是什么人修改和用铅笔划线的供词记录，没有被告人签名和侦讯人员确认的供词记录以及没有签名也没经确认的起诉书等等也归入了卷宗。

检察机关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消除这些缺点，而通常是，认为自己参加调查的工作就是对于侦查材料进行简单的登记和盖章。检察机关不仅没有消除这些违背革命法纪的行为，而且实际上是将

这些违法行为合法化了。

隐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里的——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人民的敌人，经常巧妙地利用这种对于侦讯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粗暴地破坏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他们有意歪曲苏维埃的法律，制造假案，捏造虚假的侦讯材料，凭着微不足道的根据或者是毫无根据地追究刑事责任，进行逮捕，制造以挑唆为目的来反对无辜的人们的“案件”，而与此同时又采取一切措施，掩饰并保护自己进行反苏犯罪活动的同伙免于被揭露。无论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还是地方机关里，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

以上指出的所有这些存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中的不可原谅的缺点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钻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里的人民的敌人，千方百计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脱离党的机关的监督和领导，并以此来使自己和自己的同伙轻松地继续进行反苏破坏活动。

为了彻底消除上述缺点以及更妥善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讯工作，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禁止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进行任何大规模的逮捕和强行移民的行动。

根据苏联宪法第 127 条规定，逮捕行动只能根据法院的决定或经检察长的批准方可进行。

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从边境地带移民只能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批准，凭相应的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或者是民族共产党中央专门提出的、得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赞同的呈文进行。

2. 撤销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命令成立的三人审判小

组，以及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工农民警局下设的三人审判小组。

今后，一切案件都要严格依据现行审判管辖法的规定，提交法院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特别委员会审理。

3. 在实施逮捕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应遵循下列原则：

1) 严格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35 年 6 月 17 日的决定，协商逮捕事宜；

2) 在向检察长索取逮捕批准令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必须提交说明逮捕理由的决议，以及能够说明必须逮捕的、根据充足的所有文件资料；

3) 检察机关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关于逮捕的决议的理由必须进行仔细的、实质性的核实，如果有必要，还应要求其进行补充侦查或者是提交补充侦查文件资料；

4) 检察机关应制止证据不足的逮捕行动。

应规定，签发逮捕令的检察员，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起，对每一次错捕行动共同承担责任。

4. 在进行侦讯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一切规定。

其中包括：

1) 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结束调查工作；

2) 自逮捕之时起不超过 24 个小时，对被逮捕的人员进行审讯；根据刑法典第 138 条规定，在每一次审讯结束之后，立即形成审讯记录，并准确注出审讯的起止时间。

检察员在读过审讯记录之后，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并标明阅读文件的时间：年、月、日、时；

3) 对于在搜查时所没收的文件、信函以及其他物品，应在搜

查现场立即查封，并按照刑法典第 184 条规定，编出被查封物的详细清单。

5. 责成检察机关认真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的侦讯工作实行检察监督。

根据这一点，责成检察员系统地核查侦查机关对于法律规定的侦查工作要求的执行情况，立即消除违背这些规定的行为；采取措施保证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被告诉讼权等等。

6. 鉴于检察机关监督作用的提高，以及检察机关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所进行的逮捕和侦讯工作应承担的责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规定，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的侦讯工作实行监督的所有检察人员，都要经相应的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民族共产党中央和苏联检察长的推荐，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

2) 责成州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和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期限内，对于即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对于侦讯工作实施监督的所有检察人员候选人进行审查并提交联共（布）中央批准；

3) 责成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同志，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中抽调几名政治可靠、业务精通的检察人员，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所进行的侦讯工作实施监督，并在 20 天之内将以上人员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

7. 批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1938 年 10 月 23 日命令中阐述的关于整顿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侦讯工作的措施。其中包括赞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在行动处成立专门的侦讯部门的决定。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正确组织侦讯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保证任命最优秀的、政治上最可靠的、业务精通的党员为中央和地方的侦讯人员。

应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全体侦讯人员，无论是中央机关的，还是地方机关的，只能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进行任命。

8. 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总检察长，给自己的地方机关下达指示，要求认真执行本决定。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请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注意，必须坚决消除上述存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中的缺点，按新的方法进行侦讯和检察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警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对于丝毫违背苏维埃法律以及党和政府法令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机关的每一名工作人员，不管是谁，都要严厉追究法律责任。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维·莫洛托夫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04022

叶若夫关于辞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 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8年11月23日）

绝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斯大林同志

我请求联共（布）中央，免去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工作，理由如下：

一、1938年11月19日，政治局讨论了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的声明，完全证实了声明中所阐述的事实。我应承担的责任是：茹拉夫廖夫同志（这一点从声明中可以看出）曾提醒过我，说利特温^①、拉济维洛夫斯基^②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负责人员有可疑行为，他们试图掩饰某些人民的敌人的案件，因为正是他们本人与这些人民的敌人在反苏阴谋活动方面有联系。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茹拉夫廖夫同志关于利特温可疑行为的报告，利特温千方百计阻止揭露波斯特舍夫^③，因为正是他在进行阴谋活动方面与波斯特舍夫有着联系。

① М.И. 利特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政治保密处处长。1938年自杀身亡。

② А.П. 拉济维洛夫斯基，莫斯科州内务局副局长。1940年被镇压。

③ Л.П. 波斯特舍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州委员会第一书记。1938年被镇压。

显然，假如我对于茹拉夫廖夫同志的提醒表现出应有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关注和警惕性，那么人民的敌人利特温以及其他一些下流分子很早以前就会被揭露，也就不会在人民委员部里占据如此重要的职位。

二、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茹拉夫廖夫同志的报告时还揭露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实际工作中的其他一些完全不能容忍的缺点。

侦察机关的重要杠杆——情报工作极为松散。实质上是被迫重新成立国外情报机关，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已经混进了间谍分子，这些间谍分子中的很多人都是驻外公使，他们与混入侦察机关的外国间谍头子一起工作。

侦讯工作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缺点。这方面主要是：在很多情况下，对最重要的罪犯进行侦讯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没有被揭露出来的阴谋家，他们不让谈论案件，从而一开始就将案件捂住，而最重要的是1——隐瞒了他们在肃反工作人员中的阴谋活动同伙。

内务人民委员部最混乱的方面是干部。先不去说，在十年的时间里，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阴谋分子和与其有联系的外国情报机关，收买的不仅仅是肃反委员会的上层人物，还有中层人物，更多的是基层工作人员，现在我略感欣慰的是：我消灭了上层人物和中层人物中声名狼藉的工作人员。正如现在已经弄清楚的那样，被重新提拔的人员中，很多人是间谍分子和阴谋分子。

显然，对于所有这一切，我是应该负责任的。

三、我最重大的疏忽是：目前已被弄清楚了了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警卫处的状况。

第一，那里还存在着大量的没有被揭露的阴谋分子以及听命于保克尔^①的卑鄙分子。

^① K.B. 保克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作战处处长，1938年被镇压。

第二，接替保克尔、后来自杀身亡的库尔斯基^①，和目前已被逮捕的达金^②也是阴谋分子，他们在警卫处里安插了一大批自己人。我把警卫处的最后两任负责人看做诚实的人，因此信任他们。我看错了人，对此我应承担责任的。

抛开其他一系列缺点不谈，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肃反工作人员的业务工作的大体情况也如此。

我不谈一系列客观事实，因为在最好的情形下，这些事实可能对糟糕的工作进行某种解释，我只想说我作为人民委员部的一名领导在用人的方面所犯的错误。

第一，很显然，我不胜任如此责任重大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没有掌握比较复杂的侦讯工作的全部内容。

我的错误在于：我没有及时地、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向联共（布）中央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第二，我的错误在于：我虽然看到了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甚至在人民委员部里还对这些缺点进行了批评，但是，我却没有同时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这些问题。满足于个别的成绩，掩盖缺点，一个人进行挣扎，试图改善事情。陷入僵局时，才感到不安起来。

第三，我的错误还在于：我经常以事务主义态度对待干部的分配。在很多情况下，对于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工作人员，我迟迟不予逮捕，直到选出替换人员为止。由于这些事务主义的理由，在很多工作人员问题上我犯了错误，将他们推荐到重要的岗位上，而现在，他们被作为特务分子揭露出来。

第四，我的错误在于：在对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警卫处进行

① В.М. 库尔斯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1937年自杀身亡。

② И.Я. 达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警卫处处长。1940年被镇压。

彻底清洗的工作中，我表现出了对于一名肃反工作人员来说绝对不能宽容的粗心大意。特别是，在拖延逮捕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分子（布留哈诺夫^①等）这件事情上，我的粗心大意是不可原谅的。

第五，我的错误在于：虽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局长、叛徒柳什科夫^②以及后来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叛徒乌斯宾斯基^③等人的政治忠诚有所怀疑，但是，我却没有以肃反工作人员的警惕性采取足够的措施，导致柳什科夫在日本隐藏起来，而乌斯宾斯基目前还不知道逃到何处，侦查工作还在继续。

以上所有这一切，使我没有可能继续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工作。

再一次请求免去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

尽管存在这些重大的缺点和工作失误，但我应该说，在中央的日常领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是给了敌人以狠狠的打击。

我向联共（布）中央和向斯大林同志作布尔什维克的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接受所有这些教训，认识错误，在中央认为应该使用我的任何一个部门重新做人——不辜负中央的信任。

叶若夫

① 布留哈诺夫，H.П.（1878~1938），1933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中央农作物产量测定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因“积极参加右派组织”遭到镇压。

② Г.С. 柳什科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局局长。1938年逃到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地区。

③ А.И. 乌斯宾斯基，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后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局局长。1941年被镇压。

№040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免去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决定

（1938年11月24日）

第 65a 号记录

1938年11月24日

第 160 条：尼·伊·叶若夫同志的声明

研究了叶若夫同志关于请求免去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声明，考虑到这份声明所阐述的理由，以及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使他有可能同时领导两个大的人民委员部，联共（布）中央决定：

1. 满足叶若夫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
2. 保留叶若夫同志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

中央书记 约·斯大林（签名）

No06447

叶若夫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秘密 受审时的最后陈述

(1940年2月3日)

我对如何出庭受审以及我在法庭上的举止考虑了很久，终于确信，只有如实地坦白交代，才能获得保住性命的惟一机会。昨天我和贝利亚谈话时，他对我说：“你别以为一定会处决你。如果你认罪，老实交代清楚，你的性命就可以保住”。

我同贝利亚这次谈话后下了决心：宁愿去死，但要死得光明正大，对法庭只能交代事实。在预审中我说我不是间谍，我不是恐怖分子，但是大家不相信我，并且对我严刑拷打。我入党25年来一心一意同敌人作斗争，不断消灭敌人。我有罪，据此可以处决我，关于这些罪行我后面再谈，但是我的案件起诉书所认定的罪行我没有犯过，我没有罪……

柯秀尔^①从未到过我的办公室，我和他也没有间谍活动的联系。这一说法也是我胡编的。

我供出了泰茨大夫，这纯粹是因为他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我认识泰茨仅仅是因为有时我找卫生局，泰茨大夫接电话时说了自己的名字。在预审时我想起了这个名字，就编造了揭发他的供词。

在预审时侦查员要我供认我当时曾同情“工人反对派”。不错，

^① 柯秀尔，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1889～1939），1930年起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9年2月被判处死刑。

当时我同情过“工人反对派”，这一点我从不隐瞒，但我并没有参与反对派的活动，也没有加入过反对派。列宁“论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发表后，我读了提纲，认识到反对派的欺骗行径，从那时起我就成了诚实的列宁主义者。

我第一次见到施略普尼柯夫^①是在1922年，因为当时我为采购粮食常去找他。后来我就没有见过他了。

我是在马里亚辛^②的家里认识皮达可夫^③的。皮达可夫一喝酒就喜欢嘲弄一起喝酒的人。有一回皮达可夫喝醉了，用别针扎了我两下。我发了火，打了他一个耳光，把他的嘴都打破了。这事发生后我们吵了一架，从此就不理睬了。1931年马里亚辛想使我们和解，但我不同意。

1933~1934年皮达可夫去国外，他交给谢多夫^④一篇为《社会主义通报》撰写的文章。该文对我和其他一些人泼了许多脏水。皮达可夫送交文章一事是我亲自调查清楚的。

由于我和皮达可夫之间有过这些纠葛，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他保持什么联系，因此我关于与皮达可夫建立反苏联系的供词也纯属瞎编。

我和马里亚辛的私交由来已久。我知道马里亚辛很能干，所以拉·莫·卡冈诺维奇才把他推荐给我，但后来我与他决裂了。马里亚辛被捕后许久没有供认他的间谍活动和挑拨政治局委员的活动，所以我才下令“揍”他。我与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以及“工人反

① 施略普尼柯夫，亚历山大·加甫里洛维奇（1885—1937），“工人反对派”的首领。

② 马里亚辛曾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

③ 皮达可夫，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1890~1937），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党籍。后恢复工作，仍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6年被捕，1937年2月被处决。

④ 列·托洛茨基之子。

对派”这些团体和组织没有任何反苏联系，同样，我与皮达可夫、马利亚辛以及其他人也没有任何这种联系。

我没有策划过任何反党反政府的密谋活动，相反，我竭尽全力来揭露密谋活动。1934年，当我着手承办“基洛夫事件”一案时，我毫不犹豫地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亚戈达和肃反委员会内其他叛徒的情况，这些暗藏在肃反委员会内的敌人，如阿格拉诺夫和其他一些人欺骗我们，说这是拉脱维亚侦查机关干的。我们不相信这些肃反工作人员，迫使他们向我们坦白交代，供出托洛茨基右倾组织插手此事的情况。侦查基洛夫被害一案时我在列宁格勒，我看见肃反工作人员想把这个案件掩饰过去。我一回到莫斯科立即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详细报告给斯大林，这之后斯大林立即召集了会议。

在清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系统党的文件时，我们查出了许多敌人以及形形色色侦查机关的特务分子。我们向肃反委员会通报了这种情况，但肃反委员会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不抓人。于是我才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召见亚戈达，命令他立即抓紧处理这些案件。亚戈达对此很不满，但他不得不把那些我们已经提供有材料的人抓了起来。

人们会这样问，如果我参与了反苏密谋活动，那为什么我还一再向斯大林提出关于肃反委员会工作糟糕的问题呢。

现在别人总对我说，你这样做都是为了往上爬，为了自己钻进肃反委员会机关。我觉得，这种责难毫无根据，因为我着手揭露肃反委员会机关工作糟糕时马上就转入揭发具体的人。我揭发的第一个人便是波兰间谍索斯诺夫斯基。亚戈达和明仁斯基^①就以这件事为借口大吵大嚷，不但不逮捕索斯诺夫斯基，反而把他派到外省

^① B. P. 明仁斯基（1874～1934），1919年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3年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26年起任局长。

去工作。我乘机立即逮捕了他。当时我还揭发了米龙诺夫等人。但是我的行动受到亚戈达的干扰。这就是我进入肃反委员会之前的情况。

我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时开始是一个人干。我没有助手。一开始我就进行摸底，接着我抓的第一件事便是粉碎钻进肃反委员会机关各部门的波兰间谍。这些间谍掌握了苏联的侦查机关。因此，我这个“波兰间谍”一开始干的就是镇压波兰间谍。镇压波兰间谍的活动之后我立即着手清洗倒戈分子。这就是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开展工作的情况。莫尔恰诺夫以及与他同流合污的钻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并窃据要职的其他人民敌人都是我亲自揭露的。我要逮捕柳什科夫，但扑了一个空，他逃到国外去了。

我清洗了 14000 名肃反工作人员。但是我最大的过错是清洗得少了。我当时的处境险恶。当我责成这个或那个部门的主管人审讯被捕人员时自己就在想：“今天你审讯他，明天我就逮捕你”。我周围都是人民的敌人即我的敌人。我到处清洗肃反工作人员。惟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北高加索没有搞清洗。我认为这些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是诚实的，但实际的结果却是：破坏分子、坏分子、间谍和形形色色的人民敌人都藏身在我的羽翼之下。

我和弗里诺夫斯基的关系。我一直认为他“直爽”。我不止一次为工作问题和他发生冲突。我骂他，当面叫他笨蛋，因为只要一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就立即跑到我跟前大叫，说这都是“捏造”，抓错了，如此等等。弗里诺夫斯基替他们说话，所以我在预审时的供词中把他和已被捕的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联系起来。当克里姆林宫对弗里诺夫斯基已彻底不信任时，我这才把他看清楚了，对此我立即向斯大林作了报告。

弗里诺夫斯基在预审中的供词从头到尾都怀有敌意。我不怀疑他是亚戈达的同伙，也不怀疑他参与反苏密谋活动。说明他参与这

一密谋的有以下事实：亚戈达及其走狗把每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案件都称作是“捏造”，他们正是以所谓“捏造”为幌子高喊太平无事和阶级斗争熄灭的。我出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后，立即注意到这种太平无事并且集中全力来消灭这种状况。亚戈达分子弗里诺夫斯基正是通过这种“捏造”暴露出来了，所以我才对他政治上不信任。我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关系。我好像是从1934年起就认识叶夫多基莫夫的。我把他看做是党的人，是经过审查的。我经常去他的住所，他也经常到我的别墅来。如果我参与了密谋活动，那我作为密谋活动的参加者自然应该不让密谋败露。但有文件说明我竭尽全力参与揭露密谋活动。根据我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供的情报叶夫多基莫夫被撤了职……

根据我在预审时所作的供词，弗里诺夫斯基和叶夫多基莫夫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看起来比其他被我亲自揭发的人实际上更像我的同伙。但在这些人中有的我信任的，我认为他们是诚实的，如沙皮罗夫（现在我仍然认为他是诚实的）、采萨尔斯基、帕索夫、茹尔边科和费奥多罗夫等。对其余人我一直不信任。我专门向中央委员会写过一份关于尼古拉耶夫的报告，指出他是卖身投靠的家伙，应该治一治他。

我从未参与反苏密谋活动。如果我认真地读完密谋参加者的所有供词，那就会明白，他们不仅诽谤我，而且还诽谤中央委员会和政府。

弗里诺夫斯基供认，汞中毒一事是根据我的指示干的，在预审时我被迫证实了这一口供。我进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不久就感到身体不适。过了一些时候我的牙开始脱落，感到身体不舒服。大夫给我作检查时，说是得了流感。有一回布拉贡拉沃夫提醒我，要我在人民委员会用餐时多加小心，因为可能有人在那儿放毒。当时我没把这话当回事。又过了一段时间扎科夫斯基来找我，

一看见我就说：“你大概中毒了，你的气色很不好”。我和弗里诺夫斯基就这件事交换过意见，他责成尼古拉耶夫立即对我的工作室的空气进行检测。经过检测弄清楚了：空气中发现汞气，我正是因汞气中毒。可以再提个问题：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而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有谁愿意这么干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呢。这一切都是谎言。

有人指控我道德生活腐化。但有什么事实呢？我25年来在党内担任要职。在这25年中大家有目共睹，我的谦逊和诚实受到人们的爱戴。我不否认我酗酒，但我干起活来像头老黄牛。说我腐化有什么根据？

我懂得并且要老老实实说出来，因为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只有承认对我提出的指控，向党忏悔并请求党免我一死。党也许会考虑我的功劳给我留下一条命。但党绝对不需要谎言，因此我再次向您声明，我不是波兰间谍，对此我也不想认罪，因为如果我承认自己是波兰间谍，就无异于是给波兰地主送上一份礼，同样，如果我承认我为英国和日本进行间谍活动，就无异于给英国贵族和日本军阀送上一份礼。我不愿给这些老爷送这样的礼物。

当我在预审时交代我从事过恐怖活动时，我十分痛心。肯定地说，我不是恐怖分子。此外，如果我想对某个政府成员搞恐怖活动，那我也用不着为此招兵买马，而只要利用技术设备，在任何时候都能干出这种卑鄙勾当。

我在预审时就恐怖活动作的口供和书面供词都是“捏造”。

我的陈述快完了。我请求军事法庭满足我的下述请求：

1. 我的命运已经很清楚。我的性命当然保不住了，因为在预审时我自己也促成了这个结局。

我只有点请求，请从容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

2. 无论是法院还是中央委员会都不相信我无罪。

如果我的母亲还活着，请保障她的老年生活并养育我的女儿。

3. 我请求不要迫害我的亲属侄子们，因为他们完全是无辜的。

4. 我请求法院仔细地分析茹尔边科一案，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是个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的老实人。

5. 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这是对我的诚实和谦逊有所了解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清楚的。

请转告斯大林，我的事纯粹是各种情况的偶合而造成的，也不排除是由于那些未被我揭露的敌人插手造成的。

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

【专题说明】

苏德秘密协定与战前苏德关系（一）

（1939年8月至1940年11月）

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侵略和扩张行径引起了西方国家和苏联的极大不安。苏联与英法早在30年代初希特勒上台后就开展了关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谈判（1934~1935年缔结东方公约、苏法和苏捷签订条约）。后英法于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而破坏了上述谈判。1939年4月重新开始同苏联进行关于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谈判。由于相互间缺乏信任，于7月初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德国急于发动侵波战争，英法苏遂在政治谈判中未获结果的情况下，于8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军事谈判。此时，希特勒急于进攻波兰，又担心受到东、西方来自苏联和英、法的一面挟击，便向莫斯科伸出了橄榄枝——要求与苏联改善政治关系，条件是满足苏联的利益要求。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的安全——制止德国向东方进攻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从而决定了英法苏谈判的失败。经过闪电式的外交谈判，里宾特洛甫访苏取得成功。苏德签订了贸易信贷协定、互不侵犯条约和一系列划分双方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希特勒旋即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并且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举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波兰陷落后，苏德关系进一步发展，再次经过外交谈判确定了

双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和合作的基础。到1940年下半年，希特勒认为对英国的战争已经胜利在即，便开始考虑战后的世界秩序和利益划分问题。考虑到苏联的实力地位，希特勒提出要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由此四大国瓜分已经破落的大不列颠帝国在全世界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对此表示欣赏，并派莫洛托夫赴柏林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各怀鬼胎，相互猜疑，所以在苏芬战争、波罗的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立场不一，观点对立，外交谈判没有任何成果。尽管会谈公报声称取得了谅解和信任，但实际上双方都明白在很多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德国与苏联之间是难以协调的。于是，莫洛托夫走后，希特勒便开始考虑他的“巴巴罗莎”计划了。

本专题选编的52份档案文献，包括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往来电报、苏德两国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记录、苏德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和秘密协定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苏德之间复杂的外交关系。这些档案基本上印证了过去西方文献所反映的许多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希特勒，特别是斯大林，对本国安全和世界秩序的战略考虑。

为了将苏联在外交谈判时的立场与公开声明中的说法作一比较，我们收入了少量当时苏联报刊上发表的消息和讲话。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赵国顺编辑和校注，
王英杰、乔立良翻译)

№05763

舒伦堡关于递交柏林声明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

（1939年8月15日）

舒伦堡^①为今天执意要求莫洛托夫接见表示歉意。但他的执意是由于他接到了柏林的训令以及他想说的问题的性质造成的。

舒伦堡说，他从阿斯塔霍夫^②和里宾特洛甫^③的谈话中得知，苏联政府对谈判感兴趣，但认为继续在柏林谈判不合适。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我们认为阿斯塔霍夫同志经验还不十分丰富，所以我们认为谈判应在这里进行。

舒伦堡说，他收到的柏林训令，并委托他口头转达，但他想宣读它（附训令全文^④）。舒伦堡受里宾特洛甫委托，请求把他宣读的训令报告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由于舒伦堡的声明很重要，待把这一声明报告苏联政府之后他对此再作回答。不过，他现在就可对德国政府在这一声明中所表示的愿同苏联改善相互关系的愿望表示欢迎。至于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一事，为了使交换意见取得成果，莫洛托夫认为，必须进行有关准备。莫洛托夫强调说，他所说的只是对这一建议的初步意见。

然后，莫洛托夫同志告诉舒伦堡，早在6月底，我国驻意大利代办就把他同齐亚诺^⑤谈话的消息电告了我们。在同我国代办谈

① 舒伦堡，时任德国驻苏联大使。

② 阿斯塔霍夫，时任苏联驻德国大使馆参赞。

③ 里宾特洛甫，时任德国外交部长。

④ 参见本专题文件№05764。

⑤ 齐亚诺（1903~1944），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

话中，齐亚诺顺便提到在柏林存在一个“舒伦堡计划”，齐亚诺说，该计划主要是想改善苏德关系。“舒伦堡计划”仿佛要：（1）德国协助调解苏联和日本的相互关系并协助消除同日本的边界冲突；（2）签订互不侵犯公约和共同保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3）同苏联签订广泛的经济协定。莫洛托夫同志问舒伦堡，罗马方面的这一消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舒伦堡一开始满脸通红，然后说，齐亚诺这些消息是从罗素那里得来的，舒伦堡同他谈话时仅仅粗略地涉及到苏德关系改善问题。谈话并未涉及共同保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谈话未涉及细节，这个计划仅仅是叙述罗素的设想。莫洛托夫同志说，他从上述“舒伦堡计划”所提建议里没看到任何不可思议的东西，况且，商贸信贷协议看来就要达成了，正计划改善德苏政治关系，这从今天大使的声明里也可看出。舒伦堡说，他和罗素关于波罗的海和苏日关系可能改善的谈话内容都反映在今天他读过的训令里。舒伦堡补充说，他最近的建议更具体。

莫洛托夫同志对舒伦堡说，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清楚，德国在最近之前还不想同苏联改善相互关系。如果现在我们看到德国想改善相互关系，那我们自然欢迎这种愿望并对此持积极态度。莫洛托夫同志补充说，他正是这样看待今天大使的声明的。关于“舒伦堡计划”，莫洛托夫同志继续说，他提起它，是因为它同今天大使的声明属于同一类问题。

舒伦堡问，能否把莫洛托夫同志所引用的“计划”中的各点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现在谈话应该采取更为具体的形式。我们期待苏德经济谈判有一个良好的结局。至于苏日关系，莫洛托夫同志问，德国能否对此事施加影响或届时适宜地提出问题。舒伦堡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尽管训令里什么也没谈，但里宾特洛甫给阿斯塔霍夫同志指出过，对日本他有自己的观点，

并且当时里宾特洛甫给大使讲，他有能力“对日本立场施加不小的影响”。

莫洛托夫同志问舒伦堡，德国政府对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有没有确定意见。舒伦堡回答说，还未同里宾特洛甫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政府还未采取肯定的和否定的立场。莫洛托夫同志声明说，由于里宾特洛甫和舒伦堡谈到了苏德现行协议的“说明”和补充问题，弄清德国政府关于互不侵犯条约或类似条约的意见是重要的。

舒伦堡问，是否应把莫洛托夫同志所提各点看做是里宾特洛甫前来的前提条件。莫洛托夫同志声明说，他将专门召见舒伦堡回答他今日的声明。在里宾特洛甫到来之前，按照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必须对某些问题做准备以便能通过决定，而不只是进行谈判。今天德国的声明里指出，其一，时间不等人，在飞速前进；其二，但愿事件不要赶在我们前面，使我们成为马后炮。所以说，假若德国政府对互不侵犯条约的思想或类似思想抱积极态度，假若类似的思想也包括今天舒伦堡的声明，那么就应该谈得更具体些。

舒伦堡通知说，他将把今天谈话的内容电告柏林，其中要强调指出苏联政府对莫洛托夫同志所说各点的特别兴趣。

结束时舒伦堡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尽快答复他今天的声明。

谈话持续了1小时40分钟，其中40分钟记录舒伦堡声明（训令），因为大使不愿把声明文件给别人看。

谈话记录 B. 巴甫洛夫

№05764

舒伦堡面交莫洛托夫的柏林声明

(1939年8月15日)

1. 以往时期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和苏联在世界观上的矛盾，其惟一的原因在于德国和苏联站在了相互对立和敌视的立场上。从近来的发展可以看出，似乎不同世界观并不排除这两个国家间可有理智的关系和恢复友好合作的可能性。这样，两国对外政策的矛盾时期即可永久地消失了，通往两国新的未来的道路完全打开了。

2. 在德国和苏联的利益中没有现实的矛盾。德国和苏联的生活空间毗邻相连，但各自在自然的需求上，两国之间并无竞争。所以说，两国之间自一开始就不存在任何理由一国要反对另一国，进行侵略。德国对苏联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国政府坚持这种观点，认为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没有哪一个问题不能取得使两国满意的解决。这里包括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波兰、东南部等问题。此外，两国政治合作也是非常有利的。正是这种合作关系到德国和苏联的国民经济，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互补性。

3. 毫无疑问，德苏政治正处在历史转折关头。柏林和莫斯科最近将要做出的政治决定对于未来几代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关系的发展都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决定将决定他们是被迫拿起武器去互相残杀还是能够建立相互友好关系。在以往年代，在这两个国家人民是朋友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生活得很好，当他们成为敌人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生活得不好。

4. 的确，德国和苏联由于近年来存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敌视，

目前相互之间还不信任。必须清除所积留下来的众多污垢。但是需要肯定，在此期间德国人民对俄国人民的真情实意从未消失过。在此基础上，两国的政治可以开始新的创造性的工作。

5. 根据自己的经验，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西方民主不仅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而且是苏联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现在它们企图重新通过签订军事同盟把苏联拉入同德国的战争。1914年这一政策给俄国带来了很不好的后果。两国利益要求应永远避免有利于西方民主的德苏磨擦。

6. 英国政策所造成的德波关系紧张，以及英国掀起的军事叫嚣和由此而出现的成立同盟的企图，都迫使德苏关系必须在短期内明朗起来。否则，没有德国的影响，事情可能走向反面，使两国政府失去恢复德苏友好的可能性，不能在拥有相应章程的情况下共同使东欧领土问题明确起来。所以，两国领导不应该听任事情自行发展，而应及时采取措施。如果双方由于不能承认对方国的观点和意图，两国人民彻底分道扬镳，那将是很不幸的。

按照给我们的通知，苏联政府还有进一步明确德苏关系的愿望。

以往经验表明，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做到使这种关系明朗化很慢，所以德国外长约·里宾特洛甫准备近期来莫斯科，以元首的名义向斯大林先生陈述元首的观点。根据约·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意见，通过直接交换意见可以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不能排除有为彻底理顺德苏关系奠定好基础的可能性。

No05765

舒伦堡关于促成同里宾特洛甫会面与 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

(1939年8月17日)

舒伦堡说，他已收到柏林答复。看来柏林工作迅速，他补充说。受德国政府委托，他想宣读答复。舒伦堡同时强调说，莫洛托夫同志8月15日陈述的几点符合德国的愿望。

然后舒伦堡宣读了他所收到的德国政府的答复（见附件^①）。

在这里，舒伦堡以个人名义作了说明，他说，之所以把共同保障波罗的海国家这一点写进答复，是因为德国政府觉得苏联政府盼望这一点。我们，舒伦堡补充说，不大明白莫洛托夫同志的意思，他在8月15日谈话中是重复罗素说的计划呢，还是以此表达苏联政府本身的愿望。德国政府这样做，是想迎合苏联政府的愿望。莫洛托夫同志声明说，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对谈到关注出现严重事件的地方，舒伦堡解释说，德国不能容忍波兰的挑衅行为。

作为对所读训令的补充，舒伦堡遵照对他的私下指示，请求莫洛托夫同志本周或下周即开始同里宾特洛甫谈判。为完成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舒伦堡请求尽快给予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对8月15日德国的提议他已有答复，现在可以给舒伦堡以书面答复^②。我应提醒一句，莫洛托夫同志补充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No05766。

② 参见本专题文件No05767。

说，斯大林同志知道此事，答复是经他同意的。斯大林同志同意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递交。在对宣读的苏联政府答复进行解释时，莫洛托夫同志强调，答复中说的是首先开始关于改善政治关系的谈判，应该完成信贷贸易协议谈判。这是在改善相互关系道路上应该迈出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或批准 1926 年条约，显然，此处指的是舒伦堡在谈到恢复一些条约时所强调的那个条约；或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谈判双方感兴趣的对外政策问题协定。

在转向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话题时，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对德国政府提出这一问题表示赞赏，它以派著名政治家来莫斯科的建议强调了自己意图的严肃性。这同只派二等官员斯特林来莫斯科的英国人不同。不过在里宾特洛甫到来之前应做相应准备，而且我们不愿看到事先就传闻四起。

莫洛托夫同志问舒伦堡，能否做到没有传闻，只为改善相互关系做工作。然后莫洛托夫同志又问，舒伦堡如何评价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前途。舒伦堡回答说，关于信贷贸易谈判，他的印象是，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达成协议的。关于第二步，舒伦堡要电告柏林，请求拿出条约草案。但舒伦堡已看到补充协定的困难。

对此，莫洛托夫同志声明说，应该有互不侵犯条约草案或者批准旧的中立条约。应该根据德国政府的选择，不完成这个就完成另一个。最好是收到条约方案，那时就可转入协定问题了。

舒伦堡说，签订新的互不侵犯条约也好，批准旧的中立条约也好，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事情的重心，他认为，在于协定书，所以希望收到苏联政府的协定方案，哪怕是草稿也好。协定书有重要的意义，舒伦堡说，因为在拟定协定书时要涉及诸如保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莫洛托夫同志说，他没有德国政府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答复，该问题以前德国政府根本就没提出来。应该讨论今天的答复。对协定书问题暂时还未作详细研究。在拟定它

的时候，顺便说一句，无论是德国方面还是苏联方面，都将涉及8月15日德国声明中提出的问题。拟定协定书的倡议不仅应该来自苏联方面，还应该来自德国方面。自然，8月15日德国声明中涉及的问题不能写入条约里，应把这些问题写入协定书里。德国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应该考虑到，条约将包括4~5条，而不是像舒伦堡想的只有1条。舒伦堡说，他不怀疑德国政府准备拿出条约草案。外交部法律处处长完全胜任像拟定条约草案这种任务。但是他在拟定协定书时，显然要碰到困难，所以，为了工作进展顺利，希望对协定书的内容预先有个初步安排。比如，波罗的海国家保障问题将被公开。也许，在协定书里，应该反映8月15日声明的内容？其中讲到德国将考虑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利益。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协定书的内容应是讨论的对象。贸易协议已接近达成，应该准备互不侵犯条约草案或批准1926年的条约，在讨论这个条约的时候应该涉及关于协定书内容的具体问题。

舒伦堡承诺向柏林要条约草案。至于协定书，他将请求在8月15日德国声明的基础上拟定。其中要提出关于在波罗的海地区考虑德国利益的总的原则。

B. 巴甫洛夫 记录

№05766

舒伦堡面交莫洛托夫的德国备忘录

（1939年8月17日）

1.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先生在最近一次谈话中所陈述的各点符合德国政府的愿望，即德国准备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如果苏联政府同意，在没有宣布条约作废的情况下，条约期限可达25年。其次，德国政府准备同苏联共同保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最后，德国按照它所采取的确立立场，宣布准备利用自己的影响来改善和加强苏日关系。

2. 元首的观点是，关注当前形势和随时出现严重事件的可能性（德国不准备继续忍耐波兰的挑衅行为），希望彻底和尽快弄清德苏关系和双方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立场。因此，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表示，从8月18日开始准备随时飞往莫斯科，并以元首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苏德关系谈判，并在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签署相应条约。

№05767

莫洛托夫面交舒伦堡的苏联备忘录

(1939年8月17日)

苏联政府研究了舒伦堡先生今年8月15日递交的德国政府关于希望认真改善德苏政治关系的声明。

考虑到德国政府一些代表在正式声明中经常带有对苏不友好甚至敌视的性质，考虑到德国政府不断寻找借口同苏联冲突，直到不久前，苏联政府还正在为对付这种冲突做准备，认为由于这种冲突不可避免必须增加自己的军备。我们十分清楚，德国政府利用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企图建立，并实际上已经建立起许多国家的反苏统一战线，并努力拉日本也加入这一战线。

显然，德国政府的这种政策迫使苏联采取认真措施以准备反击德国对苏联可能的侵略，也就是说，参加许多国家反对这种侵略的防御战线的组织工作。

但是，如果德国政府现在改变自己的政策，向认真改善同苏联的政治关系方向转变，那么苏联政府对这种转变只能表示欢迎，并准备本着认真改善对德关系的精神改变自己的政策。

如果再考虑到苏联政府从来没有，也不想有任何反对德国的侵略意图，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和平解决苏德关系领域里的争端是完全可能的，不同政治制度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贯原则，那么就得出结论，对于建立新的得到改善的两国政治关系不仅有现实的基础，而且对于实现这方面的实际步骤也存在条件。

苏联政府认为，签订信贷贸易协议应是改善苏德关系的第一步。

苏联政府认为，不久之后的第二步可以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批准 1926 年的中立条约，同时通过一个谈判双方都感兴趣的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专门协定，并把其作为条约的组成部分。

No05768

舒伦堡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内容与 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

(1939年8月19日)

14时。舒伦堡再次为今天他执意要求接见表示歉意。莫洛托夫同志说，如果事情紧急，就不该拖延。舒伦堡提醒说，里宾特洛甫通知他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希特勒的观点。

舒伦堡说，从莫洛托夫同志最近的声明里德国政府看到了苏联政府对舒伦堡所提问题的积极态度。在正常条件下，这些问题能够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得到调解。但现在的形势并非寻常，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意见，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调解问题。柏林担心德国和波兰之间发生冲突。下一步事态不取决于德国。现在形势非常紧张，不大的事件是可以引起严重的后果。里宾特洛甫认为，在产生冲突之前，必须明确德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在冲突期间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第一步——签订贸易信贷协议，舒伦堡认为已经完成。共同保障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问题，互不侵犯条约和对日本施加影响问题业已明确。所以，里宾特洛甫认为他的到来有重要意义，认为需要立即着手第二阶段的工作。里宾特洛甫有希特勒的无限授权，可以签订所有苏联政府所盼望的协议。

互不侵犯条约问题非常清楚，而且简单。德国政府认为，它应该由以下两点组成：

(1) 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承担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战争或其他武力方式的义务。

（2）此条约立即生效，如未宣布作废则有效期为 25 年。

莫洛托夫同志问，难道整个条约只包括这两条吗？他指出，在拟定条约草案时有许多样板条约可以利用。应该考虑，苏德之间的一些条约能否被利用。舒伦堡回答说，他丝毫没有反对利用这些条约的意思。希特勒准备考虑苏联所盼望的一切。向苏联政府所提出的条约符合德国和拉脱维亚之间的类似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补充说，我们同波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有互不侵犯条约。我们想知道，德国政府是否反对将其中的一个条约作为拟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如果德国政府方面没有反对意见，那么就请它指出，在这些条约中，哪个是它可以接受的。

舒伦堡再次坚持要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希特勒对此赋予了重要意义。里宾特洛甫可以签署协定书，其中不仅可以把已提出的问题包括进去，也可把新出现的问题包括进去。时不我待——舒伦堡补充说。

莫洛托夫同志答应把舒伦堡所说的全部意见提交苏联政府讨论。莫洛托夫同志强调说，我们认为，正如他上次给舒伦堡说的，里宾特洛甫的来访有积极的意义。但里宾特洛甫到来之前，对此决定或多或少应有所准备。我们认为不应局限于外交途径，我们理解其意义并高度评价里宾特洛甫的到来。我们已经指出过做准备的阶段。第一步已接近完成。第二步很快即可开始。

莫洛托夫同志接着问，德国政府想签订新条约，不想批准 1926 年的条约，他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舒伦堡回答说，从电报中可以得出这种结论。他个人有这样的意见，德国政府坚持签订新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想知道，在苏联同波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订的条约中，德国政府可以选择哪个作为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协定书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应成为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些问题应该写进协定书，德国政府应该考虑这

个问题。对此我们也在考虑。苏联政府在考虑德国政府的意见，我们讨论的问题不能拖很久。但里宾特洛甫到来之前应该有一定把握，保证谈判能取得一定成果。何况我们还没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未签署信贷贸易协议。

舒伦堡再次坚持里宾特洛甫前来，以便在爆发冲突前取得一定成果。他相信在拟定协定时也不会遇到困难，他说。

莫洛托夫同志问，能否这样解释德国政府加快目前谈判的愿望，即德国政府对德波关系，其中包括但泽问题感兴趣。舒伦堡作了肯定回答，而且补充说，正是这些问题是事件到来前愿意考虑苏联利益的出发点。舒伦堡认为，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准备已经结束，他强调指出，他们准备迎合苏联政府的所有愿望。

莫洛托夫同志为强调我们对待这些问题的严肃性，声明说，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们决不食言，同时希望德国方面也这样做。至于信贷经济协议以及政治谈判，我们不是这些问题的阻力。莫洛托夫同志再次重复对于里宾特洛甫来访问题的观点。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表述于苏联政府的答复中。第一步完成之后可以走第二步，但第一步尚未完成。应该公布，协议已制定出来，但还未签字。舒伦堡又一次说，柏林很着急，应结束谈话。

14时30分。莫洛托夫同志说，他已向政府报告了今天谈话的内容，为了工作方便，他提供一份条约的草案文本^①。在读完条约之后，莫洛托夫同志通知说，在贸易贷款协议公布之后，里宾特洛甫可于8月26~27日来莫斯科。

B. 巴甫洛夫 记录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05769。

№05769

莫洛托夫面交舒伦堡的苏德条约草案文本

（1939年8月19日）

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

本着加强两国人民之间和平事业的愿望，从苏联和德国之间1926年4月所订中立条约的基本原则出发，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签约双方保证相互之间，不单独也不与其他国家一起对对方使用任何武力和实施任何侵略行动。

第二条

如果签约一方成为第三国实施武力或进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签约另一方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该国的类似行动。

第三条

在签约双方之间在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上发生争端或冲突的情况下，双方保证只通过和平途径采取互相协商的方式或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成立相应协商委员会的途径，解决这些争端和冲突。

第四条

本条约所订期限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签约双方中没有一方宣布其作废，那么条约的有效期限则自动延长5年。

第五条

本条约应在最短期限内得到批准，然后生效。

附 则

本条约只有在签约双方感兴趣的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特别协定书同时签署的条件下才有效。协定书是条约的有机部分。

No05770

苏德贸易信贷协议

（1939年8月19日）

苏联政府代表和德国政府代表就苏联在德国的补充订货问题举行了谈判并达成以下协议。

（一）

1. 苏联政府将指示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处或苏联进口机构向德国公司提出总金额为2亿德国马克的补充订货。

2. 补充订货都是用于投资目的的物品，即：

工厂设备，

装置，

设施，

机械和车床，

器械制造设备，

石油工业设备，

化工设备，

电工器材工业制品，

船只、车辆和运输器材，

测量仪器，

实验室设备。

3. 同时还包括为这些供货提供普通备件。然后还要执行有关

技术援助和设备投产运行合同，这些合同将根据本协议提出的订货而签订。

4. 每一批单独订货的价值不应少于5万德国马克。

5. 补充订货不属于所谓的日常供货范围，后者主要是指：

原材料，

半成品，

备件（以上第3款提到的备件除外），

化学制品，

消费品，

日用品。

6. 在分配订货时，商务代表处和进口机构有选择公司的自由。德国公司亦有是否在本协议基础上接受订货和接受多少的自由。

7. 订货将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两年时间里根据第一个清单^①进行分配。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至第一年年终，订货价值总额不超过1.2亿德国马克。

8. 订货分配由苏联商务代表处实施或在商务代表处承担共同责任的条件下由进口机构实施。

9. 德国政府保证在订货分配时（如果需要，包括落实每次订货任务）给苏联商务代表处和进口机构以必要的帮助，其中包括按期供货和保障货物质量。

10. 根据本协议所分配的订货的供应条件应该是正常的，价格应该是公道的。

11. 苏德之间1938年12月19日签订的贸易和支付额协定第7条也适用于按照本协议分配的订货。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No05771。

（二）

德国政府宣布，德国黄金贴现银行根据以下条件为德国政府承担总额为 2 亿德国马克的补充订货贷款。

1. 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处把票据寄存在德国黄金贴现银行。票据平均期限为 7 年，分别按每次订货填写。票据作以下分配：

30% 的订货金额——6.5 年，

40% 的订货金额——7 年，

30% 的订货金额——7.5 年。

票据由苏联进口机构填写，由苏联商务代表处承兑。票据用德国马克开出并在柏林支付。

2. 德国黄金贴现银行根据上述票据向苏联商务代表处和进口机构提供贷款，用于向德国公司支付德国马克现金。该银行不要求德国供货公司为贷款承担任何责任。

3. 票据年息 5%。商务代表处每三个月用其在德国黄金贴现银行的往来账户向该银行支付一次这种利息。该银行所要收取的这种利息应以票据来保证。

4. 苏联驻德国的商务代表处有权提前按照本条第 1 和第 3 款之规定赎买在德国黄金贴现银行寄存的票据，利息支付仅以过去的时间计算。

（三）

支付手续合同由德国黄金贴现银行和苏联商务代表处依据本协议第二条签订。

(四)

订货的分配根据总的供货条件，依照商务代表处和德国经济俄罗斯委员会双方于1935年3月20日签订的仲裁审理协定和最后协定中所确定的原则，以及双方相应机关对其所作修改，通过特殊的信件交换方式来落实。

(五)

1. 苏联政府保证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两年内把第三清单^①中所规定的价值数额的货物提供给德国。其价格应与货物相称。

2. 苏联货物的提供和支付根据1938年12月19日苏德贸易和支付额协定规定的条件实施。

3. 如果1938年12月19日协定在本协议有效期间终止或作了修改，在没有其他协议的情况下，1938年12月19日协定仍将相应有效，一直到所有票据和贷款利息偿还和苏联货物支付款开始使用，其中包括用于所有票据债务和以前债务的支付。

4. 此处特别涉及1938年12月19日该协定的第7条和第8条。

5. 德国政府保证为苏联货物及时提供输入德国的许可证，其输入总金额应足以偿还本协议所规定的贷款和确定期限的贷款利息，以及支付苏联欠德国的所有其他票据债务。为此，双方政府应及时开始谈判，拟定这些货物的年度清单，这些货物向德国进口一方面要考虑德国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苏联出口的能力和利益。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No05773。

6. 此外，德国政府还保证在订货分配和按第二清单^① 供货（用苏联货物在德国销售进款的闲置金额支付）方面给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处和苏联进口机构以帮助。

（六）

德国提供的货物，至少 60% 由德国船只运输，如果按苏德间海运章程衡量运费是可接受的和正常的。其余德国供货由苏联船只运输，条件是使用德国的海港。

（七）

1. 在订货分配和按本协议规定期限完成订货任务以及在其他货物（无论是贷款货物还是用苏联出口所得现行收入购买的货物）交付方面出现障碍的情况下，双方政府应立即进行谈判消除出现的困难。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苏联政府必须按照本协议第五条之规定，继续采取措施按第三清单向德国供货，直到达到本条第 3 款规定的比例关系时为止。

2. 在按照本协议第五条之规定苏联交付货物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也如上一款相应处理。双方政府应立即进行谈判消除出现的困难。如果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德国政府必须按照本协议第一条之规定，保障贷款定货的分配和如期完成订货，直到达到本条下一款所规定的比例关系时为止。

3. 如果出现了本条所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政府仍必须保证在最短期限里使按照第一清单和第二清单所进行的订货同

^① 参见本专题文件 No05772。

按照第三清单所进行的苏联供货交易之间达到符合这些清单总金额的比例关系。同时双方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按规定条件完成这些订货和交易。

(八)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俄文和德文各一份。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E. 巴巴林
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K. 施努列博士
1939年8月19日于柏林

№05771

德国公司应提供的用苏德信贷协议贷款 支付的各类设备（第一清单）

（1939年8月19日）

货物名称和金额：

1. 车轮半轮车削机机床，铁路专用车，直径 2500MM 的重型立式车床，455MM 以上中心高度的留心镗，刨宽 200MM 以上（含）的刨床，削缘刨床，镗孔直径 100MM 以上的镗床，重 1 万公斤以上的磨床，最小镗刀直径为 155 毫米的镗床，最小卡盘直径为 1500MM 的卡盘车床，重 5000 公斤以上的拉床，最小行程 300MM 的拖床，钻孔直径 100MM 以上的深钻床，钻头直径 80MM 的大型摇臂钻床。

加工棒料直径在 60MM 以上的自动机床、半自动机床、多功能切削机床，加工棒料直径在 60MM 以上的多刀车床，加工齿轮直径在 1500MM 以上的切齿机，大型液压机，磨擦冲床，曲柄式压力机，拉力实验机，包边机，5 吨以上的锻锤。

机械设备：轧辊，剪床，弯曲机，铁丝网编织机，切割机等。
总计 12500 万德国马克。

2. 各种吊车：桥式，锻造用的，旋转式，浮动式等。

总计 550 万德国马克。

3. 线材、板材和薄板轧机。

总计 500 万德国马克。

4. 空气、氢气和煤气管压缩机。

总计 510 万德国马克。

5. 林德装置，硫酸、火药和其他化工厂各种专门装置。

从煤里提取液态燃料的非舍尔系统装置、温克勒尔发生器和制取液态氮的高压塔。

注：从煤里提取液态燃料的非舍尔系统装置、温克勒尔发生器和制取液态氮的高压装置从 1942 年年中开始供货。

总计 1300 万德国马克。

6. 各种电气设备：防爆马达，油开关，变压器。

总计 330 万德国马克。

7. 煤炭工业设备：风镐、装载机，运输机械。

总计 50 万德国马克。

8. 100~200 马力的拖船，修理船，20 艘拖网渔船。

总计 300 万德国马克。

9. 2500~12000 千瓦的工作涡轮机，600~1200 马力柴油发动机。

总计 200 万德国马克。

10. 350~750 马力的锅驼机。

总计 280 万德国马克。

11. 检查测量仪器。

总计 410 万德国马克。

12. 光学仪器。

总计 230 万德国马克。

13. 某些军事装备。

总计 2810 万德国马克。

合计共 2 亿德国马克。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E. 巴巴林

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K. 施努列博士

№05772

德国公司应提供的以苏联出口即行收入的
自由资金支付的设备和物品（第二清单）

（1939年8月19日）

货物名称和金额：

1. 床身以上中心高度达450MM的机床，机械镗床，六角车床，生产车床，铣床，螺纹车床，抛光床，推杆直径达60MM的杆式自动车床，推杆直径达60MM的多轴自动车床，专用车床，线材加工机，切割机，液压式和机械式快速刨床和双立柱式刨床，钻孔和划线车床，摇臂铝床，多轴铝床，齿轮达1500MM的切齿机，偏心压力机，清除毛刺冲床、铆钉冲床，重5吨的空气锤和蒸汽锤。

总计4200万德国马克。

2. 从煤里提取液态燃料的非舍尔装置和硝酸、硫酸、火药等化工企业的各种专门装置。

总计1050万德国马克。

3. 硬铝板。

总计150万德国马克。

4. 金属和金属制品：除铁之外的重金属和轻金属半加工品，薄板，钢丝，冷轧带材，薄壁管，黄铜带材，优质钢。

总计1450万德国马克。

5. 化学制品，染料和化学半成品。

总计490万德国马克。

6. 武装装备物品。

总计 3000 万德国马克。

7. 各种制品，如印刷机械，内燃发动机，材料试验机，配件，气动力机械和气动泵，备料和建筑机械，造纸机械，纸加工机械，食品加工机械，纺织机械，制鞋和皮革加工机械，焊条，备件，测量仪器等。

总计 1660 万德国马克。

合计共 1.2 亿德国马克。

本清单中所指出的各类设备订货和其他订货可在信贷协议签字之后两年时间里分配。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E. 巴巴林
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K. 施努列博士

№05773

根据苏德信贷协议苏联所应
提供的货物（第三清单）

（1939年8月19日）

1. 农业：

饲料，2200 万马克

油饼，840 万马克

亚麻油，60 万马克

2. 林业：

木材，7400 万马克

3. 工业：

白金，200 万马克

锰矿石，380 万马克

汽油，120 万马克

粗柴油，210 万马克

润滑油，530 万马克

苯，100 万马克

石蜡，65 万马克

麻刀，375 万马克

排水管，125 万马克

皮棉，1230 万马克

棉花废料，250 万马克

纺纱破布，70 万马克

亚麻, 135 万马克
马毛, 170 万马克
加工的马毛, 30 万马克
软锰矿, 150 万马克
磷酸盐 (半浓缩), 1300 万马克
石棉, 100 万马克
化学制品、药品和草药, 160 万马克
树脂, 70 万马克
鱼鳔, 12 万马克
羽绒和羽毛, 248 万马克
鬃毛, 360 万马克
生皮, 560 万马克
做毛皮制品的兽皮, 310 万马克
皮毛, 90 万马克
生产火柴的白杨和山杨树, 150 万马克

合计共 1.8 亿马克

本清单规定的苏联供货应在两年时间里完成, 每年提供总金额 9000 万德国马克的货物, 根据可能, 供货应第一年完成一半, 第二年完成另一半。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E. 巴巴林
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K. 施努列博士

No05774

苏德关于贸易信贷协议的秘密协定书

（1939年8月19日）

根据今天苏德政府间签署的信贷协议，双方签字代表约定如下：

德国政府将把按规定支付的5%年息退还0.5%，这样，贷款的有效利率实为4.5%。这种退还在商务代表处和德国黄金贴现银行协商确定的偿还期限里实行。这样，在决算期限里，商务代表处所支付的利息的10%在支付期限里退还。该款项根据商务代表处的指示以德国马克汇入苏驻德商务代表处或苏联国家银行根据1938年12月19日贸易支付额协议所开设的其中一个特别账户上。

该进款可依据上述贸易支付额协议第4条之规定使用。

自然，上述1938年12月19日协议第4条第17款规定的从特别账户上支付利息的权力也适用于今日签署的苏德信贷协议贷款的利息支付。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E. 巴巴林

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K. 施努列博士

1939年8月19日于柏林

附 录

苏联报刊关于签订苏德信贷协议的报道

8月19日，在经过长期谈判之后，在柏林签署了苏德贸易信贷协议。

在协议上签字的苏方是商务代表处副主任 E. 巴巴林，德方是施努列先生。

贸易信贷协议规定，德国给苏联提供2亿德国马克的贷款，期限7年，利率5%，自协议签字之日起两年时间里，这些贷款用于购买德国货物。

协议还规定，苏联在同一期限，即在两年时间里，向德国提供总金额为1.8亿德国马克的货物。

《消息报》1939年8月21日

№05775

苏德关于贸易和信贷谈判的最后议定书

（1939年8月19日）

一、双方检查了自己的全权证书并认定其符合手续，签署了苏联和德国信贷协议并交换这一文件文本。

二、签署并面交了以下文件，它们是上述信贷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1) 德国供货第一清单，
- 2) 德国供货第二清单，
- 3) 苏联供货第三清单。
- 4) 秘密补偿协定书。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E. 巴巴林

德国政府全权代表 K. 施努列博士

№05776

施努列关于德国政府将协助完成 订货给巴巴林的信

(1939年8月19日)

尊敬的巴巴林先生：

今天信贷协议签字，您表示希望德国政府予以协助，以便顺利实施和完成苏联预计在德国的订货。

对此，我不胜荣幸地向您宣布，在分配和完成订货时，德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每次都给商务代表处和苏联进口机构以必要的帮助。

德国政府将继续协助苏联商务代表处和苏联进口机构的代表参观准备生产订货的企业，以便确定所订产品的质量。德国政府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保障苏联商务代表处和苏联进口机构的代表在下达定单和预先通知之后能够参观供货工厂，以便确认完成订货的形势和顺利程度，如果是特殊订货可进行必要的实验，实施必要的验收。

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在相应情况下应把同德国公司开始订货谈判的消息立即告诉德国国民经济部，以便德国国民经济部能够依照本信所说施加自己的影响。

顺致崇高的敬意！

K. 施努列博士

1939年8月19日于柏林

No05777

巴巴林关于立即通知开始订货谈判 给施努列的信

（1939年8月19日）

尊敬的 K. 施努列博士先生：

兹证明我收到了您今日的来信，其中称：

“今天信贷协议签字，您表示希望德国政府予以协助，以便顺利实施和完成苏联计划在德国的订货。

对此，我不胜荣幸地向您宣布，在分配和完成订货时，德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每次都给商务代表处和苏联进口机构以必要的帮助。

德国政府将继续协助苏联商务代表处和苏联进口机构的代表参观准备生产订货的企业，以便确定所订产品的质量。德国政府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保障苏联商务代表处和苏联进口机构的代表在下达定单和预先通知之后能够参观供货工厂，以便确认完成订货的形势和顺利程度，如果是特殊订货可进行必要的实验，实施必要的验收。”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将把同德国公司开始订货谈判的消息立即通知帝国经济部，以便帝国经济部能够依照本信所说施加自己的影响。

我声明我同意这封信的内容。

顺致敬意！

E. 巴巴林

1939年8月19日于柏林

No05779

希特勒关于接受互不侵犯条约草案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39年8月21日）

斯大林先生：

1. 我真诚地欢迎德苏贸易协议签字，它是改变德苏关系的第一步。

2. 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我来说意味着加强德国的政策，使之长久延续。这样，德国将回到数百年以来对我们两国有益的政策路线上来。所以德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决心要根据这一根本转折做出所应做出的一切结论。

3. 我接受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先生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但我认为必须尽快澄清与之有关的一些问题。

4. 我认为，苏联政府所期望的补充协定可在极短时间得到根本澄清，如果给德国一位重要国务活动家提供亲自在莫斯科进行这一谈判的机会。否则，德国政府不知道如何可能在短期限内澄清和拟定这一补充协定书。

5. 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不可忍受。波兰这样对待一个大国，以致随时都可爆发一场危机。无论如何，德国将从现在起采用一切手段反对这些无理要求以保护本国利益。

6. 我认为，由于两国都有在相互间建立一种新关系的愿望，因此最好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再次建议您在星期二（8月22

日)，最迟在星期三（8月23日），接见我的外交部长。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形势，外长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一天，至多两天，再长是不可能的。如能得到您的尽快答复，我将十分高兴。

阿道夫·希特勒

1939年8月21日

№05780

斯大林关于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 给希特勒的电报

（1939年8月21日）

德国总理阿·希特勒先生：

感谢来函。

我希望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将成为根本改善我们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点。

我们两国人民彼此之间需要和平关系。德国政府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将为我们两国间消除政治紧张局势和建立和平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苏联政府委托我通知您，它同意里宾特洛甫先生于8月23日来莫斯科。

约·斯大林

附 录

苏联报刊关于苏德关系改善的报道

在签订苏德贸易信贷协议之后，改善苏德政治关系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苏德政府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确定双方有缓和两国间政治紧张局势，消除战争威胁和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愿

望。因此近日德国外长约·里宾特洛甫先生将来莫斯科进行有关谈判。

《消息报》

1939年8月22日

No05782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苏德谈判消息 给法国外长乔·博内的电报

（1939年8月22日）

哈瓦斯通讯社得到苏联新闻局允许可发布以下消息：

“同德国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无论如何也不能中断或迟滞英法苏的谈判。此处指的是促进和平事业：一方面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另一方面要准备同侵略作斗争的途径和手段，如果发生侵略的话。”

如果这些术语表达得不清楚，我建议进行解释，解释时至少得用类似的精神，以最平静的心情进行。

被愚弄的党^①要求十分谨慎从事，所以我们不应做什么或说什么，就让德国宣传机器去宣布我们反对侵略的和平计划在东方破产了吧。

^① 这里指苏联共产党。

No05783

法外长博内关于敦促波兰保持沉默
给法驻波大使莱·诺埃尔的电报

(1939年8月22日)

由于宣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即将签字造成了新的前景，我觉得必须尝试对雷茨-斯米格韦^①元帅做出新的努力，以便排除（现在还来得及）惟一的同时也是妨碍在莫斯科缔结三方协议的障碍。

对抗苏德策略的惟一行动是波兰政府立即保证对签字保持沉默，以便让杜芒克^②将军以只有在俄国的帮助下波兰才有进行这场战争的可能性为由而采取强硬的立场。

即使（毫无疑问，波兰政府不会同意）这一做法不能奏效，那么至少让俄国承担起它对波兰的义务，如果它不执意拒绝的话。

相反，无论同苏联政府达成什么协议（这还要知道是否有波兰政府的肯定答复），都能使我们从精神实质上 and 字义上限制未来苏德条约的意义，至少提出该条约同苏联对法国和英国所承担的义务不相矛盾。

请您特别要坚持这一精神，以最坚决的态度强调，波兰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可放弃这最后一次拯救和平的尝试。

最后，你要正式提醒他^③，对波兰经常表示友好，并向它提供

① 雷茨-斯米格韦（1886-1947），时任波军队的总司令。

② 杜芒克，法国将军，其时正在莫斯科参加英法苏三方的军事谈判。

③ 指雷茨-斯米格韦。

了大量贷款、军事技术装备和各种援助的法国，今天有权要求它慎重考虑拒绝的严重性。

如果得到肯定答复，请立即电告纳吉亚尔。

№05784

迈斯基关于英国对里宾特洛甫访苏反应 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

(1939年8月22日)

21日深夜伦敦收到关于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进行互不侵犯谈判的消息后，在政界和政府各部门出现了不小波动。有两种感觉：吃惊，茫然若失；忿怒和担心。今天早晨，情绪已接近惊恐。傍晚平静下来，但仍有恐慌。其征兆是英国政府决定24日召开国会，要在一天内通过《王国保卫法》，该法曾在上次战争中实行，缔结和平条约之后被取消。该法授予政府保卫国家的特别权力。对于假定之中的苏德条约的态度一天之内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它被理解为三方谈判的结束和苏联转向绝对的中立立场，从而为德国提供在欧洲行动的自由。傍晚，下述见解占了上风：在形势中最终任何灾难性的变化也没发生，三方谈判可继续下去，三方条约签字的可能性一点儿也没减少。因为所有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中都有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签字国一方对第三国实施侵略时，这些条约可立即宣布作废。

今天有机会同不少人进行了会谈，其中有劳合·乔治^①、阿托尔斯卡亚公爵、格林伍德、丘吉尔，德格维尔（英国议会主义者小组的组织者），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的总的印象是：对英国人的震动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尽管可能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它的意

^①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英国首相。

义。劳合·乔治的心情很好：他看出苏联政府在同英法谈判中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忍耐性。

他以前曾等待我方的打击。工党分子的立场很脆弱。格林乌德完全被发生的事惊呆了，我不得不说不说些刺激的话回答他的抱怨和担心。议会在 24 日开会。据一些迹象看，可以预料，会议将在民族统一的招牌下进行。

全权代表^①

^① 即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伊·米·迈斯基。

№05785

法驻波大使诺埃尔关于同贝克会谈情况
给法外长博内的电报

(1939年8月23日)

接我上次的电报。

由于您的电报(№633~635)最后部分深夜我才收到,故而我今天上午10点才开始与贝克^①联系。

在他面前,我以整个形势所要求的坚定性坚持阁下提出的论据。

我坚持说,如果波兰放弃自己的不妥协立场,以保证莫斯科军事谈判^②进行下去,至少让里宾特洛甫之行获得部分失败,在这种前提下,德苏阴谋所造成的形势就会变得于我们有利,德国因此将遭受各种困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我还强调指出,如果波兰执意坚持不协调的立场,那么我将以最严肃的方式提出波兰的责任问题,波兰将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威胁,这里说的是它的生死存亡。贝克很吃惊,但未立即给予答复,而与我辞别去参加莫西齐茨基^③主持的仪式,他准备在那里同其他波兰领导人商量。12时15分,我同我的英国同事——他同我一起去办事——又来到贝克的办公室。

最后,我们得到了贝克的同意,但他只同意我第1242号电报

① 贝克,时任波兰外交部长。

② 指当时正在莫斯科进行的英法苏三方集体防御德国的军事谈判。

③ 莫西齐茨基(1867~1946),时任波兰总统。

中的提法。

不过我觉得，这一提法将使杜芒克将军有充分可能进行谈判。

其他问题贝克都拒绝了，首先推托波兰不想陷入困境——波兰怀疑苏联正想把它推入这种困境。

最后，部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不过他认为需要再重复一遍，波兰政府对俄国军队进入它的领土依然表示深恶痛绝。

№05786

贝克关于对波苏军事合作立场 给波兰外交代表机构的电报

(1939年8月23日)

考虑到由于里宾特洛甫去莫斯科造成的新形势，法国和英国大使通过外交行动表示，他们的政府希望重新开始军事谈判以限制德苏条约的作用和活动范围，从策略上讲，这是可以改变形势的。因此，他们再次请求我们“默认”在莫斯科的各军事代表团的表示：相信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不能排除波苏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我已声明，波兰政府不相信这些步骤会有结果，但是，为了改善法英代表团的处境，我们拟定了一定的措辞，同时我再次重申了我们秘而不宣的关于部队通过的保留条件。

措辞打算这样表达：“法英司令部相信，在采取共同行动反对侵略的情况下，不能排除苏联和波兰之间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因此，两司令部认为，需要同苏联司令部一起拟定相应的计划”。

利用这一机会，我再次明确表示：我不反对这一措辞仅仅是为了策略，我们对待苏联的根本观点是认真的，是不会变的。我再次提出，不同我们打招呼，苏联讨论我们同法英的关系是不礼貌的。

№05756

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的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23日）

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本着加强苏联和德国之间和平事业的愿望并根据1926年4月苏联和德国之间所签署的中立条约的基本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签约双方保证，彼此之间不对对方，也不伙同其他国家对方使用任何武力、实施任何侵略和进攻。

第二条

如果签约双方中的一方成为第三国军事行动的目标，则另一方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这个国家。

第三条

签约双方政府未来保持接触，彼此协商，就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交换情报。

第四条

签约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第五条

在签约双方之间发生争端或冲突的情况下，双方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友好交换意见或在必要时以成立冲突调解委员会的办法解决这些争端或冲突。

第六条

本条约有效期为10年，如果在到期前1年内，签约双方无一方宣布其作废，那么条约有效期自动延长5年。

第七条

本条约应在尽短期限内得到批准。批准书的交换将在柏林举行。条约一经签字，立即生效。条约共两个正本，用德文和俄文写就。

莫斯科，1939年8月23日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维·莫洛托夫
德国政府代表 约·里宾特洛甫

№05787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波兰立场 给法驻波大使诺埃尔的电报

（1939年8月25日）

同意您第24号电报的陈述。

假若一开始就说明波兰默认，那就能避免军事谈判在第一次接触之后被搁浅，也就不会让俄国人产生这种印象：在主要问题上，尽管问题紧急和进行了5个月的谈判，而我们没有任何准备。此外，应该宣布，波兰的默认是确定无疑的，不仅仅是同意，它是不可否定的，是可能的。

但是，在达到这一点之后，应该进一步提醒波兰采取更为公开的立场。确实，很难想象，怎么能够指望苏联承诺反对努力与它相处的德国，假如受到我们保障的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仍不想听到关于俄国人的援助的话。

希特勒坚决要采取行动，而由我们保障其安全的贝克正在阻止实施这一行动。希特勒尽管在言论或行动上反对过苏联，但他已同斯大林言归于好，而且在两国以往现实的基础上，作为大国对大国，同新俄国进行了对话，于是把波兰推上了联合起来的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突出的位置上。

№05789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伏罗希洛夫答记者问 给法外长博内的电报

(1939年8月27日)

伏罗希洛夫元帅答记者问，塔斯社想必已经发表了。如果您没有该文，请通知我，使馆将电告您其内容。

另外，我注意到，他谈到向波兰提供原料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可能性，而且此处所说的援助，正如他所说，可以根据商业原则向波兰提供，对此既不需要相互援助条约，也不需要军事条约。

这是一个重要的声明。尽管波兰对上面所说很不高兴——它已公开宣布拒绝接受俄国军事援助，但仍可得出以下结论：苏联在没有我们所期望的条约的情况下，尽管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它仍准备提供可能的援助。但波兰人想以此限制苏联的援助。这样，可以继续探讨这一受到限制的俄国援助，将其纳入我们的计划。排除波兰人不欢迎的正面军事援助，因为它包括通过波兰的领土。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的代表团不必遵守刚来这里时接到的训令。

考虑到这一点，实际上在法、英、波和德国力量对比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正如杜芒克将军对我说的，我们从来没有把俄国人对波兰人的积极援助考虑进去。可以指望，如果土耳其恪守自己的义务，希特勒的名声将在莫斯科大大受损，而不会使现有军事力量真正发生有利于德方的变化。

这样看来，8月23日的交易，并非像德国期望的那样，是对

波兰和我们的莫大打击。

在当前形势下，如果法国和英国无能为力，茫然若失，那就可能产生最大的危险。

如果这样看待问题，似乎布尔什维克俄国已带着武器和资源转到希特勒德国阵营一边，于是预先采取行动，那么我们无异于在帮德国的忙。被愚弄的党现在非常紧张。在苏联政府里，现在有各种倾向。如果说对英国人很不信任和不友好，那么对我们的感情就很微妙。昨天在公众讲演会上，就有一名讲演人面对群众热烈称赞法国和它的军队。

再次建议，在评价这件事情时，头脑应十分冷静。

附 录

伏罗希洛夫就同英法军事代表团谈判问题答记者问

《消息报》评论员给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同志提了许多问题，伏罗希洛夫同志回答如下：

问：同英法军事代表团谈判有什么结果？

答：由于分歧严重，谈判中断了。军事代表团已离开莫斯科回国。

问：能否告之，有哪些分歧？

答：苏联军事代表团认为，苏联同侵略者没有共同边界，只有在让苏军通过波兰领土的条件下，苏联才能给法国、英国、波兰以援助，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可使苏军和侵略者的军队接触。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假使英美军队不能在法国领土登陆，那英美军队就不能同法国军队进行军事合作。同样的道理，假若苏联军队不能在波兰领土上通过，那它也就不能同法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

尽管这一立场分明是完全正确的，法英军事代表团仍不同意苏联代表团的立场，而波兰政府公开宣布，它不需要也不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这种状况使苏联和这些国家不可能进行军事合作。

这就是主要的分歧所在。谈判因此而中断。

问：在谈判中，是否谈到援助波兰原料和军事物资的问题？

答：没有。没有谈到。援助原料和军事物资问题是贸易业务，给波兰提供原料和军事物资完全用不着缔结相互援助条约，更用不着军事条约。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同日本没有任何相互援助条约或军事条约，但他们已连续两年卖给日本原料和军事物资，尽管日本正在中国作战。在谈判中，谈的不是原料和军事物资援助问题，而是部队援助。

问：《每日先驱报》外交评论员写道，似乎英法军事代表团问过苏联军事代表团，苏联是否准备向波兰提供飞机、弹药，并准备在边界部署红军，而苏联军事代表团似乎这样进行了回答：“战争开始后立即在东北部占领维尔诺和新格鲁杰克，在东南部占领利沃夫、塔诺波尔和斯塔尼斯拉夫省，从这些地区红军可以给予波兰人军事援助，如果需要的话。”

您怎样看待该报外交评论员的这一评述，它是否与事实相符？

答：这一评述从头到尾全是谎言。它的作者是无耻的谎言家，而刊登自己外交评论员这一虚假评述的报纸是造谣中伤的报纸。

问：路透社通过广播电台报道说：“伏罗希洛夫今天对英法军事代表团团长们宣布，由于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认为继续同英法谈判已无意义。”

路透社的广播符合事实吗？

答：不，不符合事实。同英法的谈判之所以中断不是因为苏联

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而是相反，苏联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同英法的军事谈判由于克服不了的分歧而进入了死胡同。

《消息报》

1939年9月27日

No05790

莫洛托夫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开讲话

(1939年8月31日)

同志们！自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以来，国际形势没有向好的方面转化。相反，形势变得更为紧张。

某些政府所采取的消除这一紧张局势的步骤明显不足。这些步骤没有达到目的。这里说的是欧洲。在东方亚洲，形势也没有向好的方面转化。日本的军队依然占领着中国的大城市和中国大片国土，没有放弃对苏联的敌对行动。这里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它消除了德国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为了全面确定这一条约的意义，我不得不先分析一下最近几个月同英法代表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情形。

你们知道，英法苏关于缔结相互援助反对欧洲侵略的条约的谈判早在4月份就开始了。众所周知，英国政府的最初提案的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些提案轻视谈判的根本前提——轻视互相援助和平等承担义务的原则。尽管如此，苏联政府没有拒绝谈判，而且拿出了自己的提案。我们认为，英法政府很难骤然转变自己的政治方针，从不久前还在敌视苏联的态度转变到在平等承担义务的条件下同苏联进行认真谈判。但是，后来的谈判没能成功。

英法苏谈判持续了4个月。这些谈判澄清了许多问题。同时，这些谈判还向英法代表表明，在国际事务中需要认真考虑苏联的因素。但是，谈判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当然，事情不在于某些

“提法”，也不在于条约草案的某些条款。不，问题在于更为重要的事情方面。

只有在一定的反对侵略者进攻的军事措施方面达成协议，英法苏缔结相互援助反对侵略的条约才有意义。因此，在莫斯科除了进行政治谈判，还花了一定时间同英法军队代表进行了军事谈判。然而军事谈判没能取得任何结果。谈判遇到了波兰——它应由英法苏三方保障——的反对意见，它拒绝苏联的军事援助。没能克服波兰的反对意见。而且，谈判表明，英国不是努力克服波兰的反对意见，而是相反，在支持这些反对意见。很清楚，波兰政府和它的主要盟友如此对待在发生侵略的情况下苏联方面所给予的军事援助，不能使谈判有好的结果。这之后我们明白了，英法苏谈判必遭破裂的厄运。

同英法谈判说明了什么？

英法苏谈判表明，英法立场贯穿着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矛盾。请你们来判断一下吧。

一方面，英法要求苏联给波兰提供反对侵略的军事援助，而苏联，众所周知，也准备在得到英法对自己的相应援助的情况下同意这一要求。另一方面，英法又指使波兰出面坚决拒绝苏联方面的军事援助。请试想，在这种条件下，当苏联的援助预先被宣布为不需要和强加于人的时候，如何达成相互援助的协议。

其次，一方面，英法保证给苏联提供反对侵略的军事援助以补偿苏联提供的相应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他们又给自己的援助提出了关于间接侵略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能将其援助化为乌有，给他们以形式上的法律依据以逃避给予这种援助，从而在侵略者面前把苏联置于孤立的地位。请你们辨别一下这种“相互援助条约”同带有某种欺诈性质的条约有什么区别吧。

还有，一方面，英法强调相互援助条约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要

求苏联严肃对待这一事情，尽快解决与条约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又非常缓慢，对待谈判十分不严肃，把这一事情交给不重要的没有授予全权的人员办理。只说一件事就够了，英法军事代表团来莫斯科没带一定的委托书，没有在某一军事条约上签字的权力。而且，英国的军事代表团来莫斯科没带任何委任状，只是在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请求下，在谈判正式开始前它才出示了自己的书面委托。然而这仅是某种意义上的权力证明，并非真正的委托书。试想一下，英法这种对待谈判的不严肃态度同被认为败坏谈判名声的戏弄谈判的轻浮态度有何区别。

这就是英法同苏联谈判立场的内在矛盾，它导致了谈判破裂。

英法立场矛盾的根源何在呢？

简言之，事情在于以下方面。一方面，英法政府害怕侵略，所以希望同苏联有互相援助条约，这样可加强它们自己，加强英国和法国。但是，另一方面，英法政府又担心同苏联缔结严肃的互相援助条约可以加强我国。加强苏联，看来这不符合它们的立场。不得不承认，它们这种担心超过了其他考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按照英法指示行动的波兰的立场。

现在我来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关于苏德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决定是在同法英军事谈判因上述不能克服的分歧步入死胡同之后做出的。因为这些谈判表明，缔结互相援助条约没有指望，我们不能不给自己提出是否有其他可能保障和平和消除德苏间战争威胁的问题。如果英法政府不想考虑这一点，那这是它们的问题。而我们的责任是考虑苏联人民的利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利益。同时我们坚信，苏联的利益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需有其他条件。需要德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根本转折——朝同苏联睦邻

友好的方向转变。只有具备这第二个条件，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德国政府想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使之朝着改善对苏关系方向发展的愿望之后，才算找到了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

众所周知，在最近6年时间里，自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以来，德苏之间政治关系很紧张。同样清楚的是，尽管世界观和政治制度不同，苏联政府努力同德国保持正常的往来和政治关系。现在无需回顾几年来这些关系的一些细节。代表同志们，这些我不说你们也清楚。但是需要重温一下几个月之前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阐述。

在讲到我国对外政策的任务时，斯大林同志当时是这样确定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

“1. 今后还要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外交联系的政策；2. 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到冲突中去。”

不难看出，斯大林同志在这些结论中说的是，苏联主张同所有国家加强事务往来。但斯大林同志同时也警告，要反对战争挑拨者，小心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我国卷入同其他国家的冲突中。

在揭露英法和北美新闻界借口德国夺取苏联乌克兰的“计划”所掀起的风波时，斯大林同志当时讲：

“似乎令人怀疑的这一闹剧，其目的是煽起苏联的狂热去反对德国，毒化空气和没有根据地挑起同德国的冲突。”

可以看出，斯大林同志在揭露企图挑起德苏争端的西欧政治家们的阴谋时是多么一针见血。

应该承认，我国有一些短视的人们受表面的反法西斯宣传的迷惑，忘记了我们敌人的挑拨。斯大林同志考虑到这种状况，当时就提出了关于德苏之间非敌视的睦邻关系的可能性的问题。

现在清楚了，在德国，一般说来对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声明有了

正确的认识，而且据此做出了实际的结论。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证明了斯大林同志的历史预见是无比正确的。

早在今年春天德国政府就提出了恢复贸易信贷谈判。谈判于是很快得到恢复。通过相互让步达成了协议。众所周知，协议已于8月19日签字。

这已不是同德国现政府第一个贸易信贷协议了。但这一协议不仅优于1935年的协议，而且优于以往所有的协议，更不用说我们同英法或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没有类似的一个有益的协议了。该协议不仅在贷款条件（7年贷款）方面于我们有利，它同时为我们提供一种额外订购大批我们所需设备的可能性。按照这一协议，苏联保证向德国出售一定数量的我们多余的原料，这对苏联完全是有益的。为什么我们要拒绝这一有利的经济协议？那些不希望苏联同其他国家签订有利的经济协议的人们能满意吗？而且十分清楚，同德国的贸易信贷协议完全符合苏联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利益。这一协议完全符合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称赞斯大林同志关于必须“加强同所有国家的外交联系”的指示。

当德国政府表示希望也改善政治关系的时候，苏联政府没有理由拒绝。这时提出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议论，其中透露出对开始改善苏德政治关系一些最简单的道理不理解。

例如，有人很幼稚地问：苏联怎么能和法西斯之流的国家改善政治关系？难道这是可能的吗？但是他们忘记了，这里谈论的不是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而是两国间的对外关系。忘记了 we 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绝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内政的立场。忘记了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我国对外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

“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外交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始终都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样的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

这些话的意思很清楚：苏联努力同所有非苏维埃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只要这些国家坚持以同样的立场对待苏联。

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对待非苏维埃国家，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以著名的列宁原则——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为基础。怎样在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不过我只举几个。比如，从1933年以来，我们同法西斯意大利就存在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至今谁也没想说反对这一条约。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一条约符合苏联的利益，它符合我们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同波兰和其他一些众所周知是半法西斯制度的国家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些条约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我提醒一下下述事实可能也不是多余的：我们同某些其他的非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如英国还没有这种条约。但责任不在我国。

自1926年以来，我国同德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立条约，该条约于1933年得到现今德国政府的延续，至今有效。

苏联政府以前认为应该继续同德国改善政治关系，但形势至今才允许这样做。的确，这里说的不是像英法苏所谈判的互相援助条约，而是互不侵犯条约。不过在现今条件下还很难过高估计苏德条约的国际意义。

这就是我们同意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来莫斯科的理由。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这一天应被看做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天。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欧洲历史上，而且还不仅仅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

昨天德国法西斯分子对苏联还在执行敌对的外交政策。是的，在对外政策领域，昨天我们还是敌人。但今天形势变了，我们不再

是敌人。对外关系的政治艺术不在于增加自己国家的敌人数量。相反，这里政治艺术在于减少这些敌人数量，做到使昨天的敌人变成相互之间保持和平关系的睦邻。

历史表明，我国和德国之间的敌视和战争对我们两国不是有益，而是有害。1914～1918年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是俄国和德国。所以，苏德人民的利益不在于他们之间敌视。相反，苏德人民利益需要的是相互之间的和平关系。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苏联和德国之间的敌视画上了句号，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世界观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应该也不能成为在两国之间建立好的政治关系的障碍，正如这种不同没有妨碍苏联和其他非苏维埃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好的政治关系一样。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主张苏德人民友好，主张发展这一友谊并使其开花结果。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主要意义在于，欧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在结束两国间敌对、消除战争威胁和相互之间生活在和平之中达成了协议。而且，欧洲可能的军事冲突的战场缩小了。即使欧洲不能避免军事冲突，这些军事行动的范围也将受到限制。对这种形势不满意的只能是欧洲全面战争的挑拨者，那些想在爱好和平的幌子下点燃整个欧洲战火的人们。

苏德条约遭到了英法和美国新闻的诸多攻击。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还有一些为“本国”资本主义和为其慷慨解囊的先生们服务的“社会主义”报纸。很清楚，从这些先生们那里是不会得到真实情况的。

有人企图散布一种不真实的情况，似乎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妨碍了同英法相互援助条约的谈判。这一谎言已遭到伏罗希洛夫同志答记者问的痛斥。众所周知，真实情况恰恰与此相反。苏联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顺便说一句，是出于以下情况的考虑：同英法的谈判由于英法统治集团的过错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分歧意见而被

迫中断。

另外，还有人怪罪我们，指责条约中没有在签约一方以表面借口卷入战争的情况下宣布其作废的条款。然而为什么同时忘记了，无论是波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该条约 1934 年缔结，1939 年德国违背波兰意愿宣布其作废），还是在前几个月签署的英德互不侵犯宣言中，都没有规定这种条款和这种附加条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许波兰、英国放火，不准苏联点灯？

最后，还有这样一些爱好者，他们喜欢在条约中看出其中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为此提出了种种猜测和暗示，企图引起一些国家对该条约的不信任。然而，这一切只能说明该条约的敌人绝望和无力，他们越来越暴露出他们是苏联和德国的敌人，企图在两国之间挑起战争。

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进一步证明了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正确性：必须十分小心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我们应谨防那些想从德苏关系恶化中渔利的人，那些不希望德苏之间和平和睦邻友好的人。

我们明白，执行这一路线的是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者。但我们对下述现象不能袖手旁观，视而不见：最近以来，某些英法社会党领导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执著。这些先生们真是不遗余力，惟此事而已。他们要求苏联一定要卷入战争，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德国。这些不自量力的战争挑拨者是否是发疯了呢？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图，苏联不能卷入战争，既不能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德国，也不能站在德国一边反对英国？难道不明白苏联现在和将来都要执行自己的独立的旨在保护苏联人民——也不仅仅是苏联人民——利益的政策？如果这些先生们有欲罢不能的打仗愿望，那自己就去打吧，不要拉苏联。我们倒想看看什么叫斗士。

在我们看来，在全体苏联人民看来，这些人和所有其他的欧洲

战争挑拨者一样，是和平的敌人。只有那些想制造新的流血、对人民进行新的屠杀的人，只有他们才想挑起苏德冲突。只有他们才想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德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苏联同德国签订了条约，它相信苏德人民之间的和平符合所有人民的利益，符合普遍和平的利益。每一个真诚希望和平的人都相信这一点。

这一条约符合苏联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它不能削弱我们保卫这些利益的警惕性。这一条约正是要靠我们对自己现实力量的坚强信心，对任何反苏联的侵略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巩固。

这一条约，还有以破裂而告终的英法苏谈判都表明：没有苏联的积极参与，现在就不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东欧问题，所有企图撇开苏联、背着苏联解决类似问题的做法都是要失败的。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意味着欧洲发展的转折，意味着欧洲两个最大的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开始向好的方面转折。这一条约不仅使我们取消了同德国发生战争的威胁，缩小了欧洲发生可能的军事冲突的范围，从而有利于普遍和平事业，而且它保障我们有可能增长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阵地，继续增长苏联对国际发展的影响。

这里没有必要再来研究条约的个别条款。人民委员会有理由希望你们赞赏这一条约，把它看成是苏联的重要的政治文件。

人民委员会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提交最高苏维埃讨论并建议批准它。

《消息报》

1939年9月1日

№05791

雷巴尔科和沙罗诺夫关于德国入侵波兰
致国防人民委员和外交人民委员电

（1939年9月1日）

优先拍发
通过电话收到

国防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

据二部通报，9月1日6时，未经宣战，德国轰炸航空兵对卢茨克、格丁尼亚、卡托维兹、克拉科夫、特切夫和华沙进行了空袭。对华沙的空袭被击退。8时50分对华沙的第二次空袭亦被击退。10时对华沙的第三次空袭结果尚不清楚。但泽已被德军占领。在韦斯特普拉半岛正在进行战斗。德军步兵部队已在姆瓦瓦、克雷尼察、贾岛多沃和上西列津方向越过边界。战斗正在进行。前线详细情况二部尚未通报。

雷巴尔科^①

沙罗诺夫^②

① П.С. 雷巴尔科，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处武官。

② Н.И. 沙罗诺夫，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

№05792

迈斯基关于英国政府通报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9年9月3日)

我今天收到以下转告苏联政府的通报：

(1) 从9月3日上午11时起英国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2) 英法将努力避免轰炸和平居民和毁坏历史文物，同时遵守1936年水下战争协定和1925年的禁止瓦斯战的协定，在同商船的空战中遵守对用军舰实现作战一方权力进行调节的那些原则。当然，这样做的条件是德国也这样做。

(3) 由于同德国的战争，根据1937年英苏海军条约的第24条，国王认为他不再承担该条约的任何义务（限制装备和交换情报）。

(4) 在规定地区布置地雷阵地（用明码通知您）。

全权代表

No05754

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

（1939年9月27日）

帝国外长先生于1939年9月27日18时左右抵达莫斯科。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首次会谈于22时开始，持续了3个小时。德方出席会谈的有冯·舒伦堡伯爵大使，苏方出席会谈的有什克瓦尔采夫大使。

会谈具有十分友好的性质。下面是会谈的过程。

部长先生首先详细向自己的俄国交谈者畅叙了德国对英法问题和战争事态的评估。正像部长先生所声明的那样，在西线战争进程中，还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故在德国现在把这场战争称作“土豆战”。从法国方面讲，在这场战争上主要是在耍嘴皮子，哈瓦斯通讯社在这一点上显得尤为突出。法国军事通报在不正确地报道着事态。实际上，迄今为止，敢于飞越德国国境的法国飞行员，连一个也没有生还。英国人打仗靠的是其赢得“造谣部”声名的情报部的努力。事至今日，英国的一兵一卒、一架飞机也没有参加作战行动，当然，除轰炸威廉港外，英国有16架轰炸机参加了这次轰炸，然而，只有6架飞机返回英国，10架被击落。英国人仅仅在德国上空投撒传单，期望在元首和德国人民之间进行离间。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得逞。这种企图，如同竭力想离间苏联人民和斯大林的企图，同样遭到了失败。

至于西方的状况，我们的筑垒线是在某个时候修筑的那种最强大的工事。我们的筑垒线的走向包括与比利时和荷兰接壤的整个德

国西部边境线。它纵深 50 公里，计有几万个弹药库。在这条防线后面，德国觉得自己绝对安全，因为在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攻克德国防御工事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弹药。防线前，有 10 公里的地雷区，法国人曾企图冲过这一雷区，结果一事无成。首次失败后，他们便放弃了类似的企图。

元首坚信，战争只会以我们胜利而告终。倘若我们的敌人想得到和平，那么，他们可以拥有和平。如若不想，那么，我们准备持久战争，并有能力以数学般的准确性保证胜利。假如英国希望持久战，那么，它将得到持久战。我们拥有充分根据认为英国不想打持久战（在这一点上，斯大林非常支持类似的看法，并指出，按他的意见，英国也不希望持久战）。德国用自己的陆军、潜水舰队和空军的兵力能够对英国实施沉重打击。到那时，英国不得不签订有利于德国的和约，并极其衰弱地退出斗争。英国非常清楚这些危险。所以，不能把好像英国准备了 3 年战争的这种论断信以为真（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作了自己同意的明显手势）。

这以后，部长先生说，他应谈三点意见，这三点应构成谈判的具体题目，他也是为此而来莫斯科的。这三点是：

1. 进一步发展德苏关系。
2. 边界的最终确定问题。
3. 看来，目前苏联政府也在考虑的波罗的海沿岸问题。

关于第一点，部长先生说，元首委托我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明，元首永远坚持德国应在东西方之间选择这一观点。元首曾期望和考虑过，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是会有有的。但是，英国草率地拒绝了元首的深远建议。元首确信，从此，就没有与英国达成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了。这种相互理解被英国当权的特殊阶层的帝国主义固执性破坏了。在英国，人民什么也决定不了。事情竟发展到英国干预与其无关的德国事务和甚至向德国宣战的地步。为了苏联

利益，元首做出的决定不会动摇。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坚信，尽管存在各种思想分歧，但德苏之间真正长期的友好关系是可能的，两国的现实利益在准确确定这些利益的情况下，能够避免根本摩擦的可能性。能够开花结果的现实友好合作之基础是存在的。

在这一方向上已采取的首次尝试已卓有成效。倘若将实现已达成的协议，那么，在重大事务上，一切将绝对会清楚的。波兰战争结束后，德国得到了很大的定居领土。德国的领土奢望因此得到了满足。近来的事态给苏联带来了丰硕果实：在修改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规定以后，苏联取得了通往波罗的海的出口；与在血统上相近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建立了联系。在这方面，导致德苏之间摩擦的分歧无任何可能。元首不是幻想家，所以，他没有竭力进行无止境的领土争夺。至于苏联，它是如此幅员辽阔，即它不可能有干涉德国领土事务的任何意图。这样，便给相互利益的逆差奠定了基础。至于这一问题的积极方面，元首是以以下考虑为出发点的。

德国的真正敌人是英国。在这一方面，苏联利益与德国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这方面，继续加深苏德新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认为，在整个英国问题上，苏德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一范畴内，德国与苏联的紧密合作不仅有益，而且，有可能签订一定的协议。部长先生称，会谈进程中，能听到苏联就此问题的想法，会使元首十分感兴趣。他会把这样的思想作为讨论的题目。如果苏联政府同意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本着共同调节波兰问题时的原则确定更加紧密发展苏德关系的纲领。德国和苏联现在便可重新审视共同对付英国的可能性。在类似的声明中，就可以强调说，德国和苏联壮志满怀，任何人都不敢动一下两国占领的阵地，而且在必要时两国将共同保卫这些阵地。这样，事情很可能达到长期合作的地步，因为，元首是在以远大的历史前景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

现在的任务是就公开有关共同声明的方式和方法达成相互理

解。部长带来一份方案，他想将此方案作为建议递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审阅（这时，部长先生请求用俄语读方案的文本）。外长先生补充说，这一结论的意义不应是德国期待苏联的军事援助。德国自己能够对付英国和法国。但是，这样的声明的意义在于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德苏之间的合作和两国在对外政策原则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关于第二点，最终确定边界线，元首从冯·舒伦堡大使的报告中了解了苏联的建议。就此问题应指出下面的事实。波兰已彻底被德国武装力量击溃。德国武装力量的行动不仅为德国，而且也为苏联带来了硕果。正因为如此，德国期望苏联能在满足我们某些愿望上协助我们。元首完全恪守 1939 年 8 月 23 日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但是，他委托部长先生（催促苏联政府）讨论下面的问题。苏联是一个拥有极其难以置信能力的大国。同时，德国是一个比较小的，首先缺乏木材和石油的小国。所以，我们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请求帮助我们。

在秘密补充议定书上，指出了一定的分界线。存在某些有关北部分界线的模糊之处。为迎合苏联政府的愿望，德方立即声明自己同意消除这些模糊之处，补充标明了皮萨河，结果这未给德国带来好处。正因为如此，德国政府期望苏联政府在桑河上游南部的石油产区做出让步。德国政府在奥古斯图夫和比亚韦斯托克也期待这一点，因为那里有对我们经济十分重要的广阔森林。这些问题的明确解决会对德苏关系的继续发展十分有益。我们提请注意的是，我们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做了很大贡献，同时，异常之快（斯大林也认为，事情确实办得非常快）。

在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莫斯科会谈期间，建立独立的波兰计划成了公开的事情。好像从那时起，苏联政府也倾向于明确瓜分波兰的想法。德国政府明白这一观点，决定实现准确划界。德国政府认

为，独立的波兰可能会成为经常不安定的策源地。德国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也想到了一处。

正像部长先生继续讲的那样，他从德国军人口中听到双方制定的纲领计划是以善意和友好的相互协作精神实现的，十分高兴。对于德国军事领导人来说，使作战军队离开敌人和迫使作战军队在相反方向上移动是件不易之事。在德国第8集团军的行动地域，这使波兰人甚至认为是他们使德军溃退的。尽管出现了这些困难和那些不太大的误解，但事情解决得还是迅速和无阻碍的。

关于第三点，波罗的海沿岸问题，部长先生声明的内容如下。

从冯·舒伦堡大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苏联政府目前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很自然，现在与爱沙尼亚政府进行的谈判就与此问题有关。德国在爱沙尼亚的公使报告说，苏联向爱沙尼亚提出了5年的军事协定（斯大林纠正说，是10年），而为此，要求在爱沙尼亚领土上为苏联军舰和飞机建立基地和进行紧密合作。显然，应该把这一点理解为实现波罗的海沿岸问题的第一步。德国目前正处在战争状态，欢迎逐步解决波罗的海问题。明显的是，我们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事务并不感兴趣。但是，如果苏联政府通知了我们，它准备如何和何时解决这些问题，以便让德国政府按照通过的协议能够形成自己的立场的话，我们是会感谢的。正像从冯·舒伦堡伯爵报告中明显看到的那样，苏联政府在期待我方明确同意它的打算（斯大林指出：我们期待着善意看待这一切）。

冯·舒伦堡伯爵的最后报告中讲的是涉及立陶宛的建议。按照莫斯科协议，立陶宛属于德国的利益范围。按照斯大林的建议，德国利益的这一范围应换为维斯瓦河以东直到布格河的领土。

在这里，部长先生提起了莫斯科会谈的过程和由于苏联涉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愿望，当时，有必要向元首进行函询。当时，在确定相互利益的北部界线方面，元首同意了苏联的愿望。要知道，元首

不是奉行只有一天的政策，他在考虑远大的前景，并承认，苏联确实需要不冻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移动了我们利益范围的界线。我们关心的是使这条界线能够保存。假如按照苏联的愿望，我们采取妥协，那么，必须注意到，苏联的建议内容并没有包含德国放弃立陶宛或其部分领土的足够等价物。在讨论可能的折衷决定时，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按照这一办法，德国靠立陶宛能够扩大自己东普鲁士的地区。

此后，部长先生在地图上画了他认为可以接受和可能的一条线。按照他的想象，这条线的走向应从立陶宛的最南端一直到波罗的海，也就是在科夫诺以东穿过整个立陶宛（科夫诺留在苏联一方），以下在格罗德诺以东，包括比亚韦斯托克。然后，应找到与布格线可以接受的汇合点。他请求苏联方面在今后讨论时也把这一点看做是讨论的目标。但是，他也提请注意，斯大林的建议对我们来说，不是放弃立陶宛的足够的等价物。

部长先生谈完自己的想法后，斯大林问莫洛托夫，他们两人谁应该回答。莫洛托夫先生说，想让斯大林先生回答，因为，毫无疑问，斯大林先生会回答得更好。然后，斯大林作了以下声明。

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一直是相信德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早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最初阶段，全世界都指责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是领工资的德国特务。拉帕洛条约也是布尔什维克签署的。条约内容包括含有扩大和加深互利关系的所有先决条件。当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在德国执政后，关系变坏了，因为德国政府意识到有必要把重点放在内部政策上。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一问题解决了，故而，德国政府表现出与苏联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苏联政府立即声明自己准备也这样做。如果可以总的讲关系变坏的原因，那么，必须确认，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历史概念中，从没有排除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现在心怀坦然地着手恢复

与德国的合作。这一合作是这样一种力量，在这一力量面前，所有其他一切阴谋诡计都得向后退缩。如果德国政府同意这一观点并将按照外交部长先生所讲意图行事的话，那么，这样会形成良好和友谊合作的所有先决条件。至于说共同声明，那么，其内容必须要进行全面考虑和讨论。所以，他，斯大林，将在明天给予答复。至于苏联政府对整个英国问题的态度，他想指出的是，苏联政府从来不同情英国。只要读一下列宁及他的学生的著作，即可明白，布尔什维克对英国的尖刻抨击和仇视最厉害，而且还是在与德国还谈不上合作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斯大林先生说，部长先生以谨慎的方式暗示说，德国不把合作暗指为某种军事援助，也不打算把苏联卷入战争。这讲得十分得体 and 非常好。德国现在不需要别人援助，很可能将来也不需要别人援助，这是事实。但是，倘若事与愿违，德国陷入困境，那么，它可以相信，苏联人民会去援助德国，并且不允许别人扼杀德国。苏联关怀强大的德国，不允许有人把德国打倒在地。

斯大林就边界最终确定问题作了如下声明。

斯大林在他与冯·舒伦堡伯爵上一次谈话时，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想法。他今天还得重复一下这些想法。波兰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下列可能性。原先的意图是保留独立而不完整的波兰。两国政府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很清楚，独立而不完整的波兰将永远是欧洲不安定的策源地。波兰人为使德苏内讧，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因为明白这一事实，双方便放弃了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的想法。现在，可能有下面两种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对波兰实行瓜分，这样按照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议定书，德苏之间的最终边界走向将是沿皮萨河、纳雷夫河、布格、维斯瓦和桑河这条线。这一决定有很大不方便。这一决定很可能出现两个国家因其制度差别，每个国家在隶属于自己管辖的波兰

领土上做出不同的决定的后果。很明显，德国可能沿维斯瓦河建立保护制度或类似保护制度的东西，同时，苏联政府可能走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道路。必然的后果会是波兰人按照传统力争重新合并和恢复独立波兰国家的意图，企图在德苏之间散播敌对情绪。形形色色的影响将交织在一起，这些影响很可能只有助于危及德苏的友好合作。

他，斯大林，根据这些想法，得出结论，最后将民族志上属于波兰的领土留在一家手中，即留在德国人手中。德国在那里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从德苏长远的、友好关系立场上看，这非常有益，并能避免上述缺点。基于这一点，他建议德国接受居住在卢布林省和与布格接壤的华沙省北部的400万波兰人。他不能同意部长先生说的苏联政府提出了补偿不够的建议的想法。在归属德国的维斯瓦河以东的领土上，居住着不少于400万波兰人，然而立陶宛的居民则不足200万。德国将做出很好的有利可图的事，因为人——这是最重要的，比一切可以得到的东西都宝贵。

至于德国关于桑河上游区的想法，从苏联政府方面，没有做出某些回应的步骤。这一地区答应给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是极其恶劣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从来不会放弃这块土地。斯大林说：“我的手永远不会要求乌克兰做出这样的牺牲。”但是，毕竟为了显示愿意满足我们，他提出下列建议。在德罗戈贝奇和鲍利斯拉夫目前的石油开采量为30万吨，而在苏联工程人员的精明领导下，年产量可提高到50万吨。苏联政府准备将这一产量的一半卖给德国，而代替另一半的是从苏联其他石油产地提供原油。作为结算的是苏联政府准备要德国现在丰富的烟煤，以及石油产地用的钢管。这一切都在可能的范围内，但没有领土上的让步。

有关德国在布格以北地区和立陶宛的愿望，斯大林断然拒绝。他称，苏联政府准备将东普鲁士和立陶宛之间的突出部，连同苏瓦

乌基市直到奥古斯图夫以北一线转让给德国，但仅此而已。对部长先生关于我们迫切需要奥古斯图夫地区的森林的意见，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声称，在他们执行提议的界线时，我们将得到这片森林的北面部分。

至于立陶宛，苏联政府绝不认为苏联划出部分立陶宛领土，是在促使瓜分立陶宛。

尽管部长先生作了坚决的声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点，他们不准备就涉及布格以北原波兰领土和立陶宛的问题做出任何让步（苏瓦乌基地区除外）。

交谈的这一部分是以部长先生的声明结束的，部长先生声明，他将立即把这次谈话的情况禀告元首，而自己在夜间考虑一下情况，在下次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先生交谈时，提出折衷的建议。

关于波罗的海沿岸问题，斯大林声称，苏联政府要求爱沙尼亚政府为爱沙尼亚港湾和达戈岛及厄塞尔岛为自己的军舰提供基地，以及为自己的空军提供基地。为了守卫这些基地，苏联政府将在爱沙尼亚部署1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1个坦克旅和1个空军旅。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在苏爱军事援助条约的掩饰之下实施。爱沙尼亚对此已表示同意。

对部长先生提出的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以此实现慢慢向爱沙尼亚深入，并可能向拉脱维亚深入的问题，斯大林先生回答得很肯定，但补充说，将暂时在爱沙尼亚保留现今的政府系统、各部，等等。

至于拉脱维亚，斯大林声称，苏联政府向拉脱维亚也将提出类似的建议。倘若拉脱维亚将反对像爱沙尼亚这样条件的互助公约建议，那么，苏军将在极短时间内“收拾”拉脱维亚。

至于立陶宛，斯大林声称，如果与德国达成有关“交换”领土的协议，苏联将把立陶宛归入自己的版图。在谈话的第一部分，斯大林对自己涉及占领立陶宛的打算谈得不太清楚。

最后，谈到了土耳其。斯大林称，土耳其人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也许，他们想与英国、法国，以及与德国和苏联同时谈判。斯大林先生同意部长先生关于好的出路是土耳其绝对中立的意见。斯大林接着指出，如果苏土互助公约从土耳其方面包括有涉及英法的附带条件，而在苏联方面有有关德国的附带条件，那么，这一公约一般不会有对外后果，“如果只字不提保加利亚的话”（斯大林微笑地指出）。他说，如果土耳其坚持自己古怪的行为，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教训一下土耳其人的必要性。

谈话结束时商定9月28日14时继续会谈。

从德文翻译。^①

莫斯科，1939年9月28日

（签字）黑格

^① 这份记录是德国研究人员在查阅二战前夕驻苏大使冯·舒伦堡的个人档案时发现的。

№05755

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

（1939年9月28日）

9月27日22时部长先生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先生之间开始的谈判于9月28日15时继续进行。

部长先生首先说，昨天晚上他将第一次谈话内容报告了元首，并致电元首作了详细的汇报。此后，他与元首在报告基础上通了电话。元首委托他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先生致意，并转告他们，他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并同意他的意见。元首同时觉得瓜分波兰民族地区令人不安，因为这种瓜分，容易导致德苏之间的摩擦，而这一点，当然是应该避免的。元首同意斯大林关于波兰人在实现传统的合并时会使用一切手段挑起苏德内讧的意见。当然，不应该期待由此会在两个友好国家间产生严重的分歧，但是，可能会有局部的困难。从这点出发，元首原则上同意接受斯大林所说的第二方案，但是，有某些不大的改动，这些改动部长先生准备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指出。

此后，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先生拿着各种制图材料进来了。这时，开始讨论边界的最终确定线。这次讨论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各持己见，但在这段时间，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折衷决定。例如，斯大林未接受德国想拥有奥古斯图夫市的愿望，依据是经过这里的铁路有苏联的利益。同时，他考虑了德国得到奥古斯图夫森林的愿望，并根据这一点同意将边界向南作相应的移动。后来，苏联政府在下列问题上向我们作了让步。在

第一方案中，边界线的走向在纳雷夫河和布格河之间，而在奥斯特罗文卡、普尔图斯克、维什科沃和奥斯托罗夫市地区出现了被称作“鼻子”的地区，这一地区无论是部长先生，还是舒伦堡大使都把它称作我们不能接受的地区。斯大林先生称，他准备赞同德国意见，放弃对这一突出部的要求，将边界从布格河方向一下子转向南，使其不到奥斯特罗文卡。这样，从奥斯特罗文卡通过奥斯托罗夫到马尔基尼亚-戈尔卡的铁路将留在德国方面。与此作交换的是德方宣布，它准备在拉瓦-鲁斯卡和卢布丘夫市附近把边界线稍微向北挪动一下，因为不这样，边界在这里的走向将直接沿着铁路。围绕佩列梅什利市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部长先生想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相信，位于桑河两面的城市处于分离状态是不行的，部长企图以苏联得到美丽的大城市利沃夫为由说服对方将佩列梅什利市让给我们，结果将俄国人推到了坚决反对的地步，俄国人声称，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违背关于沿桑河走向的边界协议。我们只得以将位于右岸的城市南区划归苏联而握手言好。当谈到位于桑河发源地的边界南端点时，靠准确的参谋地图确定，这一发源地在靠近苏联的乌若克山口以西。对部长先生提出的苏联是否愿意满足关于简化通过乌若克山口的过境运输的愿望问题，苏联代表未给予最终否定，但同时他们也没有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这样在就划定最终边界取得一致后，公使衔参赞亨克受领部长的任务，将有关标图交给制图员，并检查界线标示情况。随后，以下面方式重新开始谈判。

部长先生回到了与斯大林先生昨天会谈的那一部分，在这一部分，斯大林称，苏联政府关心的是强大的德国，如果在必要情况下，假如德国处于危难之中，苏联政府准备对它给予援助。部长先生就此问题声明说，德国政府没有期望苏联方面的军事援助，而且

也不需要这种援助。但是，对德国来说，苏联在经济方面的援助具有极大意义。在这一问题上，8月19日签署的贸易和信贷协议奠定了良好开端。这一协议的签署已成为建立总的友好关系的开始。从经济观点看，这一协议仅仅是初步开始，它还应该发展，因为德苏之间的贸易额在过去是今天协议的5倍。目前，由于军事事件和英国实行封锁，德国只得急剧改变自己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势下，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对德国具有特殊意义。拥有丰富的原料储备的苏联能够大大支持德国，而德国则愿意向苏联提供其必需的高质量成品。为了与苏联政府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与部长一起来莫斯科的还有公使施努列。部长请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先生在这次谈判期间指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能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此外，如果苏联政府给予经济支援的准备情况能在他与莫洛托夫先生之间非正式交换书信中得到反映，他将不胜感谢。除了这些保证性的表示外，如果能在这样的书信中决定和反映我们关心的某些经济问题，德国政府会十分感谢。这里指的是下面几点：

1. 简化罗马尼亚的石油和粮食沿科洛梅亚－利沃夫铁路过境运输手续。

2. 按照斯大林昨天做的承诺从德罗戈贝奇和鲍利斯拉夫地区提供石油。

3. 简化进出伊朗以及进出阿富汗的过境运输手续。

4. 简化从远东国家的过境运输，特别是简化通过横贯西伯利亚铁路运往德国的大豆和中国草药的过境运输手续。

就此问题，斯大林声明，他可以同意信件的这种交换。至于特别的愿望，苏联政府原则上不对任何国家提供通过自己领土的货物自由过境运输的权利。伊朗强烈企图得到这样的权利，但是，它是不会得到的。然而，考虑到德国的特殊情况和目前德苏关系的性质，苏联政府准备就过境运输问题给予德国期望的简化，并在有关

的信件交换中敲定这种承诺。根据这一点，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转交了德方准备的有关方案。

谈判的这一部分结束后，部长先生请斯大林告知，苏联政府以何种方式和何时打算实现有关波罗的海沿岸的意图。

斯大林先生回答说，爱沙尼亚政府同意苏联的建议，故在这一基础上可指望在今晚或最晚在今夜与爱沙尼亚签订有关协议。然后，斯大林通报了与爱沙尼亚协议的内容（目前协议已公布）。此外，他通报说，在这一协议中，部署苏联军舰的地点指的是巴尔季什港，但同时在专门的秘密协议中商定，军舰也将部署在塔林，因为巴尔季什港还没有完全构筑好。关于进入爱沙尼亚的军队人数最大限度，斯大林说为 25000 人。上次谈话中他提到的空军旅的人数，他确定为 3 个团。最后，斯大林再次表示，暂时不打算改变爱沙尼亚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把苏联制度引进爱沙尼亚。暂时保留爱沙尼亚宪法，各部将继续自己的工作。到适当时候，爱沙尼亚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事务。

苏联政府涉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意图在这次谈话中没有提及，因为斯大林在昨天已谈了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此后，外交部长先生将话题转到比萨拉比亚。他提醒说，德国政府在 8 月 23 日的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已表示了自己对此问题不感兴趣。所以，他想从斯大林先生这里听到斯大林的意见——他把斯大林先生所讲的理解为“苏联政府目前没有针对罗马尼亚采取某些动作的意图，但是，如果因匈牙利对罗马尼亚采取某些行动而导致巴尔干半岛上发生变化，苏联政府将声明自己的利益”，不知是否正确。苏联政府的行为，对他来说，是完全理解的，因为他不可能想象，苏联政府想扩大战场。然而，在罗马尼亚的行为中，明显有神经过敏的迹象，这些迹象并没有因苏联关于中立的声明而消除。他，作为德国外交部长，很想从斯大林这里得知，苏联政府关于它

与罗马尼亚未来的关系有些什么见解。

斯大林回答说，目前，苏联政府没有触动罗马尼亚的意图。鉴于整个波兰政府，包括整个波兰总参谋部转到了罗马尼亚，莫洛托夫召见了驻这里的罗马尼亚大使，并问他，由于那么多的波兰知名客人和那么多的飞机到达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政府是否完全意识到自己在中立方面的义务。罗马尼亚大使简直无地自容，在显出明显害怕的同时，声明说，保证绝对遵守中立和扣留雷茨-斯米格韦、贝克和波兰政府的其他成员。对此，斯大林先生补充说，无论从罗马尼亚方面还是从波罗的海国家方面，目前还不会发生任何胡闹的举动，因为，它们都相当害怕。

斯大林对部长先生提出的关于与正在莫斯科的土耳其外交大臣萨拉焦格鲁进行谈判情况的问题回答说，他还没有见到他，他没有时间接见萨拉焦格鲁。以此，他让人们明白，他对签署互助条约表示怀疑。

在继续谈话过程中，部长先生讲到，由于对英国作战，德方可能有让自己的潜水艇使用摩尔曼斯克港的愿望，以便在那里修复潜水艇，很可能，还修复德国的辅助巡洋舰。

斯大林先生声明，苏联政府在这方面也原则上同意向德国提供援助。摩尔曼斯克有拖网渔船和军舰的修理基地，这些基地可为部长先生提到的目的使用。但摩尔曼斯克港的规模是否有必要的隔离能力这一问题，必须研究。

17时40分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请部长和大使先生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共进晚餐。^①

^① 记录中接下去列举了参加宴会的苏方人员名单，其中有：莫洛托夫、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贝利亚、布尔加宁、沃兹涅先斯基、戈尔金、普罗宁、波将金、杰卡诺佐夫等。

晚餐在与克里姆林宫相邻的大厅举行，是在轻松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气氛由于主人于晚餐进程中为每个出席客人频频举杯而变得特别活跃。第一杯为部长先生而干。祝酒词的内容是对“带来成功”的客人表示欢迎，与此同时为德国，为德国元首及其部长高喊“乌拉！”

部长先生在答谢词中感谢苏联政府热情款待，并声明，他特别高兴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在他首次访问期间以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为建立德苏友好关系奠定了良好开端后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这以后，战争贩子挑起了战争，战争的结果使波兰遭到了毁灭。德国和苏联共同在原波兰国家领土上担负起维持安定和秩序的任务这一事实，是它们在广阔基础上继续友好合作的保证。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是签署最后协议和调节处于德苏之间那些领土上的关系。确定共同边界和德苏再次成为直接邻邦这一事实，开辟了未来成功合作的、给人以希望的前景。苏联得到了居住着有血缘关系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大片土地。同时，德国也将自己的同族兄弟归入了自己祖国的版图。数百年来德俄之间存在的直接比邻关系恢复了。这种比邻关系是两国间友谊的可靠基础。元首希望实现这种友谊，尽管两国制度上存在着区别，但他认为这种友谊是完全可能的。部长先生以此为苏联政府成员的健康和特别为给予他如此真诚款待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健康干杯。

晚宴期间，莫洛托夫再次为部长先生的健康举杯，并补充说，苏联政府特别高兴在自己国内见到里宾特洛甫先生，因为此人从不空手而来。第一次来时，他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要签订新的条约，这一条约将使两国间的友谊和边界得到巩固。里宾特洛甫先生以每小时650公里行动的速度，令苏联政府从心底里赞叹。他的精力，他的毅力是他所完成的建立与德国友好关系的事业将永远牢固的保证。

莫洛托夫在为斯大林举杯的祝酒词中强调了此人在改变苏德关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为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致祝酒词时，莫洛托夫高度评价了大使在共同事业中的孜孜不倦和始终如一的努力，并感谢他所完成的工作。

晚宴后，在相邻的大厅里举行了无拘束谈话，谈话持续到 21 时 45 分。以后，部长先生接受了观赏芭蕾舞的建议，在芭蕾舞剧场为他及其随从人员留出了正中央的政府厢座。剧场的观众对高贵的德国客人表现出活跃和友善的兴趣。剧本身是俄罗斯芭蕾舞很高水平的新证明，为欢迎高贵客人，主要角色都由俄罗斯最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担任。

夜里 1 点，会议继续进行，直到早晨 5 点结束，结束前签署了下列文件。^①

签署文件前，就条约的某些条款、补充议定书的措词和经济问题书信交换问题举行了谈判。例如，在这些会议期间决定，为改变苏联原先的意图并加快程序，按边界和友好条约第一条，条约中不详细说明边界的情况，而只指出有关的议定书和附图。决定准确说明边界走向的补充协定书将由德国军人和苏联军人合作制定，然后，由舒伦堡和莫洛托夫先生签署。为此，部长先生根据自己所有的权力，给冯·舒伦堡伯爵以专门委托。两国政府共同声明的德国方案在其第二部分引起了斯大林的疑问。斯大林谈的意见是，德国方案指出西方大国的帝国主义目的，在表述中太露骨，最好用较掩蔽的方式讲出这些思想。部长先生声明，为了斯大林提出的修改意见，他需要有元首的同意。此后，部长先生与元首进行了电话谈话，结果，斯大林的修改意见被采纳。

^① 列举了 7 份文件的名称，其中包括 2 份秘密补充协定书和 1 份信任协定书。参见本专题以下文件：No05758、No05759、No05760、No05761。

除了一处不大的改动，德方的方案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接受。这种不大的改动涉及的是德国方案中关于在战争条件下苏联对德国经济援助那一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先生建议对这一点重新措词，指出，苏联政府有决心用一切手段提高苏德之间的贸易。

这样在很短时间内便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在准备将德文文本翻成俄文和将俄文文本翻成德文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间（德方是黑格，苏方是巴甫洛夫）也没有任何分歧。

在其余时间，部长先生与斯大林就政治问题交换了看法。部长先生向斯大林建议，希望在会谈结束后能公布莫洛托夫和帝国外交大臣的联合声明，声明要指出签署的条约和最后要有给日本方面做出某种姿态的内容并有利于苏日之间的妥协。部长先生引用不久前收到的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论证了自己的建议。电报中指出，日本的某些人士，主要是军人，想与苏联妥协。在这方面，他们遇到了来自天皇宫廷中的一些经济和政治集团方面的反抗，为此他们需要我方支持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

斯大林先生回答说，他完全同意部长先生的意图，但由于下面的看法，他认为部长先生建议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些看法是：内阁总理阿部知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取得苏日之间妥协的任何愿望。日本方面把苏联在这一方面迈出的每一步都解释为软弱和求乞的标志。他请帝国外交部长先生别生他的气，如果他说，他，斯大林，比里宾特洛甫更了解亚洲人。这些人有着特殊的精神论，对他们起作用的只能是武力。在8月的日子里，大约在里宾特洛甫先生首次访问莫斯科期间，日本大使东乡平八郎跑来建议讲和。正是在这一期间，日本人在蒙古边境出动200架飞机对苏联领土发动了进攻，结果日本遭到重创被击退，未能得逞。对此，苏联政府在报纸上未作任何报道，便采取了行动，包围了日本军队集群，而且歼灭了大约25000人。只是在这以后，日本才与苏联订立停战协定。现在，

日本人在收拾阵亡者的尸体和将尸体运回日本。只是在运回 5000 具尸体后，他们才明白，他们在进攻时冒进了，于是，才放弃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此后，部长先生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对英国形势和英国政府的行动有何见解？不久前，哈利法克斯^① 邀见迈斯基并问他，苏联政府不准备与英国进行经济和别的方式的交易吗？迈斯基得到苏联政府要正面对待英国的这些探测的指示。苏联政府为此只追求一个目的，即赢得时间和弄清英国其实在对苏联想些什么。如果德国政府得到关于苏联公使与英国政府这些讨论的某些消息，那么，德国政府不必对此不安。在这些讨论后面，没有掩盖任何重大的事情，苏联政府也不准备与英、美、法这样的国家建立任何关系。张伯伦^② 是个蠢货，而达拉第^③ 更是个大笨蛋。达拉第召见苏联公使并恳求地问他，德苏之间在干什么，这两国之间签署了什么协定。苏里茨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向法国政府作了说明，指出苏联政府不能容忍自己的代表遭受审讯。在其他方面，他得到试图拖长谈判和弄清法国想从苏联得到什么的指示。从这方面，将无任何结果，而只有典型的法国式无聊的空谈。在任何场合下，斯大林让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从别的渠道听到达拉第和苏里茨之间谈话的内容的话，要我们不要以为苏法之间会发生什么。

在极其热忱的告别之际，部长先生希望莫洛托夫先生赴柏林交换批准的公文和在近期内安排元首和斯大林的会见。在莫洛托夫对赴柏林一事作了有些疑问的回答后，斯大林说，心诚则灵。

① 哈利法克斯（1881～1959），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② 张伯伦，时任英国首相。

③ 达拉第，时任法国总理。

他说他与元首的会面是必需的和可能的，“如果他们都活着”。9月29日12时40分部长先生返回柏林。

从德文翻译

莫斯科，1939年9月30日^①

（签字）黑格

^① 此为记录整理成文的日期。

№05761

苏德关于划分利益范围的秘密补充协定书

（1939年9月28日）

双方签字代表达成了以下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协议：

把1939年8月23日所签署的秘密补充协定书的第1款改为“把立陶宛国家的领土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因为卢布林省和华沙省的一部分划入了德国的利益范围。（见今日所签署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地图）。待苏联政府在立陶宛领土上采取保卫自己利益的特别措施后，为了自然而简便地划定边界，现在的德国—立陶宛边界就随之作这样的变动：地图上所划线西南的立陶宛领土归德国所有。

而且还确定，现在有效的德国—立陶宛经济协定不应因上述苏联措施而废除。

莫斯科，1939年9月28日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维·莫洛托夫

德国政府代表 约·里宾特洛甫

No05762

苏德关于边界划分的秘密协定书

(1939年10月4日)

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委任的以下签字代表，为履行193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达成以下协议。

(一)

在原波兰国家领土上，两国利益之间的边界线的走向是：边界线从伊戈尔卡河上的一个点（该点位于无名河河口旁：无名河——从普舍托克村流出，在容多瓦-科普采沃公路和伊戈尔卡河交叉点东北2300米的地点注入伊戈尔卡河）沿假设直线向西南方向延伸到容多瓦村西北黑甘恰河上的一个点。

然后，沿黑甘恰河上溯达马雷哈河口。从这一河口向西南沿假设直线延伸到叶德雷诺湖的东北端。从此沿假设直线达沃尔库尚卡河河口对面的黑甘恰河，然后沿沃尔库尚卡河上溯到奥斯特雷尼斯凯村南。从这里，边界线先是向西南方向尔后折向西北沿水渠直达水渠西北尽头。然后沿假设直线（西北走向）抵恰尔内·布鲁德村东北。从这里，向西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谢布拉村北的布利兹纳河铁路桥，谢布拉村留在苏联方面，而布利兹纳村留在德国方面。然后沿布利兹纳河而下至苏瓦尔基-谢布拉2号公路和拉奇基-谢布拉2号公路的交叉处，交叉处和谢布拉2号村留在德国一方，而谢布拉一号村留在苏联一方。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北沿假设直线延伸到托比洛夫卡村以北，然后几经曲折插向西南，沿假设直线抵达普鲁斯卡·乌拉村西南约 900 米处的原俄德国界，置普鲁斯卡·马拉村于德国方面。

从这里边界线大体向西南方向沿原俄德国界线抵达与皮萨河의 交切处。

从这里沿皮萨河而下达该河与纳雷夫河的交汇处，然后沿纳雷夫河达无名河口（无名河在奥斯特罗文卡市和奥斯特罗维村之间流入纳雷夫河）。

边界线从这里沿无名河上溯延伸到南拉维村村东。

从南拉维村村东，向东南沿假设直线抵苏斯克村村南，然后再沿假设直线抵达位于特罗申村西南大约 400 米处的特罗申 - 拉宾德公路上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向南—东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斯特连基村以南道口，然后折向东南并沿假设直线延伸抵达布钦村南的奥什河上，置布钦村于苏联一方，而扎奥热村于德国一方。

从这里，沿奥什河上溯至其左岸支流处——该支流在索科洛沃和罗戈外克村之间注入奥什河，然后沿该支流抵达乌利诺沃 - 斯塔莱村以东 1200 米处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向东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砖厂以南约 700 米处的奥斯特鲁夫 - 马佐夫舍 - 扎宾科沃公路上的一个点，置扎谢列山村、柳别沃·诺维村和上面提到的砖厂于苏联一方，而扎列谢村、普希美村和柳别沃村于德国一方。

从这里，边界线向东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诺瓦·佐洛托里亚村西北大约 500 米的地方布罗奇斯科河上的一个点，把乌格涅沃村留在德国一方。

从这里，边界线向东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别茨基村以南约 350 米处的公路上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向东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纳德布日爱村以东大约 1500 米处西布格河上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沿西布格河上溯抵索洛基亚河口。

从索洛基亚河口沿该河延伸到乌格奴夫村西北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北方向沿假设直线抵霍德瓦尼采村村南，将普舍德诺镇和诺沃修尔基村留在苏联一方，而将梅斯利亚特恩村和霍德瓦尼采村留在德国一方。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北方向，沿假设直线，抵达茹拉夫采村东北部以北 1300 米附近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日尔卡村东南克里尼察河上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改向西南，沿假设直线，延伸到布日兹纳东南，尔后折向西南方向，沿假设直线，抵达比祖内村西北约 800 米处的一个点。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在加尔贝村东南抵达卢夫恰河上，然后沿该河上溯到西格雷田庄。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戈拉叶茨镇东南的格诺伊尼克河上的一个点，尔后顺该河而下抵达戈拉叶茨—采沙奴夫公路与该河相交处。

从这里，边界线折向西南，沿假设直线。延伸到采沙奴夫镇东部边缘。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达赫奴夫村西边，置诺维田庄于德国一边。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福托雷村东南边缘，从这里几乎向正西，沿假设直线，伸延到扎比亚拉村西北部的一个点，置利亚托舍纳田庄和乌什科夫采村于苏联一方。

从这里，边界线向西北方向，沿假设直线，延伸到多布恰村西北普希科巴河上的一个点，把米尔库夫村留给苏联一方，把捷戈尔尼亚村留给德国一方。

从这里，边界线沿普希科巴河而下抵达该河注入普希卢宾河交汇处，然后沿该河而下抵达它注入桑河的交汇处。

从这里，边界线沿桑河上溯直达其源头，把霞基和乌若克车站留在苏联一边。

注 1：在不通航的大小河流上，边界线沿这些河流的主要支流中间通过。

在通航的河流上，边界线沿主航道中间通过。

注 2：用假设线确定的边界地段，勘界时将被取消。

注 3：本协定书所确定的边界线，用黑线标在所附俄文地图上。比例：100000:1

（二）

本协定书第 1 部分所规定的边界线将由苏德联合委员会到现场勘察界定。

委员会确定界标，对边界线制定详细的说明并将该线标在 1:25000 比例的地图上。

委员会于今年 9 月着手工作。

委员会所制定的边界线说明和边界线地图需经双方政府批准。

（三）

本协定书需要得到批准，签字后立即生效。批准书的交换将在尽短期限内 在柏林举行。

本协定书一式4份，其中2份俄文，两份德文，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939年10月4日签订于莫斯科市

苏联政府全权代表 维·莫洛托夫

德国政府代表 冯·舒伦堡

№11677

莫洛托夫关于斯大林对其柏林之行指示的记录

（1940年9月9日）

绝密

维·莫·^①

柏林之行的几点指示（1940年9月9日）

一、此行的目的：

1) 了解德国及三国（德、意、日）轴心协定所有参加者在实施建立“新欧洲”及“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方面的真实意图，“新欧洲”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界线；“新欧洲”和“大东亚共荣圈”内各个欧洲国家的国家结构的性质和关系的性质；实施这些计划的阶段和期限，至少了解它最近的阶段；其他国家参加三国轴心协定的前景；此时和以后苏联在这些计划中的地位。

2) 初步拟定苏联在欧洲以及在近亚和中亚的利益范围；摸清就此与德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协商的可能性，但在谈判的现阶段不与它们缔结任何协定，要指出，此类谈判将在莫斯科继续，近期内里宾特洛甫应来莫斯科。

二、考虑到关于部分划分苏联和德国利益范围的苏德协定诸事均已解决（芬兰除外），谈判中争取将以下地区纳入苏联的利益范围：

^① 即莫洛托夫。

1) 芬兰——以1939年苏德协议为基础，在执行这一协议时，德国应排除一切困难和含糊的说法（撤出德国部队，在芬兰和德国停止一切危害苏联利益的政治示威）。

2) 多瑙河，多瑙河的近海部分——与给索博列夫同志的指示^①一致。

也谈谈我们对德国在保证问题及向罗马尼亚派驻军问题上未与苏联磋商而感到不满。

3) 保加利亚——这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按照德意协议，应该属于苏联利益范围，根据同一协议苏联方面应当对保加利亚给予保障，像德国和意大利对罗马尼亚所为一样，让苏联部队进驻保加利亚。

4) 土耳其及其命运问题没有我们参加便不能解决，因为我们在土耳其的利益至关紧要。

5) 我们对与苏联毗邻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未来的命运极为关注，希望就此与我们达成协议。

6) 伊朗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便不能解决，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利益也至关紧要。此事如无必要则不谈。

7) 关于希腊和南斯拉夫我们想知道：轴心国打算做什么？

8) 在瑞典问题上苏联仍旧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为了苏联和德国的利益维持这个国家的中立。德国是否仍旧采取此立场？

9) 作为波罗的海国家，苏联关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船只从波罗的海经大小贝尔特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自由通过的问题。最好遵循多瑙河问题会议的先例，举行由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代表讨论此问题的会议。

10) 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应保证我们的煤炭租赁企业正常工作。

^① 索博列夫于1939~1942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长。1940年他出访保加利亚，建议两国签订互助条约。

三、德国—日本过境运输，这是我们强有力的立足阵地，应该指出这一点。

四、如果有人问到我们和土耳其的关系，可以谈我们对土耳其人的回答：我们曾对他们说过，由于没有同苏联签订互助公约，故无权要求苏联给予援助。

五、如果有人问到我们和英国的关系，则按我们在斯大林别墅交换意见的精神谈。

六、谈谈有人告知我们，德国通过罗斯福向英国提出和平建议。这是否属实？答复是什么？

七、对于可能提出的有关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回答说：美国也问我们，在土耳其和伊朗出现危险的情况下，能否给予它们支援。我们对这些问题暂不作答。

八、询问一下，按照三国轴心协议，“大东亚共荣圈”的边界在哪里？

九、在秘密备忘录里，中国是其中要点之一；谈谈必须争取实现对中国（蒋介石）体面的和平。

对此，苏联可能在有德、意参与的情况下，准备承担调解之责；我们不反对承认印度尼西亚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满洲国仍然属于日本）。

十、在保留大英帝国（不包括委托统治地）及英国现在控制的所有领地的条件下，并不干涉欧洲事务和立即撤出直布罗陀和埃及，以及承担义务归还德国前殖民地的条件下，建议以四强公开宣言的形式采取一次和平行动（如果主要谈判进程顺利的话：保加利亚，土耳其及其他）。^①

^① 档案原件中删去了此后的一句话：立刻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参见本专题文件 No05794。

十一、关于苏日关系，开始不超出我给建川美茨^① 回答的范围。

十二、询问波兰的命运——以1939年协议为根据。

十三、关于抵偿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财产问题——一年25%，三年50%（三年等分）。^②

十四、经济事务：在谈判进程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谈谈粮食问题。^③

① 斯大林在给日本驻莫斯科大使的答复中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苏联同意签订条约，但不是互不侵犯条约，而是中立条约。

② 指的是苏联对1940年根据苏德协议离开波罗的海各国的德国人的赔偿。

③ 是指苏联向德国提供粮食。

№05794

斯大林关于删除印度条款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1日）

1940年11月11日13时40分发出

第10063号

如果事情进展到发表声明这一步，我以同志们的名义做一次修正：我建议删除关于印度的条款。

理由是：我们担心条约当事人会把关于印度的条款作为煽动战争的阴谋手段来接受。

收到电报及同意与否请回电。

斯大林

№05795

莫洛托夫关于收到来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1日)

1940年11月11日18时50分发出
20点00分从比亚韦斯托克(柏林)接收

斯大林：

您的10063号电报收悉。同意。谨遵训令。

莫洛托夫

No05793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2日）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以及参赞黑格和巴甫洛夫（翻译）

道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帝国外长说，从他去年访问莫斯科之后两年来发生了不少事件。作为他在莫斯科同俄国国务活动家会谈的继续和对不久前他致斯大林信的补充，他想简要谈谈德国对总的形势和德苏关系的评价。不过他不想预见各类事件，因为下午元首要同莫洛托夫先生举行会谈，届时元首要告诉他自己对政治形势的根本评价。同元首会谈过后还有同帝国外长会谈的机会。可以预料此次交换意见将对两国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莫洛托夫说，他知道给斯大林信的内容，其中对去年秋天以来的各种事件作了总的评述，他希望元首能对信中的分析口头作一些补充，谈谈对总的形势和德苏关系的看法。

帝国外长说，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表示了德国的坚强决心，现在他想再次强调，不列颠世界帝国的末日现在已经到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了。英国已被击败，它什么时候彻底承认自己的失败，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可能很快就要发生，因为英国国内形势日趋恶化。自然，德国欢迎尽快结束冲突，因为它不希望有不必要的人员牺牲。但是，如果英国人还不尽快承认自己的失败，大概明年他们就要乞求和平了。德国正在继续昼夜不停地轰炸英国。德国潜艇将加足马力重创英国，德国认为，

由于这些打击，英国将被迫停止武装反抗。在大不列颠，现在已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安，它预示了出现这种结局的可能性。如果英国经过这些打击还不屈服，那么德国等到气候条件允许时，将毅然转入大规模的进攻，从而彻底摧毁英国。之所以至今还未实施这一大规模进攻只是由于天气原因。

在目前形势下，英国指望美国援助，但是美国的援助完全是值得怀疑的。至于陆上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参战对于德国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德国和意大利任何时候也再不会允许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登陆。英国指望得到美国舰队援助，这也是完全不可确定的事。看来，美国不会超出向英国人提供军事装备首先是飞机这个范围。很难说，真正有多少装备能提供到英国。但是可以预料，由于德国海军采取措施，美国提供的装备能运到英国的将是很有限的。如此看来，美国的援助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在类似条件下，美国参战与否对德国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

关于政治形势，帝国外长指出，在法国战局结束之后德国特别强大了。大概元首还要进一步向莫洛托夫先生讲这个问题。军事行动没有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直接蒙难家庭没有一家抱怨牺牲的——或物质损失。所以德国现在拥有好多个师，而它的空军也越来越强大。潜水艇和其他军舰数量逐渐增加。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任何登陆和实施其他军事行动的企图或美国同英国联合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看，这是毫无问题的。但英国人还不明白这一点，因为在英国，似乎是一片混乱，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首脑在军事和政治上智疏才浅，他在以往所有关键时刻表现得都是无能为力，这次肯定也不能应付。

在其他方面，轴心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完全控制着自己的欧洲部分。已同法国达成原则协议，它打输了战争，作为偿还，它应该

（法国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在以后任何时候都不再支持英国，而应加入反对英国和堂吉珂德式的非洲征服者的战线。由于轴心地位非常强大，他们现在想的不是打赢战争，而是如何尽快结束已赢得的战争。

整个事件发展过程，即德国和意大利尽快结束战争的自然想法，导致两国开始寻找也追求这些利益即反对任何扩大战争和争取尽快结束战争的朋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就是这一追求的结果。他，帝国外长，可以负责地说，已有几个国家宣布赞成三国条约的思想。

帝国外长强调，在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谈判时——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指出，这些谈判完成得很快，从一开始对三个成员国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思想便是：无论如何三国条约不能对三国和俄国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这一思想一经外长提出，立刻得到意大利和日本的赞成。对此日本表现得尤为积极。考虑到美国的军国主义情绪，同日本的友谊对德国来说对于防止战争扩大有着特别的意义。柏林三国条约的第五条规定了同俄国的关系，此条在谈判开始时就反复讨论过。

帝国外长指出，他在访问莫斯科时一开始就说过，在新德国的对外政策概念里，同日本的友谊——它已写进三国条约里，和同俄国的友谊，不仅一样重要，而且对于实现这一对外政策概念完全是有益的，这里指的是尽快结束战争，大概苏联也赞成这一意图。莫洛托夫大概还记得帝国外长在莫斯科讲过的话，德国将完全欢迎俄国和日本相互改善关系。他（帝国外长）把斯大林的意见带回了德国，斯大林同意，如果德国利用自己的影响促进俄日接近那对俄国是有益的。帝国外长指出，他一贯对东京施加这种影响。他认为他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已有结果。不仅从他访问莫斯科时起，而是七八年来，他（帝国外长）在同日本人谈话时一直主张俄日接近。他

认为，就像苏维埃俄国和德国之间可以划定相互利益范围一样，俄日之间同样可以划定相互利益范围。从地缘政治上看，现在日本的方向不是向东和向北，而是向南。里宾特洛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促使了这种发展。德国努力促使同日本接近的另一个原则是意识到这种现实：英国早晚要开始对德作战。所以德国及时执行了相宜的对日政策。

元首认为，试图在广泛的概念框架里确定俄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利益范围完全是有益的。元首长时间和详细地思考过这些问题并得出下面的结论：由于这四个民族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它们领土扩张的基本方向，在执行理智的政策的情况下，自然都是向南。日本正在向南方行动，它在南方巩固所扩张的疆土需要几百年时间。德国已同俄国确定了相互的利益范围，德国在西欧建立新秩序之后将向南方扩展自己的疆土——中部非洲，原德国殖民地地区。同样，意大利的扩张方向是地中海地区的非洲部分——北非和东非。他，帝国外长，也在想，俄国是否值得也在南方寻找自然对俄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公海出口。最后帝国外长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他和希特勒多次讨论过，在莫洛托夫来柏林期间他们想与他分享这些构想。

针对莫洛托夫的问题——他刚才提到出海口时指的是哪个海，帝国外长回答说，按照德国方面的意见，战后世界将发生重大变化。他回忆说，在莫斯科，他曾对斯大林讲过，英国再无权统治世界。英国执行的是荒唐政策，为此迟早它将遭到报应。所以德国认为，不列颠帝国的统治应该发生大的改变。德俄条约至今对两国是有利的，无论是德国，还是俄国，俄国对自己的西部边界可进行公正的修正。德国对波兰和法国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顺利地实施这一修正。德俄条约两伙伴做成了一笔互为有利的投机买卖。对于任何条约来说这都是有利的基础。自然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

题：为什么未来不能实现互为有利的合作呢，苏维埃俄国能否从不列颠世界帝国关系的改变中捞到相应的好处，即俄国能否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方向或说穿了在最有利的地方找到出海口呢。而且俄国还可以在绝对没有德国任何利益的这一亚洲地区实现自己的其他追求。

在发言结束时帝国外长谈到了土耳其。至今这个国家还和法国和英国结有联盟。法国由于失败退出了游戏，而英国作为盟友的意义也越来越值得怀疑。所以，土耳其聪明行事，近几个月减少了同英国的联系，不超过他一个中立国应有的水平。问题是，在对待土耳其问题上俄国有哪些利益。他认为。考虑到很快战争就要结束，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对此都表示关注，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对土耳其施加影响，让它脱离同英国的联系。他，帝国外长，不想作最后的评价，但认为，俄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建立共同的基本概念会逐渐把土耳其拉到四国这方面来。至今他还未同土耳其人谈过这些事情。只是在同土耳其大使秘密会谈时他说过，德国将欢迎这种发展，如果土耳其逐步深入贯彻到目前为止的这种政治路线，成为绝对的中立国，而且补充说，德国对土耳其没有领土追求。

帝国外长继续说，在这方面他完全理解俄国对蒙特勒海峡公约的不满。德国对此更是不满，因为它没能参加这一公约。他（帝国外长）个人认为，应该取消蒙特勒公约和多瑙河委员会并用其他什么东西取而代之。新的条约应在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国家首先是俄国、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签订。很清楚，苏维埃俄国不能对现在的地位满意。德国认为，苏维埃俄国和毗邻国家在黑海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一定优先权是可以接受的。距黑海数千里之遥的国家要求它们与黑海沿岸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是荒谬的。除此之外，同土耳其关于黑海的新条约还应保障俄国的一定的特别权利，

对此详细的意见他现在还不能讲，但是应该向苏维埃俄国的军舰和商船提供比现在更为自由地进入地中海的权利。他（帝国外长）已同意大利朋友讨论过这些问题，刚才他说的思路得到了意大利人的广泛理解，他觉得俄国、德国和意大利对土耳其实行共同政策，以促使它不失体面地同英国断绝这些国家不感兴趣的联系是适宜的。这样，土耳其不仅可以成为反对扩大战争和主张尽快结束战争的共同合力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将自愿地废除蒙特勒公约并同上述三国一起建立新的海峡制度，这一制度将满足俄国的一切正当要求并为其提供一定的特权。同时还可以共同考虑承认土耳其所有权的可能性。

帝国外长在总结自己的发言时说，这里讲的主要是以下几件事：

1. 共同考虑三国同盟成员国如何以某种形式同苏联达成协议，在协议中反映苏联赞成三国同盟的目的——在全世界反对扩大战争和尽快建立和平。

此外，还可提出这些国家想要合作和在相互尊重各自利益方面能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些共同问题。大体方向就是这样，按照这个方向可以缔结相应的条约。具体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谈。如果苏联政府觉得这一思路可以接受，那么随后苏联政府和三国同盟就可实际发表一个它们主张立即建立和平的共同声明。

2. 共同研究以某种形式明确四国利益的可能性。

3. 关于土耳其和海峡问题。

关于这几点应该指出，帝国外长不想得出具体的建议，他只是概括地表达了在给斯大林去信时元首头脑中出现的一些想法。如果苏联政府觉得这些想法还符合实际，那帝国外长就准备亲自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他的意大利和日本同事也一同前往是否有益，因为他知道，他们也准备去莫斯科。当

然，在此之前，应先通过外交渠道确定俄国和轴心国（三国同盟）的关系以及俄日关系。

在总结自己发言时，帝国外长还谈了几句他同中国大使简短谈话的消息。双方任何一方也没促使他进行这次谈话，但他知道日本方面一点儿也不反对这次谈话。为了尽快停止战争，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促使蒋介石和日本之间消除矛盾。他没有建议让德国从中斡旋，但考虑到德国和中国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他把德国的观点转告了蒋介石元帅。日本坚决主张承认南京制度，同时从另一方面又传出了马路新闻，说日本，还有中国正在寻找妥协方案。不能确定，这是否符合事实。但毫无疑问，假如两国达成妥协，这将是有益的。出于这种原因，他（帝国外长）邀请中国大使并向他陈述了德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因为他认为日中之间在这种交换意见的范围里进行对话，讨论类似他想通报莫洛托夫的这些内容不是不可能的。

莫洛托夫同意中日接近是有益的这种意见，他在回答帝国外长这些话时说，帝国外长的话引起了莫大的兴趣。就涉及德国和苏维埃俄国的问题以及其他国家的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他非常理解里宾特洛甫关于三国条约的意义所发表的意见。但是，作为非交战国的代表，他为了能够准确地理解条约的意义，他不得不请求给一系列解释。

在条约中提到了“欧洲新秩序”和“大东亚空间”这两个术语。对大东亚空间的理解非常不一致，至少对没有参加过条约制定的人来说是这样。所以，对他来说，重要是听到对于这一术语实质的更为详细的解释。其他问题，如苏联参与里宾特洛甫所描述的那些行动的问题还必须经过详尽的讨论，不仅在柏林，还要在莫斯科讨论。

帝国外长指出，“大东亚空间”这一术语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

名词，他也未得到过关于这一术语的详细解释。这一措词是在不久前谈判中提出来的，上面已经提到，这些谈判进行得很快。他只能说，“大东亚空间”这一概念一点儿也不涉及对俄国有重要利益的那些地区。他已说过，在缔结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作为重要的一点，已经讨论过条约不应该包括任何直接或间接反对俄国的内容。

莫洛托夫说，在指望长久而有前途地划定利益范围的情况下，心须作详细而准确的说明。所以他请求给他介绍条约参加国的立场，至少要介绍帝国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在划定德俄之间利益范围的情况下必须特别留神。去年确定的这些利益范围仅是部分决定，由于最近事件这些决定已经过时和完结，仅芬兰问题除外，这个问题他以后还要详细谈。必要的长期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俄国在得到关于三国条约的意义、性质和目的的准确信息之后，首先希望同德国、然后同日本和意大利确定利益范围。

这时谈判中止，以便给俄国代表团留出会谈前在小范围里同元首共进早餐的时间。

1940年11月13日^① 于柏林

施密特（公使） 记录

^① 此为记录整理成文的日期。

№05796

莫洛托夫关于与里宾特洛甫谈判情况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2日）

1940年11月12日16时40分发出

18时20分通过电话收到

斯大林：

首场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是同里宾特洛甫进行的，由于现在要去同希特勒会谈，故我先简短地把同里宾特洛甫谈话情况通报于您。他首先详细地重复了他给您的信的内容，然后补充说，德国的利益在于东、西非；意大利——在于东北非；日本——在于往南；而苏联也是往南——向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此外，他还谈了有土耳其、苏联、德国和意大利参加修改蒙特勒公约^①的意见，说要保障苏联的优先地位，而根据可能也不伤害土耳其的“面子”。他希望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最好以声明的形式达成反对扩大战争的协议，他还愿看到日本和蒋介石之间进行妥协。我对他只作了简短的回答，说对他的想法非常感兴趣，应先在柏林，然后在莫斯科，在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我说关于三国条约有许多问题他必须首先向我解释清楚，从原则上讲四国的行动是可能的；我还说，我认为去年的苏德协议在事件过程中已告完结，仅有芬兰问题

^① 关于黑海海峡的1936年公约。

除外。不过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相互关系我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莫洛托夫

№05797

斯大林关于芬兰问题说法不妥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2日）

1940年11月12日22时50分发出

特字第14号

在你的关于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密码电报中，关于除芬兰问题外同德国的协议已告完结一句话说得不准确。这句话是不确切的。应该说，互不侵犯条约的协定书已告完结，而不是协议，因为德国人可能会把“协议完结”这句话理解成互不侵犯条约完结，自然，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等你同希特勒会谈的消息。

№05798

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2日)

参加会谈的有德国外长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以及参赞黑格和巴甫洛夫(翻译)

寒暄几句之后元首说,在今天这次会谈中使他兴奋的一个思想是:尽管在人民生活中很难确定其发展的长期前景,冲突产生常常受到个人因素的莫大影响,但他还是认为,应该尽量确定较长时间的民族发展前景,以便至少可以避免摩擦和排除冲突的原因。今天说这样的话是适宜的,因为今天处于德国和俄国领导岗位上的都是些享有十足威望和可以把握他们国家发展方向的人。此外,在我们提到俄国和德国的时候,指的是两个伟大民族,按其本性,它们可以避免利益冲突,如果其中每个民族都懂得另一个民族需要至关重要的保证,舍此它就不能生存。此外,两国都有不愿为战争而战争的政权制度。为了解决自己内部的任务,它们都需要和平,而不是战争。考虑到这些重要保证,尤其是经济领域的保证,两国应该能使关系得到调解,以使两国甚至在现有领导人百年之后仍能和平合作。

在莫洛托夫表示完全同意这些论断之后,元首接着说:很清楚,确定两国人民和两个国家关系发展的远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元首认为,制定某些共同的完全不以个人因素转移的清楚而明确的原则和实施可在长时期里确保消除冲突的政治经济方针是可能的。德国正在进行战争,而苏联没有,正是这一因素决定了这

次会谈的形势。德国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由进行战争这一因素决定的。战争过程中所采取的许多步骤正是出自战争需要，而这些在战争开始前没有预料到。总的来说，不仅是德国，俄国也得到了许多重大的好处。通过精确分析，可以确定，近一年的政治合作对两国都大有好处。

莫洛托夫说，这完全正确。

元首继续说：两国中哪一个国家也没百分之百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在政治生活中，甚至有 20% 或 25% 的要求实现时要付出众多代价。他认为，未来不是每一个理想都能实现。但是欧洲这两个最重要的民族，如果它们一起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在它们相互对立情况下所不能及的。在它们抱成一团儿的时候，它们都能取得某种优势。如果它们相互反对，那只能是第三国获利。

莫洛托夫指出，元首的思路非常正确，而且被历史所证实，但它还是对今天的现实更为重要。

元首继续说：现在军事战役基本上已经完成，所以他又重新冷静地给自己提出了德俄合作的问题。

战争进程导致了军事行动的扩大，这一点德国未曾预料到，但德国被迫一次次以军事行动对一些事件做出了反应。然后元首简要地向莫洛托夫通报了军事行动的进程，这一进程使得英国现在在大陆不再拥有军事力量。他特别谈了现在实施的反对英国的军事战役。指出了天气条件对这些战役的影响。英国人的抵抗行动是非常可笑的，而俄国先生们可亲眼看见并确信要想粉碎柏林那简直是无稽之谈。待天气条件一好，德国就要对英国实施坚决而强大的突击。现在德国不仅试图为这一决定性的突击实施有准备的军事措施，而且要明确在这一冲突之中和以后起作用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他又一次审视了同俄国的关系状况，不仅考虑了不利的方面，而

且还考虑了这一关系正面发展——如果可能的话——的远景。从中得出了以下结论：

1. 德国不请求苏联的军事援助；

2. 由于军事行动的极度扩大，为了对付英国的抵抗行动，德国不得不进入离德国遥远而德国在那里又无第一位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地区；

3. 因此，产生了一些需求，它们的意义只是在战争过程中才充分显示出来了。但它们对德国来说绝对是需要的。这些需求系指某些原料产地，德国把它们看成是至关重要的和绝对不能替代的因素。莫洛托夫先生可能认为，这同当时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达成的有关利益范围的协议有出入。不过俄国在实施反对波兰的战役时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冷静审视德国和俄国利益时，他（元首）经常不是准备让步而是想适宜满足俄国的要求，例如在立陶宛问题上。从经济观点看，立陶宛对我们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但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我们理解调解这一整个地区政治形势的必要性——以此防止，尤其是防止未来产生导致德国和俄国关系紧张的思想倾向。在南蒂罗尔问题上，德国也采取了类似立场。但对德国来说，在战争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在战争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因素，而它们在实施军事战役期间应被看做是绝对至关重要的。

他（元首）抛开次要方面，着重考虑了如何弄清德俄合作的基本因素，德俄关系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向前发展。对于德国来说，这主要指以下几点：

1. 空间不足。在战争过程中，德国占领了如此大的以致它可充足使用 100 年的领土。

2. 在中部非洲增加一定数量的殖民地的必要性。

3. 德国需要某些种类的原料，在任何情况下也要保证弄到这些原料。

4. 德国不允许敌国在某些地区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

以上几点，任何一点也不触及俄国的利益。俄国可以发展，丝毫不损害德国的利益。（莫洛托夫认为这一想法非常正确）。如果两国意识到这一点，理顺共同的互为有利的工作，那么它们就能防止困难、紧张形势和精神负担的出现。十分清楚，德国和俄国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一个世界。两国将永远作为世界的重大组成部分而互相独立存在。其中任何一方都可按照自己的观念建设自己的未来，如果它能考虑另一方的利益。德国在亚洲除了一般的经济和商贸政治利益并无其他利益。它在那里没有殖民地利益。而且它知道，在亚洲，可能的殖民地空间看来属于日本。但是，如果中国进入觉醒民族之林，考虑到它的众多人口，那么任何殖民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欧洲，德国、俄国和意大利有不少共同点。这三国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明确希望得到公海出海口。德国想进入北海，意大利想去掉直布罗陀门栓，而俄国想进入世界海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大国在这方面如相互之间不发生冲突，它们得到公海出海口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他（元首）从这一观点出发分析了战后欧洲关系的发展。欧洲主要的国务活动家们应该阻止从这一场战争中引出新的战争。所以，必须这样解决所要调解的问题：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要产生新的冲突。

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元首）同法国国务活动家谈过话^①，他认为，他从他们那里找到了对调解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可导致在未来建立可接受的关系，从而对所有感兴趣的方面都是有益的。他曾援引同法妥协条约序言对贝当和赖伐尔指出过，现在仍同英国进行战争，丝毫不能采取任何有害于建立反对大不列颠战争结束前提

^① 1940年10月22日和24日希特勒会见了赖伐尔和贝当。

的步骤。

在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例如德国在巴尔干没有任何政治利益，它在那里作战只是为了保障自己对某些原料的需求。这里说的是纯粹的军事利益，而保障这些利益不是轻松之举，如在罗马尼亚，那里的德国部队要靠几百公里之外的供给中心供应^①。

出于同一种原因，对德国来说，英国可以在希腊建立工事以及在那里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将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一点。

在这种条件下继续战争自然不是心甘情愿的事。所以德国在完成波兰战局之后就想要停止战争。当时英国和法国不必付出流血的代价就可得到和平，但是它们选择了继续进行战争。自然是鲜血铸就了真理，同样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国家进行了宣战和实施了战争，然而并没有为此承担责任。关于这一问题，元首明确地向法国人表示过。但是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就该是两国交战之初谁有罪谁就该加倍偿还。无论如何对于德国来说，去年结束战争和复原部队以便重新开始和平工作最好，因为从经济观点看，任何战争都是不好的事情。即使是对胜利者而言，它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也要承担战争负担，而在和平发展的情况下，它可以较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一思想，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以战争手段达到目的总比以和平行动花费更多的代价。元首继续说，在复杂的形势下，由于军事情况的发展，德国不得不在它没有政治利益而至多只有经济利益的地区作战。但是这里的自我保存应该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尽管如此，德国在上述地区的被迫行动不是建立世

^① 指1940年10月12日派遣德国军事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

界和平的阻力，和平是必须要实现的，它给从事共同事业的民族带来它们所希望的东西。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美国问题。美国今天执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它不是为英国进行斗争，而是为了把不列颠世界帝国搞到手。它帮助英国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此刺激自己的军备，靠获得军事基地来加强自己军事强国的地位。这里说的是未来，当这个与英国一模一样行事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其他可能受到它伤害的国家应该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这不是近来的问题，不是1945年的事，也不是1970年或1980年之前的事，这是遥远的事，到那时，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严重威胁其他民族的自由。而现在欧洲大陆就应为这种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应该团结一致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任何获得军事基地的企图。所以，他已开始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交换意见，以便同这些国家一起为整个欧洲和非洲大陆制定一种门罗主义并采取新的共同的殖民政策：按照这种政策，上述每一个国家都可争取它实际可以利用的东西。在其他地区，如果俄国在那里有优先权，自然它的利益也优先。这样，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国家的大联合：它们应该冷静地考虑现实并依此在相互之间确定自己的利益范围并在相应的条件下确定自己对于其余世界的关系。建立这样的上述国家大联合自然是非常困难的。但毕竟提前思考这件事不比实际实现它复杂。

然后元首又回到德俄的意向这一问题上，他表示完全理解俄国想有不冻港和绝对保证公海出海口的企图。德国在它现在的东部省份大大扩大了自己的生活空间。但是这一空间至少一半可以说是经济上亏本的地区。可以说，俄国也好，德国也好，都没有达到自己提出的目标。但无论如何两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如果广泛地看待其他问题，那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德国正在进行战争，它应该占领在政治上对它没有意义的一些领土。未来两伙伴可获得巨大的

好处。

这时元首又回到巴尔干问题上，重申德国将迅速以武力反对英国在萨洛尼卡立足的任何企图。德国对最后一次战争中萨洛尼卡不愉快的事情^①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回答莫洛托夫关于萨洛尼卡有何危险的问题时，元首指出：罗马尼亚油田离此很近，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卫这一油田。但一旦出现和平，德国部队则立即撤离罗马尼亚。

在继续会谈过程中，元首问莫洛托夫，俄国打算怎样保障自己在黑海和海峡的利益。德国随时准备帮助俄国达到改善海峡制度的目的。

莫洛托夫指出，希特勒的讲话带有泛泛的性质，一般说来他可同意这一思路。他认为，如果两国共同合作，不搞对抗，那么对德国和苏联将是有益的。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斯大林给了他明确的指示，所以下他要说的切话都是符合斯大林的观点的。他同意希特勒的意见：两国从德苏协议中都获得了很大好处。德国有了可靠的后方，众所周知，这对去年战争中事态的发展非常重要。德国还在波兰得到了重大的经济实惠。通过拿立陶宛交换卢布林省排除了俄国和德国之间产生摩擦的可能性。所以说应该认为去年的德俄协议除芬兰条款外都实现了。芬兰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要求元首谈谈，德俄协议关于芬兰的条款是否还算数。根据苏联政府的意见，这里没有什么变化，而去年的德苏协议仅仅解决了部分问题。同时其他一些问题也成熟了，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随后莫洛托夫转向三国条约的意义。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可以用什么形式吸收苏联参加？在柏林谈判期间必须讨论这些问题，在预计的帝国外长访问莫斯科期间——俄国人自然期待

^① 指英法军队1915年在萨洛尼卡登陆一事。

这一访问^①——还要讨论它们。此外，还要明确同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的利益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及涉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一些问题。对于俄国政府来说，如果它能得到对以上问题的解释，那它对希特勒提出的那些问题采取具体立场将是很简单的事。苏联政府对欧洲新秩序尤其是对建立这一新秩序的期限和形式感兴趣。它还想得到关于所谓大东亚空间界限的概念。

元首回答说，三国条约应该整顿涉及欧洲国家利益的欧洲关系，因此德国现在呼吁苏联，希望它在它感兴趣的地区有发言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没有苏联的参加都不应进行关系调整。这不仅涉及欧洲，而且涉及亚洲，在那里俄国应该参加大东亚空间的划界，并确定自己在那里的追求。德国对此只作中间人。无论如何俄国不应被排除在决定因素之外。

当元首试图组织以上提到的国家大联合时，使他感到最为复杂的问题不是德俄关系，而是德、法、意之间能否进行合作的问题。只有现在，当他认为这一问题可以解决和调整的基本轮廓已被这三国赞同的时候，他才认为可以同苏维埃俄国接触探讨黑海关系调整问题、保加利亚问题和对待土耳其的问题。

在作总结时，元首宣布，在某种程度上这里说的是在考虑西欧问题以及东方问题的情况下实施广泛合作的初步设想；西欧问题必须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调解，而东方问题主要涉及俄国和日本，但德国可以作为中间人为其提供善意的服务。这里说的是反对美国“靠牺牲欧洲利益而获得好处”的所有企图。美国无论在欧洲，还是在非洲和亚洲都应该规规矩矩，什么也不应该插手。

莫洛托夫同意元首关于美、英作用的说法。他觉得俄国参加三国条约原则上讲完全是可能的，如果俄国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伙

^① 这一访问未能实现。

伴的话。在这种条件下他认为俄国参与共同努力没有困难。但必须明确的是确定条约的目的和意义，尤其是大东亚空间的边界。

这时，谈判由于可能宣布空中警报而中止，而推迟到第二天继续进行。同时元首答应莫洛托夫，他要详细同他讨论谈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1940年11月16日^① 于柏林

施密特 记录

^① 此为记录整理成文的时间。

No 05799

莫洛托夫关于与希特勒会谈情况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4时45分发出

4时50分收到

斯大林：

我同希特勒进行了首场会谈，时间持续2小时30分钟。说好明天接着谈，然后等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时再谈。希特勒首先发言，用去了一个多小时，他讲：

（1）去年的苏德协议对两国都是有利的，至于说有些地方没有执行，照他的话讲，任何时候政治协议都不会百分之百地执行，而有时只能执行百分之二十五；

（2）德国和苏联的利益和生存空间没有矛盾，可以调节，在未来百年之后仍可调节；

（3）英国已被战胜，一旦天气条件允许，他将让人们具体地看到这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所有情况下英国都不应插手欧洲事务；

（4）法国活动家，如贝当和赖伐尔，用希特勒的话讲，他们理解和迎合德国的计划：

（5）现在德国的利益在中非，大体相当于德国原殖民地的范围，只是稍有调整，因为在欧洲德国已保障自己有今后至少一百年的空间，尽管在其他场合他讲过，原料需求促使他们在巴尔干行动

(反对英国不仅是为了军事利益)；

(6) 德国在亚洲只有一般的商贸利益，未来亚洲属于日本，但那里可能有众多人民的复兴；

(7) 美国地位特殊，因为美国执行的政策纯粹是帝国主义的而不是保卫英国的，同时按照门罗主义，美国只应该从事美洲事务而不应干预欧洲事务；

(8) 可以说，除遥远的摩尔曼斯克和远东，苏联没有进入大洋的自由出口，应同其他国家协商考虑这一问题；

(9) 德国在同英国斗争过程中，必须到它不想去的地方，但因对英作战需要，它被迫临时这样做——到巴尔干。希特勒宣布，在缔结和约之后，德国部队将立即撤出罗马尼亚，同时德国承认苏联在黑海和巴尔干问题上的利益。但黑海没有自由出海口，因为它要进入地中海那里将永远有意大利存在。

(10) 希特勒特别指出，他不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但他总是说必须在“广泛的范围里”同我们达成协议。

我就希特勒对许多重要问题发表的意见作了回答，由于我是通过翻译来评断这些意见的，所以我说，在这些意见中我听懂了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正确的，是值得继续共同讨论的。至于去年的苏德协议，它确实有利于德国（第一，在西方展开战争时东方有巩固的后方。第二，得到了波兰）和苏联，后者认为除芬兰问题外该协议已经完成，关于芬兰问题，我还打算继续进行更为具体和坦诚地谈话。现在到了谈苏德之间更为广泛的协议的时候了。但由于有三国条约这一新的因素存在，在谈之前必须先弄清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好向希特勒解释苏联感兴趣的问题和在万不得已时解释同黑海和巴尔干有关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必须首先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尔后是土耳其问题。我要求继续向我——没有参与三国条约问题准备和决策的政

府的代表解释：条约成员国是怎样理解“欧洲新秩序”的，哪些国家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一条约，计划多长时间实现条约的基本思想，什么是“大东亚空间”及其界限在哪里，条约成员国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涉及苏联。

希特勒明显地活跃起来，并开始解释：关于欧洲，三国条约确定由德、意两国协调，两国想就欧洲问题同苏联达成协议。关于亚洲，日本也应该同苏联达成协议。

德国（希特勒在这里和其他一些情况下称“我们”——不清楚他这里是单指德国人还是指条约所有成员国）邀请苏联以第四个伙伴的名义参加三国条约。同时希特勒保证，“他们”不想让苏联处于协从的地位；“他们”想知道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利益如何，以便同苏联相互协调利益，做一名好的苏、日和苏、意中间人；弄清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问题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条约专门规定，不触犯苏联的利益，不背着苏联预先决定苏联利益。

对希特勒的解释我表示了感谢，但我仍回答说，我等待希特勒对条约参加国计划作某些补充解释。我补充说，苏联不拒绝参加四国这样和那样一些共同行动，但如果仅作为客体，苏联不会参加三国条约。希特勒大笑起来，强调说，苏联不应是客体，而应是新条约的主体，并且宣布，他非常希望已开始了的会谈能意见一致地继续下去。

因为我们的会谈是额外安排的，已经到了吃饭时间，所以约定明天，11月13日，我在他那里吃早饭，饭后继续会谈。

最后，我要补充说，我们在莫斯科事先的分析正确地阐明了我在这里碰到的问题。现在我努力获得信息，观察这些伙伴们。在谈话中他们的回答有时候不清楚，需要进一步订正。希特勒的很大兴趣在于在势力范围问题上同苏联达成协议并加强同苏联的友谊。很

明显，他还想把我们推向里宾特洛甫想让其恪守中立立场的土耳其。对芬兰问题他们现在缄口不谈，但我要迫使他们开口。

请指示。

莫洛托夫

1940年11月13日

№05800

莫洛托夫关于改变芬兰问题说法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5时30分发出

6时50分收

斯大林：

您的第14号电报收悉。关于芬兰问题的说法我已改正，做到措词准确。同希特勒会谈的通报我已发出。

莫洛托夫

№05801

莫洛托夫关于与希特勒谈判方针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10时05分发出

11时55分收

斯大林：

今天早饭我要会见希特勒，时间是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钟。饭后立即接着谈判。最好能在3点钟前收到您的指示，尤其是在声明（是否建议）中国、土耳其问题以及我们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利益等问题上的指示。

据我看，应该：

1. 关于声明，坚持通过的决议并见机行动；
2. 关于中国，建议按照以前的决定，即按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时通过的最后决定行事；
3. 关于土耳其，不到迫不得已不要把问题搞僵；
4. 关于波斯湾，讲话要坚定，但泛泛而已。

莫洛托夫

№05802

斯大林关于与希特勒谈判方针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11时^①发出

1. 关于黑海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希特勒，问题不仅在于黑海出口，而主要在于它的入口，这一入口一直被英国和其他国家用来对苏联海岸实施进攻。从上个世纪克里木战争到1918年和1919年外国军队在克里木和敖德萨登陆，所有事件都表明，海峡问题得不到调整就不能说苏联黑海地区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说，苏联对黑海问题的兴趣是苏联海岸防御和它的安全保障问题。与此紧密相联的是苏联保障保加利亚的问题，因为不同保加利亚就苏联军队通过它的领土保卫黑海入口问题达成协议就不能保障海峡地区的安宁。目前这一问题之所以非常紧迫不能拖延，不仅是因为土耳其同英国有联系，而且因为英国海军占领了希腊的岛屿和港口，利用它同希腊的协议，它从那里可以一直威胁苏联的海岸。

2. 其余所有问题，按照你已经知道的训令办理，至于下一步谈判的结果，你基本上能同德国人达成协议，而莫斯科只剩下收尾和办理手续，——那就最好不过了。

3. 我们认为你在谈判中的行为是正确的。

^① 这里表明的是莫斯科时间。

№05803

斯大林关于与希特勒谈判策略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14时50分^①发出

我们建议：

1. 不暴露我们对波斯的过多兴趣，只讲我们不反对德国人的提案。

2. 关于土耳其，暂时主张按照里宾特洛甫的精神，和平解决问题，但是要讲，没有我国保障保加利亚，不允许我们的军队进入保加利亚以作为对土耳其的施压手段，和平解决是不现实的。

3. 如果德国人建议瓜分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您可按照训令精神摊牌，使用上次密码电报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的论据。

4. 关于中国，同意里宾特洛甫妥协的意见，暂不运用训令中的措施。

5. 关于声明，表示原则同意，不要更改其条款。

^① 这里表明的是莫斯科时间。

№05805

莫洛托夫关于同戈林和赫斯谈判情况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15时发出

16时40分通过电话收到

斯大林：

我同戈林和赫斯进行了会晤。同戈林我们简要谈论了改善和加强两国经济关系的愿望。同赫斯的会谈没有政治意义。

受里宾特洛甫的委托，舒伦堡刚到我这里来过，说去年关于芬兰问题的协定仍完全有效。我要求应据此得出实际的结论：

（1）从芬兰撤出德国军队；（2）在芬兰和德国停止旨在伤害苏联利益的政治游行。我提醒说，在芬兰问题上，柏林应该明确表态，以便不妨碍通过新的更重大的共同决定。

莫洛托夫

№05804

莫洛托夫关于在黑海等问题上力争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3日)

1940年11月13日15时发出

17时通过电话收到

斯大林：

您关于黑海问题说明的电报收悉。现在我就去吃早饭并同希特勒会谈。我要在黑海、海峡和保加利亚问题上力争。

莫洛托夫

No05806

希特勒和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3日）

参加会谈的有德国外长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以及大使馆参赞黑格和巴甫洛夫（翻译）

元首谈了他对昨天会谈中莫洛托夫意见的看法，根据莫洛托夫的意见，德苏协定“除芬兰一条外，已经实行”。

莫洛托夫强调说，该意见不仅涉及条约本身，首先涉及的是秘密协定书。

元首回答说，在秘密协定书中确定和划分了德苏势力范围和利益区。如果说到实际占领，那么德国方面坚持了协议，而俄国方面不都总是如此。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没有占领属于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

昨天提到了立陶宛。毫无疑问，在当时情况下，拒绝德苏第一个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国主动造成的。问题已很清楚，后来在瓜分波兰时出现了困难，为了回避这些困难才促使俄国人拿出了自己的提案。无论如何，卢布林省在经济上不是立陶宛的等价物。不过，德国方面也得出了结论，由于事态发展，已出现必须改变第一个协议的形势。

对布科维纳也是这样。其实，按照最初的协议，德国只对比萨拉比亚没表示兴趣^①。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承认，从明确的观

^① 实际上德国在协定书中声明对东南欧没有兴趣。

点出发修改协议，这对另一个合作伙伴来说是适宜的。

对待芬兰的原则也完全与此类似。德国在那里没有政治兴趣。俄国政府清楚这一点。俄芬战争期间，德国恪守了自己奉行绝对友好中立政策的承诺。

莫洛托夫这时指出，在这场冲突中，俄国政府对德国的立场没有怨言。

元首这时指出，他甚至在卑尔根扣留了往芬兰运送武器和弹药的船只。其实德国并无权这样做。德国由于自己在俄芬战争中的立场，已把自己摆在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瑞典严重对立的地位，结果在挪威战役中——这一战役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德国为了防止瑞典进攻，确保安全，被迫多使用了几个师，如果不是这样，就无需动用这么多兵力了。

实际上形成了这样的形势，按照德苏条约，德国承认，芬兰首先在政治上使俄国感兴趣，处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内。但德国应该考虑两点：

1. 在战争时期，德国对芬兰提供镍矿石和木材感兴趣。^①

2. 德国不希望波罗的海出现新的冲突，因为冲突会限制德国在这个它为数不多的对外通商海域里自由行动。关于德国军队占领芬兰的推测是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通过芬兰只是把部队运到了希尔克内斯，德国已正式把这一情况通知俄国。由于路线很远，火车在芬兰领土上得停2~3次。一旦完成一定数额调动部队的过境运送，就不再通过芬兰调动部队。他（元首）指出，为了德国和俄国的利益，不能允许再把波罗的海变成战场。自俄芬战争之时起，在军事战役能力方面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英国有了远程轰炸机和活动半径很大的驱逐舰，因此英国人有了在芬兰机场上设防固守的能

^① 1940年7月27日签订了德芬协定，规定芬兰开采的镍矿石的60%供给德国。

力。

此外，还有一个纯精神方面的因素，它是非常不利的。芬兰人进行了英勇的防御，赢得了世界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同情，就是在德国，在俄芬战争期间，人民之中都有一种不满情绪，他们对德国政府实际是按照同俄国的协议所采取的立场不满。有鉴于此，德国不希望发生新的芬兰战争。但这不涉及俄国的合理追求。德国不止一次通过它对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对奥兰群岛的设防问题^①的立场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战争时期，德国在芬兰的经济利益是很大的，就像在罗马尼亚一样。德国希望能考虑它的利益，何况当时它在立陶宛和布科维纳问题上对俄国人的意图表示了理解。无论如何，德国在芬兰没有任何政治利益，它完全同意芬兰属于俄国势力范围这一事实。

莫洛托夫回答说，1939年条约属于一定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已随波兰战争结束而告终，法国失败可算是第二阶段，说实在的，现在已开始第三阶段。他顺便提到，在最初的条约中，以秘密协定书的形式确定了德俄共同边界，调节了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罗马尼亚、芬兰和波兰等国有有关的问题。然后他对元首提出修改条约表示同意。在总结法国失败后的形势时他说，德俄条约对于德国的重大胜利不是没有影响的。

对于因立陶宛和卢布林省修改最初条约的问题，莫洛托夫指出，假如德国不想这样做，那苏联也就不坚持。他只是认为，新的决定符合双方利益。

帝国外长这时说，尽管俄国没把这一修改作为必要条件，但也是一直在积极争取。

莫洛托夫重复了一个论题：苏联政府不反对一切照旧，还像最

^① 1940年10月15日芬兰同意奥兰群岛实行非军事化。

初条约里规定的那样。无论如何，德国在立陶宛的配合行动得到了补偿——得到了一块波兰领土。

元首就此指出，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交换不能算是补偿。

莫洛托夫然后提到关于立陶宛的一块领土^①问题，指出，苏联政府至今还未收到德国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答复。但是苏联政府期待会形成明确的立场。

关于布科维纳，他承认，当时指的不是秘密协定书中所说的那个地方，而是另外一个地方。最初俄国把自己的利益局限在北布科维纳。但在目前形势下，德国应理解苏联在南布科维纳的利益，然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俄国并没有得到对自己需求的答复，相反，德国对罗马尼亚整个国家领土提供保证，完全忽略了俄国对南布科维纳的愿望。

元首指出，这里说的是德国方面的重大让步，假如说布科维纳的一部分可被俄国占领的话。根据口头协议，原奥地利领土属德国利益范围，划归俄国的领土当时也提到了，不过只提到比萨拉比亚。关于布科维纳，协议里只字未提。最终也未能确定“势力范围”一词的准确含义。无论如何，这里丝毫未破坏协议。为反驳莫洛托夫所说的关于对立陶宛的一块领土和布科维纳问题的修改同德国使用武力所作的其他修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元首回答说，所谓“用武力修改”完全不是条约的内容。

但莫洛托夫坚持他说的意见——俄国希望的这些修改有其一定的重要意义。

元首回答说，为了德苏合作未来有一个好的结果，苏联政府应当明白，德国进行的斗争是殊死斗争，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要夺取胜利。为此需要一系列经济和军事因素的前提条件，德国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证这些前提条件。假如苏联也处于这种形势之中，那德国

^① 指立陶宛南部原归属德国现纳入立陶宛版图的一块“凸出”领土。

对俄国的要求就会表现出——实际已经表现出——同样的理解。德国要保证的前提条件同德苏条约并不矛盾。德国想避免后果难以预料的波罗的海战争，这并没有破坏德苏条约，根据条约，芬兰划入俄国势力范围。根据罗马尼亚政府的意愿和请求所提供的保证没有破坏比萨拉比亚的协议。

苏联应该意识到，如果两国扩大合作范围，那便可获得更多的好处，比现在讨论的那些不大的修改要强得多。那时可望获得更大的胜利，如果俄国不在德国在战争过程中感兴趣的地方寻求胜利。德国和俄国在对待外部世界时越紧密团结，未来取得的胜利就越大，相反，两国越对抗，成就就越小。在第一种情况下，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能对抗我们两国的国家。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同意元首的最后结论。同时，他提请注意苏联政府尤其是斯大林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加深和改善两国关系是相宜的。但是，为了给这种关系奠定基础，还应该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虽不具有具体意义，但毕竟有害于德苏关系的气氛。芬兰问题便是其一。在俄德之间友好协商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通过战争便可解决，但芬兰不该有德国驻军，在这个国家里也不该有反对苏维埃俄国政府的政治示威。

元首回答说，第二点无论如何不属讨论范畴，因为德国同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组织游行容易，制止就难了，无论其真正组织者是谁。至于德国部队，他请放心，如果能达到共同理解，在芬兰就不会再出现德国军队。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认为示威活动还包括向德国派芬兰代表团或在这个国家接见芬兰官员。德国部队进驻的事实导致芬兰摇摆不定的立场。例如，提出了“谁同意最近的俄芬和平条约^①，谁就不

^① 指 1940 年 3 月 12 日的和平条约。

是芬兰人”等类似的口号。

元首回答说，德国一直在劝说芬兰尤其是罗马尼亚接受俄国的要求。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政府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彻底调解和弄清芬兰问题。为此无需新的条约。按照德俄旧条约，芬兰已划入俄国利益范围。

元首对此最后解释说，德国不希望波罗的海发生战争，而且确实要芬兰提供镍和木材。它在政治上对芬兰不感兴趣。它与俄国不同，没占芬兰一寸土地。德军部队过境近几天即将完成，以后不再运送。对德国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俄国是否想同芬兰作战。

莫洛托夫对此有些躲躲闪闪地说，一切都会好的，如果芬兰政府不再以摇摆不定的立场对待苏联，并在居民中停止煽动仇恨情绪，如提出上面例举的口号。

针对元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下次瑞典将干涉俄芬战争——莫洛托夫指出，对于瑞典他什么也不能说，但应强调，德国也好，苏联也好，都对这个国家的中立感兴趣。自然，两国也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宁感兴趣，不过苏联完全有能力保持这一地区的和平。

元首指出，在欧洲其他地方可能出现过这种情况，再好的军事意图也会因地域因素而变得非常难以实现，所以他可以想象，如有新的冲突，在瑞典和芬兰可能形成独特的对抗策源地——这一策源地可为英国或美国提供空军基地。这将迫使德国进行干预。他（元首）非常不乐意这样做。昨天他已指出，很可能再次出现干预萨洛尼卡的必要性，一个萨洛尼卡他就够了。他不再对在北方开始军事行动感兴趣。他再次强调，在未来两国合作的框架里可以取得其他结果，据他看来，俄国在和平条件下可得到它想要得到的一切。此处指的仅是拖延半年或一年时间，此外，芬兰政府刚刚送来照会，

其中答应同俄国进行最紧密和友好的合作。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些说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他们坚持他以上说的观点，波罗的海地区的和平绝对可以得到完全保证，如果德国和苏联之间完全弄清芬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明白，为什么俄国应该拖延半年或一年实现自己的意愿。因为在德俄条约中没有指明期限，也没束缚任何一方在自己利益范围里的行动。

元首在强调根据俄国方面的意愿对条约所作的修改时指出，波罗的海不应有战争。波罗的海冲突可能成为德苏关系和未来大规模合作的严重障碍。按照他的意见，未来合作要比理顺目前一些次要问题重要得多。

莫洛托夫反驳说，这里所说的不是波罗的海战争，而是芬兰问题和在去年条约框架里解决这一问题。他在回答元首的问题时说，这一问题他认为应在比萨拉比亚和周围国家^① 范围里解决。他请求元首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当元首回答他只能重复不该同芬兰发生战争，因为这一战争会带来长远影响时，莫洛托夫说，这一声明把去年条约中未反映的新因素带入了辩论中。

元首反驳说，在俄芬战争期间，德国不顾由于战争在斯堪的纳维亚可能出现盟军基地的危险，恪守自己对俄国承担的义务，一直劝说芬兰采取妥协立场。

帝国外长这时指出，德国甚至禁止芬兰使用电缆通过电台向美国呼吁的要求。

元首接着说，就像当年俄国提出瓜分波兰会使德俄关系复杂化一样，他现在也坦诚地宣布，芬兰战争也会使德俄关系复杂化。他

^① 指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要求俄国人应善解人意，就像一年前他在波兰问题上所表现得那样。考虑到俄国人的外交天才，肯定他们会找到避免这一战争冲突的途径和手段。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不理解德国方面的担心——在波罗的海地区能发生战争。在去年国际形势比今年对德国还不利的时候，帝国都未曾提出这一问题。它已完全击溃法国，更不用说已占领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而现在它认为已战胜了英国。他（莫洛托夫）不明白，怎么在这种条件下又提出了波罗的海战争威胁的问题。他不得不要求德国采取去年的立场。如果德国能无条件地这样做，那么芬兰问题不会产生任何麻烦，如果它不这样做，那就出现了需要进行谈判的新形势。

在回答莫洛托夫关于从军事角度看芬兰问题没有危险的议论时，元首强调，他也明白一些军事问题，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瑞典参加可能的战争的情况下，美国会在这一地区设防布阵。他（元首）希望欧洲结束战争，并只能再一次说，波罗的海新的战争会使德俄关系复杂化，并且瑞典的不明立场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如果美国因芬兰冲突而进行干涉，俄国将对美宣战吗？

当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时候，元首反驳说，当问题成为现实的时候再确定立场就为时已晚了。莫洛托夫又说他没看到在波罗的海发生战争的征兆，这时元首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议论都带有纯粹理论的性质。

帝国外长在作总结时指出：

1. 元首宣布，芬兰仍属俄国利益范围，德国不在那里驻军。
2. 德国同芬兰的反俄示威毫无关系，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做有利于俄国方面的工作。
3. 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问题在于两国合作。在过去，合作已给俄国带来莫大的好处，而未来它所带来的好处会更大，与之相

比，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借芬兰问题制造难题。说不定这里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其实，俄国在同芬兰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已使自己的所有战略意图得到满足。在被战胜的国家里出现游行示威也不是什么完全反常现象，比如说，如果德国部队过境会在芬兰居民中引起一定反映，那么这种反映无论如何会随着过境结束而烟消云散。如果以这种观点现实地看待事物，那么德俄之间就不会存在观点分歧了。

元首指出，芬兰属于俄国的利益范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观点实际是一致的。为了不再继续纯理论性质的争论，最好转入更重要的问题。

在战胜英国之后，面积 4000 万平方公里的不列颠世界帝国作为破产财产可能被瓜分。在这一财产中也有俄国的一份——它通向不冻的和真正开放的世界海洋的道路。少数人即 4500 万英国人至今统治着 6 亿不列颠世界帝国的居民。他想消灭这一少数。其实美国所干的也正是为了今天从这份财产中割去它感到饴甘饴肥的几块而已。自然，德国想避免一切冲突，因为它会分散德国对付世界帝国心脏——不列颠群岛的精力。所以他（元首）不同情意大利针对希腊的战争，因为它分散力量，不能把力量集中到反对英国这一点上。如果波罗的海发生战争，情况与此是一样的。

同英国的斗争将进行到底，他相信不列颠群岛的失败必然导致帝国之崩溃。认为能从其他地方，比如说从加拿大统治和维持世界帝国的统一，那简直是幻想。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极为开阔的前景。在最近几个星期同俄国开展外交谈判的过程中，他们应该清楚和确定俄国参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所有垂涎破产财产的国家都应该停止它们之间的冲突而只进行瓜分不列颠世界帝国的斗争。这里说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满怀兴趣地注意了元首的思路，对自己听

懂的东西都表示满意。但是他可以说他听懂的不多，远不如元首，因为他，毫无疑问，对这一问题已深思熟虑，对问题已有自己具体的想法。现在最重要的是首先明确意大利和日本也可参加的德俄合作。而且无需改变它的初衷，只要明确它的下一步方向就可以了。

元首指出，关于开辟广阔前景，下一步工作很简单，他强调德国不急于吞并法国，俄国人看来也这样认为。德国想建立一个有关方面的全世界同盟，它可由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苏维埃俄国和日本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代表由北美到东亚所有那些企图以不列颠破产财产来满足自己追求的人的共同利益。为此，应该克服这一利益大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为此必须理顺许多问题。在西方，即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元首认为，他现在找到了可使大家都满意的方法。比如，西班牙和法国本不容易在北美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由于双方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广泛的可能性，这两个国家迫使自己达成了一致意见。

用这种方法理顺在西方的所有问题之后，现在该轮到在东方达成协议了。这里指的不仅是苏维埃俄国和土耳其的关系，而且还有大亚细亚地区。大亚细亚包括的不仅有东亚地区，而且还有纯亚细亚地区，从这一地区可以向南，而德国现在承认这一地区为俄国利益范围。这里说的是为未来人民的的活动大体划定一个界限，为民族争得一个大的空间，使其在未来50~100年内有充分的活动余地。

莫洛托夫回答说，元首提出了许多问题，不仅涉及到欧洲，而且越出了欧洲界限，涉及到其他许多地方。就此他想谈谈对靠近欧洲的土耳其的意见。作为一个黑海国家，苏联同许多国家有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还有一个问题未弄清楚，多瑙河委员会^①现在正

^① 该委员会从1940年10月28日起举行会议，与会的有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罗马尼亚的代表。

在讨论这一问题。苏联对罗马尼亚表示不满，它未同俄国协商就接受了德国和意大利的保证。苏联政府已两次陈述自己的观点，它坚持这样的意见：这种保证是违反苏维埃俄国的利益的，如果“可以这样不客气地表示的话”。这里出现了取消这种保证的问题。对此元首指出，这种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是必需的，因此取消它是不可能的。这涉及到作为黑海国家的苏联的利益。

莫洛托夫然后提出了海峡问题。他援引克里木战争和 1918～1919 年事件，称海峡为侵略苏维埃俄国的大门。对于俄国来说，英国现在希腊设防布阵，这是一种很大的威胁。从安全角度考虑，苏维埃俄国同其他黑海国家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莫洛托夫问元首如果俄国给靠近海峡最近的保加利亚这个独立国家也提供同等条件的保证，就像德国和意大利给罗马尼亚提供的一样，那么德国会说什么呢。不过，俄国打算先同德国，如有可能再同意大利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①

在回答莫洛托夫关于德国对于海峡问题立场的提问时，元首说，帝国外长已预见到这一点，为了苏联政府的利益，准备修改蒙特勒公约。

帝国外长肯定了这一点，通报说，意大利人对修改问题也采取了友好的立场。

莫洛托夫再次提出保加利亚的安全保证问题。他请对方相信，苏联无论如何不想干涉这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其秩序不会有丝毫变动。

关于德国和意大利保证罗马尼亚的问题，元首解释说，这种保证是使这个国家不通过战争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俄国的惟一办法。此外，罗马尼亚的油井引起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绝对兴趣。最后，罗马尼亚政府曾亲自请求德国从空中和陆地保卫石油开采区，因为它完

^① 苏联同保加利亚从 1940 年 11 月底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

全没有安全感，害怕英国人进攻。在谈到英国在萨洛尼卡登陆的威胁时，元首再次强调，德国不能容忍这一登陆，但请放心，战争结束之后，所有德国士兵将撤出罗马尼亚。

在回答莫洛托夫关于德国对俄国保证保加利亚意见的问题时，元首说，如果这种保证同德、意保证罗马尼亚的条件一样，那么首要的问题便是，保加利亚本身要求过这种保证没有。他（元首）对此不清楚。此外，在他发表意见之前，自然应该问一下意大利的立场。关键的问题是，俄国看到没有，通过修改蒙特勒公约，可以充分保障俄国在黑海的利益。他不要求立即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清楚，莫洛托夫应首先同斯大林讨论这一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俄国只追求一个目的。它想保障自己免受来自海峡的进攻。它想同土耳其调解这一问题，同时在保加利亚也要保证缓和形势。作为黑海国家，俄国有权提供这种保证。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同土耳其达成相互理解。

元首回答说，从总的方面看，这符合德国的意见。俄国军舰可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同时，它对其余所有军舰是关闭的。

莫洛托夫补充说，俄国想得到的不是纸上的而是实际上反对通过海峡对黑海实施进攻的保证，俄国认为可以同土耳其达成这方面的协议。于是，他重新回到俄国保证保加利亚的问题上，再次强调，这个国家的内部制度绝对不会变动，而且俄国还准备保障保加利亚通往爱琴海。他又给元首——这个决定整个德国政策的人提出问题：德国对俄国的这一保证将采取什么立场。

元首反问道：保加利亚是否请求保证了？元首再次说，他应问问领袖^①的意见。

莫洛托夫强调，他不要求元首完全回答，只要求谈谈初步想法。

^① 指墨索里尼。

元首回答说，在同领袖商谈之前，他无论如何不能表示自己的立场，因为德国对这种情况不是特别感兴趣。作为多瑙河大国它只对多瑙河感兴趣，对黑海绝对不感兴趣。假如它同俄国发生什么摩擦，那么它需要的也不是这个海峡。

讲完这段话以后，话题又回到对瓜分破产财产——不列颠世界帝国——感兴趣的各国之间广泛合作的计划上来。元首指出，自然，他不能绝对相信这些计划就能实现。假如不能实现。那么就错过了伟大的历史机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外长应同莫洛托夫先生一起，在经过相应的外交途径准备之后，在莫斯科重新分析这些问题。

元首注意到会谈时间很晚了，说，由于英国航空兵可能实施突袭，最好停止讨论。因为主要问题都已充分讨论过了。

他在最后发言中指出，下一步应继续讨论俄国黑海利益的保障问题以及俄国在未来世界中想占据的地位的普遍保障问题。

莫洛托夫在最后发言中指出，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新问题。作为一个大国，苏联对欧洲和亚洲的重大问题不能袖手旁观。

然后他提到不久前有所改善的俄日关系。他预见说，这种关系还将继续得到改善，感谢帝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

至于日中关系，毫无疑问，俄德的任务在于保障日中关系的调解。但同时应该保障中国有体面的出路。况且日本现在正准备“利用”印度尼西亚。

1940年11月15日^①于柏林

记录由施密特整理

^① 此为记录整理成文的日期。

No05807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

(1940年11月13日)

会谈时间：1940年11月13日21时45分至24时00分。

由于宣布了空中警报，帝国外长约·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先生在苏联大使馆吃过晚饭后大约于21时40分来到帝国部长先生的避弹所进行最后的会谈。

帝国部长从订正事实入手，他想借机对以前讨论的问题进行补充和核实。他想向莫洛托夫先生解释，他认为制定德苏合作共同路线是可能的，他想列举他在这方面想到的几点。但他郑重地指出，这里说的仅是一个大概的构想，可能要等到将来某个时候才能实现。

总之，这里所说的是三国公约成员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同苏联之间的未来合作，同时，他认为，应该首先找到一种途径，以便大体确定这四个国家的利益范围并在土耳其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而且，从一开始就清楚，划定利益范围要触动所有四个国家，而对解决海峡问题感兴趣的只有苏联、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他认为下一步将要做的是：莫洛托夫先生同斯大林先生讨论在柏林提出的问题，以便在下一步谈判中苏联和德国达成一致意见；而帝国部长先生要同日本接触，以便确定怎样才能找到划分利益范围的共同点。至于土耳其，他已同意大利探讨过对它的想法。意大利、苏联和德国下一步行动便是按照三国的意图对土耳其施加影响。如能

顺利地找到三国利益的共同点，且三方都能满怀至善愿望，那么毫无疑问，这对所有参加者来说都是有益的。

下一步将是试图通过秘密文件把两大问题确定下来。如果苏联也坚持类似观点，即准备反对扩大战争和促使尽快结束现在的军事冲突（帝国部长先生认为，在上几次会谈中，他正是以这种观点理解莫洛托夫先生的），那么帝国部长先生算是最终看到了三国公约成员国和苏联达成合作协议的前景。他已大体考虑过了协议的内容，他想今天向莫洛托夫先生介绍一下，不过应预先声明，这个问题他还未同日本和意大利具体讨论。

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在德国和苏联之间讨论。而且这里所说的，绝不是德国的某个建议，而是，正如上面所说，应由双方讨论的和莫洛托夫同斯大林已商定好了的共同观点。事情的下一步，特别是同意大利和日本的外交谈判，只有等到德苏之间把问题弄清之后才行。

然后帝国部长先生向莫洛托夫先生陈述了他考虑的条约草案的内容：

三国公约成员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政府为一方，苏联政府为另一方，为在它们的自然国界里确立于所有参加国人民有利的秩序，为了给为此目的的合作奠定坚实的和长久的基础，达成以下协议：

第1条。按照1940年9月27日的三国公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约定以一切手段不让战争发展成世界冲突并为尽快建立世界和平而合作。同时，它们决心把这种合作扩展到世界上其他也致力于类似事业的国家的去。苏联宣布它赞成这一目的，而且决心从政治上在这方面同三国合作。

第2条。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保证相互尊重它们自然的利益范围。如果这些利益范围发生冲撞，则始终不渝地通过友好的

方式讨论出现的问题。

第3条。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同意，它们不加入或支持旨在反对四个国家中其中一国的集团。

四国在经济上在各种关系中互相支持并进一步充实和扩大相互之间现已达成的协议内容。

帝国部长先生补充说，这一条约的有效期限拟定为10年，附带条件是，在这一期限内四国政府可及时达成延长条约有效期限的协议。

条约本身是不保密的。另外，根据上述条约，可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其形式还待确定）来确定四国领土要求的基本方向。

至于德国，除在签订的和平条约的条件下重新考虑欧洲领土的现实之外，它对领土要求的重心在中部非洲地区。

意大利对领土要求的重心，除在签订的和平条约的条件下重新考虑欧洲领土的现实之外，在于北非和东北非。

日本的要求尚需通过外交途径明确。但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找到分界线，如从日本群岛和满洲以南划一条线。

苏联对领土要求的重心可以先放在本国以南印度洋方向。

这一秘密协定还可通过一些具体问题的确定而得到补充，即上述四国在决定个别问题时要相互尊重领土要求，不在实现这些要求时把自己摆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

未来条约还可由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之间签订的第二个秘密协定加以补充。第二个秘密协定大体可表述如下：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由于德、意、日、苏之间签订了条约，坚持一致的意见，即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而断绝同土耳其的联系，并完全致力于四国之间的政治合作。

它们宣布，根据总的方针，它们将紧密接触（其特点还要详细讨论），共同追求这一目标。

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将共同努力用其他章程取代现行的按照蒙特勒公约确立的海峡制度，从而苏联将获得它的舰队可在任何时间不受限制地通过海峡的权利，同时，除其余黑海国家（但包括德国和意大利在内）以外，所有其他国家，原则上都放弃自己的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商船可自由通过海峡。

最后，帝国外长就此宣布：

如果苏联表示准备同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进行这种合作，那么德国政府表示欢迎。这一问题在最近应由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先生和苏联驻柏林大使澄清。按照斯大林先生来信^①中确定的原则——他不反对按照这种原则详细讨论问题，而莫洛托夫先生在柏林逗留期间也肯定了这种原则，可以认为最终目的是组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长会晤并计划签署这种协议。他，帝国外长，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需要详细分析，所以他不期盼莫洛托夫先生今天就答复这一问题，但令他欣慰的是他今天有机会比较具体地向莫洛托夫先生通报了近来使德国方面兴奋的一些想法。此外，他还想告诉莫洛托夫先生以下内容：

正如莫洛托夫先生所知，他，帝国外长，一直对日苏关系很感兴趣。如果莫洛托夫先生介绍一下目前日苏关系的状况，他将非常感谢。据德国政府所知，日本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赋予了很大意义。他远不是想干涉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但他认为，如能和莫洛托夫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将是有益的。如果希望德国给予一些间接影响，那他乐于听命。尽管他还清楚地记得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曾说，他比里宾特洛甫先生更了解亚洲人，但是他不能

^① 指斯大林1940年10月21日给里宾特洛甫的回信，他在信中表示同意莫洛托夫出行，并说他“原则上不反对”四国进行合作的想法。

不提醒对方，他知道日本政府准备同苏联达成广泛的相互谅解。

他还有一种印象，这就是如果出现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人准备慷慨地调解其他所有问题。他想郑重地指出，日本没请求德国政府充当中间人，但把情况告诉了他，帝国外长。所以他知道，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条件下，日本准备承认俄国在外蒙和新疆的势力范围，假如能同中国达成互相谅解的话。

如果苏联和三国公约成员国之间达成相互谅解，那么苏联还可在英属印度方向上的可能要求方面同三国达成一致意见。在萨哈林石油和煤炭租赁企业方面，日本还准备满足苏联的愿望，但为此它必须克服内部障碍。假如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政府想办成此事并不费力。然后，毫无疑问，也有了在其他问题上取得相互谅解的可能性。

最后，帝国外长请莫洛托夫先生谈谈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看法。

莫洛托夫先生回答说，他对日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今后在相互谅解的道路上会比以前进展得快。同日本的关系以前经常碰到困难和危机。不过现在看来，对于相互谅解来说，前景看好。日本政府已建议同苏联（这是在日本政府换届之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苏联政府已向日本政府提出许多问题。目前还未收到答复。只有收到答复后才能开始谈判，谈判不能同其他许多问题分开。所以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

至于土耳其，苏联的出发点是，在海峡问题上必须首先同它达成相互谅解。苏联和德国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蒙特勒条款已不适用。苏联作为最大的黑海国家应该坚持要得到现实的安全保障。俄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遭受来自海峡的进攻。因此，问题应该得到详细分析和讨论。

苏联在近东感兴趣的问题不只一个土耳其，比如还有保加利

亚。关于这个问题，他，莫洛托夫，在上次同元首会谈中详细谈过了。苏联还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命运感兴趣。它不能对他们漠不关心。除此之外，苏联政府还想知道，轴心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是怎样考虑的，德国对波兰有何打算。他提醒说，关于波兰领土的未来形式，苏联和德国之间有协定存在，但要实现它必须交换意见。他问，根据德国的观点，这一协定是否还有效。

苏联政府还对瑞典中立感兴趣。他想知道，德国政府是否还坚持以前的观点，即保持瑞典中立符合苏德的利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大贝尔特海峡、小贝尔特海峡、松德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苏联政府认为，关于这一问题，应该像现在讨论多瑙河委员会^①那样进行讨论。至于芬兰问题，上次他同元首会谈时已充分说过了。如帝国外长能对上述问题表明一下看法，他将非常感激，因为这有助于明确约·里宾特洛甫先生以前提出的其他所有问题。

帝国外长先生回答说，关于保加利亚问题，除了元首对莫洛托夫先生讲过的，他没任何别的要说的：首先应该确定，保加利亚是否确实想要苏联保证其安全；在没同意意大利事先达成相互谅解之前，德国政府不能对这一问题表态。对于其他问题，他也不能给予回答。至于保持瑞典中立，对此我们同苏联一样感兴趣。如果提到波罗的海出海口，那么它现在是内海，我们对在这一海域内保持船只自由通行感兴趣。但事与愿违，在波罗的海之外有战争。现在还不到谈波兰新秩序的时候。巴尔干问题在会谈过程中已广泛讨论过了。我们对巴尔干感兴趣只是从经济观点出发，而且我们不想让英国干涉我们。德国对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明显未被莫斯科正确理解。

^① 1940年10月28日，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罗马尼亚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就解散国际和欧洲多瑙河委员会问题举行谈判。

所以，他想再次重复，当时指的是通过迅速行动防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发生冲突。假如他，帝国外长，当时不进行干预，那么匈牙利就进攻罗马尼亚了。另一方面，假若不给罗马尼亚以领土保证，保障其后方，那也就不会提议罗马尼亚做领土让步了。德国政府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是力求维护巴尔干的和平，不让英国在那里设防和破坏德国的运输。至今我们在巴尔干的行动还完全是以我国对英国的战争形势为条件的。只要英国政府一承认自己失败和请求和平，德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就完全转移到经济范围，德国部队就将撤出罗马尼亚。正如元首多次声明的，德国在巴尔干没有领土利益。他只能重复，关键的问题是，苏联是否准备并能够在广泛消灭不列颠帝国方面同我们合作。如果能扩大关系和划定利益范围，那我们就很容易在其他所有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这些利益范围何在，已经多次指出过了。此处指的是元首已详尽阐述过的观点——为了苏联和德国的利益，要求两伙伴齐心协力，一致对外，以便在实现自己的意图中相互支持。如能听到莫洛托夫先生关于这方面的看法，他将非常感谢。同根本的关键问题相比，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无所谓的，都能自相调解，只要在总的方面取得相互谅解。在结束谈话时，他想提醒莫洛托夫先生，他希望莫洛托夫先生回答这一问题：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

莫洛托夫回答说，德国方面是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反对英国的战争实际上已经获胜。但是在其他场合又说，德国正在同英国进行生死斗争，因此他只能这样理解：德国“为生而斗”，而英国正在“拼死而争”。至于合作问题，他原则上持肯定态度，但需要补充的是，对此需要详细讨论再达成协议。斯大林在信中已阐明这一思想。他现在不能完全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不知道斯大林和自己其他莫斯科朋友的意见。他应当说，所有明天的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与今天的问题相脱离，不能与实现已有的协议相脱离。在着手新

的问题之前，首先应该结束已开始的东西。他，莫洛托夫，在柏林举行的会谈，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他认为，对所提出的问题，此后通过外交途径由双方大使进行讨论是适宜的。

然后，莫洛托夫先生热情地向帝国外长先生道别，并说，他并未因宣布空中警报而感到不便，他能同帝国外长先生举行如此富有成效的会谈还应归功于它呢。

1940年11月18日^① 于柏林

记录由黑格整理

^① 此为记录整理成文的日期。

№05808

莫洛托夫关于同希特勒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4日)

1940年11月14日3时发出

4时25分通过电话收到

斯大林：

今天，11月13日，同希特勒会谈了三个半小时，午饭后，在计划会谈之外，又同里宾特洛甫谈了三个小时。现在我简要地通报一下这些会谈。详细情况随后再报。

两次会谈没有收到理想的结果。同希特勒的会谈主要谈的是芬兰问题。希特勒宣布，他肯定去年的条约，但德国声明它对保持波罗的海的和平感兴趣。我指出去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这一说法虽然没有遭到任何反驳，但也没产生任何作用。

引起希特勒警觉的第二个问题是苏联按照德、意向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的原则，向保加利亚提供保证。希特勒拒绝回答，说，这个问题他应事先征询意大利的意见。

里宾特洛甫顽固坚持，希望我们表示赞成修改蒙特勒公约，赞成有土耳其、苏联、意大利和德国参加的新条约。条件是给予土耳其领土保证和满足苏联关于禁止非黑海国家军舰进入黑海的合理要求。我回答说，这个问题苏联应该同土耳其达成协议，我强调，海峡问题，对于不是黑海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而言，从其安全保障的观点看，不是根本性问题；而对苏联而言，海峡问题不仅同与土耳

其签订新条约联系在一起，而且同苏联的现实安全保障联系在一起。这一保障问题不仅涉及土耳其，而且涉及我所说的保加利亚，即给予保加利亚的保证。对所提出的问题我向他作了这样的回答：对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划分它们之间势力范围的“共同工作”，我认为可能的和符合愿望的，但对此应该达成协议，首先应该正确地把明天的这些问题同今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准确地说是宣读了四国共同公开声明的草案草稿（“不成熟的想法”）和两个秘密协定草案：

（1）“关于四国主要利益范围划分草案”，其中把我国的利益范围放在印度洋方面；

（2）“关于海峡草案”，基本本着土耳其、苏联、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协商的精神。里宾特洛甫提出这些草案将通过一般外交途径由大使们去讨论。

我回答说，我不反对通过这一途径讨论这些草案，所以德国现在没提出里宾特洛甫来莫斯科的问题。

这就是基本的总结。没有什么值得祝贺的，不过至少摸清了现在希特勒的情绪，对此是必须重视的。

我还没有考虑好，我离开柏林的公报如何写，因为我刚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回来，我没听到他这方面的任何建议。如果来得及，请您提出建议。

莫洛托夫

附 录

莫洛托夫同德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公报

今年 11 月 12～14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

米·莫洛托夫同志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阿·希特勒先生和外长约·里宾特洛甫先生进行了会谈。双方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并在苏联和德国所有感兴趣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了相互谅解。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还同德国元帅戈林先生和希特勒先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内的副手赫斯先生举行了会谈。

11月14日早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乘火车回到莫斯科。

《真理报》

1940年11月15日

№05809

莫洛托夫关于不再报告谈判细节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4日）

1940年11月14日15时15分发出
18时通过电话收到

斯大林：

我决定不再像我答应的那样以密码电报禀报谈判细节。最好回到莫斯科后当面谈并把所有谈判记录交给您。希望您同意。

莫洛托夫

№05811

莫洛托夫关于苏驻德大使回国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0年11月14日)

1940年11月14日15时25分发出
18时20分通过电话收到

什克瓦尔采夫^①陪我回莫斯科，他的工作问题另行讨论。

莫洛托夫

^① 什克瓦尔采夫，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11月26日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

No05812

魏茨泽克给德驻外使团的通电

（1940年11月15日）

趁莫洛托夫来柏林之机，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去年缔结的条约的基础上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未来继续坚决执行该条约所确定的政策。此外，双方还为苏联政策和三方公约国政策的协调一致做了努力。正如莫洛托夫访问的最后公报中指出的：双方是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交换意见的，双方在德国和苏联感兴趣的所有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一结果清楚地证明，所有关于德苏矛盾的主观臆断都是荒诞的，所有敌对方面企图破坏德苏相互信任和友好关系的投机行为都是建立在自我欺骗基础之上的。莫洛托夫友好访问柏林再次表明了这一点。^①

同一文件发往所有外交使团。收电后请确认。

魏茨泽克^②

1940年11月15日于柏林

^① 这一句是里宾特洛甫加上去的。

^② 冯·魏茨泽克，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

【专题说明】

沃尔科娃与基洛夫案件

(1956年5月至12月)

1934年12月发生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成为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导火索。围绕这一案件的审查,不知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不知有多少人命丧黄泉。本专题选编的就是其中一例。一位患有妄想狂的普通公民沃尔科娃,由于不断编造出认识暗杀基洛夫的凶手并了解作案经过的谎言,竟然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历任领导人和一系列国家领导人,甚至斯大林本人的接见和询问,以致此事沸沸扬扬地折腾了二十多年,凡受牵连者均被捕入狱。直到苏共二十大后,经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审定,才决定不再理睬这位精神病人的告密和声明。显然,这些材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苏联30年代形成的政治审查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同时也说明法制不健全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不幸。

(本专题文件由赵国顺编辑和校注,
李传勋翻译)

№06207

沃尔科娃关于基洛夫暗杀事件 给苏共中央的信（摘录）

（1956年5月30日）

苏共中央

我，沃尔科娃，现在向苏共中央作以下说明：1934年7月24日我在自己的同乡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莫罗佐娃那里……偶然地碰上了一些过去的绿林军^①在开会。这个会我没有参加，而是拿着一本普希金的书坐在旁边的屏风后面（房间被一道屏风隔开），留心听那些坐在桌旁吃喝和争论的、我不认识的人的谈话。当时我自己什么也没有听懂，因为他们说的话神秘莫测，但我知道他们谈的是即将举行的革命和起义。夜里2时我起身回家，我的同乡把我送到楼梯口，在那里我问她这是些什么人。她回答我说是同乡。并叫出了许多人的名字。我当时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斯莫尔尼区分局的秘密工作人员……

1934年7月25日我乘车去区分局见局长马利宁，但局长已换成了索科洛夫（我不在时局长换人了）。新局长接见了，仔细听了我的汇报，交给我的任务是更密切地与这些人结识，但不要介入任何事情。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杜宾斯基-尼古拉耶夫的公民，

① 最初指国内战争时期为逃避在白卫军中服役而躲到森林里的人。后白卫军组织了白色绿林军。国内战争结束后白色绿林军被红军消灭。

他就是萨季科夫^①。按一个姓他的名和父名是谢苗·列昂尼多维奇，按另一个姓他的名和父名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我和这个人经常见面，按照索科洛夫的要求和交给的任务我和他一起游玩，我从他那里得知，列宁格勒有几个反革命小组，其中一个由科托雷诺夫^②领导，另一个由沙茨基^③领导。尼古拉耶夫不止一次带我去他的朋友那里……见过科托雷诺夫和……兹韦兹多奇金^④。我同他两次去……德国领事馆领钱。第一次领了10000卢布，第二次领了15000卢布，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去……那里有些人在讨论某个重要问题。后来尼古拉耶夫对我讲，将在列宁格勒杀掉基洛夫，在莫斯科杀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将在同一天同一时刻进行，以便把所有的人弄糊涂。在列宁格勒由沙茨基和他进行，在莫斯科由斯米尔诺夫进行（这个斯米尔诺夫见过，中等稍高的身材，留着黑胡子）。

我按照尼古拉耶夫的要求去送两封信——一封信送到维里察站给兹韦兹德尔，另一封送到波德博罗维耶站给马斯拉科夫。这两封信在我的首长索科洛夫作了复制后由我送到指定地点。我从维里察带回一封给斯莫尔尼宫工作人员——组织处副处长米亚斯尼科夫^⑤的信，以及给斯莫尔尼宫工作人员科尔舒诺夫的一封信和5000卢

① 尼古拉耶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1904～1934），1924年入党。杀害基洛夫的凶手。1934年12月29日被枪决。

② 科托雷诺夫，伊万·伊万诺维奇（1905～1934），1921年入党。“新反对派”成员。1934年12月5日被捕，12月29日被枪决。

③ 沙茨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99～1934），1923～1927年为党员。托洛茨基的拥护者。1934年12月5日被捕，12月29日被枪决。

④ 应为兹韦兹多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902～1934），1923年入党。“新反对派”成员。1934年12月8日被捕，12月29日被枪决。

⑤ 米亚斯尼科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1900～1934），1917年入党。托洛茨基拥护者。1934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组织处副处长。同年12月10日被捕，12月29日被枪决。

布……索科洛夫局长对这两封信也作了复制，然后我把它们交给了指定的人。我从尼古拉耶夫那里知道了几个斯莫尔尼宫的工作人员：列宁格勒苏维埃组织处处长泽尔策尔及其副手米亚斯尼科夫，“阿图尔”汽车修理厂厂长索西茨基^①，列宁格勒苏维埃住宅管理局局长列文^②及其过去在列宁格勒消费合作社联社的副手利斯科维奇（现仍在那里工作），运输处处长弗拉索夫，莫斯科的斯米尔诺夫，莫斯科的拉泰奇克，驻英国大使——他的姓的简称很奇怪，我记不准。科托雷诺夫这个小组，还有杰尔扎温那个小组是从事破坏活动的，有列瓦诺夫、斯米尔诺夫、戈卢别夫、别洛乌索夫、舒瓦洛夫、佩图霍夫。^③

1934年9月，我被召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列宁格勒州总局……一个工作人员德里亚宾向我提了许多我不知道的问题，然后带我去见第一处即特别处处长巴利采维奇。当时在场的还有侦查员彼得罗夫。起初他们问我知道不知道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反革命小组并且要暗杀基洛夫。我回答说知道，但不知道何日何时。当时巴利采维奇在我旁边坐下对我说：“听着，沃尔科娃，否认这一切。你就说反革命小组并不存在，暗杀也不会发生，那样你会得到一切，如果你不想和我们齐心协力前进，那就得被枪毙”。我回答巴利采维奇说，你们可以枪毙我，但我不会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当时巴利采维奇就说：“把她关起来，彼得罗夫，您跟她说说点什么”。于是我被关进第36号单人牢房。我在那里蹲了五天。后来彼得罗夫把我叫

① 索西茨基，列夫·伊里奇（1899~?），1919年入党。托洛茨基拥护者。1934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汽车修理厂厂长。同年12月10日被捕。

② 列文，维克多·索洛蒙诺维奇（1897~1934），1917年入党。托洛茨基的拥护者。1934年任列宁格勒住宅租赁合作社主席（沃尔科娃记错了他的职务）。1934年12月10日被捕，12月29日被枪决。

③ 沃尔科娃指名的这几个人为“绿灯”组织成员。

出去，要求我按他的口授去写，被我拒绝了。他对我说，我是根据便函被关押的，如果我还是像牛那样犟，就把我转为第一类。此后把我领到下面，几次关进蒸气室并用了刑——用烧红的针刺我的指甲。后来又过了几天，在让我签字保证不离开列宁格勒后把我放了出来。我从羁押所出来后就去出席区苏维埃全会，因为我当时是苏维埃代表。开完全会后我回了家。尼古拉耶夫在家里等我，我同他一起乘车去利戈沃，一位党中央委员沙德鲁钦^①（我记得是这样称呼）的一所独家住宅。路上，尼古拉耶夫在汽车里问我：你说实话，你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是不是供出了我们，这是扎波罗热茨^②提醒他的。我笑了起来，说他是疯子，但他对我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左轮手枪里第一颗子弹就是给我的，我说——我接受。我们的谈话就此为止。当我们来到利戈沃时，那里有几个从莫斯科来的人，尼古拉耶夫告诉了我他们的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在那里从一艘潜水艇上卸下一些箱子（货是从德国运来的），并把这些箱子藏在这所住宅的地下室里。在房间的地毯下有个入口，从那里把所有箱子放进去了，我从那里即从一个箱子里拿了一个物件作证据，带回来给了我的首长索科洛夫（原来是一颗手榴弹）。我还对索科洛夫讲了我受刑和被关押的情况。我同索科洛夫驱车去见机要政治处处长戈林-伦金^③，然后同他一起去基洛夫家……我同索科洛夫坐在会客室里，戈林-伦金去找基洛夫，他回来对我们说一切就绪，已把情况报告了，然后我们就回来了。晚上，我同我们区分局的谢梅纽克——我对尼古拉耶夫介绍说

① 沃尔科娃在1934年及以后的信中说是卡尔平斯基。

② 扎波罗热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885～1937？），1919年入党。1934年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副局长。1934年12月被捕，后被枪决。

③ 沃尔科娃记错了。戈林-伦金曾任远北建设总局机要政治处处长。1934年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行动处处长。

他是我的兄弟——去了“阿斯托里亚”旅馆，谁在那里我不知道，这事由谢梅纽克进行，因为他懂外语。后来我从尼古拉耶夫那儿得知，他已知道在沙茨基小组里沙茨基自己抓到了阍，应当由他去暗杀基洛夫，沙茨基正在研究基洛夫的行进路线。尼古拉耶夫说：“我决定在基洛夫家附近杀死他。当基洛夫坐进汽车，我装作要问什么的样子站到了汽车的踏板上，刚要开枪，但保卫基洛夫的卫士长把我从车上推了下来。”他当时说：“竟是这样的笨蛋，我衣袋里装着任务单，袖管里藏着左轮手枪，我出示了党证，那人不是自己人，把我放了。”他又说：“现在我要到斯莫尔尼宫去等他，以便赶在沙茨基之前把他干掉。”我就这一切给基洛夫写了一封信，向他详细报告了一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怎么样把我关起来，怎么样用刑，要我否认报告过的一切，要我说反革命小组不存在，暗杀不会发生，信上还写了怎么样在利戈沃藏匿了武器，尼古拉耶夫怎么样想在基洛夫家附近将其枪杀在汽车里，卫士怎么样把他从汽车踏板上推下，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扎波罗热茨在那里把他放了，他现在将在斯莫尔尼宫等候基洛夫。我还写了在同一天同一时刻，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斯米尔诺夫要杀死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1934年10月28日上午10时我在邮政总局寄出了两封类似的挂号信：一封寄给基洛夫家，另一封寄到莫斯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4年10月28日中午12点我被抓到一所大房子里，（起先）是扎波罗热茨的秘书别洛乌先科跟我谈，从那里又转给彼得罗夫。在那里，特别处处长亚尼舍夫斯基、行动处处长莫谢维奇、扎波罗热茨的业务秘书别洛乌先科、巴利采维奇和我们的机要政治处处长戈林-伦金一起同我谈并要求我否认说过的一切。在那里又让我同斯莫尔尼宫工作人员科尔舒诺夫（我曾捎给他5000卢布）对质。对质的时候不让我说话，他们在那写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拒绝在对质笔录上签字，代我签字的是另一个人（他现在还在那所大房

子的第五层楼工作，姓什么我不知道，但认得他的脸)。从中午12点拘留我到晚上11点，然后他们到利戈沃藏着成箱武器的沙德鲁钦家去了。我没有去利戈沃，把我送到普里亚热卡的一个疯人院里藏起来。我在那里从1934年10月28日待到1934年12月2日，大约有17天不让我吃东西，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34年11月26日我从那里给列宁格勒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秘书伊利英写了一封信，向他述说了一切，请他报告基洛夫，信是护士安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穆拉什金娜帮我寄出的。1934年12月2日党和政府领导人把我从这个可怕的地方接到斯莫尔尼宫。来找我的有斯特鲁佩的私人秘书伊利英（我就是给他写的信）。切尔托克和一个莫斯科来的工作人员，把我送到了斯莫尔尼宫，我已经是只剩一口气的骨头架子了。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同我谈话的有党和政府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在场的还有丘多夫^①、卡达茨基^②、亚戈达、阿格拉诺夫、波斯克列贝舍夫、伊利英及两个敌人卡扎科夫和普列特尼奥夫。我记得当时给了我两个火腿面包，我贪婪地吃起来，因为我太想吃了。伊利英说，同志，您别撑坏了。当时波斯克列贝舍夫问我，您很久没吃东西了吗？我回答说大约17天前，他们把吃的从我这里抢走了。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哭的，只记得眼泪顺着脸颊淌。后来向我出示了尼古拉耶夫的照片，问我是否认识他，我回答说认识，又问我他姓什么，我说出了我所知道的三个姓，把我所了解的一切都讲了。还谈到我寄给基洛夫的那封报警的信，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同志问我是否记得信是什么时候发的，我说是1934年10月28日上午10点在邮政总局用挂号信发的，信的复制件我交给了局长索科洛夫。索科洛夫对我

① 丘多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时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

② 应为科达茨基，伊万·费多罗维奇，1934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说，这封信你白寄了，特别处不会让这封信送达基洛夫的。政府从斯莫尔尼宫派了一个人去邮政总局，这个人回来说，在挂号邮件登记簿上查到这封信，收到信的人是特别处处长亚尼舍夫斯基^①。当把亚尼舍夫斯基召到办公室并问他是否收到我寄给基洛夫的信时，他回答说收到了。伏罗希洛夫同志问他把信弄到哪儿去了，他说交给巴利采维奇了。巴利采维奇回答说他是收到了，但把它撕了。当伏罗希洛夫同志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说信里写的不是正经事。当把侦查员彼得罗夫带来时，他看到我就慌了神。伏罗希洛夫同志指着我问他认识我吗，他回答说认识，又说：“她堕落到开始搞爆炸物的程度”。伏罗希洛夫同志就问彼得罗夫，既然我有罪，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关押起来。彼得罗夫回答说他们没有关押的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对彼得罗夫说，您没有根据关押她，却有根据把一个健康的人送到疯人院去，您对她干了什么事，上帝保佑我们这个疯子有这样的记忆力，尽管她在这样的条件下待了一个月零5天，却既没有忘记一个地址，也没有忘记一个名字。晚上我被送到斯维尔德洛夫医院，党和政府领导人把我交给主任医师和院长，让他们对我承担个人责任。1934年12月4日，基洛夫被杀案调查委员会的几个成员来医院找我，给我带来了许多照片，要我把认识的挑出来，我认出几个人，其中有米亚斯尼科夫，还有一个，委员会成员们相互谈话的样子像是站在仪仗队里似的，其中的一位塔夫利达宫警卫长开出一张去瞻仰基洛夫同志灵柩的通行证。我在医院里住到1935年2月23日，然后到谢斯特罗列克疗养地，后来又去了基斯洛沃茨克。1935年7月根据党和政府的决定，给了我一套住宅和一些东西。1935年伊利英答复我说，我给基洛夫的信（我从精神病院写的那封）他没有转交，因为他曾拿着我的信去找梅德韦

^① И.В. 亚尼舍夫斯基是列宁格勒州内务局特别处副处长。

季，梅德韦季二话不说要求把信交给他。他说：“但我没有把信交给他，我来到斯莫尔尼宫，开始往莫斯科写信，写完了8页，刚翻到第9页就响起了枪声，我们跑到三楼。基洛夫俯卧在那里，而凶手仰卧着。保卫基洛夫的那个边防军战士开枪自杀了”。我问伊利英：“凶手供出了谁？”他回答我说，谁也没供出来，因为他服毒自杀了。伊利英还对我说，如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知道你还活着，你就会遭到与10月份把凶手从基洛夫汽车踏板上推下去的那个卫士长同样下场。他讲了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1934年12月2日用车押送这个卫士长去斯莫尔尼宫审讯时，在车从特维尔大街驶向斯莫尔尼宫途中制造了撞车事件，把他杀死了。他还说：“我们找了两次。我把你的信交给丘多夫，丘多夫又转给政府成员。那时候从政府卫队给我派了两个人去找你。第一次我们来了，那里的人对我们说，他们那儿没有这个人，过去也没有”。我未被列入任何名册。于是他们就回来报告，说她的信上的地址是准确的，但那里答复说没这个人。于是召来了梅德韦季，问他们把我弄到哪儿去了。梅德韦季说，在他们截获了我写给基洛夫的报警信后，就决定把我送进疯人院。但提出了条件——她在那里活不下来，我们没有责任，既然她给基洛夫发了报警信，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她还向哪里发了信，如果我们把她枪毙，有人会向我们要人，此后梅德韦季写了释放我的命令，但不能肯定我还活着。

沃尔科娃

又及：

1951年科先科接见了，不知他从哪里知道我的情况，他问我怎样活下来的，既然我认识尼古拉耶夫。

科先科对我说，您不必过谦，我认识您。我问他基洛夫是怎样

被杀的。他对我解释说，暗杀的。他对我解释说，暗杀那天即1934年12月1日，上午10点，组织处副处长米亚斯尼科夫把我们大家召集到斯莫尔尼宫说，如果尼古拉耶夫由于任何原因没能在办公室里杀死基洛夫，那么米亚斯尼科夫就在二楼把他杀死，如果米亚斯尼科夫没能在二楼杀死，那么索西茨基在一楼或列文在出口处把他杀死。内务部卫队被有意安置在另一个基洛夫不走的大门。

科先科现住斯大林街，现在还在工作，在哪里我不知道。

沃尔科娃

曾任索西茨基当过厂长的“阿图尔”工厂副厂长

№06208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审查沃尔科娃的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摘录

(1956年7月18日)

绝密

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同志：

现将审查女公民沃尔科娃 1956 年 5 月呈送苏共中央的声明的结果报告如下。

根据与女公民沃尔科娃的谈话及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存的对她以前递交的声明的审查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现已查明，她 1934 年讲出的口供与基洛夫被杀毫无关系。

女公民沃尔科娃近年来向国家安全机关写了大量声明，在其中指控许多诚实的苏联公民犯有反苏罪行。这些公民中有一部分曾经被捕，后来由于缺少犯罪要素而被释放。

谎言被揭穿的女公民沃尔科娃承认：杀害基洛夫的真凶尼古拉耶夫及科托雷诺夫她以前从不认识，而这些名字和他们的照片是叶若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工作人员给她看的。

在委员会里进行谈话以后，女公民沃尔科娃又写了一份声明，她在声明中否认自己的口供并指责与她谈过话的同志强迫她在这些口供上签字。

她在这份声明中还报告了一个新的恐怖组织（信件附后）。

鉴于多次审查结果证明女公民沃尔科娃通常所写的均属诬告，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今后对女公民沃尔科娃的声明不进行任何审查。

附件共 17 页。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罗夫

附件 1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陆军大将谢罗夫同志

1956 年 5 月，女公民沃尔科娃向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声明。沃尔科娃在声明中指出，她 1934 年住在列宁格勒市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尼古拉耶夫的人，他就是萨季科夫，他还叫杜宾斯基，这个人好像准备娶她。沃尔科娃肯定地说，她得知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当时准备暗杀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同志。

据沃尔科娃讲，为了防止正在准备的犯罪行为，她把上述情况报告了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然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的工作人员巴利采维奇、彼得罗夫等人不但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尼古拉耶夫及其同谋者的犯罪行为，反而对沃尔科娃本人进行威胁并要求她推翻自己的举报。在沃尔科娃不听这些劝告之后，这些工作人员指示将其送进了精神病院，直到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她才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指示下获释。

同时沃尔科娃还写道，在列宁格勒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与暗杀基洛夫的反革命组织有关系的人。

根据您的指示已把沃尔科娃召到莫斯科并就其递交的声明的实质进行了详细的讯问。同时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中查出有关审

查沃尔科娃以前寄给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及国家安全机关的声明的全部材料。

经过审查现已查明：

沃尔科娃 1906 年生于雅罗斯拉夫尔州弗拉德琴区伊利英斯科耶村，俄罗斯人，受过五年教育，非党人士，现住列宁格勒市（……），现任公民证登记员……

沃尔科娃从 1931 年起是列宁格勒市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员。从案卷材料看出，沃尔科娃 1936 年以前从未报告过有关自己与暗杀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及其同谋者科托雷诺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相识的任何情况。因此她也就未因尼古拉耶夫等人的案件受过讯问。1934 年沃尔科娃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过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有一个由她的同乡、过去的富农组成的反革命小组，这些人好像在进行反苏密谈并企图杀害基洛夫。经初步审查，沃尔科娃的报告未能得到证实。

鉴于沃尔科娃行为反常，其明显的谎言亦被揭穿，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工作人员怀疑其精神是否健全，并于 1934 年 10 月对其进行了体格检查。精神病医生做出了结论：她有精神病，患有：“经常性迫害妄想症”。

此后沃尔科娃被送进精神病诊疗所。

在基洛夫遭凶杀后，抵达那里的一个政府委员会查阅了内务局保存的带有恐怖活动性质的全部实际材料。根据斯大林同志指示，沃尔科娃被召到斯莫尔尼宫，在那里政府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她谈了话。

沃尔科娃肯定地说，谈话后斯大林同志指示对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改善其居住条件并安排对其治疗。

由于这些指示，沃尔科娃受到了列宁格勒的苏维埃组织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特殊关照。向她提供了一套单独的设备齐全的并

配有家具的住宅，还定期发给她数额可观的津贴。每年她都得到免费的疗养证。1935年至1940年仅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发给沃尔科娃11个免费的疗养证、休养证。

与此同时，根据沃尔科娃以前报告的材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26人，指控他们进行反革命的反苏活动。

在侦查过程中又逮捕了37人。

同时，因为对沃尔科娃的报告置之不理并把她安置到精神病诊所而逮捕了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工作人员亚尼舍夫斯基、巴利采维奇、彼得罗夫、莫谢维奇、别洛乌先科，并判处他们年限不等的监禁。

1955年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经审查已查明，1934年因沃尔科娃告密而被捕的人在法庭上推翻了以前他们所讲出的所有的口供，并且不承认有任何罪行。其中多数人当时被判处2至10年的监禁。

从1935年起至今，沃尔科娃不断地写了大量的信和声明，其中还有给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及国家安全机关的匿名信。她在这些声明中指控一些苏联公民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从1936年起，她开始写材料，说她本人认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并指控许多自己的熟人与尼古拉耶夫有犯罪关系。

沃尔科娃在大多数声明中都提到她个人与斯大林同志及其他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相识关系。显然这导致国家安全机关认为她的声明有特殊意义，并照例将沃尔科娃所控告的人逮捕。

准确查明沃尔科娃写了多少声明看来是不可能的。仅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从1948年到1955年就她从她那里收到约90份声明，目前该局存有11册审查这些声明的材料。

沃尔科娃写声明告自己同住宅的邻居、熟人、女儿、自己的同居者，并指控他们都犯有严重罪行……

1949年8月沃尔科娃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报告列宁格勒居民И.А. 马雷舍夫、А.Д. 布尔拉科娃、加里宁、М.В. 莫罗佐夫、

E. A. 加夫津斯卡娅等人从事敌对活动。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沃尔科娃声明中列出的所有人都被逮捕。对他们的案件所进行的侦查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们都没有任何罪过，沃尔科娃诬告了他们。

对该案件进行侦查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向阿巴库莫夫提出因缺少犯罪要素而终止此案的问题，然而阿巴库莫夫不允许释放他们。由于沃尔科娃的诬告，上述所有公民毫无根据地坐了约两年的监狱，其中一人死在狱中，直到阿巴库莫夫本人被捕后他们才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还仔细审查了沃尔科娃的其他声明，然而所有这些声明均未得到证实。

由于沃尔科娃的精神状况不止一次引起严重怀疑，1940年6月20日对沃尔科娃作了门诊精神病鉴定……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指出：“……沃尔科娃被发现有个性类妄想狂发展。由于存在神经痛轻微症状的妄想表现因素，必须在住院条件下进行精神-心理状况的诊察”。

鉴定委员会关于在住院条件下对沃尔科娃进行诊察的建议未能实施。1952年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重新提出对沃尔科娃进行检查的问题，但戈格利泽禁止把她送去鉴定。由于这一原因，迄今没有关于沃尔科娃精神状况的最后结论。

在讯问中沃尔科娃指出，因为她递交了声明，近年来她不止一次受到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员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谢利瓦诺夫斯基的接见，她还两次受到原苏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安德里阿诺夫的接见，1949年8月29日夜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见了她。

在1956年6月8日的讯问中，因为沃尔科娃多年来诬告诚实的人被揭穿，她承认她从来不认识科托雷诺夫和斯米尔诺夫，这两

个名字是叶若夫提示给她的，他当时给她看这两个人的照片，说她应当在反革命组织的集会上见过他们并建议她记住他们。正如沃尔科娃指出的那样，此后她开始在自己的声明中说她见过科托雷诺夫和斯米尔诺夫并了解他们的反革命恐怖活动。同时沃尔科娃还指出，她确实有一个姓尼古拉耶夫的熟人，但她不知道他是否就是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也不能证明这一点。

沃尔科娃指出，1935年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她出示了一个人的照片并声称这个人她是她的熟人尼古拉耶夫，他杀害了基洛夫。正如沃尔科娃所说，起初她声明，向她出示的照片上的人她不认识，然而当时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对她说“怎么会这样，斯大林同志把这张照片给您看过，您认出照片上的人是尼古拉耶夫，为什么现在您不认得他了？”正如沃尔科娃指出的那样，此后她就承认了她认出来向她出示的照片上的人是她的熟人尼古拉耶夫，从那时候起，在让她看这个人照片的所有场合她都指认是自己的熟人尼古拉耶夫，而这一点实际上她现在并不能证明。

应当指出，在口头描述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的肖像和报告能说明其特征的资料时，沃尔科娃对他的描述与对他侦查的案卷中现存的正式文件对他的描述不一样。

在报告上述情况时，我们从自己这方面认为已经查明，沃尔科娃与尼古拉耶夫——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从无任何关系，与同他一起被追究责任的其他人也无关系，但她利用了业已造成的局势并出于自私的目的利用这一局势投机，挑拨性地指控大量毫无罪过的苏联公民。

鉴于不止一次的审查已证明女公民沃尔科娃通常所写的均属诬告，拟在今后对女公民沃尔科娃的声明不再作任何审查。

上校 多布罗霍托夫

上校 卡利斯托夫

No06209

彼得罗夫致苏联检察院的申诉（摘录）

（1956年12月12日）

依照司法监督程序所作的申诉

彼得罗夫，格奥尔吉·阿列克谢耶维奇，1904年生，俄罗斯人，现住利沃夫市。

……根据被我申诉的判决，我被判3年监禁，罪名如下：

- （1）丧失阶级警惕性，
- （2）不能容忍地玩忽职守，
- （3）将女公民沃尔科娃非法送入精神病院……

1934年下半年，列宁格勒州内务局特别处第3科一个侦缉人员（我当时任特别处第2科侦缉人员），名叫格里戈里·伊里奇·德拉普金，交给我一封信，从字体看写信人文化水平不高，署名是沃尔科娃，她报告说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叫“绿灯”的反革命组织，有700名成员。

在把这封信给我时，德拉普金讥笑地说这位女公民“有点缺心眼儿”，她还不止一次地写材料说她见过的一些红军战士进行反革命密谈，她写的一切从未得到过证实。

此外，德拉普金当时还对我说，沃尔科娃还给列宁格勒州刑事侦查局写了材料，制造了一些“假案”，那里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她。

沃尔科娃从不是正式的秘密工作人员，她做这一切都是自告奋勇的。^①

^① 事实上，沃尔科娃确实从1931年起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工资的秘密工作人员。在这之前曾是列宁格勒州刑事侦查局的情报员。

沃尔科娃在一个地方当清扫工，当时年龄大约不超过 20~23 岁，社会出身是农民，文化水平低，见识也不广。

在同沃尔科娃谈话时，她给人的印象是精神不正常。

当我开始对沃尔科娃第一封信谈的列宁格勒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感兴趣并问她从哪里得知这个组织的人数时，她什么具体东西也答不上来。

在以后与沃尔科娃的会见中，她还给了我一些不可靠的材料：忽而说她在—一个年轻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家做客时发现一个装着人肉的篮子；忽而说在自己其他熟人那里发现了印钱的机器；忽而说有人把她推进—辆小汽车，载到列宁格勒市郊区—个小地方利戈沃，强迫她在那儿洗死尸，她在那里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些装炸弹的箱子，为了证明这件事她解开手帕，从里面取出—个老式弹壳，这个弹壳她放在写字台上当笔筒。

根据沃尔科娃的口述，在利戈沃那所住宅住着一个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卡尔林斯基。

所有这些材料应当存在沃尔科娃的间谍案卷中。经过仔细的业务审查，沃尔科娃的这些材料没有—个得到证实。

在—次以局长梅德韦季同志为首的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全体领导人出席的业务会议上提出了网络的工作问题，指责我从自己的网络那里接到—些不足信的“案子”，其中谈到了沃尔科娃，会议的结论说她是社会危险分子，因为她在自己给机关的信中进行诬告并提供不正确的情报。

就在这次会议上，梅德韦季同志建议局卫生处的马穆申^①请—位精神病学教授并传唤沃尔科娃，以便对她进行检查。

请来的精神病学教授建议对沃尔科娃进行住院检查，就此根据

① 马穆申，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时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卫生处处长。

精神病教授的结论做出了专门决议，此后她被卫生处送往精神病院去作检查。我与送沃尔科娃去精神病诊疗所毫无关系。

大约两个月以后基洛夫被暗杀。

当我被传唤到斯莫尔尼宫去见斯大林时，沃尔科娃也被传唤，当时出席的除亚戈达外还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等同志及列宁格勒内务局的所有领导人。

斯大林和亚戈达就沃尔科娃的材料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我解释说，沃尔科娃的所有材料均不符合事实，因为它们都经过有效而细心的审查，其中没有任何情况得到证实。

尽管我与政府成员的警卫没有任何关系，在斯莫尔尼宫接受斯大林的讯问后，我被逮捕并与列宁格勒内务局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被追究刑事责任……

彼得罗夫（签名）

1956年12月12日

附 录

拉祖尔金娜^① 的回忆摘录

……基洛夫被暗杀后，斯特鲁佩^② 的秘书约夫列夫，1913年入党的党员——跑到我这里哭了起来，还说：“我犯了罪”。他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个月前有一个妇女来见他，并要求必须见到斯特鲁

① 拉祖尔金娜，多拉·阿布拉莫夫娜，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会文教处指导员。

② П. И. 斯特鲁佩，1934年任列宁格勒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佩，当时他说：“斯特鲁佩不在，他到州里去了。”她坚持说：“我有急事要见斯特鲁佩。”他说：“斯特鲁佩不在。三天后才能回来。”这时候她说了这样一些话：“……前天，星期日，我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来到儿童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员聚在那里，他们喝醉了，当时听到他们在谈暗杀基洛夫，谈话不清晰，但还是能听出来他们谈暗杀基洛夫……”当斯特鲁佩回来时，她和约夫列夫试图找到这个妇女，结果发现她是个疯子，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关进了精神病院。当时我说：“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就得去，基洛夫被杀案调查委员会来了。叶若夫来了。我们去见他。”我们就去了。他听完后说：“我要去见斯大林。”他去见了斯大林并讲了这件事。斯大林命令立即派人去找这个妇女。她当时在疯人院。她被带回来见斯大林，我们都看到了她怎样被领来，她在人保护下去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沃尔科娃小女儿的回忆摘录

母亲的性格始终不合群，傲慢，多疑。她当然比自己的同村人读的书多一些。而她的记忆力非常好。她不该在集体农庄干活，而应当穿上一件不管什么样的皮夹克，哪怕职务不高，总得当个头儿……

她多次给我们讲过 1934 年 12 月她与斯大林的会见。一切看起来是这样：斯大林亲自去医院找她，她当时被“人民的敌人”安置在那儿。她同斯大林一起乘车并得知基洛夫被杀害。母亲哭了，斯大林安慰她，把自己的手帕递给她，让她擦去眼泪。

我们家确实长年保存着一块带大花边的大手帕，把它当成宝贵的纪念品，据说它是斯大林的，后来，已经是 60 年代，一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曾与母亲一起供职的同志把它撕成了几片。

妈妈继续进行自己的情报活动，后来……她找到了一个公民证登记员的职务，但经常往什么地方写材料，打电话，并从那里得到一些钱……

1956年她被送到精神病防治所审查……过去，特别是二十大以前她常说，她应该被杀死……她对邻居也怀疑，写材料告他们的密，时常更换门锁。

最后一年几乎没离开过普里亚日卡的精神病院。常常像个疯子一样。死时很痛苦。不知对谁说些威胁的话，大喊大叫。这发生在1971年。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版人：谢曙光

编审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行人：胡鹏光 王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务：宗静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ССР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皮萨列娃关于红色恐怖的日记（1918年1月至3月）

 专题说明

 06260 皮萨列娃的日记（1918年1月10日至3月26日）

肃反委员会和肃反工作（1918年4月至1921年4月）

 专题说明

 03292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理事会关于释放伊林致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4月16日）

 03293 波尔托拉茨卡娅女子高级学校管委会主席团关于释放伊林致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4月18日）

 03294 莱温松、马利宁关于为伊林担保致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4月19日）

 03295 莫斯科大学青年教员协会关于为伊林担保致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4月25日）

 02260 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记录（1918年6月12日）

 03296 雅科夫列夫为伊林申辩致列宁的信（1918年8月24日）

 02261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契卡工作给俄共（布）各省委员会的信（1918年10月16日）

 02262 全俄肃反委员会俄共（布）党团组织关于《周刊》事件的决议（不晚于1918年11月14日）

 03297 法学女子高级班班长委员会请求释放伊林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1918年11月15日）

 02680 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关于肃反委员会与革命法庭关系问题的会议记录（1919年1月30日）

 03131 比亚雷尼茨基-比鲁利亚关于“海鸥”庄

园给沃伊诺夫的信（1919年9月8日）

03113 高尔基关于释放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给列宁的信（不早于1919年10月6日）

05305 谢杰尔尼科夫关于苏维埃的腐败现象给列宁的信（1920年4月23日）

02263 萨姆索诺夫关于消灭宗教问题给捷尔任斯基的信（1920年12月4日）

03114 克鲁泡特金关于人质问题给列宁的信（1920年12月21日）

02264 萨姆索诺夫关于监狱状况给捷尔任斯基和克谢诺丰托夫的报告（1921年1月20日）

02265 捷尔任斯基关于使用极刑等问题给俄共（布）中央的信（不晚于1921年1月25日）

02266 捷尔任斯基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肃反委员会条例草案的意见（不晚于1921年3月）

02267 土耳其斯坦前线特别局库什克分局向俄共（布）中央的声明（1921年3月18日）

02269 瓦尔金-姆格拉捷关于各党派的态度给俄共（布）中央和莫斯科执委会的信（1921年4月11日）

02268 捷尔任斯基对土耳其斯坦前线特别局库什克分局声明的答复结论（1921年4月23日）

俄共（布）八大中的军事问题（1919年3月）

专题说明

05221 军事小组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1919年3月20日）

11676 军事小组第二次会议速记记录（1919年3月21日）

05222 讨论军事问题的全体会议速记记录（1919年3月21日）

作家柯罗连科眼中的红色恐怖（1919年3月至1921年6月）

专题说明

01680 柯罗连科关于新政权的统治方法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3月20日）

01681 柯罗连科关于帮助朋友迁居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4月10日）

01682 柯罗连科关于搭救被捕者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4月15日）

01683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和出版等事宜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5月4日）

01684 柯罗连科关于出版社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5月18日）

01685 柯罗连科关于哈尔科夫文化协会等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6月2日）

01686 柯罗连科关于肃反委员会枪决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6月11日）

01687 柯罗连科关于人质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6月18日）

01688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奥斯特洛夫斯基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6月20日）

01689 柯罗连科关于逮捕诺索维奇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19年7月15日）

01690 柯罗连科关于奥杰尔受到指控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2月27日）

01691 柯罗连科关于奥杰尔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3月12日）

01692 柯罗连科关于搭救梅利古诺夫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3月29日）

01693 柯罗连科关于调查“征用”行为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4月4日）

01694 柯罗连科关于政治处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约于1920年5月）

01695 柯罗连科关于格尔施泰因案件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5月5日）

01696 柯罗连科关于随意枪决行为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6月7日）

01697 柯罗连科关于行政判决和死刑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6月11日）

01698 柯罗连科关于枪决女学生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7月6日）

01699 柯罗连科关于拯救儿童同盟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8月10日）

01700 柯罗连科关于制止枪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8月13日）

01701 柯罗连科关于保释托卡列夫斯基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8月21日）

01702 柯罗连科关于托夫卡奇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8月31日）

01703 柯罗连科关于枪毙人质问题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10月12日）

01704 柯罗连科关于别涅夫斯卡娅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11月2日）

01705 柯罗连科关于采特林案申诉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11月5日）

01706 柯罗连科关于行政性流放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11月11日）

01707 柯罗连科关于费先科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11月18日）

01708 柯罗连科搭救托尔斯泰的侄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0年12月29日）

01709 柯罗连科关于用行政方式处决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1年1月27日）

01710 柯罗连科关于接待杜德钦柯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1年2月5日）

01711 柯罗连科关于应通过法庭进行审判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1年2月15日）

01712 柯罗连科关于天主教神父被捕事给拉柯夫斯基的信（1921年3月7日）

01713 柯罗连科关于契卡未经批准实行枪决给拉柯夫斯基的声明（1921年6月15日）

列宁在1920年的几个讲话（1920年1月至10月）

专题说明

06544 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月12日）

06548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俄共（布）中央的政治报告（1920年9月22日）

11675 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1920年9月22日）

06545 列宁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问（1920年10月2日）

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

专题说明

05194 劳动农民联盟区委会告红军战士书（1920年10月）

05197 暴动农民的部队告应征红军战士书（1920年11月）

05196 卡麦隆关于坦波夫省暴动持久原因的报告（不早于1921年1月3日）

05193 给坦波夫省各镇压起义部队的命令（1921年3月13日）

05195 图哈切夫斯基致前线全体红军战士书（1921年5月19日）

05191 舍伊杰曼和瓦西里耶夫给图哈切夫斯基的通知（1921年6月21日）

05192 图哈切夫斯基给粮食征集委员会的命令（1921年7月8日）

苏俄驻爱沙尼亚使团的报告（1920年9月）

专题说明

04015 特别委员会关于苏维埃驻爱沙尼亚使团秘密工作条件的报告（1920年9月29日）

关于富农迁徙问题（一）（1928年6月至1931年12月）

专题说明

07321 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摘录）（1928年6月15日）

07322 乌拉尔州委第61次秘密会议记录（摘要）（1930年1月22日）

07323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关于“进入战备状态”的通知（1930年2月6日）

07325 富农事务委员会关于遣送富农的会议记录（摘要）（1931年7月8日）

07324 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
大清洗中的外国侨民（1936年2月至1938年4月）

专题说明

04019 贝格关于“波兰军事组织”案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936年2月3日）

04030 迪特里希给德共中央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处的报告（1938年4月29日）

叶若夫案件（1938年11月至1940年2月）

专题说明

04021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1938年11月17日）

04022 叶若夫关于辞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38年11月23日）

0402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免去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决定（1938年11月24日）

06447 叶若夫在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秘密受审时的最后陈述（1940年2月3日）

苏德秘密协定与战前苏德关系（一）（1939年8月至

1940年11月)

专题说明

05763 舒伦堡关于递交柏林声明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1939年8月15日)

05764 舒伦堡面交莫洛托夫的柏林声明(1939年8月15日)

05765 舒伦堡关于促成同里宾特洛甫会面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1939年8月17日)

05766 舒伦堡面交莫洛托夫的德国备忘录(1939年8月17日)

05767 莫洛托夫面交舒伦堡的苏联备忘录(1939年8月17日)

05768 舒伦堡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内容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记录(1939年8月19日)

05769 莫洛托夫面交舒伦堡的苏德条约草案文本(1939年8月19日)

05770 苏德贸易信贷协议(1939年8月19日)

05771 德国公司应提供的用苏德信贷协议贷款支付的各类设备(第一清单)(1939年8月19日)

05772 德国公司应提供的以苏联出口即行收入的自由资金支付的设备和物品(第二清单)(1939年8月19日)

05773 根据苏德信贷协议苏联所应提供的货物(第三清单)(1939年8月19日)

05774 苏德关于贸易信贷协议的秘密协定书(1939年8月19日)

05775 苏德关于贸易和信贷谈判的最后议定书(1939年8月19日)

05776 施努列关于德国政府将协助完成订货给巴巴林的信(1939年8月19日)

05777 巴巴林关于立即通知开始订货谈判给施努列的信(1939年8月19日)

05779 希特勒关于接受互不侵犯条约草案给斯大林的电报（1939年8月21日）

05780 斯大林关于同意里宾特洛甫访苏给希特勒的电报（1939年8月21日）

05782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苏德谈判消息给法国外长乔·博内的电报（1939年8月22日）

05783 法外长博内关于敦促波兰保持沉默给法驻波大使莱·诺埃尔的电报（1939年8月22日）

05784 迈斯基关于英国对里宾特洛甫访苏反应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1939年8月22日）

05785 法驻波大使诺埃尔关于同贝克会谈情况给法外长博内的电报（1939年8月23日）

05786 贝克关于对波苏军事合作立场给波兰外交代表机构的电报（1939年8月23日）

05756 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

05787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波兰立场给法驻波大使诺埃尔的电报（1939年8月25日）

05789 法驻苏大使纳吉亚尔关于伏罗希洛夫答记者问给法外长博内的电报（1939年8月27日）

05790 莫洛托夫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开讲话（1939年8月31日）

05791 雷巴尔科和沙罗诺夫关于德国入侵波兰致国防人民委员和外交人民委员电（1939年9月1日）

05792 迈斯基关于英国政府通报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39年9月3日）

05754 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1939年9月27日）

05755 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1939年9月28日）

05761 苏德关于划分利益范围的秘密补充协定书（1939年9月28日）

- 05762 苏德关于边界划分的秘密协定书（1939年10月4日）
- 11677 莫洛托夫关于斯大林对其柏林之行指示的记录（1940年9月9日）
- 05794 斯大林关于删除印度条款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0年11月11日）
- 05795 莫洛托夫关于收到来电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1日）
- 05793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
- 05796 莫洛托夫关于与里宾特洛甫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2日）
- 05797 斯大林关于芬兰问题说法不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0年11月12日）
- 05798 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
- 05799 莫洛托夫关于与希特勒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3日）
- 05800 莫洛托夫关于改变芬兰问题说法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3日）
- 05801 莫洛托夫关于与希特勒谈判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3日）
- 05802 斯大林关于与希特勒谈判方针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0年11月13日）
- 05803 斯大林关于与希特勒谈判策略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0年11月13日）
- 05805 莫洛托夫关于同戈林和赫斯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3日）
- 05804 莫洛托夫关于在黑海等问题上力争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3日）
- 05806 希特勒和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

05807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

05808 莫洛托夫关于同希特勒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4日）

05809 莫洛托夫关于不再报告谈判细节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4日）

05811 莫洛托夫关于苏驻德大使回国给斯大林的电报（1940年11月14日）

05812 魏茨泽克给德驻外使团的通电（1940年11月15日）

沃尔科娃与基洛夫案件（1956年5月至12月）

专题说明

06207 沃尔科娃关于基洛夫暗杀事件给苏共中央的信（摘录）（1956年5月30日）

06208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审查沃尔科娃的信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摘录（1956年7月18日）

06209 彼得罗夫致苏联检察院的申诉（摘录）（1956年12月12日）

封底